



赛福鼎回忆录

赛福鼎 著

赛福鼎回忆录

赛福鼎·艾则孜 著

译者 郭丽娟
王庆江
阿克拜尔·吾拉木

华夏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赛福鼎回忆录

赛福鼎·艾则孜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396千字 插页10

1993年3月北京第1版 199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053-664-5/K·055

定价：14.50元

目 录

上 篇

地牢中的磨难

第一部 童年时代.....	3
第一章 第一步——上学.....	3
第二章 “衬衫事件”.....	11
第三章 学校生活.....	19
第四章 曼苏尔·伊达耶提.....	22
第五章 小先生.....	26
第二部 辛亥革命与新疆.....	40
第一章 辛亥革命震撼四乡.....	40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新疆的武装暴动.....	42
1. 伊犁革命.....	43
2. “哥老会”运动.....	48
3. 铁木耳·海力帕暴动.....	50
第三章 杨增新统治下的新疆.....	63
第三部 在黑暗的地牢中彷徨.....	73

2239/3702

第一章	二十年代的新疆	73
第二章	革新主义在新疆	74
第三章	苏联十月革命对新疆的影响	78
第四章	重重压迫与巴依之间的纷争	82
第五章	苦难中孕育着的动荡	86
第四部	大动荡	91
第一章	哈密暴动	92
第二章	喀什暴动	112
第三章	攻打喀什	123
第四章	三方混战	130
第五章	内部冲突与外来干涉	137
第六章	三次战斗	140
	1. 依米提萨依之战	140
	2. 包围疏勒之战	145
	3. 死里逃生	149
第七章	和田暴动	151
第八章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54
第九章	和加尼牙孜和盛世才的联盟	161
第十章	马仲英在南疆	168
第十一章	对三十年代群众暴动的看法	174
第五部	血泊中的求索	181
第一章	盛世才执政	182
第二章	“狼种猪”	188
第三章	撕破伪装投入蒋介石怀抱	199
第四章	阿图什的新兴教育事业	205
第五章	留学苏联	221
第六章	塔城六年	251

下 篇

天山的红日

第一部 三区革命前夕的局势.....	283
第一章 在水深火热中呻吟的新疆.....	283
第二章 吴忠信入主新疆.....	287
第三章 对于三区革命的思想与组织准备.....	292
第二部 尼勒克暴动和三区革命政权的建立.....	298
第一章 尼勒克暴动.....	298
第二章 攻占伊宁和临时政府的成立.....	303
第三章 伊犁解放.....	311
第四章 组建民族军和改组政府.....	317
第三部 三区解放和逼近乌鲁木齐.....	324
第一章 解放三区.....	324
第二章 青年组织和人民革命党.....	330
第三章 进军南疆.....	337
第四章 塔什库尔干革命.....	345
1. 准备阶段.....	346
2. 暴动开始.....	348
3. 胜利之后.....	348
4. 革命的继续.....	350
5. 和谈开始.....	352
6. 三次战斗.....	353
7. 整顿部队.....	356
8.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的到来.....	356
9. 执行和约.....	357

10. 疯狂报复	359
11. 总结与思考	361
第四部 联合政府和针锋相对的斗争	362
第一章 和平条款的签订与联合政府的成立	362
第二章 针锋相对的斗争	371
第三章 乌鲁木齐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	374
第四章 南京之行	380
第五章 与泛土耳其主义者的斗争	385
第五部 新的斗争浪潮	391
第一章 喀什的民主选举与革命高潮	391
第二章 和田、莎车之行	398
第六部 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行为与和平条款的撕毁	413
第一章 各种挑衅与“2.25”流血事件	413
第二章 反对国民党阴谋诡计的斗争	429
第七部 解放前夕的斗争	438
第一章 总的形势	438
1. 全国的形势	438
2. 全疆的形势	439
3. 吐鲁番暴动	439
4. 三区的形势	442
第二章 新的任务	444
1. 军事工作	444
2. 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	447
第三章 民族工作	450
第八部 三区革命的历史意义	456
第一章 三区革命的爆发与胜利的主要因素	456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怀着三区革命	459

第三章	三区革命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464
	1. 彻底解放了三区	465
	2. 推动了全省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浪潮	466
	3. 军事工作方面的重大成就	466
	4. 脚踏实地地抓经济工作	468
	5. 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470
	6. 政治思想工作有了非常显著的进展	471
第四章	三区革命的性质.....	472
第九部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476
	第一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476
	第二章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482
	第三章 北京之行.....	500
	第四章 盛大的庆典.....	515

上 篇

地牢中的磨难

第一部

童年时代

第一章 第一步——上学

人的一定要迈出多少步，谁也数不清，可这些步子中有些却令人终生难忘。如果说脱离父母怀抱蹒跚迈出的第一步是极为重要的一步，那么长大之后进学校读书则应算是人生里程中更有意义、更令人难以忘怀的一步了。

我入学时只有六七岁光景。上学前，家人常常拍着我的头说：“快了，孩子，你要上学了！”于是，我便开始留心比我大的那些已经上学的孩子们的情形。我发现，有些孩子放学回家时高高兴兴，有些孩子放学回家时却神情沮丧，甚至哭哭啼啼。听说这些神情沮丧的孩子是在学校挨过揍、受过罚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满怀喜悦地等待着入学那一神圣时刻的到来，丝毫没考虑到什么“挨揍”、“体罚”之类的“厄运”会降临到我头上。

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缝好了小书包。小书包用紫色条纹土布缝制，一边缀有纽襻，另一边钉一颗扣子，可以把书包扣得严严实实。书包两边还缝了一条带穗的蓝色布带做为背带。这个小书包使我激动得难以自持。妈妈缝制的时候，我一直围着她，不时急不

可待地发问：“妈妈，书包什么时候才能缝好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背上它呢？”妈妈总是慈祥地笑着回答我：“孩子，别着急，到上学那一天，你就会背上它了。”

上学的一天终于盼到了。那天妈妈很早就把我叫醒，帮我穿上新衣裤，照看我吃了早点，然后庄重地让我把那个令我激动多日的小书包背在身上，打量了好一会儿，最后满意地点点头，在我额头上亲切地吻了一下说：“你可以去上学了，哥哥送你去。”就这样，我的阿布里孜哥哥牵着我的手，把我送进了学校大门。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上学那天的装束：身穿紫色条纹土布缝制的无领对襟长衫，腰系蓝色腰带，足登稍旧的红色皮靴，头戴小白帽，斜背着那个小书包。这在当时是标准的中等富裕家庭子弟入学的装束。当然，不少学生穿得比我阔绰，可衣衫褴褛、穿皮窝子上学的穷孩子数目更多。

走出家门，我立时被一种又兴奋又恐惧的感觉所笼罩。我愿意上学，不愿落在别的孩子后面，可此时我却想起了那些由于受罚挨打而哭哭啼啼跑回家的孩子们。听说“掌学”老师脾气暴躁，“他会打我吗？爸爸是个有面子的人，或许他会对我手下留情？”正当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之际，一群小学生看到我，把我拉到了他们中间……

我们村名叫瓦克瓦克，坐落在下阿图什的边缘地带。村南有一条河，北面与巴格拉村与硝鲁克村相连，村后由西向东是一溜土山，从这里可以望见阿图什西面的库玛里山，通往卡特亚依拉克的大路穿村而过，路北是碱滩，路南是干燥的戈壁。

学校设在买木提力·卡里老师家的院子里。他家院子在村尽头一条小渠边的磨房前。来到大院门前，我离开孩子们，紧紧抓住哥哥的手。哥哥刚一领我走进大门，买木提力·卡里老师便朝我们走来。我一眼认定这是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这位老师高高的个

子，长长的腿，留着稀疏的短胡须，习惯地皱着眉头，表情冷漠。他的眼皮下垂，双眼流露出冷冰冰的目光，使我一见便浑身战栗不止。他没有注意我的神情，迈着稳健的步子缓缓向我们走来。我不知所措，真想掉头逃走，可我怕孩子们笑我不中用，怕哥哥责骂，终于没逃。老师走近我们时微笑了。可不知为何，我觉得他的笑容比他的皱眉还可怕。

“喂，阿布里孜，你把赛福鼎送来了？”老师笑着与哥哥打招呼，然后微笑着拉过我的手向我说道：“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不好好念书，我可不会客气。”他的声音听来还算温和，我却感到厌恶。我试图挣脱他的大手掌，但他不放手。看看老师，看看哥哥，我差点哭出来，哥哥觉察到我的紧张，劝我说：

“好好念书。买木提力·卡里老师是个好人，我小时候也在这里念过书。”

就这样，我迈进了学校的大门，从学校开始了步入社会的第一步。

每当想起入学和念书的情景，我总有种异样而好笑的感觉。我十分怀念我刚刚入学时的那段学习生活。与现在的学校相比，我的这个学校简直太不起眼了，然而就是这所又小又简陋的学校把我引上了求知之路，为我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为此，对这所学校，对严厉的买木提力·卡里木老师，对我迈进学校第一步时的情景，我始终怀有一种神圣而念念不忘的感情。

第一堂课开始了。一个稍大的孩子从一间屋子里跑出来高声喊叫了一句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班长），孩子们立即停止喧闹，一窝蜂似地冲进屋里，我跟在孩子们身后走进屋子。这是学校仅有的一间教室，里面什么也没有，孩子们跪坐在墙根下，紧张地盯着屋门，那种神情真好像就要进来一只狼似的。手提小棍的老师进了门，孩子们在班长的带领下，一起从位子上站起来齐声高喊：“萨拉

姆！^①”老师走到前面墙根下低矮的小土炕前，盘腿坐在铺在土炕上面的一块旧毡子上，我们也随着坐了下来。老师瞪着圆鼓鼓的眼睛向四周环视一圈，然后高声说道：“赛福鼎、莫敏，到我这儿来，其他人自己读书！”我和莫敏走到老师面前，并排跪下。我惊恐万状，不敢抬头，莫敏却满不在乎地仰着头，还用胳膊肘顶了我的腰一下。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学生了。”老师盘腿端坐，摆弄着手里的小棍子，“你们绝对不能违反我的规矩。现在你们跟着我念：‘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②

我俩诚惶诚恐，丢三落四地跟着老师念了一遍，老师很不满意，又反复教我们念了几遍，最后吩咐我们：“你们下去念一遍数一次，到明天为止，要念完一千遍！”说完又让我们拿出本子和笔，在本子上给我们写了两个字母，然后叮嘱说：“你们看，这是‘艾力甫’这是‘拜’^③你们必须念熟，明天我提问你们。”我俩回到位子上，我颤抖地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开始和同学们一起反复诵读“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过了一会，老师又把另两个学生叫到小土炕前跪下，老师向他们问了句什么，可能他们没有回答出来，老师生气地大声呵斥，把他们的头用力向下按，接着伸出右脚，踏在他们头上，用手中的小棍子抽打他们的屁股。两个学生哭叫求饶，过了好一会儿，老师才放过他们。这个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怕极了，我害怕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同样挨打。比我大些的孩子告诉我：“书念不好你会挨打，要是你念得好，你的同伴念不好，你也会与同伴一起挨打。”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一打听才知道，这是

① 萨拉姆——维吾尔语，“您好”之意，这里为“老师好”。

② 伊斯兰教徒箴言，意为“奉仁慈的万能的真主之名”。

③ 维吾尔文的头两个字母“A”与“B”的发音音译。

老师想的一个办法,把两个学生编成一组,授相同的课,第二天同时检查,有一个人成绩不好,二人便一起受罚,像我刚才看到的那样。听了这番介绍,我更加胆战心惊了。

就这样,老师依次把一对对学生叫到土炕前跪下,检查旧课,传授新课。有的学生回答得好,老师很快就教授新课,有的学生回答不出便受到同样的责罚。全部学生都检查完,教授完新课之后,老师向着全体同学大吼一声:“自己读!”自己便翻开一本封面破损的旧书读起来。学生们背靠墙壁,半闭眼睛,晃动身体,可着嗓门高声诵读,声音之大仿佛要把屋顶掀起来。学生们反复诵读老师教授的功课,我和莫敏二人大声诵读“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

过了一会儿,学生们渐渐安静下来,原来有个学生要出去方便。那个学生走到门边被老师叫住,老师令他趴下,脱掉裤子,用棍子抽打他的屁股。那个学生痛得来回翻滚,不停地哭喊求饶。打完之后老师喝令他起来。挨打的学生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揉着泪汪汪的眼睛站立起来。老师冲着他怒冲冲地责问道:

“你是不是忘了规矩?”

“是的,老师。”

“下次还忘不忘规矩了?”

“再不忘了,老师。”

“记住,要出去必须先喊‘艾代卜’!”^①

那个孩子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师,带着哭声说了一声:“艾代卜,老师。”老师说:“去吧!”他才捂着被棍子抽疼的屁股匆匆朝门外走去。我不明白这又是怎么回事,别的孩子告诉我,这是老师立下的规矩,学生们谁要上厕所,必须先到老师那里请求准许,说一声“艾代卜,老师”,老师同意后方可出去。谁不喊“艾代卜”就出去必

^① 艾代卜——维吾尔语“规矩”,“礼貌”的音译,请求允许出去之意。

得受罚。目睹这一幕幕惩罚学生的场面，我吓得浑身又哆嗦起来。

我生平所上的第一堂课结束了，老师走出教室，孩子们像获得自由的小鸟一样，一下冲出小屋，飞出大门，跑到渠边。大家拿出家里带来的馍，蘸着渠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刚才那一顿顿可怕的棍打似乎一下被抛在了脑后。孩子们麻雀似地嘁嘁喳喳，嬉戏喧闹，在渠边摔跤打滚，尽情玩耍。只玩了一小会儿，便又该上课了。我们走进教室上第二节课，这节课老师没有来，由班长代行老师职责，带领大家复习。孩子们不时地打闹，戏耍，把班长急哭了，因为他若管不好我们要受罚，这也是规矩。他一哭，我们就老实了。后来班长出去一会儿，再进来后宣布放学。孩子们欢呼雀跃，一窝蜂似地往外跑，互相碰撞，接二连三有人被撞倒。冲出校门，孩子们甚至朝后望都不望一眼而飞也似地径直朝各自家中狂奔而去。

我就这样在求知路上迈开了第一步。回到家中，学校中发生的事情一幕幕闪现于脑际，挨打受罚学生的哭声在耳边回响，竟动摇了我继续上学的愿望。可转念一想，学还得上，挨打的事哪个学校都有，躲是躲不开的，除非哪个学校都不去，但是不上学，不求知，那不注定一辈子要愚昧无知吗？再一想，这一天毕竟学到了一些知识，“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是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还学会了字母“A,B”。无论如何，这一天没有白过，虽然老师严厉可怕，但学校生活对我来说仍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学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早晨照例要由老师检查旧课，讲授新课，每天要眼睛半闭摇头晃脑地背书，然后在渠边戏耍。老师几乎每天要惩罚一两个学生。最重的惩罚要算是打手心或脚掌心了。

有一天，有一对年龄稍大的“同课生”（即二人一组的两个学生）脚掌被打得流了血。他们的脚被抬放在一块木板上，由两个学生从两面抬木板，被打者仰面躺在地上，不停哭叫求饶。抬木板的

两个学生，一个忍不住地流泪，努力不哭出声来，另一个则把脸别转过去，紧咬下唇，眉头紧皱，默不作声。被打的孩子因何挨打，我记不清了，大概最多是逃学一两天，或者和别人打了架，再不就是打了人家的狗。那么小的孩子，会做出什么大不了的错事呢？而这样的惩罚确实可怕，甚至可以说残酷。那些对其它惩罚无所畏惧的学生都十分惧怕这种惩罚。我担心有朝一日我的脚也会被架到板子上。幸运的是直到离开这所学校我也没有受到过这种惩罚。不知是因为老师认为我没犯什么大错，还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对我手下留情。可其他的惩罚我未能幸免，如被老师踩着脑袋打屁股，罚站墙角，打手心等等，有过好几回。

每周星期四是最令我们担惊受怕的日子。按照惯例这一天是给老师送礼的日子。带来礼物的学生平安无事，没带礼物来校的学生可就要遇到麻烦了。每星期四早晨，学生们走进教室后先要像往常一样列队向老师问好，然后走到小土炕前，把家里带来的饅放在一块餐布上，钱放在旁边的盘子里。老师此时会看看学生，看看餐布和盘子，有时脸上绽出微笑，有时则露出怒容。学生们家境不一。家境不好、吃不起白面饅的只能带杂面饅，没有整饅的只好带半块，但无论如何，是没有不带饅来的。至于钱就不同了，能带钱来的不多，没钱带的不少。带钱来的学生一般带六个钱，顶多超不过八个钱（当时流通的铜钱，一枚铜钱算两个钱，这样的算法大概是当时的政府搞的什么鬼把戏。据说在和田不少人因不愿把一枚铜钱说成两个钱而丢了命）。带钱来的孩子把钱放在盘子里，没带钱的孩子垂头丧气，连“萨拉姆”也说不出，由于羞愧，他们可怜地躲避着老师责难的目光。胆子稍大一些的孩子会喃喃地告诉老师“因父亲不在家，没有钱”或“母亲答应明天给钱”，以搪塞过关。此时老师不打人，但他那恼怒的目光比打人还令人生畏，他粗暴地命令那些孩子坐到位子上去。事情并不会就此完结，什么都没带来的学生

这一天终究会被老师以种种借口打一顿。为逃避这一天的惩罚，有些学生干脆不再来校上学。当然，每次都能给老师带来礼物的学生毫无后顾之忧，他们很少受罚，有的根本没挨过打。他们的父母经常会给老师送些吃喝礼物，或者把老师请到家中吃顿油饼，这样老师就会对他们刮目相看了。

买木提力·卡里老师虽然对孩子们很严厉，但他确实还算是个好人。他有时也很温和，很慈祥。对学习努力的穷孩子，他虽然言辞刻薄，表面上也惩罚，可暗中却处处袒护他们。这些孩子不来学校时，他会亲自去找孩子的父母，说服他们让子女来校学习。对富家的孩子，买木提力·卡里老师是另一种态度。他很少惩罚富家子弟，但也极少给他们以真正的关怀。富家子弟不来上课，买木提力·卡里老师绝不会去亲自把他们追回学校，虽然也对他们进行辅导，但总不像对学习刻苦认真的穷孩子那样尽心，所以，村里的富人们不太喜欢买木提力老师。他们当面点头哈腰，背后对他侮辱谩骂。尽管他们知道买木提力·卡里老师知识渊博，可胜任宗教、语文、数学三门课的教学工作，但他们和与他同龄的宗教之士甚至不承认他是一位宗教学者。买木提力·卡里老师对村里那些所谓“德高望重者”的偏见并不理会，始终认真地管理着他创办的这所学校。我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半年左右，上了整整一学期课，学会了全部维文字母，了解了不少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收获很大。然而，不知是由于学生少老师难以为继，还是买木提力·卡里老师遇到了什么麻烦，总之学校最后办不下去了，我的学习生活只好随之中止。

童年时代我第一次的学校生活仅仅半年便告结束。我就读的这所学校的教学情况正是当时新疆教育情况的真实写照。听说其他学校的“学习气氛”并不比我们这所学校好。我们这所学校既教识字，又教算术，而其他许多学校除了开宗教课读《古兰经》之外，

什么都不教。因此，这所学校比较起来应当说还是比较先进的。

回忆小学生活，我忘不了我的买木提力·卡里老师。他的打骂学生，他的教学方法，他的索取星期四礼物都是时代的产物，对他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家长们告诫孩子，打人的棍子来自天堂，孩子按时挨棍子，来世才能发芽开花有出息。家长们视学生在学校受惩罚为天经地义。“星期四礼物”是当时教师的“薪水”，相当于现在的学费。当时不仅在农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小学教育都是靠“星期四礼物”来维持的。

如上所述，就整个社会和当时的条件而言，对买木提力·卡里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星期四索取礼物的做法除了不应当单纯地进行非议外，我甚至为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为他对我今后的深造与成长付出的心血而由衷地感谢。成人后，每每与当时的同学相聚，我们都会不约而同，满怀激情地想起我们的买木提力·卡里老师和他创办的那所学校，都会共同忆起在那所学校里发生过的种种童年趣事。这使我感到，“老师”、“学校”、“知识”是些多么神圣的字眼，这些字眼富有多么深邃的内涵！

第二章 “衬衫事件”

买木提力·卡里老师的学校倒闭，我失了学，便在家里由哥哥教我读书，哥哥不在时母亲教我。我不记得阿布里孜哥哥什么时候读过多少书，只记得当时他在家里管事，完全有能力教我。哥哥是长子，脾气好，又聪明，在家里很受大家尊重。我喜欢他，我的朋友也都喜欢他。

我的母亲识字，这在当时很不一般，因为那时妇女识字很少

见。母亲名叫萨里汗，外祖父是当时阿图什很有名的一位医生，名叫米纳瓦尔。外祖父亲自教孩子们读书，全家人都很有知识。除了医学书籍外，别的书也读得很多。

母亲教我读关于宗教规则的书，教我识字，读书，写字，算算术。学了几个月，我就会写字了。我记得，我学会拼写后，第一次歪歪斜斜地写的一句话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看后非常高兴，她对我说：“你好好念书，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母亲是位善良慈祥的女性，村里的穷苦妇女求她给外地谋生的丈夫写信，她从不推诿。母亲治家有方，对子女一视同仁，看书是她一大嗜好，一有空她便手不释卷。母亲虽然年轻，却颇受众人尊重。

父亲长年不在家，听说他有时在喀什，有时在莎车。父亲原名阿不都热西提，小时爷爷曾为他取名塔西^①，希望他长大成为一名强健有力之人，故我印象中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塔西阿洪”。爷爷名叫艾则孜阿洪，曾祖父叫阿不都热西提，高祖父名毛拉托乎提阿洪。再往上推我就知道了。按照维族取名的习俗，父亲是用他祖父名字命名，与他祖父同名。我的爷爷似乎是一位有着中等产业的人。我们村头有个巴仑达纳夫人麻扎^②，爷爷曾是这个麻扎的看坟人，因此人们也称他为艾则孜谢伊赫^③。爷爷生有二男三女五个孩子，分别取名塔西阿洪（我父亲）、库纳阿洪、帕蒂玛汗、热比汗、卓尔汗。我父亲娶了四房妻室，共有十七个孩子。他们是：穆伊丁、乃吉木丁、伊拉里丁、尼萨汗（以上几人的母亲为尼萨汗），阿布里孜、阿布都拉艾克、赛福鼎（就是我）、里瓦依丁、孜亚衣丁、买木比丁、

① 塔西——维语“石头”之意。

② 麻扎——维语“坟地”之意。

③ 谢伊赫——维语“看坟人”之意。

买提力丁、再娜甫汗(母亲为萨里汗),谢米西丁、孜维德汗(此二人母亲为阿皮孜汗),努斯来提汗、孜瓦尼汗、伊里潘(此三人母亲为图汗)。如今在世的有伊拉里丁、赛福鼎、孜维德汗、伊里潘等十四人。阿布里孜于1940年,里瓦依丁于1937年先后死于狱中,阿布拉艾克1987年去世。

在我印象中,父亲胡须花白,相貌堂堂。我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学校里念过书,只觉得他可能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宗教教育,他还通晓一些现代科学知识。不知是自学的还是听来的,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通今博古,还懂数学,似乎什么都知道。

据我所知父亲拥有许多财富和不少田产。开始时经商,后来转搞地方手工业。辛亥革命前后开办学校,从事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的活动。1911年(或1912年)当局以他参加“哥老会”为由要逮捕他,他得到风声,被迫流亡俄国。流亡生活使他眼界大开。听说他先后在俄国中亚一带、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逗留,后来去了芬兰。我们小时候听他说过,他到过—个地方,那里一年之中六个月是白天,六个月是黑夜。那个地方叫芬兰,靠近北冰洋等等。

父亲在俄国流亡三四年,和一个名叫雅可布的亚美尼亚人合伙把一座火柴厂的设备迁至莎车,以后又在喀什建了两三处小型轧花厂。此外,他继续从事反对保守、宣传新事物、开办新型学校的活动,还创办了以我们家乡为中心的手工业联社。

我失学后,听说莎车的火柴厂停产,父亲负债累累。母亲打算托人送我去莎车找父亲。物色半天,找到了我们村的艾山阿洪。此人是泥瓦匠,是个有名的角力手,人称艾山诺奇^①。我和艾山阿洪同乘一匹马上路。他坐前面,我坐后面。在他身后的马背上搭一条褥子,为安全起见,用一条土布带把我系在了艾山阿洪的腰上。他

^① 诺奇——维语“好汉”之意。

带着我三天便赶到了莎车。

旅途生活很有趣，我一向喜欢骑马、骑毛驴，但这次长途骑马跋涉可就不那么轻松了。我只觉得难受，觉得单调乏味，上路不久就紧紧抓住缚在艾山阿洪腰间的土布打起盹来。一打盹就坐不稳，艾山阿洪急得不停地提醒我不要睡觉。我们赶了一站又一站，受了不少苦。我记不清途中曾在何处投宿，途经哪些地方，只隐隐记得一天下午，到了一个叫克孜勒包伊的地方，看到那里的人们都头戴高筒帽，妇女们也戴着这种帽子，颇为有趣。人们个个高大魁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似乎不是赶集的日子，街上行人寥寥，间或可见牛车、马车或驮着柴禾的毛驴走过，再有就是无事可干的孩童在街上戏耍。

走到一个馕坑前，我看到一个人正在高声吆喝，夸赞自己的烤包子，他的伙计不停地从馕坑里取出烤包子往外扔。那些烤包子是那么诱人，使我馋涎欲滴，我招呼艾山阿洪买几个烤包子，他答应一声，却并不停下而径直赶到一家客店前下马。

这家客店院子不大，两侧是两排客房，正对大门的是前面敞开的马厩，里面拴着驴和马。我们拿着行李走进一间小屋，艾山阿洪安顿我睡觉，他却出了门，并把门从外面反锁上，。一会儿，我听到门响，同时一股烤包子的香味沁入肺腑。我一骨碌爬将起来。

艾山阿洪招呼我说：“快来，看我买来了烤包子！”他解开系在腰间的布袋，取出烤包子放在矮桌上，又从外面端来两碗（土陶碗）生水，告诉我烤包子蘸生水特别好吃，边说边把一个烤包子塞到我手里。

我从来没听说，更没见过这种吃法。不知是肚子太饿还是这种吃法特别，只记得那天我吃得特别有滋有味。

吃完烤包子，艾山阿洪领我出去逛巴扎^①，我们东瞅瞅，西看看，最后走到巴扎尽头，见柳树林中有一片空地，一群人围成一圈正在津津有味地观看着什么。我们从人群中挤进去一看，原来人们都在看摔跤。艾山阿洪领我在前排坐下，见四五对角力手正在激烈地较量。看着看着，艾山阿洪坐不住了，他不由自主地比划起来。旁边的一位老人注意到他，开口问道：

“喂，小伙子，看样子你也是个角力手吧？”

“唔，角力手不敢当，不过摔过几回。”

“怪不得，看你坐不住了。这是角力手的习惯。”

说着，老人起身牵着艾山阿洪的手，把他领进场内：

“请看，这位是我们的客人，一看便知是位好汉，谁想与他比试比试就请上场吧！”

人们一下对艾山阿洪发生了兴趣。艾山阿洪毫不推辞，接过老人递过的腰带扎在腰间，气势逼人地站在场内等待对手上场。人群中走出几个人叫阵，被艾山阿洪三两下摔倒在地，有的被举起来摔倒，有的被仰面朝天扔在地上。人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大多数人交口称赞，个别人似乎不大服气，把一位身材魁梧、健壮有力的小伙子推到场上。小伙子英姿勃勃，像一头即将扬蹄飞奔的雄鹿，浑身充溢着力量与智慧。人们对这两位勇士的较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人一交手，人群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人们屏息观赏。二人你来我往，不知摔了多少回合，不分胜负。精采的比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我正为艾山阿洪着急，忽见他瞅准一个空档机警地抱住了对方腰际，不容对方反应过来，大吼一声，将对方抱离地面，然后迅速转了几圈，将那个小伙子扔在地上。人群中如同投入一颗炸弹，一下子沸腾起来，爆发出一片喝彩声。被摔的小伙子似乎丢了

^① 巴扎——维语“集市”之意。

面子,不肯罢休,从地上一跃而起抓住艾山阿洪的腰带连声说道:

“不算数,再摔一次见高低!”

就在这当口,那位老人走了过来,他和蔼地劝慰小伙子说:

“算了,小伙子,角斗场有规矩,高手不是只交手一次决胜负吗?”

老人打发艾山阿洪赶快离开。艾山阿洪穿好衣服,牵着我的手离开人群,一些人簇拥着我们,走了很远才散开。就在这一天我似乎才明白“帕里万^①”的真正含义。

第二天继续赶路。越接近莎车,村落越稠密,房屋越多。走到一条名叫米夏河的河边,两岸柳树成荫,风景秀丽。右岸可见城墙。我们知道,这便是莎车县城的城墙了。

我们没有进城,在城外一个有着一扇大门的院子前下了马,这便是父亲居住的院落。父亲高兴地接待我们,与父亲在一起的有大哥乃吉木丁,后母阿皮孜汗和她的孩子谢米西丁、孜维德汗住在院子一侧,另一位后母图汗及其女儿努斯来提汗、孜瓦尼汗住在大院另一侧的房子里。

被称为工厂的这个地方其实只是一所大院落,孩子们可随意玩耍。在这里我和谢米西丁弟弟,还有父亲的亚美尼亚合伙人雅可布的两个儿子经常一起玩耍。

雅可布的家安在大院靠边一间高高的屋子里。雅可布是一位蓄着浓密黑胡须的英俊潇洒的男子,他的夫人围个围裙终日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不时朝我们玩耍的地方喊上几嗓子,叫他的儿子:“赛里,科吾克!”他的两个儿子哪个叫“赛里”,哪个叫“科吾克”,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们全家均能讲一口生硬的维吾尔语。雅可布家屋檐下的走廊上经常坐着一位姑娘,那是他的女儿,长得漂漂亮亮

^① 帕里万——维语,“摔跤勇士”之意。

亮，经常坐在走廊上看书。乃吉木丁哥哥经常站在院子里向姑娘那边张望。有一天我从姑娘家门前经过，姑娘把我叫住，问这问那，还给了我两块方糖，最后塞给我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指指正在涝坝边用锯子锯着什么的乃吉木丁哥哥，让我把纸条送去。我把纸条送给哥哥，哥哥看看纸条，朝姑娘笑笑，就打发我走开了。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一直没有忘怀。以后我才知道，我为他们传递的不是普通纸条，我充当了传递情书的小通信员的角色。以后他俩要求成亲，因我父亲不同意，两位有情人终未成为眷属。

我去莎车前，火柴厂就早已停工了。我们几个孩子可以自由进出厂房玩耍。所谓厂房，是个大厅，里面安装着相互衔接的大轮子、轮子上装有朝外伸出的长长的铁杆，拴在铁杆头上的皮绳此刻无力地耷拉到地下，听说以前这皮绳是用来套马的，这是一部以畜力为动力的简易机器，用途是切火柴杆。另外还有一间屋子是蘸火柴头、糊火柴盒和包装的工作间。这个工作间里的活计全部手工操作。据说这间工厂曾有过近二百名工人，他们当中大多是女工和童工。当时我不知道工厂何故停工，后来才听说停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雅可布乘我父亲不在之机私吞了一部分钱财，另一个是我大哥穆伊丁乘父亲不在厂之机大肆铺张办婚事，用光了所剩的生产基金。那场婚事之豪华铺张不仅闻名莎车，而且传到喀什，几乎人人皆知。

我在莎车只住了几个月便离开了。在莎车，父亲待我很好，晚上陪我一起睡，哥哥经常教我读书，对我关怀备至。可不久发生了一件极大挫伤我幼小心灵的事，使我哭闹着要求离开，又回到了阿图什。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星期前，妈妈托人给我捎来一件衬衫。看到衬衫我非常喜欢，同时强烈地思念起母亲，伤心得哭了一场。父亲让我试试，我一试，衣服窸窣作响，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洋布缝制而成的，上面有条

形图案。父亲让我把这件新衣留到古尔邦节穿，我急得等不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把新衣拿出来，看了又看。古尔邦节终于到了，节前那个晚上我把衬衫取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打算第二天一起床就穿。那天夜里我做了很多梦，遗憾的是一个也没记清楚，只记得梦中见到了妈妈，穿上了衬衫和小伙伴们一起过节。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兴冲冲准备穿新衬衫时，枕头下面的新衬衫却不翼而飞了。我哭了，哭得非常伤心，边哭边四处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当时父亲不在家，一大早就去清真寺做礼拜。大院里做活的一位妇女领我进屋，为我擦干眼泪，告诉了我衬衫的去向。原来是我的后母出于对母亲的嫉恨，竟在半夜偷偷摸摸从我枕头下面取出衬衫，用剪刀将其剪碎，将碎块扔进炉里烧成了灰烬。这种做法对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残忍了，就像撕碎了我稚嫩的心灵。我嚎啕大哭，跑到大门外等待父亲归来。父亲和哥哥做完礼拜刚到家门口，我便一下扑到父亲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叫喊：“我要妈妈，我要回家！”父亲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十分生气，乃吉木丁哥哥尤其怒不可遏，他说可能衬衫没被烧掉，只是被藏起来了，他手提利斧闯进后母房间，要劈开后母的箱子。女佣作证说衬衫确实已经烧掉，乃吉木丁哥哥更加生气，他当即把我领到城里一位名叫马木提的裁缝家里，请裁缝为我赶制一件衬衫。裁缝是个好人，很喜欢我，他放弃休息，坐在缝纫机旁，中午时分便为我缝制好一件漂亮的衬衫。哥哥一直坐在裁缝家等候，直到衬衫缝完。他让我试试，我哭闹着无论如何也不穿，再三哭喊这不是妈妈缝的那件。哥哥连哄带劝，好话说尽，总算帮我把新衣穿在身上。衬衫其实做得很不错，裁缝说衣料叫做“巴纳里斯”，和母亲用来缝制衬衫的衣料一模一样，也有条形图案。但在我眼里，世界上一切衬衫都比不上母亲为我缝制的那件。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裁缝为我赶制的衬衫虽然穿在身上了，心里却无论如何不能

平静。从那天起,我就一个心思要回阿图什,我早晨哭,晚上哭,有时半夜醒来把父亲叫醒,哭闹着要回家。当时父亲正准备和那个亚美尼亚人雅可布打官司,实在脱不开身送我,托别人又不放心。正在这时,我哥哥伊拉里丁从喀什来到莎车,于是父亲让哥哥把我带回阿图什家去。像来时那样,三哥伊拉里丁用布带把我缚在身后,我们兄弟二人合骑一匹马,顺原路往回赶。这次用了四五天才赶到阿图什。见到母亲时的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一见到母亲,我便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放声痛哭,似乎多日的委屈都要在这一刻宣泄出来似的。

母亲开始还安慰我。当她听我抽噎地述说“衬衫事件”的始末后,实在控制不住,抱住我也大哭了一场。当时在场的人都哭了。

这次莎车发生的“衬衫事件”一直到我长大成人,仍感到受到伤害的心灵难以平复,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第三章 学校生活

从莎车回到阿图什不久,我家院里办了一所学校,仅有一个班,外院一间宽敞的屋子做为教室。我们三四十个男女学生在这所学校读书,记得学校是母亲倡议,哥哥阿布里孜筹建的。当时哥哥在一所高级经文学校读书,课余时间管理家中一切大小事务。

我们学校请来一位名叫买木提明阿洪的老师,这位老师三十岁左右,是位忠厚老实的好人,他不打骂学生,主要教授宗教课程,也教点识字、数学知识。这所学校与买木提力·卡里老师的学校相比,学生似乎要自由一些,遗憾的是这所学校没能维持多久便办不下去了,原因是妒嫉他的毛拉们总是指桑骂槐地辱骂他是自封的

老师，阻止他来校上课。有一天，老师来得很晚，来校后便让我们进教室排成一排坐在墙跟下，而后把我们挨个叫到前面，用树枝抽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挨打，只听他边打边流着泪说：“孩子们，今天我要打你们一次，让你们记住我，明天我就不在这里了！”听了他的话，我们莫名其妙，有的孩子哭了起来，倒不是为了挨打，因为老师打得一点儿也不疼，是因为看到老师那种伤心的样子，受了感染。老师挨个打完我们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他转过身来看了我们好一会儿。我们什么也弄不懂，只是呆呆地站着。老师看了我们一会儿，非常和蔼地对我们说：“孩子们，明天我不会再来了，请你们别生我的气。”说完转身走出了教室。

第二天老师没有来。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我哥哥阿布里孜才来告诉我们老师走了，让我们各自回家。就这样，这所学校从此便不存在了。

这位买木提明阿洪老师直到 1987 年才去世，享年八十余岁。他生前是全国政协委员。1946 年我在喀什遇见过他，我们双方都感到非常亲切。他是一位开明的阿訇，解放后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始终积极工作。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我和他相遇，亲切交谈，非常高兴。我常常想起他，但有个疑问始终找不到答案，那就是他当时为什么打我们，为什么边打边哭？我们交谈时我曾问过他这件事，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你还记得那件事？当时家乡有些坏人造谣中伤，撵我走，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就打了你们一顿。”在座的听后都笑起来，其中一人说道：“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示啊！”

我家院子里创办的学校由于没有老师而关闭之后，我到一位叫托帕的老师开办的学校去读书。这个学校设在村北清真寺的正堂里，托帕老师高大魁梧，胡子略呈黄色，冬天头戴圆顶皮边毡帽，

夏天戴顶白帽，帽子上围一块小色兰^①。上课时他除了对太过火的淘气行为外，轻易不打人。然而他很严肃，平时极少有笑脸，经常粗暴地批评或严厉地警告学生，星期四学生没带孝敬老师的礼物时，虽然他不太高兴，但从不气急败坏地发火。

我们有时去他家帮他干些农活。有一次，我们正帮老师从路边往院子里搬砖，忽见大路上跑来许多骑马的兵痞，街上的人们又惊恐又好奇地观看。听说那是喀什马道台的兵，去打马提台。

在托帕老师的学校里，我从头到尾学习了初级宗教课程，开始读《古兰经》中某些较短的段落，此外还学习了《纳玛艾克》、《潘迪纳曼》等书。这些书我读不懂，《古兰经》更读不懂，因为这些书不是阿拉伯文就是波斯文。《纳玛艾克》和《潘迪纳曼》两本书中夹杂着一些维吾尔语，但通篇讲的是什么，却理解不了。以后我听别人说，那是些讲解教规和劝人行善的文学书籍。

我在这所学校里读了两三年就不去了。因为听说再往后那位老师就教不了了。在这所学校里我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流畅的阅读和流利的书写技能。

此后，我还在阿吉老师的学校里读过书，关于这段时间的学习生活我后面还要提到。在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很贪玩，常常玩得忘记回家：一出校门就去玩，有时玩上瘾会连书包丢掉都不知道。和小伙伴们一起玩非常开心，我们上树，爬墙头，在小渠里戏水，玩球，玩羊髌石，打仗，捉迷藏等等，花样可多了。我们还摔跤，可摔跤总以吵架收场，有时甚至分成两派，动起拳头一争高低。那真是一段有趣、难忘的日子。

^① 色兰——伊斯兰教男人的缠头巾。

第四章 曼苏尔·伊达耶提

有一天，我和一帮小伙伴在村里玩球，一个个大汗淋漓，忘乎所以，玩得好高兴。当我追着球跑到一条小渠边要拣球时，坐在渠边的一个人忽然站立起来，笑着问我：“你是赛福鼎吧？”我一边答应，一边奇怪地打量他。这个人一看就是外乡人，但他的姿态和微笑令人感到非常亲切。他身穿紫色长衫，头戴圆顶皮边帽，足登软底皮靴，个子高大，身体魁梧壮实，不知是刚刚长出还是有意蓄起的小胡子，使他显得非常神气。他风尘仆仆，一看便知是刚进行过长途跋涉。他走到我面前告诉我：“我刚从你哥哥乃吉木丁那里来。”说着，递给我一张折得很小的信纸。我一眼认出信上的字是哥哥的笔迹。信是写给我的阿布里孜哥哥的，大意是要我们好好接待这位送信人，掩护他躲藏起来，详情由送信人面告。送信人微笑着，亲切地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曼苏尔·伊达耶提。

我把他领到家中。阿布里孜哥哥看了信，待他非常热情，把他引入侧室交谈很久。我给他们送去茶点。后来哥哥带我拿着坎土曼、铁锹，到果园僻静处一株桃树下动手挖地窝子。挖了一会儿我累了，哥哥让我一边望风，不要让其他人过来，他自己挖。做脯礼的时候，哥哥挖好了一个相当宽大的地窝子，他让我取一捆秫秸和一个毡子铺在地窝子里。一切准备就绪，哥哥陪曼苏尔·伊达耶提吃过饭，便把他送到那个地窝子里安顿好。此事只有我们兄弟俩和母亲、姐姐知道，对其他人，尤其是外人我们严格保密。我负责往地窝子里送饭，哥哥每晚去地窝子与曼苏尔·伊达耶提交谈。我每次去地窝子都看到曼苏尔·伊达耶提在读书，从书上的记号看，我知道书是父亲的，我想大概是哥哥借给他的。

曼苏尔·伊达耶提向我要了些纸，好像在写诗。有时他把自己写的诗念给我听，我不大懂，他就给我讲。就这样，我俩成了好朋友。他很喜欢我，我也爱听他说话。我经常想：“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我很想问他，可又不敢，只觉得他是个神秘的好人。当我自认为和他的友谊越来越深之后，有一天终于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有人要抓你吗？”

“是的。我是逃犯，他们要抓我，说不定还要把我处死呢！”他笑着回答。

“他们是谁？”

“道台、伯克。”

“道台是黑汉人吗？”

“是的，是黑汉人，他的名字叫马道台。”

我为什么要问关于“黑汉人”的问题呢？这主要因为当时我们最怕的就是脑袋后面拖一条长长的辫子，头上戴一顶有疙瘩的黑帽子，身上穿一件长长的袍子，在政府衙门里干事儿的汉人。我想，要是被汉人抓去就糟了，所以我们务必得把这个人藏好。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我又问。

“因为我反对他们啊。”曼苏尔·伊达耶提笑着回答，“你要爱听，我给你讲。”

我当然爱听，于是他就给我讲述了他所经历的一切：

他和喀什一批学生举行游行，反对瑞士医院^①在喀什以治病为名行传教之实。瑞士人传播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他们收容城里的流浪儿，供其食宿，教他们念书，然后把这些儿童秘密送往国外，十年二十年之后，这批孩子重新出现在喀什时，便是在国外受

^① 瑞士医院——一些瑞士基督徒在喀什开办的一所医院。

过教育，脱胎换骨的基督教徒了。

几年之后我曾到那所瑞士医院看病，了解内情后我才真正明白当初曼苏尔·伊达耶提为什么要组织游行反对这所医院了。那次是阿提汗叔叔领我去的。进门后，一个人把我们领进大厅，大厅前面一排椅子上坐着许多穿戴得一模一样的孩子，这些孩子就是被瑞士人收容教育的维吾尔族流浪儿。我们坐在靠后些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到一位身穿西装、蓄着头发、不留胡须的男人走进大厅，径直登上正对大门的讲台。我听见人们称他：“艾山先生”。听说这位艾山先生是当初被收容选送到国外学习后归国的流浪儿之一。他既是大医生，又是传教士。他用维吾尔语传教，首先盛赞基督教，然后大讲特讲耶稣和圣母玛丽亚。他最后讲的几句话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说：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进果园，落在一棵柳树上。百灵鸟整夜为花儿鸣唱。天亮了，百灵鸟的双脚被柳树上新长出的细丝缠住，飞不起来了。百灵鸟呼救，哭泣，央求飞来的鸟儿和走来的人们解救它。有的人和鸟儿对它毫无恻隐之心，有的虽然同情它，却不知如何搭救。后来，园丁走来了，园丁看到鸟儿的脚被缠住，动了怜悯之心，拉断细枝，将百灵鸟救了出来。百灵鸟谢过园丁，落在一株玫瑰枝上尽情欢唱。人们啊，你们在危难中或者想进天堂时，必须清洗自己的罪过。向任何人请求怜悯，乞求恩赐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仁慈的园丁能解救你们，而那位园丁就是上帝的儿子——圣人耶稣。”

他的这番话令在场的人感到震惊。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成年人说道：“这是个异教徒，我们不能听他乱讲这种反真主、反穆圣的胡言乱语。”说完带领众人离开大厅。后来我听说来此医院看病的人都必须先进大厅听艾山先生说教，然后才能看病。

让我们继续听曼苏尔·伊达耶提的故事吧：曼苏尔·伊达耶

提和喀什一些学生为抗议瑞士人在自己的家乡宣讲传播基督教，进行反对伊斯兰教的活动和强行在我们家乡进行欺骗儿童的勾当，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人数越来越多，游行队伍行至医院门前时，人数已达数千。游行群众要求瑞士人出来对话，遭到无理拒绝，于是便冲入医院，捣毁了几间房屋。在瑞士人的要求下，政府派兵来到医院，强行驱散游行队伍，秘密捕人，一些人被捕，一些人逃走。曼苏尔·伊达耶提在乃吉木丁哥哥的帮助下逃离医院来到我们家中。据曼苏尔·伊达耶提讲，这次游行的组织者是以阿布杜卡德尔大毛拉为首的几个人。他们曾多次要求道台衙门封闭这家医院，驱逐这家医院的瑞士人出境，均遭拒绝，于是就组织了示威游行……

曼苏尔·伊达耶提在我家躲藏了一两个月。一天，我们收到哥哥乃吉木丁的亲笔信，要我们告诉曼苏尔·伊达耶提，事情已经平息，他可以回去了。这封信阿布里孜哥哥和曼苏尔·伊达耶提反复读了几遍，我估计他们是怀疑信上所说事实的真实性，然而这封信确是乃吉木丁的笔迹，丝毫不差。曼苏尔·伊达耶提认为，如果事情不像信上所说，乃吉木丁是不会写信的，因为乃吉木丁也是游行的组织者之一，经反复分析，曼苏尔·伊达耶提终于相信这封信是乃吉木丁亲手所写，信上所说事实确切无疑，于是决定回去了。

曼苏尔·伊达耶提走后不久，我们便听说，他半夜时分进入喀什市，敲响乃吉木丁房门，当乃吉木丁开门，刚刚惊诧地说了一句：“你怎么来了？”时，便有人从两边蹿出，将曼苏尔·伊达耶提抓走。那封信原来是一封伪造乃吉木丁笔迹的假信。

曼苏尔·伊达耶提自此音讯皆无。我长大当兵和当老师时，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一直没有结果。我想，他或许被杀，或许逃走，但从种种迹象分析，他死于道台衙门监狱中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曼苏尔·伊达耶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亲切的笑容。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思想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被我敬仰。当时被杀和失踪的人远不止他一个，游行活动的组织者阿布杜卡德尔大毛拉后来也被谋杀。据说是被半夜潜入他家的一个麦曾^①用刀子捅死的。凶手被抓，后台却未被追查。阿布杜卡德尔大毛拉的长子阿布里孜·买合苏木为此专程到乌鲁木齐告状，告了很久，但一直到死也没告出个结果。

据传，反对这次运动的是以喀什有名的巴依、富商吾麦尔巴依为首的一些人所为，他们充当某些外国反动势力的打手，从事里通外国活动。地方道台、县官便是他们的靠山。据说谋杀阿布杜卡德尔大毛拉的凶手虽然招供是被吾麦尔巴依收买的，但由于当局是吾麦尔巴依的后台，因此没有继续追查而最终使该案不了了之。

第五章 小先生

十三岁时我曾当过一个星期“教书先生”。人们大约不会相信：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如何能当老师？然而请读者相信，这的确是真的，我确实当过小先生。

我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戏剧性地走上讲台的。这一个星期的教书生涯不仅记载了我个人一个星期的生活，而且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

我想，十二岁以后的我应当算做进入了童年时代的第二个阶

^① 麦曾——伊斯兰教宣礼员。

段。在此阶段,我发现不少令我困惑不解的事。对于穷与富,对于宇宙万物,对于学校住宿生活等等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问别人,别人也解答不了。这期间,父亲早已破产,全家靠变卖家中物件勉强度日。父亲刚从莎车回到阿图什时虽未干什么大事,但还能维持全家人的小康生活。我们村里穷人、乞丐很多。穷人为什么受穷,乞丐为什么行乞,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受人欺侮,这些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为此感到十分苦闷。

我家有两位帮工,一位是柯尔克孜族,名叫加纳伊;另一位叫阿木提。阿木提管农务,加纳伊管家务。加纳伊身体强健,脾气暴躁,全家住在我家外院的两间小屋里。他的妻子叫帕坦木,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阿吉热木,一个叫买买提。加纳伊虽然是我家的帮工,比我们穷得多,但我们都非常怕他。没有他的许可我们谁也不敢骑马骑驴。据说城里那些当官的和当兵的也都怕他,一见到他就喊着“塔西阿洪柯柯克”(可能是说“塔西阿洪的柯尔克孜佣人”)惊慌跑开。这是因为有一次加纳伊进城,几个当兵的出言不逊,加纳伊大打出手,抓住一个兵痞,用其长辫捆住其双手,像提一只小羊羔似地提起来扔进图曼河。被扔的兵痞好不容易被同伙救上来,免于一死。自此,加纳伊便开始痛恨那些当官的和兵痞,当官的和兵痞们一听到“加纳伊”的名字也闻风丧胆,颇有谈“加”色变的味道。对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奇怪,加纳伊力气大,在我家权力不小,可他为什么比我们穷呢?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为什么天黑了又会亮,天亮了又变黑?类似这类问题我终日冥思苦想,想得头昏脑涨也找不到答案。在我眼里,整个大地是一块巨大的、扁平木板样的东西,一直往前会怎么样呢?大地尽头大概就是人们称做“地狱”的深渊吧?我问老师是不是这样,老师只说:“好好念书就行了!”我想,老师之所以不回答我的问题,大约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于是我去问父亲,父亲告诉我,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好好读书,长大就

就是“解散”这个词。我们遵循这些规则，在回家的路上遇到砖头瓦块、石头土块，就拾起来扔得远远的，这好像成了我们一种有趣的游戏，扔起来觉得很过瘾。这个规矩直至现在我还牢记不忘，上街散步，路上有什么东西我总会习惯地把它们拾起来扔到一边。

那所学校后来开始教语言和算术。所谓语言，是阿拉伯语，读一本名为《教育之倾注》的书，读不懂就背。所谓算术，是先学一到一千的数字，然后学乘法口诀（二二得四，二三得六……），算术也用阿拉伯语教授。有门名叫“艾布介特”的课程，是用阿拉伯字母表示数字，A 是 1，B 是 2，J 是 3……像学诗歌一样，我们不懂，只能死记硬背。

当时我已满十三周岁，快十四岁了。读过的书读懂的不如忘掉的多，父亲查觉到这个情况后，就在家里给我补课。每天早晨父亲讲，我们兄弟三人（阿布里孜哥哥、阿布都拉艾克哥哥和我）一起听。父亲教我们四则运算、字母读写规则，我们听得非常明白，我学得比哥哥好，于是父亲让我给两个哥哥当“老师”。（此时我甚至还成了小时给我上过课的阿布里孜哥哥的“老师”。）除了数学、语文，父亲还给我们讲授自然常识（日月星辰、天文地理等）。不管我们懂与否，他只管讲述，讲得很多，其实很多话我们听不懂。他常对我们说：“从地上取一把土经过加工就变成黄金。”当时我一点儿不明白为什么土会变成黄金，然而这句话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以忘怀。

现在该谈到我当“小先生”的事了。

那几年父亲没办工厂，也没经商，在家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反对宗教迷信的宣传和开办新式学校的活动。几个大毛拉反对父亲的观点与宣传，常在一些公共场合与父亲争论不休，甚至争争吵吵，

互不相让。阿图什有位名叫阿布勒阿吉的大喀孜^①，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来我家，我给他敬茶，请他入座，他对父亲说：“哎，尊敬的塔西阿洪，求你让我们活下去吧！我们不任神职，会无事可做，不收‘吾守尔’^②、‘扎卡特’^③、‘伊斯卡提’^④，会饿肚子。”

当时父亲在麦西艾提镇办了一所只有一个班的新式学校。有一天我在阿吉老师的学校下了课正与同学们一起玩耍，父亲骑马来找我，让我坐在他身后。起初我以为父亲接我回家，可我在他身后坐好后，他一拉缰绳却驱马往麦西艾提镇方向飞驰而去，我原以为父亲不带我回家是要带我去外公米纳瓦尔家，可到了外公家门前并未停马。我忍不住向父亲发问：“爸爸，你要带我去哪儿？”他说：“带你去当老师。”我说：“我长大才能当老师啊！”父亲一本正经地说：“不，今天就让你当老师，现在就让你当老师。”说话间我们已来到街上一个小小的院落门口。我们下马后走进院子，一位老大爷立刻把一群正在大喊大叫、打闹戏耍的孩子赶进一间小屋。父亲对我说：“我让你给这些孩子当老师，你看可以吗？”我一见父亲并没开玩笑的意思，便有些发慌地对爸爸说：“爸爸，我这么小怎么能当老师呢？”父亲说：“你能当，你给他们教字母，从A教到Y，给他们教数字，从一教到一百，教完这些我再告诉你往下怎么教。现在就去上课吧！”父亲语气坚定，不容推辞，不等我表态便牵着我的手进了充当教室的那间小屋。走进教室我更加紧张了，慌乱中我注意到教室里坐着大小高矮不等的三四十个孩子，他们整齐地坐在几排长板凳上。父亲向孩子们介绍：“你们的伊布拉音阿洪老师不能来给你们上课了，今后由这位小老师给你们上课。现在就开始。”学生们听了介绍，打量着我，小声议论着什么，后排几个高个子学生竟

① 喀孜——伊斯兰教法官。

② ③④——伊斯兰教宗教税收。

吃吃地掩口笑起来。学生们的议论和嘲笑使我更加不知所措。我拉了拉父亲的衣襟，用求饶的目光看着他，他毫不理会我的窘迫，一只手摸着我的头，继续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不要看他小，小也能当老师。你们以后也有可能当老师，所以，尽管这个老师小，你们也要听他的话，学会他教你们的功课。”说完冲孩子们笑笑就走出了教室。

此时，全班学生都盯着我，我看这些学生小的只有七八岁，大的约十七八岁。从前往后，学生个头越来越大。看着他们，我心里乱作一团，似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正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大人的咳嗽声，顺着声音望去，只见看门的老大爷坐在门口一张小板凳上向我微笑，见我看他，挤了一下眼，指了指染黑的一块墙壁和墙壁前面小凳子上放着的几块石膏和一条抹布。不知是这些东西提醒了我应做什么，还是老大爷的微笑鼓励了我，我以从未有过的勇气，走到黑板前，拿起充当粉笔的石膏，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母“A”（艾里甫），然后转身对学生们说：“这个字母念‘艾里甫’。”坐在后排的几个学生又笑起来，我不理睬他们，又在黑板上写了“B、T、S”几个字母，教他们读、写，让他们把这些字母抄到自己的本子上。学生们照我的要求抄下字母，我没检查他们抄得对不对。抄完后我领着他们读。我似乎觉得此时我的神情与买木提力·卡里老师完全一样，于是一颗跳动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开始了我当“小先生”的教学生活。

学生们渐渐习惯了，我也不再害怕，可后排那几个衣着讲究的大孩子总要寻衅捣乱。他们一会儿欺负穷学生，一会儿不听讲，自由活动。尽管如此，我也不再受他们的干扰而照常上课。

听父亲说，办这个新式学校，遭到了毛拉、喀孜们的强烈反对。开始他们对老师又打又骂，把老师赶走。后来父亲找来同村的伊布拉音阿洪当老师，他们又故技重演。伊布拉音阿洪老师一上街，不

是挨骂，便是遭到从他背后或玉米地里飞来的石块的袭击，那些人不择手段，一心想把他撵出学校。父亲暗中设法保护他，以避免发生不测。几个月后，有一次父亲因其它事不在，伊布拉音阿洪老师终于被蓄谋已久的几个人抓住，拖进一间屋子里痛打一顿，逼着他发誓——不当“秃尾巴学校”的老师。伊布拉音阿洪老师迫于无奈被逼发誓，离开了学校。老师一走，学校再次面临停课的危机，父亲找了几个人，均因对前两任老师的遭遇心有余悸，不敢来校任教，无奈，父亲只好领我前来给孩子们上课。

父亲当时或许认为他的儿子不致被赶走，可是事实上我只当了一个星期小先生便再未能继续当下去，其中的缘由我将在后面交待。这一个星期的生活，有快乐，也有烦恼。所谓“快乐”，是当小先生两天后，我想到了星期四礼物，想起过去看到老师收到学生送的铜钱，我们是那样眼馋，如今我当了老师，也会收到学生们送来的礼物了，我感到快乐极了，一心盼望星期四快些到来。星期四终于盼到了！那天早晨，我没像别的老师那样站在教室门口等候，而是径直坐在黑板前面的小板凳上等待那个快乐时刻的来临。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教室，我偷偷朝他们手上望去，学着买木提力·卡里老师的样子，伸出张开的右手。学生们走到我面前，把铜钱放进我的掌心，然后每人往铺在我面前的餐布上放一个饅（这块餐布我不记得是我铺的还是那位老大爷铺的了），右手掌心的铜钱放不下了，我把它们倒在左手里，一会儿右手掌的铜钱又满了。我一看，学生们已经到齐。星期四的礼物，有的孩子交得多，有的孩子交得少，多的六个钱，少的四个钱或两三个钱，也有个别孩子什么也交不出来。对什么也交不出的孩子我既不责骂，也不瞪眼。说心里话，我非常同情那些穷苦的学生，看到他们衣衫褴褛，我打心眼里难受。星期四礼物收完了，我把铜钱放在板凳上，开始上课。老大爷走进教室用餐布把饅包起拿走。我边上课，边瞅板凳上的铜钱。

午休时,学生们刚离开教室,我便赶忙数铜钱,数数,共有四五十枚。我小心翼翼地把钱包进腰带扎好,又担心地瞅瞅四周,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不知下午课是怎样上的,放学后,我一口气跑到外公家(外公家距学校仅有一二公里路程)。一进门我便高喊起来:“外公,我得到星期四孝敬费了!”说着,解下腰带,把铜钱倒进外公的手心里。外公高兴地抱住我,在我额头上亲吻一下说:“孩子,你成人了,能拿到星期四礼物了!”外公拿来一个陈旧的小罐,领我走到果园深处,在一株无花果树下挖了一个坑,把钱装进小罐,封好口,然后把小罐埋在这个坑里说:“今后得了星期四孝敬费,不要对别人说,直接拿来埋在这里,你说好不好?”我高兴地表示同意。这以后我每天早晚都到这里来一趟(当时我住在外公家),扒开土看看装钱的罐子,想象着今后拿到星期四礼物就把钱放到罐子里,一个罐子装满了,再用另一个罐子装,钱多了,罐子多了,把它们排成一排,啊,那是些多么令人激动的罐子啊!外公不让我对任何人讲把钱放到罐子里埋到果园深处无花果树下的事,但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急于要将此事告知妈妈。这个装钱的罐子和星期四礼物此后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那些美梦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是那样迫不急待地盼望下个星期四的来临。可我没料到,没等到第二个星期四,我这个“星期四”迷便倒了霉,不仅再没得到星期四礼物,而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学校。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那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课间休息时,学生们在院子里玩耍,我独自留在教室里。忽然院子里喊声大作,我从窗子往外一看,见几个巴依的孩子手拿长棍在捅穷孩子衣服上的破洞,以此取乐。几个穷孩子和他们对抗,巴依的孩子恼羞成怒,大打出手。我赶忙出去制止、批评巴依的孩子不该拿人取笑。一个叫黑力力·拉赫曼的大孩子不服气,顶撞说:“你胡说什么?”几个巴依的孩子为他撑腰,穷孩子们站在我周围为我助威。我们营垒分

明地分成两派，双方大喊大叫，打成一团。一个巴依的孩子把我一拳打倒在地，六七个孩子一下压在我的身上。看门的老大爷看到这个情景赶过来责骂学生，把压在我身上的孩子一个个拉开，将我扶起。老大爷非常生气，批评那些孩子说：“真不像话，你们竟敢打老师，成何体统！”老大爷帮我拍打身上的土。我的鼻子流血了，血流到衬衫上，使衬衫血迹斑斑（当时我身穿白土布短衫，腰扎蓝色腰带）。几个衣衫破旧的穷学生满脸是血，呜呜地哭着。我又委屈又恼火，哭着朝大门跑去。老大爷追了一阵，没能追上。几个穷学生哭着跟随我走出大门，我没回外公家，一路哭着跑回自己家（我家距学校约四五公里）。进了家门，见到父母，我更感到委屈，为了让父亲注意到我脸上及衬衫上的血，我大哭着扑到母亲怀里，此刻，挨打的痛苦已远远超过收星期四礼物的快乐，我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引起父亲的重视，使父亲能允许我离开学校。父母亲见我当时那副样子非常吃惊。我哭诉了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其中当然不乏夸大其词。母亲心疼极了，一边给我小心地擦拭脸上的血迹，一边生气地对父亲说：“你看，这个可怜的孩子变成什么样子了，他才刚刚十三岁，还不过是个孩子，我说过不行，你不答应，偏让他去当什么‘小先生’。这下好了，被学生打成这样，你总算看到了吧！”妈妈流着泪，帮我脱掉血迹斑斑的衬衫，劝我说：“好孩子，别哭了，咱们再不去就是了。走，我给你洗把脸。”说着，把我领进里屋。父亲什么也没说，对他来说，也许儿子挨打远比不上学校停办让他恼火。

母亲给我洗了脸，换了衣服。听到孩子们在院外玩球的喧闹声，我悄悄溜出家门，跑到孩子们中间。我跑得那样快，那样舒心，那种如释重负的愉悦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天我玩得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心。其实我那时觉得，当“小先生”，除了拿星期四礼物令我愉快，其余什么都令我厌烦，讲课是件很困难的差事，

有的孩子不仅不听讲，还设法嘲笑讽刺我，最使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当了老师还挨打。与当老师相比，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简直是一种解放，要知道，我还是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子啊！

在以后的岁月中，求学越来越难，以至最终辍学。其原因，一是因为家庭破产，为保证全家度日，我必须停学，减少开支；二是父亲完全脱离了学校，辍学之后父亲可以在家教我，（事实上父亲确实亲自教了我一年之久）；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阿吉老师（我当小先生之后来该校执教的另一位教师）时常打人。有一天，他让所有学生坐成一排，伸出手，用教鞭挨个打学生手心。他边打边让我们坦白是谁偷拿了清真寺的库拉^①。一个学生被打得受不住，告发了我和一个叫买买提的孩子偷拿库拉的经过。阿吉老师大怒，命我和买买提脱下长裤，让其他学生帮忙把我们按倒在地，痛打一顿。打完之后把我们吊在清真寺前一棵老榆树上，自己进寺做昏礼。我俩被打得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痛哭，同学们见状十分同情，却谁也救不了我们。

所谓库拉，就是放风筝用的长线。由于这种长线很难找到，因此对我们来说显得十分珍贵。那年春天，阿图什盛行放风筝，阿吉老师怕因此影响我们学习，把我们的风筝全部没收烧掉，而把库拉留在清真寺用做教徒们做礼拜时排队拉的绳子。我和买买提偷偷地又做了两个风筝，但没有库拉，于是半夜时分潜入清真寺，偷走了寺里的库拉。我们自以为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因此不管老师如何拷问，我们都咬紧牙关不吭声。我们清楚，如果我们承认偷了库拉，不仅会挨揍，会被开除，还要从此背上“小偷”的罪名，受到众人的歧视。可谁知还是被人告发，导致一次皮肉之苦。

① 库拉——一种放风筝用的长线。

说来凑巧，正在我们被吊在树上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父亲骑马来到清真寺前。他见状立即翻身下马，掏出小刀，割断绳索，把我们放到地上。我一下扑到父亲怀里痛哭失声，父亲向同学们了解情况，孩子们噤噤喳喳地诉说，我俩委屈地哭个不停。正在这时，阿吉老师做完昏礼走出清真寺，父亲气愤地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严加责问，申斥他说：“孩子即使犯了天大的错误也不能这样惩罚，你哪里像个教员！再说这不能算是孩子的过错，要怪应当怪寺里的管理员没管好。今后你要做到，一不能毒打孩子，二必须好好教书，否则你就滚回老家（阿吉老师不是本村人），我们会另请高明！”说完给我穿上衣服，让我骑在马后把我带回家去了。

我在这个学校学习两三年，收获不大。学了《纳瓦依》和《赛尔波》。《赛尔波》像是一本语法书，是波斯文，我们一点儿也不懂。这本书开始是“艾斯艾地，卡拉胡，非得达林……”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老师也不加解释，只叫我们死记硬背，还让我们不停地背诵什么“比丹是比丹，不是比汗，比丹的意思是‘知识’，‘比汗’的意思是‘学习’”这样一些押韵词句，实在让人厌烦透顶。虽然波斯文与维文有相似之处，但依我们当时的水平，学起来确实太困难了，正在我学得头脑发涨、不愿继续学下去的时候，父亲把我从学校领回家中。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但不久父亲去了伊犁，我在家中的学习便因此而中断了。

父亲去伊犁，是因为他在莎车的工厂倒闭后，我家在经济上发生了危机。我大哥穆伊丁、二哥伊拉里丁打算去苏联经商。他们与一个阿富汗商人筹办了一批羊皮、羊肠等货物去苏联，如能获利，准备与这位阿富汗人平分。谁知到了苏联他们被视为走私者，货物被全部没收，人也不知去向。乃吉木丁哥哥去找他们，没有找到。向阿富汗人赔款的事落到父亲头上。父亲变卖了一部分房屋田产，也没能还清赔款，那个阿富汗商人到喀什道台衙门告了父亲一状，道

台派衙役来我家抓父亲，由于我们事先得到消息把父亲藏了起来，他们没能抓到。深夜我们把父亲送到邻村麦特穆沙舅爷（此人是父亲的舅舅，是位颇有威望的长者）家躲藏。我每天去看父亲一次，给父亲送一顿饭。父亲躲在麦特穆沙舅爷家无花果园的一个地窖中，我从园子后面的豁口墙翻越进园。我家距麦特穆沙舅爷家约三四公里远，每天一个来回着实不容易。最让我头痛的是去舅爷家要路过一个小磨坊前的一座桥，磨坊的主人乌守尔瘸子养了一条凶狠的大黑狗，这条狗见了生人就追，我每次过桥都提心吊胆。黑狗经常趴在磨房前虎视眈眈地注视桥面，一听到脚步声就狂吠着奔过来。第一次过桥由于跑得快，没被它追上，吓得我够呛，以后我不敢从桥上走，拣了下游水浅的地方淌水过河。当时刚刚开春，河水冰冷刺骨，淌了几次水我冷得实在受不住，便又改由桥上过。那天我一手拿饭盒，一手拿根长棍，壮着胆子走到桥头。定睛细看，大黑狗似在熟睡，我撒腿便跑，这一跑可坏事了，黑狗被脚步声惊醒，从后面拼命追我，我想，这次肯定要被狗咬了！慌乱中我灵机一动，把饭盒放在地上，猛一转身向黑狗挥舞起手中的长棍，黑狗被吓得停下一个劲“汪、汪”叫，没敢上前。可我转身一走，它又追，没办法我从衣袋里取出一块馕扔到远处，哈，这一招还不错，大黑狗放弃对我的进攻，跑去找馕，我趁机赶忙逃走。以后，我使用这种办法对付黑狗，可每次过桥，心还是怦怦跳个不停。那条大黑狗在我眼里简直是个面目狰狞的魔鬼。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父亲悄悄逃往伊犁，一年后（1929年）在伊犁不幸过世。

去苏联的两个哥哥乃吉木丁、伊拉里丁后来也回伊犁落了户。穆伊丁哥哥据说在苏联参加了“解放新疆同盟会”，违反了苏联政府禁止成立秘密组织的条例，被苏联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服刑十五年，获释后被安排在苏联北部的阿尔罕格力斯基劳

动改造。1950年我到莫斯科时打听到他的下落。1959年他回过一次新疆。大约于1974—1975年间，他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伏龙芝逝世。

父亲逃往伊犁后，为寻找几个去苏联的哥哥，四哥阿布里孜也去了苏联。五哥阿布都拉艾克、小弟里瓦依丁和我三人留在家中。说句实话，阿布都拉艾克哥哥是个娇生惯养、游手好闲之人，指望他养家等于白日作梦。小弟里瓦依丁在经文学校读书。养家糊口的担子自然而然落在我的肩上。我们不能坐吃山空，为了全家十来口人的生活，遵照妈妈的意见，我和一名叫阿木提、一名叫买买提的人合伙种地。我干力所能及的轻活，负责把地里收获的粮食卖给粮贩子，预收粮款（粮价比市面价低很多）支付开支。后来因为水利纠纷，这件事没能办成。生活所迫，我又与一位名叫阿比勒的朋友合伙做花大布（即往白大布上印花的布）生意。这是父亲的老本行，父亲年轻时在苏联学习过，回新疆后对此手艺有所发展，发明了往白大布上印花的技术，并将此布命名为“花布王”。人们为此送给父亲一个“塔西阿洪花布王”的雅号。当时我们这一带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

塔西阿洪这加扎，^①
垄断了今天的巴扎，^②
白粗布上印上花，
丢弃了往日的麻扎。^③

① 加扎——有办法的人。

② 巴扎——集市。

③ 麻扎——坟地。

这首歌谣形象地描绘了父亲当时开创的事业如何红火。它有两重意思，一是说父亲发明新技术赚了不少钱；二是说做花大布等于丢弃了麻扎。所谓“丢弃麻扎”，指的是十一世纪阿图什著名的苏丹苏图克·布格拉汗陵园被水淹后，父亲曾争取一些巴依赞助，准备修复，动工后不知何故没修完半途而废。这首歌谣似乎是群众对父亲没有彻底修复这座宏伟壮观的陵园表示不满。

我们做花大布的生意没获成功，我又去当裁缝。我当裁缝纯属偶然。那是斋月（伊斯兰教历的九月）的一天，村里一个名叫阿布都什伯克的裁缝的缝纫机坏了，到我家借用缝纫机，我以六个月内教会我裁缝手艺为条件，将缝纫机借给他，母亲也同意我的条件，于是我就连同缝纫机一道去了他家。这个狡猾的裁缝不是叫我给他哄孩子，就是叫我给他喂驴，从不好好教我技术，干的活最多是让我熨熨衣服，锁锁边。他做活做到关键时刻就把我打发走。结果六个月过去了，我没能学会什么正经手艺。尽管如此，也多少看会了一点，把机器搬回家后我试着干起缝纫活儿。母亲多少会一些，有时帮帮我。我每星期缝制四五件且克曼布（一种土布）长棉袍拿到集市上出售，赚的钱有限，顶多够买点肉，打点灯油，很难维持生活。

总的来说，那些年我为谋生奔波，干这干那，直到1932年我十七岁时，参加了我们那里的农民暴动。

第二部

辛亥革命与新疆

第一章 辛亥革命震撼四乡

我为什么在此提及辛亥革命呢？因为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极大、影响颇深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正是我出生的前四年（我出生于1915年）。谈到我的出生年代，有必要谈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形势。

我出生的前几年，离我们村不远的阿图什镇和离我们村相当远的喀什等地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官员们的辫子和服饰变了，官员们的长辫子不见了，头上戴上了黑色大盖帽子；脱掉了有纽襟的长袍马褂，代之以四个口袋的制服。最重要的变化是旗子的变化：龙旗消失了，挂起了五色条旗。维族高级官员昔日头戴的有穗的帽子换成了很大的白色缠头布，满式绣龙长袍换成了维式对襟长衫。

当然，农民们仍旧在地主的田地上辛勤耕作，牧民们依然为牧主放牧牲畜，手艺人为了养家糊口，照常干着他们昔日的营生。在这些劳动者身上看不出什么变化。

看上去有些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却依然如故的本身正

是一场重大变革的结果。当时我们家乡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这种变革，他们只是感到困惑：说没变化吧，好多事儿都变了；说变了呢，这个世界仍旧是这么个样子，还是穷的穷，富的富……以后我才明白，在我出生的前四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

然而，由于革命成果落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所以人民群众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袁世凯政权仍然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我出生后两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人类历史由此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似乎没掀起什么波澜，农民们除了知道“沙皇倒台了”，其它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吃苦受累受剥削、受压迫是“命该如此”，“天经地义”。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则早已超越了国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当时我们这个小乡村似乎已被世界遗忘，即使如此，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伊犁革命也使乡亲们明显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动荡。伊犁闹革命的消息传到家乡时，早已不算什么新闻，但家乡的人们却仍将它当成头号新闻添油加醋地四处传播，使之最终成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强烈的节奏和感染力以及故事情节曲折的口头文学。这足以说明，当时那场巨大变革的劲风也曾在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地图上找不到、鲜为人知的小村子里轰轰作响地刮过一阵。

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在武昌爆发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反对独裁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成果。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封建王朝的残暴统治下蒙受欺凌压榨。到了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外推行卖国主义政策,对内加紧对人民进行压榨剥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进一步陷于半殖民地境地。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各族人民相继掀起一次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风暴,使中国大地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短短十几年中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其中有1894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等等。严重的动荡和矛盾斗争,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首先通过报刊杂志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宣传、教育群众。随着形势的发展,成立了各种革命组织,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等,最后根据斗争的需要,按照孙中山先生确立的纲领成立“同盟会”。“同盟会”统一了国内外各革命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的大规模革命斗争结果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制政权。

辛亥革命对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因势利导,使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进一步深入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时,新疆也爆发了数起武装暴动,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新疆的武装暴动

辛亥革命前后新疆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全国范围内风起云

涌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不波及到这块貌似平静的祖国边远大地。以下介绍的就是新疆对伟大的辛亥革命做出的一系列反应。

1. 伊犁革命

我记事后听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伊犁革命。我听说这个事件时，它已过去了几年，可人们对它仍津津乐道。当时我不明白人们何以对伊犁革命如此感兴趣，只是猜想，大约是因为伊犁革命的重要领导者杨缵绪后来在距我们村不远的喀什当了一个时期提督之故。通过进一步探讨，我认识到，杨缵绪当时做过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可能是人们对伊犁革命津津乐道的更重要的原因。

以后通过阅读史料，研究历史，我对伊犁革命的认识才更趋于完善。

伊犁革命指的是1911年11月7日伊犁惠远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猛进乡）爆发的一场革命运动。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被打倒的最大人物是当时的伊犁将军志锐，领导者的头号人物是杨缵绪，其次是冯特民、冯大树。

伊犁将军是当时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新疆的最高权力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他常驻惠远。惠远地处伊犁河北岸，防范极严。以惠远为中心，建有一条三角形的防线，共有九处，被称为“伊犁九城”。“九城”中至今尚存的有志霍城的清水河、芦苇沟、绥定（水定镇）等，此外还有巴彦岱、塔尔吉。其中有的现已成废墟，有的被后来兴盛起来的城镇所取代。我曾有幸参观过当年的“伊犁九城”，当我目睹九城构成的三角防线，估算其相互间隔大约相当于骑兵一天的路程时，实在惊叹不已！可以想见，当年三点中的一点发生变故，其他两地驻军可立即出兵援助。清政府为维护其在新疆的统治花费了多少心思，由此可见一斑。

在清政府自1759年设伊犁将军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伊犁将军

始终是清政府在北部中国(东北、蒙古草原、天山南北麓等)完善军政体系的重要一环,因此,设伊犁将军这一统治体系一直得以保持并不断得到加强。尽管截至伊犁革命爆发这个机构已持续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其间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发生过多次变故,但伊犁将军的军政大权始终未见削减,惠远一地在新疆政治、经济生活中所处地位与作用始终没有改变,因此,爆发于新疆军政最高领导中心的伊犁革命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对新疆各族人民肆意掠夺、盘剥,使新疆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镇守新疆的最高统治者伊犁将军盘据惠远城,任意屠杀、掠夺、敲诈、欺压人民大众,使新疆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伊犁将军和一切官吏除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疯狂掠夺,聚敛财富外,还从清廷领取高额薪俸。伊犁将军日薪一个元宝,支系长官月薪一个元宝。官员们出巡牧区一次,可得到不计其数的牲畜、白银;将军及其眷属外出,乘坐大轿,轿前五十名骑兵开路,中间鼓乐班子奏乐,后面卫队护卫,出衙时鸣炮6响,全市停业、戒严,停止一切活动。满族百姓享有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满人生男,从出生第二天即可领取粮食、俸银、生女亦可领取粮食。城内不准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居住。每晚一声炮响,少数民族百姓必须立即出城,城门关闭。

各族人民对这种残暴的统治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辛亥革命的巨大鼓舞下,终于揭竿而起,举行了伊犁革命!

这场革命是“同盟会”会员、旅日“同学会”成员杨缵绪、冯特民、冯大树等人发动并领导的。清政府原来派杨缵绪出任伊犁陆军协统。杨到伊犁后,遵照“同盟会”的指示,为在西北地区起事做了紧急准备。他们首先在兵营中广泛进行宣传,激发士兵们的反清情绪,为起义进行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杨缙绪等人通过分布在新疆各地包括伊犁地区的“哥老会”成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当时“哥老会”地方头目徐三泰为壮大力量，不分民族与信仰，吸收了一部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哥老会”。徐三泰本人当时被誉为“伊犁河之龙”。该组织宣扬“在反对清政府贪官污吏的斗争中，大家都是一家人”的观点，深得民心，吸引了不少群众。作为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义勇军团长徐三泰在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概，他所领导的队伍也以英勇善战享誉伊犁。

杨缙绪等伊犁革命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到，伊犁地区是各族人民聚居的地区，没有各族人民的团结战斗，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为此他们对维、哈、回等族群众坚持团结，争取他们参加斗争。他们的报纸《白话报》还出了维文版。这些工作颇见成效：暴动当夜，不少维、哈、回族群众参加攻打将军公署的战斗，艾肯木拜克、玉山巴依、牙合甫巴依等维吾尔巨商慷慨解囊，为革命军捐献资财。马得元、马凌霄等回族人在暴动中成为当时人所熟知的反清武装首领。总之，在伊犁革命中，汉、维、哈、回、蒙等各族群众团结一致，互相信赖，奋不顾身，并肩战斗，攻占了惠远城，枪杀了伊犁将军志锐及其爪牙吕顺、奸细春竹铭。不久，又攻占绥定，伊宁，宣告了伊犁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五族共和政府”。杨缙绪以总指挥的身份，任命前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并建立政府行政、经济、外交事务等部门，任命自己的部下充任负责人。

革命政权诞生后，为了巩固政权，杨缙绪、冯牧民等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继续争取各族群众的支持。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同情革命，表示拥护革命政权，如原蒙古察哈尔、额鲁特各营的总管、驻乌苏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及哈萨克各千户长等均属此列。这些上层人士多次得过宫廷恩赐，享有许多特权，但清王朝遭难，他们没与主子有难同当，却公开表

示拥护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他们感受到了群众对清廷的强烈反感，看到杨缵绪为首的革命者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加之暴动前后革命军的宣传深得人心，革命政权成立后，建立了比较进步的统一战线，执行深受各族群众拥护的民族政策等等。这些正是伊犁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杨缵绪为首的革命政府处理内部事务告一段落，经过短时间的准备，开始东进乌鲁木齐（原名迪化）。他们在五台、精河、沙泉子等地与乌鲁木齐驻军遭遇，展开激战，击败官军，开始攻打乌苏。

此时内地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政府被推翻，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迪化道尹，接管原总督袁大化掌握的一切大权，成为新疆的最高统治者。杨增新一上台便采用欺骗手段，平息伊犁革命，分化瓦解暴动首领，对革命的主要人物，许诺委以省或地、专、州级官职，破坏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瓦解革命军斗志，分化他们的队伍，然后或者赐与金银财宝，强迫他们去内地，或者威逼欺骗，迫使他们辞职离任。伊犁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杨缵绪被派往喀什任提督，杨增新的队伍开到喀什后，他们任意介入杨缵绪的公务，或者干脆包办代替，迫使杨缵绪愤然辞职，回返内地。有的领导者如贺家栋、郝可权等先调乌鲁木齐委以省民政厅行政长官之职，后于1912年年底给贺家栋一万两白银，郝可权两万两白银，诱骗他们回返内地。

对留在伊犁的革命者，杨增新的监督始终没有放松。他收买一批军事首领派往伊犁，利用这些人的手把革命者一个个暗杀，对同情革命的可疑分子，不论什么民族，一概收监或采用各种手段残杀。

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革命活动而只有些革命思想的人，杨增新也不放过。袁大化当政时，从其他省区调来当差或自流来疆的人

均被怀疑为播撒革命种子而来，杨增新将这些人或者遣送回内地，或者秘密处决，毫不留情。

轰轰烈烈的伊犁革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在当时的条件下，伊犁革命的领导者做了不少进步工作。他们推翻伊犁将军的独裁统治，整顿军队，关心政治经济一应事宜，减少税收，改进对外政策，规定男人剪长辫，女人放小脚，百姓见官不叩拜，不得对维吾尔人使用侮辱性称呼等等。他们还先后创办了《伊犁白话报》、《新伊犁日报》等报刊，宣传反清主张，提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杨缙绪等人组建的新政府向军队发布六项命令，其中包括遵守军纪、不许抢劫、不许侮辱妇女、不许吸食鸦片、不许经商、保护外国人等规定。此外还做出卫国不分民族、文明自觉、汉蒙回维哈各族完全平等等规定。

他们组织慰问团，到田间地头向农民宣讲政策，公布“成立协商局，征求民意”等十条章程，其中包括“欢迎群众提出任何建议，在政府机关门前设立意见箱，与提意见的人进行面谈，听取意见，对每项建议认真议处，给以答复，重要的决议要见报”等内容。他们要求各县依此执行，设意见箱，对群众建议处理后上报。

杨缙绪的新政府公布的这些法令、措施颇受群众欢迎，争取了一大批群众，由于贯彻执行了一系列进步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新政府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杨缙绪身为革命政府首领，亲自深入维、回群众，宣传汉族同各少数民族一样反对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强调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必要性。他们的宣传颇得民心，争取到大批维、回民众的支持。

杨缙绪到喀什当提督时也做了一些进步的事情，如听取群众意见，并做适当处理。他到和田做的几件好事，如支持群众反对从俄国来的俄国商总色依提阿吉——该人诱惑于田县策勒镇一些商

人和群众冒充俄商或煽动他们加入俄籍(因俄商在新疆经营进出口贸易不纳税)而掀起骚乱,反对俄国驻喀什领事馆以保护本国侨民权益为借镇压策勒地区以苏甫尔盖为首的群众等,也在群众中间得到口碑。

关于伊犁革命,当时有两件事使我最感兴趣。一件是汉族男人剪辫子,另一件是汉族女人放小脚。男人留长辫在小孩眼里是件很古怪的事。清朝初期,由于要求留辫子曾导致多起惨案。在新疆,清政府没有对穆斯林采取强硬措施,这或许是怕引起麻烦,也可能是他们在新疆建立自己的政权时,在关内已执政百余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留长辫为象征的民族感或许已稍有些淡漠之故。

妇女裹小脚在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看来更加不可思议。每当我进城看到那些费力地移动着三寸金莲的女人,特别是上了年纪,行走不便的老妪,便会油然而生怜悯之情。

按照小伙伴们们的说法,似乎发生伊犁革命的一夜之间,汉族男人的长辫便齐刷刷地被剪掉,汉族女人的小脚也一下子被放开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若干年后,我在莎车、喀什等地仍见到过不少留着长辫的汉族男人和移动着三寸金莲的汉族妇女。对此我颇感困惑,我只能解释为:“这里不是伊犁!若在伊犁,他们的辫子早就会剪掉,小脚也早就会放开,放开的小脚大约已经长成大脚了。”及至后来,我更加成熟老练一些后才明白,剪辫子、放小脚只不过是伊犁革命诸多政治口号中的一条。这些口号完全变为现实谈何容易!我早先的解释只不过是孩子的幼稚想法而已。

2. “哥老会”运动

“哥老会”是遍布长江流域各省的一个组织。所谓“哥老会”,就是“兄弟联盟”之意。这个组织秘密成立于清朝中期。据我所知,它是随着左宗棠的士兵开赴西北,进驻新疆而传来的。

这个组织传播很快。它起先在士兵中发展成员，后来发展到军官，再后来就发展到社会各界了。手艺人、流浪汉、地痞流氓等都纷纷加入了这个组织。国内不少地区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有的直接参加，有的或公开或暗地表示同情支持。这个组织的基本纲领是反对清王朝，口号是“团结、礼义、互助”，采取秘密的活动方式，用读小说、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宣传鼓动，暗杀贪官污吏。

当时这一组织遍及新疆各地，尤其在伊犁和喀什的军队中，参加者非常之多。

辛亥革命爆发当年，许多“哥老会”成员相继来到南疆，与当地会员一道进行反清宣传，开展反清活动。1912年，喀什、阿克苏、焉耆、轮台、库车等地先后发生哥老会会员暗杀贪官污吏、夺取政权的暴动。他们杀富济贫，保护百姓，受到群众拥戴，不少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参加了“哥老会”组织。

关于“哥老会”的上述活动，还可举出几个典型事例说明：喀什哥老会成员边永福、魏得喜等刺杀喀什道尹袁鸿佑、参将冯殿臣；阿克苏道台陈正源、库车知州潭昌国、焉耆道台张铤、伊吾县知州等均为哥老会成员所杀。

“哥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暴动，得到各族民众的积极响应，伊犁、喀什等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其尤为支持。（我的父亲塔西阿洪不知是因为参加了“哥老会”还是和他们有联系，官府镇压“哥老会”时，父亲竟也上了官府的逮捕名册。由于事先得到风声，才得以提前逃亡俄国暂避。）

杨增新上台后，积极配合全国范围内对“哥老会”的镇压，要在新疆把“哥老会”成员斩尽杀绝。首先，他们把“哥老会”的头目从群众中分化出来，然后一个个加以杀害。如对付在喀什暴动、杀死喀什道台袁鸿佑的“哥老会”头领边永福、魏得喜、陈德光，先以委以重任为名将其骗至乌鲁木齐，而后送边永福至甘肃、魏得喜至内

地，留下陈德光在乌鲁木齐无法存身也去了甘肃。杨增新接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边永福、陈德光进行诬陷，借甘肃有关人士的手杀害了他们。

“哥老会”在当时还算是个进步组织。虽然它没有完成什么革命大业，但毕竟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3. 铁木耳·海力帕暴动

截至现在，本书已出现三个人物与当时发生在新疆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这三个人物就是袁大化、杨增新和杨缙绪。袁大化当过新疆都督，杨增新任过督军、杨缙绪则发动了伊犁革命。从历史资料看，三个人无论从官职和当时人们的看法看，排列顺序似乎都应当是：第一袁大化，第二杨增新，第三杨缙绪。而在我的记忆中，从知名度看，排列顺序却与史料完全相反，即第一杨缙绪，第二杨增新，第三才是袁大化。为什么袁大化排在最后？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才明白，这是因为当时流传的传奇性的故事中袁大化这个名字极少出现之故。

袁大化的名字只是在哈密农民暴动的传说中才出现。讲故事的人总以这句话开头：“那是袁大化当都督的时候……”

我一直想了解哈密农民暴动的详细经过，可直到1940年作为三区革命代表出任新疆联合政府教育厅厅长时，我才实现了这一愿望。

哈密暴动是哈密农民为反抗哈密亲王沙木胡苏特的专制独裁，在铁木耳·海力帕率领下进行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是当时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是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哈密王自十八世纪中叶起设置于新疆哈密。清政府出于对天山南北行使统治权的需要，自1760年开始在天山北麓游牧地区实

行郡王制度；在乌鲁木齐周围的农业区实行县制；在塔里木河流域实行阿克木伯克制。哈密虽是农业区，却地处塔里木河流域，故仍实行扎萨克郡王制。清政府给该地区统治者以极多的封建特权，明显地表现出清政府对哈密王的格外关照。平定大小和卓暴乱之后，清政府给那些与清廷患难与共的维吾尔封建主加封了“郡王”封号。受封的有哈密的额贝都拉、吐鲁番的伊敏和卓、库车的扎依提、乌什的禾吉斯等。其中哈密的额贝都拉是第一个受封的。这一封号自额贝都拉始代代相袭，一直传到沙木胡苏特亲王。据说沙木胡苏特曾亲自押送三十几车贵重物品前往京城给慈禧太后进贡，受到慈禧太后召见并赐封“尊贵王爷”称号。沙木胡苏特亲王是历史上哈密王中嗜杀成性的暴君，也是最忠于清王朝的封建王爷。

沙木胡苏特亲王是哈密地区最大的剥削者。占哈密地区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沙木胡苏特王家族霸占了该地区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一。仅沙木胡苏特个人的田产就达三万四千余亩。他榨取土地税、水税及其他苛捐杂税，令农民为他无偿服役，极尽敲榨勒索之能事。以前的王爷规定农民每月为王府服役三天，到沙木胡苏特王执政，竟增至五至七天。除此而外，王府开荒、种地、伐木、挖渠、采煤等等私事也无一不从民间抽伏。

沙木胡苏特亲王骄奢淫逸，仅行宫就在乌鲁木齐、兰州等地建有多处，他在北京建一处行宫，耗银达七万五千余两。

辛亥革命前夕，内地各省区相继爆发反清起义。受此影响，1907年夏，哈密农民也举行了反对哈密王的武装暴动，提出取消无偿服役的口号。他们搜集大量砖石瓦块投向王府大门，表示斗争的决心。

沙木胡苏特亲王被起义者的人多势众所震惊，不得不做些让步。在清廷官员的调停下，他将农民为王宫无偿服役时间由每月七天减至三天，为表示诚意，他特地宣誓并立了一块石碑为证。然而

农民起义军一经解散,沙木胡苏特亲王立即背信弃义,自食其言,下令逮捕“闹事”者首领。农民们无奈,只能再次高举义旗,举行暴动。沙木胡苏特亲王派人给巴里坤镇台易盛富送厚礼行贿,请求派兵镇压。易盛富一伙穷凶极恶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军,残酷杀害了起义军首领土尔帕克、杜戈买提等人。新疆近代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土尔帕克起义”。

“土尔帕克起义”后,哈密农民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压迫。乌鲁木齐的袁大化政府与哈密王串通一气,在哈密推行“无论如何,绝不放松。只许老老实实,俯首贴耳听命”的镇压措施。他们进一步增加徭役赋税,增加为哈密王无偿服役的时间,王府官差任意摊派给农民。无限延长的无偿徭役加速了广大农民的倾家荡产。王爷及其官员肆无忌惮地抽派农妇为他们干家务,更有甚者,他们竟随意蹂躏少妇少女,连幼女也不放过,致使不少人致残,不少人丧生,令农民们忍无可忍。

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覆灭,伊犁革命的轰轰烈烈以及各地贪官污吏被“哥老会”相继暗杀等事件,动摇了哈密农民头脑中“王爷神圣、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越来越重的盘剥压榨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终于揭竿而起,举起了反对袁大化政权及哈密王武装暴动的义旗。

铁木耳·海力帕是当时农民暴动的领袖。他又一次提出“土尔帕克起义”中提出过的“不为王爷无偿服役,只给政府纳税缴粮”的口号。

铁木耳·海力帕出生于哈密县南湖村一个贫苦木匠家庭(有书记载他1891年出生于吐鲁番一个贫苦雇工家庭。其父在残酷的苛捐杂税盘剥下无法养活一家四口,被迫于1893年迁至哈密库拉依村落户谋生。铁木耳十五岁时被父亲送出学木工),在初级经文学学校读过书,多少有些文化。他经常被王府抓差服役,为王爷修理

拉拉车、木犁等家什，年龄稍大些后由于难以忍受王爷敲骨吸髓的剥削，逃到乌鲁木齐，颠沛流离，四处流浪。这段时间，他接触到“哥老会”的宣传，接受了一些反对君主制度的先进思想，头脑中萌发了反对王爷制度的念头，于是从乌鲁木齐回到家乡南湖村，不久便举家迁至库拉依村，在群众中进行反对哈密王制度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库拉依村位于哈密北部天山脚下。村里的全部土地均属哈密王及其手下官吏所有。农民们以租种土地，为王爷及下属放牧牲畜为生，身受重重压迫，苦不堪言，极易接受铁木耳·海力帕关于反对王爷制度的宣传。他们拥护铁木耳，处处为铁木耳提供方便。

伊犁革命胜利后，总督袁大化为了把杨缙绪等人建立的新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欲向伊犁派兵，向各地摊派壮丁以做兵源。哈密王开始给袁大化送去二百壮丁，袁大化吃了败仗，向哈密王要求再增派五百名。

沙木胡苏特亲王对袁大化言听计从，满口应承。他以支付“军费开支”为由，向各户摊派白银十至四十两。所得钱财缴袁大化一部分，其余用于抓丁支付。抓丁时，有人的出人，出人需自备衣物、坐骑；没人的需备一百两白银、五十两纸币、一匹配备马鞍缰绳的骏马和一套衣裤，找一位顶替者。就这样，沙木胡苏特亲王从哈密市周抓丁二百名，从山区抓丁三百名，凑齐了袁大化所要的五百壮丁。

重压之下的哈密群众愤怒之极，对抓丁极为不满。铁木耳·海力帕看出这是发动群众的最好时机，便与卡拉伯苏克、托乎提等十余人密谋潜入兵丁队伍，准备夺取武器装备，为正式发动暴动做好准备。

1912年3月沙木胡苏特亲王派艾介尔巴克伯克率五百名壮丁前往乌鲁木齐交差。这支队伍行至三道岭，被早已等候在此的铁

木耳·海力帕、卡拉伯苏克、托乎提裁缝等人截住。铁木耳·海力帕等人进行公开宣传，号召兵丁们不要为哈密王和将军送死，号召他们为争取自由幸福向后转，号召兵丁们与袁大化、沙木胡苏特亲王进行斗争。这番号召深得军心，五百壮丁中有三百人积极响应，当即返回库拉依，公开宣布反对抓丁，反对沙木胡苏特亲王的残暴统治。哈密各界人士纷纷表态支持铁木耳·海力帕的行动，包括和加尼牙孜在内的不少人参加了铁木耳·海力帕的队伍。铁木耳·海力帕的队伍迅速壮大，很快超过一千人。

沙木胡苏特亲王对此深感震惊。他派赛丹夏大阿訇，在北京出生长大的肉孜和加及回族阿訇马昌龄、艾山巴拉阿吉等人做他的说客，前往铁木耳·海力帕处企图通过宗教途径予以调停，遭铁木耳·海力帕拒绝。沙木胡苏特亲王见调解不成又妄图以金钱财宝为诱饵，骗铁木耳等上当，然而起义者们尚未忘怀“土尔帕克起义”的惨痛教训，他们毅然表示，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停。

诱骗没有成功，沙木胡苏特亲王十分恼火。他发誓定把他们斩尽杀绝，焚尸扬灰、没收土地、没收财产，并从外地移新民，重建新村。沙木胡苏特亲王为达此目的多次派兵进攻铁木耳·海力帕起义队伍驻地，但屡战屡败。沙木胡苏特亲王为此惊慌不安，只好向血腥镇压土尔帕克的老牌刽子手易盛富求助，他派人送易盛富白银二百两请易出兵，易慨然应允，亲率一百三十五名士兵从巴里坤出发。不料消息被他的翻译、参加过暗杀艾西来甫乡约和伊吾县知州的“哥老会”成员张存仁泄漏给铁木耳·海力帕。铁木耳·海力帕在哈密南山口埋伏一支队伍，恭候易盛富一行。易盛富的人马进入埋伏圈，被起义军全歼。易盛富见状不妙，乔装打扮，躲藏在一户人家，却未逃过义军中一名叫吾孜霍加·艾合买提的战士的眼睛。这名战士捉住易盛富，愤怒地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活活劈死。原来这个战士的父亲惨死于“土尔帕克起义”，易盛富的的手上沾

满了“土尔帕克”们的鲜血，吾孜霍加·艾合买提向他讨还了血债，替自己的父亲和“土尔帕克起义”中的一切受害者报了仇，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易盛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沙木胡苏特亲王得知易盛富的惨败与死讯更为焦虑不安。他怕哈密人追随铁木耳·海力帕，特地组织起一支没有哈密人在内的，由维族和回族组成的约四百人的队伍。他挑唆这支队伍与铁木耳·海力帕的起义队伍为敌，命令这支队伍在沁城一带与铁木耳·海力帕的队伍交战。哈密王沙木胡苏特万没料到他精心训练的这只队伍与起义军仅对峙三个多月，便被士气旺盛的起义军打得溃不成军，仓惶逃回哈密。

就在这时，袁大化来到哈密。原来杨增新到新疆走马上任，袁大化卸任东行入关途经此地。沙木胡苏特亲王见到袁大化如遇救星，迫不及待地向袁告铁木耳·海力帕一状。袁大化的护兵中有一百五十名是当初没有追随铁木耳·海力帕的哈密籍兵士，五百名是率部向袁大化省军投诚的原伊犁新军团长钱广汉的部下。袁大化派钱广汉率领护兵镇压铁木耳·海力帕的起义军。

沙木胡苏特亲王向钱广汉许诺：“镇压哈密造反军，赏他本人五十枚元宝，部下每人元宝十枚，士兵发放三月军饷并赏赐大量财宝”。

钱广汉率兵驻扎托鲁克村南的阿克秋克河谷，特意运来铡俘虏用的铡刀。沙木胡苏特亲王为了让钱广汉更好地为他卖命，向农民摊派大米白面、鸡鸭蛋品、烟酒马匹等酬劳钱广汉部队。

铁木耳·海力帕的义军驻扎在托鲁克村南的一个高地。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雄赳赳开赴战场。为制造声势，恫吓敌人，人们把花帽、圆帽、皮帽等摆放在高地上。钱广汉一见，误以为起义军人多势众，不敢贸然进攻，只是试探性地进行炮轰枪击。铁木耳·海力帕不急于率领这支以棍棒为主要武器的队

伍发动攻势，命令托乎提裁缝、卡拉伯苏克等率人迂回到敌人后方，乘敌军不备发起攻击。

腹背受敌的钱广汉部队不战自败。钱广汉扔下留在河谷中的三百余名士兵尸体与伤员仓惶逃回哈密。钱广汉吃了败仗，沙木胡苏特亲王仍不敢得罪他，怕他迁怒于自己，对自己更不利，于是派手下一个名叫朱月禄（音译）的人将许诺的钱财送至钱广汉下榻的城隍庙，不想朱月禄见钱眼开，将钱财私吞。钱广汉十分恼火，欲杀沙木胡苏特亲王以泄愤，便以祭奠阵亡将士为由，邀沙木胡苏特亲王来驻地。沙木胡苏特亲王一到祭奠场所，钱广汉即令手下开枪，沙木胡苏特亲王动作敏捷地逃上皮包车侥幸逃生。

沙木胡苏特亲王不明缘由，经解释方真相大白。钱广汉盛怒之下，下令攻打朱月禄营房，朱月禄无力抵抗，被迫交还全部金银财宝，纠纷才得以了结。

铁木耳·海力帕大获全胜，缴获三四车武器弹药，又从敌军死尸及伤员手中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还有不少人参加了起义军。经过这次战斗，起义军数量增多，武器装备改观，士气大增。起义军迅速控制了哈密十二个山区，同年冬天，一举攻占头堡、二堡、三堡和四堡等村落。钱广汉的残兵败将和哈密军副统帅姜国胜率几个新兵营抵挡不住起义军的攻势，沙木胡苏特亲王和哈密知州白文超只得向新上台的杨增新请求派兵支援。

杨增新虽刚上台，对哈密问题的根由却也略知一二。1907年他由北京到新疆途经哈密时，刚好赶上“土尔帕克起义”。他甚至充当过沙木胡苏特亲王和起义农民的调停者。这次哈密王向他求援，他没向哈密王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却暗示应当像解决“土尔帕克起义”那样，先做些让步，通过调停解决。其实杨增新主要是考虑到自己的新政权尚不稳固，与伊犁革命者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疆各地的地方政府对他还持怀疑态度，对他的政府尚未完全承认，他需要

军队,在目前情况下,无力派兵去哈密。

沙木胡苏特亲王不了解杨增新的难处,拒不同意让步,而继续请求军事援助。杨增新为使自己的利益不至受到威胁,一方面继续规劝沙木胡苏特亲王做些让步,一方面派自己部下一个名叫李寿福的回族营长率兵赴哈密,设圈套诱骗铁木耳·海力帕上钩。

李寿福到哈密后,高举伊斯兰教大旗,伙同当地宗教界名流上山与铁木耳·海力帕相会于草丛之中。李寿福向铁木耳·海力帕转交了杨增新的亲笔信,信的大意为:我杨增新不反对铁木耳·海力帕在哈密暴动建立政权。你们造反是因为你们反对哈密王这个腐朽没落的制度,对此我深为理解。我的政府一向爱护体谅无辜百姓,绝不以任何借口加罪于百姓。你铁木耳·海力帕是英雄好汉,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我诚恳地希望你能来省会为政府效力……。李寿福竭力向铁木耳·海力帕兜售什么:杨增新对哈密百姓真心实意,对铁木耳·海力帕绝无二心;山区百姓若不愿依附于哈密王而想屈从于政府,杨增新可以批准,在北京袁世凯总统正式批准之前,山区百姓虽名义上仍从属于哈密王,但杨增新可保证说服哈密王减轻服役赋税,减少苛捐杂税,对聚众闹事者绝不予追究等花言巧语。为使铁木耳·海力帕及其起义军相信他的鬼话,李寿福甚至手捧《古兰经》发誓。与李寿福同来的宗教人士阿訇、毛拉等也效法李寿福,手捧《古兰经》进行说服调解。

铁木耳·海力帕被手持《古兰经》,再三赌咒发誓的李寿福和阿訇、毛拉们蒙蔽,同意和解,与李寿福达成如下协议:

- (一)农民给王府干活,王爷需付酬金;
- (二)废除一切徭役赋税;
- (三)从王府划分一部分土地给农民租种;
- (四)释放暴动期间王府逮捕的五十名农民,对巴里坤镇台易盛富的被杀与其它有关事件,官府一律不得追究;

(五)山区维吾尔族农民自签定协议之日起不再归哈密王管辖；

(六)为办理上述事宜,铁木耳·海力帕立即赴乌鲁木齐晋谒都督杨增新并接受任命。

这份用汉、维两种文字签署的六项协议很快被证实不过是个圈套。第一,乌鲁木齐另行起草了一份官府文书,明文规定:农民为王府无偿服役的条令仍被视为合法有效,不同的只是由七天减少为两天。第二,以铁木耳·海力帕和他带来的一百三十人在乌鲁木齐待命,不得自行其事为由将铁木耳·海力帕软禁,断绝了他与义军的一切联系。此外,杨增新还命令驻守哈密的李寿福诱骗参加暴动的农民放下武器,交出弹药回乡务农。铁木耳·海力帕占据的山区被沙木胡苏特亲王重新收归己有,由铁木耳·海力帕任命的村长全部被废除,代之以哈密王的亲信。协议中关于哈密王应执行的条款,沙木胡苏特亲王也拒不执行。

铁木耳·海力帕被杨增新任命为定边马队第三营营长,他亲眼看见起义没有任何结果,知道中计,但为时已晚。杨增新以对士兵进行训练为由,在铁木耳·海力帕营房中安插奸细,奸细无微不至地“关照”铁木耳·海力帕,使铁木耳·海力帕不能离开营房半步。铁木耳·海力帕没有行动自由,焦虑万分,他找到1912年在吐鲁番暴动中支持自己的战友穆依登商议对策,打算到吐鲁番想办法,穆依登与铁木耳·海力帕一样,都是被杨增新诱骗到乌鲁木齐后任命为营长的。铁木耳·海力帕的打算正中穆依登下怀,二人不谋而合,立即着手准备。

铁木耳·海力帕利用到乌拉泊打草,筹备饲料之机,把一部分武器弹药藏在运送草料的车中送出城,又从外面秘密购买到一批武器弹药,然后派遣一名叫艾山开克力克的商人将这些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吐鲁番。

铁木耳·海力帕的计划被叛徒木哈买提库力获悉并密告沙木胡苏特亲王。沙木胡苏特亲王当即派人秉告杨增新，同时派翻译木哈买提·尼牙孜携大批金银财宝呈送杨增新，请求杨增新“为了哈密安定，务请尽快除掉铁木耳·海力帕”。

铁木耳·海力帕的一位汉族朋友发现沙木胡苏特亲王的翻译频繁进出省公署大门，知道有诈，提醒铁木耳·海力帕提高警惕。不知是铁木耳·海力帕没有在意，还是没来得及采取对策，1913年9月6日他毫无戒备地被叫去开会，就在当天夜里，与穆依登一起被杨增新杀害。第二天杨增新将此消息迅速通知吐鲁番、鄯善知州和沙木胡苏特亲王，命令他们迅速追回铁木耳·海力帕运去的武器弹药。

对铁木耳·海力帕的部下，杨增新一个也不放过。他以铁木耳·海力帕的士兵要求回老家为由，打发他们离开乌鲁木齐。这批人行至奇台木垒之间的大石时，被杨增新的伏兵全部杀害，穆依登的人马也同样遭此厄运。

铁木耳·海力帕被杀，为沙木胡苏特亲王除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哈密王立即开始了疯狂的复仇行动。他把起义军的主要首领杀得一个不剩，把一般成员流放到边远煤矿区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以补充“军费开支”为名对百姓横征暴敛。参加暴动的山区百姓遭到残酷的剥削欺辱，被迫缴纳毫无来由的惩罚性的苛捐杂税，据说，那一年王府竟从山区横征暴敛两万多只羊。

以铁木耳·海力帕为首的轰轰烈烈的哈密农民暴动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有关新疆历史的书籍与资料大都把伊犁革命、“哥老会”运动和哈密农民暴动视为二十世纪初新疆历史上的“三大事件”。“三大事件”相比而言，我认为哈密农民暴动最具民主色彩，是一个直接向封建主义发起进攻的运动。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觉得伊

犁革命的主要参与者是正规部队，“哥老会”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搞暗杀，而哈密农民暴动则完全是反对封建压迫、以广大群众为主体、得到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的革命运动。

谈到哈密农民暴动首次取得的胜利，我们不应当忘记艾西来甫乡约和张则仁（音译）这个名字。后者是“哥老会”成员。曾因暗杀伊吾县镇台而闻名新疆。实际上，汉族中响应和同情哈密农民暴动的绝不仅仅是张则仁一个人。巴里坤镇台易盛富被义军杀死后，由张存仁继任镇台，巴里坤驻军首领胡登科杀死张存仁，宣布起义。他与铁木耳·海力帕取得联系，资助铁木耳·海力帕大批武器弹药，双方密切配合，互相帮助。杨增新得知这一情况，大为震惊，在一份发往哈密的电文中指出：“哈缠复叛，原有汉奸为之播弄。”“惟念作俑者不过一二汉奸与三数刁横。”并指示哈密副将姜国胜追查哈密明守备有无通“匪”情事^①。

1912年5月在喀什暴动中杀死喀什道尹袁鸿佑的“哥老会”成员边永福、魏得喜等人，同年十月率兵向乌鲁木齐转移，这中间他们收到“哥老会”成员邓兴邦等人的函邀，建议他们率部开赴吐鲁番，配合哈密起义军一起反对反动政府。边永福、魏得喜等既未采纳此建议，也没对邓兴邦等予以指责揭发。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以铁木耳·海力帕为首的哈密农民暴动在范围上已远远超越哈密地区而成为整个东疆地区的一场暴动。穆依登为首的吐鲁番农民起义的配合也证实了这一点。事实还说明，铁木耳·海力帕领导的暴动不单纯是维吾尔族农民反对沙木胡苏特亲王的斗争，同时也是汉族等其他民族群众反对一切剥削压迫的革命斗争。从张则仁、胡登科、邓兴邦等汉族革命者对哈密农民暴动的配合、支援与同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① 请见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乙集一，7—11页。

总而言之，新疆伊犁革命，“哥老会”运动，哈密农民暴动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在新疆的继续与发展。遗憾的是，同内地革命胜利果实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手一样，新疆的暴动胜利果实也同样落到了杨增新手中。

如同内地革命把封建君主赶下历史舞台一样，新疆革命也把亲清派袁大化赶下了台。从袁大化效忠清朝廷，不遗余力镇压伊犁革命和哈密农民暴动这点看来，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新疆革命的艰辛曲折。

若把袁大化在新疆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喻为一场话剧，那么伊犁革命恰恰是这场话剧的序幕，哈密暴动则是它的终止。袁大化离职回到内地，派自己的卫队镇压农民暴动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凶恶、顽固、保守与不甘灭亡、与人民为敌到底的本质。

我没有详细研究袁大化的生平。从我接触到的有关材料看，他平生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袁大化 1851 年出生于安徽省涡阳(今蒙城)县大袁庄一个地主家庭。考中秀才之后，拿着朝廷俸禄，当了一名私塾先生。他一心想当官，不久便弃教从军赴吉林，奔波多年未捞上一官半职。1881 年，当时的清廷军事总督李鸿章派吴姓高官赴黑龙江省巴彦地区处理中俄纠纷，适逢袁大化在吴某人手下当差，袁大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心尽力为吴某效劳，到吉林、黑龙江等与俄国接壤地进行侦察，绘制军事地图，两年后又参加大兴安岭和阿木尔河、漠河河谷的金矿勘测，深得吴某及李鸿章赏识。李鸿章亲自推荐他担任漠河金矿矿长。由于平民身份的袁大化直接提拔为清廷命官不合王法，李鸿章便暗示他掏钱买个县令官职，而后接受任命，出任金矿矿长。越级擢升的袁大化深为清廷和李鸿章对他的知遇之恩感恩戴德，更加听命于皇室与李鸿章，成为李鸿章手下一名

得力干将。李鸿章为此对他更加器重,将他引荐给清朝皇帝,他受到皇帝接见,并晋升一级,成为真正的清室走卒,为此,他益发感激涕零。

1898年,奉李鸿章之命,袁大化到山东省勘测黄河水道,他残酷镇压因饥寒交迫走投无路而起义造反的数万民众,残杀无辜,进一步得到李鸿章的青睐和清廷的赏识,进而被提升,先后任山东省徐州道、山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

他被调任新疆巡抚是1911年元月底。统治新疆不过一年,他极尽欺压百姓、迫害进步人士之能事,他封锁辛亥革命的消息,杜绝辛亥革命的影响,当辛亥革命的消息封锁不住,新疆各族人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揭竿而起,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他血腥镇压,露出极端反动凶残的刽子手嘴脸。

我个人认为,袁大化离开新疆时,新疆政局的急剧变化是对他在新疆所推行的政策及所做所为的绝妙讽刺与恰如其分的评价。

袁大化在新疆经历了两个时代。短短的几年内,他从大清帝国主管边防事务的一名小小官员擢升为中华民国的新疆都督,摘除饰有孔雀翎毛的顶戴,剪掉脑后的长辫,戴起饰有绦带的高顶军帽,佩上带穗的华贵肩章。倘若让袁大化把隐藏在服饰变化背后的思想感情变化公诸于众,将无疑是一件妙不可言的趣闻。

袁大化是在伊犁革命蓬勃发展、乌鲁木齐“哥老会”运动方兴未艾、南疆“哥老会”组织四处戕杀地方官员的形势之下将大权移交杨增新,自己率部入关的。袁大化的如此下场,有人认为是因他本人昏庸无能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其宿敌陷害暗算的结果。总而言之,这种结局对他本人而言,不能不说带些悲剧色彩。当然,对袁大化进行评议是其他领域的任务,故我在此就不赘言了。

袁大化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6月5日率亲信王佩兰、钱广汉、蔡东善等人东行,行至哈密,适逢铁木耳·海力帕率农民起义

军杀死易盛福，大败官军，声势大震。不知是当时袁大化不负责任，还是其部下隐瞒军情，哈密农民暴动的消息他竟然到达哈密后才得知。他派钱广汉镇压，可钱广汉没进山就吃了败仗，连连失利，令袁大化无可奈何，只得率部于当年7月23日离开哈密入关。

袁大化之剧的最后一场在哈密落下帷幕。关于哈密农民暴动的专著与描述暴动的小说故事，总要提及袁大化这个名字。殊不知，镇压哈密农民暴动与镇压伊犁革命、镇压“哥老会”运动一样，均系诡计多端、灭绝人性的老狐狸杨增新所为。

哈密农民暴动持续一年半之久，它反对反动的迪化（即乌鲁木齐的旧称）政府，也反对沙木胡苏特亲王的政权。这次暴动给了迪化政府与哈密王的地方政权以沉重打击。正因如此，哈密农民暴动遭到双重打击，背负超负荷的沉重压力，以至最后精疲力竭，无力坚持，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哈密农民暴动在新疆历史上也终将以反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光辉篇章永留史册，被人们世代传颂，永志不忘。

第三章 杨增新统治下的新疆

杨增新 1867 年出生于云南省蒙自县莫别村一个官僚家庭。1889 年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历任甘肃省中工县知县和河州知州，甘肃省武备学堂总办等职。

1907 年应当时新疆巡抚连昆之邀，杨增新进疆担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1908 年连昆派杨增新赴京，并向光绪帝力荐杨增新能力超群。光绪与慈禧太后召见了杨增新，但不知何故，却未赏赐他个一官半职。杨增新无奈重返新疆，任阿克苏道尹。辛亥革命爆发，杨增新被袁大化任命提法使兼巴里坤镇台、镇迪道（从一些资料和

传说得知，杨增新从北京返疆后，宣布对他委以阿克苏道尹的任命，可实际上他没在阿克苏干过一天。回疆时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袁大化没让杨增新去阿克苏上任，而把他留在乌鲁木齐担任了负责乌鲁木齐治安的“镇迪道”，兼任提法使）。

毋庸讳言，杨增新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同时被委以重任完全是由于袁大化认定杨增新有能力杜绝辛亥革命对新疆产生的影响。

杨增新深知袁大化处境艰难，自己的靠山不过是个空架子而已。由于伊犁革命的爆发，新疆反动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清朝统治眼见无法维持。为留条后路，杨增新以阻截杨缵绪部队进发乌鲁木齐为由请求征兵，袁大化点头应允，杨增新立即组建一支由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回族五营马队。他组织纯回族部队是考虑到新疆地方宗教的特点，认为回族与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与共同利益，便于巩固他的地位。他担心汉族中的“哥老会”成员威胁他的统治。他知道诱骗铁木耳·海力帕上当的李寿福就是五营回族马队的一个营长。这个例子足可看出杨增新利用回族宗教信仰的良苦用心。

杨增新的这支回族部队没去阻击杨缵绪的伊犁革命军，令袁大化大失所望。袁大化重新征兵，企图阻止伊犁革命军进攻，仍未能如意，因为他拉伙拼凑的部队无力与士气旺盛的伊犁革命军抗衡。

袁大化处境益发艰难，正如俗语所说：“屋漏偏遇连阴雨。”从伊犁回来的蔡乐善于1912年6月3日在乌鲁木齐起义，虽然起义被杨增新的回族营镇压，但袁大化也明白自己已无力左右形势，遂决定把新疆的军政大权交与杨增新，自己由亲信钱广汉率五百亲兵护送回关内。

袁大化原打算让喀什道尹袁鸿佑接任自己。这大约是因为他明白杨增新组建回民部队居心不良，抑或因为杨增新不是自己的

嫡系。

袁大化这个计划因袁鸿佑被“哥老会”成员暗杀而落空，接任袁大化的人选于是就非杨增新莫属了。

袁世凯确认杨增新定能胜任，曾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举荐杨增新。袁大化向杨增新移交新疆军政大权，自然正中袁世凯下怀，于是杨增新很快被任命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1914年改称新疆将军、巡按使，督理新疆军务。——译者），并受命对付新疆的革命运动，抵制革命影响。

杨增新对袁世凯言听计从。袁世凯恢复帝制，杨增新立即表示拥护，支持袁世凯改年号为“洪宪”；袁世凯死后杨增新悲痛欲绝，大肆颂扬袁世凯之“功勋”。

杨增新上台后对新疆的革命力量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欺哄镇压，无所不用其极。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他首先欺骗伊犁革命者，对其封官许愿，威逼利诱，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继而进行血腥镇压。紧接着，又对活跃在天山南北的“哥老会”成员下手，或者动用军队镇压，或者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将头领调至乌鲁木齐分而治之，有些人被调关内杀害。镇压铁木耳·海力帕的农民暴动军及穆依登为首的吐鲁番农民起义军的手段与镇压伊犁革命军及“哥老会”的手段本质上相同，只不过又有发展，加上了利用伊斯兰教的宗教伎俩和借哈密地方王爷之手无情残杀参加暴动的黎民百姓。

镇压革命力量之后，他执行了一整套反动政策，如对进步人士进行盯梢跟踪，挑动民族纠纷“同室操戈”，挑动本地人排斥外来者，争取上层人士羁縻与牵制全疆，对平民百姓实施愚民政策等等。截至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自己的部下、军事厅长樊耀南暗杀，杨增新统治新疆整整十七年之久。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杨增新堪称新疆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反面人物。有关新疆近代史的中外著作就杨增新其人进行过多方

面的探讨,我也打算在可能条件下对他进行一些研究。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看待这个人呢?

在接替袁大化在新疆的军政大权时,杨增新组建一支回民队伍做为赌注。镇压蔡乐善“哗变”时,他正式投入了这个赌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这个赌注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利用回民部队镇压“哥老会”;派回民部队的李寿福去哈密执行他的恶毒计划,诱骗铁木耳·海力帕上当;由于这支回民队伍打着信奉伊斯兰教的旗号,因此他们在镇压各族群众时,维、哈、柯尔克孜等穆斯林民族从不偏袒被镇压者,对穆斯林群众起到了蒙蔽作用。

他利用维、回、哈、蒙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驯化、统治百姓。前面提到过哈密王对群众穷凶极恶的盘剥压榨。杨增新不仅不加以限制,而且变本加厉地强化哈密王沙木胡苏特、鄯善王伊明、库车王木海买提·依明,焉耆、布克赛尔、乌苏的蒙古王布彦蒙库、帕勒塔、德思钦阿拉希、吾洛力木加甫,哈萨克王艾兰等统治者的特权,公开充当他们肆无忌惮盘剥压榨百姓的后台靠山。群众不满,他佯装不知,假惺惺地以救世主面貌出现,行镇压之实。他给铁木耳·海力帕写的信,做的许诺及以后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口是心非、两面三刀挑拨民族关系是他统治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让阿勒泰蒙古人乌拉海·开比力斯的左翼头目泰平穆出任蒙古骑兵营营长,守卫哈萨克族占据的阿勒泰,同时又支持哈萨克人争夺牧场,造成双方发生争执。对此他了如指掌,却只令地方官吏进行调解,他本人充耳不闻,只字不提。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杨增新了解到阿勒泰哈萨克王艾兰和买明为争官衔,他们的亲属为争地位高低产生矛盾便钻空子,在双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批准双方各自征兵组建一个营,从而造成他们互不相让,经常发生

冲突的局面。蒙族的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在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为使民族矛盾更加恶化，以便从中渔利，他恶毒地运用挑拨离间、令各民族自相残杀的卑劣手段，达到羁縻与牵制的目的。

以上所谈不过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列举的极少的几个例子。至于杨增新如何控制不在王公贵族手下的维族以及如何实施羁縻与牵制的政策，我将在以后有关章节加以叙述。

富的合法掠夺者和拥有者,为不从“乡约”宝座上跌落下来,就一方面拼命效忠杨增新政府,一方面疯狂掠夺剥削老百姓,以不断积累财富,不断向道尹们行贿。杨增新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保障、增加乡约的特权,以通过他们控制百姓,一方面巩固政权,一方面坐享其成。

对宗教上层人士,杨增新也深知他们的威力,因此他非常注意讨好宗教上层人士,巩固加强他们享有的特权。在利用宗教上层人士方面,杨增新耍了不少手腕。为加强对喀什这个新疆重要的伊斯兰教中心的控制,他派云南回族马福兴担任喀什专区(当时和田也属喀什专区)道尹。马道尹以专横拔扈闻名喀什。在职期间,他随意蹂躏维、回等族妇女,接二连三纳妾、滥施刑罚。百姓稍有过失(如偷盗等)便抽筋(砍掉双脚)、剁手(剁去双手);他看上的土地、果园必据为己有。杨增新收到不少百姓上告马道尹的诉状,不仅不予理睬,反而百般袒护,直到发现马道尹私自与英、俄领事联络、秘密派人去北京,对他不忠,一气之下才命乌什县的马绍武将马道尹父子枪杀,任命马绍武这个回族伊麻目接任喀什道台职务。该人在好色方面比他的前任稍好一些,但贪婪方面却是比之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增新依靠他争取地方上的大阿訇、大毛拉,通过他们控制维族群众。

杨增新给各专区道台、各县县令下达指示时,时常强调:“会利用宗教干事的官才算称职的官。”“必须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书籍”,“不得任意更换喀孜、阿訇”……宗教上层人士则以“安于现状”,“执行真主旨意”是“穆斯林必尽之义务”的信条控制百姓。喀孜裁判所的教规无论如何过分,杨增新也以“穆斯林的事穆斯林自行解决为好”为由保持缄默,不予理论。

杨增新在新疆统治期间执行的最为狠毒的政策当属“愚民政策”。在当权的十七年时间里,他没有兴修任何建筑,没有兴建任何

文化设施与新闻机构,没有出过一份报纸,剧院、文化馆、书店等等就更谈不上。历数十七年中他干的事,一是1916年底在独山子建了一座由水车转动炼煤油的作坊,二是1918年为吐鲁番修建一座拥有三十个纱锭的纱厂提供贷款,再就是1925年批准乌鲁木齐建纺织公司,同年开办了一个驾驶学校。此外,为强化自己的统治,更好地剥削各族群众,1920年开办了一所蒙哈学校,招收蒙哈上层有钱人家子女,教授汉文,培养忠于他的蒙哈族官吏。为适应与苏联发展外交与贸易关系的需要,于1923年办了一所俄文法政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万恶的刀斧手。

杨增新抢掠盘剥大量财物,购置修建不少行宫。在大连市河西桥和天津市区都建有豪华的公馆。他在乌鲁木齐建了一座庙宇,亲笔题写了“观音寺”三个大字的木匾,高悬在庙门上方,规定新官上任需先至寺内叩拜观音,上交布施;升官发财回来也必须先给“观音”上交布施。“布施”得的钱自然全部落入贪得无厌的杨增新口袋。寺庙的“瓦合甫”(即不动产)自然也归杨增新所有。

除此之外,听说杨增新还曾打算在乌鲁木齐建一座规模宏大的个人陵园,塑一尊个人铜像。

新疆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除屈指可数的几座工厂和极少的几个学校外无任何其他像样的建筑,各族人民常年生活在没有文化教育气氛的环境之中,不要说现在,就在当时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杨增新为维护自身统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中,不发展教育事业是最为恶毒的。他认为无知的人好统治,愚昧的百姓好控制。他害怕人民觉悟,他甚至限制关内的报刊杂志及苏联的出版物传播到新疆。他一心想阻止百姓学文化,希望百姓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报纸、书籍之类的东西。

杨增新以推行愚民政策为荣,以此作为自己对新疆的一大贡献。有些史料中谈到悬挂在他公署大堂门上的一首诗,盛世才上台

后还悬挂了一段时间。这首诗写道：

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
纷争莫问中原^①事；边庭有桃源胜境。
狂率南回北准，浑噩长太古民。

这首诗使我们不难看出杨增新的思想实质及其目的，不难看出他为了达到目的如何在天堂般的新疆玩弄伎俩，使群众始终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

在这里我还想介绍一件杨增新时代有关学校及教育的事情，那就是强迫一些孩子上“学堂”。我小时听说过“学堂”这个词，有趣的是，当时竟无人将这个词翻译成维吾尔语，竟至维吾尔人谈起“学堂”，都不知“学堂”为何物。在人们的意识中，不仅对“学堂”的概念模糊不清，而且掺杂着某种恐怖感。这就出现了维族儿童被迫上学时，有钱人竟不惜出钱雇贫苦人家子弟顶替自己的子女入“学堂”读书的趣事。直到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学堂”就是“学校”。至于杨增新何以推行愚民政策，却又强令维族孩子入“学堂”，主要还是出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需要一批听命于自己，又能牢牢羁縻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族干部，他办学堂正是为了培养这样一批人。他的学堂招收有钱的上层人士子弟，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愚民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得不仅穷苦百姓，而且连有钱的上层人士也误认为进“学堂”是服差役，无一不千方百计地逃脱，使上学这件事成了一件不得人心的事。

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货币贬值。货币价值不稳，变化之快令人吃惊。当时使用过杨增新发行的一种纸币，

^① 中原——指关内省区，杨增新在此自诩没有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

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当时正在流通的钱币很少能到孩子们手里。我听到过老百姓对这种纸币的抱怨，他们对货币不稳定又恨又怕，于是拼命把手中的钱变成实物，拼命积累牲畜、土地和粮食。

谈到货币，我想起儿时的一件事。由于杨增新执政期间，货币没有信誉，因此沙俄的纸币在市面上很吃香。俄国人的商店只收俄币，不少中国人的商店也只收俄币。当时伊犁有个维族大商人，名叫雅可布巴依，与一般的商店不同，他的商店只收中国货币，当然包括杨增新发行的新疆地方货币在内。这件事父亲讲过多次，我虽不知详情，却觉得这个雅可布巴依了不起，他竟然不怕杨增新的货币不稳定，是个英雄，他的财产肯定不少，由此对这个商人竟生敬佩之情。

以后从有关资料得知，杨增新执政期间的货币贬值好像久治不愈的痼疾，从杨增新上台到被杀伴随始终。杨增新解决政府财政困难不靠发展生产力，不靠加强商品流通活跃经济，而是试图用扼杀生产力、限制商品交换，把经济纳入死胡同，与经济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方法加以解决。当财政陷入危机，无法解决时，便滥发纸币，间接地加紧对百姓进行盘剥。政府弄虚作假，增加税收，使得大批群众倾家荡产，商人乘机大量囤积货物牟利，当官的个个贪赃舞弊，索贿受贿。层层收税，重重剥削使新疆几乎窒息。

杨增新对人民巧取豪夺，竟发明并实施承包赋税的高招。他把赋税以承包的名义出售给各地的巴依，巴依按规定向政府缴税，收税权完全在巴依手里，何时收税，收多少税，收何种税等无任何原则、标准、法律可循，完全由承包赋税的巴依说了算。一个农民去巴扎，出售自己编织的麻袋，要纳税；用钱买东西，要纳税；碰上税吏查税，还往往没事找碴，随意罚款，其结果是这个农民卖掉麻袋所得款全部付出仍不够税款，还要自己掏腰包补税。穷人如此，有钱人则相反，他们行完贿，或根本免税，或纳极少量象征性的税。承包

赋税的大巴依虽然要交政府数额较多的税款，但他们大肆进行免税贸易，赚的钱远远多于税款，所以这些人在杨增新政府制造的大批贫苦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基础上发了财。喀什的铁木耳巴依，依不拉音巴依之所以迅速成为大富商，均是承包赋税的结果。

杨增新表面禁止吸食鸦片，实际上却为鸦片大开绿灯，致使倒卖、吸食鸦片盛行新疆。杨增新对吸食鸦片的官吏，对官吏们给他上贡的礼品向来不闻不问，表面上似乎毫不介意，实际上礼品均系鸦片商人所送的贿赂，杨增新比谁都清楚。

我知道杨增新有一本题为《补过斋文牍》的著作，收录了其报告、演讲、谈话及其对自己毕生言行的反省。由于时间等条件所限，我尚未对这本书进行认真研读。据读过的人说，这本书对于理解杨增新的政治、哲学思想，了解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的全貌，可算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的资料。对新疆近代史和研究杨增新有兴趣的人士不妨一读，或许对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第三部

在黑暗的地牢中彷徨

第一章 二十年代的新疆

上一章谈到杨增新统治新疆十七年来的情况时，已经暗示：杨增新即使不被杀死，他的统治也不可能继续下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杨增新之死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真理。杨增新的下属军官樊耀南枪杀杨增新是统治集团对付忍无可忍的群众之前，内部矛盾公开化的信号。

杨增新生命的结束与杨增新时代的结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结束杨增新生命很容易，1928年7月7日被枪杀，他的生命便永远地宣告结束。而结束杨增新时代，却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

杨增新死了，留下一个愚昧落后的烂摊子。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财政收入萧条混乱，军队自由散漫，没有战斗力，经济破产，工业萧条，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怨声载道。整个新疆笼罩在一片凄凉与动荡不安的气氛中。

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毕竟有了实质性变化：与新疆接壤的俄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宣告中国进入了一个光辉的新时代,中国历史掀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的一页。概括说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动摇了整个旧世界的根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使旧中国的根基出现了一条很大的裂缝。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可能不使新疆随之出现一些鼓舞人心的变化。

杨增新执政期间,尽管竭尽全力使新疆继续保持“愚昧淳朴的古老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新疆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真空,因而最终仍然受到了时代浪潮的强烈冲击。最先吹进这间令人窒息的“牢笼”的和煦春风,是标志普及新兴教育的革新主义的主张。

第二章 革新主义在新疆

“革新”原译为“改良—新生”,“革新主义”则为革新者要改良、革新之意。

“革新主义”一词最早始用于俄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人。生活在伊斯兰教氛围中的塔塔尔族一些知识分子研究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远超过伊斯兰世界,于是主张在中世纪以来一直裹足不前的伊斯兰世界实行改革。一位名叫穆沙·加茹拉的塔塔尔人是革新主义者的领袖。他们出版名为《舒拉》的刊物做为舆论工具。

革新主义的出现是中亚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革新主义经历了诞生、发展、转折直至沦为反动、没落几个阶段。

在此我并不打算介绍革新主义的全部兴衰史,而只想陈述一

下革新主义在新疆的发展,因为当时正值其发展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约辛亥革命前后),喀什一些进步人士如胡赛音巴依、巴吾东巴依、塔西阿洪(我父亲)等人极力提倡兴办新型学校,他们派专人赴土耳其聘请教员,在上阿图什开办了一所师资培训学校。此外,还选送一批青年(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子弟)赴土耳其留学。

开办师资培训学校,生源是上阿图什和下阿图什一批有一定水平的青年,经费由上述人士赞助。学校开设语文、文学、数学、历史、地理等新课,还开体育课,教授足球、体操,进行军训。阿图什的群众性足球运动至今活跃、普遍,也许与那时开设体育课、普及足球运动有关。

以后我了解到,当时曾两次从土耳其聘请教师在师资培训学校任教。第一次是1880年,第二次是1910年。这两次办学何以间隔时间这么长,没听到过圆满的解释。我想大约是经费紧张与传统习惯势力作梗之故。后一次办学影响更加深远,由于后一次距我出生时期较近,因此我所听说的有关办学情况多是第二次的。

师资培训学校深受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影响很大。这所学校第二次办了两年,毕业生遍及上阿图什和下阿图什各个乡村,而后他们相继创办了多所小学。其中一所在我家旁边,任教老师是师资培训学校毕业的哥哥乃吉木丁和另外一两名毕业生。

新型的师资培训学校这株茁壮的幼苗,却由于反动派及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不幸夭折。这个新生事物刚一出现,宗教界一些反动顽固的头面人物、依麻目、喀孜、穆夫提、经文学院的伊善(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导师)等便站出来表示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新型学校培养反对宗教的“秃尾巴”(指脱去长袍改穿制服的人),科学反对宗教,学科学的目的是消灭宗教,而穆斯林学伊斯兰教教义才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学什么科学……宗教界人士的反对,显然为巴

依、伯克、地主等上层人士所欢迎，当时以无恶不做闻名的大巴依吾麦尔巴依、阿洪巴尤夫纠集的一伙顽固分子，在喀什掀起了一股反对新兴教育的黑旋风。他们反对新兴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企图以此削弱进步人士在群众中的影响与威望。

宗教界也有一些进步的宗教人士与青年学生支持新教育。反对派无奈，便依靠政府势力，在喀什县官、道台面前极尽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拨弄是非、煽风点火之能事。这还不够，他们还向远在乌鲁木齐的杨增新进谗言，胡说什么“喀什有些人从国外请人，以办学为名，行推翻政府之实。”喀什的道台是吾麦尔巴依之流的靠山，吾麦尔巴依之流是喀什官府的吹鼓手，他们臭味相投，配合默契，大有不整垮新兴教育誓不罢休之势。

1912年，杨增新政府派调查组从乌鲁木齐来喀什调查，做出“发展新兴教育是反政府活动的开始”的荒谬结论，对喀什道台和吾麦尔巴依之流的诬陷予以肯定，下令立即关闭学校，驱逐从土耳其请来的教师出境。事实上调查组完全是按上面的调子下的结论。我曾听说，调查组调查我家旁边的学校时，调查组中有人说：“这个学校反政府，必须解散！”可是有一个人（大约是比较进步的）却私下对我父亲表示：“你们学校不像诬告者诬陷的那样，办这样的学校是好事，但上面有令，不能不关闭！”就这样，新兴教育运动尚在萌芽阶段就被顽固派和独裁统治集团一道镇压下去了。

这场新兴教育运动虽然平息了，却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第一，它向人们，特别向青年揭示了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觉悟，才能改变命运，否则终生不得翻身的真理。人们开始渴望学习，渴望摆脱贫困，摆脱愚昧无知，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在师资培训学校毕业的学生及一些进步人士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相继在塔城、伊犁、吐鲁番等地创办新型学校，培养出一大

批初具新思想的进步人士。

第二，进步与落后开始泾渭分明。进步力量兴办教育，必然遭到反动势力的反对。立新必须破旧的道理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秃尾巴”与“长尾巴”的矛盾明朗、公开了。在这场矛盾斗争中，虽然反动的宗教界头面人物及地主、巴依长期占据上风，然而进步力量非但未被消灭，反而在斗争中益发壮大了。

第三，反动政权是扼杀新兴教育及一切新生事物的罪魁祸首，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有力靠山这一事实得到了进一步证明。群众觉悟了，他们认识到，立新必须破旧，必须打倒一切反动派及其靠山，新生事物才能站住脚这样一个真理。由此看出，新兴教育运动并未彻底失败，学校关闭了，新生事物及“革新主义”思想却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并总结出了新旧斗争的重要经验教训。

新疆这场以新兴教育为代表的革新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它确实是反封建、反宗教迷信、反独裁统治的进步活动。它虽然算不上一场革命，却完全可以算做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倾向的改良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在新疆维吾尔族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没有第一步就谈不上第二步、第三步。1934至1935年间，麦买提力先生（台尔菲克）为首的一些进步人士在阿图什掀起了第二次新兴教育运动的热潮。这次运动取得了远远大于第一次新兴教育运动的成绩。因为它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掀起的，麦买提力先生及其战友或是受到第一次新兴教育运动的影响，或是直接受过其教育。解放后，阿图什的教育事业比之其它各地发展迅速，高等院校学生及干部队伍中阿图什人居多的事实不能不说与新兴教育运动的深远影响有关。

第三章 苏联十月革命对新疆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两条渠道传播到新疆。一条渠道是直接来自苏联传播进来，另一条渠道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间接传播过来。当时新疆反动统治集团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拼命阻挡其传播。但真理和正义岂能阻挡得住？十月革命的胜利消息很快传遍新疆，唤起了新疆人民的觉醒。

十月革命的胜利，最先影响到伊犁、塔尔巴合台（今塔城）地区，并迅速向各地传播。阿利夫·艾比托夫、海热提·麦米特维奇、瓦希洛夫等人在伊犁、塔城等地通过多种渠道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工人阶级作主人，号召新疆各族人民学习苏联工人阶级，鼓动他们向新疆独裁集团进行斗争。新疆人民迅速觉醒，1918年4月近两千名学生、教师、工人、职员在伊犁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剥削压迫的口号，号召各族群众反对杨增新政府。

十月革命的胜利传到新疆，并对新疆产生重大影响，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来往于新疆与苏联之间的劳动群众的积极热情的宣传。

十月革命前后，特别是革命后至三十年代初，新疆（主要是喀什和伊犁地区）大批穷苦劳动者到中亚的苏联大地谋生。有些人春去秋归，有些人长期在那里定居。这些来往于新疆与苏联之间的劳动者具体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据我所知，南疆地区来来往往的

劳动者不少于南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二。

去苏联谋生的劳动者主要在苏联各煤矿及其它矿山干活，有的在棉花轧花厂和炼油厂找到工作，也有的从事农业，木工等体力劳动。这批维吾尔劳动者与苏联人民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直接受到了革命教育，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

苏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非常关心侨居苏联的新疆维吾尔人，组织他们学习政治与文化，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使侨居苏联的新疆维吾尔人中间涌现出一批有识之士。这些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新疆各族人民只有沿着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前进，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他们组织起来，向侨居苏联的广大新疆维吾尔劳动者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这些入向新疆各族人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8年至1930年间，侨居苏联的一部分维吾尔人成为苏共党员，一部分人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新疆的地方特点没有加入苏联共产党，但也做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的工作。如他们出版了名为《挣脱》的维文报纸，所用维文有两种，一种是在阿拉伯文基础上改革的（当时使用的察哈台文的印刷体形式），一种是在拉丁文基础上改革的（苏联境内的维吾尔族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文字）。这两种文字发行的报纸在苏联境内的维吾尔族劳动者中间广为传播，一部分还秘密传播到南疆各地。在喀什的艾力阿吉、阿图什的穆依丁、塔西阿洪和其子艾则孜等一批觉悟了的维吾尔人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拯救新疆》组织，这个组织在一段时间里非常活跃，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组织和培养侨居的维吾尔族劳动者，主要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提高维吾尔劳动者的觉悟，但不同意他们成立组织，建立自己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强调：新疆人民的解放与全国人民的解放息息相关，必须坚持共同解放的

原则。因此居住在中亚的维吾尔、回族侨民同居住在莫斯科的中国侨民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自觉地把民族的解放同全中国革命的胜利联在了一起。

从苏联回来的维吾尔人向家乡父老乡亲热情宣传自己的所见所闻，使没去过苏联的人们也了解到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了解到自己与苏联劳动者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天壤之别，受到强烈的震动。

总而言之，去苏联谋生的新疆维吾尔族劳动者一方面目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与苏联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传播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们家乡去苏联谋生的人非常之多。一有人回来，乡亲们便争相打听新鲜事儿。他们的所见所闻很快便会传遍四面八方。我记事时，十月革命的话题仍像新闻一样反复传播。也就是说，到了二十年代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1917年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厌其烦地传诵什么“沙皇被推翻，穷人一把火烧掉了沙皇的宝座，工人农民挥舞镰刀斧头，杀死了道台、县令，称王称霸的人被埋进地窖，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等等，百谈不厌，通过传闻表达着自己的愿望。

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们最感兴趣的是新思想，新事物和有关学习的消息。在前面提到的阿吉老师教我们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谈论的不外乎是这些话题。孩子们热烈地传诵着从民间，从父母那儿听来的趣闻，如“安集延建立了许多新型学校，那些学校不是毛拉教学生，而是老师教学生”；“那边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新书，还每天往一张很大的纸上印刷当天发生的事情发给大家，听说那玩艺儿的名字叫‘报纸’”；“年轻人刮胡须，留短发，穿制服”，他们把刮胡须，留短发的年轻人称做“秃尾巴”，“那些秃尾巴常在一起讨论，一个人上台讲话，其他人在台下鼓掌，鼓掌是支持他的意思”……，这

类传闻一经传入毛拉们的耳朵，便立即被严格禁止继续传播了。阿吉老师多次警告我们：“谁敢说俄国人的好话就开除谁。”于是，公开谈论变成了私下议论。在学校可以禁止谈论，对社会上人民群众的谈论他们却是禁止不了的。民间传闻非常之多，我们专门去找从苏联回来的人，听他们讲见闻。以后听说喀什道台对此非常恼火，禁止人们再去苏联，从苏联回来的人，会立即被官府送进监狱。然而中苏边界之长，来往人之多，岂能被官府控制住！尽管喀什道台三令五申，又禁又抓，照常有人进，照常有人出，各种传闻也照常传播不误。

二十年代末，巴依、地主们的脑袋耷拉下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诸如“地主、巴依被关押，他们的土地、财产被没收，有的被杀头，有的被流放”之类令他们胆战心惊的传闻。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几遍祈祷，要求真主保佑他们这类可怕的事别在自己家乡发生。

不久，一大批受到十月革命冲击的乌兹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族巴依从苏联逃到新疆，三〇年前后的一两年内，这些苏联籍的少数民族地主巴依络绎不绝地跑来，我们称他们为“逃民”。很快，伊犁、塔城等地的“逃民”也多了起来。许多沙俄军官率士兵逃到新疆，一时间，这些“逃民”竟充斥于伊犁、塔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逃民”大多是苏联土改时期为保命而外逃新疆的资本家、大地主、大牧主和沙俄军官、士兵。他们到处传播“可怕的”、“令人担忧”的消息。据他们说，他们家乡血流成河，饥寒交迫的人们互相残杀，甚至人吃人，勾画出一幅幅血淋淋的恐怖画面。他们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沙皇俄国时代，
我们吃白面包。

布尔什维克来了，
我们的白面包被查抄。
若钉槓子请钉在大路中间，
戳死那些布尔什维克脓包。

他们编造这种咒骂布尔什维克的歌谣，发泄对十月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带来的恐怖情绪，使新疆的巴依、财主们胆战心惊，人民群众则兴高采烈，盼望布尔什维克早日来到自己的家乡。他们赞叹那些“敢把大肚皮踩在脚下，能把兵士们吓得四处逃窜，号称布尔什维克”的人们是“真正了不起的英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十月革命在新疆产生的主要影响是给新疆带来了自由解放的春风，播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子，使穷苦大众坚定了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信念与决心。

第四章 重重压迫与巴依之间的纷争

我在孩提时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压迫与剥削、贫与富的感性知识，这是因为我的家乡是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居住的边远农村。我亲眼看到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没有土地的佃农，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地里操劳，却永远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同情他们，实在想不通他们何以如此贫穷。

我小时总觉得周围的一切总在周而复始地重复，如同一潭死水，令人感到沉闷、窒息。每天清晨，我家门前清真寺的唤礼塔上都会传来“安拉呼阿克拜尔……安拉呼阿克拜尔……”^①这样永远不

^① 伊斯兰教徒口头禅，意为“真主伟大，至高无上”。

变的召唤穆斯林们做晨礼的唤礼声。从我记事起，我就记得清真寺的麦曾^①是一个叫麦提库瓦阿洪的人。时光飞逝，年龄渐长，我觉不出这个世界的变化，只感到那位麦曾的唤礼声变得越来越沙哑无力。他的声音简直无法与喀什、莎车等地大清真寺中那种舒展优雅的唤礼声相比。即使如此，这位麦曾的唤礼声也绝不可轻视。因为在当时没有钟表、没有具体上下工时间观念的年代，这位麦曾的唤礼声不啻开始一天新生活的奏鸣曲。每天清晨听到唤礼声，男人们会立即起身小净，奔向清真寺做晨礼，女人们则烧火、煮饭，开始围着锅台忙碌，孩子们不管情愿不情愿，也必须立即从床上爬起。男人们做完晨礼，吃过早点，各行其事，一天的生活就此开始。

我们村是一个约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村里除了少数有门面的几户人家外，都是没有土地的佃农。拥有土地最多的除我家之外，就数赛莱阿吉和哈德尔阿吉了。他们的土地大部分雇人耕种，一部分租给佃户，到时收租或以收取收获物抵租。村里还有不少以帮别人干活为生的人，人们称他们为“短工”。当时我无论如何琢磨不出“短工”这个词的含义。听人称“某某是某巴依的长工，”对“长工”这个词，我经过思索认为，顾名思义，大约就是“长年给别人做工之人”的意思，后来多少学了一些汉语，从词的结构分析才彻底搞清楚“长工”、“短工”的具体含义。听人说长工是为祖辈抵债给人干活儿，对此我颇为不解。一次我冒昧地问叔父：“哪里有几代都还不清的债呢？”叔父解释说：“他们借的是高利贷，不仅还不清，而且越欠越多。负债累累，世世代代也还不清。”什么是“高利贷”，我不清楚，也不敢再向叔父发问。人们债台高筑，忧心忡忡，公粮、什一税（宗教税之一，其税率一般为5%—10%）和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接踵而至，使得人们终日劳碌，到头来却一无所得。此外，各

^① 伊斯兰教清真寺中呼唤教民做礼拜的唤礼员。

种徭役如雪上加霜,使农民们简直没有活路。我小时候经常见人们聚集在一起唉声叹气,议论他们明日如何生活,祈求真主保佑“明天过一天安稳日子。”可什么算“安稳日子”谁也说不清。我总觉得他们越盼“安稳”,日子越不安稳。且不谈那些租金、苛捐杂税、劳役,摊派令人如何无法应付,就是每天从喀什等地传来的形形色色令人毛骨悚然的传闻就使他们“安稳”不了。当时喀什有一个人称马提台的官吏心毒手辣,谁都怕他三分。有关马提台的传言无时无刻不令人们心惊胆战,一会儿传说马提台抢走了谁的女儿,一会儿传说马提台把某人铡死了,一会儿传来马提台把某某扔下悬崖摔死的惨讯,一会儿又传来马提台抽了某某足筋的新闻,等等,等等。每听到一次这样的传闻,人们精神上就受到一次惊吓,传闻不断,令人们终日处于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在弄不懂“马提台”是什么东西,是何许人的年代,我心目中的“马提台”不啻凶狠残暴的魔鬼的代名词。正因如此,“马提台”这个称呼牢牢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以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了有关马提台的史料,了解到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马提台原名马福兴,是个来自云南的回族。原先在浙江一带任提督,后因触犯王法(不知犯了什么法)被流放新疆米泉一带务农。在杨增新的庇护下,担任回民部队的首领。他忠实于杨增新,参与了杨增新在疆期间的一切阴谋活动,杨增新重用他,委任他为喀什提督,企图利用宗教民族(以回治维)关系,实现对南疆的控制。马提台到喀什后,残酷地剥削压榨百姓,后来竟然连杨增新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千方百计想摆脱杨增新的羁绊。

马提台吸食鸦片,酗酒成性,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恶棍。他纳有十六房妻妾(其中一房在北京),十四房是被强抢的维吾尔族少女。他在喀什疏勒县草湖一带修建了一座富丽豪华的别墅,建了一座大花园,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引起极大民愤。杨增

新劝他收敛一些，他置若罔闻，令杨增新甚为恼火，派与马提台素有芥蒂的乌什道尹马绍武（此人亦以无恶不作而闻名）率重兵前往喀什讨伐马提台，将马提台擒获枪决。为显示自己的威风，平息喀什群众的愤怒，杨增新还命令将其头颅割下，在城门口悬首示众，暴尸三日。

在百姓被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马提台之类的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日子里，阿图什的巴依和宗教界头面人物也分成两派互相撕咬起来。其中一派以尤素夫阿吉为首，另一派的统领是艾买提库力阿吉。为争当阿图什喀孜人选，他们相互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尤素夫阿吉一方要求由已故喀孜来衣斯阿吉之长子伊明·马合苏木继任阿图什喀孜，艾买提库勒阿吉一方不同意，力主阿图什喀孜由阿比勒阿吉担任。双方互不相让，相持不下，跑到伽师县衙，以求裁决（当时下阿图什属伽师县一个区）。

伽师县衙口头答应尽快裁断，实际上却迟迟不予办理，原因是县令看出此案越拖对他越有利。一方面维族人之间互相残杀，他正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双方为自己能打赢官司，每次进衙，必厚礼相见，故案子越拖他越有利可图。

由于伽师县令有意拖延，致使这一纠纷拖了两年之久未得解决。阿图什各村巴依、百户长也由此分为两派，他们拉拢民众，壮大各自势力。两派常在阿图什市面上发生冲突，进行大规模争斗。一次我在阿图什巴扎闲逛，遇到两派斗殴，我爬到一棵树上看热闹。人们手持棍棒、长刀、斧头在街上残杀，喊声震天。我看见棍棒斧头（屠夫们切肉用的小斧头）在成百上千的人们头上飞舞，乱砍乱劈，被吓坏了。好半天才从一个大院里出来一群手持棍棒的差役平息了这场恶斗。后来听说在这场格斗中死亡数十人，数百人受伤。

第二天，双方抬着死者尸体到县衙告状，听说告状人达数千人

之多。

又一个巴扎日(即集日),我和朋友们去阿图什巴扎游逛,走到税务局门前,看见艾买提库勒阿吉坐在税务局门前一个土台上,身旁放着一个很大的装满银元的钱箱。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艾买提库勒阿吉便站起身声嘶力竭地喊叫:“谁支持我们,跟我们到伽师县衙门,我赏他十五块银元!”不少人站出来表示跟他去,这些人在登记簿上写上名字,艾买提库勒阿吉便发给他们十块银元,告诉他们到县衙门口再发另五块。

对穷人说来,到县衙门走一遭,喊几句“我们支持×××当喀孜”就能得到十五块银元是件求之不得的美差。然而那些有钱的上层人士岂能甘心让穷苦百姓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的银元?他们把穷百姓推到互相残杀的第一线,靠这些穷百姓卖命,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喀孜宝座,他们会得到比付出的十五块银元多几倍的财富。简言之,在这种纷争中得利的依然是县令、巴依,百姓们用十五块银元买来的是不尽的苦难与动荡的生活。

上述纠纷,尤素夫阿吉最终获胜,伊明·马合苏提当选为喀孜。但仅仅过了一年,艾买提库勒阿吉一派便重新占了上风,击败尤素夫阿吉,把伊明·马合苏提从喀孜宝座上赶下台,把阿比勒阿吉推上喀孜宝座。

杨增新政府就是这样挑动维族人互相残杀的,他“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第五章 苦难中孕育着的动荡

二十世纪初,杨增新政权的残酷压迫把新疆人民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渊。人民忍无可忍,寻求自由、反抗剥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人们向往革新，渴求知识。关内与国际范围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再也封锁不住，革命的曙光终于照耀在新疆的大地上。

1918年至1920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依靠工人、士兵的力量，击溃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革命白匪的围剿，巩固了革命政权，壮大了革命力量。年轻的苏维埃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更加提高，与其接壤的新疆深受影响。杨增新明白，苏联的影响总有一天会导致新疆人民奋起反抗，于是他积极为自己寻求后路，一方面加紧剥削掠夺，聚敛财富，一方面审时度势，随风转舵，对北洋军阀的当权者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有奶便是娘”，企图以此维系自己的地位与统治。

与此同时，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始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欺压人民、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反动政策的斗争。这场斗争壮大了革命力量，加剧了军阀的内部矛盾，揭露了反动派卖国求荣，加紧盘剥人民，推行奴化政策，抗拒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反动本质。已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北伐战争爆发的

爆发 1921 年 12 月伊犁部队驻奇台的两个营最先发动的军事政变。骑兵营营长宋金山，步兵营营长高士豪联合内部反对北洋军阀的势力发动的这次兵变，由于孤立无援，没有群众基础而告失败。虽如此，也揭了杨增新的伤疤，令杨增新惊慌不已。为抵制革命影响，他几乎拼了老命。他往各地派遣密探奸细，对自己的部下也疑神疑鬼，暗中盯梢，跟踪。1926 年后他在哈密东部安插尧乐博斯一个维族营，道尔吉三个蒙族营，布彦、色克赛两个蒙族营和阿道德（音译）、陈万祥两个营，他下令各营营长严格清查部下，稍有可疑之处格杀勿论。这足以证明杨增新对北洋军阀政府是多么忠诚，对革命力量又是多么仇视，多么抵制！

1928 年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头目张作霖同蒋介石作战失利，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杨增新这个北洋军阀的忠实追随者摇身一变，投入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怀抱。他打电报表示拥护蒋介石，向他的新主子摇首乞怜。其实早在 1927 年杨增新就因对前途绝望而将家眷送往内地，自己也打算定居天津或大连了。这说明，杨增新已经看到内外形势的严峻，他深知自己已无路可走，感到自己的政权已日薄西山，因此给自己选了一条“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后路。

上述事实使杨增新统治集团内部某些高级官吏决定伺机谋杀他。1928 年 7 月 7 日，杨增新被其部下，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樊耀南、法政学堂教务长张纯熙等人按照预先部署的计划，在当天俄文法政学校举行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杨增新及下属各厅长、部队将领、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等出席毕业典礼的宴会上枪杀了杨增新。遵照樊耀南的指示，宴会一开始，他的一名部下便向杨增新开了枪，接着，几个人一起向杨射击，杨增新当即中弹倒地，樊耀南怕杨增新没死，又往杨增新尸体上连打两枪，使这个十七年来以吸吮新疆人民鲜血为生的独裁者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樊耀南系湖北省公安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前发配来新疆，先后担任新疆地方审判厅厅长兼法政学堂教员，迪化道台，军务厅厅长兼交涉署署长等职。他之所以枪杀杨增新，是由于他与杨增新长期以来心存芥蒂，为争夺新疆统治权而发生纠纷所致。即使他成功，新疆老百姓的处境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即使如此，我从以后掌握的材料中仍了解到，他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对贪污受贿、腐败无能敢于公开表示不满的人。杨增新对他很器重，曾多次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企图拉拢他效忠自己，而他始终不为所动，不追随杨增新。

挫败樊耀南政变的是与杨增新一道被杀的杜发荣旅长的部队。该部队的实权派，杜发荣之子杜治国发誓为父报仇。军务科长官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等人坚决支持他。当时任政务厅厅长的金树仁利用与军界上层人士的同乡（同为甘肃人）关系，与他们打得火热，他对杜治国等人深表同情，支持他攻打被樊耀南占据的杨增新公署。仅有三十几名亲信护卫的樊耀南顽强抵抗，直至最后一发子弹打光而被俘。

樊耀南被抓后被捆在马厩一根柱子上，胡须被一根根拔光，双眼被剜，舌头被割，最后被捆在马尾巴上活活拖死。他的同伙张纯熙等也惨遭折磨后被一一枪杀（据说有些人被拉来观看樊耀南如何受折磨，如何被拖死，樊耀南死后，这些人被用马刀活活劈死）。

从此以后，新疆人民落到毫不亚于杨增新的又一个暴君金树仁的魔掌之中。

金树仁系甘肃导河（即河州，现名临夏县）人，毕业于甘肃高等学堂，是1909年北京科举考试中的优胜者，后进杨增新任教的讲武堂就读，同杨增新有师生之谊，对杨增新忠贞不二，颇受杨增新的青睐器重，先后被委任为阿克苏、疏附（今喀什市）、迪化等县的知事，1926年被提任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直至杨增新被杀（其时

政务厅改为民政厅)。做为杨增新的学生与亲信,他当然支持甘肃籍军人为杨增新复仇。军人期望他的支持,金树仁于是乘机挺身而出,宣布自己为省临时主席,省军司令,要为杨增新报仇雪恨。杨增新当政时期中饱私囊的各地贪官污吏,道台县令出于对杨增新的感恩之情接受了金树仁。对他心怀不满的官吏慑于他有军队做后盾,虽背后抨击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是个大烟鬼,却也不得不顺从于他。金树仁见机会难得,赶忙以省政府委员会,南北疆上层社会文官武将以及维吾尔王,哈萨克王,蒙古王等联名名义电告南京政府,他已得到新疆各界人士的支持,迫使南京政府承认他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后“总司令”改称“国防督办”)的事实。

金树仁上台后,对人民群众的残暴统治比之杨增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磨刀霍霍,贪得无厌,为聚敛金银财宝加紧对群众抢掠盘剥,根本不顾群众死活。仅上台一二年,他那贪淫好色,利欲熏心的恶魔嘴脸便暴露无遗。新疆人民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杨增新时代。

各族人民忍无可忍,开始进行反抗,金树仁血腥镇压,加紧征兵,扩充军队,对人民增收沉重的军用苛捐杂税,滥发纸币,企图以此解决财政困境,造成货币进一步贬值,严重破坏了新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平衡。原来隐蔽或半隐蔽的各种矛盾日益公开、尖锐,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使金树仁政权自行衰败,各族人民积极酝酿开展反独裁斗争。1930年初,新疆变成了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第四部

大 动 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具体说从1931年起,新疆政治局面风云突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这时正值金树仁执政期间。

三十年代新疆发生了哈密—吐鲁番暴动、库车暴动、喀什暴动、和田暴动、陆军新编三十六师进疆,陆军八师为推翻盛世才政权从伊犁进军乌鲁木齐等大事。这些暴动打击了旧政权。但各派又互相吞并,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动荡混乱的局面持续达三年之久。

在这动荡的年代,新疆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和加尼牙孜阿吉、麻木提师长、铁木耳师长、吾斯曼·艾力师长、沙比提大毛拉、穆·艾孜来提、马仲英、张培元、盛世才等一大批历史人物。

鱼龙混杂、鱼目混珠,革命的领袖人物、阴谋家、军阀、洋奴等一时间全部卷入到这个政治旋涡中。

应当强调的是,使新疆大地震颤,在这个伟大的旋涡中熠熠闪光的基本力量,不容置疑是新疆各族人民。面对黑暗统治揭竿而起的各族群众,用棍棒做武器,置生死于不顾,如同一股股汹涌澎湃的洪水,猛烈冲向各州县,向政府军发起猛攻。

发生这样的事件时我已年满十六周岁,虽然离孔夫子所说的,

距“而立”“不惑”之年相去甚远，但是父亲过世后我家的困境锤炼得我过早成熟了，我性格中憎恶强暴、向往真理、同情弱者的一面开始形成。我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带着爱憎分明的感情介入了新疆三十年代的政治风暴。

第一章 哈密暴动

三十年代席卷新疆的政治风暴始于哈密，人称“哈密暴动”。哈密暴动爆发于1931年。官方文件与民间流传的暴动时间完全一致。暴动的直接起因是张姓汉族边防军官强娶一维族少女为妻，引起非议；暴动地点在哈密靠近天山的树普勒村。说确切些，这次暴动有着广阔的背景，它既有直接的近因，又有间接的远因。究其远因，甚至可追溯到两世纪前乾隆年间，这次暴动确实值得史学家们认真研究。

上面谈到哈密暴动的直接起因源自一位汉族边卡军军官强娶维族少女为妻。实际上这不过是根导火线，恰如往干柴上扔根火柴，一点就着罢了。

饱受哈密王制度欺凌压榨的当地农民们历史上进行过多次反抗，有史可查的两次是1907年的土尔帕克起义和1912年的铁木耳·海力帕起义。农民们高举义旗，反对王府视农民为奴隶的残酷剥削。但两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农民们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1930年沙木胡苏特亲王病故，其子聂滋尔继承王位。聂滋尔早在父亲生前便以贪淫好色、酗酒无度、吸食鸦片而闻名哈密，是一个野蛮暴虐、专横跋扈的纨绔子弟。他不分时间地点，只要性起便要无所顾忌地残杀百姓，奸污幼女，劣迹昭著，十恶不赦。继承王位之后不仅丝毫不加收敛，反而越发变本加厉。

为废除哈密王制度、改革土地所有制而从未停止斗争的民众，为反对聂滋尔继承王位，掀起了更大的斗争怒潮。金树仁看出这是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最好时机，立即插手，力主改变土地制度。当然他之所以如此绝非为百姓着想，而是企图变哈密王手中的税权为已有，以缓和无法缓解的经济危机。除此而外，他还企图动员甘肃同乡移居哈密，耕种哈密王的土地，增收租金税收。以此既可赢得为当地农民砸碎哈密王枷锁、是当地农民“救星”的美名，缓解他们的对抗情绪，又可以“慈善家”的名声享誉甘肃同乡，甚而还能填充令他为之焦虑的空虚的政府金库，这真是一箭三雕的好算盘。

为实现自己的如意计划，金树仁首先决定羁縻聂滋尔，委任聂滋尔为省政府高级参议员，使他留在乌鲁木齐不能回哈密。随后于1931年1月宣布成立哈密县、伊吾县、巴里坤县（杨增新曾于1923年4月设立哈密县，行政上隶属于迪化道台、但县政府无权收缴王府土地税，无权安排劳力在王府属地开荒），公布了在上述县收缴土地税和开荒种地的条例。与此同时，还派遣了一个委员会清查王府土地。

金树仁在关于收缴土地税和开荒种地的条例中规定，维族农民愿种地者可继续种地，但要发放地契，从当年起缴税；废除无偿为王府服役的制度；维族不愿种的地作为荒地分给新来的百姓租种。

当时九十多名汉族农民从甘肃来托乎拉村落户，由政府发放农具、耕牛、种子，减免两年税收。分给他们的土地登记册上注册为荒地，实际上都是耕种多年的沃土良田。这种做法激起了世代向往这些土地，为之付出血汗甚至生命的当地农民的强烈愤慨，他们很快意识到，经过改革的土地制度与自己期待的土地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分得贫瘠土地的农民开始还知足，他们认为分些地就“不错”，

可他们经济基础薄弱，没有“面肥”（即没底子），无力缴纳当年的土地税，于是要求缓交。官府不予理睬，引起农民们的强烈不满。

那些年间，星星峡、下庙尔沟、一棵树、二宫、沁城、小堡等地的驻军任意向百姓摊派徭役赋税，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就在这时，发生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小堡一名姓张的驻军连长强娶维族少女为妻的事件。

那是1931年2月，驻防军连长张国琥欲娶一位维族少女为妻，村民们经研究“表示同意”，但提出必须按维族习俗迎娶。张姓连长点头答应。迎娶那天，化装成少女少妇与乐队的起义军里应外合，把从张连长到炊事兵（有人说有两个比较老实的战士免遭一死）全部驻军一个不留地全部掐死，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这次行动是在名叫沙力的一位机智勇敢的都尔戈（王府委任的村长）领导下获胜的。

这件事发生后，伊吾、巴里坤、沁城等地的民众随之揭竿而起，教训了当地的贪官污吏。参与行动的民众集中在东山脚下宣布起义。

被王府任命的原村长阿布都拉音、苏甫尔、帕里尼牙孜、阿不都尼牙孜、米提甫等人原商定七月起义，他们企图利用群众对金树仁土地制度的不满，给省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恢复哈密王制度。小堡事件促使他们提前行动，被唤起的民众向各政府军驻地发起攻势，把政府军迅速消灭，夺得了武器装备。沙力都尔戈是这一系列胜仗的部署者和指挥者。这个名字很快就在以后的岁月中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其实正是这位沙力都尔戈最早发动了哈密起义，领导民众打了一系列大胜仗，把金树仁的哈密驻军巧妙消灭，把他们一个个无声无息地扼死，用政府军的武器装备武装了起义军。听说该人是哈密王委任的小堡村村长，也有人说他是托乎拉村村长。

哈密东山的起义突如其来地给了金树仁以当头一棒。金树仁命哈密驻军师长刘希曾出兵镇压，刘师长虽做了周密的准备，在沁城仍遭沉重打击。刘希曾二次率一营兵力镇压起义军时，受到前后夹击，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这次战斗之前沙力都尔戈与和加尼牙孜做了周密部署，两支队伍埋伏在山谷两侧。更深夜静，官军刘师长率兵进入南山口山谷，沙力都尔戈与和加尼牙孜的部队立即两面夹击，大获全胜。

和加尼牙孜声名大震，传遍四方，与哈密起义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

关于和加尼牙孜的身世，说法不一。最普遍的说法说他 1889 年出生于哈密塔拉图山村，三代为奴，父亲伊明·尼牙孜后来成了为王府管奴隶的当差。和加尼牙孜到了上学年龄，被父亲送到哈密经文学堂读书，与沙木胡苏特亲王的孙子白锡尔是同学。和加尼牙孜满十七岁后，为避免被登入奴隶名册，由父亲作主娶妻成家自立门户。1907 年他家被摊派给星星峡驻军运送柴草，他被迫前往，归途上同行者除他与另外二人外全部死于暴风雪。三人来到阿其克苏兵站，站上军官说甘肃来了二十名士兵全部冻死，根据登记知他们带有二斤鸦片、五十两白银，可他们身上没发现这些东西，怀疑东西被和加尼牙孜等三人偷走，对他们三人严加搜查，从那二人身上搜出铜钱，从和加尼牙孜身上搜出铜钱和临行时父亲给他的一两白银，于是兵站将那二人放走而将和加尼牙孜扣留。

兵站罚和加尼牙孜服了一个月苦役，不断逼问他偷盗的东西藏于何处。直到哈密来了一个车夫，告诉和加尼牙孜“哈密农民起义了”，和加尼牙孜才受到启发，夜半时分偷了一匹骏马，沿着熟悉的小路跑回哈密参加起义，这次起义就是有名的“土尔帕克之战”。

沙木胡苏特亲王大有不抓到和加尼牙孜誓不罢休之决心。他四处张贴告示，告示云：“夏尔拉塔图山区奴隶伊明·尼牙孜之子

和加尼牙孜前往星星峡，在途中阿其克苏兵站偷窃王府鸦片两斤，银圆五十块，马一匹，皮大衣一件，藏匿于草丛之中，以参加土尔帕克暴动之用。该人矮个，圆脸，浓眉大眼。告其下落者，赏元宝三枚，或骏马三匹；抓到该人送交王府者赏元宝十二枚或骏马十二匹。”

和加尼牙孜的老母看到告示，把儿子秘密送往吐鲁番躲避。之后和加尼牙孜更名改姓，以“依斯哈克”的名字进都城高级经文学校读书隐匿。在学习期间，他结识了一起学习的买合苏提·穆依登和买合木提·穆依登等人。

抓和加尼牙孜的告示和侦探也到达吐鲁番。按照母亲的安排，在买合苏提、买合木提等人的帮助下，他加入朝觐行列前往麦加。朝觐完毕欲回国，由于没有路费，留下给当地一个有钱人干活，挣够了钱，于1912年初回到哈密。回来时正值哈密王奉袁大化之命征兵，铁木耳·海力帕趁机发动起义。对和加尼牙孜来说，无论是为报新仇旧恨，还是为摆脱沙木胡苏特亲王的监视，参加起义都是能达到目的的唯一出路。他不失时机地投奔铁木耳·海力帕，在战斗中以勇敢、机智、灵活、巧妙而赢得了铁木耳·海力帕的赏识及起义军的尊重，成为铁木耳·海力帕的贴心参谋与得力干将。

铁木耳·海力帕中了好计，起义失败，和加尼牙孜阿吉没去乌鲁木齐，而和一部分义军弟兄留在哈密农村。为躲避沙木胡苏特亲王对起义军的疯狂报复，他率领义军弟兄上了山。铁木耳·海力帕牺牲后，沙木胡苏特彻底露出狰狞面目，出兵各地农村山区清剿起义军。和加尼牙孜率兵坚持斗争，由于士气低落，弹药缺乏，人数一天天减少，他感到继续坚持已没什么意义，便解散了队伍，单独留在山上。

沙木胡苏特亲王决心不惜代价活捉和加尼牙孜。和加尼牙孜除了出国无路可走，便欲出国暂避。在从巴里坤到阿勒泰的路上，他的马被同路一个哈萨克小伙子偷走，无法赶路，身上又没钱，只

好留在当地为一个哈萨克巴依喂牲口以求生存,这一喂就喂了一年之久。

沙木胡苏特亲王追捕和加尼牙孜的命令传到哈萨克阿吾勒(游牧村落),化名依斯哈克的和加尼牙孜成了人们的怀疑对象。和加尼牙孜在当地无法继续存身,便偷了一匹马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警觉地逃往塔城。路上马死了,只好步行,历尽艰辛赶到一个名叫马木提巴依的维族牧主住处。他小心谨慎,自我介绍名为卡木扎,是哈萨克族。与哈萨克人共同生活过一年多的和加尼牙孜从语言到性格都与地道的哈萨克人相差无几,马木提巴依毫不怀疑地收留了他,让他为自己喂养牲畜。

沙木胡苏特亲王得知和加尼牙孜逃到塔城,派人到塔城抓他,和加尼牙孜知来者不善,便赶在他们行动之前逃往俄国。

到了俄国他在一个叫雅尔坎特的维族聚居的村落存身,靠给巴依干活儿、打猎谋生。有时四处游荡,游荡时巧遇在俄国经商的吐鲁番老同学买合苏提·穆依登、买合木提·穆依登兄弟,经他们介绍到了谢麦、扎衣撒、托克玛克、卡拉阔尔等地与不少新疆商人相识,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有关新疆的消息。

1923年苏联内战东进,他随东家魏力巴依来到伊犁,后赴乌鲁木齐。1927年底得知父亲去世,他秘密赶赴塔拉图奔丧,并就此留在塔拉图。

沙木胡苏特亲王死后,继承王位的聂滋尔腐化堕落,劣迹昭著,人民对其强烈不满。金树仁为自己的利益召聂滋尔至乌鲁木齐,不让他重回哈密。一个叫尧乐博斯(该人曾任杨增新军队维族营营长之职)的人乘机把沙木胡苏特亲王的孙子白锡尔推上王位。此时哈密人民的斗争矛头主要对准金树仁,而不是王爷。王爷利用群众的情绪,对废除王爷制度表示不满,要求恢复王爷制度。迫于形势,王爷对百姓的压榨略有收敛,意在收买民心。不知是出于此

原因,还是忘记了父辈的恩怨,抑或念及幼时同学之情,总之,白锡尔绝口不提追捕和加尼牙孜之事(也许上述三种考虑兼而有之),相反,他给山上的猎户发放枪枝,摊派每位持枪者交两支鹿角。塔拉图交来六支鹿角,白锡尔十分重视,他追查交鹿角的猎户姓甚名谁,当他知道此猎手正是和加尼牙孜时,竟邀和加尼牙孜到王府一叙。

和加尼牙孜婉拒白锡尔两次邀请,白锡尔不甘心,选派玉素甫王爷(伯克)第三次亲临相请,和加尼牙孜无奈只得应邀前往。

到王府后,白锡尔待和加尼牙孜如上宾,礼遇周到,二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使和加尼牙孜最终成了王府的武官和卫队长。他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武官身分对以后在暴动队伍中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在武装暴动进入第二和第三阶段时曾被推崇为称职的领导者,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组织和指挥方面表现出色,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1931年2月到4月,官军镇压起义军频频取胜,起义军痛失精锐部队,士气日益低落。何以如此?简言之,就是和加尼牙孜的威望随着一次次战斗直线上升之故。起义军占据的山区磁铁般吸引了各界群众。金树仁见状,千方百计招降。派哈密县长朱烈,宗教界知名人士赛丹霞阿訇和牙力都尔戈等人上山与和加尼牙孜谈判,保证如果起义军缴械,一切既往不咎,满足起义军一切要求。

和加尼牙孜阿吉亲自参加过“土尔帕克事变”和铁木耳·海力帕起义,亲眼见过两次起义后官府所谓的“不予追查”、“既往不咎”、“答应一切要求”为何等货色,吃过苦头,因此不仅拒不妥协,而且连谈判的打算也没有。义军将领中,大部分是代表王府利益的都尔戈,起义爆发后,这部分力量与既反对王爷制又反对金树仁政权的力量混在一起,对谈判的态度截然不同。白锡尔王和他的姐

夫、聂滋尔王的女婿马合甫阿吉为起义军提供武器弹药，金银财宝、粮草给养，迫使自幼仇恨王爷制度的和加尼牙孜不得不与金树仁的代表谈判，并提出如下要求：若要停止冲突，首先必须取消废除王爷制的命令，撤回官府指定的各县县令，撤走省军，为保安定，严禁关内派兵进犯新疆，安排维族军队负责新疆之安全。

对和加尼牙孜的要求金树仁做了如下答复：“任何条件均可考虑，但起义军必须放下武器。”

谈判期间，哈密驻军师长刘希曾乘起义军忙于谈判之机，在哈密、巴里坤等地部署军队，企图镇压起义军。由于和加尼牙孜阿吉早领教过“会谈”、“和解”之伎俩，事先机智地做了安排，因此官军不仅没占到便宜，反而被起义军打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金树仁见势不妙，一面指责刘希曾无能，一面命令自己的亲家朱瑞墀师长，亲信熊发友旅长镇压和加尼牙孜的起义部队。不想朱、熊连吃败仗，只得一面向金树仁求援，一面派虔诚的穆斯林苏菲阿吉上山与和加尼牙孜谈判。

就在此时，巴里坤的哈萨克民众在和加尼牙孜起义军连战连胜的鼓舞下揭竿而起，一举占据哈密与七角井之间的头堡、二堡等地，造成哈密、奇台、吐鲁番之间的交通线失控。和加尼牙孜阿吉与阿力甫为首的巴里坤哈萨克起义军屡战屡胜，一举打开了哈密的局面。

和加尼牙孜阿吉领导的反压迫、反剥削、反对不平等制度的武装起义，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显示了各族人民的愿望可以变成现实的必然性，很快得到东疆乃至南疆人民的响应。新疆各地相继爆发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给了金树仁独裁政权以沉重打击。哈密暴动由地区性的起义成为全省范围群众起义的中心，和加尼牙孜也由哈密暴动的领导者变为全疆起义者的精神支柱。

哈密暴动的爆发及迅速胜利令各阶层人士刮目相看。与此同

时,各界人士也怀着不同的目的,企图从中谋取些什么,企图使暴动体现自己的意志。在此我想介绍两个人,一个是尧乐博斯,一个是马仲英。这二人既是哈密暴动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哈密暴动的破坏力量,是导致暴动失败的重要人物。

关于尧乐博斯的身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原是汉族,小时被父母带到新疆,生活所迫卖与维族人为子;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随左宗棠进疆的一名老兵在喀什与一维族妇女所生的混血儿。他天生癫痢头,在旧军队中长大,沾染不少兵痞恶习,蛮横,刁钻,令人生厌。以后不知何故来到哈密,在哈密王府干活儿。此人狡猾奸诈,诡计多端,骗得沙木胡苏特亲王的信任,被提拔为王府听差。随沙木胡苏特亲王去北京时向武林好手学得些许武艺,对汉语与汉族礼仪习俗颇为精通。

杨增新执政时,经沙木胡苏特亲王推荐,他曾被安排担任一个维哈营的营长,驻守庙尔沟。沙木胡苏特亲王死后,聂滋尔继承王位,他被王府留用兼任营长职务。小堡出事,库拉依暴动前夕,他扶佐白锡尔称王。起义一爆发,他与白锡尔王立即表态支持并资助了起义军大批武器弹药和二百余匹钉了掌的好马。

和加尼牙孜阿吉虽屡战屡胜,毕竟不如金树仁实力强大,时间一长,由于内部主张复辟哈密王制度者有之,力主妥协折衷调和者有之,以及其他种种,使得他实难坚持,处境维艰。就在这个时候,由于援助起义军武器物资、为起义军出谋划策(与刘师长谈判期间,尧乐博斯曾给起义军写信,为如何消灭官军在哈密和巴里坤的两个团出谋划策)而享有一定威望的尧乐博斯明智地提出派人去酒泉请回族马仲英相助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得正是时候,和加尼牙孜欣然采纳。

尧乐博斯把马仲英引入新疆,马仲英深为感激,给了他一个旅长官衔以示回报。尧乐博斯为此洋洋自得,忘乎所以。此时他早已

脱离起义队伍，一心巴结马仲英。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包围乌鲁木齐，尧乐博斯积极为他提供物质援助。盛世才靠苏军援助击败马仲英，迫使马仲英逃往南疆，尧乐博斯亦同行南逃。盛世才空投传单宣称“与马仲英一刀两断者，将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尧乐博斯见马仲英大势已去，遂从托克逊返回归顺盛世才，表示遵令留在哈密。盛世才虽对他的归顺认为晚了一步，还是赏给他一个哈密警备司令的官衔。这个两面派、阴谋家、政治投机商为何当初装扮成起义的支持者，为何为起义军出谋划策，其行动做了最简单明了的回答与总结。

谈到马仲英，史料记载该人系西北军阀马步芳的本家兄弟，原名马步英。十七岁时因当营长的父亲生病，继任了父亲的营长职务，人称尕司令（“小司令”、“矮个子司令”之意）。他自封为“甘肃—宁夏青年联盟总司令”，逞性妄为，怙恶不悛。马步芳之父马勋臣就任青海省主席后，唯恐马仲英的名气超过自己的儿子，令马步芳认真对付马仲英。马步芳政治、行政、军事基础雄厚，又有强有力的后盾，对付马仲英易如反掌。他监视马仲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使马仲英在宁夏和甘肃东部无立足之地。“尕司令”无计可施，只能投入蒋介石怀抱，寻求庇护。有着土匪、军阀遗传因子的马仲英不甘失败，不久便重返甘肃，召集旧部，再次称霸。他在河西走廊东山再起，声称即将开始大的行动。但马步芳没待他站稳脚跟，便动用重兵向他发起足以置他于死地的强大进攻。马仲英无力抵抗，除解散队伍仓惶逃命无路可走。

尧乐博斯邀马仲英到哈密等于给了他一条生路，真似“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路可走的马仲英欣然应允，率六百余名士兵来到哈密。到哈密后即向巴里坤官军发动进攻，缴获部分新式步枪和大炮，与和加尼牙孜的部队一起向哈密发起进攻。哈密防守森严，粮食弹药储备充足，金树仁及时电告即刻救援，使守军

士气大增，顽强抵抗，固守城池，致马仲英打了几次败仗，损失惨重。他不愿继续消耗兵力，便把包袱推给和加尼牙孜阿吉，致使哈密最终也没能被攻破。正在僵持之时，金树仁的救兵来到七角井，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前往截击。马仲英舍不得用兵，只顾收集武器弹药，和加尼牙孜阿吉只好孤军作战，虽战士们勇猛顽强，毕竟势单力薄，未达预期目的。

在战斗中腿部受伤的马仲英一面养伤，一面招兵买马。他看中东部，欲东行甘肃，在老家建立军事基地。

马仲英去新疆后，马步芳在酒泉安排驻军，封锁嘉峪关，阻止马仲英进关。马仲英无奈只好驻扎安西、玉门、敦煌等地。马仲英多次电告马步芳之父马勋臣，恳请马念及亲戚情分，在酒泉给他一席之地，均遭拒绝。马步芳提出，若回酒泉，必须以交出巴里坤、七角井战役中的战利品为条件。为回家乡，马仲英被迫交出四门大炮、四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数百支步枪、大批弹药以及部分军用物资，而后获准回到酒泉。

尧乐博斯请马仲英进疆时，二人曾密谋夺取金树仁大权。尧乐博斯诡计多端，阴险狡诈，马仲英却更加技高一筹，他故意回关内使尧乐博斯误认为新疆大权已非己莫属。他回关内加紧训练队伍，疏通后方关节，时刻不忘马步芳的存在。他把部分骨干留在新疆，令他们不断进行骚扰，在新疆制造混乱。尧乐博斯见马仲英离疆，高兴得忘乎所以，欲以旅长身份领导起义军与马仲英留下的骨干。起义军识破了他的两面派嘴脸，决定对其行动严加限制。

马仲英留在新疆的骨干各自为政，自行其是。马世明等人议定：马占仓、何福海去喀什，马希旭（又名马赫英，人称“马黑鹰”）去阿勒泰、塔城招兵买马，积蓄力量，马世明、马德祥等人到吐鲁番、鄯善一带准备进攻乌鲁木齐。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和加尼牙孜。一心恢复王爷制度

的白锡尔和尧乐博斯承认他的起义军领导者地位，一心想从起义中捞油水。他们在特定时期支持过他，可形势一变，他们翻脸之快令和加尼牙孜瞠目结舌。对和加尼牙孜更为致命的打击是在七角井战役中，马仲英推卸重任，一走了之，把战事留给他一人，使他的部队损失惨重，无法补充（武器弹药皆被马仲英拿走），不得已撤退进山。金树仁见他弹尽粮绝，处境艰苦，从塔城调黎海如担任总督召降和加尼牙孜。和加尼牙孜坚决拒绝，明确表示：不推翻金树仁政权誓不罢休。

据史料记载，就在这个时候，和加尼牙孜开始与外蒙建立联系。对这件事，史料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外蒙主动联系。那是1932年秋，外蒙派洛甫森多尔吉和加木森多尔吉两名蒙族代表和一名叫阿巴依的哈族代表来到和加尼牙孜驻地，向和加尼牙孜表示：金树仁部队的盘剥与战争的骚扰造成维哈百姓处境维艰，难以生存。大批新疆维哈百姓外逃外蒙境内，影响了外蒙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对此表示忧虑。他们同情和加尼牙孜和新疆受苦受难的百姓，愿意提供武器弹药、食品衣物方面的援助。和加尼牙孜表示愿意接受援助，并适当给以酬谢。外蒙代表提出签署一项条约，和加尼牙孜担心因此受外蒙牵制，拒绝签署任何条约、协议或文件。

另一种说法是：和加尼牙孜阿吉率部撤到塔拉图山上，召开会议决定派遣沙力都尔戈，巴克尼牙孜都尔戈等人去外蒙购买军火，向外蒙提请援助（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做出决议）。外蒙立即派遣加木森多尔吉、阿巴依尼牙孜、卡斯木先生、斯马义、祖尔东等代表面见和加尼牙孜，对农民起义表示同情，同意给予援助。

两种说法都肯定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和加尼牙孜为首的哈密暴动极为同情，给予了积极支持与大力援助。1932年冬蒙古人民共和国资助和加尼牙孜部队五百套皮大衣和军用棉衣，七十支步

枪,数十箱子弹与面粉、军用物资等,截至1933年,即和加尼牙孜阿吉率部转移鄯善、奇台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共资助和加尼牙孜部队步枪、手枪、机关枪、弹药等价值十几万两白银的军用物资,还在蒙古境内培训维族青年三十余名。和加尼牙孜并不无偿接受援助,每次接受资助物资,或是付黄金抵债,或是打借条,注明还期。

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政治干部到和加尼牙孜部队中协助做政治工作,这些政治干部虽未建立显赫功勋,却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在哈密、巴里坤周围宣传征兵,壮大武装力量,争取哈萨克群众积极参加起义。加木森多尔吉二次来疆时在塔拉图与和加尼牙孜会面,在他身边协助工作三个多月,归国时他让卡斯木、阿巴依两位哈萨克人留下,两位政治工作者以后成了和加尼牙孜的得力助手。

和加尼牙孜阿吉面对投机分子白锡尔、尧乐博斯的背叛、金树仁派来的盛世才、刘杰三等的攻击及马仲英的威胁,深感势单力薄,担心暴动半途而废,长期在哈密周围游荡损耗有生力量,于是不顾蒙古方面的反对,应吐鲁番起义者之邀西行鄯善、吐鲁番。

吐鲁番民众于1932年末(十一月底)自发地举行了暴动。当时到处流传“和加尼牙孜打到鄯善”的消息,阿斯塔纳群众便自发组织起来,阿斯塔纳的买合苏提·穆依登带领一部分知名人士前往鄯善迎接和加尼牙孜。走到鲁克沁发现情况有诈:原来打到鄯善的不是和加尼牙孜,而是马仲英部下马世明拼凑的二三十个鲁莽士兵。这些人妄图凭几声吆喝恫吓拿下鄯善,不想“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到沉重打击,仓惶逃至鲁克沁地阿依村,惊魂不定,不知所措。买合苏提·穆依登正忙于领导阿斯塔纳人民起义,无暇顾及马世明,便把他及他那二三十个散兵游勇带往阿斯塔纳。行至喀拉哈达,与前来镇压起义的一营官军相遇。双方交战,阿斯塔纳民众高举棍棒、叉、锹冲向官兵,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大获全胜,缴获数百枝步枪,弹药等战利品,买合苏提·穆依登把武器发

放给猎户和壮小伙儿,很快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武装队伍。

买合苏提·穆依登原是阿斯塔纳的巴依,出生于商人家庭,有一名叫莫苏尔·穆依登的哥哥和名叫买合木提·穆依登、古苏尔·穆依登的两个弟弟。1920年他去苏联经商,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在莫斯科和回国之后在吐鲁番与兄弟一起做过一些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事情,据说,他领导着一个七人组成的领导集团。

哈密发生暴动,他当即致信和加尼牙孜阿吉,表示拥护与支持。1932年春,他再次致函和加尼牙孜,告之吐鲁番条件已成熟,和加尼牙孜若来吐鲁番与他共同领导暴动,定会成功。听说“和加尼牙孜抵达鄯善”,他激动不已,所以才不加调查匆忙赶去迎接。

阿斯塔纳起义军歼灭金树仁一营官军的消息一经传出,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地农民欣喜若狂,立即高举镰刀、斧头、棍棒赶到阿斯塔纳,纷纷要求参加起义队伍。穆依登家大院成为起义军指挥中心,起义军磨刀霍霍,积极准备攻占吐鲁番县城。

当时吐鲁番县城驻有金树仁的一个旅,凭起义军的人员装备很难对付这支守军。正在起义军绞尽脑汁想对策的时候,又传来消息:奇台援兵将至。起义军知道,两支队伍一会合,起义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于是决定连夜出发,堵截奇台援兵,不料奇台援兵没待起义军堵截已先赶至吐鲁番老城附近,起义军拼命拦截无效,援军长驱直入,进入吐鲁番县城。这是1932年12月初的事。

买合苏提·穆依登等领导人决定乘起义军士气高涨立即攻城。他们连夜准备,不想天亮前金树仁派遣的援兵从乌鲁木齐赶到吐鲁番。向起义军投诚的马世明见援兵人多势众,胆战心惊,主张撤到托克逊暂避。买合苏提·穆依登不同意,认为当前起义军士气高涨,不宜撤退,与官军交战定获全胜。官军连夜赶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加之对起义军人数、武器装备情况一无所知,双方交战后官军士气低落,结果被起义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除七八

十名将士侥幸活命仓惶逃窜到达坂城外，全部被歼，丢下两千多名死伤将士。起义军缴获数千支步枪，大批弹药、马匹、车辆、衣物等军用物资，足以把全军武装齐备。

两次战斗连获大捷，起义军群情激昂。准备就绪，开始攻打吐鲁番县城。战斗激烈，打得很艰苦，起义军机智灵活，在城门放一把火，使城里一片混乱，吐鲁番守军马旅长（马福明）抵挡不住，缴械投降，起义军收缴数百枝步枪，大批弹药和载重汽车一辆。

起义军下个目标是鄯善。当时鄯善县城驻有金树仁守军数千名，其中有十月革命时从苏联逃出的白俄组成的一个团，该团英勇善战，装备精良，拥有大批大炮，轻重机枪和新式步枪。起义军深知对手的厉害，为了获胜，起义军进行了充分扎实的准备，首先整顿领导集团，确定买合木提·穆依登任总司令，艾木都拉大毛拉、莫苏尔·穆依登、依明巴依阿吉任参谋长，马世明任师长，买合木提·穆依登任旅长。穆依登家在吐鲁番县城内的大院为总指挥部。按起义军的籍贯、人数编成团、营、连、任命团、营、连长。

组织方面的准备完成之后，起义军于1933年1月开始向鄯善发起攻击。战斗持续十二天，仍未破城。这时马世明大搞分裂活动，自封为“三十六师前线剿匪总司令”，私自占据吐鲁番。起义军从七角井派来援兵，歼灭了金树仁部下的熊发友旅，使鄯善的白俄军惊惶不安，然而由于战斗时间持续过长，起义军伤亡惨重，加之马世明搞分裂，造成起义军力量分散，因此起义军没能乘七角井援军大获全胜之机坚持攻城，而被迫转为防御。

盛世才得知熊发友旅被歼，非常惊慌，立即放弃哈密，率兵进军鄯善。为保存有生力量，起义军放弃对鄯善的封锁，撤往吐鲁番。了解撤退根由的马世明见风转舵，回归起义队伍，绝口不提自称“总司令”之事，仍以“师长”自居，在吐鲁番稍加休整，起义军离开吐鲁番向托克逊撤退。

起义军指挥中心在托克逊研究决定，暂时分散行动：买合木提·穆依登、马世明去焉耆，买合苏提·穆依登去哈密，与和加尼牙孜阿吉共同组织“哈密—吐鲁番联合军”，从盛世才手中夺回吐鲁番、鄯善，推翻金树仁反动政权。1933年1月底，按照起义军指挥中心决议，买合木提·穆依登、马世明前往焉耆，买合苏提·穆依登和参谋伊明巴依阿吉、鲁克沁王萨依提一行前往哈密。

同年二月底，和加尼牙孜阿吉、买合苏提·穆依登等人回到鲁

提·穆依登继承他的遗愿,与另一哥哥莫苏尔·穆依登及其他志士仁人一道直接护送和加尼牙孜胜利转移喀什,参加反对疏勒敌人的战斗,同时与背面袭来的马仲英交锋。买合木提·穆依登同他哥哥一样,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奋不顾身,也是一个极富领导才干、与众不同的领导者。我在喀什目睹他颇富雄才大略的指挥才能,由衷钦佩。)

和加尼牙孜阿吉为失去买合苏提·穆依登这样一位肝胆相照的战友痛不欲生。当时他神思恍惚,不知所措,打算回哈密。就在他欲动身之际买合木提·穆依登从焉耆返回,两支队伍会师,于1933年3月开进吐鲁番。马世明深知和加尼牙孜阿吉对马仲英的不讲信义,忘恩负义不满,没有同买合木提·穆依登一道回吐鲁番。得知和加尼牙孜阿吉和买合木提·穆依登会师从吐鲁番调头北上,马世明这个政治投机商不甘心坐失良机,让马占仓带上他自己的队伍留在焉耆,自己率两团兵力向北转移。

始由哈密爆发,吐鲁番立即一应而起的上述暴动是席卷整个东疆,最先起来反对金树仁独裁政权并给其重大打击的伟大的人民武装运动。在新疆革命史上,这次暴动以其成分单纯,面对形势复杂,环境恶劣,斗争艰苦而独树一帜。在单枪匹马,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数量、装备优于自己数倍的敌人英勇斗争,顽强不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在新疆革命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光辉篇章。这次暴动的规模之大,群众基础之雄厚,影响之广,震动之强烈超过它之前之后的任何一次起义。它有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口号,有全疆各地各阶层民众由衷钦佩的领导集团。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农民运动的片面性,又加入了一批机会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商,但瑕不掩瑜,无数起义者(包括领导者)用鲜血和生命证实了人民的力量强大无比,指明了新疆的光辉未来。这次暴动以惨重的教训使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敌人,教会人民如何对待这样

的敌人。敌人对这次暴动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血腥镇压，对新疆人民欠下了又一笔血债。在以后的日子里，敌人惟恐新疆人民再次起来反对他们，稍有风吹草动，便如临大敌，限制民众的一切行动自由。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真是可悲可叹！他们身居统治地位，却时刻不得安宁，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终于落得起义者期待的下场——以彻底覆灭而告终。

人民起义者在历史的篇章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起义的领导者尽管有这样那样一些过失，但瑕不掩瑜，子孙后代会慷慨大度地原谅他们，给他们以客观的评价，尊重他们，爱戴他们，永远纪念他们。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动分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则早已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哈密—吐鲁番暴动在新疆引起连锁反应。库车第一个起而响应。库车暴动的主要领导者是铁木耳·艾力和阿地力·艾兰木。阿地力·艾兰木的名字不知何故很快被人们遗忘，我只听说他是沙雅人。

据说铁木耳·艾力原籍库车，是当地的大商人。多数人认为他是库车（也有人传是库尔勒）的马帮头目，还有人说他不是什么商人，也不是马帮头目，只是个马车夫。我觉得当时人们似乎不大关心铁木耳·艾力的出身和干什么营生，而只是关心他很快拉起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和他的“师长”称号。铁木耳·艾力不知何时被何人委任为“师长”，他的部队并无番号和正规编制，我估计他只是个自封的“师长”。当时起义队伍中自封为“师长”的大有人在。这正像马仲英队伍中自封的“指挥”颇多一样。在起义者中，人们大约把“师长”做为“头目”、“领导者”的代名词。

铁木耳·艾力于1932年元月在库车成功地领导了起义。马世明派来的马占仓部下一位名马仁的回族团长（人称该人“马指挥”）

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大力帮助。

铁木耳师长打算从库车出发，进军阿克苏。阿克苏驻有金树仁部下的一个团。团长吕发荣、阿克苏专员徐益珊闻讯向喀什求援。喀什有一个师，原师长艾印玉（音译）被金树仁调往乌鲁木齐对付哈密起义军（该师长半路死了），新被任命的师长金树吉为金树仁的四弟。金树吉派手下一名叫杨庆明的团长增援阿克苏。二月初，吕发荣和杨庆明率部在拜城和阿克苏交界的群尔鲁克和苏鲁克牙尔两地分别与铁木耳·艾力的队伍交战，铁木耳师长大获全胜，吕发荣、杨庆明逃往阿克苏，专员徐义珊、阿克苏县令袁孝通（音译）见吃了败仗逃往南疆，铁木耳师长很快攻占了阿克苏。

听说铁木耳师长进军喀什，金树吉吓得自杀身亡。他的司令官刘鼎任命李登荣为团长，率兵到距巴楚东部八十公里的托库孜乌堂构筑防御工事。刘鼎视察防御工事归途中被杀。李登荣的队伍阻击铁木耳师长的起义队伍遭惨败，李登荣自尽身亡。在阿克苏加入铁木耳师长队伍的马占仓（该人职位比马仁高一级，人称“秃尾巴指挥”）收容了李登荣的残兵败将。

铁木耳师长勇猛顽强，以英勇善战、爱民如子为群众所拥戴。对他的勇猛顽强，敌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进发喀什时他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后来中了喀什背信弃义的“秃尾巴指挥”（马仲英队伍中大小军官都自称“指挥”，此处可能指马占仓手下的马仁）的奸计而不幸牺牲，他至死保持清白的名声，没给自己的一生染上任何污点。

世人瞩目的三十年代暴动中还有一位不容忽略的人物，那就是喀什的沙比提大毛拉。有些材料称他为暴动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他既不是暴动的倡导者，也不是暴动的组织者，他甚至没杀过一个敌人。他生在喀什，长在喀什，有着丰富的宗教知识，是一位宗教职业者。他曾出国（据说去印度）深造，受到泛

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的严重影响。回到喀什后,以传教为业,编纂发行初级伊斯兰教教程。他的行动为保守僧侣所仇视,因为这些顽固不化的僧侣企图使民众永远处于贫困落后、愚昧无知的状态,以利他们摆布。而大多数进步的宗教人士则对他的做法大为支持、赞赏。

喀什人民暴动,金树仁政府的地方政权垮台,部分反动分子利用历史造成的起义者的局限性与弱点,妄图窃取胜利果实。他们东奔西走,绞尽脑汁,认为沙比提大毛拉的威望最好利用,于是把沙比提大毛拉推到前台,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共和国”政府的班子,推任沙比提大毛拉为傀儡总理,即“政府”首席代表。沙比提大毛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接受了这个职务并组阁成立了“政府”。

这些事实说明,沙比提大毛拉不是暴动的领导者,而是反动派挖空心思选中的投机分子的代理人。他和他的“政府”妄图从暴动中捞取好处,而人民群众一旦看清了他们这些人的本质,则对他们不仅不支持,而且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起义的著名领导人和加尼牙孜阿吉最终率领起义军推翻了这个所谓的“政府”,将沙比提大毛拉抓获并送往乌鲁木齐处理。

和田暴动始于1932年2月17日。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主要是穆罕默德·伊敏大毛拉,也叫穆罕默德伊敏·艾孜来提、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以后的章节我们称他为穆·布格拉,译者注)。墨玉暴动前夕,他曾与和田地区的木哈买提·谢日甫穆夫提、依斯拉皮尔大毛拉等数十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一起致函和加尼牙孜阿吉,当地群众在这封信上按了手印。信上对哈密暴动表示祝贺,拍手称快,要求和加尼牙孜尽快来和田。穆·布格拉在墨玉发动暴动,得到和田群众的热烈支持,不少人奔赴墨玉,参加暴动。由于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墨玉暴动迅速席卷和田地区,声势浩大,参加

者异常踊跃。

穆·布格拉和沙比提大毛拉一样，也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宗教学者。他生于墨玉，受过高等宗教教育，长期担任教师职务。除宗教方面造诣颇高外，他还乐于为百姓做好事，积德行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穆·布格拉领导的和田暴动由于内部的诸多分歧、争名夺利而未能巩固胜利成果。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均无支持者，以至暴动最后以失败告终，穆·布格拉被迫逃亡印度。盛世才政权垮台，确立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权后穆·布格拉回到新疆，被国民党反动派蒙骗拉拢，为国民党反动派分裂革命队伍、加强独裁统治呐喊助威，反对三区革命为中心的新疆人民革命运动。1949年新疆解放前夕，他再次逃亡印度，在印度进行反对新新疆，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最后病死土耳其，成为三十年代新疆暴动领导人中惟一葬身异邦之人(关于这些情况本书以后还将谈及)。

在论述新疆三十年代历史事件的著作、资料中还有一个人的名字绝少提及，那就是柯尔克孜族群众暴动领袖吾斯曼·艾力。也许此人与他人相比，其所在地区与活动不甚显赫，暴动时间较短。然而在我尚不知晓三十年代新疆重要事件中那些名噪一时的其他人物之前，吾斯曼·艾力就早已成为我心目中一位非同寻常的重要人物了。以下叙述的就是有关吾斯曼·艾力的一些故事。

第二章 喀什暴动

吾斯曼·艾力以“吾斯曼勇士”、“吾斯曼师长”、“吾斯曼帕夏”(帕夏系旧时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译者)之称谓名扬喀什。这些显赫的称谓是喀什暴动取得初期胜利

后，群众送给他的。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哈密暴动后，阿图什民众当中开始出现各种流言。什么“哈密王造反了。现在的哈密王之父临终时预言，他死后要在他的坟头上栽两株花，何时花开就要闹事。如今两株花开了，人们起来造反了。”还说“暴动者口唱《花儿，开放吧》这支歌作战，脖子上挂护身符，刀枪不入，异教徒枪弹打不穿。”“乌鲁木齐将军们已逃走，哈密人正向喀什进发。”等等。这些传言传播极快，令人们精神为之振奋。不知是从哈密传来的还是老百姓自己编造的，《花儿，开放吧》这首歌迅速传播开来：

开吧，开吧，花儿开吧，
花开时节，大地洒满阳光！
开吧，如今穷人连包谷馕也吃不上，
巴依、霍加却穷奢极欲，趾高气扬。

开了！开了！花儿争相怒放！
草坪一片五彩纷呈，
百花争奇斗艳吐着芬芳，
开吧，小伙子们整装待发上战场！
开吧！巴依、霍加垂头丧气趴地上！
花开时节，大地洒满阳光！

.....

这首歌谣同上述流言好像是召唤喀什人民揭竿而起的号令，作用非同小可。我们聚在一起唱这首歌时，似乎有一种就要走上战场的激情。孩子们喜欢唱，纺线的女人们也喜欢唱。记得我家有个

叫托乎提汗的邻居，是个寡居妇女。妇女们常聚在她家院中在月光下一起纺线。妇女们把边纺线边唱歌视为一天最开心的时刻。托乎提汗院中的歌声常常响彻整个村庄。歌声像在召唤我们，我们常去她家院子听歌。往常她们总以“纺车悠悠转，爱人来身边”这类的情歌开场，继而高唱各种歌曲。可那些日子，她们以极大兴趣吟唱的情歌变成了《花儿，开放吧》这首歌，于是不仅年轻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也被她们的歌声吸引去了。她们还唱其他的歌，我记得她们唱过这样一首：

马提台是只大老鼠，
徭役多得无法数，
不让百姓过日子，
吊上绞架活受苦。

后来来了一个马道台，
自称不当暴君把人害，
可百姓牛羊任意赶，
问也不问就要宰。

祈求苍天雷鸣电闪，
劈毁帝王金銮宝殿，
愿大地降生英雄好汉，
为百姓铲除心头之患。

这样一批广为流传的民谣说明被压迫民众对独裁政权的愤怒已达顶点，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期间官府也知形势紧张，开始征兵，增收赋税，挑选骏马，加

紧备战。我们村被摊派上交好马。逊塔克山上有个名叫艾买提库力阿吉的人把有马人家的马集中在一起，准备挑选，我也被叫去。我有一匹白鼻梁的棕色马，我就骑着这匹马前往。看样子他们是要抢马。艾买提库力对我说：“要命别要马，别无他法。”我们坐在那人门前榆树下的小土炕上，瞅着拴在河边柳树上的马，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我十分喜欢自己这匹马，这匹马又漂亮又善跑，我刚刚骑它参加过阿图什巴恰克河滩上举行的赛马会，它超过了许多马，为我争了光，我实在舍不得它被征去。那个人让几位村长和我们马的主人一起商量商量，自己进屋等候。我突然有了勇气，悄悄走到马旁解开缰绳。刚翻身上马，便被几个狗腿子发现，他们大喊大叫：“哎呀，要逃走了！”我心一横，索性纵马飞驰而去，到拐弯处回首望去，只见四五个骑马人追赶上来。我放开缰绳纵马飞奔，他们竟没一个人追上我。我跑到一个亲戚家藏起来。阿图什有一个名叫阿布拉伯克的暴君派人到处搜捕我，若被他搜出可就倒霉了。一天夜里，我悄悄离开村子，到巴庄一个叫阿木提阿洪的人家里避风。后来听说官府自顾不暇，征马之事不了了之，我才回家。

1932年春天，吾斯曼帕夏（即吾斯曼·艾力）一下子出了名。关于他的传闻很多，说他反抗道台，最近就要下山；说他刀枪不入，是个用一把砍刀能同时砍倒十个人的英雄；还说他见过里孜尔圣人云云。一天，听说他次日下山，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到硝鲁克村。这个村落位于阿图什傍山坡处，我们赶到后见山坡上站满了人，四面八方的人们还在络绎不绝地向这里涌来。“来了，来了！”一阵喊声，人们纷纷向东翘首观望。几个巴依、阿訇站在人群前头，准备率先欢迎吾斯曼帕夏。忽然一阵骚动，原来是那个阿布拉伯克走来了。一些人围着他撕打，打得他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撕破。多亏几位巴依、阿訇相劝，他才未被愤怒的人们打死。两个骑马的人刚把他带走，人群中又传出“来了，来了”的喊声，向东望去，

果然一个骑马的人飞奔而至，身后扬起一片尘埃。这个人带来了吾斯曼帕夏即将到达的信息。一会儿，远处尘土飞扬，尘土中一队骑兵飞驰向前。人们一阵激动：终于把吾斯曼帕夏盼来了！队伍越来越近，只见队前是八到十个骑兵，身背步枪，腰扎子弹袋，头系红头布巾。骑兵后面是一位留着两撇小胡须，个子不太高却英姿勃勃的好汉。只见这位好汉骑着黑色马，身穿红色袷袂，袷袂里面是红色衣裤，腰间佩戴一把手枪，脖子上斜挎一柄长刀，头缠绿色缠头巾，装束神态都与与众不同。人们相互传告：“这就是吾斯曼帕夏。”“吾斯曼帕夏来了！”有人喊叫，有人问候，人们情绪激动，难以描述。吾斯曼帕夏走到人群前翻身下马，向几位长者谦恭地问候。欢迎群众簇拥吾斯曼帕夏前行，他们身后是头扎一色红头巾，身穿各式各样服装，手持长枪的数百名（大约有四五百人）骑兵。听说他们要在阿图什宿营。直到天黑，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兴奋异常，边走边赞叹吾斯曼帕夏如何威风，如何气派。谈论最多的是有什么吾斯曼帕夏打仗，刀枪不入，异教徒子弹绕着他走，任谁也奈何不了等等、言谈话语间流露出强烈的向往当兵的情绪。一人说想去当兵，另一人便嘲讽：“你不行，你能干什么？”一人说 he 想去和暴君打仗，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另一个就泼冷水：“你父母绝不答应。”回到家里，母亲正坐卧不安地等我，我喜形于色，向她详细讲述见到的一切，讲到最后竟情不自禁地说：

“妈妈，让我去当兵吧！”

“从你的脸上看出你的心思了！”母亲笑着说，“可你哪里能当兵？你还小啊！”

“还小？我都十七了！妈妈，让我去当兵吧，妈妈，快答应啊！”

“十七岁就算大人了？快干你的事去，长大了再说参军的事！”

我没再还嘴，只是当兵的愿望益发强烈了。临睡前我忍不住又去央告母亲答应我当兵，母亲仍不应允。躺在床上，我无论如何不

能入睡，总想当兵、骑马、打仗、打枪……眼前一直晃动着吾斯曼帕夏和那些头扎红头巾的士兵的身影。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睡着，只记得那天夜里做了许多梦，究竟做了什么梦我现在已记不清，只觉得那是些十分有趣，令人兴奋不已的美梦。什么骑马挥刀追赶敌人啊，什么攻打城池，攻不进纵马向前猛冲，飞上城墙啊等等。醒来之后，我更加克制不住强烈的当兵欲望，但不敢向母亲张口。午饭前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问我：

“孩子，你怎么了？怎么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还在想当兵的事吗？”

“妈妈，让我去当兵吧！我的几个朋友都要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行呢？”

“其实这也是你父亲的遗愿。”母亲哭了，“要是你父亲还活着就好了。你要是够了年龄去当兵，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会感到欣慰的！”

“妈妈，我不小了，我能打枪，能骑马，你就答应我，让我去吧！”

“先喝茶吧，孩子。”妈妈给我倒了一碗茶，“帕夏那些人今天要做什么？”

“不知道，他们似乎在做攻打喀什的准备，我去看看好吗？”

“要去就去吧！但有一点，做什么事都必须先考虑好再做。”

母亲的态度使我感到，我当兵的事似乎有了希望。看得出来，母亲没有坚决反对的意思。

早饭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有的骑马，有的骑驴，多数步行，一同进山。大家都非常兴奋，似乎去了马上可以当兵。村里的人们也喜形于色，仿佛在欢送我们上战场，个个笑容满面。他们的兴奋表明他们认为马道台倒台，建立新政权时刻已指日可待，他们满怀喜悦地等待着那一时刻的来临。

赶到山口，见山口两边聚集了很多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人

们熙熙攘攘，喊声一片。头系红头巾、肩背步枪的柯尔克孜族起义战士急匆匆地前后奔跑，听不清人们喊着什么，这里简直变成了人的海洋。我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好不容易找到设在路旁一棵树下的招兵登记处。负责登记的头目让登了记的青年或五个或十个地排成一行，把他们领到一个山洞前面，在那里让他们把红头巾系在头上，再回来编进新兵行列。新兵行列在迅速地增长，前来登记入伍的青年络绎不绝。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大家纷纷向入伍登记加入新兵行列的青年表示祝贺。我们几个人看着别人登记，非常羡慕。我要去登记，可伙伴们有的怕家里太穷，自己一走家中更困难；有的怕父母不同意，扯后腿；还有的干脆怕死，没勇气报名。我想立即报名，又担心母亲生气，正在犹豫，一个叫阿布都卡德尔阿吉的乡亲走到我身边对我说：“喂，赛福鼎，站着干什么？到当兵的时候了！走，我领你去见吾斯曼帕夏！”我说：“我实在想当兵，可是担心年龄太小，母亲不同意。”他说：“十七岁，不算小了，你母亲是个明白人，不会不同意的。我们会去跟她说，走吧！”边说边拉着我走，我把马交给身旁一位青年照看，随着那位乡亲来到山洞口，洞口的人还是不见减少。等了一会儿，阿布都卡德尔阿吉把我领到洞口前。往洞里望去，只觉得阴森可怕。吾斯曼帕夏坐在洞内一块石头上，仍然身着昨天那套服装：红色衣裤，绿色缠头巾。在我眼里，此刻的吾斯曼帕夏简直不是人，而是神。阿布都卡德尔阿吉把我带到他面前向他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愿意当兵。他是塔西阿洪的儿子，叫赛福鼎。”

“好样的！孩子，过来！过来！当兵吧！你父亲是个大好人，你父亲的愿望要由你来实现了。”吾斯曼帕夏操一口夹杂着柯尔克孜口音的维语亲切地说，还摸了摸我的额头，我只觉得一股神奇的力量传遍了全身，身子不由颤抖起来。吾斯曼帕夏朝身旁一名士兵一伸手，那位士兵立即递过一块红头巾。吾斯曼帕夏亲手为我扎上头

巾,再一伸手,那位士兵又递给他一块稍长些的红布,他把这块红布系在我的脖子上,命令洞口的人们递过一把刀来,洞口的人们回说没有大刀了,递过了一把带鞘的刺刀。吾斯曼帕夏接过刺刀把刀从鞘内抽出仔细观看:刀生了锈,装在粗皮子缝制的刀鞘中。在我的眼里,当时那把生锈的刺刀简直是神物。我想,故事里讲的宝器大约就是这个样子。我把刺刀用皮绳挂在腰间,神气十足,高兴极了。我终于有了武器,当了兵了!吾斯曼帕夏又摸了摸我的头,此刻我觉得我是如此幸运:别人有一块红头巾,我却不仅有红头巾,还有红围巾,简直有些飘飘然的感觉。我跨上马,手握这件神奇的武器,觉得任何敌人不在话下,我已经是世界的主人了!阿布都卡德尔阿吉把我编入他的新兵队伍,朋友们见状跑来欣赏我的武器,赞不绝口。我的武器仅次于能装子弹的枪,其实当时的枪只不过是装铅弹的七响枪。铁制武器中除了这种闪闪发亮的刺刀就是矛,然后就是棍棒了。和矛、棍棒相比,我的刺刀当然是高级武器了。这把刺刀佩戴在我腰间,在新兵行列中非常显眼。阿布都卡德尔阿吉让我排在前头。忙过好一阵,阿布都卡德尔阿吉才把新入伍的一二百名新兵集中在一起进行简短的训话: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要上战场同敌人作战的士兵了!我是你们的头目,你们要称我为‘团长’,还要服从这位库尔班江的指挥。”他指了指身旁一位高大健壮留有胡须的人,接着说,“现在你们回家与父母家人告别,带上日常要用的物品,明早在我们大院集合。”说完宣布解散让大家各回各家。

听说吾斯曼帕夏到达这里的当天早晨就开始征兵,物色头目,分派了团长、连长职务,让他们自己招兵买马。他自称“师长。”我们的阿布都卡德尔阿吉就是这样当上的“团长”,他招了二百名左右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士兵(像我这样持刺刀者极少)。这样的招兵头目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认识阿布都卡德尔阿吉和克其克阿

洪两位。他俩都是提坚村人。克其克阿洪是闻名阿图什的摔跤能手。阿布都卡德尔阿吉是提坚村牙库甫阿吉之子(卡斯木江·堪勒之妻哈力黛之父),他英俊潇洒,个子魁梧,浓眉大眼,黑黑的胡须,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带着一副书卷气。不知他是出国读过书还是在喀什求过学,总之,当时在人们眼里他似属知识分子之列。我就这样成了吾斯曼帕夏师长部下阿布都卡德尔阿吉团长手下的一名战士。

我骑上马,与同来的小伙子们一道回家。走了一村又一村,人们个个都是又高兴,又羡慕,有人竟淌下热泪,我俨然成为一名将以全新姿态参战的勇士:腰佩刺刀,头扎红巾,英姿勃勃,豪情满怀,似乎能把世界翻个过儿!人们当然对我羡慕不已。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进了家门,看到母亲激动万分的样子,我担起心来,怕她让我把刺刀丢掉。母亲朝我走来,一下紧紧抱住了我。她热泪盈眶,说不出话。当时我家院里挤满了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有人赞叹:“真神气,当兵了,了不起!”有人担心:“他还是个孩子,打仗不是闹着玩的,碰上枪子儿可怎么办!”正在这时,姑姑卓尔汗(爸爸的妹妹)和姑父马合苏德阿洪走了进来。姑父一进门便高声称赞:“真了不起,有其父必有其子!”姑姑流着泪,抱过我亲了又亲,边亲边对母亲说:“多么威武英俊的战士啊!哥哥若在世会多么高兴!让他去吧,萨力汗!我们为他祈祷!”母亲擦着眼泪说:“看来留也留不住了。这两天他坐卧不安,心神不宁,吃不下,睡不着,我是没办法了。去就去吧!真主保佑,保佑他成为有用之材。”看到母亲表了态,大家都非常高兴。母亲连夜为我打点行装,次日一早我就要踏上征途了。

第二天起床后,吃过早饭,母亲为我取出一件白绸上衣,让我

穿上。我没有这样的衣服，这件上衣是哪来的呢？一问才知道，原来母亲彻夜不眠，用父亲留下的白绸上衣为我改缝了这件合体的衣服。我不知如何表达对母亲的一片爱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穿好白绸上衣，扎上腰带，佩戴上刺刀，觉得很威风。走出房门，立即被朋友们围在中间。走出大院，看到村里男女老幼几乎全部等候在我家门口。有为我送行的，有看热闹的，人非常之多。我家的柯尔克孜族帮工加纳伊大叔为我备好了马，那匹白鼻梁的棕色马此刻显得更加骏逸，大概加纳伊大叔为它精心梳洗打扮过。马的两耳间扎着一条两头下垂的红飘带，引人注目。加纳伊大叔深情地对我说：

“祝你一路平安，你要好生喂养这匹马。马是人的翅膀，千万不要离开它，它会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说着，大叔把马拉到门旁小土台前，把我扶到马背上。

我告别还在拭泪的母亲及送行的亲朋好友，掉转马头准备上路。此时，我心里好似波涛翻滚，几乎哭出声来。我强忍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心想，我已经是一名战士了，在亲人朋友面前掉泪岂不让人觉得我不够格！这样一想就坦然了。在亲戚、朋友、乡亲们的簇拥下来到毛拉买买提老师的清真寺前。老师和几位长者、学生在寺前等候我（毛拉买买提老师是高级经学堂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我下了马，毛拉买买提老师解下我头上的红头巾，为我缠上一条黄色缠头巾（我当即把红头巾掖在腰带上），和众人一道面西而立，嘴中念念有词，为我祈祷，祈祷完毕转身叮咛我说：“参加圣战的穆斯林之子不能不带缠头巾。上战场务必经过沐浴洗礼，千万不可忘记真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被异教徒的枪弹击中……”他还讲了很多，可我心中根本没有“圣战”、“异教徒”、“真主”这些概念。说实话，我只对骑马、扛枪、打仗感兴趣。想到杀人，我很害怕，可一想起让人望而生畏的长辫子官吏和无情

鞭打百姓的衙役，立时又感到杀这些人是应该的。我没见过马道台，但听到过很多关于他如何残忍暴虐的传言，真想抓住他，用腰间的刺刀将他捅死。怀着这种激愤的心情，我跨马从戎，参加了武装暴动的行列。

这支不足二百人的新组编的“队伍”十分可怜，只有几十条枪，极少的人有马，一部分人骑毛驴，一部分人既无马，又无驴，只好步行。大部分人的全部家当只是装有极少日常用品的搭在肩上的一个褡裢。这些“志愿兵”身穿各式各样的衣服，手持形形色色的武器，骑马的，骑驴的，步行的，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他们却有两个最重要的相同点，一是与敌人打仗的信念，二是头上同扎红头巾。正是这两点，把这些苦大仇深的年轻人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形成一支令官军闻风丧胆的起义队伍。这支队伍没有津贴，吃喝、穿戴均无保障，只要登了记，就算参了军，其余一切都是自己的事，连武器都要靠自己去找。

即将开赴前线的这支近千人的新组编的战斗队伍，当晚露宿于上阿图什尽头库其万北面的山坡。吾斯曼帕夏大概还在想着明天的事，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距此处仅二三十公里的喀什驻有敌军装备精良的万余精兵，他们倘若夜袭我们，我们怎么办？棍棒武装的部队能对抗全付武装的敌军吗？我们毫无惧色地露宿于旷野。细细想来，这不是我们千余人的勇敢无畏，而是人民群众对嗜杀成性的敌人的无比义愤激发出的勇敢精神。

我们就在这个山坡上露宿数日。四面八方赶来参军的人络绎不绝，队伍迅速壮大。现在回忆一下，当时山坡上聚集大约万余人，其中有特意赶来祝福的，有来看热闹的，有来参军的。这支队伍的总数迅速增至三四千人之多。

第三章 攻打喀什

人们为攻打喀什而忙碌。为了占据一个合适的地点作基地，必须认真准备一段时间。我们转移到市郊一个名叫土突尔基的地方。这是喀什县辖地，位于拜西克来木后山坡，约在如今飞机场的东北面。吾斯曼师长的毡房架在傍山的水边。部队已分别进入阵地。吾斯曼师长的队伍由原来的几百名柯尔克孜兵士扩展成为现在这支拥有几千人马的部队。除下阿图什的阿布都卡德尔阿吉和克其克阿洪的团队外，还成立了上阿图什的则丁卡尔汪、伊德里斯卡尔汪为团长的两个团。柯尔克孜兵在数目上只有一个团，名义上却算是五个团，都加在一起成为有五千人左右的一个师。

转移土突尔基后几天出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一天早晨突然传来城里出兵的消息，有人驱马朝河滩冲，大多数手持棍棒者沿河滩向上游逃跑。我们奉命奔向河滩，看到河滩上尘土飞扬，一些骑兵跑过来朝我们射击。我们一些喘息未定的“英雄”听到枪声，好像得到命令似的跳起来逃跑。头目们在前面阻挡。我们这些人没有动弹，原地卧倒，枪打不着，只听到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上阿图什南边山坡上一些骑兵向山顶跑，一会儿听到骑兵当中有人打枪。不久传来“敌人逃跑了”的喊声。我们策马追赶，像刚才逃跑的速度一样。骑兵步兵同时朝喀什方向狂奔，声势浩大，大有不到城边不停止之势。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愤怒狂奔的人群，那场面至今难忘：近万人高举棍棒，愤怒地吼叫着向前冲，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冲到土突尔基上面的河滩，看见我们的战士正在追赶敌兵。追了一阵他们向后转，并叫我们停下。原来我们的人押着一个双手被捆绑的敌兵走来。人们怒吼着朝敌兵奔去。伊

德里斯团长高声叫喊着阻止人群向前，他自己却高举马刀走到俘虏身边。我们都以为他要砍死这个俘虏，而他只用马刀割掉俘虏的一只耳朵。那个俘虏血流不止，可一声没哼。我不知道他不叫痛是勇敢还是害怕，也不敢吱声。这个俘虏高大魁梧，长着浓密的黑胡子，既不像维族，更不像汉族，经询问才知是阿富汗人。当时喀什市有阿富汗领事馆，使馆内有一二百名护馆的阿富汗卫兵。由于百姓暴动而惊慌失措的马道台（马绍武）为了摸清暴动者的底细，请求派六十名阿富汗卫兵出城侦察。向着近万人驰马而来的骑兵原来就是这六十名阿富汗卫兵。

这场小小的风波很快过去，人们又开始忙于攻取喀什的准备：整顿队伍，宣传鼓动，清点武器，实施军需供应等等。士兵自上而下以团为基础进行整顿。

我们每天早饭后到河滩操练。这样的操练在当时是非常必要、卓有成效的军事准备。我们进行队列练习，连长或操练领队在队前喊口令，从“立正”开始。操练前这支排列蛇一般弯弯曲曲的队伍总要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发令官是下阿图什阿扎克村的吾甫尔。他总是斥责士兵：“你腰上没长骨头吗？你没吃饭吗？站得要像个人样儿！蠢货！笨蛋！……”训斥完毕才开始操练。

步兵操练不外乎列队、向右转、齐步走、跑步走、向左转、解散等。就这些练习每天已累得我们气喘吁吁，精疲力尽。我们终于学会了齐步走，跑步之类的规范动作。

骑兵操练有骑马、追逐、列队往山坡上冲锋，驱马用长矛扎稻草人等等。射击是没有的，因为绝大部分人没有步枪。

头目们向我们进行宣传教育，简单地讲一些有关反动政权和反动军队如何压榨、关押、折磨、砍杀百姓的情况，他们或许不知道如何才能讲得更详细、更得体一些。团长经常重复这几句话：“我们和敌人作战，你不杀他，他就杀你。我们千万要提防他们。”后来，来

了一位阿訇，我记不清他的名字，只记得他个子不高，山羊胡子，头上缠着一个很大很大的“色兰”（即缠头巾），脖子上挂个小书包，内装一本小小的《古兰经》。我们每天出操都是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列队前往。阿訇每天骑马来到队前对我们进行训诫。他身挎战刀，手捧《古兰经》，先读一段经文，而后讲解，说那是穆圣关于与异教徒进行圣战的教诲，讲述阿里圣人在战斗中的英雄事迹。他强调为圣战而死是殉教者，殉教者可直接升入天堂等等。

以后又来了一位名叫尼扎木丁先生的人。该人留着小胡子，下颌上光光的没胡须。身穿新式衣裤，人们戏称这种衣服为“秃尾巴”。大家对此人甚感兴趣，他说话幽默，风趣，颇有吸引力。头目们，尤其是吾斯曼帕夏对他非常尊重。这个人讲话和毛拉们的教诲大相径庭。和我们头目讲的也不尽相同。他给我们讲解暴动的意义，告诉我们，对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不会自行灭亡，敌人不灭亡，百姓就不能从苦难中得到解放等道理。他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官府的残暴，讲述官府如何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证明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政权的反动性。有时他也讲几句维护宗教权威的话，但他绝不袒护剥削人民的地主、巴依与伯克，他说维吾尔伯克是官府的帮凶，但只要悔过还应当原谅，县官道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这位尼扎木丁先生给我们讲历史，说维吾尔族建立过强大的国家，历史悠久。对他的某些话我们不理解，比如他说我们最早的祖先是匈奴，现在维吾尔人所说的“阿訇”就是“白匈奴”之意，（译者注：“匈奴”一词，维吾尔语为“hun”，“白匈奴”一词，维吾尔语为“aqhun”，而“阿訇”一词，维文则为“ahun”，故有此说。实为牵强附会之说。）其后的祖先是“突厥”，还说什么“阿特拉”、“伐吉斯”等等全是我们的后代，是“伟大的君主”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听得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也难怪，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责备他们不懂。那人讲这些的目的，大约

是想唤醒我们了解我们的根。长大懂事后我才明白那个人是在给我们讲历史。

尼扎木丁先生多才多艺，他还教我们诗歌。他教了一首诗，题目是《艾西雅尔》。但这首诗和他教的其它诗，现在我一首也不记得了。

在土突尔基山谷做战斗准备的日子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我记得那些日子里，山谷终日被一种欢乐、活泼、团结、战斗的气氛所笼罩。操练，读诗，唱歌，谈论打仗，听尼扎木丁先生谈古论今等等，这一切对于刚刚离家入伍、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的我们来说，真算得上是珍贵的精神食粮。

转眼到了晚春时节。河滩上五彩缤纷的野花争奇斗艳，新抽芽泛青的柳枝在春风吹拂下婆娑起舞，一派花红柳绿，乌云花香，那诱人的春天气息令人陶醉。白天，我们在春日下操练，尽情享受春天的美好；夜晚，河滩上散发着阵阵清香的朦胧夜色更令我们心旷神怡。河边林间被铁匠铺的熊熊火光照得一片明亮，铁锤下迸发出飞舞着的点点火星，腰间围块麻袋片的铁匠顾不得擦一擦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有节奏地往通红的铁块上舞动着铁锤。抡大锤的小伙子和着师傅锤子的节拍，大锤抡过头顶，狠狠砸向铁块。打好的马刀、长矛被扔在地上铿锵作响。年轻的兵士们坐在尚未冷却的马刀旁，欣喜地欣赏着自己的武器。铁匠、木匠和士兵们高昂优美的歌声被夜风传送到远方。这是一副多么优美动人的画面啊！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传播着“东边一个叫铁木耳的好汉要来发动起义”的消息。这个消息变幻莫测，一会儿说哈密王的儿子要来，一会又变成勇士和加尼牙孜要来，说和加尼牙孜刀枪不入，遇见过黑孜尔圣人等等。以后搞清楚这些都是尼扎木丁先生说的。他说铁木耳在轮台举行暴动，暴动者以马车夫为主，铁木耳本人也是马车夫。他们攻下轮台，攻下库车，又攻占了阿克苏。他的人马

越来越多，都称他为“师长”。我们的吾斯曼师长原是马道台派去阻击铁木耳师长的官军。当官军时，先是排长，后升连长，多少懂点汉语。官员们佩服他有本事，认为他忠于官府，派他率三四百人阻击铁木耳师长。行至阿图什山里一个名叫苏洪的地方，他联合当地柯尔克孜人举行了暴动。如今在轮台举行暴动的那个铁木耳师长就要来了。

得知铁木耳师长即将来临消息后的一天，团长派我和另外十个小伙子到尼扎木丁先生处执行任务。赶到尼扎木丁先生处，见先来的二十几名士兵正在匆忙地准备着什么，我们当即骑马准备就绪。尼扎木丁先生下令：“奉吾斯曼帕夏师长之命，我们现在去迎接铁木耳师长。”欢迎一位受人尊重的暴动英雄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任务。我们纵马前行，快到奥代克里时，与铁木耳师长和他的部下相遇。我们在路旁骑马列队等候。伴着一阵鼓乐声，人群走近了。我们还听到了歌声。一时鼓乐齐鸣，歌声嘹亮，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令人感到气势浩大，蔚为大观。我从心眼里感叹，他们的势力比我们大！

队伍走近了，只见前面是四人一排的八至十排骑兵，清一色年轻小伙儿，清一色红衣红缠头布，英俊潇洒，朝气蓬勃，齐声高唱着《花儿，开放吧》这支歌：

花儿开放了，开放吧！

花开时节见分晓，开吧！

……

歌声整齐，嘹亮，令人听了为之振奋。他们后面是一辆四匹马拉的木轮大车，车上几个人用力地击着鼓吹着唢呐。鼓乐为骑兵们伴奏，演奏的是阿帕克霍加木娱乐会、艾提嘎尔清真寺萨玛舞会中

演奏的那种令人感到欢快愉悦的曲调，这曲调在这空旷无人的荒野里显得更加悦耳动听。大概他们意在向我们炫耀他们的虎虎生气，勃勃英姿。他们的目的确实达到了！荒郊野外这支队伍的风采强烈地震撼了我们，感染了我们，令我们折服。木轮大车后面出现了一位骑着高头长鬃白色骏马、神色威严不同凡响的人，黑色络腮胡，挺拔魁梧的身姿，两旁的士兵手持步枪端坐马上，枪托一律置于膝盖；身后是四人一排的骑兵，也在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歌。不用介绍，我们立即意识到高头大马上这位人物必是铁木耳师长无疑。敬佩，激动竟使我们热泪盈眶。尼扎木丁先生下马迎上，亲吻铁木耳师长的手，铁木耳师长也兴奋异常，二人交谈良久。随后，尼扎木丁骑上骡子，命令我们前面带路。

尼扎木丁先生挥舞马刀，喜不自禁，反复高喊：“开吧！开吧！花儿开吧！”他挥舞着马刀狠狠向下劈去，高兴得简直有些忘乎所以。忽然骡子一头栽倒在地，我们一看，原来骡子的肚皮被尼扎木丁先生的马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肠子长长地拖在地上。我们为之惋惜，尼扎木丁先生毫不在意地说：“赶路要紧，大家快些上路！”说着从一位士兵手里牵过一匹黑马，翻身上去，让那位士兵骑在身后，催马飞驰，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赶到新阿瓦提投宿。次日拂晓起身上路，向伽师进发。中午赶到伽师，铁木耳师长一行傍晚到达。被暴动者占据的县衙里到处是人。铁木耳师长将在此休整三天，招收新兵，扩充队伍。我们住了一天继续赶路，赶到杨杜尔玛，听说攻打喀什的战斗已经打响，沿途随处可见人们传播“攻打喀什了！”“攻下喀什了！”“有志者去喀什啊！”之类的消息和宣传。不少人跟着我们走，有马的骑马，有驴的骑驴，耕地的扔下犁头，运粪的扔下口袋，义无反顾地随我们前进。人们折断路边新栽的小树，做为武器。四面八方的人们汇集在一起，真像条条小溪汇成江河，汹涌澎湃，流向远方。我们纵马

飞奔，一直跑到喀什河边。到了河边，人们怕掉进河中，放慢了速度，我的马没有停下，也没减速，很快跑到喀什河，从豁口前桥上飞驰而过。向后望去，见战友们落得很远。进城一看，路上没有行人，都躲进了路边的房屋与店铺中。两边房屋中有人向我招手高喊：“停下，小伙子，往回走，小心送命！”听到他们叫喊，我想停住，却无论如何无法让马停下。说话间冲到城墙边上。此刻城门紧闭，子弹从我头上呼啸而过。躲藏在路两旁的人们仍不断呼喊我，让我停下，马仍然停不下来。城门左侧被炸开一个豁口，我的马直朝豁口冲去，又跑了几米，突然停住向后倒下，我滚落在地，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两个人不知从哪儿冲过来，奋力将我拖出，拖进附近一家馕铺。一个人大吼，问我是不是不想活了，另一人把我的马牵到墙后。我精疲力竭，坐在馕铺里歇息。四周依然是呼啸的枪弹声，远处传来人们惊天动地的呐喊。听说攻城战斗清晨打响，敌军关闭城门负隅顽抗，豁口冲不进来。亚瓦格城门方向的攻击较为猛烈，呐喊声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人到达这里找到我，和我一起纵马向亚瓦格城门方向急驰。亚瓦格城外土库河岸的库干村整个淹没在四面八方传来的呐喊与遮天蔽日的尘埃之中。听不清人们究竟喊些什么，那是成千上万人们的怒吼汇集而成的惊天动地的巨浪，这巨浪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往日不可一世的敌人的威风。人群潮水般涌向土曼河对岸的城墙，冲上去，退回来，又冲上去，又……怎么办？怎么才能减少伤亡，冲进城内？大家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在豁口门和亚瓦格城门之间的一段城墙上斜挖一条路。开始挖路，显然这并非易事，不少人血洒疆场，壮烈牺牲，然而小伙子们英勇无畏，前赴后继，很快把路挖好。挖掘路的上半截和上城墙的一段十分艰难，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前面的人刚冲上去，后面的人便一涌而上。骑马的，步行的，人们手持长矛棍棒齐声呐喊，像巨大的炸弹掀起高压水柱般冲上城

头。人们争先恐后，激动万分，我在人群中挤挤撞撞冲上了城墙。双方在城墙上展开激战。

城墙上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午后敌人终于抵挡不住，从城墙上仓惶逃进道台衙门。暴动者从城墙上冲下来，从各条街道冲向道台衙门。道台衙门中及其四周射来的密集枪弹挡住了愤怒的群众。官兵在暗处向明处手无寸铁、挥舞棍棒的群众射击，造成群众的惨重伤亡。人们为了减少伤亡暂退下来，官军停止射击，双方出现相持局面。傍晚时分，一个手举白旗，带几名随从的官员走出道台衙门，自称是马道台的代表韩大人，奉马道台之命与群众谈判，条件是马道台要求给他二十四小时时间，然后投降。我们的代表讨论一阵后表示同意。停火二十四小时，令人懊丧，好像往沸腾的开水锅中浇进一瓢凉水，人们的热情受到压制，愤怒之情无处发泄。首领们此刻觉得上当受骗了。倘若人们乘胜进攻，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而且当天定会踏平道台衙门。这是首次战斗的最大教训，这次教训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四章 三方混战

停战的二十四小时过去了，敌方毫无动静。大约是第二天或第三天，铁木耳师长的队伍到达喀什。我们安顿他们在疏附县城外面的库木代尔瓦扎宿营。二位师长未及坐稳叙谈，马指挥（马占仓）便率领近一千人马，无视起义军对他的欢迎关照而直奔疏勒道台府，投靠马道台。这样一来，喀什出现了吾斯曼师长、铁木耳师长、马占仓三方各自为政的三支武装部队，三方争权夺利，互不相让，给了马道台维护反动统治，对抗人民暴动以可乘之机。

吾斯曼师长和铁木耳师长在反对马指挥和马绍武的问题上坐

一条板凳，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可二人一接触有关双方利害关系的问题，便翻脸不认人，互不相让。马指挥和马绍武竭力维护旧官吏的利益，支持莎车的宋团长，企图保住莎车。据说马道台和马指挥甚至签订了如下协议：第一，保住马绍武边防司令及道台的头衔；第二，支持莎车宋团长的势力；第三，令汉族官吏及商人信奉伊斯兰教以保其性命。

当时，维吾尔族与柯尔克孜族之间（吾斯曼与铁木耳的队伍），与二马（马绍武、马占仓）之间对立情绪均进一步激化。矛盾的焦点是攻城与守城。维吾尔族与柯尔克孜族士兵驻扎城外，汉、回族士兵驻扎城里。部分汉族士兵驻扎在英代尔瓦扎和城墙内的营房内，这个营房位于紧挨大城墙的小城墙里面。吾斯曼师长的队伍驻扎在城墙外土曼河畔的亚瓦克村，铁木耳师长的队伍在库木代尔瓦扎外围。

有一天，突然听到召唤准备战斗的号角声，我们紧急集合登上城墙。听说铁木耳师长的士兵登上了东面城墙，马绍武和马占仓的士兵在南面城墙上做好了战斗准备。

攻打道台府和英代尔瓦扎的战斗打响了，战斗很激烈。我们迅速占领了面向亚瓦克和琴瓦克的全部城墙，为的是消灭英代尔瓦扎的敌军。英代尔瓦扎的敌军进行顽抗，仗打得很艰苦。敌人一面保存实力，一面向城墙靠拢，企图夺回被我们占领的城墙。我们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反击。在面向英代尔瓦扎的三个小城楼上，为阻止敌军登上城墙我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

我们七八个人在距亚瓦克城很近的城楼上与敌人抗衡。连长尤素甫阿洪（阿图什库木巴克村赛莱阿洪之子）指挥作战。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在他的指挥下，我们打退敌人数次猖狂进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非常激奋。我和尤素甫阿洪、阿合麦提江（阿图什库汗人，一位很出色的小伙子）三人从城楼

射击孔向敌人射击，五六个战士为我们擦枪上子弹。尤素甫阿洪用一支五响钢枪，我俩用两支九响土火枪。当时使用的子弹是我们自制的简易子弹，打上五六发，枪栓和枪口便冒黑烟不能再打。枪一不能打，就递到后面，后面的人把擦净上好子弹的枪递给我们继续打。

激烈的战斗持续数小时，我们都累得精疲力尽，尤素甫阿洪的英勇顽强鼓舞着我们，我们始终顽强战斗。打退敌人最后一次攻击，听到“敌人逃跑了”的喊声，我们激动万分，大大松了一口气。英代尔瓦扎的敌人朝道台府逃窜，我们一扫疲惫，乘胜追击。追至亚瓦克代尔瓦扎前面，见吾斯曼帕夏师长的弟弟二大人（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人称他为“二大人”）率几名士兵及大批民众等候在那里。见到我们，二话不说，便亲热地把我们扶到马上，送到吾斯曼师长的司令部。原来吾斯曼师长亲临战场，目睹我们与敌人英勇战斗数小时，非常感动，战斗一结束便令二大人接我们来司令部。坐在正上方的吾斯曼师长见到我们立即起身，热情地称赞我们说：“欢迎你们，勇士们，热烈欢迎你们！”说着接过卫兵递过来的湿毛巾让我们擦脸。不用说，我们的脸已被战火熏得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擦脸的毛巾一下变黑了。吾斯曼师长亲手为我们每人颁发一叠用小绳捆紧的奖金，又亲手在我们每人脖颈上系上一条白毛巾。奖金是当时称作“喀票”（喀什纸币）的大张纸币，（一张纸票折合一两）。从司令部出来，我喜不自禁，一数，竟合五百两之多（虽然这种钞票比值不高，这个数目却也价值可观呢）。

得到吾斯曼师长的如此赏识，我心里美滋滋的。回到团部，我们片刻未停，翻身上马准备继续追击敌人。其他士兵攻打道台府，我们加入到距艾依提嘎尔大清真寺不远的汗巴扎的战斗队伍。敌人的最后一次反击被我们打退，往疏勒方向逃窜。自此，更加明确地形成了喀什、疏附、疏勒三方各自为政的三条战线。

吾斯曼师长与铁木耳师长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马绍武、马占仓躲在疏勒，想方设法进一步破坏离间他们的关系，以致导致吾斯曼师长与铁木耳师长的彻底决裂。吾斯曼师长将队伍拉到城外，准备与铁木耳师长一决雌雄。

一次交战，铁木耳师长的队伍追赶吾斯曼师长的部下，马占仓率人到疏附县城旁边观看这场“龙虎斗。”他企图助铁木耳一臂之力，以向双方展示自己的威力。铁木耳师长率兵追到赛曼上方的栏杆村，不再追赶，在往回撤兵的途中，铁木耳师长被马占仓部下击毙。吾斯曼师长见状，乘机杀个回马枪，一直打到附疏县。马占仓撤回疏勒，铁木耳师长的队伍“树倒猢猻散”，各自逃命，吾斯曼师长在英代尔瓦扎安营扎寨。

此后平静了一段时间。吾斯曼师长整顿队伍。尼扎木丁先生等人挺身而出，收容铁木耳师长的部下，进行整编。后来又冒出几位将领，各自招兵买马，自行组建队伍。

我们团驻扎在英代尔瓦扎。我的任务是协助团长阿布都卡德尔阿吉（职务相当于现今的团秘书），整顿部队。从前一段时间的混战中，可以充分看出我们这支队伍的战斗素质之差与战斗纪律之涣散，必须进行整顿，才能提高战斗力，适应今后战斗之需要。我们的计划是：第一，整顿组织，重新编排班、排、连、营、团；第二，对士兵进行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思想教育；第三，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我们连的宣传任务落到我的头上，我不知如何开展工作，只是把自己知道、看到、想到的向士兵们神侃一气。在士兵们心目中，我肚子里有“墨水”，是个比较有文化、有觉悟的战士，他们服气。后来，军事教育的任务也被强加在我头上。何谓“军事教育”我并不太懂，只是由于上级有令，士兵们有要求，要学习打枪，我才硬着头皮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

一天，团长把我带到库木代尔瓦扎外面艾克木阿洪巴依的果

园,那是我们部队的一个宿营地。士兵们正在操练,尼扎木丁先生指挥。我觉得他们训练得比我们正规,他们集合、正步走、向后转、向右转等动作比我们整齐、规范。他们带枪训练,使我感到新奇,从他们这里我学到不少经验。回来后,我模仿他们的作法在连里进行携枪操练,效果很好,在全团出了名。为了普及我们的方法,全团开始集中训练。

不久,疏勒县与疏附县的双方交战了。有时他们挑衅,有时我们骚扰,双方均有伤亡。两县百姓也蒙受了严重损失。我方武器装备不如对方,持枪者少,大部分以棍棒为武器。虽然我方有万余人,疏勒敌军只有两三千,众寡悬殊,但敌方武器精良,拥有机枪大炮,依仗武器装备的优势,他们毫不顾忌自己兵力之不足,经常向我方发动攻击。我们反击,却无论如何攻不破疏勒县城。疏勒县城墙高,四周平坦,凭我们那少数几枝老掉牙的枪枝如何能攻城?我们的枪弹也不过关,都是自制的,土枪经常冒烟,有时子弹向后飞,发生过误伤自己人的恶性事件。当时发生过的一个事故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一天的清晨,我们在克孜勒桥周围与敌人展开激战。我们数十人隐蔽在尤素甫·卡德尔汗墓地一堵墙的后面向敌人射击。几个士兵用枪托挖射击孔做为工事。我身旁一个战士用力挖着,当射击孔就要挖通时,他的枪突然走火,击中后面一名叫阿不都热合曼的战士的胸膛,这个战士当即停止了呼吸。我一见又难过又生气,责问那位挖射击孔的士兵:“看看,你干了些什么?”那个士兵奇怪地看看我,回头发现倒地而死的阿不都热合曼,十分难过、却不知战友何故突然牺牲、惊愕万状。我指着他的枪口高声说:“瞧瞧你自己的枪口!”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枪口还在冒烟,吓了一跳。我问他:“枪里的子弹呢?”,他一下明白是自己的土枪走火打死了战友,悲痛欲绝,一下跌坐在地。正在这时敌人杀声震天,向我们发起攻

击,无情的子弹,夺去了我们三位战友的生命。我们顽强战斗,由于人少枪少,敌人已步步逼近,我们右侧的部队及时赶来救援,才把敌军打退。大队人马向敌军发起总攻,我们奋力追杀,敌人溃不成军,退到克孜勒河边。我们一直追到卡勒玛克栏子村才罢休(此处有疏勒县城门前重兵把守的堡垒)。以前我们从未到达过这里。

撤回阵地,把战友的尸体掩埋在附近阿克麻扎墓地(根据伊斯兰教教规,战场上的战死者可不洗礼,不做祷告就可以掩埋)。不慎走火致死人命的那位士兵扑在战友尸体上痛哭失声,不能自己,我们也非常伤心。其余士兵望着他的神态感到不解,因为他哭得太不一般了。走火死人之事只有我清楚,他泪流满面,不时用泪眼窥视着我。我心想,若向上级汇报,这个战士或要被处死,或要受到严重处罚,而他完全是无意的,是无辜的,报告毫无意义。最后我决定将此事隐瞒下来不向上级告发。回到营地,那位可怜的战士面色惨白,坐卧不宁,夜里我几次醒来,看他一直翻来复去,整夜似乎都没睡着。第二天清晨,我把他拉到一僻静处,想安慰安慰他,没待我开口,他却伤心地边哭边说:“阿不都热合曼是个好小伙子,他是我的同乡,死在我的枪下,我回去如何向他家人交待啊?”他越说越伤心,泣不成声。我劝他说:“事已至此,哭也无用。这事只有你知我知,我绝不泄露出去。只希望你更勇敢地战斗,替阿不都热合曼多杀几个敌人,告慰阿不都热合曼的在天之灵。”他听了我的话,扑到我的怀里痛苦失声,连连向我表示:“好战友,请你放心,我要为阿不都热合曼英勇杀敌,勇敢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此后,他果然作战勇猛,无私无畏,每次战斗结束都把战果(杀死的敌人数目)记在阿不都热合曼帐上。

一天深夜,敌人又发起进攻,我们奋起反击。穿过士曼河来到刀莱提巴克那片阿尔斯圣汗墓地,我们连迂回到敌人右翼,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死伤惨重,我们过河追击,把敌人逼进卡勒玛克栏

子,才停止追击。我们发现这里躺着四五十具尸体,从服饰看是柯尔克孜族士兵。几具尸体是无头尸,让人看着毛骨悚然。当时敌人对俘虏非常残忍,不管受伤与否,抓住俘虏一概枪杀,砍下头颅在疏勒县城门上悬首示众,有时将砍下的头颅挂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场所。看来那几具无头尸的头颅是被砍下悬挂到哪里示众去了。我们分析,这些战士是中了敌人的埋伏而惨遭不测的。我们正在向这些战友表示哀悼,突然杀声四起,原来我们也中了敌军的埋伏。我们匆忙卧倒,匍匐前进到一条渠沟向敌人开火。敌人火力密集,枪弹呼啸而至,那位走火的士兵见状红了眼,一跃而起,跳出渠沟,端着枪怒射敌人。他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眼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边打边喊:“一、二、三,这是属于阿不都热合曼的。一、二、三,这是属于我的……”我担心他暴露目标,会被敌人击中,向他大喊:“卧倒,快卧倒!”“不,今天算赶上了,别管我!四、五、六、七……”“八”字没出口,他“扑通”一声向后倒在渠沟里。我命令身后一名手持棍棒的士兵照看他,随着增援而至的大部队跳出渠沟追击敌人,敌人见我们人多势众,夹着尾巴逃进卡勒玛克栏子中。返回渠沟旁,我看到渠边一棵柳树下,那位勇敢的士兵躺在战友的怀里,面色惨白,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守护他的士兵用手捂住他的伤口,鲜血从战友的手缝中汨汨流着。我心痛如绞,这位勇士睁开无神的眼睛,十分艰难地断断续续对我说:“赛福鼎,我的好战友,我……不行了,为…阿不都热合曼……为……母亲……”话没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我们用抬把子把他的尸体抬回,掩埋在阿不都热合曼墓旁。这位名叫买提克里木的走火士兵和阿不都热合曼这位被走火致死士兵之间发生的故事至今使我难忘,那悲壮的往事时常浮现于脑际,使我充满了对死难战友的无比怀念。

在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一直为隐瞒买提克里木走火致死阿不都热合曼之事忐忑不安。这样隐瞒究竟对否?经过多次考虑,

我最终还是认为自己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走火致死人命不是买提克里木的过错，他是无辜的。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毫无必要。事实证明，买提克里木是一位勇敢无畏的好战士，他为自己的战友杀了那么多敌人，最后壮烈牺牲，战死沙场，足以洗清他无意造成的过失，他以自己的行动告慰了九泉之下的战友。我为他隐瞒这件事不应被认为不妥。这个秘密被我隐瞒了整整五十年之久，五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把它披露出来，写进我的回忆录中公诸于众了。

安息吧！我亲爱的战友的英灵！

第五章 内部冲突与外来干涉

马道台和马占仓躲进疏勒县城后，起义部队置攻打疏勒之事于不顾，在疏附县内发生了多次内部冲突与纠纷。发生冲突与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外来干涉。

部分隐蔽苏联境内山区的逃民于1932年夏窜到喀什。这部分人大多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继续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对抗的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人。他们溃退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缘山区、被称为“巴斯马其”（意为1918年至1924年间中亚细亚的反革命匪徒。——译者）。

二十年代前后，这些“巴斯马其”被苏联红军击溃，流亡到中苏边界的帕米尔和天山地区。听说喀什暴乱，他们贼心不死，妄图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捞一把，于是窜到了喀什。其中有个名叫加纳别克喀孜的知名人士，可算得反布尔什维克的柯尔克孜族首脑人物。此人先是来到和田，在和田住了一段时间。此外还有阿迪樊萨特和阿不都哈里克樊萨特（柯尔克孜族），尤素甫江千户长（乌兹别克族）等比较有名的首脑人物。这些人各自拥有四五百名装备精良的

骑兵。

这些人到达不久，喀什又来了一位名叫阿合麦特·台菲克的陌生人。该人头戴红色带飘穗的高顶土耳其帽，一脸黑黑的络腮胡，一点儿不像维吾尔人。他一来立即投入吾斯曼师长的怀抱，在吾斯曼师长的支持下，树立了一定的威信。此后，逃民与暴乱者之间，维吾尔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柯尔克孜与维吾尔人之间，暴动者内部，逃民内部便发生了一连串紧张的冲突。强者缴弱者枪后自封“团长”，谁的武器装备好（尤其是逃民）谁就称王，好马、好枪、好房、好地就强行归己。暴乱队伍内部纠纷迭起，强者吞并弱者、新部队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

当时，我们团也解散了，一个叫艾买提·库勒阿吉（阿图什籍巴依）的人自封为团长，招兵买马。他让我给他当秘书，他的队伍由两三百很快发展到四五百。

阿克苏有一人称阿木提汗旅长的人带着近千人马也来到喀什。以后还冒出一支什么“第四方面”的柯尔克孜部队，专门反对苏联逃民。当时驻扎喀什的部队真不少：有一个师长，（吾斯曼帕夏虽被称为“师长”，他手下决不只一个师，实际上他领导着几乎全部军事力量），一个旅长，五六个维吾尔、柯尔克孜族团长率领的部队；有五支逃民部队，还有新冒出来的那支“第四方面”军。这么多队伍竟没有一支去攻打只有两三千人马的疏勒，使敌人在疏勒县城内得以优哉游哉，高枕无忧。

暴动队伍内部与逃民队伍内部的矛盾纠纷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开始自相残杀。阿不都哈里克樊萨特击败阿迪樊萨特，在艾依提嘎尔广场视其为暴君斩首示众。事隔不久，尤素甫千户长在英吉莎又把阿不都哈里克樊萨特抓获杀头。乌孜别克人与吾斯曼师长间的冲突亦愈演愈烈，互相残杀、互相抢掠造成的流血事件日益增多。后果自然是百姓遭殃，敌人渔利。

我们团长艾买提·库勒阿吉是阿图什一个有名的巴依，在此我需简单介绍一下。在阿图什派别中，他是反尤素甫阿吉派的首领。他招兵买马，组建团队，目的之一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害，二是伺机将财产转移国外。最后均如愿以偿：既保住了自己的财产，又将个人全部资产安全转移到了印度。他名为团长，实则投机商。他与同伙之间商贸来往频繁。他广泛收集皮货（主要是貂皮、松鼠皮、狐皮、海獭皮等等）运往印度，然后让弟弟先行离开，自己随后也去了那里。从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那些自称暴动领袖，招兵买马者行径的一个侧面。

维族军官中阿不都卡德尔阿吉、则丁卡尔汪、伊德里斯卡尔汪等人迫于逃民势力强大的压力，最终解散。最后只剩下阿图什的克其克阿洪（1937年牺牲于“南疆叛乱事件”）和东面的阿木提汗（哈密人）旅长。阿木提汗担任很长一段时间军事首领，盛世才执政后，到乌鲁木齐担任当时任省政府副主席的和加尼牙孜阿吉警卫部队的司令。和加尼牙孜阿吉被盛世才关进大狱，他也成了盛世才的阶下囚。出狱后，参加了群众性的进步活动。解放后任过哈密副专员，听说前几年不幸逝世。该人是个很不错的人，盛世才时期，他在塔城任知县期间，我们互相关照，相互往来，关系不错。

过了很久我们才明白，当时喀什的军事首领之间冲突不断，矛盾重重，完全是外来者玩弄阴谋诡计，蓄意挑拨离间一手制造的。总导演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位阿合麦特·台菲克。该人经常骑匹高头大马带两名卫兵四处游逛。不知何故，在很短时间里就博得了众人的信赖，受到暴动者和逃民们的尊重。他究竟搞些什么名堂？为何今天这个统领被杀，明天那个统领被害？当时我们谁也弄不清这些事件的内幕。

总结这段时间的内部冲突原因，不难看出，武装暴动若得不到很好的组织，没有统一的、正确的领导，尽管人多势众，也难以战胜

少于自己数倍的敌人。没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革命利益敢于挺身而出、带路的人，领导权落在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唯利是图之人的手中，这些人自然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争权夺势，互相残杀，给别有用心、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亲者痛、仇者快，人民群众蒙受痛苦，群众运动遭受挫折，社会进步受到影响。喀什混战的后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第六章 三次战斗

1. 依米提萨依之战

1932年夏的一天，我们团接到开赴莎车的命令。阿布都卡德尔阿吉向我们几个人宣布任务，原来是敦促死守莎车城的敌人投降，他们拒不接受，一定要到喀什向马道台缴械、并决定次日开赴喀什。我们的任务是在英吉莎东路堵截消灭他们。团长给了我一百人马，虽没任命我为连长，我却在行使连长职权了。

经过一夜的周密准备，次日晨，阿布都卡德尔阿吉团长亲自率领我们四五百名将士出征。

为了抢时间，把敌人堵截在喀什属地之外，队伍进行了急行军，十分紧张。急行军的另一原因是，似乎另一支部队也与我们同时出征，也在抢时间，抢速度。赶在这支部队之前到达英吉莎预定堵截地点，先于他们堵截消灭敌人，既立功受奖，又能得到大批战利品，何乐而不为！这样我们便劲头十足地进行了急行军。

日夜兼程，第二天一早赶到英吉莎。那天大概是英吉莎县城的巴扎天（集日一译者），街上人来人往，小商小贩、赶集的农民、农民

装束的带枪人，在集市上穿梭往来，络绎不绝，熙熙攘攘，乱哄哄。十字路口和一些宽敞地带，不少身穿维式袷袂、头戴色兰（缠头巾）的怪模怪样的人坐在地上，前后晃动着脑袋，嘴里不住地叫喊“啦……啦……”看着真是既可笑又可怜。原来这些人是在显示自己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人。当时不知哪位长官发布了一条“信奉伊斯兰教者免杀”的命令，使得除逃走的汉族官吏，所有汉族商人、手艺人和平民百姓为保命都争先恐后信奉起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说实话，除了活命他们别无他求。对他们来说，念阿拉伯文《古兰经》无异于读天书，舌头转不过弯，实在学不会，只记住经文头一个字母“啦”，故只是一个劲地“啦、啦”，表示念《古兰经》。谁也没要求他们头缠色兰，但他们自认为缠上色兰才算是真正的穆斯林，因此自发地缠起色兰，且一个比一个缠得大，似乎色兰越大，生命越有保障。

这样的“穆斯林”喀什很多。到清真寺做晨礼，人还没进清真寺就能听到这种“啦…啦…”的“大合唱”。他们惟恐迟到，每天半夜就起床到清真寺等待做晨礼。我想他们如此虔诚也主要是为了保命。

那天我们在英吉莎宿营。第二天太阳升至一竿子高时我们到达克孜勒村。该村位于正对依米提萨依的西南方向，过去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我们在此选择了一个较隐蔽的地方，修筑了一些简易工事，恭候敌军来临。只一刻工夫，戈壁西北方向顺山脚便出现了一支和田暴动者的队伍，他们是包围莎车的和田暴动队伍的一部分。听说我们从喀什出来，他们绕过已经出城的敌人赶到了这里。据他们讲，敌人正从戈壁西南一个名叫库克热瓦提的地方向这里移动。我们在这里等候敌人，直等到太阳西移，才看见远处敌军的影子。

那时正是七月份的酷暑季节，晒得冒烟的沙子能把鸡蛋烫熟，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四五公里远处出现了敌军的人群、马队与车

辆。尘土飞扬。人马时隐时现地缓缓朝我们隐蔽的地点移动，离我们越来越近。忽然敌军停止了前进，大约发现了什么动静。我们看到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平民百姓，老人孩子，总计约一千二百人左右，除百姓外，武装骑兵约有五六百人。我们开始想让他们停在酷日之下，时间一长饥渴难耐，主动投降。我们派人劝降，他们不肯，坚持要到疏勒县缴械。烈日炎炎的戈壁滩上，双方僵持了数小时之久。

天色将黑，他们的骑兵突然飞一般向我们猛冲过来，杀声震天，来势凶猛。我们没料到这一手，一时有些慌乱，没待想好对策，敌军骑兵已杀到我们跟前，在我们的队伍中横冲直撞杀将过去，虽然被我们打死了一些人，可大部分还是冲杀出去，逃往英吉莎方向。听说他们快到英吉莎时，被我们后面的部队堵住，终因兵力悬殊而大败，被迫缴械投降。

敌军骑兵冲杀过去，我们无奈朝剩下的人群走去。我们身后跟着数百名手持棍棒的老百姓。剩下的敌兵开枪射击，负隅顽抗，但势单力薄，无济于事，很快被我们干净彻底地消灭殆尽。手持棍棒的老百姓向敌军队伍中的百姓挥舞棍棒，被我们制止。不少商人官吏带有大量金银财宝。群众冲向他们的马拉轿车、马车、驴车大肆抢劫，戈壁荒滩上一片乌烟瘴气，喊声震天，钞票布片漫天飞舞；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副乱糟糟、凄惨惨的景象。我们把我们的人马集中在一起，命令他们第一不准杀人；第二不准抢劫；第三只许收缴敌军武器。我们开始收集敌人留在戈壁滩上的枪枝弹药，缴获了不少，每人背回了五六支步枪和大量子弹。

在从戈壁滩向村落行进时，有人慌慌张张跑来向我报告说，一些手持棍棒者要杀害汉族妇女儿童。我听后立即安排部队去驻地，自己带两名士兵跟在那人后面赶到一座安集延式院门外，见到不少手持棍棒者正在大喊大叫，欲破门而入。有两名手持棍棒者正在

劝阻他们。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平民百姓，妇女儿童何罪之有？有本事去和当兵的斗！”看见我，那些人让开了一条路。劝阻他们的年轻人向我介绍了情况，我对众人说：“这个小伙子说得对，说得好。你们也都有妻儿老小啊，他们是无辜的，不能伤害他们，你们回去吧！”他们听从我的劝告，先后离去了。劝阻那些人的两个小伙子打开院门让我们进去，我们看到院内外有四名手持棍棒者在保护着那些无辜的妇女儿童。大院一个角落里（是个没有房间的堡垒）有一群妇女，她们怀抱着孩子，惶恐不安地挤成一团，边哭边拼命叫喊着“啦…啦…”，这凄厉的哭喊与令人战慄的惨状使人目不忍睹，稍有一点人道主义的人，见到这副场面都会油然而生怜悯之情。

我走到妇女们身边，她们不知我要干什么，悲切的哭声益发加剧，我赶忙向她们解释：“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听了我的话，哭喊声略微减弱一些。守卫大门劝阻人们不要进门的小伙子指着我向她们介绍：“这位年轻人是我们的军官，他会保护你们不受到伤害的。”蜷缩在角落的妇女儿童闻听此话似乎听到号令般跌跌撞撞扑过来，齐刷刷跪在了我的周围，前面的妇女抱着我的腿，儿童们拉着我的手，哭着央求我救救她们。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她们安静下来。我数了数，共有二十二名妇女，八名儿童。除一名白发老妈妈，其余都是中青年妇女。孩子们最大的不过七八岁。我把她们全部带回我们的宿营地。

这些妇女儿童饥渴交加，我安顿他们先吃饭休息，而后考虑如何处理。这可真是个难题，出于人道主义，我们总不能一推了事，对她们的生死不闻不问。经反复考虑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凡我部队军官士兵，愿娶她们为妻的可娶一名妇女为妻，愿收养儿童的可收养一名孩子为子。团长和我召集所有班、排、连长，向他们宣布决定，他们表示可以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前提下接受。我们把他们的建

议和我们的决定告知那些妇女儿童,那些妇女儿童欣然同意。可怜的人们,此刻除了活命,还能奢求什么呢?找一名能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的人,可能就是她们此刻最大的愿望了。就这样,除了那位老太太之外,二十一名妇女全部有了“丈夫”。当晚,按伊斯兰教仪式举行了婚礼。

我们为这批妇女找到归宿,孩子们也被愿意领养的人领去抚养。只有两个十来岁的男孩,自从在大院见到我,便缠上了我,两个孩子哭着哀求:“收下我们吧,我们的父母都死了。好叔叔,我们只想跟着您。”两个孩子懂维族话,讲了一口漂亮流利的莎车口音的维吾尔语。我原来打算收下那个大些的,当我流露出这个意思时,那个小的死命拉住我的衣襟不松手。回来的路上,这个孩子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抓住我的衣襟,不断地哭着祈求:“收下我吧,叔叔,我给您做儿子,我没母亲,父亲刚才也被打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可怜的孩子拽着我的衣服不松手,真让人心酸。我实在不忍心拒绝,只好收下了这个小的,那个大的让团长阿布都卡德尔阿吉收养。我们给这两个汉族孩子取了维族名字,我的“儿子”叫“艾尔西丁”,团长收养的孩子叫“吐尔逊”(吐尔逊后来一直在卡德尔阿吉团长家长大成人,在阿克苏当过教师,听说后来当上专署文教处处长和副校长,长大后我再未见过他)。我把艾尔西丁送回家,交母亲抚养。以后我去苏联留学,母亲在家供他上学。1939年我在塔城工作期间,他和商人们同路来塔城找我(是母亲派他来的),打算把我带回喀什。他告诉我母亲病重,五个儿子一个也不在身边(两个被抓去坐牢,一个死去,一个来往于喀什、伊犁之间经商,都顾不上母亲。我在塔城,也不能对母亲尽孝),只有艾尔西丁成了地地道道的“孝子”。我心疼母亲,也由衷地感激艾尔西丁。他还是个孩子,却一面学习,一面挑起了照顾母亲的重担。每个礼拜他都牵着驮着母亲的毛驴从阿图什到疏勒县,探望里瓦依丁弟弟,给他送些好吃

的。很多次别说见面,就连饭都送不进去,只好伤心地一路哭回阿图什。当时艾尔西丁真成了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好帮手。这次他来塔城也历经千辛万苦,实在不易。他坚持要带我回阿图什,说不把我带回去,母亲会痛不欲生。可我走不了,盛世才不准我离开塔城。事后我才知道,盛世才让我来塔城工作带有处罚、流放性质。艾尔西丁无奈随商人们同路返回阿图什。此后很长时间没见到他。听说解放前他在阿图什当过教师,当过翻译,解放后来到了乌鲁木齐,后来进北京铁道学院学习,毕业后在铁路部门工作。

2. 包围疏勒之战

疏勒县城被包围,疏附县内各部队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各派势力集中力量,准备共同对敌,攻打疏勒。我们的部队拿下疏勒西南部一个名叫克其尔奇的地方,团部就设在此地。这个乡位于两条河之间,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山村,空气宜人,到处是果园。当时正值瓜果飘香的金秋时节,听说要打仗,当地人都跑出避难,熟透的瓜果无人采收,香甜的西瓜、哈密瓜无人摘取。在军队供应相当紧张的当时,这些美味香甜的瓜果帮了我们的忙。我们挑选最鲜最美、最甜最大的吃,吃得惬意,吃得满足,简直终生难忘。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把敌人逼到城墙附近。激战几小时后,敌人发起反攻,逼近了我们。正在这时,一股敌人突然从不远处的一个果园里冒出直向我们杀来。两边的人早已撤退,只有我们三十几人两面受敌。敌人左右夹击,我们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七八个人。敌人步步逼近,我们节节败退,拼命往回逃跑。回营地的路上,有一座桥,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将桥封锁,过桥时我们又有两位战友牺牲。为避开敌人的枪弹,我们剩下的几人从桥下淌水过河,上了岸进入一片稻田,费了好大劲,才穿过泥泞的稻田进入一

片玉米地。这时，实在迈不开步了，便躲在玉米地里歇息。哪知此地并不安全，密集的枪弹从头顶呼啸而过，稍事休息我赶忙强行离开此地继续往前逃，正急匆匆地跑着，忽然发现路边躺着一位受伤的乌孜别克族士兵，正痛苦地哀嚎着。此人名叫卡斯木江，似乎是名中级军官。他看到我，像看到了救命恩人，一个劲地央求：“赛福鼎老弟，快救救我吧！”我仔细查看，原来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他已无法行走。可我目前的状况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能救别人？正着急，一位骑马的士兵逃到这里，我让他停下，他不肯，我用枪瞄准他高声说：“你不停下我打死你！”他这才勉强停下。我叫他带走那个伤员，他无论如何不同意。其实即使他肯带，我也无法将那位伤员扶上马去。可留在这里等死也不行啊。紧急中我想了一个办法，解下伤员枪上的皮带绑住伤员那只好腿，命令骑兵抓住伤员的枪把伤员拖走。可怜的伤员痛苦地惨叫着被拖在马后带走，虽然受些苦，总不致在这里被俘，那是死路一条啊！（几个月后我受伤住疏附县医院治疗时，遇见了那个伤员卡斯木江。他拄着拐棍一个劲感谢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据他说，他被拖到指挥部，立即被人送到医院治伤，他说是我救了他一命。）

送走卡斯木江我继续逃，逃到一座果园墙根底下双腿一软，扑通倒下，实在逃不动了。倒在这里会被敌人发现，我鼓了鼓劲，用尽力气翻墙进入果园，躺到一棵桃树下，此时我疲惫不堪，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紧闭双眼，心似乎跳到嗓子眼，我什么都不想，只是一心等待死神的降临。这里静极了，好像是世外桃源。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体力有所恢复，睁眼一看，三个压弯枝头的金黄色大蜜桃就在眼前。这三个熟透的大蜜桃似乎就要溢出甘甜的桃汁！经过半天的激战与狼狈逃窜，我早已精疲力尽，饥肠辘辘，此刻这水灵灵的大蜜桃对我来说简直胜过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救命仙桃。我伸手摘下两个桃子，在袖口上稍微擦了一下便大口大口狼吞虎

咽地吃起来。也许是这里的桃子真比其它地方的桃子甜，也许是当时实在又累又饿，总之，我觉得那里的桃子似乎是人世间最甜最香的桃子。时至今日每当提及桃子或是看见桃子，我都会深切地怀念起克其尔其果园中的救命“仙桃”。

三口两口吃完一个桃子，第二个桃子刚咬一口，突然“嗖嗖”，飞来几颗子弹，接着传来敌人的喊杀声。我舍不得丢弃吃了一口的甜甜的桃子，便把桃子揣在怀里跳起来逃命。我艰难地穿过这座果园，正准备翻墙进入另一果园，突然发现果园墙后有我们的战友，他们就在这里阻击敌人，我兴奋之极，一下翻过墙头，栽倒在地，心总算放下了。

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难以突围，我踏下心，拿出怀里的桃子，津津有味地继续吃起来。

不久，我们把敌人赶进城里，包围了他们。

我们把敌人困在城里达九十天之久。

一天，天还没亮，疏勒城内的敌人突然同时大开四个城门，进行突围。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几乎抵挡不住从克其尔其城门突围出来的敌人。这是一场殊死决战，敌人伤亡惨重。天亮后我们发现，突围的敌人中竟有不少维吾尔族，这些人高举大刀，大喊大叫着扑向我们，大有与我们决一死战之势。我们集中火力对付他们，打得他们仓惶逃窜。这是怎么回事呢？经了解我们才知道，原来疏勒县内有一绰号马木提肉的地痞亡命徒被马绍武以一千两白银收买，这个地痞得了马绍武的好处，为马绍武网罗了七十名个个像他一样的亡命之徒，每人发一百两白银，一把大刀，组成敢死队为马绍武卖命。在敌军前面冲杀送死的就是这支敢死队。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伤亡都不轻。我们的弹药原本不多，加之多为土枪土炮，远不如对方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因此经过一段时间激战的消耗，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对能否顶住敌人的反攻产生

了疑虑。为保存实力,有的团队开始撤退,有些胆小者逃跑了。正当我们茫然不知所措之际,敌人竭尽全力发起了总攻,我们没能阻挡住,被敌人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敌人突围到我们左翼后反守为攻,我们的右翼也不知从何方突然冒出一股敌人。我一看,我们两面受敌,形势不妙,忙率领三十名士兵边撤边打。正在紧急关头,一个名叫艾维孜的塔塔尔人带领二十余人前来支援我们。该人当时手下有五六十名塔塔尔族士兵,他们这支部队以作战勇猛著称。我不知道他们属于哪部分,从其言行看,似乎是支独立大队。艾维孜机警地跑到我身边对我说:“顶住,我们来了!”他们的到来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两侧敌人不断发动进攻,他们时立时卧,有时单腿跪立,边打边向前推进。敌人脖子上系红布带,头上缠白布条,像支敢死队,杀气腾腾,欲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顽强对抗,与敌人僵持两个来小时,伤亡惨重,五六十人的队伍仅剩下十八人。面对多出我们数倍的敌人的强攻,我们打得十分艰苦。敌人两面夹击,我们明显地处于包围之中。艾维孜见势不妙,留下十人掩护,让我们赶紧撤退。我们撤得差不多时,他们才边打边撤出来。我向四周看了看,周围静寂无声,只剩下了我们这十几个人。

这九十天的战斗是喀什暴动中最激烈,最艰苦的一场持久战。至今我还经常梦见打仗,梦见被包围、被敌人俘虏后又被救,飞上蓝天逃脱等等,这大概正是那九十天恶战对我神经产生极强烈的刺激造成的。

被我们包围九十天的疏勒县城内的敌人,最终反把我们驱散。我们不仅没能攻破疏勒,反而逃循得如此狼狈。何以至此?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后勤供应无保证,武器装备原始落后,最主要的是缺乏统一、正确的领导。将士们的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最终竟全部付诸东流,这个惨痛的教训实在应当牢牢记取。

3. 死里逃生

在疏附县和疏勒县与敌人激战的日子里，几次紧急危险的经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使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1933年初春，经过几天周密的准备，我们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们很快把敌人逼到城墙边，敌人顽强抵抗，使我们前进不得。我们连做为突击队前行，试图穿过克其尔其，迂回到那奇河边，不想在一条渠沟边撞上了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们伤亡惨重，敌军又有援兵救援，我们无法前进半步。无奈，只好后撤。在撤退途中，我们发现左右两侧都有敌人，便就势潜入一座砌有安集延式围墙的空院落，用石头、木料顶住院门，打算以此地为据点，与敌人决一死战。

敌人追来后开始攻打这个院落。我们奋勇还击，战斗愈打愈烈，我们的五十余人打得只剩二十来人，想撤已无退路。敌人迂回到我们后面，把我们紧紧包围住。敌人向大门步步逼近，子弹“嗖嗖”地呼啸而过，使我们无法靠近院门。我们的子弹眼看要打光了，我当机立断，把二十来人手中的子弹集中起来，每人分上四五颗。我命令大家节约子弹，不许放空枪，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我强调说，落到敌人手里会被杀头示众，与其被敌人砍头，不如自己结束自己。战士们有些恐惧，但这种情绪很快消失殆尽。人都一样，初次打仗有些怕，打上两三次便习以为常了，因为死神总在你身边徘徊，久而久之也就无所谓了。

此时，战士们反而放开了。我们把死亡抛到脑后，只想多杀几个敌人，我们处于一种亢奋、忘我的境地，三颗、两颗！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我们把最后一颗子弹推上膛，准备壮烈就义。敌人逼到门口，就要推开院门了，有的迫不及待已翻墙而入。我们的战士

并排站在院尽头一堵墙前，望着摇摇欲坠的院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边突然传来“乌拉”的喊声。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敌人是不喊“乌拉”的，难道是自己人到了？这难道是真的？……“乌拉”声越来越近，我们从墙洞往外一看，真是神话一般的现实，我们的一百多名骑兵正高举战刀，向我们这里奋勇冲杀过来。正在破门的敌人慌了手脚，抛下几具尸体仓惶逃命。我们喜出望外，冲到门边，把门打开，迎接战友进来。勇士们进到院内，我们高兴得热泪盈眶，不知如何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原来这是一支乌孜别克族骑兵，我们团长得知我们被包围，特地派这一百名精悍的骑兵前来营救。这支骑兵队伍最善打攻坚战，他们无坚不摧，无往不胜，过去对此我早有耳闻，如今他们使我们死里逃生，我们更是真正领教了。骑兵战友们关切地给我们擦干净被烟熏火燎变成黑色的脸和眼睛，搀扶我们上马把我们带回部队。

还有一次，我带领十五人潜伏在克其尔其村侦察敌人火力。开始没发现敌人，村里无任何动静。回来的路上，突然发现一个果园里有几十名敌人。跟他们开火吧，我们人少，怕要吃亏，于是决定从原路返回。我想吓吓敌人，便骑在马上，端起五响短枪，瞄准果园放了一枪。刹那间，我感觉像有一团火忽地扑到脸上，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密集的枪炮声唤醒，发现自己躺在河边的高坡下，一名英吉莎籍名叫沙莱的士兵看护着我。我右手满是血，脸上火辣辣的，疼痛难忍。我惊奇地问沙莱：“我怎么啦？”他说：“没什么，你自己的短枪走火，子弹退了膛。幸好没打中要害，只是手受了点伤。”见我醒来，他让我坐在他坐骑的前面，把我带回了营地。一个护士为我包扎手臂，清洗脸部，我又是一次大难不死。

听战士们说，那时的子弹大部分是土造的，不十分保险。我用的偏巧是颗劣质土造弹，加之短枪枪口生锈，子弹从枪膛反弹出来

打在握枪栓的右手上，火药迸在脸上和脖子上。我被送进疏勒县医院，医生接连几天为我清除迸进脸上、手里的火药末儿。因弹片和火药末刺进肉皮太多太深，几天都未清除干净。（火药刺进手心肉皮底下，成为一个个黑色小肿块。有时这些小肿块会冒出尖来，我使用针剔除。直到1960年才将它们清除干净。）这些我都没在乎，只是后来，我右手拇指受风，感染恶化，医生要将我的拇指切除，我才感到特别难过，因为我左手就没有拇指（左手拇指是五岁时刀伤感染切除的），现在要再切除右手拇指，以后干事该多不方便？我没同意医生的意见，向医生要了些酒精、药棉、纱布、外敷药等，请两个月养伤假，回到阿图什探家。回到家，母亲每天清晨用酒精为我擦洗伤口，敷一种黄色外用药，然后用纱布包扎好。就这样，我的右手拇指很快被母亲治好了。一个月后，我回到了部队。

第七章 和田暴动

和田人民同全疆人民一样，身受重重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和田地区盛产黄金、玉石，自然条件比其他地区好。然而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但没给和田人民带来幸福，反而给和田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使和田变得更加贫穷落后。杨增新、金树仁政府的地方官吏把和田地区变成掠夺金银宝石的重要基地，金树仁本人更是一个抢掠玉石的最大强盗。

在沉重压榨下饱受苦难的和田人民寄希望于宗教。这样一来，他们除遭受地方封建独裁者的残酷剥削，还必须忍受反动保守的宗教上层人士的精神压迫。重重压榨令和田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1931年哈密人民揭竿而起，举行武装暴动。受其影响，时隔不

久，新疆各地相继暴发武装起义。和田人民深受启发与鼓舞，也终于举起反对独裁政权的武装暴动的大旗。

前面提到的穆·布格拉、阿不都拉·马合苏木、努尔阿合麦提、穆罕默德·尼雅孜·艾来木阿洪等人听到哈密暴动的消息，立即起而响应，在和田秘密进行了暴动准备。他们首先争取忠于自己的一批圣门弟子，然后通过这批人进一步发动群众。他们的计划不幸被金树仁在和田的代理人获悉，只好于1932年2月17日提前行动。暴动队伍很快推翻了墨玉县反动政府，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皮山县县长闻讯请皮山县驻军夺回墨玉，但被暴动者击溃，全军覆没。穆·布格拉等人用缴获的武器把暴动队伍武装起来。

和田县积极配合这次行动，对穆罕默德·伊敏大毛拉攻占和田起了积极作用。和田行政长官谈风翼和县长王叔仁坚守一两天，见大势已去，主动投降，交出了政权。

和田县如此迅速地对暴动做出反应，应当说是反动派一手造成的。1930年夏秋时节（农历三月底、四月初），和田道台、知县召集数百名宗教界知名人士在县城内一学堂开会，将中华民国国旗和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照片高高悬挂在会场主席台上方。从未见过中华民国国旗与孙中山先生照片的宗教人士见状万分惊愕，不知所措。大会开始，主持人与和田县令命令与会者脱帽，要宗教人士取下头上缠的色兰。当县令命令与会者向国旗与孙中山先生照片鞠躬致敬时，一直被国旗与照片搞得茫然不知所措的宗教人士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坚决拒绝低头鞠躬，道台、县令的再三要求，引起阿訇们的强烈反感。他们表示，除真主外，他们不向任何人物鞠躬，并坚决要求退出会场。守卫在大门口的卫兵将门上锁，数十名兵士爬上会场屋顶架起枪枝，向与会者恫吓示威。阿訇们及他们的维吾尔族追随者对此深为气愤，决定砸开大门退出会场，造成会场一片混乱。双方对峙达一小时之久，最后政府方面怕事态闹

大,才被迫打开大门。

上述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骚动。宗教界人士认为,“新将军(指金树仁)上台,要消灭宗教,命令我们向国旗、照片鞠躬叩头,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教规。”以此为由,他们决定每周星期四(和田新城的集日)、星期六(和田老城的集日)举行集会,绕街道、商店一周游行宣传,每周星期三组织群众集体祈祷。洛浦、墨玉、皮山县不少人赶来参加这些活动。1930年哈密农民暴动的消息传到和田,参加集体祈祷诵经者首先响应。前面提到给和加尼牙孜阿吉写信的正是这个祈祷诵经活动的领头人穆罕默德·谢日甫穆夫提和依斯拉皮尔大毛拉等人。

穆·布格拉利用雄厚而有准备的群众基础迅速攻占和田后,将墨玉县政权机构迁至和田,成立了“和田伊斯兰教国”。这个临时政权机构,推举穆罕默德·尼雅孜艾来木阿訇为主席,穆·布格拉汗为军事长官,萨比提大毛拉(不是喀什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那个沙比提大毛拉)为副主席兼副军事长官,努尔阿吉·阿合麦提汗和阿不都拉买合苏木(穆·布格拉之弟,又名夏合曼苏尔)为副军事长官,另外还任命了一批文官。

不久,和田专区其他县也相继暴发起义,推翻了和田专区的金树仁政权,宣布承认和田临时政府。

随后,三千多名暴动者在努尔阿吉·阿合麦提汗和夏合曼苏尔率领下向西挺进。与此同时,叶城、泽普也发生了以穆罕默德·卡孜和沙比尔汗阿吉和加等人为首的武装暴动。和田暴动者的到来给这二县暴动者以极大支持,二县暴动迅速取得胜利,推翻了金树仁在二县的反动地方政权。

和田起义军穿过叶城、泽普进军莎车,迅速攻占了莎车老城。在这次战斗中和田临时政府副主席兼副军事长官萨比提大毛拉英勇牺牲,领导和田暴动的重担落在夏合曼苏尔肩上。

正在这时，喀什的铁木耳师长派部下阿皮孜团长率兵攻打莎车。阿皮孜团长与夏合曼苏尔共同包围莎车新城，几经努力仍未攻破。莎车新城守军表示愿意投降，但要去喀什新城向马道台与马指挥缴械。起义军表示同意，允许他们率人马家眷出城，而后占领了该县城。离开莎车的金树仁官兵未及平安到达喀什新城，便遭和田义军与喀什义军的前后堵截，他们拒不缴械，被起义军彻底歼灭。

就这样，和田暴动除占据整个和田地区外，还发展到莎车，占据了莎车。

第八章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前面提到，1931至1933年底，武装暴动的熊熊烈火燃遍全疆大地。金树仁政府垮台，盛世才1933年4月12日在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发动的政变中粉墨登场，却未能建立起一个能够左右局势的政权。

当时和加尼牙孜阿吉的队伍与马仲英的队伍占据了哈密、巴里坤、七角井到吐、鄯、托广大地区。马仲英的副师长马赫英占领阿勒泰，攻占额敏县后进军塔城。伊犁方面由依靠金树仁上台的张培元窃取军政大权。该人表面上顺从盛世才，暗地却与马仲英建立联盟，发动反盛战争，占据了乌苏，玛纳斯等县。金树仁的忠实党羽魏镇国逃出阿勒泰，占领了奇台。

至于南疆，从库尔勒到民丰均被起义军所占领，但各地起义军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将所有起义军汇集到一起的核心力量。过去来到南疆的马仲英走卒马世明的部下马占仓、何福海等在群众暴动一开始，便慑于群众威力表示归顺，表示愿推翻反动政权；承认自己是穆斯林，支持维族人民的武装暴动。暴动取得胜利后，这些家伙却广为接纳原政府官军，把官吏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之下，造成

起义军内部的矛盾重重,纠纷不断。马占仓之流的居心很明显,他们妄图利用起义军的势力,为马仲英网罗人马,为马仲英日思暮想要建立的“穆斯林政府”做准备。

和田暴动者建立了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的头目并没有建立马仲英心目中的穆斯林政府的愿望。他们深知,马仲英和铁木耳师长、吾斯曼帕夏师长是不会与他们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那些人只会在内部尔虞我诈,互相拆台。为此,他们根本不对建立什么统一的政权抱任何希望。

从苏联跑回的柯尔克孜、乌孜别克人的队伍来到这块陷于一片混乱的土地,出于站稳脚跟、以求生存的需要,时而倒向起义者,时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与起义军发生一些纠纷。

截至 1933 年底,各种政治力量开始自发地聚集。从东疆到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南疆地区的起义者均开始涌向喀什。当时喀什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占据喀什,在喀什规划自己的未来。

出于上述原因,有着不同信仰的外国机构也开始插足喀什,在起义队伍中寻求自己的代言人,培植亲信。外国机构中以英国和苏联驻喀什领事馆最为活跃,最为积极。除了这两个国家,1931 年霸占我国东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其军国主义的本性,对我国新疆也发生了兴趣,对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发生的各种事件极为关心,对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对土耳其外交机构的活动甚为关注。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了一批苏联中亚一带的逃民,他们命令这些逃民密切注视新疆动态,随时准备向苏联打出这张“王牌”,以牵制苏联对新疆采取行动。在马仲英部队司令部中安插的特务大西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利用马仲英扩大自己在新疆的影响的铁证。

除此而外,那些念念不忘什么同种同宗,对中世纪初建立的“大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津津乐道的泛土耳其主义者也不愿坐失

良机，他们削尖脑袋从聚集喀什的起义队伍中物色“大土耳其帝国”的崇拜者，不遗余力地培植“大土耳其帝国”的信徒。

苏联对南疆起义者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集中在喀什的起义军首领“百分之百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不接受苏联的宣传，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兴趣，他们坚决抵制有关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鉴于上述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只有英帝国主义把一部分起义军首领拖进了自己的陷阱之中。英帝国主义以变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 1948 年前与印度是一个国家）为殖民地的现实为根据，既策划在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内建立“穆斯林国家”，又倡导在新疆建立“穆斯林国家”。南疆起义大批人流血牺牲换取的胜利果实，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英帝国主义反苏战场上的祭品。对此，起义军的某些领导或许根本不明白，或许虽然明白，却因目光短浅而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帝国主义者的庇护人。

在这种情况下，回历 1352 年 7 月 4 日，公元 1933 年 11 月 12 日“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出笼。皮匠街前广场上竖起了蓝色弯月星星旗，在升旗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同时宣布了“政府”成员的名单、宪法及“国歌”。

“政府”^① 由以下人员组成：

“政府”主席（总统） 和加尼牙孜阿吉

首席代表（总理） 沙比提大毛拉

副总理 加纳拜克（喀孜，柯尔克孜人，苏联逃匪领袖）

军政部长 乌拉孜拜克（柯尔克孜人）

① “政府”组阁时，沙比提大毛拉派人请当时住阿克苏的和加尼牙孜出任“主席”，其目的显然是要利用和加尼牙孜的威望、影响及武装部队。和加尼牙孜对此断然拒绝。沙比提大毛拉在大会上无视事实，依然宣布主席为和加尼牙孜。

军队总指挥 玛合木德·穆衣提
内政部长 赛依德扎代·尤努斯别克
外交部长 哈斯木江阿吉(英国间谍)
教育部长 阿布都克里木汗·麦合苏木(大阿訇)
教产管理部长 夏木西丁·吐尔迪阿吉
司法部长 扎里夫·哈里阿吉(喀什的知识分子,宗教学者)
农商部长 奥布尔·玉山阿吉(大地主商业资本家)
财政部长 阿里阿訇巴依(喀什商界的暴发户)
卫生部长 阿拜都拉汗(苏联中亚人)
国务秘书长 艾来木阿訇(库车的教长)

尤努斯别克兼任喀什专区专员。

“国歌”歌词如下:(大意)

我们的旗帜是蓝色星月旗,
我们的住所是金色的宫殿。
土耳其斯坦是土耳其人的故乡,
土耳其人勇敢无比。

.....

(我就记得这么几行,不一定对。)

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外交官员参加了“共和国”的成立庆祝大会。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英帝国主义者是这个所谓的“共和国”的幕后操纵者和公开支持者,他们的参加表示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个“共和国”。

“共和国”一成立,立即出版了以库特鲁克·谢维克为主编的《新生活报》。在这份报纸上公布了关于成立所谓“共和国”的政府宣言、纲领、成员、宪法与国歌等等。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仓促拼凑起来的“政府”，在当时不过昙花一现，没做过任何一件实事。它的“政府”成分复杂，组织涣散，“主席”和加尼牙孜阿吉，军事指挥玛合木德·穆里提，军政部长乌拉孜拜克等人根本没来，他们甚至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政府”，拒绝出任什么“主席”，“军队总指挥”等职务。接受任命的部长大多是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人士，这个政权实际上代表的也是这两个阶层的利益。他们的宣言和纲领声称保护穆斯林的利益，实际上保护的只是地主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利益。

这个“政府”在宣言和纲领中只字未提要为群众做些什么，实际上他们确实什么也没做，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个“政府”不抱任何希望。

这个“政府”标榜自己是整个“东土耳其斯坦”的“政府”，实际上它成立一年，别说新疆，就连喀什专区的形势也没能控制住。

“军事指挥部”和“军政部”的成立，并没使各部队接受统一领导，各部队之间仍然争权夺利，互不服气，自行其事。

当时色提瓦尔地江·拜里热木、阿合麦提·法里达，苏菲扎代、苏里唐伯克、阿布都拉汗等人也先后来到喀什。听说这些人是从苏联外逃的“卡斯莫夫其”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反布尔什维克，反苏联政府。来到喀什的除上述这些人外，还有阿合麦特·台菲克、马合木提·乃迪木等一批土耳其人。

这些人到喀什来干什么，人们不久便一清二楚了。他们置进攻疏勒之事于不顾，终日忙于协助成立、整顿那个所谓的“共和国”政府及其军队。具体说来，在马合木提·乃迪木领导下，色提瓦尔地江、苏里唐伯克、拜里热木、苏菲扎代等人参与了成立“政府”的筹备事宜，其他人则参加了对军队的整顿。

上述事实证明，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完全是在外国力量扶持下建立的政权。

这个“政府”的宣言、口号以及实际行动对渴求外国扶植、寻求外国势力为靠山的意愿未加丝毫掩饰。

“政府”刚刚成立，其所谓的“外交部长”卡斯木江阿吉便携带“国书”与众多金银财宝周游各国，通知土耳其、阿富汗、伊朗、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政府自己政权的成立，要求这些国家予以承认，给予军事装备、枪枝弹药、飞机、汽车、现款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

为了同样的目的，该政府还派人出访了阿拉伯等很多穆斯林国家。

该“政府”虚张声势，对内声称什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大肆宣扬成立这个“共和国”的重大意义，说什么服从这个“政府”的命令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提出以伊斯兰教管理国家，要最广泛地实施伊斯兰教教规，要承认合乎教规的宗教裁判所是国家机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制定法律，按法律办事，可以起到司法部门的作用。

为解决财政方面难以克服的危机，这个“政府”进一步增加税收，掌有实权的伊斯兰教法庭增收各种名目的宗教税额，使百姓背负的沉重负担比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政府”的腐败无能很快暴露无遗。它言行不一，组织涣散，“政府”成员内部不团结，别说新疆，就连喀什形势也无法控制。和田起义军首领穆·布格拉派代表来喀什，原打算对这个“政府”表示支持。但来到喀什看到的，却是喀什已被各自为政的武装力量所瓜分，只好失望地返回和田。由此看来，这个“政府”不仅不顾及民族团结，而且他们标榜的“一切以穆斯林的团结为重”的纲领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窃取各族人民反对金树仁独裁政权的斗争成果，在外国帝国主义力量扶植下成立的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反对

进步,反对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如昙花一现,很快便垮台了。这样的结局不足为奇,因为饱受压榨的新疆各族人民奋起抗争绝非为了空喊几句漂亮的口号,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解放和幸福安定的生活。这个政府基于其本性是绝不会考虑人民的利益,绝不会满足人民的需要的。另一方面,苏联不能容忍外国帝国主义在新疆,尤其在南疆加强影响及渗透,建立附属于英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十月革命胜利后,正是英帝国主义在中亚打着“泛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的旗号,对年轻的苏维埃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干涉,煽动反共情绪。苏维埃政府看透了英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不能容忍他们故技重演,在自己的近邻新疆再次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因此,对这个“政府”成为新疆近代史上寿命最短的政府的事实,人们便极易理解了。为推翻这个“政府”,新疆各族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帝国主义势力及其附庸或坐山观虎斗,观一场闹剧,或乘机捞一大把,中饱私囊。

在此我还想介绍这样一件事:以协助整顿该“政府”及军队为名来到喀什的那个名叫马合木提·乃迪木的人,宣称要为“政府”效力,要到英国购买武器,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新疆成立了这个“共和国”,以此为由从“政府”领取了大批黄金。他携带巨额黄金行至塔什库尔干与几名从土耳其回来的人相遇时,马合木提·乃迪木得意忘形地说:“那些起义者晕头转向,忘乎所以,被我哄骗到手大量黄金。现在我携带这些黄金走了,再不会回来了。”这是一名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打自招。仅此一例,我们就足可看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政府”的所谓“支持”、“援助”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垮台之后,总理沙比提大毛拉和司法部长扎里夫·哈里阿吉等人在莎车县被奉和加尼牙孜阿吉之命的马合木提·木依提逮捕,送往盛世才在乌鲁木齐的监狱,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副总理加纳拜克,由于柯尔克孜人的内战,军队溃不成军,加之马仲英部队火上浇油,重击他的剩余部队,使得他最后竟至无处存身,被迫逃往印度。

军政部长乌拉孜拜克与吾斯曼帕夏发生纠纷。开始吾斯曼帕夏失利,后来他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击败乌拉孜拜克,迫使他向自己投了降。乌拉孜拜克以保存性命为条件保证不再参与军事活动,卸甲归田。吾斯曼帕夏因进行反苏活动被通缉,要求马合木提·木依提庇护,却反被送进盛世才监狱,死于狱中。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成员归顺和加尼牙孜阿吉者,在盛世才伪装进步的假面具未被揭穿,其刽子手的真面貌公诸于世之前,被新疆省政府任命为各厅、专区、县的副厅长、专员、县令等要职。

逃到国外的部分成员在国外成立各种组织,一段时期内没中止活动。有些组织成员紧紧依附于南京中央政府,揭露过盛世才的罪行。一批逃往印度的和田、喀什等地的维吾尔族青年后来被派往南京学习,这是后话。

第九章 和加尼牙孜和盛世才的联盟

为使读者对前面提到和以后章节中将要提到某些事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有些问题需要重新做些交代。

截至1933年为止,在一段日子里,以和加尼牙孜阿吉为首的哈密农民起义者完全控制了东疆。1933年3月,和加尼牙孜阿吉与马合木提·木依提联合,进一步壮大了力量,使起义军具备了正规军的实力和规模。和加尼牙孜阿吉与马合木提·木依提分别担任这支队伍的统帅与军事指挥官。

三月底，和加尼牙孜阿吉以吐鲁番、托克逊、鄯善为基地进军北上，攻占木垒。金树仁的部下逃至奇台集结。和加尼牙孜阿吉的另一支队伍进攻达坂城，迅速收拾掉当地金树仁手下那些以烟鬼、赌棍为主的守军，占领达坂城，打开了进攻乌鲁木齐的道路。

此时，马世明从焉耆向乌鲁木齐进发。原来他见马合木提·木依提被和加尼牙孜阿吉从焉耆叫走，知道二者必将联合。他担心二者联合后，队伍壮大对己不利，便秘密派遣焉耆的麦苏里巴依、尼牙孜回回等人向在酒泉进行军事训练的马仲英求援，他本人则参加了攻打达坂城的战斗。他假惺惺地向和加尼牙孜阿吉表示一定配合，实际上却暗中等候马仲英，在南山周围集结力量，训练部队，时不时还在乌鲁木齐周围进行一些骚扰。

马仲英接到马世明的情报，离开酒泉前往新疆支援。在奇台附近与和加尼牙孜阿吉的队伍相遇，他惊叹和加尼牙孜阿吉的队伍鸟枪换炮、今非昔比，已成为一支具备相当实力与规模的部队。他惊恐万分，不敢与之抗衡，于是改变态度，表示愿与和加尼牙孜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共同对付金树仁，推翻金树仁反动政权。马仲英向和加尼牙孜表示：“你们是矛的杆，我们是矛的尖，你们握紧矛杆，我们奋力刺杀。”

双方联合，分头行动。马仲英率部攻打奇台，和加尼牙孜阿吉率部进攻吉木萨尔。马仲英为维护自身的声望，奋力拼杀，损失惨重，战斗中失去了亲弟弟马仲杰。最后攻破奇台，缴获八千余支步枪、五十余挺轻重机枪及大批弹药。

和加尼牙孜阿吉的部队同时向吉木萨尔发起猛攻。吉木萨尔守军见势不妙，表示愿缴械投诚。和加尼牙孜阿吉停止进攻，准备受降。敌军告之次日缴械，和加尼牙孜阿吉表示同意，不想马仲英闻讯连夜派兵赶至吉木萨尔收缴了官兵武器及军马两千余匹。

和加尼牙孜阿吉对此深为不满，要求马仲英退还战利品，哪怕

退还一部分也行。马仲英毫不理睬，和加尼牙孜阿吉认清马仲英是个见利忘义、贪得无厌的小人，决定与马仲英一刀两断。

正在这时，乌鲁木齐发生军事政变。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4月12日发动政变，推翻了金树仁政权。机会主义者盛世才依靠手中军权登上了新疆省主席的宝座，然而他的统治权仅能行使于乌鲁木齐、塔城、呼图壁、昌吉、米泉、阜康等县城内，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村则掌握在和加尼牙孜阿吉的维族军队与马仲英的回族军队手中。乌鲁木齐被包围着，塔城也仍处于马仲英进攻的威胁之中。

盛世才的兵力算起来，有乌鲁木齐地方军队二千、东北军三千、白俄流亡人员组成的军队近一千，合计约有六千人马。

盛世才处境艰难。为摆脱困境，他一面靠拢苏联，争取苏联的支持，一面向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暗送秋波，企图利用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阿吉之间的矛盾，拉一方，打一方。即使不能如意，也设法使他们不致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盛世才深知，他与双方均交过战，与任何一方议和都不容易，但设法改善关系总比按兵不动强，于是他派代表同时与双方谈判，派艾克拜尔、马合木提霍加（乌孜别克族）去吉木萨尔和加尼牙孜阿吉处，派以吴艾青（音译）为首的代表去奇台马仲英驻地。

盛世才了解加尼牙孜阿吉曾接受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料他听得进苏联方面的劝告，便请求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帮助自己。苏联领事馆没让盛世才失望，派工作人员马合木提·霍加以盛世才代表的身份与和加尼牙孜阿吉谈判，实际上是传达苏联方面的意见。据说马合木提·霍加这样向和加尼牙孜阿吉表示：“我代表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的意见，希望你与盛世才团结一致，因为苏联政府支持盛世才。马仲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总有一天要被消灭，谁和他搞在一起都会和他同归于尽。”

过去盛世才也曾派过两名特使与和加尼牙孜阿吉谈判，特使

们口头转达了盛世才愿意和谈的要求，转递了盛世才一封亲笔信，信上写道：“你领导的反对金树仁的起义完全是正确的，我一向不愿与你交战，但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和你打了几年，实属迫于无奈。现我已推翻金树仁政权，今后我们没必要继续交战，我诚心诚意请你到乌鲁木齐来，我们团结一心，共同治理新疆……”和加尼牙孜阿吉当时态度强硬，拒绝和谈，并当面表示：“他在搞欺骗。我绝不与他和解，我要战斗到底，为死难弟兄报仇雪恨。”

此次苏联领事馆出面调解，想一下使和加尼牙孜阿吉改变态度也并不容易。因为和加尼牙孜阿吉与盛世才之间有深仇大恨，然而和加尼牙孜阿吉也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武器弹药缺乏来源，部队供给极为困难，人力严重不足，没有对付马仲英与盛世才的实力等等。从长远利益考虑，他不能拒绝苏联调解，断绝自己的后路。于是最终还是接受调解，与盛世才谈判达成协议，接受盛世才对他“南疆剿匪总司令”的委任。为表示与盛世才联合，接受委任的诚意，他在奇台与马仲英部队开战，挫败马仲英部队后率部进军南疆。此时他已有了万余人马，六千多枝枪。

和加尼牙孜阿吉进军南疆，追击奉马仲英之命开赴喀什的马占仓，连战连捷，打得马占仓溃不成军。接着和加尼牙孜阿吉又攻占阿克苏，在阿克苏休整一段时间，补充了武器弹药、给养装备等等。

此期间，和加尼牙孜阿吉通过外蒙派往他身边协助工作的斯马义阿訇、哈孜·尼牙孜阿訇等人，在乌什县与苏联建立起联系，以牲畜，黄金换购苏联武器，武装自己的队伍。沙比提大毛拉此时正在喀什策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邀和加尼牙孜阿吉出任“共和国”总统。和加尼牙孜接受苏联方面关于以反对“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为条件为他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拒绝出任该“政府”总统的职务，将沙比提大毛拉的代表打发回喀什。

1934年1月，苏联以“阿勒泰部队”名义出兵新疆，全歼马仲英的阿勒泰驻军马赫英部与马仲英的伊犁同盟军张培元部。后进军乌鲁木齐，给了马仲英主力部队以致命打击，突破其对乌鲁木齐的包围，迫使马仲英率部逃往南疆。先期抵达喀什，与当地起义军联合，参加进攻疏勒战斗的和加尼牙孜阿吉，在马仲英入侵喀什，与马道台勾结之前率一部分人马企图半路阻击马仲英部队。由于喀什起义军首领没能积极配合，和加尼牙孜阿吉吃了败仗，撤退至阿图什的阿力胡村。

和加尼牙孜阿吉在艾尔开希塔木再次与苏联联系，交付苏联二千两黄金，购买武器。苏联方面再次提出出售武器需以联合盛世才政府推翻“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条件。为购置武器，和加尼牙孜答应苏联的条件，命驻守莎车的部下马合木提·木依提逮捕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政府成员。马合木提·木依提派下属吾甫尔团长执行命令。吾甫尔团长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和则力甫卡日阿吉，将他们经阿克苏送往乌鲁木齐。

和加尼牙孜阿吉在莎车、阿克苏两地招兵买马，壮大力量，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再次进军喀什。部队士气高昂，兵强马壮，没打什么大仗、硬仗，便顺利击败马仲英，迫使马仲英落荒而逃，到苏联避难。

盛世才政府接二连三致电和加尼牙孜阿吉，甚至派特使面见和加尼牙孜阿吉，请他去乌鲁木齐接受任命。当时马仲英逃往苏联，其残兵败将在马虎山率领下逃奔和田集结，与盛世才政府达成如下协议：以泽普为界，马虎山部驻扎和田，盛世才官兵驻扎喀什，双方互不干涉。和加尼牙孜阿吉鉴于这种形势，率部队沿莎车河来到阿克苏。盛世才政府特使特来阿克苏迎接，在盛世才政府内任职的苏联方面的参谋长（有些资料记载的是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波里谢夫）也亲赴阿克苏迎接和加尼牙孜阿吉，敦促他与盛世才政府尽

快实现合作。和加尼牙孜阿吉指出盛世才阴险奸诈，那位苏联参谋长再三劝解，担保盛世才绝不伤害他的性命，侵吞他的财产，影响他的政治地位，劝和加尼牙孜阿吉尽快去乌鲁木齐接受任命，担任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最终接受了苏联参谋长的劝告，相信了上述承诺与担保，于1934年8月到达乌鲁木齐（有资料记载，他与盛世才签订条约，达成协议后才去的乌鲁木齐。该协议由和加尼牙孜阿吉、盛世才代表与以证人身份出面的苏联代表三方签字，用维文、汉文、俄文三种文字书写）。

和加尼牙孜阿吉接受盛世才的任命，担任了新疆省副主席。盛世才同意和加尼牙孜阿吉保留警卫部队，其主力部队驻守南疆。盛世才命名其主力部队为“新疆边防军第六师”，任命马合木提·木依提为师长。

和加尼牙孜阿吉及其部队为稳定新疆局势，争取民心，落实盛世才政府争取苏联支持与直接援助的措施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从和加尼牙孜阿吉接受盛世才任命，担任新疆省副主席和同意盛世才将其部队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六师”的事实不难看出，此时的和加尼牙孜已经承认盛世才政权为新疆全省的合法政权。为巩固盛世才政权，表示自己拥护盛世才政权的诚意，他还做出了一些姿态。如1934年8月1日乌鲁木齐市召开庆祝新疆和平统一的群众大会，和加尼牙孜阿吉在会上讲话，明确表态拥护盛世才政府的各项政策，拥护盛督办的领导，号召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建设繁荣昌盛的新新疆。作为新疆著名的人民起义领袖，在如此重大的场合进行呼吁，对稳定新疆局势将会起到何等重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肯定，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初，和加尼牙孜阿吉在省政府会议上曾提出过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合理建议，他与省政府中的苏联顾问亲密合作，为改善，密切新疆与苏联的关系做

过一些努力。1935年夏天，他亲自参与修建达坂城桥，1936年兴建吐鲁番棉纺厂。为了提高政治水平，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要求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在学习方面给他以帮助，苏联领事馆欣然应允，派曼苏尔先生、斯依提阿吉等人为他们授课，帮助他们学习。和加尼牙孜阿吉非常兴奋，学习十分认真刻苦。

然而和加尼牙孜阿吉还是上当受骗了。盛世才见和加尼牙孜阿吉完全相信了他，帮助他巩固了政权，稳定了局势，立刻摇身一变，露出了阴险毒辣、两面三刀的刽子手面目。他自食其言，违背承诺，一步步整治起和加尼牙孜阿吉。首先他不让和加尼牙孜阿吉参政，不通知他参加任何省府会议，关于调配军队、部署财政、处理内部事务等重大问题，不仅不征求和加尼牙孜阿吉的意见，而且提都不提。接着，在和加尼牙孜阿吉身边安置密探，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盛世才用金钱、美女、舒适安逸的生活等等腐蚀瓦解和加尼牙孜阿吉，为使和加尼牙孜丧失斗志，盛世才施展各种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和加尼牙孜阿吉以后发觉自己已完全中了圈套，成了地地道道的傀儡，却为时已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倍感寂寞苦闷，空虚无聊，用下棋、打猎、在乌鲁木齐周围旅游等消遣打发时间，排遣寂寞。以后他又去经商，但终难逃脱盛世才的魔爪，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最后死于绞刑。史料记载，1937年10月12日和加尼牙孜阿吉被盛世才逮捕，一切私人财产被查封，经莫斯科方面批准，送上绞架处死。执行人系苏联派来执行盛世才旨意的阿希木阿吉等人。盛世才原打算对马合木提·木依提做同样处置，因马合木提·木依提事先有所察觉逃往国外，才免于死。

第十章 马仲英在南疆

和加尼牙孜阿吉同盛世才联合，马仲英忧心忡忡。由于和加尼牙孜阿吉的和解，盛世才少了一个劲敌，松了一口气，而马仲英的存在依然令他不得安宁。马仲英当时虽已与伊犁第八师（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向盛世才亮出王牌，封金树仁部下伊犁的张培元驻军为国军第八师。张培元还是“伊犁垦荒长官”名义的行政总督）师长张培元联合，但双方对乌鲁木齐并未构成威胁。

和加尼牙孜阿吉进军南疆的同时，马仲英率八千装备精良、战斗力颇强的人马攻占失去的奇台，后取道阜康欲向乌鲁木齐发动进攻。盛世才用来对付马仲英的部队是清一色的东北军。令东北军出击，是由于盛世才深知东北籍官兵急欲回老家的心理。他提出：“扫清道路，打回关内”的口号，用以鼓舞东北军，提高东北军的士气。为使东北军死心踏地为他卖命，打败马仲英，他还一下发放全军官兵每人三月军饷，这支队伍总人数计四千余。

尽管如此，东北籍官兵的士气仍然远远不如马仲英部队士气高涨。这是因为马仲英一贯重视军事训练与官兵英勇顽强、严守军纪的素质培养。冬季训练，他的部队身着单衣，既进行军事操练，更磨炼意志。他的每一名士兵都矢志不移地坚信，战斗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对这次战斗，马仲英抱着必胜的决心，自信自负，神气十足。

然而事实出乎意料。在奇台滋泥泉一仗中，马仲英部队一败涂地，伤亡惨重。目睹者介绍，马仲英发动这次战斗不得人心。他命令兵士们身着单衣裤上阵，战斗开始，一场暴风雪使兵士们身受枪林弹雨与天寒地冻的夹击，士气一落千丈。马仲英狂呼乱叫，士兵

们不听那套，失败遂成定局。不得已，马仲英率残兵败将逃往吐鲁番、鄯善。几天后，在伤亡兵士死伤地点，马仲英恳请当地百姓为兵士们超度亡灵。他奔走于各清真寺之间，手持《古兰经》，祈求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他还召开大会，在会上讲话说：“我要解放全疆的穆斯林，解放全中国，使全国实现穆斯林化。我要攻占印度到苏联的全部地区，使我的穆斯林国界通往麦加天房。”真是吹牛不上税，他的牛皮吹得也太大了！

1933年秋，马仲英完成了一系列准备。冬季开始，他率领六千余名精兵与新征集的一千五百余名新兵开赴乌鲁木齐。他的部队冲破盛世才部队在柴窝铺、芨芨草子、乌拉泊等地的阻拦直抵乌鲁木齐三甬碑、黑假山、二道湾、西大桥、沙依巴克区等地，使乌鲁木齐基本上陷于其部队的包围之中。1934年元月初，马仲英部队占据乌鲁木齐飞机场，缴获了一架飞机。接着占领无线电台，对乌鲁木齐南梁及东、北方向发起猛攻。

马仲英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他觉得攻占整个乌鲁木齐指日可待，狂妄不可一世。就在这时，苏联红军出兵新疆，消灭了马仲英的同盟军张培元在乌苏、玛纳斯的驻军，占领了乌苏、玛纳斯二地。继而进军伊宁、绥定、昭苏等地，摧毁了张培元本部。张培元仓惶逃跑，自尽身亡。

苏联红军的空军部队先行到达乌鲁木齐，对马仲英部队进行猛烈轰炸，而后步兵在重型武器与装甲坦克掩护下发动猛攻。马仲英无招架之力，于1934年2月11日率部自乌鲁木齐逃往达坂城。2月底在达坂城殊死顽抗数日，抵挡不住，逃往南疆。

马仲英之所以没从来路返回关内南逃南疆，主要是由于他获悉当时鄯善、哈密起义军响应和加尼牙孜阿吉的号召，切断了他回关内的逃路，准备对他的队伍一举全歼。马仲英队伍中有不少从吐鲁番、鄯善等地抓来的维吾尔族壮丁，他担心这些人与和加尼牙

孜阿吉的起义军里应外合，因此不敢率部回关内，这自然也是他去南疆的原因之一。马仲英准备逃往南疆稍事休整，或逃往国外，或由和田经青海返回甘肃。他非常希望得到南疆马世明、马占仓等人的实际援助。

苏联红军不给马仲英以喘息之机，步步紧逼。天上轰，地上扫，逼得马仲英走投无路，只好向苏方求饶，表示今后绝不再与苏联为敌，并把在新疆掠夺的数百斤黄金“寄存”于苏联国库。苏联方面手下留情，在巴楚停止追击马仲英部队。苏联方面究竟是否真正相信马仲英的“承诺”与“誓言”无据可查。我想，考虑到喀什有英国领事馆，做得太过分会使自己在国际外交界陷于不利地位，为照顾国际影响而停止追击马仲英大约才是苏方停火的主要原因。总之，苏联部队追到巴楚后的确停止了前进。

马仲英在喀什不甘寂寞，不思悔过，仍然恶习不改，作恶多端。他在喀什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对人民起义军进行欺骗，拉拢，达不到目的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

为挽救军事上的失败，改变在民众中的孤立地位，马仲英死皮赖脸央求苏联驻喀什领事馆给他以支持。1934年6月7日他以“赴苏参观学习”为名与参谋吴英齐等百余人携十几秤子（一秤子约合16斤）金币，十几秤子金条、数百吨白银等大批金银财宝逃往苏联。至于他究竟携带多少金银财宝无法查实。一些亲眼所见其商队、骆驼队的人们也未提供出任何有价值的资料。马仲英聚敛的金银财宝，有抢掠得来的一部分，而大部分是从枪杀铁木耳师长的马占仓在喀什的金库中取出的。马仲英一到喀什，便占据了 this 金库。当时英国一度极力唆使马仲英经他的殖民地印度返归甘肃，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实英国对马仲英的“关怀”出于“黄金诱惑”，但马仲英到喀什后确实见过英国领事，也确有材料证明马仲英一度打算通过印度返回甘肃。

有些介绍三十年代新疆重大事件的文章把马仲英说成是“推翻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包围英国驻喀什领事馆、逮捕那个‘政府’成员的爱国者”，还把他美化为“要求赴苏学习”的“进步者”。这些人以马仲英重用大革命时期留学苏联的先进分子在自己队伍中担任过参谋的事实为根据（说他们之中甚至有丢失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证明马仲英不反对共产主义。我认为，像他那样在同一时期既为一个帝国主义者效劳，又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者；既反对分裂祖国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又不遗余力地要建立分裂祖国的“穆斯林国家”、“穆斯林政府”的做法，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实际上，马仲英一心想窃取本世纪三十年代新疆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成果建立什么“穆斯林国家”、“穆斯林政府”，（如他在各地贩卖关于建立这样的“国家”和“政府”的货色，在所谓“致阿勒泰一切穆斯林首脑的公开信中也公然鼓吹建立这样的“国家”和“政府”）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和民族败类。为使自己的野心得逞，他不惜公开向当时全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求荣，是最大的卖国贼和屠杀无辜百姓的刽子手，还是一个为个人私欲，不知羞耻，公开抢掠新疆金银财宝的贪得无厌的大强盗。

马仲英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求荣，尽人皆知。上面我曾提到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马合木提·霍和加对加尼牙孜阿吉说的话，此话并非无稽之谈，苏联方面确有真凭实据足以证明。

盛世才部队在奇台紫尼泉子战斗中击败力量上占优势的马仲英部队，固然有暴风雪给马仲英部队造成的困难因素在内，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盛世才以铁的事实揭穿了马仲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忠实走狗的嘴脸，激发了因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而被迫离乡背井的东北军官兵的爱国热情与对马仲英卖国行径的切齿仇恨。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达到“钳制中国西部”的目的，在马仲英的积极配合下，派特使为他们的代理人。其中一个名叫大西忠（该人以后落入盛世才之手），还有一个名叫卡马勒先生。该人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后逃到日本的，日本方面派他担任马仲英的军事顾问。据说该人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马仲英部队作战之所以机敏灵活，与这个土耳其人对其部队进行过严格训练不能说没有关系（该人后落入盛世才之手，死于狱中）。此外，日本政府 1933 年底曾打算以考察新疆情况为由，派三人小组经苏联来新疆，因苏联政府未给签证，未能如愿。由此可见，马仲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妄图建立分裂祖国的反动政权的叛国者和阴谋家。

随着马仲英占据喀什，“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倒台，起义部队也随之四处逃散。如果说马仲英对这个“共和国”的倒台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话，我们只能理解为，马仲英没能建成性质相同的自己的共和国，出于嫉恨，他不能容忍“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存在。仅此而已，绝不能往他脸上贴金，称他为什么“先进分子”。

马仲英是个残无人道的吸血鬼。他自乌鲁木齐败北，逃往南疆后，对喀什各族人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马仲英曾在疏附县紧闭四个城门，在城内进行两天两夜的大屠杀，杀害人数达四五千人之多。不管反对他还是拥护他，无一例外均遭毒手。马仲英在阿图什、英吉莎进行大屠杀，率兵到阿图什纵火焚烧起义者家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逼使起义者四处逃亡。当时我曾带领三十名战士逃至阿图什上方一带山上躲避。

一天清晨，马仲英率兵杀到阿图什，我们在台合提云上方的山上，居高临下，亲眼目睹了马匪在下阿图什烧杀抢掠的惨状。我率

兵下山，吩咐部下在距此地三十公里开外的巴昌等候我，我想回家把妈妈与家人送至安全地带。途中，我亲眼看见了马匪在伊塔奇、布亚麦特、提坚等地进行残无人道的抢掠、搜刮、纵火、杀戮平民百姓的罪恶行径，心中悲愤之极。转向孙塔格方向，看到提坚不少地方火光冲天，马匪官兵先寻找起义者头目的家烧杀抢掠，进而对起义兵士家走一家，烧一家，一家也不放过。整个阿图什哀鸿遍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到孙塔格又看到一批批朝阿图什下方逃难的人群，不计其数。惊慌失措的男女老少不顾死活地狼狈逃命。到家后，我发现哥哥阿布里孜早已带母亲出逃。我四处寻找，各处逃来的人们在乡间小路上挤作一团，骑马的，骑驴的，赶驴车的，步行的；哭声、喊声、车声、马蹄声，乱成一团。人们潮水般向前涌，我被裹挟其中，随人流涌动。没走多远，见一位老大爷高举一个两岁左右与母亲挤散的小女孩，向人群高喊：“这是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孩子？”小女孩凄惨地呼喊着妈妈，哭成一个小泪人。我挤过去打听，没人顾得上理我。孩子四处张望，伸着小手哭喊，真让人心疼。小女孩的妈妈大约身不由己，被人群涌向前方去了。我把小女孩从老大爷手中接过放在我的马前面，带着她边寻找母亲边向前逃。逃至阿图什下方最边缘的栏杆村，回头一看，从阿图什山到下边的河沿漫山遍野都是人，像被一群恶狼追赶的牲畜。人们惶恐万状，奔跑逃命。登上一处高地，我看到有的村庄变成一片火海，中部一处的火光最为显眼，以后得知那是克其克阿洪团长的家，焚烧的惨象令人不忍目睹。整个阿图什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人们纷纷逃命，哭声震天。这就是被某些人称为“革命者”的马仲英在阿图什制造的无数人家破人亡的悲剧。马仲英对阿图什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我心情沉重，带着小女孩随人流逃命。不知走了多久，追上了黑压压的一片逃难的人群。人们战战兢兢，哀号哭叫，挤做一团，像

是逃不动了。人群中与亲人离散的真不少，喊爹叫娘、找儿子、喊妻子，悲悲切切，凄凄惨惨，令人心酸。我抱着侥幸心理为女孩寻找母亲，举起手中哭得精疲力竭的可怜的小女孩，大声喊叫：“这是谁家的孩子？这是谁家的孩子？”喊叫了好一会儿，忽见一位中年妇女跌跌撞撞，哭喊着向我这边跑来。我怀中的孩子看见这位妇女用力从我怀里向外挣扎，大声哭叫“妈妈”。那位妇女战栗着，从我怀里把孩子一下子夺过去，紧紧搂在怀里，怕被人抢走似的，抱得那样紧。孩子找到了妈妈，我一颗心总算踏实下来。正待驱马离开，几个人跑到我的马前，对我千恩万谢，谢个不停。原来这些都是孩子的亲人。告别了这些人，我继续赶路去了。

如果对马仲英在新疆，特别是在喀什地区烧杀抢掠、血债累累的罪恶行径做一番调查，定可以列举出大量血写的事实，证明马仲英不可饶恕的罪行。哪怕对民众稍存一点恻隐之心，也不会支持残害喀什人民的刽子手马道台，也不会与马道台一道如此丧尽天良地屠杀起义者与无数善良无辜的百姓。那些美化马仲英为“爱国者”、“进步者”的人们对此难道会视而不见，难道不该深思之后再下结论吗？

第十一章 对三十年代群众暴动的看法

三十年代群众暴动的起因、过程及规模，前面已做过介绍。对某些地区某些暴动领导者的看法，在此重复纯属多余。我之所以要以一章的篇幅专门写一写对三十年代群众暴动的看法，是因为我认为新疆历史上似三十年代初期这样迅猛，这样拥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群众运动，尚属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对这些群众暴动，必然像对待任何其他群众运动一样，存在着

各种看法与偏见。对群众暴动的实质与主流若不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去分析对待,就必然只见支流,忽略主流,得出片面的结论,从而对历史,对人民群众做出不公正的评价。

诚然,1931年至1934年间轰轰烈烈的群众暴动以失败告终。新疆各族人民以推翻金树仁反动政权为目的的革命风暴席卷天山南北。他们艰苦奋斗,抛洒热血,最终革命成果竟付诸东流。盛世才这个狡猾的刽子手巧妙地窃取民众的暴动成果,登上了新疆省主席宝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然而,我们能够因此而认为这场从哈密山区到昆仑山麓,席卷全疆的群众暴动是错误的,认为没有这场暴动,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也会发动政变,推翻金树仁政权,或者说盛世才也会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对金树仁取而代之吗?

一些资料和书籍不着眼于人民暴动的威力,竟说什么金树仁政权垮台是由于他沿袭了杨增新政府具有致命弱点的政策,如果金树仁采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就不会垮台;有些评论认为金树仁垮台是因他过于信任、重用同乡,这些乡党背着 he 囤积财宝,贪污腐化,引起陈中等人的强烈不满,于是发动政变将其推翻;还有文章则认为金树仁系被流亡的白俄人士所打倒,盛世才于是乘机上了台云云。

持这些看法的人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力量何等强大,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论是陈中、陶明樾、李笑天,还是白俄流亡者,或者盛世才之流,都是由于看到哈密暴动迅速席卷全疆,势不可挡,金树仁无力镇压,才乘机有所行动,窃权暴动成果的。

有些资料与书籍虽提及群众暴动,却将其称之为“暴乱”,“谋反”,极力贬低其规模、作用及其性质,竭力为企图利用群众暴动达到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的马仲英、盛世才等刽子手涂脂抹粉,用唯心的、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解释马仲英、盛世才之流与暴动者之间

的矛盾、冲突与战争，最后做出马仲英、盛世才之流代表合法政府，群众暴动代表分裂与混乱的荒谬结论。

做此结论者的论据是：和加尼牙孜阿吉在暴动初期接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虽然没接受“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任命，但没对组织者沙比提大毛拉立即采取镇压措施；他的下属、部队总指挥马合木提·木依提于1937年4月外逃；1933年11月“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共和国”政府在和田暴动后成立了“和田政府”（或称做“和田伊斯兰教国”），该“政府”头目之一穆·布格拉蜕变为“泛土耳其主义者”逃往国外……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我认为，上述所谓“证据”并不能改变新疆三十年代初群众暴动纯系反对金树仁反动独裁统治的本质；诬蔑它是反政府的“暴乱”，“谋反”，绝不能说明马仲英之流讨伐人民暴动是正确的，是维护祖国统一的；同样，对群众暴动的诬蔑丝毫不能为罪恶昭著的盛世才开脱，认为盛世才镇压群众暴动是从全局出发，是执行正确的政策，更是荒谬绝伦的逻辑。

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最尊重事实。铁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三十年代初期新疆各地的群众暴动是反专制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这是我的结论，也是历史的结论。我之如此肯定它的反专制、反独裁的革命性质，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证明：

1. 这些暴动最先明确提出推翻金树仁反动政权的口号，目标明确。马仲英、盛世才之流从未提出过如此旗帜鲜明的口号，他们反对金树仁，只是反动派之间的争权夺势；他们要推翻的只是金树仁个人；他们的目的是打倒金树仁，自己取而代之，继续维持金树仁式的反动政权。马仲英的嗜血成性，盛世才刚刚上台便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 新疆三十年代初的群众暴动不像其他任何地区的暴动那

样，在举行暴动的同时打出“独立”、“分裂”的旗号。拥有正规武器的新疆暴动领袖顶多为自己加上个“师长”的军衔。如“巴依师长”、“铁木耳师长”、“吾斯曼师长”、“马合木提师长”等。为全疆群众公认的暴动最高领导人和加尼牙孜阿吉自始至终没给自己加封任何官衔，别说“师长”，连“班长”的军衔也没有。盛世才政府封他为省政府“副主席”，而不少资料、著作中不承认他是省政府副主席，理由是这个官衔不是“南京政府”给的，不能算是正式的。我认为，这样倒不错，不致使这位群众暴动领袖清白的历史染上污点。和加尼牙孜阿吉将以“阿吉”（“阿吉”，意为“朝觐者”。伊斯兰教徒朝拜过麦加圣地“克尔白”者的称号。——译者）的身份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被广大人民所怀念。

3. 有一点需再次强调说明，那就是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与暴动者毫无关系。新疆三十年代初期群众暴动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或类似的东西，他们甚至连设想也没有。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妄图利用暴动领袖的声望，私自把某些领导者作为该“政府”成员对外宣布。而事实上，这些领导者既未行使过什么职权，也没有过任何行动，表示对这个“政府”的支持与拥护，甚至连承认都没承认过。问题很明显，看到这个“政府”成员名单上有某暴动领袖的名字，便把污水泼在清白无辜的暴动者身上是不公道的。污水终归是污水，它毕竟掩盖不住清泉清澈透底的本色，污水会被冲走，清泉则会永远向人们展示自己清纯美好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和加尼牙孜阿吉曾下令镇压这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令其军事指挥马合木提·木依提抓获该“政府”主要领导人送交盛世才。这个贡献不能记在马仲英、盛世才名下，真正的有功之臣是和加尼牙孜阿吉。有些资料为了美化马仲英、盛世才这两个镇压新疆群众的刽子手，竟不顾事实，张冠李戴。这个

事实必须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至于“和田政府”(或称“和田伊斯兰教国”)并非暴动初期所成立。和田暴动者暴动初期并未打出“独立”、“分裂”的旗帜,只是在沙比提大毛拉推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后,和田暴动者不满,为表示对抗才自行宣布成立“和田政府”。这个“政府”中的个别人可能有闹分裂、搞独立的倾向,但他们绝对代表不了广大的和田暴动群众,更代表不了全疆的暴动者。瑕不掩瑜,和田个别暴动者的所做所为丝毫不能抹杀和田暴动群众为推翻金树仁反动政权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他们与全疆暴动者一道英勇奋斗,做出了巨大牺牲。

4. 关于接受外国援助的问题。当时新疆各派势力无一不接受外国援助。其中接受外援最多的是盛世才。盛世才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巩固自己的统治,背着伪中央政府私自请苏军入境。且不管他巩固政权之后又接受过多少外援,只要看看上述事实,问题便一目了然了。至于马仲英,则公开投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他的司令部里不仅有以上介绍过的、尽人皆知的大西忠、卡马勒之类的日本间谍,而且还有从苏联逃往日本、在日本受过特种训练的日本走狗马力克、扎克尔等,为其出谋划策。只有和加尼牙孜阿吉是不签订条约、协定,只用现金、牲畜从蒙古、苏联换购武器的惟一领导者。关于这些前面已做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5. 和加尼牙孜阿吉的暴动队伍比之任何其他队伍更加具有人民性和进步性。这点从暴动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同心同德,团结一心,共同为推翻反动政权而战的事实可清楚地看出。盛世才与马仲英则不然,若考证一下他们究竟为反对谁而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反对新疆各族人民而战。各族群众为反对金树仁反动政权奋不顾身,浴血奋战,攻占过不少县市,而盛世才、马仲英之流处处与各地暴动部队作对,为维护金树仁反动统治卖命,谁

是谁非岂不昭然若揭？

综上所述，我们并非肯定这些暴动自始至终是在正确的领导与严密的组织下进行的尽善尽美的革命，因为它最终毕竟以失败而告结束。

暴动领导者的最大错误在于，虽然有推翻金树仁反动政权的明确目的，却没有推翻反动政权之后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权的长远目标与理想。暴动一哄而起，迅速取得胜利。暴动领导者们被胜利冲昏头脑，飘飘然不知所措，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往何处去。于是盲目行动，四处碰壁，最终葬送了暴动成果，使轰轰烈烈的群众暴动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暴动领导者之所以思想方法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与弱点，主要原因是，他们生活在被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统治千余年的社会环境之中，自身的宗教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发动群众全部靠宗教宣传。他们必须如此，若不依靠宗教，群众无法发动，他们自己就绝对不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宗教帮助他们，也同样加速了他们的失败。“泛土耳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正是利用了暴动队伍中的宗教意识，从这方面打开缺口，使“泛土耳其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似瘟疫般在暴动队伍中四处蔓延，腐蚀了暴动者的思想，使他们无力铲除“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和田政府”这两个处于萌芽状态的毒瘤，在自己的斗争史上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污点。

紧紧依附于宗教、小生产者思想意识极为浓厚的农民暴动领导者，虽然懂得一些有关分清敌我、区别阶级关系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中却难以正确处理。反动透顶的金树仁独裁政权被推翻，他们代之以封建地主式的统治，在大规模占有土地进行残酷剥削方面稍有收敛，本质上却没有丝毫改变，而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暴动领导者以“团长”、“师长”、“宗教法庭”的合法名义向群众

摊派盖有金树仁政权烙印的各种徭役赋税，人民群众依然生活在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之中。

暴动队伍中从统帅到基层小头目无一不是封建透顶之人。他们不知道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不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形势的发展，不懂得运用科学的方法指导战争。对周围的人和事，不善于进行全面分析，正确对待。比如他们从不分析自己周围的人谁代表哪个国家说话，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从而决定如何对待。他们狂热地推崇迷信，一切都俯首听命，战斗中常常是徒劳无益地流血牺牲，以至最后痛切地丢失到手的胜利果实，懊悔不及。

三十年代新疆的群众暴动证明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以正确的方向和纲领为指导、在阶级和宗教问题上立场观点正确的战斗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人民暴动必定要失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不能忘怀的经验教训。

对新疆三十年代的群众暴动确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因为三十年代的新疆情况非常复杂，如当时的人事关系，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新疆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历史的和现实关系的变化等等，盘根错节，头绪纷繁。再者，就是三十年代新疆举行的群众暴动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大方向明确，斗争方式正确，没有达到的主要目标正确，因此才使得暴动风暴迅速席卷天山南北、全疆各地。各族人民齐上阵，不仅引起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深切注意，而且引起了国外一些较大国际势力的关注与参与。这也说明了暴动规模之大，说明暴动是各族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什么“哈密暴乱”、“南疆暴乱”之类诬蔑性的奇谈怪论，纯粹是金树仁、盛世才档案上那些胡言乱语的翻版。我们今天用这样的语言去为三十年代的新疆群众暴动命名显然是极不合适的，必须加以纠正。

第五部

血泊中的求索

新疆是中国的部分。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历来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成员。和中国大地的汉族人民一样，新疆各族人民自古以来深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深重压迫与残酷剥削。除遭受阶级压迫，他们还要遭受民族压迫。对新疆各少数民族实施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侮辱与血腥屠杀，是历代封建统治集团共同的统治手段。左宗棠、赵辉、杨增新、金树仁等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在这些方面一个胜过一个。假如我们把他们作一比较，盛世才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压迫剥削要算是空前绝后、首屈一指了。他骑在新疆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敲骨吸髓，十年中屠杀了十一万多无辜民众便是不容辩驳的铁证。

盛世才同杨增新一样，打着进步旗号，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做幌子欺骗新疆各族人民。他和杨增新大耍“羁縻与牵制”的把戏，不仅欺骗新疆人民，而且欺骗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杀害了大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众，而且残酷地杀害了大批汉族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盛世才政权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的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深重的灾难。

新疆是吸血鬼的屠宰场，是暴君统治下的地狱。穷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在痛苦的万丈深渊。盛世才统治时期是新疆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正如盛世才自己所说，新疆变成了“停滞不前，愚昧落后、暴乱蜂起的地方”。暴君盛世才靠玩弄阴谋诡计起家，靠欺骗蒙蔽群众执政，他一心想把这个“手持金盘讨饭的乞丐的故乡”变为自己聚敛财宝的地方，妄图将金盘从创造金盘的主人手中抢走，据为己有。

盛世才逃到台湾后，写了《赤色分子在新疆的失败》一书。他胡编乱造，为自己在新疆进行的十年法西斯统治开脱罪责。他说自己“以艰苦的、然而却是胜利的斗争，把新疆从外国侵略者和民族主义的穆斯林泛土耳其主义分子手中拯救了出来”。这纯属无稽之谈。盛世才在新疆屠杀十一万多名无辜百姓的血腥罪行是绝对洗刷不掉的。

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对于盛世才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不少。下面就让我用事实来揭穿盛世才的真面目吧。

第一章 盛世才执政

我初次听说盛世才其人是在喀什。那是马仲英在乌鲁木齐败北，退逃南疆之时。当时盛世才的部下与苏联军队尾随马仲英穷追不舍。结果众所周知，马仲英被彻底击垮，逃亡国外，其残兵败将全部归顺盛世才政府。几年之后我得知，盛世才原来是被三十年代新疆群众暴动的浪潮推上历史舞台的。

暴动初期，盛世才不过是金树仁手下一名小小的参谋长。在贪污腐化、穷奢极欲的金树仁手下军政要员的眼里，盛世才水平高，能力强，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显赫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盛世才

深谋远虑,任职期间,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从不贪污受贿,从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每天身穿佩戴肩章的军装,军容严整,待人彬彬有理,风度翩翩。在那些面黄肌瘦、身穿长袍马褂、终日萎靡不振的大烟鬼——金树仁的军政要员当中,盛世才显得非常突出,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盛世才两度留学日本的学历,在金树仁政府的军政要员中是独一无二的。留日学习期间,盛世才倍受蒋介石青睐,是直接受蒋资助者之一,仅此一点在金树仁面前就足以显赫一时,然而开始盛世才并不走运。1929年秋,奉省主席金树仁之命到关内挑选军事人才的鲁效祖(金树仁的秘书)经南京方面彭昭贤推荐结识盛世才,盛当时为蒋介石军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1930年盛世才随鲁效祖经西伯利亚来新疆。来疆后,盛世才巧妙伪装自己诡计多端的两面派嘴脸,处处忍让,委屈求全,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在南京身居高位,来疆后仅仅当了一个小小参谋和警卫营营长,后来,甚至被调至讲武堂任教官。对这种安排,他虽内心不满,表面上却唯唯诺诺,一声不吭,给人一种谦和礼让、宽容大度的印象,以此争取了一批拥护者、追随者。

哈密暴动风起云涌,斗争高潮一浪高过一浪。金树仁派兵镇压,屡战屡败。金树仁无计可施,只好抱一线希望,对盛世才委以重任,提升他为参谋长,后又任命他为东线总指挥。盛世才终于等来1933年4月12日政变,使他在新疆的政治生涯发生了重要转机。

“4.12”政变是金树仁部下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军政官员依靠巴平阔夫为首的数百名归化军^①白俄士兵发动的以推翻金树仁为目的的军事政变。金树仁发现后,先到乌鲁木齐北门,准备调集乌鲁木齐其他部队,未能如愿。后到城外红山,调遣新疆其他地方部队。首先听候调遣的是从镇压哈密暴动前线回到乌鲁木齐的盛

^① 指入疆的俄国白卫军后加入中国国籍者。

世才，接着就是北疆遵从金树仁旨意的伊犁张培元和阿勒泰的魏镇国。但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有何实际行动。

盛世才的总指挥部设在六道湾一个名叫“一炮成功”的地方，当时修建的炮楼一直保留到解放后。盛世才玩弄阴谋诡计的才能，在1933年4月12日这一天充分展示在众人面前。那天，他装出一副忠于金树仁的面孔，穷凶极恶地镇压政变分子，对金树仁表面不动声色，暗地却在积极进行推翻其政权的准备。“一炮成功”距红山很近，盛世才却从未去过金树仁住所。作为政变行动后盾的归化军，不但人数少，武器装备也不齐全，军心涣散，斗志低落。据说他们一见盛世才兵临城下，便惊慌失措，准备立即撤出乌鲁木齐。

4月13日被围困在城内的政变分子陈中和巴平阔夫派人面见盛世才，请求盛世才进城，扭转紧急局势。盛世才觉得正合心意，不禁沾沾自喜。在众人护卫之下，盛世才趾高气扬进入乌鲁木齐。金树仁见大势已去，携带家眷，灰溜溜逃往昌吉。从此，盛世才先以“督办”身份，后以督办兼省主席的身份开始了在新疆长达十年的法西斯统治。

盛世才上台头几年，新疆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东面马仲英步步紧逼；西面张培元自伊犁进军乌鲁木齐；南面库车、喀什、和田地区农民暴动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盛世才被马仲英部队包围在乌鲁木齐，混乱到达了最高峰。

盛世才无力摆脱困境，因为国民党政府对他不予承认，根本不从关内派兵援助他，而他即使争取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对他而言，关内增援也毫无可能。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便是求助于苏联。而能得到苏联帮助的，只能是苏联的拥护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于是，盛世才这个天才“演员”，在新疆的政治舞台上便做了一次精彩绝妙的表演。

对苏联来说，新疆的动乱局面越早结束对它越有利。因为英、

日帝国主义插手新疆使它深为忧虑不安，一小撮分裂主义者在喀什以英帝国主义为后台，成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苏联极力反对未能奏效。英帝国主义者巧妙地利用宗教上层人士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感，争取到了一批人，加之来到喀什的不少反苏人士，都是来自苏联的反布尔什维克民族主义分子和武装土匪，对苏联也很不利。再有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的马仲英包围乌鲁木齐，其同盟军张培元占领了玛纳斯。省府一旦落入马仲英之手，在苏联眼皮底下建立亲日的马仲英的政权，这些都会使新疆出现对苏联更加不利的危险局势。

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向苏联表示反对帝国主义，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苏联当然求之不得。1933年5月刚上台一个月的盛世才，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前往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试探当时的总领事孜拉肯，向苏方暗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与苏联签定的“苏(联)新(疆)贸易协定”基础上与苏联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一心想把近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苏联自然喜不自胜，立即对盛世才做出积极反应。盛世才次日设家宴招待苏联总领事孜拉肯、副总领事甘宁等人，席间大肆宣扬自己学生时代便信仰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过研究，认为只有在共产党指引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为了骗取苏联领事对他的信任，他竟拿出逮捕共产党人时收缴来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革命书籍，用以伪装自己。

苏方对盛世才的表态似信非信，没急于对他做出什么承诺，想再考验考验他。可马仲英步步紧逼，盛世才急于应付，于是10月份再次派遣陈德立带一名叫姚雄的人直接去莫斯科，请求援助。

为观察考验盛世才，与新疆建立友好往来，苏联政府于11月份特任命熟悉东方事物、曾任塔什干外事局局长的格奥尔金·阿布拉莫维奇·阿布列索夫为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该人上任后，

盛世才极力逢迎，凡事都向他请教，对他百依百顺，言听计从。阿不列索夫被盛世才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对他十分信任，向苏联政府汇报时极力称赞盛世才如何重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虔诚信仰共产主义，如何可靠，使苏联政府最终落入盛世才设下的圈套，决定给他以军事、经济方面的具体援助。

1934年4月盛世才正式派人赴莫斯科提请援助。苏联政府为保障边境安全，援助了他一万军队的全部武器、服装和一批军用物资，希望他努力稳定新疆局势，尽快发展新疆经济，普及文化教育，加速建设一个文明富足的新新疆。

苏联政府大力支持盛世才，给了盛世才以无私援助，派陆军、空军出兵新疆给张培元、马仲英部队以致命打击，粉碎了马仲英对乌鲁木齐的包围，挽救了盛世才及其政府。总之，若没有苏联的援助，盛世才政权大约维持不到1934年。

盛世才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为消灭来自西方的外部势力，摆脱东方（日本）、南方（英国）的危险，我冒险求助于苏联，以解决新疆的危机——这才是我的根本目的。盛世才这些话真是不打自招。他居心叵测，用欺骗手段借助苏联势力抵制英国、日本的渗透，彻底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在新疆建立起一个军阀独裁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独立王国里他肆意奴役、屠杀新疆人民，妄图独吞那个令他垂涎已久的“金盘”。他统治新疆十年，在新疆推行一整套欺骗性的法西斯政策是他所作所为的最好证明。跑到台湾之后，为掩饰对蒋介石的不忠，他卑躬屈膝向蒋介石表功，胡说什么“是我保住了新疆，使新疆免遭外国侵略”，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如果他说“是我使用种种伎俩和屠刀镇压了新疆各族人民”，我看还算是实话。

盛世才投靠苏联并非心甘情愿，纯属迫于无奈。苏联红军击败马仲英部队之后，盛世才准备继续请求苏联帮助，而苏联方面自有

打算。那个阿不列索夫一上任立即会见盛世才，对盛说：“斯大林同志向您致意！苏联愿意帮助您平息新疆内乱，苏联政府支持您！”由此看来，斯大林相信盛世才，也要利用盛世才。但苏联方面仍留有余地，听说阿不列索夫当时曾对盛世才的一个同伙说过：“如果你夺取政权，我们也支持你。”不知何故，盛世才的同伙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去争夺政权。此话引自一位美国人写的名为《新疆是小卒还是大车？》一书（指象棋中的“卒”和“车”）我不知道那位美国人这句话源于何处，但我觉得这句话确实有可信之处，因为从当时的多种迹象分析，苏联方面相信盛世才，但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地步，他们是留有余地的。

然而，不管怎样，苏联政府在军事、经济上的确给了盛世才以大力援助，为盛世才武装了万余士兵的队伍，以后也继续不断地一直给这支队伍以无私的支援。

1935年初，斯大林派以自己内弟斯凡蒂孜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达乌鲁木齐，帮助盛世才制定改革计划，与盛世才签订了一份关于互助合作的协议书。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工作数月，于1935年5月16日双方签定互助协议书。按照协议，苏联方面向盛世才政府提供了价值四百万元的黄金（金币）贷款，派遣了大批顾问与技术人员来疆工作，为新疆提供了不少当时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积极扶植盛世才政府，帮助盛世才政府发展经济。当时新疆在经济、交通、采矿、文教、财贸等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不能不归功于苏联的大力援助。这些成绩对于当时新疆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具有重大

采取对策，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国军队很快打到莫斯科，苏联政府顾不上盛世才，盛世才自然也求之不得，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对苏联政府恩将仇报，发起攻击。盛世才的叛变对苏联政府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新疆人民也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第二章 “狼 种 猪”

上一章介绍了盛世才是如何上台，如何巩固政权的，这一章我将就盛世才执政期间如何实行法西斯专政向读者作一介绍。

盛世才在新疆建立和巩固了法西斯统治后，开始在政治、组织、经济、军事上大搞两面三刀，玩弄阴谋诡计。他在督办公署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上，先把推翻金树仁有功的二人当众逮捕，押至东花园执行枪决，然后才宣布开会。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向国民党政府示威（据说被枪决的陈中等人与国民党政府派往新疆的黄慕松关系密切），另一方面是他诬陷无辜、诛杀异己的开始。在他的淫威之下，会上无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在众人的“支持”下，盛世才登上督办兼省政府主席的宝座。从此，他肆无忌惮地大搞军事镇压，大搞特务活动，玩弄阴谋诡计，进行政治欺骗，建立军国主义政权，把“捧着金盘要饭的乞丐故乡”的“金盘”据为己有，使本来就愚昧落后的新疆再度后退，扼杀了这个“暴乱蜂起”之地的勃勃生机。这些就是盛世才统治新疆十年所做所为的概括。当时，迫于国际形势与新疆人民反独裁斗争浪潮的日益高涨，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法西斯面目加以伪装，把自己装扮成追随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步者，用以迷惑新疆人民、欺骗苏联政府。他的所谓“八大宣言”与“六大政策”正是为了达到迷惑新疆人民、欺骗苏联政府的目的而打出的招

牌。

盛世才及其追随者大肆吹捧“六大政策”是“英明的政策”、“伟大的政策”、“救命的政策”。于是，没过多久，盛世才便被尊崇为“伟大领袖盛督办兼主席”。人们听到盛世才的名字，会霍然起立，以示尊重。当然，广大人民群众是因为惧怕被他们的屠刀赶进监狱才不得不如此的，大家都清楚盛世才的特务、耳目防不胜防，不得不多加小心。

盛世才逃到台湾后在一本书中写道，经过三年的时间，新疆人民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安定、富足、幸福代替了混乱、恐怖、废墟与仇恨；粉碎了反革命逆流和外国侵略者；加强了民主，召开了民族（维、哈、蒙）代表大会……。这纯粹是盛世才在为自己涂脂抹粉，为自己实施欺骗政策进行辩解。诚然，新疆当时确曾有所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公路交通、文教卫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如兴办新学校，发展出版事业与医疗卫生事业，修建联接南北疆的公路，开辟汽车运输线、飞机航线，整顿财政，繁荣商业等等。这些发展从形势要求与人民需要来说，都只能算是初步的，但在新疆历史上却实在是不可低估的进步，它为新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成就都是在苏联政府的真诚援助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以及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取得的，绝不能记在盛世才的帐上。盛世才只是以玩弄阴谋诡计，用欺骗手段骗取了苏联的援助，“平定”了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建立大规模的特务网，训练大批自己的爪牙，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使得民族压迫与恐怖混乱比之杨增新、金树仁以至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统治新疆短短 10 年，盛世才这个刽子手竟灭绝人性地残杀了十几万无辜民众及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的英勇战士。三十年代的新疆简直成了盛世才屠杀无辜的屠宰场。为巩固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盛世才施展各种阴谋，干尽罪恶勾当。最为狠毒的是他巧

妙地利用特务网，炮制出所谓的“反盛谋叛”罪名，丧心病狂地诛杀异己。被诬背上此罪名者不少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进步人士，包括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不问政治的一般职员及普通百姓。

1937年至1942年间，盛世才连续制造了三次所谓“阴谋反叛案件”，在全疆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残酷镇压。

第一次镇压行动以1937年7月逮捕原呼图壁县令张柱高（音译）和米泉县一万姓地主开始，至逮捕教育厅厅长张馨、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把镇压推向高潮。

盛世才在这次镇压行动中，首先逮捕呼图壁县县令张柱高和米泉县一姓万的地主，强行逼供，令他们招认自己“阴谋反叛”，准备以“反盛世才阴谋暴乱者”立案入册。接着又逮捕了一批汉族官员，对其施行法西斯逼供信，强令这些人承认自己“奉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命，欲举行反盛世才的暴动”。在他的逮捕名单中，还有和加尼牙孜阿吉、马合木提师长、马虎山（原和田马仲英部师长）、沙力甫汗、冯梁（督办公署政法处处长）、毕力诺夫将军（白俄人）、张馨（教育厅厅长）、马绍武（民政厅长，原喀什道台）、阿宝（供销厅长）、黄汉章（省政府秘书长）、陈德立（伊犁专员）、包尔汗（土产公司总经理）、广禄（驻塔什干领事）、西力克（蒙族）等人。这就是说，此次镇压波及全疆各地，从伊犁、塔城、哈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专区的行政官员到省政府成员，甚至一般官员以及部分百姓均未得幸免。

简而言之，1937年可以说是新疆近百年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期。那时，每个新疆人，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以及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当时的新疆似乎偏离了历史的轨道，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阴谋、诽谤、刁难充斥人们的正常生活，被捕、被杀变成家常便饭。当时仅五百万人口

的新疆，每个角落都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处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或亲属被杀、被捕、被关押，或突然失踪，下落不明。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四处颠沛流离。这数不胜数的悲剧的制造者正是伪装进步，善以花言巧语蒙蔽世人的刽子手盛世才。

盛世才 1937 年开始大清洗，落得自己也不得安宁。他终日担惊受怕，一怕新疆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二怕自己的法西斯暴君面目被识破，担心“斯大林、毛泽东争取我的拥护，最终推翻我的统治”（盛世才语）。他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毛泽东进行试探，更加着意伪装，以蒙蔽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争取斯大林与毛泽东同志的信任。他肉麻地大肆吹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假惺惺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彻底博得斯大林的信任，他曾亲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据他本人所谈和一些资料记载，他竭力把自己装扮得非常“革命”，把自己乔装打扮得很“红”，以此争取继续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斯大林以前对他半信半疑，而他到达莫斯科，在斯大林面前做了一番出色的表演后，竟博得了斯大林的基本信任。据说斯大林接纳他为苏共党员，并几乎满足了他在经济、军事上的全部要求。

盛世才争取到莫斯科信任，减少了一些忧虑，仍作贼心虚。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十分惧怕新疆人民的进步力量，惧怕人民群众起来反对他。

1939 年，盛世才开始了第二次镇压行动。这次镇压从当年 9 月逮捕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一位姓宋的秘书开始，到 1940 年 2 月逮捕杜重远，把镇压推上顶峰。

杜重远以前来过新疆，回关内后写了一本名为《新新疆》的书，此书内容令盛世才惊恐不安。杜重远二次来疆，不愿接受盛世才的任命，只要求担任新疆学院院长。沈雁冰（茅盾）、张仲实、萨空了、陆贵宾、沈国文、赵丹等人为帮助振兴新疆文艺事业来到新疆，被

盛世才疑为是中国共产党派遣的“间谍”，盛还认为杜重远是“周恩来派遣的特务”。以“煽动学生闹事”为由，将陆贵宾、沈国文等人逮捕，胁迫沈雁冰等离开新疆。他诬陷新疆学院成立的“科学研究小组”是反对他的地下组织，企图将关内来疆的中共干部、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派来的干部依靠人民所开展的革命活动一举镇压。

正在盛世才担惊受怕，大行镇压之时，阿勒泰人民忍无可忍，率先发动了反对盛世才的武装暴动。盛世才认为有机可乘，借故乌鲁木齐有人妄图配合阿勒泰武装暴动推翻他的统治，策划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镇压。他先逮捕几个人，大搞逼供信，强令他们承认“阴谋反叛”，制造假案。他所谓的有力“证据”是杜重远的“自白书”，其实这是盛世才一手炮制的假自白书。根据这个假自白书，盛世才制造出了所谓的“反革命暴动组织”和“维吾尔斯坦组织”，基本核心人物如下：

敖远清（音译）（被诬为总策划者）

拉托夫（被诬为该组织顾问，当时该人是盛世才的私人顾问）

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

姚雄（伊犁专区专员兼司令）

程培兴（板房区区长）

阿不都拉大毛拉（建设厅长）

库尔班·尼牙孜（公安管理处副处长）

沙力甫汗（阿勒泰专区专员）

拜合蒂尤夫（白俄商人）

……

盛世才制造该假案后，又耍了一个滑头，即在逮捕与该案有关联的人员之后，向莫斯科作假汇报。斯大林、莫洛托夫怀疑其中有诈，派调查小组前往乌鲁木齐调查核实。调查组直接找到被诬为

“维吾尔斯坦组织”头目的库尔班·尼牙孜等人了解案情，经过充分调查分析，作出“此案纯系冤案，是盛世才手下一些人背着盛世才制造的假案，他们欺骗盛世才，有推翻盛之企图”的结论。

调查组确认此案为假案，却认为非盛世才所为，而是其部下背着他搞的。盛世才顺坡下驴，装出一副“吃惊”、“愤怒”的样子，发誓一定亲自“调查”、“处理”。他精心策划，与手下一名叫李英奇的帮凶一起，当着苏联调查组的面提审了十几名主要案犯，目的是要说明调查组审案有误，要调查组亲耳听到案犯翻案的口供，承认过去他所作的结论正确无误。被提审的人中，有八人承认此案并非冤假错案，盛世才的结论是正确的；其他四人却坚持为苏联调查组提供的事实，坚持此案确系冤假错案。这四个人一出审讯室立即被杀了头。那八个人当时虽保住了性命，最终却没能逃脱被枪杀的厄运。据当时一知情者证实，公开审案之前，盛世才先进行过一次秘密审讯。十二人被带至一间漆黑一团的审讯室，亮灯后，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几个手持屠刀、荷枪实弹、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这些刽子手威胁他们说，公开审讯时，若胆敢坚持为苏联调查组单独调查时提供的口供，他们的脑袋就会在这间屋里从他们的头上搬家。

玩完这套把戏之后，苏联调查组的三人中有两人相信了此案确实存在，只有一人不相信，断定问题定出在盛世才身上，并将调查情况连同自己的分析给莫洛托夫写去一份书面汇报。盛世才诡计多端，也向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呈送了一份很长的书面报告，后附案犯的两的口供（全部译成俄文）。斯大林见到盛世才的报告，完全被盛的花言巧语所蒙蔽，竟毫不怀疑地相信盛世才所言是实。从此，盛世才倚仗苏联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全疆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活动。

1939年开始的大规模镇压至1941年2月结束。伊犁、和田、哈密等专区的行政长官与群众计万余人被投入监狱或关进“反叛

集中营”。这万余人中大部分被视为“危险分子”惨遭杀害。盛世才逃到台湾后写的一本书中说“那次逮捕 481 人，枪杀 59 人”，完全是一派胡言。这个数字不及盛世才实际杀人数目的百分之一，铁一般的事实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了的：

了解盛世才的一个美国人说：“盛世才是个患间谍狂症的病人。”此话不无道理。当时到过新疆的另一位美国人说：“盛世才给我讲述他反阴谋诡计，反间谍活动的故事，我觉得毫无价值。他讲话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尊重事实的正常人一听便会听出那都是些莫须有的神话。”从以上两位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评述中，盛世才的嘴脸与品性可见一斑。

第三次镇压发生在 1942 年。这次镇压始于当年 3 月 19 日盛世骥（盛世才四弟，机械旅指挥官）被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囚禁、被残杀使这次镇压达到高潮。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形势极为关注。盛世才政府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对新疆问题更加关切。当时莫斯科（第三国际）派干部来疆帮助工作，中国共产党由于长征和忙于建立延安抗日根据地（时值 1934—1936 年间）无法顾及新疆。待条件稍微允许，中国共产党即从延安派干部来到新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成立了“八路军驻疆办事处”。在其领导下，来疆的中共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盛世才，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搞统一战线，利用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尽可能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进步事业，逐步解放新疆人民。

当时新疆有不少中共负责干部，如滕代远、邓发、陈云、李先念、周小舟、李云阳、林基路、王献堂、黄火青、毛泽民、陈潭秋等。1937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方面军西进部队的李先念，程世才、顾天民、李天涣等同志率四百多名官兵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成立“新兵营”，对新兵进行军事、政治方面的培训（教练与学习）。作为

中共在新疆的组织机构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兵营，在领导群众，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少负责干部在政府、军队与“反帝会”组织中身居要职，他们占据报刊宣传、教育、经济等部门的重要阵地，作了大量工作。

1938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往新疆派遣一百多名干部，安排在财务、经济、文教等重要部门协助工作。陈潭秋（总负责）、毛泽民（负责财务）、林基路（负责文教）、王保群（来自莫斯科，负责报刊杂志及宣传）、黄火青（负责“反帝会”组织）等同志为基本领导核心。1938年至1940年间，中国共产党派往新疆工作的上述同志在新疆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1. 以妥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原则；
2. 培养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
3. 整顿财经制度；
4. 减轻群众的赋税负担，逐步改善群众生活。

通过上述工作，唤起了新疆人民的觉醒，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当时培养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干部在财经文教战线努力工作，取得了卓越成绩，在新疆历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赴苏留过学的一批干部，在以后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在三区革命中和全国解放后，那些接受过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民族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疆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盛世才当时一方面迫于形势，一方面为了伪装进步，在对中共干部进行的革命活动初期未加干涉。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越来越深入人心，成绩越来越显著，盛世才越来越难以容忍，觉得对

巩固他的法西斯专政统治是个威胁。他为此惊恐不安，终于确定实施 1942—1943 年对新疆共产党干部大逮捕、大屠杀的法西斯政策。

这次阴谋行动始于 1942 年 3 月 19 日盛世才暗杀自己的亲弟弟盛世骥。盛世骥留苏学过军事政治，反对盛世才的法西斯统治，被盛世才视为“危险分子”。盛世才阴险毒辣，想一箭双雕，既可除去自己的眼中钉，又可将杀害弟弟之罪名嫁祸于共产党人。他认为人们不会怀疑他会杀死自己的亲弟弟，而肯定相信他的谎言，相信盛世骥之死是共产党人所为。他派人深夜将盛世骥暗害于家中，然后嫁祸于弟媳，强令弟媳供认：“人是我杀的，是拉托夫（苏联顾问）指使我干的。”据此，盛世才逮捕数人，施行逼供信，强迫他们编造出一份“推翻盛世才及其政府，建立新政府组织”的花名册。根据名册，逮捕了拉托夫（该人以后返回苏联）、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几乎所有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工作的干部，实行软禁。对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党人，能关押的关押，不能关押的驱逐出境。盛世才反动之极，凡被他视为共产党员、共产党追随者或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进步人士，他一个也不放过。1943 年，盛世才残酷杀害了以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为首的一批优秀中共干部。盛世才供认：“此次逮捕了阴谋反叛者 656 人，处死 88 人。”如此轻描淡写，意欲掩盖这次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实际上，这次的行动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大屠杀，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盛世才穷凶极恶，有恃无恐，对知识分子，新疆学院的教师、学生与成百上千的无辜群众进行集体逮捕，激起了全疆人民的强烈愤慨。

中国共产党人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抗争。他们以绝食和其他方式开展了抗议盛世才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及无辜群众的斗争。没等盛世才将全体共产党人与其他民众斩尽杀绝，张治中便接任新疆省主席，于 1946 年 6 月将幸存者全部释放，130 多名共产党人

有幸获释，返回延安。

盛世才企图通过这次大屠杀建立一个像一位美国人评论的那种“伪装独立的军阀政权”，然而其恶劣行径却从反面加速了他的垮台。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开展工作，撒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为新疆各族人民指出了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新疆人民的自由解放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活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

说实话，我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与向往，正是从当时目睹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之后开始并加深的。在苏联学习期间，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过初步的感性认识，但没达到以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的程度。在苏联学习时，学校没给我们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听说是盛世才的意见），回新疆后，我没有机会同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发生关系，但他们忘我的工作态度，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热情关怀与真挚帮助，强烈地影响和触动了我。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理想，使我深受启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以至最后决心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榜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听到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遇难的消息，正是我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我为此感到深切的悲痛，对盛世才枪杀如此优秀的中共干部的罪行感到万分的愤慨。

盛世才第一次在新疆进行大清洗时，我对盛世才毫不怀疑。因为盛世才上台后平定了新疆的动乱，做过一些进步的事，散布过一些进步思想，对我影响很大。随着时光流逝，盛世才的反动面貌暴露了出来，他逮捕枪杀的范围越来越大，为他卖命效力，对他上台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竟也不能幸免一死。这些事实开始动摇了我对盛世才的好感。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的被害，使我彻底认清了盛世

才反动的法西斯真面目，认识到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巩固其反动的独裁统治而伪装的，盛世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伪君子，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

三区革命后，有个人给我念过陈潭秋和邓发同志对盛世才的一段评价。他们说，盛世才“按其出身讲，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大军阀；按其思想讲，他时刻妄想当土皇帝；从其行为讲，他是个‘狼种猪’。”这个评价，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他的真实嘴脸。盛世才狰狞的刽子手本质的确如同一只凶残的恶狼，而他却又愚蠢得像一头猪，说他是“狼种猪”，实在太恰当不过了。

1951年我病休时，一位同志给我读过一本历史书。听到明朝始祖朱元璋上台后大杀皇室异己的一段记载，我一下联想到盛世才，想到盛世才上台后在新疆的三次阴谋大屠杀。我在此并非把盛世才与朱元璋相提并论，朱元璋是十四世纪统一中国，建立明王朝的皇帝，而盛世才不过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一个小小的地方军阀，然而在清除异己方面，二者采取的残酷手段却是惊人的相似。

在盛世才接二连三蓄意制造冤假错案的年代，弄清事实真相是非常困难的。但正如俗语所说，“纸里包不住火”，朱元璋诛杀异己的秘密保守了整整一个世纪，仍然败露了，而盛世才的阴谋伎俩在他尚未离开新疆之前便已暴露无遗。解放后，对这些秘密则挖掘得更深透，更彻底了。

那次病好之后，我决心详细了解一下盛世才玩弄阴谋诡计的真相。病休从时间上给我提供了便利条件，我的工作则从客观上给我提供了查找资料、向人调查的方便。我与许多知情人士交谈，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

在研究过程中，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盛世才在他一手制造的三次阴谋案件中，竟能把世界的东方与西方、把帝国主义的日本与社

会主义的苏联、把中国的卖国政权与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中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把共产党与国民党搅合在一起，巧妙地与亚洲腹地新疆相联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把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政治观点、政治信仰别有用心地、人为地结合起来，为他所用，真不能不承认是一大奇迹。在这方面，盛世才不能不说是个“天才”。

盛世才虚伪，奸诈的丑恶嘴脸，在 1942 年暗杀其胞弟盛世骥后，同时写给苏联与国民党当局的两份报告中暴露无遗。给苏联的报告中，盛世才写道：“阴谋家们正在筹建一个反苏政权。”给国民党的报告中却说：“阴谋家们正欲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如此胆大妄为地蒙骗两个世界瞩目大国的最高当局，实属罕见，充分证明盛世才是一个不折不扣、阴险狡诈的政治骗子。

有时我突发奇想：若在当时苏联当局与国民党当局互相交换一下盛世才给双方呈送的报告，那么对盛世才、对国民党当局，对苏联当局将会是一个多么辛辣、多么耐人寻味的讽刺呵！

第三章 撕破伪装投入蒋介石怀抱

盛世才撕破伪装，法西斯面目原形毕露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国际上失去苏联的支持援助，国内被排斥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进步人士对他的声讨，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阿勒泰地区反对盛世才政权的武装暴动使他走投无路，孤立无援。除了投靠蒋介石，盛世才已无路可走。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盛世才的“迷途知返”大喜过望。蒋介石早就暗示盛世才从“追随苏联、赤化新疆”的迷途中回头，如今盛世才“回了头”，蒋介石喜不自胜，当即表示“既往不咎”，

派夫人宋美龄亲赴乌鲁木齐与盛世才举行会谈，以示关怀。蒋介石深知盛世才诡计多端，嗜血成性。为了夫人的安全，他派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忠信、梁寒操等担任宋美龄的随从，自己则亲赴酒泉坐阵，命令八战区全部战斗机做好紧急战备。这样做的目的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宋美龄与盛世才谈判时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也在给盛世才施加压力。

盛世才非常理解蒋介石的居心与自己的处境。一个欲称霸全国，一个要称霸新疆的中国两大军阀，在1942年秋举行的会谈中，各自动用一切手段下了赌注。盛世才接受了蒋介石对他的任命，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担心蒋介石吞并他的部队，故未表态交出部队，并入国民党“中央军”，也未请蒋介石的军队进疆。盛世才投靠蒋介石的条件是坚持新疆“独立王国”的现状，由蒋介石提供兵源。国民党上层会谈代表宋美龄、吴忠信来疆后亲眼目睹盛世才的困境，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提出与盛世才的要求截然不同的意见，即新疆必须建立国民党省党部，盛世才要服从省党部领导，同时暗示他不许“中央军”进疆绝对办不到，他在新疆称王称霸的时代即将结束。据有些资料介绍，对这次会谈，蒋介石非常重视，在酒泉向宋美龄部署战略，认为从盛世才手里夺回新疆没有问题，但不可操之过急，要先把他稳住，然后安排他在中央当个部长就算达到目的。胸有成竹的宋美龄恰到好处地利用了盛世才的困境，委婉地表示了国民党方面的意思，盛世才理解国民党方面的居心，没有固执己见，与宋美龄以及后到新疆的朱绍良（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就下列问题达成了协议：新疆建立从国民党省党部到各地的基层国民党组织；新疆选送干部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进行轮训，接受关于有关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新疆与内地各省加强物资交流；在对外政策方面，新疆与国民党政府步调一致；新疆内部立即进行对反国民党的思想及反国民党人士的大清洗等等。截至

1942年底，南京来疆的国民党人士达数百人之多。盛世才翻脸不认人，要苏联撤走全部干部、专家及一切援建人员，废止使用一切亲苏口号，撕毁全部张贴在各种场合的亲苏标语，公开了自己的反苏反共立场，彻底暴露了其法西斯暴君的反动面目。

在盛世才的再三要求下，重庆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政府提出了种种要求，迫使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全部干部、专家、顾问，最后连驻守哈密的红军第八团也撤离哈密回国。国民党官员随着苏联人员的撤离陆续来到新疆，进入各要害部门。朱绍良、文翁风再次进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随之而至，梁寒操、何经武（音译，空军将领）、毛邦屈（音译）等亦接踵而来。

这个1942年元月份还自诩是斯大林忠实信徒的盛世才在年底便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的忠实弟子，开始了其反马克思主义，反苏反共的反革命生涯。过去他口口声声叫喊“三民主义不实用，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解放全世界”，此时却煞有介事地宣扬什么“经过十年的研究实践，终于得出拯救全世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精神力量并非马列主义，而只能是三民主义的正确结论。”至此，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在新疆人民和全国人民面前。

盛世才变化之快令人惊异。1940年他提出了“六大政策”，并以此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提并论；1941年向苏联政府提出，新疆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1942年2月4日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要求中国共产党给他派顾问协助工作，而1942年7月，便彻底翻脸，走上了反苏反共的反革命道路。盛世才何以转变如此之快？原因正如以上所谈，他是个阴险狡猾的政治投机商，当他孤立无援，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他的政府时，他乔装打扮，骗取苏联的信任与援助，巩固了政权；当他看到国际上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战争陷于暂时困境，国内蒋介石反动集团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围剿”，貌似强大时，又摇身一变，投靠蒋介石怀抱。盛世才的表演可谓淋

漓尽致，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就入木三分了。

随着盛世才镇压中共干部、进步势力，排挤苏联专家、顾问，安插国民党反动分子担任政府要职，美国也开始向新疆渗透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 1942 年来到新疆，1943 年第一次在乌鲁木齐设立美国领事馆。不久，英国也在乌鲁木齐设立了领事馆。重庆政府把在他们扶植下以反苏反共著称于国内外的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派回新疆。美、英驻疆领事馆大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上述一帮维吾尔、哈萨克族败类，在新疆大肆进行了一场反苏反共的活动。美帝国主义终于使自己梦寐以求往新疆渗透的梦想变成了事实。新疆人民也充分认识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1943 年元月，新疆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盛世才任主任委员。为表明心迹，盛世才凶相毕露，杀害、拘捕、软禁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甚至于家属，还翻印出版了不少在内地早已没有任何市场的国民党宣传小册子。盛世才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北疆各地相继爆发反盛武装斗争。国民党政府对他只是利用，并不给以真正的支持。结果这个骑在新疆人民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十年之久的“土皇帝”再也无力回天，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法西斯专政统治了。

1944 年 9 月，盛世才被国民党政府调任中央农林部长，结束了他在新疆十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盛世才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新疆的悲剧却未因盛世才的离去而告结束。指责盛世才黑暗统治，却以美国为后盾、步盛世才后尘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凶残地镇压群众，重演了一幕幕盛世才时代的悲剧。事实证明，蒋介石与盛世才纯属一丘之貉，毫无二致。

为巩固在新疆的统治，蒋介石采取了不少措施。他首先想解决的是新疆的民族主义问题，指导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他抛出《发展

西北规划》一文，其中有关于新疆问题的重点论述。他决定派一万名国民党官员携带家眷计五万余人赴疆支边，同时拨发数目巨大的款额。1943年国民党省党部成立之后，新疆政治、文教机构基本上全部由国民党汉族官员把持，少数民族干部被排斥在外，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

蒋介石还极力推行荒谬绝伦的所谓“同宗、同种、同族”的民族政策。按照他的逻辑，新疆以维吾尔族为首的诸穆斯林民族与非穆斯林民族同汉族原属同一种族。利用其反动的民族政策，蒋介石在新疆干了一系列旨在进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诬蔑少数民族、扼杀少数民族文教事业的勾当。

政治上，国民党极力宣扬三民主义，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大肆拘捕枪杀共产党人及拥护共产主义、为少数民族解放自由仗义执言的进步人士。

经济上，国民党一方面增加赋税，加紧掠夺百姓，一方面制造财政混乱，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关内大批汉族奸商乘机来到新疆，大发不义之财。与苏联断绝关系后，新疆工业处于瘫痪状态，人民只能依靠手工业产品满足生活所需。国民党寄希望于美国，要求美国派人来疆支援。华盛顿“中国金融委员会”代表和美国地质勘探团先后应邀来到新疆。他们真是为振兴新疆经济而来吗？还是引用一位美国记者的话来回答吧：“美国这种经济援助不值一提。美国人来疆的目的不是为经济，而是为政治。”

前面我介绍了盛世才统治新疆十年，伪装进步，推行军阀大屠杀阴谋政策的实质。现在，“盛世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盛世才究竟应当如何评价”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盛世才究竟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因此这次我把此作为重点进行了一番考证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立场的人看法截然不同。国民党大民族主

义反苏反共分子认为，盛世才是有过错，但他保住新疆没有落入苏联之手，确是他的功劳。持这种观点者显然是在为盛世才辩护。有人认为盛世才是个人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认为盛世才也还做过不少好事，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估计形势失误，才成为反动分子。持此种观点者大有人在，以前我也是其中之一。经过认真的研究分析，我最终否定了此种观点。

盛世才自我评价说：“最早我在思想上、信念上相信苏联政策是正确的，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以后苏联对我玩弄阴谋伎俩，蓄谋杀害了我的弟弟，使我有所觉悟。我由此开始反苏，与苏联断绝了关系。”这完全是在为自己辩解，开脱罪责。他在与苏联关系的态度改变方面为自己辩护，却只字未提自己是如何残酷杀害十几万无辜进步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可见他是何等的作贼心虚。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参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盛世才《赤色分子在新疆的失败》等反面材料。经多方调查分析，我得出了如下看法：

盛世才绝非先进步、后蜕变为机会主义分子或反动分子。他原来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幼接受反动的军阀主义教育，为军阀主义效劳，在日本期间更加系统地学习了军阀主义思想理论，滋生了权利欲。从日本回国，在贺耀祖部队及蒋介石总参谋部就职期间，为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往上爬的欲望，他野心勃勃，多方寻找机会，却未能找到。来新疆后，他觉得新疆正是他大展宏图之地。为达目的，他对金树仁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积极参与对哈密、吐鲁番农民暴动的血腥镇压，以各族人民的尸体为人梯向上爬。1931至1933年初，金树仁反动政权在波澜壮阔的人民暴动的沉重打击下走投无路，日暮途穷，盛世才认为时机已到，借助“四一二”政变大耍两面派手法，对金树仁政权取而代之。上台后，为实现其在新疆建立独立王国的黄粱美

梦,他假意靠拢苏联,乔装打扮出一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面孔,骗取了苏联的信任与支援。迫于形势的压力,他也多少做过一些好事,然而他所做的这些好事绝非出于心甘情愿,而只是为了迷惑群众,掩盖自己的法西斯本来面目,是不得已而为之。盛世才的所作所为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切。

我认为,盛世才是新疆近代史上举世无双的最大的吸血鬼、刽子手。过去他以此令人诅咒的恶名闻名于世,今后也必将永远以这种令世人诅咒的恶魔形象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四章 阿图什的新兴教育事业

1934年,阿图什掀起了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兴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在阿图什历史上,喀什历史上,而且在新疆历史和维吾尔族历史上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二十世纪初,在阿图什和以后伊犁、塔城、吐鲁番等地创办新型学校,是新疆教育启蒙运动的开始,是新疆教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尽管这场教育运动波及面窄,时间短,却为以后新疆的新兴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这次的新兴教育运动与二十世纪初那场运动相比,波及范围广泛,涉及内容丰富,兴办速度迅速,充满勃勃生机,是盛世才政权建立以后全疆范围内开展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教育运动。

1934年夏,喀什局势基本稳定,军事行政机构得以整顿,经济、文教事业开始被重视。麻木提师长在几位土耳其人士的帮助下开始酝酿掀起一场新兴教育运动。

1934年春,在麦吉丁先生带领下,十二名土耳其人来到阿图什。

我要介绍的阿图什新兴教育运动正是这十二名土耳其人当中一位名叫麦买提力先生(笔名为台尔菲克)的人带头掀起的。麦买提力先生是我大姑的儿子。年轻时,为寻求知识,离家去北疆,经塔城到苏联塔什干,边做工边读书。中等学校毕业后进入一所大学深造,后因生活困难辍学,四处打工维持生活。在黑海之滨,他结识了一名土耳其海员,随那名海员一起到土耳其谋生。据他本人介绍,在土耳其他饱尝了生活之艰辛。为糊口,他打短工,干杂活,什么苦都吃过。一家餐馆老板见他能弹奏弹布尔琴,会唱歌(他原是弹唱好手,一把弹布尔琴不离身,从喀什一直带到土耳其),便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在餐馆弹唱助兴,以招揽顾客。以后他与当地琴师歌手结识,生活日益得以改观。餐馆老板为感激他帮助自己得以生意兴隆,将他推荐给当地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帮他进入一所大学深造,学习期间,他成绩优异,并加入了“土耳其青年统一党”,积极参加该组织的各项活动,受到当地年轻人的爱戴与尊重。据他介绍,一次“土耳其青年统一党”召开大会,会上请他讲话,他没有准备,感到很为难。后来灵机一动,从台下找来一把弹布尔琴,为自己写的诗谱上曲,便自弹自唱起来。他写的诗内容如下:

我们维吾尔子孙有明亮的眼睛,
我们的道路布满荆棘,路途遥远。

世世代代我们在暴君手下受苦受难,
为了自由解放,我们的鲜血把江河尽染。

如今,我们的家乡是痛苦不堪的地狱,
我们无家可归,似一只只离群孤雁。

他的弹唱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从此他被誉为维族琴师歌手。听说家乡爆发了群众暴动，他热血沸腾，在强烈的爱国激情的驱使下，他与几个土耳其人一起受青年组织派遣回到新疆。

当时我正任专员公署秘书。麦买提力先生找到我，劝我同他一起回阿图什，别当什么秘书了。我问他回阿图什做什么，他告诉我回去办学。我欣然同意，便与他同乘一驾马车回到阿图什。在路上他给我讲述他的经历，告诉我他年轻时在新疆饱尝生活苦难，去塔什干学习未能如愿，以后去土耳其如何受苦，如何求学等事。他对我讲述去阿图什办学的设想及计划，使我深受鼓舞。他要求我到阿图什后物色几位头面人物支持他开展工作，要我拟定一份可靠的年轻人名单。

到了阿图什，我约请几位进步的开明人士及一些年轻人，用大约一周的时间商议如何遵照麦买提力先生的计划开展工作。麦买提力先生的计划分两部分，均需尽快准备。一是开办短期师资培训班，二是在阿图什二十四个乡镇各建一所学校，共需办二十四所学校。两套计划打算在六个月内准备就绪落实。实现此计划既重要又紧张，我们情绪颇高，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虽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能否完成任务有些疑虑，但在麦买提力先生坚定不移的气概与雷厉风行的作风感染下，个个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工作，使师资班很快在下阿图什的阿扎克乡一所经文学堂里办起来。麦买提力先生召集若干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有钱的开明人士组成校委会。我动员几个知心好友同我一起，挨村挨乡，挨门挨户招收学生。仅用两周时间，我们的师资班便胜利开课了。

这期短训班共招收了六十名求知欲强，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学员。学员吃住在经文学堂，伙食及其他一切费用均从有钱人家募捐

还是该短训班惟一的一名教师。他为学员们开设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每天上六节课。课余时间备课，了解学员思想动态，管理学员生活，与校委会研究工作等，忙得不亦乐乎。除教授上述课程外，他还带领学员进行体育锻炼。每天上午一小时，下午课后一小时为体育活动时间，通过体育锻炼增强学员体质。麦买提力先生像上满弦的发条，师资的工作原已占了他的全部时间，而为了更好地搞好学校工作，他不辞劳苦，把自己的休息时间也全部用在了工作上。他经常是晚上顾不上吃饭便怀揣干馕，骑马出发，连夜与家长、校委会成员商讨学校建设事宜，抽空向有钱人募集办学经费。累极了，便随便找个地方睡上一觉。有时为赶回学校准时上课，他可以彻夜不眠。我们经常发现他由于缺乏睡眠而眼圈发黑，眼中充满血丝，露出一副疲惫不堪的神色。然而他从不叫苦，总是情绪激昂地给我们讲述某某村建起了学校，他办学的计划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讲述起来，他神采飞扬，一扫疲惫不堪的神情，令我们又感动又心疼。麦买提力先生乐观的情绪与坚韧不拔的干劲，给了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决心勤奋学习，不辜负麦买提力先生的一片苦心。在师资班学习期间，我们每位学员都干劲十足，收获很大。

实现创办二十四所学校的计划，既宏伟又紧迫，困难相当不少。但由于大家同心协力，忘我学习，勤奋工作，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圆满完成了师资班的学业。在麦买提力先生带领下，我们六十名刚毕业的学员，走村串乡，奔赴各自的岗位。接受那些世世代代没受过教育的平民子弟入学，在当时无疑是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令人感到鼓舞，为之激奋。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既在二十四个乡建起了二十四所学校，又为这些学校培养配备六十名教师，接收近万名学生入学的事实莫说当时，就是今日看来谁能不承认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呢？

应当指出，这个奇迹确实来之不易。相比之下，解决物质、经

济、组织方面的困难还算容易一些，因为社会各界、学生家长、校委会成员、开明世绅等对办校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使物质方面的一系列困难比较顺利地很快得以解决。令人感到棘手的困难是如何对付落后与进步，宗教迷信同科学文化之间的斗争。部分毛拉、阿訇代表的落后的宗教势力以种种手段对这场运动极尽反对破坏之能事，是新兴教育运动开展过程中的极大阻力，斗争相当激烈。

师资班开办起来，学校建设工作刚刚开始，反动分子与保守的宗教人士便立即跳将出来，挑拨离间，造谣诽谤，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胡说我们是“短尾巴”，是“渎神者”，说我们要开办意在“消灭宗教的布尔什维克学校”，诬蔑我们是些“短尾巴，长头发，没胡子的异教徒”，标榜自己是在“保护神圣的伊斯兰教”。

在一些宗教人士眼中，我们这六十名师资班学员是一个反宗教的小集团，是一伙宣传布尔什维克的“短尾巴”。一时间，我们成了令人感到神秘可怕的人物。我们的打扮确实与众不同，我们都穿短制服，腰间不系缠腰巾，留发，刮胡须，戴新式帽子，唱新歌，走路来雄赳赳、气昂昂，言谈举止显然与一般百姓不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年轻人支持我们，学生家长支持我们，绝大多数群众也支持我们，对我们心存芥蒂的只是少数反动分子与那些居心不良的宗教人士。这部分人见他们的宣传鼓动奈何我们不得，对新兴教育事业的破坏与阻挠便升级了。斗争日益尖锐化，公开化。有些未竣工的校舍，在他们的威胁之下被迫停工，许多学校面临着停课的危险。对教师或隐蔽或公开的辱骂与殴打时有发生，到后来，麦买提力先生的生命安全都到了无法保障的地步。此时若得不到政府与部队的有效支持，这场新兴教育运动就要落得个前功尽弃的下场。

为与反动分子做斗争，保证新兴教育运动的顺利进行，我们派

人去喀什向麻木提师长求援。麦买提力先生准备率六十名青年教师向麻木提师长请愿。麻木提师长得知麦买提力先生欲前往请愿，捎话要求暂不要去。我们没听这一套，停课一周做请愿准备，学唱歌曲，操练队伍，制作新式的统一服装等等。我们还排练了一个以两人说唱的形式，控诉破坏新兴教育运动顽固派罪行的小节目。我们终日在教室学唱歌曲，在室外进行操练，俨然一支充满活力的宣传小分队。

不到一周，一切准备均已就绪。出发前，男女老少众乡亲纷纷来到我们的驻地欢送我们。人们都很激动，有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我们的队伍威武雄壮，情绪高昂激奋。队伍成四路纵队前进，排头的小伙子高举着一面画有火炬图案与“探索者”字样的红旗。两名大鼓手，两名小鼓手，两名唢呐手，一名吹笛手组成的乐队紧随其后。他们高奏激昂的进行曲，鼓舞大家奋勇向前。我们的服饰新颖别致，上身一律穿草绿色土布缝制的翻领双兜衬衣，腰束皮带；下身是草绿色马裤，头戴黄绿色大沿帽。我们左手持铅笔、书本，右手高举长短一致、一尺来长自制的式样漂亮的“探索者棍”。我们朝气蓬勃，充满自豪感，挽着袖子，高昂着头，挺起胸膛，高唱战歌向前进，真像是一支出征疆场的士气高昂的军队。我们所唱歌曲的大意为：

我们是勇敢的探索者，
我们心明眼亮，意志坚强。
满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
我们奋勇前进在大路上。

努力学习，年轻的探索者，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们热血沸腾。

世世代代我们生活在暴君的魔爪之中，
徒有雄心，却不能为国为民献上一片赤诚。

我们要砸碎束缚我们的桎梏，
迎着太阳，向着光明，
努力学习，我们年轻的探索者，
为了祖国，我们热血沸腾。

我们生活在血染的大地上，
为了祖国我们甘愿奉献全部力量。
我们行进在自由解放的大路上，
义无反顾，奔向前方。

努力学习，我们年轻一代探索者，
为了幸福，我们热血沸腾。

.....

我们这支队伍高唱战歌，离开家乡，大踏步向库玛勒山进发。麦买提力先生在稍后处与队伍并排前进。我走在队伍中间领唱战歌，高呼“一一二一三一四”的口令，统一队伍的步伐。

在无人处或戈壁滩上行进，我们走得较为随便。一旦临近村落，我们立即改变为威武雄壮的步伐。经过白西克兰木、阿瓦提，傍晚时分到达阿帕克霍加墓（即香妃墓）。麦吉丁先生及麻木提师长的两三个部下在此迎候。他们劝麦买提力先生暂不要进入喀什县城，返回阿图什等待答复，说这是麻木提师长的意思。为何不让我们去喀什，我当时一点不明白，只记得麦买提力先生坚决不答应。次日清晨，我们不顾那几个人的百般阻挠，坚定不移地向城里进

发。我们仍如出发时那样，队列整齐，步伐坚定，朝气蓬勃，声势浩大。接近喀什县城时，城里冲出一队骑兵，阻止我们前进。走在前面的一位军官翻身下马向麦买提力先生走来，传达麻木提师长的命令。原来这队骑兵是奉麻木提师长之命专门来接我们进城的。我们欣喜若狂，刚才的忧虑与不快一扫而光。骑兵们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队前带路，两部分分别在我们队伍两旁护送。我们在骑兵队伍的护卫下前进更觉神气，浩浩荡荡，歌声嘹亮，步伐矫健，一直随骑兵队伍进了喀什城。在通往麻木提师长驻地的路两旁，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好奇的人们，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常。军乐高奏，响彻全城，把我们乐队奏出的乐曲声完全压倒。麻木提师长的武装士兵列队欢迎，从新城门附近麻木提师长司令部前面的广场一直排到大院内，一支庞大的军乐队列队站在大门口高奏欢迎曲。我们高唱战歌，步伐坚定，列队进入司令部大院，麻木提师长率众官员亲切地迎候我们。大院南面有个带凉棚的高台，麻木提师长登上高台致简短的欢迎词。他很激动，虽然话未刻意修饰，但确实非常诚恳热情。对我们的真心支持使我们非常兴奋，但我们似乎还不太满足。按照麦买提力先生的计划，我们此次要争取得到他切实有效的帮助。麻木提先生致完欢迎词，麦买提力先生上台进行简短汇报。麦买提力先生说：“保守势力阻挡我们前进，我们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还慷慨激昂地朗诵了自己写的诗：

啊，我美丽的故乡，
在你明亮的眼睛里，
闪烁着美好的希望。
然而，你的上空，
常常乌云密布，挡住阳光。

时光流逝，日转星移，
经过战斗的洗礼，
你造就了无数英雄儿女。
你用甘甜的乳汁，
哺育我们健康成长。

为科学进步，
为故乡繁荣富强，
我们杀上教育革命的战场。
愚昧落后，
妄想把我们前进的道路阻挡。

我们决不退缩，
不屈不挠，勇敢顽强。
啊，故乡的父老乡亲，
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盼望着你们热情相帮。

为了实现美好的希望，
我们将誓死抗争，决不投降。

.....

麦买提力先生满怀激情的朗诵博得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一下台，麻木提师长立即迎上前与他紧紧握手，请他一起就座。全场群情激昂，气氛热烈。此刻，人们恨不能把阻挠新兴教育运动的顽固派撕个粉碎。麦买提力先生和我们得到了众人的尊重与爱戴。

接着，双人表演开始。名为演节目，不如说是二人对话更恰当。

我们当时情绪极佳，动作大方，表情生动，声音洪亮，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要说登台演节目，我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要说在这种场合，登这种讲台演讲，我更是生平第一次。之所以取得成功，大约是全场热烈的气氛使我产生了空前激情的结果。

演完节目，由买买提·胡赛音同学登台讲话。他热情地宣讲了阿图什新兴教育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师资班取得的巨大成绩，乡乡村村办起学校的经过，宣传开创学习新知识的重大意义。当他振振有词地讲到：“让我们拿起书和笔，为了科学，为了进步，勇敢前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时，我从同学当中霍然起立，高举双手喊道：“请停一下！”全场听众不知我要做什么，都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不管众人如何看我，只是以军人的坚定步伐登上了讲台。我左手握着书和笔，右手紧握探索者棍，对买买提·胡赛音同学高声说：“你的话前面都对，但最后一句我不同意”。人们对我的话不理解，更加惊异地看着我。我请买买提·胡赛音同学站到一边，便激动地面向全场听众讲起来：

“是的，为摘掉愚昧落后的帽子，为我们民族光明进步的未来，我们勇敢地迈出了伟大的一步。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父老乡亲期待着我们继续前进，可我们遇到了反动顽固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像恶狼一样凶狠，他们对我们咒骂、殴打、诽谤、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下陷阱，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们要杀害我们，要纵火烧毁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创建的学校。然而我们决不低头，决不退缩。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得到你们的真正支持与实际帮助……”

听我讲到这里时，麻木提师长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愤怒，霍地从座位上站起，高声发问：“谁胆敢反对？反对你们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回答说：“反对我们的是一部分喀孜、阿吉、穆夫蒂、阿訇、伯

克、巴依、食客，吸血的恶棍。他们辱骂我们是‘渎神者’、‘短尾巴’，说我们要消灭宗教，这纯属诬蔑。我们没破坏宗教，相反，我们是保护神圣的伊斯兰教的，我们是在履行圣人关于‘所有男女穆斯林都有受教育的义务’的圣训。我们的目的是使人民从蒙昧状态苏醒，摆脱愚昧，争取文明进步。为此，我们的人民需要知识，需要学习，需要学校。现在我们遇到了困难，有人阻挡我们前进，我们请求尊敬的长辈麻木提师长给我们力量，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

说到这里，全场一片沸腾。人们议论纷纷，似乎都被我的话所打动，被我的激昂情绪所感染。我愈发激动，满怀深情地朗诵了麦买提力先生教的一首诗，结束了我的讲话。记得那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为了祖国繁荣富强，我们努力学习，
为了人民觉悟奋起，我们不懈努力。

我们为人民的利益战斗到底，
我们是刺向暴君的利剑，锋利无比。

我们要争取权利和正义，
把一切落后，迷信，腐朽彻底荡涤。

愿启蒙的火种燃遍新疆大地，
抛弃愚昧与无知，接受文明的洗礼。

愿故乡的百灵高歌胜利，
愿故乡的春天更加美丽。

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联在一起，
知识的光芒必将照亮整个大地。

麻木提师长听我朗诵完毕，又一次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双眼直视着麦买提力先生，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绝不允许那些狗杂种阻挡你们前进的脚步。我立即写封信，给你们配备两名武装士兵保卫你们。如果那些家伙胆敢再站出来捣乱，你们就把他们捆绑起来见我。只要我在一天，就绝不允许任何人阻挡你们前进。”他提高了声音，全身颤抖。显而易见，他很愤慨。他鲜明的态度，激起了众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们高举“探索者棍”，高唱战歌，把司令部大院内的热烈气氛推向了又一个高潮。麦买提力先生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原来不希望我们进城的麻木提师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态度。原来他不知道我们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局势，所以没重视。如今明白了全部真相，他终于明确地表了态。

麦买提力先生出色的组织天才令人折服。他以我们六十名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的崭新风貌及现身说法打动麻木提师长，为清除前进道路的阻力请求支持，最终取得了预想的效果。通过这次请愿，麦买提力先生的形象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更加高大了。

麻木提师长亲切地请我们在喀什休息两天。我们的汇报，请愿活动圆满结束了。

当时年轻幼稚的我们原以为我们的事业肯定会夭折，没想到麻木提师长的一个命令及两名武装士兵改变了形势。我们感到有了靠山，浑身充满了力量。

回到阿图什两天后，我们在苏图克·布格拉汗陵墓旁的阿孜那清真寺内召开了群众大会，阿图什各乡的阿訇、巴依、头面人物、校委会委员，学生家长、平民百姓等近万人应邀参加。全体学生也

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场气氛庄严隆重。几个乡的知名人士站在清真寺前廊上，麦买提力先生在两名武装士兵护卫下微笑着登上大会主席台，他面带微笑并不能改变会场的紧张气氛。大会开始，麦买提力先生首先宣读麻木提师长的命令，然后作简短讲话。麻木提师长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阿图什诸乌利玛、阿訇、乡绅富豪及全体百姓：

麦买提力先生发动新兴教育运动，是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摆脱愚昧，唤醒民众的时刻已经来临。如今我们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倘仍执迷不悟，不允许我们的弟子读书求知，我们的民族将更加没落。唤起民众，振兴民族是父辈之遗愿，必当重视才是。吾闻有人反对办学，乃至阻挠、恐吓、谩骂、诽谤师生之事层出不穷。此劣行绝不允许再度出现。为发展吾民族之新兴教育事业，我授麦买提力先生以特权，倘有人再行反对或阻挠发展教育，无论是何寺的大阿訇或何等显赫的伯克巴依，一律严惩不贷。恳望全体父老兄弟对麦买提力先生之事业予以大力支持为盼。

此致

师长 麻木提·穆依丁

1934年×月×日

麦买提力先生宣读完命令，一些富豪乡绅，阿訇、喀孜神色不安，流露出一种既害怕又不甘心的神情，而绝大多数与会人士则表现得兴奋异常。人民大众渴望学习，渴望摆脱贫困落后与愚昧无知，渴望觉醒，这是毫无疑义的。麦买提力先生没有多讲什么，只是强调执行麻木提师长命令的必要性，发展文教事业的重要，列举国际上一些国家，特别是我们的近邻苏联、土耳其等国发展教育，振

兴科学,取得重大成就的例子加以说明。最后他要求大家一定不要反对发展教育事业。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们的事业是有益于人民的。我们不怕反对派破坏阻挠,我们要坚决斗争,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绝不退缩。我去过许多国家,为了振兴我们的民族,我要把自己的知识献给自己的人民,为人民办学校,发展教育。我知道有人反对我,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倘若有一天一颗子弹射进我的胸膛,我也绝不后悔,我为我的民族而学习,为我的民族回归故土。我愿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愿……。”他越讲越激动,边讲边摘下头上戴的柯尔克孜族毡帽举在头顶高高挥舞,脸上肌肉与短胡须随之微微颤抖……。

麦买提力先生讲完话,几个人相继登上讲台表态。其中有喀孜,穆夫蒂、伯克、巴依等。他们都表示要坚决执行麻木提师长的命令。几位校委会成员,“短尾巴”,与山后回来的知识分子也讲了话。他们严厉警告反对派,若继续与我们为敌,我们一定毫不客气,奉陪到底。

这以后我们废寝忘食,刻苦学习,人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两个武装士兵终日跟随麦买提力先生在各村巡视,家长委员会对建校工作抓得很紧,认真负责,募捐也很顺利。到1934年底,不到六个月我们便提前学成毕业,各乡学校也相继竣工。我们积极进行开课准备,分配教员,招收学生,讨论教学方案等等。只等一声令下,便要走马上任了。

1935年元月初,仅用三四天时间,我们便组织起一支声势浩大的教育宣传队。我们高唱校歌,列队前进,前面由乐队奏乐开路,我们尾随其后,走村串户进行启蒙宣传,挨村挨乡安置师资班毕业学员。我们的足迹遍及整个阿图什。由麦买提力作词的校歌大意为:

我们是教育战线的新兵，
在家乡办学，为了家乡的父老百姓。

父老乡亲请相信，
我们将带给你们幸福与光明。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黑暗之中，
愚昧无知伴随我们始终。

宗教迷信侵蚀我们的躯体、魂灵，
我们终日迷茫，昏睡难醒。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精灵，
在光明的大道上我们即将远征。

我们要用知识武装下一代，
为他们的未来铺设锦绣前程。

我被分配在提坚学校任校长兼教员。托昆乡的阿不都巴力和阿不都热西提也分在该校。我们排着队，唱着歌行至校门口时，受到几乎全村人的热烈欢迎。

学校建于该乡家长委员会负责人艾合买提阿吉家门前的池塘边，有两间教室、一间教师宿舍和一个食堂。穿过欢迎人群，我们走进教室。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孩子们整整齐齐坐在教室中。见我们进来，很有礼貌地站立起来，高举右手向我们致礼。这群从未受过教育的乡村儿童如此守纪律、懂礼貌着实令我们感到惊讶。经了

解得知，原来麦买提力老师提前来到这里，教会了孩子们如何欢迎老师，还让每班选出一名班长维持秩序。麦买提力老师把我们三人介绍给孩子们，鼓励孩子们刻苦学习，争取优异成绩。当天我便开始上课。我先点名，目的是熟悉认识一下学生，然后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上“2³、∪(A、B)”两个字母。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教师生涯。

此时下阿图什所有村子都已建成新学校，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人人学习的新气象，新风貌。群众对此深为满意，然而一些顽固不化的反对派并不甘心。他们不敢公开出来反对，便在暗地里搞小动作。如躲在玉米地或墙后向我们扔石头，偷偷摸摸砸毁学校门窗，暗中威胁家长不准送孩子上学等等。这些捣乱活动不得人心，并没有吓住我们，加上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两名武装士兵的威力，那些反对派的阴谋没有得逞，相反，倒进一步提高了麦买提力先生的威望。

麦买提力先生一刻也没停止工作，他的办学热情越来越高。他走乡串村，热情宣传，经常与校委会成员商讨扩建学校，解决教师欠缺等问题。有时候，他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把附近学校的教师集中起来进行辅导，自己写诗配曲，教我们唱歌。

这场新兴教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阿图什历史、新疆历史、维吾尔族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件。这次运动为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麦买提力先生为发展教育、振兴民族贡献了毕生精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和反对派竭尽全力破坏阻挠的情况下，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即1937年，麦买提力先生就被刽子手盛世才投入监狱，但没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被敌人的枪弹射入胸膛而死，而是与牢房一起化成了灰烬。据说，他在牢房墙壁上题写了不少诗歌，可惜的是这些诗歌均已不复存在。麦买提力先生死了，

死得很悲壮，可他经过两三年努力，经过艰苦奋斗换取的新兴教育事业的成果，却为新疆广大人民群众与受其培养教育出来的成千上万名师生所广为传诵，永志不忘。

第五章 留学苏联

1935年11月，我有幸得到赴苏留学的机会，这是我平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我当教师之前，世界观是幼稚的，行动是盲目的。扛枪当兵，勇敢战斗，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权是我的全部愿望。至于推翻专制政权之后干什么，我根本说不清楚。通过参加师资班学习，当教员教书，我多少开了一点眼界。与过去相比，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然而也只限于“不建立学校，不读书学习，不懂科学，是不行的；人民只有摆脱愚昧，才能不再蒙受剥削压迫”的有限认识。至于“要想获得彻底解放，人民必须起来革命，推翻独裁政权，消灭一切剥削者。只有这样，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受教育的机会，才能真正当家作主”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我还没有具备。我只单纯地认为，只要创办学校，人民掌握文化知识，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苏联学习，使我这种简单幼稚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开始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了。

我能去苏联学习，应归功于我们那位前任团长艾买提·库勒阿吉的帮助。一天，他把我和他的外甥（他妹妹的儿子）买合木提·胡赛音叫去问：“你们愿意去苏联吗？”，问他去苏联做什么，他告诉我们去学习。我们非常高兴，表示愿意去。他答应替我们向麻木提师长讲情，让我们去苏联留学。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麻木提师长派人把我们叫到司令部，由一位军官正式通知我们，已批准我们赴苏学习，令我们立即着手准备

启程。

以后我才得知此事的原委。原来选定第一批动身的十六名赴苏学员皆为麻木提师长的吐鲁番籍同乡亲朋好友。艾买提·库勒阿吉认为这样做不妥，建议加上几名喀什籍维吾尔与柯尔克孜族学员，以免别人说长道短。麻木提师长认为艾买提·库勒阿吉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建议，并让他推荐几名。于是艾买提·库勒阿吉便推荐了我和马合木提·胡赛音以及另外两名柯尔克孜族学员。

麻木提师长电告盛世才，要求从新疆赴苏留学的一百名学员中选派十六名喀什籍学员。盛世才不同意，经再三打电报交涉争取，最后盛世才同意只派十二人，其中八名吐鲁番籍，两名喀什籍，还有两名柯尔克孜人。

我们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希望尽快动身。主要的准备是办护照，这由上面办理，他们还给我们每人定做了一套棉军装、一件皮大衣及一顶皮帽，一双皮靴。

动身前，麻木提师长接见我们，主要盘问我们四个非吐鲁番籍学员的情况，然后叮嘱了我们几句话。我记得他大约是这样说的：“派你们去苏联学习，很不容易。我和盛世才反复交涉几次，盛世才才勉强答应。机会来之不易，你们要珍惜。去苏联后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要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赤色宣传，不要忘记每天做五礼^①。若那里没有清真寺，要请他们为你们盖一座。若他们不让你们做礼拜，你们一定要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实在不行就给我拍电报。”后来，他指着我对其他人说：“这个小伙子叫赛福鼎，是名门后代，本人当过教师，你们要听他的。服不服气？”学员们齐声回答“服。”麻木提师长送给我们每人一块金币做盘缠，和我们一一

^① 五礼——即伊斯兰教徒每天必做的功课——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共五次，所以称做“五礼”。

道别。我们乘坐一辆旧卡车，离开喀什向乌恰县方向出发。

这十二名学员是：赛依都拉·赛甫拉也夫、阿不都卡德尔·艾山、艾沙·尼雅孜、阿布力米提·马合苏托夫、吾拜都拉·鲁白都拉也夫、司马义·艾维祖拉、克尤慕·乌甫尔、阿布力提甫·尼牙孜、穆罕默德·胡赛音、阿不都哈德尔·托合塔诺夫、吐尔干和我。

我们原计划从艾尔凯西塔木进入苏联国境，由于那里下了大雪，路被雪封，只好临时决定改道，翻越铁莱克达坂直插边境。汽车不能翻越达坂，只能骑马赶路，可到何处寻找好马呢？正一筹莫展之际，来了一支驮队（马帮）。这支驮队不知是麻木提师长个人的还是司令部的，但无论如何也是奉麻木提师长之命去苏联做生意回来途经此地的。驮队马匹个个是百里挑一的好马。我们向驮队说明情况，请他们借我们几匹马翻越达坂，他们不答应。派阿不都卡德尔·艾山、阿布力米提·马合苏托夫与他们交涉，好话说尽，仍说不通。最后我们以向麻木提师长控告为法宝威胁他们，还是不行。阿不都卡德尔·艾山见他们软硬不吃，动了真气。他膀大腰圆，令人望而生畏。他挥舞拳头，粗声大气地吓唬那几个人说：“跟你们好说，你们不借，别怪我们不客气，再不借我们可要抢了！”驮队只有四五人，见我们人多势众，来者不善，怕吃眼前亏，只好乖乖为我们挑选十三匹好马，并派一名向导，帮助我们翻越铁莱克达坂。

铁莱克达坂又高又陡，又滑又险，上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行。这是一次冒险而又有趣的跋涉。征途上的趣闻，在此我不多做介绍，如果读者有兴趣，可阅读我的长篇历史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第七章第一节《伟大的进军》。像那部长篇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沿着羊肠小道，我们经历了一次艰难险阻的跋涉，翻越达坂。达坂前面的宿营地，随时可能出现的可怕的雪崩，又高又陡的羊肠小道，冰冻雪滑，直上直下的雪坡，寻找陷入积雪中的同伴，攀登海拔五千米的顶峰，顺着陡坡，在冰雪中滑行下坡——这一切就是那

部小说中描绘的艰难历程。

当年苏图克·布格拉汗何故不绕道艾尔凯西塔木，而一定要翻越这座艰难险阻的冰达坂？是当时没有经艾尔凯西塔木翻山的路，还是同我们一样运气不佳，遇上了暴风雪，我不得而知。反正他当年越过的铁莱克达坂，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走过了。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祖先走过的路，子孙后代重蹈旧辙很自然，然而走法却不尽相同。有迷失方向的，有偏离目标的，也有超过前辈、走捷径提前到达目的地的。我们走在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苏图克·布格拉汗走过的路上；路是同一条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与走这条路的目的却截然不同；苏图克·布格拉汗是黑汗王国的可汗，我们是他普普通通的学生子孙；苏图克·布格拉汗走这条路是为保卫家园，拯救同胞而远征，我们是前往已获得自由解放的苏联兄弟民族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去求学。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时代不同，但我们和苏图克·布格拉汗走这条路的愿望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为了解救我们的人民于水深火热。

出发的第三天晚上，我们翻过铁莱克达坂，进入了苏联境内一个名叫索菲的地方。那里的苏联边防人员很不友好，气势汹汹地阻止我们从此地通过。认真查验完我们的护照后，把我们安顿在一间屋里，给我们送来面包和牛肉汤，让我们吃饭休息。几天的长途跋涉，使我们个个疲惫不堪。吃过饭大家立即躺下，准备美美睡上一觉，可是望着明亮的电灯，我们感到新奇，有趣，睡意竟完全被赶走，我们索性聊了起来。这里的灯不像家乡带罩的汽灯，更不像昏暗的煤油灯。在我们眼里，这里的灯简直太亮了，亮得似乎掉在地上一根针都能找到。谈论了一会儿，阵阵睡意袭来，我们想熄灯睡觉，可不知道如何关灯。正在困惑，走进来一个人，那个人按了一下门边墙壁上一个黑色的东西，灯立即熄灭了。我们惊奇地笑出声来，不知什么时候，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谈起这件事，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对于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一出娘胎便认识电灯的人来说，听我叙述我们最初见到电灯的感受肯定会感到不解。然而，我们长那么大是第一次见到明亮得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电灯，能不感到无比新奇吗？那个时代我见到的现代科技成果，第一是汽车，第二便是电灯了。在苏联学习时期，每见到一项现代科技成果，我们内心都会涌现出那种好奇而感到有趣的感觉。为使您在读这部回忆录时不致感到太枯燥乏味，我会时时向您介绍一些这类趣闻轶事的。

第二天，苏联边防军让我们搭乘一辆满载羊毛的卡车赶路。约两个小时后，卡车行至一座高山脚下。旅途中的这座高山名叫阿拉依山。我们原以为翻过铁莱克达坂就再也不用翻山了，谁想从索菲出发才两个小时便又遇到了一座高山。阿拉依山很高，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道，缓缓爬行两个小时，才到山顶。到了山顶向后望去，发现铁莱克达坂远不如这座山高。翻过高山，卡车走上一条笔直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公路。这时突然下起雨加雪，我们身穿的光板羊皮大衣，头戴的皮帽很快被淋湿。我们又冷又饿，蜷缩着挤在一起，以求增加些热量。天色将黑，远远看见一片灯光，如群星闪烁。原来那里是一座城市。汽车行驶不多时，我们到达了这座名叫奥希的城市。汽车径直把我们拉进一座学校似的大院里。房间里出来两个人把我们带进一间大厅，让我们暂时在这里过夜。我们又冷又累，把随身所带的褡裢枕在头下，很快便入睡了。似乎睡了不大功夫天就亮了，一个苏联人走进大厅大喊：“伊斯塔提瓦依，伊斯塔提瓦依！”我们不懂俄语，以为他喊我们起床，便赶快从铺上爬起来。可他走到我们睡觉的地方，叫得更凶了，好像非常气愤的样子。我们一点不明白他在喊叫什么，只见他用脚拼命踢着我们叠放整齐的皮大衣，仍是大声喊叫着那句“伊斯塔提瓦依。”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又喊又叫是嫌皮大衣臭，说的是“太膻了！臭死了！”我们这些皮

大衣经过昨天的雨淋，又沤了一夜，也的确是臭烘烘地呛人。他让我们拿着皮大衣和褡裢到院里等着，我们不知等谁，要干些什么，实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巧这时来了一位柯尔克孜人，他要我们到旁边的屋子里去洗脸，然后去餐厅吃饭。我们把皮大衣、褡裢等随身携带物品交给院中一位巡逻值勤人员看管，便到洗脸间洗脸。洗完脸出来，有个人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大搪瓷茶缸和一张饭票，领我们到餐厅，在一支队伍后面排队取饭。从窗口交饭票后领取放在盘中的一块面包，四块方糖，一盘马铃薯汤。我们在一张空桌子旁用完早餐，学着别人的样子将茶缸系在腰间皮带上，然后又被带进一间教室。我们惊奇地东张西望，等了好一阵，才有一个柯尔克孜人领来一位风度翩翩的人，并用柯尔克孜语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你们的老师。”老师挨个询问我们的名字，登记以后，开始考试。我们感到不解，忙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到塔什干留学的中国人，不是来这里学习的，可他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话。在一位柯尔克孜青年的帮助下，他们才勉强明白了我们的意思，却不屑一顾地嘲弄我们说：“什么？你们去塔什干留学？大概是做白日梦吧？我们是招你们学开汽车来的。”我们拿出护照再三解释，他们才找来一位看来是位领导的俄罗斯人。这位领导看了我们的护照，了解了情况，生气地把我们赶出了大门。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个驾驶学校。他们从山区招收了一批柯尔克孜族青年来这里学习，送我们来的那位卡车司机把我们当成那批学开车的柯尔克孜青年送来，使我们莫名其妙地在这里过了一夜。想想这一夜的经历——从大厅到大院，从大院到餐厅，从餐厅到教室，从教室被赶出门外，一通折腾，真搞得我们哭笑不得。

被赶出大门，我们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茫然不知所措。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们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际，一位乌兹别克族打扮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如遇救星，忙向他介绍

我们的经历,求他给予帮助。那个乌兹别克人是个好心人,看了我们的护照,听我们介绍了情况,对我们非常同情。此人像个干部,他对我们说:“你们受苦了!安集延离此地不远,那里有你们国家的领事馆,你们去领事馆,他们会帮助你们去塔什干的。你们拦一辆车,搭车去安集延吧!”这个乌兹别克人的热情指点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对他千恩万谢。

开始等车了。来往车辆不少,拉煤的,载羊毛的,装木材的……络绎不绝。我们站在路边挡车,可那些司机对我们视而不见,都是狠狠按着喇叭,呼啸而过。我们见两个人拦车,车不停,索性几个人一起站在公路中间。又一辆车过来,见我们拦车,司机不耐烦地紧按喇叭,我们站得稳稳的不挪窝。司机是个俄罗斯壮汉,他气呼呼跳下车冲我们“叽哩咕噜”地大喊大叫,随后连推带搽,把我们推到一边,跳上车一踩油门,汽车一阵风似地开跑了。我们懊恼万分,又急又气。正在这时,一间装上四个轮子,镶着明亮的大玻璃窗的漂亮“房子”开了过来。“房子”里坐满了人。我们望着这间漂亮的带轮子的“房子”,心中好生奇怪。我旁边一位小伙子赞叹:“苏联人真有本事,房子底下装上轱辘,就能让它跑。”我们不敢拦这种带轱辘的“房子”,眼睁睁看着它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可拦大汽车,又一辆也拦不住。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肚子开始“咕咕”叫起来。正在发愁,刚才为我们指路的那位乌兹别克人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见我们还没走,忙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他,他感到非常惊奇,答应帮我们拦一辆车。说话间,公路上又驶过一辆“玻璃房子”。那个乌兹别克人让我们做好准备,他去拦那辆“玻璃房子”。看我们把这种汽车称做“玻璃房子”,他笑着告诉我们这是专门拉人的“公共汽车”。汽车停下,司机瞥见我们的行李,不愿让我们上。其实我们的行李不大,只是皮大衣散发出阵阵羊膻气讨人嫌。那位乌兹别克人与司机商量一阵,要我们留下行李和一位

看行李的人,其他人上车先走,他想办法再拦一辆卡车将行李给我们带到安集延。我们留下胆子较大,膀大腰圆的卡德尔·艾山,其他人上了公共汽车。

约摸走了四五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安集延。领事馆已经得到我们即将到达的消息,提前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处。不一会儿,卡德尔艾山也搭车赶来了。吃过晚饭,一个名叫萨罗金(音译)的人(不知是不是徐慕廷的父亲)在会议室接见我们。这个人看来非常和蔼可亲,他告诉我们已收到乌鲁木齐方面的电报,知道我们要来。听说路上我们吃了很多苦,他为没派人接我们表示歉意。他让我们在此休息一两天,然后派人送我们去塔什干。

次日安排我们休息,领事馆一位工作人员带领我们游览市容。这个城市很大,很美。那平坦整洁的水泥马路,琳琅满目、镶满玻璃的大百货商店,颇富民族特色的高楼大厦和除大客车外,如甲虫般穿梭往来的小轿车都令我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来到市中心广场,见广场中心耸立着一尊巨大的人物雕塑。领事馆那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革命导师列宁的塑像。只见塑像左手微微掀起衣襟,插在腰间,右手平举伸向南方。给我们当向导的有一位维吾尔人,他是在领事馆工作的中国百姓,人们称他为“老人家”。他热情地给我们讲述有关这尊塑像的故事,他说一个喀什人来到安集延,与当地一位乌兹别克人成为朋友。一天他们二人一起来到广场,喀什人问那尊列宁塑像谁,那位乌兹别克人回答说:“这是一位解放整个俄国和我们这个家乡的伟人。”喀什人又问列宁的右手为何指向他们家乡的方向,乌兹别克人风趣地回答:“噢,他是在说:我还没来得及解放喀什呢!”接着,他问喀什人:“您的家乡有这样高大的塑像吗?”喀什人回答:“有的!”“那么,您家乡那尊塑像是什么姿势呢?”“那尊塑像双手贴胸,尊敬地朝着您们家乡这个方向鞠躬!”“为什么要鞠躬啊?”“那是表示盼望您们赶快解放我们啊!”

这个普通的小笑话，表现了人民群众热爱革命导师，盼望获得自由解放的深刻内涵。听完笑话，我们议论纷纷。大家都很遗憾：这个人为什么不去解放我们的家乡呢？其实此时列宁逝世已经十一年了。过去我们听说过“列宁”这个名字，却不曾见过他的形象，如今亲眼目睹这位伟大人物的塑像，那栩栩如生的神采令我们油然而产生崇敬之情。

第二天下午，我们前往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塔什干。车站上，一辆发着震耳欲聋的吼声，冒着一团团浓烟，轰隆隆行驶震得大地颤抖的庞然大物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便停在了我们眼前。若周围没有旁人，我们肯定都会被吓跑。“装有轮子的玻璃房子”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简直可算小巫见大巫了。我们作梦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等特大稀罕物，我们又兴奋又感到新奇，甚至涌起了一种骄傲的情绪：我们见到家乡男女老少均未见过的火车了！

送行的人们向我们介绍，车头后面长得一眼望不见尾的镶着玻璃的小房子叫做车厢。他们叮嘱我们说，火车上有小偷，千万要小心，东西要看好，不要被小偷偷走。他们把小偷说得神乎其神，反复嘱咐：“小偷确实厉害，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东西就被偷走了。

作者处理担山拉河，外间人如作区五，甘作如线港在社定田地小公

全坐在下边三个铺上，用脚挡住过道，不让人们通过。不一会儿，有人过来，打算经过这里去另外一个车厢，我们没让他们过去。以后又来了一些人，我们仍不把脚收回来，那些人用俄语叫喊着什么，我们用刚从老大爷那里学来的俄语喊着：“我们是外国人！”同时做好准备，他们一旦挑衅，我们就立即反击。人越聚越多，看人们愤怒的表情，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在非常紧张的时刻，来了一位身着军装的俄罗斯军人。他走到我们跟前，很有礼貌地敬了一个军礼，用俄语说了一些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听懂，但看到他的举动文明客气，觉得他不像要打架的样子，于是不那么紧张了。可又担心他是伪装成军人的小偷，便仍执意不让人们通过而反复喊叫“我们是外国人。”那位俄罗斯军人无可奈何地离去了，过了一会领来了一位穿着打扮同他一模一样的乌兹别克军人。乌兹别克人了解了我们的身份和这样做的意图后，笑着用乌兹别克语解释说：“这不是在自己家里。过道是人们自由通行之路，你们这样做影响人们通行，阻断前后车厢的联系，会影响列车的正常秩序。这样做是违反乘车规则的。”听了他的话，我们很不好意思，用责备的目光瞧了瞧阿不都卡德尔·艾山，然后把脚放了下来，把路让开，一场风波总算得以平息。

我们并未因此放松对小偷的警惕。天黑下来，我们更加小心了。我们决定轮流睡觉，四人一组，每组值两个小时班。谢天谢地，一夜总算平安无事地度过了。

天快亮时，终于到达了塔什干。列车停稳，我们拿好行李下了火车，可我们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不知往何处去。还好，我们找到了一位半着军装的乌兹别克人，向他打听去中国领事馆怎么走，这位乌兹别克人带我们走出火车站，在站前找到一位马车夫，嘱咐马车夫送我们去中国领事馆。马车夫是位壮实的俄罗斯汉子，把行李装上车，我们又担起心来，怕马车夫半路把我们的行李拐

跑。我们想了这样一个办法：让两个人在马车两边紧紧拉住缰绳，一个人坐在马车夫旁边，其他人分布在马车周围。车站距领事馆不近，我们格外小心地注意马车夫的行动。马车夫很规矩，把我们平安送到了目的地，我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付过车钱，搬下行李，我们“砰砰”敲起领事馆大门。此时天色尚早，领事馆的人们还在睡梦中，敲了半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敲了半天，才听门内有人用汉语问道：“谁呀？”我们之中一位稍懂汉语的学生赶忙回答：“是我们，喀什来的学生。”大门仍不见开，我们生起气来，三四个人一起边喊边推大门。我们听到了门里的动静，可不知何故，他们就是不开门。我们更加生气，更加用劲地边骂边撞门。心想：“这是我们自己的领事馆，怎么不给我们开门呢？我们一路艰辛，好不容易到‘家’了，怎么还要受到如此慢待？”卡德尔·艾山怒不可遏，狂呼乱叫：“再不开，我们可要破门而入了！”

这时，门里有人用维语问话了，他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说明来历，那个人从侧门走出来斥责我们粗暴无理。他说：“这不是喀什，是苏联，这里是一个文明的城市。”我们不买帐，据理力争说：“我们一路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家’了，你们却不给开门，我们能不气愤吗？”我们你一言，我一语，义愤填膺。那个人吓得跑进大门喊人对付我们。几个人走出来，把我们让进院内。那个先出来的维族人把我们带进一个大厅，自我介绍说：“请你们不要发火。我叫麦买提江，是领事馆工作人员。刚才你们敲门敲得那么厉害，我们一时弄不清你们的真正身份，没及时给你们开门，怠慢了你们，很对不起。各位一路辛苦，请先休息一下，睡一会儿吧！”说完便离开了。

我们把行李枕在头下，东倒西歪地躺下，立即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我们实在太累了！不知睡了多久，麦买提江叫醒我们，告诉我们领事来会见我们了。没待我们醒过神，领事已经进了门。领事是

位身材魁梧的人，麦买提江向我们介绍，领事名叫甘梧鲁，是锡伯族。安集延的领事也是锡伯族，看来锡伯族出任领事的真不少啊！我们正在暗自思忖，领事已走到我们面前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他用不太熟练的维语对我们说：“我们收到国内电报，知道你们出发了，但具体到达时间不知道，因此无法去接你们。今早你们突然到达，这里的工作人员不知你们的身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真抱歉，请你们谅解。”这位领事如安集延的萨如琴领事一样和蔼可亲。我们一路颠簸，旅途艰辛的疲累此时似乎一扫而光了。领事继续说道：“吃过早饭你们休息一会儿。你们要去学习的学校会派人来接你们，我们已经通知他们了。”

吃过早饭，我们心情愉快、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谈起自己的无知、粗鲁，想起旅途的经历同今天早晨发生的不愉快，感到非常难为情。在火车上，我们表现得那么愚蠢，那么鲁莽，此刻令我们益发感到自己的愚昧与无知，更加感到来此学习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只有努力学习，加强修养，才能摆脱愚昧无知，才能变成有礼貌、懂文明的新人。

这里的人们个个西装革履、整洁干净、举止文雅。我们和人家的反差太大，我们身穿的粗布衣衫、脚上的黄皮靴、头上的白皮帽、身背的褡裢、发臭的皮大衣都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散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臭味，脸上胡子拉碴，头发又长又乱。大家互相看着各自的狼狈相，决定立即改变这种连自己都看不过去的形象，于是从刮胡子开始，进行自我整顿。这下，我当兵时学会的一点剃头手艺可就派上了用场。

我给几个人刮完胡子，轮到我们之中年龄较大、胡子最密的吾拜都拉时，遇到了困难。他无论如何不让我动他的胡子，他说：“我是个虔诚的穆斯林，穆斯林不能没胡子。你们刮不刮我管不着，反正我无论如何也不刮。”为了我们的整体形象，我们不管他同意不

同意，强按着他的头，硬给他刮。吾拜都拉寡不敌众，万般无奈，只好眼睁睁硬着头皮让我给他刮。

吾拜都拉的胡子刚刮了一半，麦买提江便来通知我们，学校接我们的人已在外面等候。我很着急，继续给吾拜都拉刮胡子吧，让接我们的人久等太不礼貌，可不刮完又怎么能出门呢？突然我灵机一动，用毛巾把吾拜都拉的胡子连同脑袋一起包了起来，吾拜都拉气得直跳着脚骂大街。接我们的人是个略懂乌兹别克语的俄罗斯人，名叫米西可夫，是个瘸子。他拄着拐杖，自我介绍是学校的纪律主任。见到吾拜都拉的头上包着毛巾，他很奇怪，问我们怎么回事，我回答说：“他牙痛！”这位纪律主任关切地说：“你们先去浴池洗个澡，到学校后请医生看看。现在咱们就走吧！”

一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浴池。吾拜都拉一路上不停地骂我，我没话说，本来吗，刮了一半胡子的脸被人看到该有多么难堪！

到了浴池，刚好浴池旁边有个理发室，几个人正在理发。我把拉过吾拜都拉钻进理发室，取出剃刀给他剃剩下的那一半胡子。理发室里的所有人和进来找我们的米西可夫见状无不开怀大笑，吾拜都拉也不再骂我了，乖乖让我为他剃掉了那半边胡子。

进浴池后，先被领进一个大更衣室脱掉衣服，然后进浴池洗澡。我记得那个浴池很大，我们洗得舒服极了。洗完澡，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大家互相开着玩笑，非常开心。

洗完澡来到更衣室，发现衣服不翼而飞。我们以为衣服被小偷偷走了，万分沮丧。正着急如何出门，米西可夫带着几个人来了。那几个人手里拿着新衣服，原来是给我们送校服的。米西可夫逐个点名，发给我们每人一套黑色毛料西服，相当漂亮。此外还有衬衣，背心、内裤、领带、黑皮鞋、袜子等等，从里到外，由上到下，真是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我们喜不自禁，争先恐后地穿上了新装。穿衣本不是什么难事，但这次我们却遇到了麻烦。一个麻烦是袜子较长，

靴子里面有一个带钩的橡皮筋，脚穿不进去。这是什么呢？我们谁也不明白。一个学员忽然发现了橡皮筋上垂着的钩子，试着用橡皮筋系住袜子上部，然后用钩子钩住固定在靴子里面的胶皮上，脚便很顺利地穿到了靴子里。那个学员把这个方法教给了我们，这第一个麻烦算是解决了。

再一个麻烦就是系领带了。这样系，那样系，怎么也系不上。我们这些在吐鲁番、阿图什乡村、山区出生长大的孩子见都没见过领带，怎么可能会系领带呢？我建议先把领带叠好放在口袋里，到学校再说。米西可夫见状，知我们不会系，便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到学校后我教你们。”这个米西可夫真是位善解人意的好人，他知道我们不好意思，便如此关切地轻描淡写了一番，使我们不致太难堪。

去学校的路上，我们向米西可夫打听我们旧衣服的下落，他告诉我们，消毒后将送进库房。我们穿着漂亮干净的西装，却惦念着自己那些粗布短衫，光板皮袄的下落，似乎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对旧衣服的感情，不如说是对缝制旧衣服的母亲，对穿着旧衣服离开的祖国的一种深切思念的流露吧！

在汽车上，我们生气勃勃，个个是那么英俊，那么帅气，大家禁不住相视而笑。如果系上领带的话，我们与塔什干人似乎已毫无区别了。

到了学校，先我们而到的乌鲁木齐学生和部分教师、领导从校门口把我们迎进学校。这里是塔什干大学专为新疆学生开办的中亚综合行政管理系所在地。盛世才与苏联政府签订协议，该系每年为新疆培养一百名留学生。这个系共为新疆培养过三届留学生，总共三百名，我们是第二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第四届时就停办了。

休息三四天后，我们进行了考试，分了高低班。考试科目为语

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经过考试，我被分到二班。从此开始了留学生活。

我们学习的课程很多，相当紧张，生活节奏很强。每天天亮起床，由体育老师带领列队跑步半小时，做半小时操，然后吃饭。八点钟上课，上、下午各上四节。晚饭后休息一小时，上晚自习，九点熄灯就寝。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晚上休息。由于学习紧张，休息时间也需复习功课。过去我们从未经过如此紧张学习生活的锻炼，开始时真感到有些吃力，但经过一段时间就慢慢适应了。

开课一个月后，我患了一次重病。我们第一年就读的这个学校在距塔什干十几公里远的南部卢那察尔斯基地区，我被送进了那里的一所医院。

一连几天我高烧不退，迷迷糊糊，昏睡不醒。不知睡了多久，终于在一天夜里打过针后，清醒过来。睁眼一看，许多医生、护士围在我的床前。恍惚中，我听到有人说：“小伙子病得不轻，他是哪个学校的？”我努力想睁开眼回答，可眼睛却不听使唤，很快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又睡了多久，我觉得这次是真的醒了。睁开眼，看到天快亮了。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医生站在床边亲切地注视着我。护士给我打完针，那位医生似乎松了一口气，她给我量体温，看到体温正常显得非常高兴。这位医生慈母般地抚着我的头，用不熟练的乌兹别克语告诉我：“孩子，平安无事了，危险期总算过去了！”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一位护士给我端来了一碗糖茶，我贪婪地一饮而尽。那位医生和我谈起家常，问我家在何处，家中有什么人，母亲健在否。我告诉她母亲在遥远的新疆盼望着我早日回到她的身边。女医生非常感慨，说她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子，在萨拉托夫城工作，那个城市距这里很远。她说她和我的母亲一样盼望着早日见到儿子，说天下母亲都一样，最后还让我写信时代她向我的母亲问候。在远离母亲的异国他乡，在重病在床最需要母亲照护的时候，

我得到了慈母般的照顾,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内心感到阵阵温馨,病好像一下好了一大半。

听护士告诉我,我患了伤寒。昨晚高烧四十一度八,校医怕我发生意外,因这里的条件好些,便把我送进了这所医院。医生抢救了一夜,采取了种种措施,好不容易使我的体温降到了四十一度。恢复知觉时,刚刚降到四十度。我为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感到欣慰,也更加由衷地感谢那位慈母般的大夫的救命之恩。

那位大夫真像母亲,常来看我,一来便坐在我床边,抚摸着我的头,跟我聊天,亲自喂我吃药。在那位母亲大夫的亲切照顾和精心治疗下,我的高烧渐退,体温逐渐恢复了正常。但全身无力,不能起床,一个星期基本上没怎么吃东西。几天下来瘦得皮包骨,头发一把一把地掉,简直脱了人形。尽管我着急上课,也一点办法没有,只能乖乖地躺在医院治病。一直住院治疗了一个来月,医生才批准我出院。

出院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上课。当时老师正在讲“解剖学”,我落下不少课,什么都听不懂。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落下的课尽快补上。每天我既要学新课,又要补落下的旧课,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结果期末考试只得了三分(五分制)。一向要强的我伤心极了,回到宿舍,趴在床上痛哭一场。寒假期间,我放弃了休息与一切娱乐活动,全力以赴地复习功课。晚上熄灯后我点上蜡烛学,致使一次坚持不住,伏在桌上睡熟,将蜡烛碰倒,烧焦了一撮头发,险些铸成大祸。“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的刻苦努力,到第二个学期期末考试,我取得了十几门功课大部分五分、个别课四分的好成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暑假到了,我们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游览。我们的旅途生活非常愉快,古老、文明、美丽的莫斯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我们尽兴游览参观,观看文艺演出。莫斯科

的马戏演出深深吸引了我们,使我们眼界大开。

列宁格勒在我们眼里是个更加优雅迷人的城市。冬宫、夏宫的宏伟、壮观,令我们为之赞叹不已。老师给我们讲述十月革命前彼得大帝时代的故事,使我们对沙皇俄国贵族上层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及其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加深了了解;通过参观古老的宫殿,历史博物馆,俄国历代绘画展览,增长了有关俄国古代史、绘画史及建筑艺术史等方面的知识。参观游览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了解到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如何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举行了俄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月革命。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们的认识与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

参观期间,我们遇到过不少趣事,为旅途生活增加了不少乐趣,在此仅举两件。

一次,我们乘船游览波罗的海。这是我们平生首次见到大海,首次乘船,兴奋、激动之情可想而知。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座名叫彼得尔古夫(音译)的夏宫。这座宫殿富丽堂皇,周围各色鲜花竞相开放。宫内收藏有众多的稀世珍宝,陈列着各类文物。这座宫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古迹之一,可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飞机轰炸,遭到损坏。参观这样一座举世闻名的宫殿,看到那么多稀世珍宝,我们兴奋之极。参观结束,大家余兴未尽,来到一处森林草坪,看到有人在草坪上摔跤,我们凑上前去看热闹。有一个名叫阿不都扎衣尔的同学,身材比我魁梧健壮,年龄比我稍大,走起路来步伐矫健,威风凛凛。看别人摔跤,他似乎手脚发痒,走入场地也与人较量起来。摔倒一两个对手后,没人敢上场与他对垒了,他觉得不过瘾,不管我乐不乐意,硬把我拖进了场地。我知道他有勇无谋,决定铆足劲和他进行智斗。三下两下,竟然将他摔倒,博得同学们的阵阵喝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人群中一位蓄小胡子,个子稍高的格鲁吉亚小伙子不服气地上场向我挑战。我听说格

鲁吉亚人粗鲁强悍,有些胆怯,可同学和老师都鼓励我应战,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挑战。围观群众越聚越多,草坪变成了摔跤场。那个小伙子抱住我的腰,把我提起来转了两圈扔到地上,但没把我摔倒,我却由此掌握了他的技法。把人抱起的跤手若技法不高明,不能把对方摔倒,是必然要被对方摔倒的,我暗自决定了对付的办法。当他第二次抡起我,把我甩到地上的一刹那,我稳稳地站住了,然后迅速飞起右脚,绊住他的左脚,狠命一搦,就把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同学们狂热地欢呼雀跃,向我表示祝贺。那个小伙子不服气,爬起来抓住我的腰不放,执意再摔一次定胜负,不然似乎下不了台似的。我们学校的带队干部出面制止,并赶忙领着我们离开了草坪。

不是吹牛,我确实懂些摔跤的门道。阿图什人从小喜欢摔跤这项活动,大人对小孩子之间摔跤不仅不制止,而且出钱出力鼓励孩子们学习摔跤,培养拼搏意识。阿图什各地都有定期举办摔跤比赛的习惯,培养出了不少摔跤好手。我从上小学起便开始练摔跤(1946年,我们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期间,在乌鲁木齐的乌拉泊,安尼瓦尔汗巴巴硬拉我与他摔,被我轻而易举地摔倒,造成他的胳膊骨折,他才服气),因此这次将那位格鲁吉亚小伙子摔倒并非偶然。新疆籍学生为此喜不自胜,为在列宁格勒林间草坪上,一个维族学生摔倒一名格鲁吉亚小伙子感到自豪与骄傲。

还有一件事也颇为有趣。那是一天晚上,我们准备去看电影。看电影之前,我们三个人去公园游玩,在一家咖啡馆喝了些酒,落在了其他人后面。晕晕乎乎赶到电影院时,电影尚未开演。我上到二楼,看到大厅里人们来回走动。我想去找同学,当时可能是酒劲发作,我感到相反的方向有许多人就坐,便朝他们走去。走到跟前,“哐当”一声,我的头重重地撞在了一面光亮冰冷的“墙上”,帽子飞了,人也摔倒在地,周围的人们哄堂大笑。一个好心的俄罗斯人拾

起帽子还给我，我被撞清醒了，十分难为情。同学们发现我出了洋相，赶忙领我走进影院。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撞在大厅中央的那面大墙镜上，同学们边看电影边笑我的失态。以后每到剧场、电影院看节目、看电影或是看到大大小小的镜子，同学们总忘不了取笑我说：“喂，赛福鼎，快去那里边找同学呀！”

镜子对现代人来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物件。而在当时，我们从未见过像一面墙那样大的巨型墙镜，这也就难怪我喝酒之后在众人面前出此洋相了。

参观归来，第二学年的学习开始，增设了不少新课。课程增多了，难度也加大了。第一学年主要补习初中、高中的功课，没感到太困难，第二学年正式开始学习高等院校的课程，自然使我们感到高深难学，压力增加了。

第二学年老师的教学方法也有所改变，主要以自学为主。有时学校把讲义用俄文打出发给我们，由自己看讲义，查阅参考书，归纳笔记。老师讲课高度概括，简练，只讲重点，课后必须自己整理笔记，消化掌握。用这种方法学习十几门课程绝非易事，有时根本记不住学习内容，如政治经济学，学过以后大部分内容很快就被忘记了。学校发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要求我们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我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学校没为我们开设此课），除要求我们学习教材，还指定阅读大量参考书。在短期内阅读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不学又不行。这样一来，第二学年的学习任务就显得更加繁重了。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学习简直像在进行一场紧张的战斗。显而易见，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那就是，或是努力学习，胜利凯旋，或是得过且过，半途而废。我们选择了前者。我们努力学习，废寝忘食，互相帮助，不断进取，最终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胜利完成了学习任务。

学校方面根据学生们的要求，经常在晚上举办各种课外活动，组织音乐、话剧、汽车驾驶、歌舞、俄语等各种知识讲座。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报名参加各类活动。我参加了音乐小组，学习音乐理论，学习各种乐器。开始音乐小组发给我一把比人还高的“大贝司”（大提琴），我对这大家伙不感兴趣，加之我左手没有小拇指，弹奏不便，就与别的同学换了一把独塔尔琴。老师批评我不该私自更换乐器，我一气之下退出了音乐小组而进入汽车驾驶班和话剧班。学习了三个月驾驶，学得很不错，只可惜实习时间少了一点，不太过瘾。

在话剧班学习了一些理论知识，阅读了一些乌兹别克文剧本。话剧老师是塔塔尔族，名叫巴科尤夫。他要求我们自编剧本，自己演出。我们尚没有学会写大部头剧作，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没有达到老师要我们自编自演的要求。老师见我们确有困难，就热心帮忙，向我们了解新疆前几年新兴教育运动中与反动派顽强斗争的有关情况，以此为素材，不到一个月竟写出了剧本。同学们非常高兴，稍加修改，决定排演。

巴科尤夫对话剧很内行，是位相当不错的导演。排练不到三个月，我们的话剧便正式演出，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在剧中扮演一名新学生，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扮演一名宗教学校的瘸腿坏学生。主角就是我们两个，一些同学在剧中饰演配角——激进派、落后老师和其他人物。

演出那天，中亚国立学院领导、我们的系领导、教师、我国驻塔什干领事甘梧鲁及其工作人员都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学院领导、系领导，我国领事等均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非常兴奋，我更是激动万分，因为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

为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实习，到农村，到工厂，到博物馆、到医院，到动物园等。有一次我们下乡摘棉

花，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是苏联的主要产棉基地，棉田面积很大。在棉桃累累的棉田中摘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浪漫，是一项很苦的劳动。很多学校的学生都来参加摘花劳动，我们被安排在塔什干西部的一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共同劳动的美好时光，建立了朴素的感情。

谈到此，我想介绍一下有关乌兹别克人民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乌兹别克历史悠久，和我们维吾尔族一样，同操突厥语，可以说和维吾尔族是同胞兄弟。除历史上个别统治者之间发生过冲突，维吾尔族人民同乌兹别克族人民历来相互帮助，友好相处。许多风俗习惯，食宿穿着等都十分接近。乌兹别克人勤劳，勇敢，有着传统的优秀文化。到中世纪时，乌兹别克人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音乐、舞蹈、天文、建筑，雕刻艺术等科学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哲学学科方面尤其居主导与领先地位。乌兹别克音乐，在中亚细亚操突厥语的民族中历来占据着一席重要地位。乌兹别克音乐的渊源是“木卡姆”，他们的“木卡姆”比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曲目短，涉及面窄，却有其独特的丰富内容。中世纪时期，他们的文化科学发展到顶峰，在突厥人民当中影响颇大。当时，乌兹别克人当中出过不少闻名于世的学者文人，如法拉比、那瓦依、乌鲁拜克、巴布尔等等。这些学者文人不仅对突厥文化，而且对中亚、近东亚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十月革命胜利后，乌兹别克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科学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绩。从193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拥有数所高等院校、科学机构、俱乐部、影剧院、马戏团、图书馆的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在科学文化的发展方面，乌兹别克在中亚与近东亚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是中亚文化教育的中心，当然这是苏联共产党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必然结果。

乌兹别克斯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矿产资源丰富，到处瓜果

飘香。自然条件比其他中亚国家得天独厚，近似我国南疆地区。风土人情，语言习俗与维吾尔族很相似。正因如此，我们在塔什干学习，除学习上感到有压力之外，一点也没有寂寞感与陌生感，学习，生活都很愉快。回国后，我常常怀念作为中亚文化中心的那座美丽的塔什干城，怀念我在那里度过的学习生涯及给了我知识，教育我成长的学校领导和老师。解放后，我曾两次去塔什干旧地重游，看到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感到由衷的亲切与兴奋。

1937年夏，我们临近毕业。毕业前的两三个月是最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当时的紧张与繁忙难以形容。以优异成绩向祖国亲人汇报是同学们最大的愿望及唯一的目的。那时，我们吃不下，睡不宁，夜以继日地复习考试，考了一门又一门。每考一门，都紧张一次。考场气氛森严，学校考试委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教育部长代表，中亚国立学院校领导、系领导等亲临考场，许多教授、教员，博士也在考场监考。我们个个如同站在法官面前的被告，紧张万分。每考完一门，同学们走出考场的表现都不尽相同。欣喜若狂者有之，哭天抹泪者有之，一言不发，含泪奔向宿舍者亦有之。最后一门课总算考完，同学们盼望考试成绩早日公布，简直是望眼欲穿。

考试成绩终于公布了！榜前人们或兴高采烈，或悲伤失望。我比任何人都激动，我觉得公布的不是成绩，而是两年辛勤劳动的报偿。榜前站满了同学，我挤不到跟前。正在着急，突然听到阿吉尤夫大声喊道：“赛福鼎，赛福鼎呢？”当有人向后指着我，告诉他我在人群后面时，他推开周围的人，把我连拉带拖拉到榜前。我抬头张望，只见我的名字排在榜首——赛福鼎·塔西阿洪（当时我用的是父亲的姓），科目成绩表上清清楚楚填着十七个满分——五分。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看一遍，的的确确，一点不错，十七门考试科目我全部得到满分！我欣喜若狂，真想把花帽抛向高空，同学

们纷纷伸出大拇指，夸赞我了不起。当时，我尽管高兴，还算理智，既没跳跃，也未将花帽抛向空中，我只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我最没有把握的数学、化学两门课居然得了满分，令我尤其惊喜。我的名字下面是“赛都拉·阿不都诺夫”，一个塔城来的塔塔尔族小伙子，得了十六个五分，一个四分。再后面是阿吉尤夫，十五个五分，两个四分。我们这前三名成为同学们狂热祝贺的对象，当时的热烈场面，至今想起来还令我激动不已。

第二天，成绩优秀者的名字上了光荣榜。在隆重庄严的毕业典礼大会上，教育部长代表、学校领导和我国驻塔什干领事先后讲话。我代表毕业学生（我是学生会主席）最后讲话，对领导和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与崇高的敬意。就这样，我们圆满结束了塔什干的学习生活，回到了我们的故乡新疆。

我们从塔城入境。当地官员对我们相当冷淡。（原来先回国的第一批苏联留学生到达塔城后，狂妄自大，自命不凡。他们对塔城道台没亲自迎接他们大为不满，表现粗暴无礼。一个名叫阿木提·霍加尤夫的大喊大叫：“我们从苏联留学回来，今后要掌权，一个小道台竟敢如此小看我们，真不是东西。”引起当地官员的极大反感，故迁怒于我们，对我们十分冷淡。）他们派人送我们到一所学校住下。塔城道台以后来看望我们，对我们解释说，现在南疆当局正在镇压暴乱，塔城全部车辆均调往南疆，故只能用马车将我们送往乌鲁木齐了。我们见当局如此对待我们，刚回来的满腔热情一落千丈。我们原也像上期学员一样，认为自己是当局送出的留学生，是栋梁之材，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受到冷遇原有些不满，尚能对付，如今竟让我们乘马车去乌鲁木齐，岂不欺人太甚？然而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一群无权无势的青年学生尽管忿忿然，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屈尊乘马车上路了。

当时塔城的马车夫大多是俄罗斯人，给我们赶车的自然也是

俄罗斯车夫。我们每四人乘一辆马车，马车的一半装饲料，另一半装我们的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面。每天走不多远，马车夫便以马累为由要我们扛上行李步行一程，遇到高坡或山路，还要我们推车。夜间车夫不在城里住宿，而一定要露宿在有水、有草的荒郊野外。我们一路吃不好，睡不好，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整整走了十二天才到达玛纳斯。

从塔城到玛纳斯这十二天的艰难旅程，使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在苏联出门坐汽车、坐火车的舒适，心中常涌起一股股说不出的酸楚。短短十二天，同学们变得又黑又瘦，手、脚打泡，乍一看与马车夫简直没什么两样，那种英俊潇洒的留学生风度已荡然无存。

正在我们为下一步的旅途艰辛愁眉不展之际，盛世才派了两辆卡车来接我们，督办公署一位汉族副官同时到达玛纳斯迎接我们。虽说是卡车，比起马车来却是又快又舒服，我们满意极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乌鲁木齐，结束了颠簸艰辛的旅途生活。政府派车接我们，使我们心灰意冷的心绪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

到达乌鲁木齐，卡车直接送我们到西大桥前的西公园。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物前，几位汉、维官员迎候我们，有人介绍其中较老的一位汉族官员是当时的教育厅长张馨。我们被带到二层一个大殿堂，殿堂内放置了几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一些茶点干果，看来对我们还挺重视。那位教育厅长致了欢迎辞，我作为学生代表致了答辞。

这一切对于我们从一回国在塔城受到冷遇后灰心丧气的心境总算给了一点安慰，使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们盼着先到一个像样的旅馆，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换换衣服，休息一下，然后安排个合适的工作，我们好报效祖国。谁料想别说旅馆，就连间像样的房子也没让我们住上。简短的欢迎会一结束，我们便被送进了大西

门的一座旧寺庙。寺庙破旧不堪，又脏又臭，众多鸽子在寺顶筑巢。我们睡在大通铺上，一个挨着一个，连翻身都感困难。这么多人只发一个吃饭用的碗，吃饭时，大家轮流用这只碗打饭。鸽子每早“咕咕”叫个不停，吵得人没法睡觉，还常常把屎拉在我们头上，过的简直是囚犯般的生活。我们留学归来欲大干一场的满腔热忱一扫而光，真不理解当局既然送我们去苏联留学，培养我们，何故又不用我们，同学们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在这里，我们的伙食极差。每日三餐粗茶淡饭，炒菜见不到油花，打饭排队，去晚一点就什么也打不上了，只好挨饿。一天，我们排队打饭，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排在我前面。我看到他，忽然想起了在塔什干学习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和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记得那天饭菜都不错，只是肉不太烂，脾气暴躁的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大动肝火，把盛菜的盘子连同盘内的菜一起扣向送饭的招待员姑娘。由于姑娘躲得快，没打着，气得那位姑娘哭着跑出了食堂……想起这件事，我对排在我前面的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开玩笑说：“哎，买合苏托夫先生，这回不扔盘子了吧？”同学们一听会意地哄堂大笑。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没好气地说：“得了，得了，肚子都快饿瘪了，还有心思开玩笑！”看来处于如此恶劣环境中的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对自己昔日的无礼大约也进行了反思。类似这种玩笑、讥讽在我们之间时常进行。早晨起床后，被子床单上的鸽子屎会引起连锁反应的玩笑。大家对塔什干学习生活的怀念，对现实的不满与种种困惑、酸楚似乎都在这些无可奈何的玩笑中得到了释放。

以后，乌鲁木齐的局势随着南疆暴乱越来越阴森可怖。提起“盛督办”，人人提心吊胆。亲朋好友相聚，不敢纵情谈笑，只能左顾右盼，窃窃私语。“南疆镇压暴乱，大批暴动者被抓，被杀”，“麻木提师长外逃印度，暴动被彻底镇压，目前还在继续清查”之类的传闻

不胫而走，搞得人们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

“南疆暴乱”究竟是怎么回事，麻木提师长何故“逃往印度”，对这些问题我颇感兴趣，总想搞个水落石出，弄清来龙去脉。这是由于当时活跃在新疆政治舞台上的众多人物中，我最先认识，直接接触过的就是麻木提师长。去苏联留学也是麻木提师长提携帮助的结果，他对我是有恩之人。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尽管处于黑暗的白色恐怖中的人们不愿谈论国事，以避免引火烧身，但由于我的执著，真诚，还是感动了不少人，为我提供了我留学苏联期间，发生在喀什及麻木提师长周围的一些情况。

据知情人士透露，1936年至1937年初，是麻木提师长处境困难，日子最不好过的时期。盛世才惧怕和加尼牙孜阿吉和麻木提师长，更惧怕觉醒了的维吾尔族人民在他们的率领下奋起反抗，推翻其独裁统治。为维护自己的反动政权，他千方百计想除掉两位暴动领导人。他欲擒故纵，先把和加尼牙孜阿吉骗到乌鲁木齐，给其戴上“政府副主席”的桂冠，然后在喀什给麻木提师长一顶“师长”高帽，同时任命刘斌为喀什警备司令，令其控制麻木提师长，把麻木提师长架空。

为削弱麻木提师长的实力，盛世才不顾麻木提师长的反对，强行抽调麻木提师长的亲信、骨干阿布都拉赫曼、尼扎木丁阿吉、阿尤甫拜克、穆蒂维拉阿洪、谢力甫阿吉、托乎提部长、艾穆代木拜克阿吉、巴拉提团长等赴乌鲁木齐学习，以后又以培训为名，调麻木提师长手下的两名团长和四名连长到乌鲁木齐。这还不算，盛世才还控制喀什与南疆的警察机构，大搞间谍特务活动，置麻木提师长及其部下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残忍地关押杀害数位麻木提师长的支持者，逐渐使麻木提师长成为孤立无助的光杆司令。

麻木提师长深知盛世才居心叵测，但因盛世才有苏联的支持，

实力雄厚,对盛世才也奈何不得。麻木提师长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均未能奏效。他曾派遣伊明·瓦衣迪和莫敏阿洪二人秘密前往南京,向蒋介石告发盛世才在新疆对南京政府阳奉阴违,大搞独立王国的罪行。但蒋介石却不予重视,只是安慰他所派去的代表,说什么目前全国忙于抗日,无暇顾及盛世才,请他们等待一个时期,把麻木提师长所派代表打发回疆。二人回来时,伊明·瓦衣迪留在兰州,莫明阿洪行至哈密被盛世才的特务抓获。

麻木提师长为摆脱困境绞尽了脑汁。1936年12月,他召集忠实于自己的部下司马义别克、穆衣提·排衣孜、亚可夫团长、依米提阿吉和克其克阿洪等人一起商量对策。经商议,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立即举行暴动,一个方案是先做准备,等待时机,伺机行事。经过充分讨论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不想秘密泄露,喀什警备司令刘斌与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得到情报上报盛世才,造成盛世才与麻木提师长的矛盾公开化。

1937年初,乘众人欢庆古尔邦节之机,麻木提师长二次召集亲信商议对策,决定集中兵力,在英吉莎发起暴动。想不到这次的行动计划又走漏了风声,被警备司令部获悉。盛世才闻讯先发制人,电令麻木提师长手下的二十三名骨干亲信即刻赴乌鲁木齐学习,令麻木提师长赴乌参加第三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麻木提师长深知有诈,借故推脱未去。没过几天,喀什警备司令刘斌以有要事相商为由约麻木提师长去疏附县。麻木提师长知道这又是一计,借故去乌鲁木齐,未去疏附。

1937年4月4日凌晨,麻木提师长以狩猎为名,携亲信穆苏勒阿吉(他的哥哥),巴雅洪·艾则孜,阿不都拉大毛拉,那衣木(?),嘎衣提阿洪,谢力普阿洪,亚森卡力、阿不力米提等计三十五人偷偷出城去了莎车。临走前把军队交付参谋长阿不都尼牙孜统领。

麻木提师长走后几天,阿不都尼牙孜率兵攻打省军驻地,一直打到莎车。克其克阿洪在莎车参加了这次行动,和田马虎山起兵配合,整个南疆到处燃起战火,社会动荡不安。盛世才见状心虚,电令刘斌稳住麻木提师长,表面上请麻木提师长出面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暗地里却磨刀霍霍,准备反击。麻木提师长深知盛世才与自己不共戴天,留在新疆迟早会落入盛世才之手,而落入盛世才之手,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活命,麻木提师长被迫离开新疆,逃往印度寻求生路。(此前穆·布格拉已先出境)

麻木提师长逃往印度之后,马虎山正式发起暴动,率兵从和田向喀什推进。阿不都尼牙孜、克其克阿洪在喀什地区开始武装行动。由此,新疆历史上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南疆暴动”这样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悲壮的历史事件。

麻木提师长逃往印度的原因如上所述 他当时的外甥王公因

活动。若无苏联相助，盛世才是无力镇压暴乱的。盛世才知道自己实力不足，向苏联请求援助。在盛世才的要求下，由四十架战斗机、二十辆坦克、两个（或三个）柯尔克孜、俄罗斯团组成的苏联红军兵团于1937年9月自喀什托云边境入疆。其中一部分兵力进驻巴楚、阿克苏，一部分兵力开往莎车、和田，很快就平息了南疆暴乱。马虎山无奈逃往印度，其主力部队与各级军官部分被歼，部分下落不明，少数逃往敦煌。阿不都尼牙孜英勇阵亡，将士们死的死，逃的逃，克其克阿洪率二百余名将士逃向塔克拉玛干，据说全部死于饥渴干旱。

盛世才的军队和警察机构在这次镇压中，或先捕后杀，或成批屠杀大批民众。且不说暴动首领与一般小头目，就连士兵都难于幸免。与暴动无任何牵连的维族干部及知识分子大批遇难，他们仅凭怀疑捕杀的无辜民众就成千上万。盛世才对新疆人民欠下了又一笔难以偿还的血债。

麻木提师长在国外妄想借助外国援助东山再起，解放全新疆。他和穆·布格拉等人或者亲自出马，或者派遣代表分赴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穆斯林国家求助。最后麻木提师长落入了日本特务机关之手。

不久，盛世才以政治培训为名，把我们集中起来上课。主要课程由盛世才本人亲自讲述，满素尔先生（苏联政府给盛世才派来的文化教育顾问）讲授民族问题，“反帝会”秘书长讲授有关抗日战争和目前形势问题。盛世才主要宣讲他的“六大政策”，有时每周讲一次，有时讲两次，每次讲一、两个小时，讲完布置讨论。授课地点在督办公署西大楼礼堂。每次盛世才讲课，我们都提前到达，而盛世才总是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到。有时我们一早赶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回来，需要在那里吃顿午饭。所谓“午饭”，只是一两个馒头和一

杯白开水。有时等待时间过长，我们提意见，官员们便以“伟大领袖盛督办兼主席工作十分繁忙”为借口堵我们的嘴。

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次我们到西大楼礼堂听课，落座后，突然发现我们已被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包围。桌子中间的过道上隔几步便站有一个手持驳壳枪、全副武装的士兵，礼堂南北角各架起一挺机枪对准我们。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都很紧张，担心自己即刻会变成盛世才的刀下鬼、阶下囚。两个多小时之后，“伟大领袖”盛督办姗姗而至，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地谈笑风声，侃侃而谈，讲完课从从容容，扬长而去。以后次次如此，害得我们每次去西大楼上课都像要上断头台一样胆战心惊。参加培训学习的这两个月像两年一样长，好不容易盼到结束，我们才舒了一口气。

大约是1937年10月中旬，乌鲁木齐突然发生兵变，和加尼牙孜阿吉等大批人被捕，我的哥哥依拉里丁也被抓。11月份我们这批留学生被安排了工作。我先被分配到师范学校教历史，备课三四天，第一次登上讲台就被告之上面有令，调我去了报社。到报社后刚与报社同事认识（艾赛提·亚克夫同志当时在报社任编辑），工作不到一周，又接到要我离开报社去塔城工作的命令。对如此频繁地变动工作，我感到困惑不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仅必须服从命令，而且连丝毫不满的情绪也不能流露，只能与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穆罕默德·胡赛音诺夫三人一同快快赶赴塔城。当时我们哪里知道此去塔城是被流放呢？直至1940年我向塔城专员赵剑锋提出要去伊犁，他不同意，可又没有理由说服我，才不得不将这个隐瞒了三年之久的真相透露给我，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满怀喜悦赴苏留学，在苏联刻苦学习两年，满怀报国热情回到祖国之后，得到的竟是被“伟大领袖”流放塔城不理不睬的“恩典”，如此待遇岂不太有失公允了吗？

第六章 塔城六年

1937年12月,我奉当局之命到塔城报社报到,与我同去报社工作的有穆罕默德·胡赛音·阿不力米提·买合苏托夫当了教师。从报到之日起至1943年6月,我在塔城工作了将近六年,这六年是我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使我有幸得到识别黑白、辨明是非的机会。实践教育了我,我决心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尽力为人民、为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应当说明的是,直到1942年,我的思想仍局限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范畴,停留在留苏期间对社会主义只是感兴趣,对共产主义只有些模糊认识的水平。回国后,虽努力学习,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却还没上升到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高度。对盛世才,我曾一度被他的两面派嘴脸所迷惑,对他及他的“六大政策”给予极大的信任,认为他在新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逐步进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对他曾寄与莫大的希望。盛世才在一段时期内高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推行比较进步的政策,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得到苏联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一切使我对盛世才更加刮目相看。留苏两年,目睹社会主义苏联的伟大,我对苏联由衷崇拜,这种崇拜之情也是我对苏联支持的盛世才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斯大林不会支持一个坏人,这种唯心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使我没能很好地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看清盛世才伪政策的实质,没能结合新疆人民的思想与生活的实际,看清盛世才假面具后面的法西斯真面目。这是当时我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1937年11月底,我开始了塔城报社的编辑生活。报社社长杨

河林(音译)对我很热情。他把我领进一间很大的维文编辑室,介绍给正在工作的编辑室全体工作人员。编辑室主要编辑人员有:副总编尼雅孜·依沙克,翻译穆罕买提江·伊利哈木加诺夫(依伯德),编辑夫则伊利·玛合苏木,编辑兼俄文翻译阿日夫·布尔纳肖夫等。这些人中有些人对我很热情,有些人对我毫无反应,个别人则非常冷淡。我和穆罕默德·胡赛音被安排在边角旮旯的一张办公桌旁,就此开始了在塔城报社编辑室的工作。

上班后两三个月,编辑室的负责人总是让我们翻阅报刊杂志。报刊杂志看腻了,我们百无聊赖,只好以看小说打发时间。编辑室不给我们安排工作,我们忍无可忍,找到报社总编杨河林,诉说无事可做的苦恼,请求他的帮助。杨河林安慰我们说:“没关系,你们好好学习,编辑部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你们一定要注意与编辑们搞好关系。”他借给我们两本列宁著作,要我阅读。

又过去了两三个月,编辑部仍不给我们安排工作,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种坐冷板凳的寂寞滋味,硬着头皮向二位负责人提出抗议。我说:“我们耐着性子坐了六个月冷板凳,实在受不了。你们终日忙碌,我俩闲得发慌,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你们到底给不给我俩安排工作?”夫则伊利似早就知道我们会责怪他们,用早已准备好的理由搪塞说:“小伙子,别着急。办报这个行当,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你们好好学学再说吧!”他的阴阳怪气使我们更加气愤,我俩一气之下找杨河林告了他们一状。杨河林出面作了不少工作,编辑部才勉强给了我们一些校对任务。穆罕默德·胡赛音脾气倔犟,忍不下这口气,干脆离开报社去当老师。我则抱着“倒要看看办报有多难”的想法留了下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起来,他们了解了我,与我的关系也融洽多了。阿日夫这个人的人品不错,平时不喝酒的时候,少言寡语,只知埋头苦干。他经常从苏联报刊杂

志上选一些文章指给我看,但只是指指而已,从不吭气。他挑选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科学趣闻、轶事和信息,另一类是有关历史的。他的知识面广,水平高,我对他颇有好感。不久,我俩就成了好朋友。

除杨河林外,我与汉文编辑室的几位汉族青年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谈天说地,互相帮助。因与印刷厂工人有工作上的联系,我与那些印刷工人相处得也很不错,休息时常与他们交谈。就这样,我在报社渐渐扎下了根。

第二年,我被从校对提为编辑。我对自己的工作相当满意,加之报社又将出报前清样的签字付印任务交给了我,我更加感到自己得到了报社的信任,责任重大,更加尽职尽责地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工作。

其实,出报前清样签字付印是责任性极大的差事,是别人都不肯干,才推给我的。我认为干责任重大的事情是报社领导的信任,所以乐于接受,于是我便成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一定责任的编辑了。

在塔城报社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搞编辑、办报纸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知识面要广。为了搞好工作,我必须大量阅读各种书刊杂志,丰富、充实、提高自己。我当时经常查阅苏联出版的各类报刊杂志,参考这些书刊杂志的内容,学习它们的版面设计等。我经常参考的是《真理报》和《红色乌兹别克斯坦报》。

当时,新疆各地出版的各类报刊逐渐增多,也可以参考借鉴。通过阅读各类报刊,查阅资料,收听广播,我觉得大大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国际、国内、政治社会斗争、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

在苏联留学时,学校没有给我们开设社会学科课程,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正式课程讲授,只是安排自己看教材、听讲座、参观,自学。我们虽然看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因课程多,

时间紧,加上没有专门老师辅导答疑,因此学得不深不透。在塔城报社工作期间,有了学习政治书籍的时间(我从苏联带回不少书),有问题,可以请教总编杨河林。杨河林知识渊博,也很耐心,每次向他请教,总能得到他的热情指点。在杨河林的帮助下,我学习了两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受益匪浅。后来我又陆续学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每学完一个章节,杨河林总要给我出几道思考题,听完我的回答,对我理解不深不透之处耐心进行讲解,帮我加深理解。在杨河林的帮助下,我在理论学习方面进步很大。杨河林是从东北去苏联,由苏联来新疆的,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拥护共产主义,有共产主义倾向,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各方面对我帮助都很大。

除学习政治理论书籍,我还努力学习文学知识,提高文学修养。我抓紧时间阅读长篇名著,短篇小说,优美的散文和文艺理论书籍以及书评,从各方面充实自己。其实,在苏联留学时我就开始喜欢上了文学,看书越多越入迷,直至最后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就这样我把塔城报社变成了提高各方面水平,增长各方面知识的又一所大学校。

在报社工作的同时,我还受聘于一些学校任教。最初在一所师范学校任课,这所师范学校暑假举办教师培训班时,我也为教师培训班上课。后来我又受聘于一所中学,每周八至十课时。我先教政治,偶尔举办时事(主要是国际形势)讲座。后来教文学,后几年还兼讲历史。

讲历史时,开始教世界史,后来教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我了解不多,这门课原来由一位名叫凯英的达斡尔族教师讲授,以后这位教师调到报社工作,先当翻译,不久便接任调乌鲁木齐工作的穆罕买提江副社长的工作。担任了副社长,他无暇兼课,便把这门课交给了我。我用他翻译好的教材上课,不敢逾越教材规定的范围半步,循规蹈矩,接部就班。由于教材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同学

们提不出什么问题难为我，我的课上得还比较轻松、顺利。

在中学教书的过程，实在也是个学习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再学习的极好机会。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得先有一桶水，这就需要自己首先认真学习，才不致误人子弟。较之报社工作，我更热衷于教育工作。看到倾注心血精力培育出的学生成了材，那种宽慰，欣喜的心情是没当过教师的人品味不出的。

我任教的这所中学，民族学生较多，男女分班。开始，两个班的课都由我上，后来我被固定教女生高班。该班大多是塔塔尔、乌孜别克、哈萨克族姑娘，维吾尔族女生较少，这较少的维族女生中就有以后成为我夫人的阿依木。

塔城姑娘热情、开朗，活泼，可爱。不知是因为我讲的课对她们有吸引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姑娘们都喜欢听我讲课，也很尊重我，我们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课上，学生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课下围着我，有说有笑，问这问那，我们之间很快建立起深厚真挚的师生感情。学生们的热情激励我更加认真负责地授课，更加注意不断探讨新的、科学的教学方法，融历史、文学于一体，使我的课更加富有感染力，更加有趣味。讲政治课时，我结合新疆社会的现实，给她们讲新疆的社会状况，阶级差异、阶级矛盾等等，由于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们非常爱听，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对我也越发尊重、越发爱戴了。

教师这个职业是崇高而受人尊重的职业，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在塔城教学，是我平生第二次从事教学工作（若从我13岁当一周小先生时算起该是第三次了）。作为教师，你付出的越多，社会和人民回报给你的越多。看到自己桃李满天下，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活跃在各条战线，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教师该是何等骄傲，何等自豪！自己付出的辛劳又该是何等有价值啊！在塔城那所中学，我教过的那些学生如今均已进入暮年，他们曾在各条战线为

新疆的繁荣富强努力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而至今仍对我——当年教过他们的老师怀有深厚的感情及深切的敬意。

说到此，我又想起了一件令人激动的往事：

大约是 1953 年，我到喀什与当时在喀什工作的王恩茂、左齐、伊敏诺夫等同志一起去阿图什视察。我们从上阿图什到下阿图什，从下阿图什转到伊塔尔奇、布亚麦提、提坚等地。路上要过一座桥，不巧桥坏了，需修复后方可通过。利用等待修桥的机会，我们一行坐在田埂上稍事休息。谈笑间，路边一座农家小院中走出一位头披白棉纱巾、头发花白的妇女，她热情地与我们打过招呼便返回院内，不一刻与一位男人一起，怀抱一个特大甜瓜走出小院，亲切地招呼我们吃瓜。那位妇女问我们是从乌鲁木齐来的，还是从喀什来的，我们告之有从乌鲁木齐来的，也有从喀什来的。她不时用眼睛扫视我，终于忍耐不住地发问：“你们认识赛福鼎先生吗？他是我们阿图什人，出生在我们这个提坚村。”伊敏诺夫很感兴趣地问她：“您见过他吗？认识他吗？”那位妇女颇有感触地回答：“怎么能不认识呢？他给我们教过书，是我的老师，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伊敏诺夫笑着对她说：“那就请您好好辨认一下，我们这些人里面可有您的那位老师没有？”她仔细地打量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和伊敏诺夫两个维吾尔族，终于，她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神情专注地凝视片刻，一下子扑到我面前，激动地抱住我说：“您不就是赛福鼎先生吗？”她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王恩茂同志和左齐同志见状不知是怎么回事，惊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原来，1935 年我在提坚学校当老师时，她正是我所教班级的学生，名叫阿米娜。我记得她当时坐在第二教室的前排，我经常提问她。谈起往事，她是那么兴奋，脸上溢满幸福的笑，仿佛又回到了焕发着青春朝气的学生时代，人一下子显得年轻了许多。她二次跑回自家小院，叫出刚才与她一起招待我们吃甜瓜的男人，向我介绍，那是她

的丈夫。随后又用餐巾包了几个馕，端出一大碗酸奶送到我们面前，一定要我们吃。盛情难却，我们只好边吃边聊，感到非常高兴，王恩茂和左齐同志听了我的介绍后非常感慨。由这次意外的重逢，受到她亲如家人般招待的小事，我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学生永远不会忘记传授给自己知识，教育自己茁壮成长的老师，师生之间的感情是人世间最圣洁、最伟大的感情。至今我还常常想，若自己永远当一名教师该有多么幸福！多么快乐！

在塔城工作期间，我还参与了大量的文艺宣传和文化启蒙工作。当时，除了省里，各专区、县均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化启蒙协会。这些文化启蒙协会靠募捐、扎卡特税^①的收入办学，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文艺演出，以配合文化启蒙。我初到塔城时，这里只有一个名叫“萨纳依乃弗赛”的文工团。该团人数不多，只排演一些小型歌舞节目，偶尔也排演一两场独幕剧。我们来之前，他们刚刚演过一场鞭挞吸麻烟、揭露赌博危害的小剧目。原想以此教育各族群众，不想事与愿违，剧目公演后，竟使其他一些民族产生“维族人只会吸麻烟，只会赌博”的偏见，维族群众对此当然不满。为挽回不良影响，该团打算再排演一些其他剧目，但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迟迟拿不出剧本。正在这时，我们来到塔城。当时我们这些留苏归来的年轻人被社会各界称之为“塔什干派”，有一定的影响和名气。塔城文工团把我们视为“救命恩人”，从协会主席到仓库保管员一齐上阵，恳请我们帮忙，演员们对我们寄予的热望比之协会主席和仓库保管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我们三人的信任令我们深为感动，我们很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决定与他们一起，为发展民族文化，唤醒各族民众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① 扎卡特税——伊斯兰教宗教税收之一，按经典规定每年缴纳一次，税率为四十分之一。

不久，我当选为维吾尔族文化启蒙协会的秘书长。该协会主席是个半文盲，需要我们大力协助。除协助主席工作，我主要的分工是负责文艺演出。

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人雄心勃勃，立志努力发展维吾尔艺术，使维吾尔族的文化艺术水平尽快超过塔城舞台上其他民族的水平。而超过塔塔尔族，绝非易事。当时塔塔尔、乌孜别克族文化艺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上演过一些规模较大，剧情复杂的剧目。塔塔尔族中文艺爱好者很多，多为知识分子：其中有一名叫赛普林的艺术导演受过专门训练，艺术素养颇高，名气很大。这些情况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深知“超过塔塔尔族”的口号绝不可轻易提出，可我们这些“初生牛犊”还是鼓足勇气做出决定，一定要超过塔塔尔族！

为了超过塔塔尔族，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首先，我们扩大能写、能编、能导的创作、编导队伍，吸收了一些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到文工团里来。然后，我们在社会上积极物色文艺人才，稍会弹奏独塔尔、热瓦甫的，稍有些歌唱、舞蹈特长的，不管他是鞋匠、剃头匠、裁缝还是社会闲杂人员，我们都积极动员，热情吸收到我们的文工团中来。招收了相当一批团员之后，我们根据各自的特长，把团员们分为乐队队员和演员两部分，进行培训、排练。由于大家积极热情，团结一心，我们这些文艺新兵进步很快，不久就排练出了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歌舞节目和剧目。我们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业余文艺爱好者，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每天排练都要在下班后，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大家都很自觉，不用动员，不讲报酬，每天排练到十点，十一点，有时更晚，礼拜天经常也得搭上。对此，我们毫无怨言，充分体现出了我们这批业余文艺爱好者对振兴民族文艺的执著、积极与主动。

我的夫人阿依木所在学校的文艺宣传搞得很活跃，学校组织

学生排演过一些歌舞小节目。阿依木能歌善舞，我看过她登台演出，演得很不错。我觉得她是个人才，便通过她的学校，邀请她参加了我们的组织。根据她们学校领导的要求，我为他们创作了一个名为《九·一八》的独幕剧剧本，帮助他们将此剧搬上了舞台。这个独幕话剧主要表现的是抗战时期东北某山区一支女游击队英勇抗日的动人事迹。阿依木出演主角，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当时，我们团正在准备排演一部名为《血迹》的话剧，其他角色均已确定，只有女主角尚未找到合适人选。阿依木在《九·一八》一剧中的成功表演令我们大喜过望，大家不约而同认定，《血迹》中的女主角非她莫属，于是请她担任了这一重要角色。阿依木不负重望，在该剧的演出中充分展现出了她出色的演技与才华。该剧公演后，我们不失时机地立即将她正式调入文工团，给了她得以充分展露才华的一个广阔天地。

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到了1938年底，演员们的演技大有长进，于是我们把《血迹》一剧正式搬上舞台公演。从1939年开始，我们陆续排演了《光辉的胜利》、《给不速之客的礼物》（均是抗战题材）、《主与仆》、《阿娜尔古丽》、《货郎与小姐》（该剧只排演没公演）、《一仆二主》、《理想医生》等一批剧目。到1941年，我们的艺术水平明显超过了其他民族而与塔塔尔族相近。我们向着“一定超过塔塔尔族”的既定目标不懈努力。1942年，成功地公演了《一仆二主》（意大利十八世纪著名剧作家卡尔洛·哥尔多尼之杰作。此剧在世界舞台上曾轰动一时），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我们自认为该剧从导演到演员的表现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以说超过了塔塔尔族。这一点也得到了塔塔尔族名导演赛普林的承认。

应驻塔城苏联人（当时塔城除苏联领事馆外，还有一个被称为“萨提森图尔格”的苏联贸易集团，该团成员很多）的要求，我们特地为他们演出了一场。开始他们对我们这样一个业余剧团在小小

塔城出演世界名剧持怀疑态度,看过我们的演出后,他们心悦诚服,给了我们以极高的评价。

谈及这些,我并非是向读者吹嘘、夸耀我本人和我们这些文艺爱好者。客观地说,当时我们那些自编、自导、自演的剧目和歌舞节目,按现在水平衡量,无疑是很粗糙,不值一提的。然而我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那样一些包括鞋匠、剃头师、裁缝在内的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业余文艺工作者敢于并认真排练一部大部头的世界名著本身就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在我们这个由文艺爱好者组成的业余文工团里,每人都身兼数职。有的人既是演员,又是乐队演奏员,甚至还是舞台设计。主要演员兼跑龙套是常事。团员之间团结协作,不分彼此,整个文工团似一个和谐融洽的大家庭。收入有一些,演员却无油水可捞,因为收入本身就不多,即便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分给演员,演员所得仍显得少得可怜。老实说,文工团全体成员都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促进推动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货真价实的文艺爱好者。不要说当时,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中,这种为唤醒民众觉悟,振兴民族文化而不为名利、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值得称颂,值得提倡的。

塔城维吾尔族开展的这种卓有成效的文艺宣传活动当时在全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编写的一些剧本,曾被省维吾尔文艺启蒙协会印发全疆,不少地区排练公演过。

在塔城工作期间,由于接触文学、艺术的机会多,我对文学艺术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38年,我学写了一首题为《统一战线》的诗歌,这可算是我之处女作。“统一战线”是当时大力宣传的政策,可我当时写这首诗的思想动机却不能说很清楚。不管动机清楚不清楚、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如何,它毕竟是我的处女作,因此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接着,我又写了一篇较长的名为《孤儿图乎

迪》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农民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压迫，小说的主人公图乎迪被活活埋在河边堤坝之下。这个素材来自民间，当时喀什一带流传着一种迷信说法，即如果河堤经常决口，无法防止，那么，把一个叫“图乎迪”或“吐尔地”（二者均系维吾尔族男人名字，意为“立住”，“止住”——译者注）的人埋在河堤下面，决口便可避免。这个短篇小说刊载在《新生活》杂志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对这样的社会效果我非常满意，于是萌发出一种强烈的写作欲望。这种欲望一发而不可收，我一连写了《沉痛的纪念》、《光荣的牺牲》、《扎曼库勒》、《两种景象》等多篇小说。其中《扎曼库勒》叙述的是一位名叫扎曼库勒的哈萨克孩童在一家私人浴池作工，饱受折磨的痛苦经历。接着，我又创作了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中篇小说《亚迪卡尔》。

我为文工团创作了剧本《九·一八》、《光辉的胜利》、《给不速之客的礼物》，还从哈萨克文翻译了《一仆二主》，并结合新疆实际，改编了苏联乌兹别克剧作家艾米扎·伊克木的《主与仆》。剧本的排演、公演，小说的发表，更激发了我强烈的创作冲动，又继续写了不少，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失落，无法找寻，我手中只保存下两篇小说和一个剧本。

当时写的东西，都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内容涉及抗日战争和民族革命等社会现实。以现在的标准衡量，那些东西无论内容上还是艺术质量上都有很多不足，甚至谬误，但它们是我初学写作的成果，是我青年时代关心国家民族，关心社会大众的思想反映。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我对它们怀有深深的感情，至今难忘。

塔城六年，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段既艰难曲折又充满乐趣的征程。1939年3月，我在塔城与阿依木成婚。我俩的结合纯属偶然。

我本无在塔城成家的打算，因为当时母亲远在喀什孤身一人，我总想有朝一日返回故里，在老母面前尽孝，为老母养老送终。阿依木曾是我的学生，吸收她参加维吾尔文艺启蒙协会的文工团时，正值她的家境十分窘迫。我了解到她的父亲早逝，留下亚森、哈斯木、吐逊娜依和她四个子女，母亲无生活来源的情况，还知道她的父亲在世时以烧窑为业，生活贫困，没有留下什么遗产。父亲去世后，身为长女的阿依木为了全家的生计，只能选择辍学求职、养家糊口这条路。我不忍眼看她的学业半途而废，不忍让她这样一个孱弱的女孩子独自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便毅然决定与她结合，与她共同承担赡养母亲，抚育弟妹的义务。

我们的婚礼相当简单。我每月薪水只有四十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十元），用这可怜的薪水办一个像样的婚礼是根本不可能的。感谢亲朋好友，特别是尼萨姨妈（我的亲戚，从我到达塔城之日起便像慈母般地照顾我）和穆罕买提·尼牙孜卡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了我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结婚一场，没能给阿依木买一件像样的礼物，成为我此生一大憾事。我们只购置了一些最一般的生活必需品。阿依木的母亲没向我索取任何彩礼，令我十分感动。我们的婚礼虽然简单，生活虽然清贫，但我们的感情深挚，在感情上我们感到很富有。亲朋好友欢聚，文工团的演员、乐队助兴，使我们这简朴的婚礼充满了诗情画意，充满了欢歌笑语，宾客们非常高兴，我和阿依木也感到十分愉快幸福。

婚后，阿依木一家五口加上我六口人只有我的四十元收入，生活相当清贫。一年后，阿依木中学毕业，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每月可得三十元薪金。我们的收入增加到七十元，比过去稍好一些，但是亚森和哈斯木到了上学的年龄，供养二人上学的开销很大，因此我们的生活仍然没能得到改善。

1940年冬，母亲从喀什到塔城看我，走到伊犁后病倒。听到这

这个消息我很难过。我坐卧不安，恨不能一步跨到伊犁看望我那历尽千辛万苦的慈母。我四处奔波，恳求当局批准我去伊犁一趟，可当局无论如何不准我离开塔城。当时赵剑锋任塔城专署专员，迫于无奈，我只好求他帮忙，他平日对我不错，可这次他却表示爱莫能助。我再三追问缘由，他才告诉我，我是省里流放到塔城的，上面有令，没有盛督办的批准，我不得离开塔城半步。我闻听此言恍然大悟，但思母心切，我把情况向赵剑锋说明，恳请他无论如何帮我一把。赵剑锋还算帮忙，两次打电报为我求情请假未获准后，第三次又向省府说情，为我争取。最后总算在那年的（1940年）夏天，省府以准假一个月，必须如期返回塔城为条件批准我去伊犁。

当时我和阿依木手头仅有四十元，这四十元刚刚够我们两人从塔城到伊犁的单程路费。我和阿依木一路上忍饥挨饿，历尽艰辛赶到伊犁时，母亲已过世多日。原来在塔城时，阿依木就已经得知母亲过世的噩耗，因怕我承受不住这种沉重的打击，没敢告诉我。我悲痛欲绝，痛哭一场。在伊犁停留已无任何意义，住了不到一月，我们决定返回塔城，但身无分文，如何买车票？来时一方面急于见到母亲，一方面指望这里经济条件较宽裕的亲友能给我们资助返程的盘缠，因而没在塔城筹借足够的路费。没想到这里有钱的亲戚十分吝啬，没有一个人愿帮我们的忙。假期一天天临近，逾期不归肯定会受到惩罚，我和阿依木求告无门，非常焦急。正在这时，我的一位亲戚以“积德行善”的大圣人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拿着母亲留下的一对钻石金耳环，要我把这对耳环给他，他给我们四十元钱作为交换的代价。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位亲戚竟然趁人之危，见利忘义，一手拿着耳环，一手攥着四十元钱逼我。他说如果不愿留下一对，留下一只也行。假期马上就到了，我万般无奈，只好满含酸楚的泪水，追忆着母亲慈祥的面容，怀着对她老人家的深切思念，用母亲留下的耳环换来四十元钱路费，踏上归途。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临终留下遗嘱，将这对钻石金耳环作为送给未见过面的儿媳的礼物留给阿依木。那位铁石心肠的亲戚竟然违背母亲临终的嘱托，作出这等卑鄙之事。至今想起来，我内心深处仍隐隐作痛，不是为失去那对耳环，而是为那位亲戚的无情无义。这件事使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贫穷的滋味，领略到有钱人的铁石心肠。在此提及这件往事，一方面想让读者了解我当时的困境，一方面谈谈有钱人的心是何等狠毒，而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我未能目睹慈母遗容的遗憾，寄托我无限怀念慈母的拳拳之心。

离开伊犁，踏上归途，等待我们的是更大的挫折与艰难。给我们制造挫折的是伊犁公安处。离开伊犁前，我去公安处开通行证。办事人员开好通行证递给我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胖子。该人身穿警服，留着胡须，让人一看就不舒服。这个人正是以无恶不作著称的公安处副处长毛拉洪。他走到我面前，冷冰冰地发问：“你就是赛福鼎？想回去了？”没等我回答，便不由分说地从我手中夺过通行证回到里间。很快他从里间出来，把通行证交给我，打发我离开。

我自认为持有公安局通行证，可以放心大胆地踏上旅途了。可伊犁到塔城的四天旅途，完全不像我原想象的那样平安无事，我和阿依木在旅途上的一次次遭遇使我们一次比一次不安，一次比一次恐惧。伊犁到塔城，一路上有十几个检查站，每个检查站盘问得都特别仔细。每到一站，照例都是先收验通行证，检查站人员看过通行证就朝车上高声询问：“哪个是赛福鼎？”然后把我和阿依木带进站内，让我张开左手，查看我的手指（我想大约通行证上写着我没有左手拇指的情况），确认我是“赛福鼎”之后，便对我们随身携带的衣物、皮箱进行严格检查，检查不出任何破绽并不甘心，还要毫无道理、东拉西扯，胡搅蛮缠地盘问一个多小时，实在问不出什么名堂之后才放行。站站如此，搞得我和阿依木一到检查站便精神紧张，惶恐不安。阿依木年轻，没经过什么事，她不明白检查站何故

如此刁难我，恐怕一不注意说错什么，把我抓走。到后来她提心吊胆，忍不住哭泣起来。我表面上安慰她不要害怕，告诉她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其实也很紧张。我们就这样惴惴不安地过了十多个鬼门关，好不容易平安到达了塔城。路途上有两次虽紧张却十分滑稽可笑的遭遇，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次是在乌苏检查站。检查站的人从我身上搜出一个日记本，上面记着我用拉丁文书写的旅途日记。一位汉族检查人员盘问日记本上记的是些什么，我回答是旅途日记，他不相信，硬让我当众读给他听。我知道他不懂拉丁文，觉得他的要求荒唐可笑，便揶揄说道：“假如本子上真有秘密，我能如实读给你听吗？”他蛮横地坚持道：“你不照实念，我就把你关起来。”我觉得对他再解释什么也是对牛弹琴，便把日记念给他听。念完后他一拍桌子，厉声责问：“你念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你要是不信，就自己念好了！”我把日记本摔在他的办公桌上，再不吭气。他既看不懂，而我的话又无懈可击，他只好放行。

还有一次在车排子检查站。检查人员严格检查完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后，厉声盘问：“你是密谋搞反革命活动的人，我们知道。你要老实交待。”我告诉他们，我是塔城报社的工作人员，不是什么搞秘密活动的危险分子，并拿出塔城报社的介绍信给他们看，证实我的身份。他们看了介绍信，硬说介绍信是伪造的。我说：“你们要是不信，给塔城报社打个电话一问不是就知真假了？”他们犹豫半天，最后向我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你能说出塔城报社的大门朝哪边开吗？”我觉得他们提的问题太可笑，便反问道：“塔城是个巴掌大的地方，凡是到过塔城的人，都能说出塔城报社的大门朝哪边开。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太愚蠢了？”他们一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威胁我说：“你太不老实，我们现在就把你关起来！”与我们同路的一位汉族军官在外面等得不耐烦，闯进站

内催促检查人员快些检查放行，他听完我和检查站站长的上述对话，鄙夷地指着审问我的那个人说：“就凭你这个德行，还能当检查站站长？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笨蛋！”检查站站长瞠目结舌，无言答对，眼睁睁地看着那位汉族军官把我领出检查站大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坐上汽车扬长而去。

一路担惊受怕，一路艰难险阻，总算平安到达了塔城。在塔城公安局门前，一位名叫萨比尔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查看完我们的通行证，十分惊奇地问我：“你们拿着这样的通行证平安回来可真是奇迹。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见他问得奇怪，向他打听我的通行证有何与众不同之处，他指着通行证右上角一个汉文打字机打出的红色符号告诉我：“这是嫌疑犯的标记。”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伊犁公安处的毛拉洪把我的通行证拿到里间他的办公室内，是在我的通行证上打上了这样一个可恶的标记。这个标记害得我一路上受尽折磨，我觉得这是吃了不识汉字的苦头，可又一想，认识汉字又能怎样？认识汉字，知道这个标记对我不利又能怎样？我真成了“色依提好汉”了！^①拿着“嫌疑犯”标记的通行证，一路上主动送人验证，受尽折磨，竟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到1942年，我们察觉到盛世才的政策有所变化。这大约是因为我们在报社工作，消息灵通，比较敏感之故。一天，总编杨河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盛世才近期的一次讲话。杨河林对我说：“你好好琢磨琢磨这条新闻，政策大概要亦”当时我们虽然意识到盛世才政策的变化，可日常工作且照

西斯战争，国内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形势相当紧张。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报社的工作也随之紧张起来。报社每天要收听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电台的国际新闻，收听记录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样，我每天晚上必须加两三个小时班，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盛世才政策的变化日趋明朗。1943年元月，新疆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塔城随着建起分部。专员、警察局长等要害部门的头目被大批撤换。1943年元旦那天，杨河林总编把我和阿依木叫到他的办公室，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们：“昨天我一连收到三次电报、电话通知，都是省里来的，命令开除你俩的公职。对此我只能执行，我舍不得放你们走，但实在无能为力。”他取出一份写好的鉴定材料，材料上肯定了我们在塔城报社工作期间表现良好，与两个月工资一起交给了我们。临别时，他眼含热泪谆谆告诫：“我很理解你们，同情你们。今后你们要提高警惕，一举一动要格外小心，一定要想方设法离开塔城。”我们挥泪告别杨河林，满怀被无故驱逐的委屈与气愤离开了工作几年的塔城报社。

我和阿依木在报社工作，虽收入微薄，却还能勉强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今失去工作，没有收入，一家六口如何过活？我们四处奔走，寻找工作，但许多单位都不敢录用我们。本来我还担任着塔城维吾尔协会的秘书长（后来成了副秘书长），后还被推举担任该协会副主席的职务，不想被赶出报社后，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的职务竟也被罢免。我找到协会主席阿乌特阿吉询问缘由，他说上面有令，他虽同情却也爱莫能助。他看我们找不到工作，无以为生，实在困难，便安排我当协会会计。我对会计业务一窍不通，不敢贸然承诺，找到阿依木一位以前当过会计的亲戚柯尤慕请教。柯尤慕精通会计业务，一口答应教会我。为了养家糊口。我接受了这个安排。柯尤慕非常热心，他帮我在会计簿上画好各种表格，耐心教我如何填表，如何结算，在他的耐心指导和具体帮助下，总算没出什么问

题。可就是这么一个会计职务我也没能干长，只干了一个月，协会便迫于上面的命令把我辞退了。

生活无着，走投无路，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全家老小饿肚子。为了全家生计，我拾起了小时候学过的一点裁缝手艺，求一位名叫里特甫江的裁缝接收我为他的帮工。里特甫江是个文艺爱好者，在我们的文工团里帮过忙，以前关系还凑合，我在他的裁缝铺里干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由于没钱，手头拮据，我们在肉铺、馕铺、菜铺四处赊购。月底债主纷纷催要欠款，我想讨回一个月的工钱还债，里特甫江却翻脸不认人，一分工钱也不给。他说：“你这么个半拉子手艺，做的衣服拿不出手。你得再干一两个月，手艺过关了才能付你工钱。”他态度恶劣，全不讲亲戚情分。一气之下，我毅然辞去了这份活计，另找出路。

我们四处托人，八方奔波仍找不到活路。在最困难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得到了与我们无亲无故的伊明·斯拉木的热情帮助。他在我家对面那条街上开设一个小饭铺，他心地善良，很喜欢我。看到我们的困境，深为同情，经常半斤八两地送些肉给我们，时时端盘包子，两盘拉面之类的饭食帮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然而这终非长久之计，他不过小本经营，只能勉强维持自家生活，哪里有能力长期照顾我们一家？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可东奔西走，仍然找不到工作，可真把我们急死了。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为找不到活路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位在地区行署工作、名叫钟英（后改名钟德华）的锡伯族职员主动找上门来，为我介绍了一份工作。他当时除在地区行署谋职外，还兼任塔城唯一一所影剧院的主任职务，与我关系不错。他一直同情我，见我几乎陷于绝境，便不顾有关方面找麻烦，主动把我找去，对我说：“想帮你在政府部门找事干没有半点可能。我愿意在我权限允许的范围内助你一臂之力，安排你在影剧院工作。名义上是勤杂

工,实际上行主任之职,一个月给你开二十元工钱,你看行不行?”在这危难之时,有人如此相助,我感激尚来不及,怎能拒绝人家的一番好意?我慨然同意,当即来到影剧院上班。

上班第一周,我遵照钟德华的意见,干的是影剧院主任的工作,不料这样做激起了影剧院一些汉族职工的不满。他们攻击我名为勤杂工,却不干本职活计,不务正业,迫使我干勤杂工的活儿。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经观察才发现他们是受专员公署一个干部的挑唆,故意找碴。少数民族职工对他们的作法很不以为然,我怕引起民族纠纷,便做少数民族职工的工作,向他们解释说,我名为勤杂工,理应干好自己的份内事儿,劝他们不要激动,不要做出不利于团结的事情。

我的份内事儿主要是张贴海报,售票检票,打扫剧场等。让我干的第一件事是张贴电影海报。头一天,我一手拿着写有电影广告的三张海报和一块小黑板,一手提着一小碗浆糊走到街上。看着很简单的事情干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我不知从何下手,一会儿往墙上抹浆糊,一会儿往海报上抹浆糊,怎么也不省事,费了半天劲贴上的海报歪歪斜斜,皱皱巴巴,让人看着很不舒服。我为此感到懊丧,无精打采地回到影剧院。

第二天去贴海报时,一位看护公园的汉族老大爷主动过来给我帮忙。他拿着一小桶浆糊和一把小扫帚,让我在一旁等着,只见他用小扫帚沾上一点儿浆糊,“唰唰唰”,在墙上来回抹几下,从我手中拿过一张海报,把这张卷成筒状的海报打开,上边贴好,用小扫帚把海报从上到下“唰唰唰”抹几下,海报便乖乖地贴到了墙上,端端正正,平平展展,让人看了那么舒服。我连声向老大爷致谢,同时领悟到,干什么事都必须掌握要领,任何貌似简单的事,不掌握它的规律,不懂门道,也干不好。就这样,在那位热心善良的汉族老大爷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又快又好地贴海报的方法。

第三天出去，那位老大爷又来了。他从我手中接过浆糊桶和海报对我说：“这事我来帮你干，每天你把剧场打扫干净就行了。”我非常感动，一再向老大爷表示感谢。说实话，我实在不忍心给这位善良的老大爷添麻烦，可老大爷执意帮我，真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接受了老大爷的真诚关心与帮助。从此，每天贴海报的活儿就由老大爷承包了。

在影剧院，工作时间虽然不长，我却感触颇深：一位锡伯族好心人热情帮我安排工作；一些汉族职工攻击我不务正业；一位善良的汉族老大爷主动替我承担张贴海报的任务。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总是同时存在，同时体现。真善美终究会战胜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谊会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在影剧院工作的这段时间内发生在我周围的这些事使我对这些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除了张贴海报，作为勤杂工的我，要干的事情还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工人主动替我分担了一些任务。一位年轻人包下了售票的差事，另一位青年替我检票，剩下的主要是清扫剧场和打扫座位的活儿了。这个活儿我和阿依木一起干，开始时我俩每天在晚场电影或演出散场之后打扫，需要打扫很长时间。每天很晚离开剧场，早晨按时上班，非常劳累。以后我俩商议将打扫的活儿改在早晨干，这样既不影响演出，我们也不致太累。打扫剧场本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可由于观众缺乏文明习惯，每次观看演出或电影时都是边看边吃，在剧场留下满地的果皮、果核，瓜籽皮等垃圾，加上剧场座位不固定，板凳总要被退场的观众碰得横七竖八，一塌糊涂，因此人为地增加了清扫的难度，每次都需打扫一个多小时才能干净，劳动量确实不小，对我俩来说实在不能算是轻活。

一天早晨，我照例提前来剧场打扫，不料剧场早已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好生奇怪，打听这是何人所为，可问遍剧场

工作人员,也没人告诉我,谁也不知道。我满腹狐疑,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看。第二天早晨,我比往常来得都早,却发现剧场又已被打扫完毕。第三天依然如此,我和阿依木沉不住气了,担心这个活儿被别人抢去,我们又丢掉饭碗。为看个究竟,第四天我和阿依木天不亮就赶到剧场。我俩把门拴好,起劲地扫起来。正扫着,传来了阵阵敲门声,我们没有理会,继续干活儿。敲门的人大约知道我们有意不开门,便设法把门撬开进到场内,我们一看,原来是剧场乐队的几位年轻人。这个乐队有近二十名维吾尔、哈萨克族年轻队员,其中有几位在我们那个文工团参加过演奏。七、八个年轻人由风趣幽默的喜剧演员吐尔逊·艾山(曾任哈密地区文工团导演,前几年不幸病逝)带领,手持扫帚、水桶、墩布,不顾我们的阻拦,硬把我们推到门外,他们七手八脚地干起来。我们这才明白,原来这几个年轻人几天来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这令我们十分感动,我们深切体会到他们对我们的一片深情,感到慰藉,感到温暖。他们的深切关怀与纯真情谊是多么可贵呀!

有一段时间他们大约外出演出去了,我和阿依木又开始自己打扫,但只打扫两天,这个活儿就又被人“抢”走了。那是第三天的清晨,我们一早来到剧场,发现剧场大门从里面紧锁,听声音里边好像有人在打扫。我们敲半天门,无人理睬,只好在外坐等。我们暗中纳闷,乐队小伙子们不在,是谁在帮我们的忙呢?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见两个人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走出门来。原来是柯尤慕和他的妹妹米娜娃尔。他们是阿依木的近亲,柯尤慕是我的知心好友,我俩在报社共事过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他一直替我兼管剧场会计的一摊工作。米娜娃尔与阿依木是同班同学,是位活泼、可爱的姑娘,我像喜欢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喜欢她,她也把我当作亲哥哥,经常与我开玩笑,在我面前撒娇。见到我,她立即跑过来,一下扑到我的怀里,边哭边说:“赛福鼎哥哥,以后别再干这又脏又累的差事

了！你干这个，我们心疼。”柯尤慕走过来接过话说：“说真的，你以后真的别干这个活儿了。这事儿让年轻人干好了。我找人求个情，你到剧场小卖部当售货员或看管剧场内的台球、国际象棋、围棋等娱乐设施好了！”柯尤慕当真向有关人员求了情，他的建议得到了钟英等人的同情与支持，可也遭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这些人的反对没能奏效，在乐队那帮年轻人的坚持下，我终于被安排到小卖部兼管台球等娱乐设施。小卖部只是晚上有节目的时候开，台球、国际象棋，围棋等则时常有人光顾。这里的台球设施是新从苏联进口的，人们很感兴趣，每人玩一小时收费五十分。我的任务是收费、取案子，玩完把台球收好（锁在柜子里），这些事显然比打扫剧场轻松多了。

我在剧场工作这段时期，各种社会压力纷至沓来，使我难以承受。亲朋好友认为我干这种工作有失身份，坚决反对。这些咬咬牙还能对付，而我自己内心的强烈不安却使我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下去了，也就是说，那么多人对我的关心帮助令我感动，也令我过意不去。我不能再给那些好心人增加负担与麻烦，唯有辞职，才能不再给朋友们增加重负，于是我最终提出辞职，离开了这所影剧院。

来到塔城五年来，虽生活艰难，道路坎坷，但得到那么多好心人的帮助，他们那种雪中送炭的情谊，我和他们一起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和他们一起登台演出的情景，都是那么耐人回味，令人难以忘怀，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如今离开剧场，我竟感到那么难以割舍，真舍不得离开。

其实我的这种感情很容易理解。我对这座剧场和它旁边的小公园实在太熟悉了！1937年初到塔城时，这座影剧院刚刚开工搭起架子，就因政府停拨经费而停工了。1938年初，我同几个人联合一起，向社会各界和有钱人募捐，解决经费困难，号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大家齐心协力，于年底终于把剧场建成。学生、干部们

情绪高，干劲大，在剧场周围空地上栽了许多树木花草，对原有的树木重新进行整理规划，在这座新整修的小花园四周建起围墙，四周安装上三座大门和一扇便门。1938年秋与1939年春，在花园里又新栽了不少树，公园门口挂上“塔城人民公园”的木牌，使一座附有一个新建剧院的小公园初具规模，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了。按当时的条件和水平看，这座公园可以算是全省唯一一座带有娱乐场所的新型公园，是夏季人们游玩、散步、休憩的好场所。影剧院每晚放映电影或演出戏剧歌舞，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打台球，下国际象棋。影剧院附设小卖部、啤酒馆、茶馆，经营烤羊肉串，这些极大地丰富了塔城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这座影剧院与小花园从无到有，从简陋到日臻完善，我不仅亲眼所见，而且亲自参与了从募捐宣传到修建剧场，栽花植树、加砌园墙，安装园门以及内部服务，从演出到打杂等一整套活动。我在这里洒下了汗水，付出了辛劳，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旦要离开，能不感到撕心裂肺般地难舍难离吗？

塔城人民公园的建成，不仅美化了塔城的市容，而且大大促进了塔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我在1950年、1960年曾两次回塔城观光，1977年第三次去塔城，当地负责同志对我说：“听说您亲自参加过这座剧场和公园的修建，在剧场登台演出过，是否有兴趣旧地重游呢？”我当然要去，于是在当地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游览了公园，参观了影剧院。老实说，影剧院的现状使我感到遗憾、痛心。这座影剧院和公园的面貌已大不如初建时。进了台球室，一位同志问我：“这个台球案子您认识吧？”这里摆着的仍是那台旧台球桌，但与当年相比，已面目全非：桌上的漆皮早已脱落，变得残缺不全，案上的绒布几处打着补丁。近四十年的时间，人们玩着这唯一的一台台球，这桌子，案子能不破损吗！望着它，我浮想联翩，许多往事浮上脑际，我把那些难忘

的往事讲给陪我旧地重游的同志听,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感慨。

塔城的文化娱乐事业当时确比全省其他城市发达。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塔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原因。塔城与苏联接壤是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当时塔城聚集了不少苏联来塔的乌兹别克,塔塔尔与俄罗斯人,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受其影响,当地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文明程度与文化水平均高于其他地区,这自然要算是它得天独厚的社会原因了。塔城地区各类学校比其他地区也多,除初小教育得到普及外,师资班与初、高中各类学校也不少。虽然二十年代这里开始的新兴教育涉及面较小,但确已有了各种类型的新兴教育。到三十年代,塔城的文化教育事业比之其他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我在塔城工作那六年,它的发展尤为显著。当时用一种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人均能看懂的所谓通用语出版发行过不少各类报刊杂志,出版过大量书籍。塔城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也相当可以,那时塔城各学校培养的一批人解放后,甚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其中不少人去了苏联。

1977年的塔城之行,使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当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塔城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方面却没得到相应的发展。就拿塔城人民公园及影剧院来说,仍是原来的模样,只是由于时间久远,过于破旧,解放后做过一些整修,搞了些植树绿化,仅此而已。这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够有力,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尊重、照顾得也有些欠缺,整个城区连一家饭铺也没有。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可它却反映了不少问题。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六年之久,吃过这里的饭菜,品尝过这里的油盐,为它的建设与发展付出过艰辛的劳动,对它怀有深厚的故乡般的感情。为此,看到它的现状,我非常难过,我应当承担一定

的责任。当时我曾立即召集地区常委特别会议，研究制订了城市建设规划，批给他们几十万元专款。在会上我特别强调了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妥善安置少数民族职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问题。这也算弥补一下我过去对这里的发展关心不够的过失吧。

现在还是言归正传。离开塔城影剧院后，我连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了，只好把家中较值钱的东西甚至衣物拿到当铺典当，换钱度日。到最后，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当光卖净，连一只旧箱子也不剩了。

在这艰难困苦、一筹莫展的时刻，周围亲戚朋友的真实面貌都露了出来。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慷慨相助。一些真正的朋友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帮助我们苦度难关，他们知道我不愿接受别人的物质帮助，就经常悄悄把五元、十元的钞票塞在我们床铺的毡子下面或夹在我的书本之中。当时经常这样帮助我们的是我的知心好友、同学、同乡阿布力米提·阿吉尤夫。他在我之后来到塔城，在税务局工作，可能由于税收提成归己，他的收入较高。不管我如何反对，他经常给我家送些钱物，帮助我们全家解决燃眉之急。除了阿布力米提·阿吉尤夫，布尔津的塔西别克（该人原籍阿图什，是我的同乡，曾是位商人，解放后参加工作，最近在喀什去世）、穆衣丁别克（也是商人，现在乌鲁木齐，已离休）也经常热情资助我们，照料我们全家的生活。此外，同乡买买提·尼雅孜卡力（现任新疆工商联社副经理），塔城一些头面人物，如万尤素甫阿吉、伊盖木拜尔迪、哈里法等也很关心我们。

塔城的亲戚中与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托乎迪阿洪大伯一家人。托乎迪阿洪大伯的夫人尼莎汗（我们都亲切地称她尼莎汗伯母）是位慈祥、善良的妇女。他们的大儿子名叫麦买提力阿洪。这一家人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们，使我们深受感动。

为摆脱困境，我千方百计想办法，试图争取得到当局的批准，

允许我离开塔城去伊犁谋生，可当局就是不让我离开。

有一天，当局突然把我抓去，让我交待与苏联领事馆的关系。当时我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与苏联领事馆有来往，但都是一般的工作交往。在此之前一年的冬天，应苏联领事馆副领事马林之邀，我曾给领事馆工作人员上过维语课。之所以请我上课，我想大约是因为我在苏联学习过，领事都巴辛与副领事马林对我印象不错之故。我只是给他们教教维语，他们并没有借故交给我任何“任务”。像那次车排子检查站站长一样，有关人员竟提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如：“你为什么去苏联学习？为什么写吹捧列宁的文章？你是怎样认识列宁的？”荒唐可笑，令人哭笑不得。我不屑回答，只是甩给他们一句话：“这些问题最好问盛督办”，“列宁是举世闻名的人物”。他们抓不到任何把柄，只好把我释放。

那些日子，阿依木终日坐在监狱门口哭泣。有一天传讯我，我远远看见她站在门口，她看见我，不顾一切地向我大声喊道：“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你，头面人物也在四处奔走，请你放心好了。”

出狱后我才知道，当时作为统战对象的伊盖木拜尔迪·哈里法、阿比提阿吉（维吾尔协会主席）、穆克木县长（以前任过县长，后来人们便一直这样称呼他）等塔城知名人士为营救我，曾多次与当局有关人士交涉（此时赵剑锋已调离塔城，调来一名凶狠的国民党人任塔城专员），要求释放我，见没有效果，几个人在专署门前静坐示威，提出“不释放赛福鼎决不离开公署”，迫使当局最终将我释放。

出狱之后，生活更为艰难，政治压力也更大。公安局常无故传讯，有时以谈话为名，窜到我家，把阿依木支出门去，关起门就地审问，弄得我们终日不得安宁。

再次逮捕，把我押送乌鲁木齐的可能随时存在。关心我们的朋友们目睹此情此景，无不劝我尽快离开。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乌斯曼

江、萨比尔等人常为我通风报信，也劝我尽快躲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离开塔城谈何容易。我多次申请，当局均以“督办不允许”为由加以拒绝。我不甘心，想出种种理由再三要求，当局见我终日纠缠，终于在1948年夏天，批准了我要求离开的申请。一经获准，我们怕夜长梦多，不敢耽搁，决定尽快动身。可说说容易，真要上路，穷得叮当作响的我们哪里去找盘缠？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尼莎汗伯母又帮助了我们。当时她和儿子麦买提力阿洪一家搬迁至伊犁，知道我们正为没有盘缠上路犯愁，便主动提出带我们同行。处于那种走投无路的困境，尼莎汗伯母的这种帮助不啻于雪中送炭，我们简直不知如何感激他们才好。他家人口多，东西也多，举家搬迁已很不易，加上我和阿依木二人困难岂不更大！我和麦买提力阿洪各赶一辆马车，又雇了一个马车夫另赶一辆马车，连人带行李分在三辆车上，像一家人一样，踏上了艰难的行程。

离开塔城的第二件大事是接受公安局的严格甚至是百般挑剔的盘查。我们虽担心他们鸡蛋里挑骨头，仍得硬着头皮接受检查。一大早我们把车赶至公安局门口。许多人都为我们说好话讲情，公安局的有关人士嘴里不说什么，实际上却仍是千方百计找碴，对我们百般刁难。检查尼莎汗伯母、麦买提力阿洪一家的东西时很快，轮到我们的东西，他们毫不放松，把我们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对阿依木也毫不留情，把她的身上从上到下搜了个遍。我带的书本刊物更是被一页一页地仔细检查，幸好我提前把那些有关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禁书严严实实地藏在为马准备的草料之中，才没被发现。检查结果，他们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又不甘心就此放过我，于是便在我的毕业文凭与合影照片上作文章，企图捞点资本向上司请功。毕业文凭是塔什干大学发给我的俄文文凭，上面盖有学校的公章，他们不认识俄文，以为这是什么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他们无知地说这个文凭是加入苏联国籍的护照，逼我招认我加入了

苏联国籍。阿吉尤夫、麦买提力阿洪等人向他们证实这是塔什干大学的文凭，不是什么护照，对他们说如果有误愿承担一切责任，他们又找到懂俄文的人得到证实，才算相信。虽如此，他们仍不甘心，又从我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等地与回国后在塔城与同学、老师（其中有俄罗斯人）的合影照片上寻衅。他们盘问这些照片拍于何地，何故拍照，照片上的人是谁，追问我与苏联老师与同学有何关系，对苏联人一个个地仔细查问，足足折腾了我们两个小时。找不到借口，却不放我们走，也不说原因。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与他们交涉，仍不理不睬。我心中暗想，看样子他们不把我抓起来不甘心，他们是不会放我离开塔城的。为不连累别人，我劝尼莎汗伯母一家先走，可不管我如何劝说，尼莎汗伯母和麦买提力阿洪也不走，他们坚持与我们同舟共济，有难同当。拖到日头偏西，公安局来人把我带进里面再次审问，审来审去，仍是那些问题，看情况不找点借口扣押我，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甘心的。

直审到傍晚，他们也没从我的回答中找到任何漏洞，迫于无奈，不得不对我们放行。阿吉尤夫和许多亲朋好友与我们依依惜别，一直送我们到城外大路上。望着送行的亲朋好友，我们百感交集，彼此难舍难离，都难过地哭了起来。尼莎汗伯母长期以来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生儿育女，直至把与自己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丈夫葬在这块土地上。如今就要离开这生活多年，埋着亲人尸骨的土地，怎能不悲伤难过呢？她哭得那样伤心，使离别的感伤气氛达到了顶点。

这座我生活、工作六年之久的城市，给我带来过许多痛苦，同时也给我带来过许多快乐。如今一旦离开，我才发现我对它竟也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惜别的热泪。

阿依木要离开的是生她养她的土地，是生她养她、给了她生命、给了她无私母爱的亲爱的妈妈，她的伤感比我自然有过之而无

不及。她与母亲紧紧拥抱，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的情景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告别塔城，告别亲朋好友，我们踏上旅途。当天我们一直走到半夜，才赶到一个名叫“黑山洞”的地方歇息。大家虽心情沉重，却为平安离开塔城感到欣慰。只差一点点，我险些就被扣押，如今终于脱险怎能不让人感到宽慰。但离开塔城并非意味着此行一帆风顺。临走前，公安局那位同情我的小伙子萨比尔曾悄悄告诫我说：“一路上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随时可能逮捕你，你要尽快离开塔城管界，千万不要在布尔津停留，到了伊犁也要提高警惕，要事事小心。”我深知萨比尔的话预示着什么，因此，在黑山洞稍事歇息，我们便连夜启程，继续那塔城到伊犁的六百多公里的艰苦跋涉。

旅途上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吃够了苦头，经常在有水、有草的地方露宿。我们随身携带的干粮不少，吃住不成问题，难的是乘马车赶路的滋味令人难以忍受。进入霍鸡开(音译)山，一直到博尔塔拉，其间尤其不好走。翻越大坂时，需要一个在车前牵马缰绳，两人手握石块紧跟在车后，马一停需立即把石块垫在车轱辘下面，以防止车滑下去。在陡峭的山坡上行走，需要把所有的马套在一辆车上，大家一起连拉带推地把一辆车推上山岗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将另两辆车弄上山。

就这样，我们翻山越岭，穿过戈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博尔塔拉，下榻麦提尼雅孜卡力之父艾沙阿吉家。他家是一户殷实人家，是我们的同乡，在塔城我与其子麦提尼雅孜卡力私交甚好，艾沙阿吉对我们非常热情，盛情款待。博尔塔拉的同乡亲戚不少，大家同情我们的境遇，轮番请我们作客。我们在博尔塔拉休息一个星期，恢复了旅途疲劳消耗的体力，然后谢绝了亲友们的挽留，踏上

了通往伊犁的旅途。

穿过塞里木湖，翻过天山果子沟，经水定，霍城，一路辛劳，我们终于到达了伊犁，在尼莎汗伯母家暂住，准备休整一段时间后开始新的生活。

下 篇

天 山 的 红 日

第一部

三区革命前夕的局势

第一章 在水深火热中呻吟的新疆

1944年9月2日,位于北疆尼勒克县西部的乌拉斯台率先响起武装暴动的号角,拉开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民族民主、平等、自由的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序幕。此后,这场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延续了五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紧密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和平解放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疆各族人民自1944年至1949年所进行的这次民族民主运动,绝非偶然发生的,它是当时国内外局势一系列社会因素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当时的国际形势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空前强大,胜利在望;法西斯势力日趋衰落,已是强弩之末。西方的希特勒败局已定,东方的日本侵略者也奄奄一息。当时,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力量的苏联红军1941年10月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对莫斯科的进攻之后,又于一年之后击溃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并于1943年2月将德军消灭。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巨大胜利,不仅是苏德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而且也成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巨大胜利,这一重大转折,极大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同样也坚定了新疆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

再看看三区革命爆发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当时国民党政府压制人民,消极抗日;而中国人民团结振奋、大打人民战争。这两条路线之间的较量仍在继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经历了高潮,低潮,再高潮的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抗击了日本强盗的野蛮进攻,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党和军队,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肃清了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思想。所有这些都为把日寇赶出中国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不断壮大自己,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反抗国内外敌人呼声甚高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新疆人民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意志越来越坚决,反对国民党暴政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法西斯统治和压迫是引发三区革命的直接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蠢起的严重危机……”^①“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维文新文字版)第17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维文新文字版)第1860—1861页。

新疆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备受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当他们不堪忍受奋起反抗时，统治者使用武力镇压。镇压之后继之而来的仍是变本加厉的压迫和剥削。无止境的重压与盘剥超出了极限，人民必定要起来反抗。1931年新疆各地爆发的颇有影响的农民起义，就是新疆各族人民对当时的反动政府及其大民族主义政策的有力反抗。大政治骗子盛世才上台后，虽然在人民斗争压力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大量工作，被迫公布了《八项宣言》，实行了具有民主性的“六大政策”，但是后来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国民党反动集团公然扼杀国内革命力量，盛世才也很快地暴露出其丑恶的嘴脸，完全投入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怀抱。

盛世才经常制造“秘密暴动案”罗织罪名，抓捕大批思想进步的社会人士和知识分子，极其疯狂地向新疆的进步势力进攻。1942年，又炮制“4·12阴谋暴动案”，逮捕并杀害了一批进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这表明盛世才已反动到了极点。当时在反动独裁军阀盛世才血腥恐怖的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践踏了。盛世才倒台后，由国民党政府主持新疆政务，则全盘继承了历史上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法西斯式的屠杀与掠夺。

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经济状况也不断恶化。建立在中苏互惠基础上的传统贸易关系被强行中断，新疆失掉了农牧产品的重要市场。工业产品急剧减少，商品货物周转停滞，农牧业与工业产值之间的差距悬殊，致使小商业者生意倒闭沦为赤贫。而一小撮官吏和投机商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中饱私囊。

这一时期，以上述经济烂摊子为基础的新疆财政，已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财政收入枯竭，赤字大增。反动政府多次企图以

投放大量纸钞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但钱币变成了废纸,导致物价持续上涨。1943年起,随着国民党反动军队入疆,带入了大量伪钞法币,更加剧了财政混乱的局面。1944年秋的物价比1943年上涨了四倍半。工商业者大批失业,人民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因而又导致了社会混乱。再加上庞大的官僚机关贪污腐化以及军费开支(1943年初新疆常驻军队两万人,后很快达十万人之多)反动政府不断增捐加税,大大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1944年国民党省政府向劳动人民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竟达二十余种。1937年的捐税人均317元(新疆货币),但后来人均竟达2419元(新疆货币),其中光是农民应交年地租超过农民实际收入的15%。沉重的地租完全由农民负担,而地主通过出租土地又把税金负担转嫁给了农民。

新疆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从上至下营私舞弊,在各种公务中公开收受贿赂。当时国民党行政机关的职位也可以钱换取。可用六七百块大洋买个县长职位;用一二百块大洋捞个保长当当。这些下级官员一旦赴任,便可毫无顾忌地鱼肉百姓榨取钱财。如莎车县一个保长任职十年,他的土地由原来的30亩一下子增加到1500亩。这种事当时在新疆屡见不鲜。总而言之,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员都通过非法手段发了财。

新疆人民所承受的苦难除了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状况恶化以外,还有日益加重的封建剥削。仅占新疆总人口6.77%的地主阶级却占有全部耕地的39.41%,而占新疆总人口55.25%的贫雇农却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广大农民忍受着最野蛮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他们要将全年收获的50%以上交纳地租,无偿劳动要占全年劳动时间的20—40%。此外,封建地主还把持了水利设施,农民每年还须向地主交纳大量的水费。农民们在这种剥削压榨下,终

年劳作也难以餬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综上所述，新疆在水深火热之中呻吟。而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就不能不起来反抗了。

第二章 吴忠信人主新疆

前面已提到，1942年蒋介石派吴忠信陪同宋美龄抵达新疆。这是吴忠信首次入疆，其实际目的是要取代盛世才主持新疆。果然，1944年9月蒋介石任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10月初，吴赴新疆走马上任。

吴忠信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青年时代曾赴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时，吴担任中央警察署稽查员。后来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和贵州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在与蒋介石长期共事中，与蒋有莫逆之交，是效忠于蒋的马前卒。吴在国民党中央政府里，一向被看作“可靠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蒋介石委派吴忠信主持新疆是有所考虑的，这件事还有一段过程。1941年秋，吴受蒋介石的委派，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视察团团长的身份前往甘肃、宁夏、青海视察当地的党政情况。在此以前，吴曾于1939年奉命以中央代表的资格赴西藏拉萨出席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这是他首次到达边疆地区。而1941年这次，吴利用到甘肃、宁夏、青海的机会，会见了上述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代表，并对他们表示慰问，炫耀自己是“精通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多多少少捞了点政治资本。

吴忠信在青海会晤了当地军阀马步芳，两人很快就谈得投机、打得火热。吴知道马步芳与其胞兄马步青不和，为了削弱马步青的

地盘和势力，吴劝马步芳将河西一带划归中央。马步芳点头认可，并与吴同机飞抵重庆。蒋介石对马步芳的表现很欣赏，给其子马绍祥一个驻军副总司令的头衔。马步芳交出了盘踞十余年的河西走廊，国民党扫清了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障碍。蒋介石对吴忠信这一招也甚为满意。通过此次交易，吴忠信和马步芳的关系更加亲密。马步芳控制的青海骑五军在新疆驻防的三个专区都对抗革命，为吴入主新疆也提供了方便。吴忠信此次视察西北更加抬高了他在“解决边疆问题专家”的名望。吴此行虽然未到新疆，但是已经得陇望蜀了。

吴忠信陪同宋美龄赴新疆，就是准备替代盛世才的第一步。当时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曾九次飞抵乌鲁木齐试探盛世才，希望盛听从蒋介石换马的安排。盛世才遭到上层的内外夹击，无力扭转形势，感到与其被赶下台还不如快点回重庆当个部长为好。可又担心被人搞掉。朱绍良察觉到盛的顾虑，也不敢为盛打保票，于是电请蒋介石要求派头面人物斡旋此事。蒋介石决定派吴忠信接任主持新疆，但吴深知盛世才是个嗜杀成性的两面派人物，没敢立刻贸然启程。后蒋介石派宋美龄与吴同去为其保驾，并多次催促他们启程。这样，宋与吴于1942年8月底飞往乌鲁木齐。

宋美龄与吴忠信抵达乌鲁木齐后，便同盛世才进行了政治交易。宋美龄当面交给盛世才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函，信中答应给盛世才农林部长职位并许诺保证盛的生命安全。盛世才则允许国民党中央军进驻新疆。经吴忠信同盛世才多次会谈，盛才解除了顾虑，初步表示愿交出省政府行政大权，交出归他统制的一个师的武装，承认朱绍良的司令长官地位。但是宋美龄和吴忠信走后他又自食其言。这种优柔寡断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宣布他为农林部部长。就这样，吴忠信做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到任之前暂由朱绍良代行公务。

盛世才将在新疆搜刮到的金银、大洋、珠宝、玉石等贵重物品装了整整三十余辆汽车，派一个加强连一路护送到了重庆。他这个自称“两袖清风”的官吏给蒋介石送了五万两黄金的重礼，于是蒋介石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坚持让盛世才当了农林部长。盛深知民众对他恨之入骨，害怕遭到报复，除每周只去一次行政院出席例会，其他时间绝不敢出门，也算是履行了部长的职责。

吴忠信坐上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宝座却也不易。在新疆捞钱的路子宽得很，国民党里想当主席的大有人在。他们之中就有梁寒操和朱家骅。梁寒操是国民党中常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同宋美龄、吴忠信一起来过乌鲁木齐，上面还有国民党国会议长孙科支持、庇护他。陈立夫、陈果夫也专为下属的中统人员撑腰争夺这一肥缺。只有蒋介石坚持让吴忠信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并一直坚持己见。照蒋介石的看法，吴忠信从事过众多边疆地区事务有“经验”，此外他还担任过安徽、贵州两省主席，但都是任职不到一年就辞职了，这证明他没有搞独立王国的野心。在蒋介石的这些理由面前，那些想活动担任新疆省主席的人及其后台都不好反对，所以吴忠信便来新疆做了省府主席。

吴忠信到新疆组建省政府时，把自己的亲信曾小鲁、周昆田选入政府充当班底，委曾小鲁为省政府秘书长，周昆田为省政府委员。此外省政府人选还有民政厅长邓翔海、教育厅长许莲溪、建设厅长余凌云，全是陈立夫、陈果夫推荐的。其他厅长和政府人员也都是各个派系的代表。不难看出，国民党主持新疆绝不是要为新疆人民做好事，而只是为了拉山头谋私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吴忠信一上台就宣布了“整肃”新疆的政策，亮出所谓治理新疆的三板斧。具体讲，一是“清理监狱”，二是“宣抚地方”，三是“敦睦外交”。就拿他的第一板斧“清理监狱”来说吧，监狱中关押着几

万名无辜，他们却不管不问，更无意释放其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仅释放了包尔汉、马良骏阿訇、刘文龙等少数人，其余绝大多数说是要等中央派来的复审团处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其实他们释放少数人并安排了职务，不过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像包尔汉被委派为迪化行署专员，马良骏被特邀为省政府委员，刘文龙当了国民议会的参议员。除了这些上层人士，吴忠信还释放了一些他急用的人员，这类人员当中还包括民愤极大不宜释放的罪犯。如盛世才时代的法官卜×、彭吉元、刘汉升等人都是盛世才多年的帮凶。盛世才之所以将他们关押不过是狗咬狗。吴忠信竟释放了这些人，却继续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说明这第一板斧“清理监狱”是场具有欺骗性的障眼把戏，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那么第二板斧“宣抚地方”又如何了呢？吴任省主席不久，便设立了“宣抚委员会”，并为该会拨出巨款，派专职官员下到各专区和民族聚居地区活动。这些官员在沿途所经之处召集当地上层分子，发放钱财加以收买。所以这个委员会起到了拉拢上层人士效忠吴忠信的作用，广大民众丝毫好处也没得到。“宣抚委员会”虽然声势很大，但对百姓们来讲只是个画饼充饥的空架子。

第三板斧“敦睦外交”是吴忠信等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当时在乌鲁木齐有个苏联领事馆，设有一名大使级的领事，还有几名副领事；另外还有英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各设一名领事。吴忠信口头上主张外交方面对各国要一视同仁，可实际上他很有倾向性，只与英美领事打得火热。吴在对苏关系中，只办了一件算作最大的事情，就是他要求中央政府派遣一名熟悉苏联情况的外交官。国民党外交部准其请求，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过多年参赞的刘泽荣以外交特派员的头衔派到新疆。吴很器重刘泽荣，下令特供刘外国高级酒类和糖果。吴还经常寻找借口，以各种名义与外国领事们设席欢宴、郊游玩乐，这些也算所谓的外交活动吧。

综上所述，吴忠信的三板斧无非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一骗人的伎俩，没有为新疆劳动人民带来任何实惠。然而吴忠信按照他“因地制宜治理新疆”的观点，又开始实行他的第二个步骤。

吴忠信认为新疆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全新疆有三百八十万人口，其中汉族有二十万多一点，以往稍有风吹草动，便对汉族有很大影响。于是他向中央提出将新疆划为四个省来管理的建议。其具体内容如下：

将天山以北各区、县划为山北省，以乌鲁木齐为省会；将天山以南各区、县划为山南省，以喀什为省会；将昆仑山麓各区、县划为昆仑省，以和田为省会；将甘肃酒泉以西哈密一带的区、县划为安西省，以哈密为省会。安西省主席由汉人担任，其余三个省主席由各民族民众由拥护中央的人员里选举产生。

国民党中央曾召集中常委讨论过此建议，认为新疆当时处于动荡关头，提出特殊建议不妥，没有批准。

吴忠信接着又提出在喀什设立省政府行署，由邓翔海兼任专员的建议，仍被国民党中央中委会否决。

吴忠信这个分而治之的主张是一个阴谋，其目的是想瓦解已经壮大起来的三区革命及新疆各地的革命活动。国民党中央之所以没批准这项建议，是害怕革命活动蔓延到新疆全省。

吴忠信的另一个“功劳”是复辟了寺庙宗教活动，麻醉非伊斯兰教的各族群众。当初，左宗棠进疆虽在几处修建了孔庙和关帝庙，但后都已废弃。吴忠信进疆后重修庙宇，并向全省发出指示，春秋两季必须举行祭祀活动。他明令修复乌鲁木齐的孔庙，并亲临孔庙带头隆重祭祀。红庙附近的关帝庙修缮工程完工，他也率先前往顶礼膜拜。这也算吴忠信主持新疆的一大“政绩”吧。

吴忠信的前任盛世才妄图以血腥镇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到头来遭到全新疆人民的唾弃。吴忠信坐上新疆第一把交椅后，同样

承袭了臭名昭著的盛世才的衣钵，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反抗。这样，吴忠信和朱绍良逐渐朝着失败的道路滑落下去。吴函告国民党中央，要求派军队来以武力对付人民的反抗，还调来了马步芳的部下马呈祥的骑五军。尽管如此，他们不仅用武力扑不灭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连他们自己在新疆也呆不长了。吴忠信终于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1946年3月吴还没等批准他辞职的回文下来，便借口中央开会溜回了重庆，再不愿回新疆。事隔两个月，省政府奉命重新进行了改组。吴忠信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可归纳成一个词，那就是压迫。

第三章 对于三区革命的思想与组织准备

新疆反动当局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激起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激起了知识分子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普遍反对。1944年爆发的阿勒泰人民武装暴动，成了新疆人民奋起反抗的推动力。

三区革命前夕，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进行了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系列革命准备工作。当时在各族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普遍产生了反抗情绪。还在盛世才被迫伪装进步，尚能给点印刷自由时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六大政策”的实施是各民族新知识青年接受进步教育的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先进的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迅速传遍了新疆各地。中国共产党派入新疆的干部通过办报纸、杂志和其他途径，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学说，使新

疆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革命理论方面的教育。共产党人还领导了新疆的反帝运动，在合法的群众组织中对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教育工作。此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中的优秀青年被派往苏联留学。所有这些都在于培养各民族新型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地民族新型知识分子的不断涌现和迅速成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及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有力影响，都为1944年爆发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运动，在思想上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了反抗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在全疆各大城镇组织了若干秘密社团。伊宁和乌鲁木齐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吸收了大量青年学生进行培养教育。其他的秘密社团还有乌鲁木齐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阿克苏的“青年星火联盟”和“民族救星”、伊宁的“同学会”等。1944年伊宁成立了“解放组织”。同年7月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领导下展开了武装斗争。

伊宁“解放组织”是由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于1943年领导成立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同年9月成立的“同学会”合并而成的。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该组织的人员组成和提出的活动宗旨时有变动。该组织的中央领导委员会成员有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卡斯木江·堪拜力、艾力汗吐烈、买合买提江·买合苏木、乌拉木·哈的尔、赖合木江·沙比里阿吉、阿不都洛夫·买合苏木、加尼·尤勒达秀夫、努尔丁伯克、萨力曼巴依、乌买尔江等人。其中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堪拜力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进步知识分子代表；艾力汗吐烈和买合买提江·买合苏木等是宗教上层人士的代表；其他成员则是富商、地主、牧主的代表。虽然“解放组织”领

导核心的成份如此复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在一起了。当时,“解放组织”把以下三点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指导群众参加革命活动;

二、组织伊犁地区的武装暴动,打击并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力量;

三、联络全疆各革命组织,与之密切合作,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自由、解放、民主的新疆省。

“解放组织”为实现上述目的付出了巨大努力,在鼓舞各族人民革命斗志、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该组织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将社会各阶层各界团结在自己周围,拧成一股劲儿投入斗争,终于在1944年11月7日领导伊犁人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人民政权。

1943年,我来到伊宁。当时局势异常紧张,群众当中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反抗国民党压迫的意识越来越强烈。1943年底至1944年初,局势更加紧张。各种社团开始秘密散发传单、标语及其他文告,由苏联境内出版印刷的《新生》、《哈萨克之乡》和《东方真理》等杂志也被运进来散发广为传阅。这些传单、杂志等宣传品上印的,都是宣传解放革命运动和号召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容。

我到伊宁后,当地政府想聘请我担任个职务,要么任报纸编辑,要么当中学校长。鉴于当时动荡的局势,被我一一谢绝了。我心里想在机关、学校为国民党做事,常常会有特务监视,令人厌恶。算了!还是另谋生路吧。我有个亲戚叫阿麻木,他的儿子阿吉哈力是个土布商人,在亲友们的撺掇下,我答应给阿吉哈力当一名出纳员。那时,伊犁的商人多数经营土布生意。他们把南疆出产的土布贩运到伊犁,或在当地直接销售,或再运往其他地区托人代销。我

原在乌鲁木齐住过,但从没做过生意,更没当过出纳。出纳虽是一项单纯的工作,但有时也会赶上由我出面讨价还价。土布生意有买也有卖,没有固定的价格,轮到我售货,虽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是不能成交。阿吉哈力得知这种情况就不再叫我出面做生意了。他对我讲:“做生意就是要蒙骗对方,为了一文钱也要扯谎力争,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撒谎的人。老实人做不成生意。你别管卖布的事,还是去点钱专当你的出纳吧。”

在我做出纳员期间,政局又有了发展,我同一些要好的朋友经常私下发表议论。我的老同学中有赛甫拉也夫、司马义·艾乌祖拉也夫、哈生木·帕尔沙也夫等人。我只是偶尔去他们住的伊犁中学(后被称作知识之乡),更多的是他们到我家来传阅和讨论搜集来的报刊和供张贴用的传单。大家在一起议论日趋紧张的局势,并且商讨我们在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之时应该做些什么。

国民党政府对伊宁的动向特别关注,对伊宁的局势忧心忡忡,除了调集军事力量外,还派出省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带一部分人赶到伊宁,与当地特务机关合作,大肆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密切监视革命知识分子和群众,把革命知识分子划作“嫌疑犯”加以逮捕。这样一来,社会气氛就越加紧张了。一些容易引人注目的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骨干和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处于敌人严密的控制和监视之下。对我盯梢的特务也增多了,由一人增加到三人,这是一个知情人透露给我的。

我与阿巴索夫有亲戚关系,所以我俩之间来往频繁,交谈的机会也多。有一天他带着卡斯木江·堪拜力来家找我,一进门他就笑着嚷了一声:“真是天大的误会!”我问:“怎么回事?”他讲了误会的来龙去脉。事情是这样,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有个人叫杜巴辛(原是苏联驻塔城领事),他让阿巴索夫去寻找一个从塔城来的叫艾则孜的人,可阿巴索夫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艾则孜,就答复杜巴辛说找不

到。杜巴辛又告诉他这个人左手缺少大拇指，阿巴索夫才恍然大悟，知道我就是那个叫艾则孜的人。原先我的姓一直用我父亲的名字塔西阿洪，后来在塔城将自己的姓改为艾则孜。阿巴索夫不知道这回事，所以尽管他经常和我在一块儿也找不到艾则孜。他明白了这件事阴错阳差的原因觉得非常有趣。卡斯木江·堪拜力也笑着说这简直就是骑着骆驼找骆驼。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更是无话不谈。他们告诉我有个叫“解放组织”的秘密社团正积极准备起事。还把尼勒克县正酝酿暴动的消息和“解放组织”十二名领导人的名单透露给我。我听到名单中除了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堪拜力以外，还有富商、地主和宗教上层人士，怎么也想不通。阿巴索夫说：“这是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是统一战线，应该利用上层人士。”接着又嘱咐我：“你身后有人盯梢，先不必参加组织，以后可经常联系。”

“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名义上是艾力汗吐烈，他是个大毛拉，也是个医生，从苏联逃过来的，曾被盛世才抓去坐过牢。一年前他在巴依图拉清真寺以作乃玛孜^①形式为掩护宣传民族解放，我曾去听过一次，回来还与阿巴索夫、卡斯木江·堪拜力议论过此事。眼看局势一天紧似一天，特别是尼勒克武装暴动后，国民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解放组织”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大部分与会者都很害怕，他们违背了当初手捧《古兰经》发的誓，停止了组织活动。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堪拜力表示反对放弃斗争，但无结果。最后他两人说：“你们胆小，我们革命！”旋即退出会议。阿巴索夫回来向我介绍了开会情况并告诉我他的危险处境和被捕的可能性，表露出想去苏联暂避一时的打算。第二天（1944年10月某日）傍晚，他同一个名叫库孜敏的苏联朋友秘密转移到了苏联境内。卡斯木江·堪拜力说他曾到城外送行。我现在记不清是在此之前还是之

① 乃玛孜——伊斯兰教徒的礼拜形式。

后,听说赛甫拉也夫也逃走了。

1944年夏,尼勒克和伊宁完全被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大肆搜捕伊宁的革命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调集军队镇压尼勒克暴动,但都未能得逞。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广大民众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业已成熟,国民党反动派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场革命。

第二部

尼勒克暴动和三区 革命政权的建立

第一章 尼勒克暴动

四十年代初，北疆阿勒泰地区的牧民为反抗盛世才的横征暴敛进行了武装暴动，此次武装反抗持续了数年，沉重地打击了盛世才独裁政权。

1943年3月，省政府下令征集一万匹军马，规定如果不交军马，将马折价每匹须交纳七百元新疆币。这次交纳军马的重担主要落在伊犁和塔城地区牧民头上，所以激起这两个地区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反抗情绪不断高涨，这是最后发展到武装暴动的直接导火线。

1944年下半年，伊犁山区接连出现武装暴动事件。6月20日，一支一百二十人的游击队袭击了国民党军。7月初，哈萨克游击队侦察到国民党军384团班明义（音译）部的辎重部队开往阿勒泰，便在哈参墓地一带伏击该部，大获全胜。8月，伊犁人民在尼勒克县西边的乌拉斯台正式举行武装暴动。暴动的领导人是帕提哈·莫斯利莫夫、色依提和艾克拜尔。

帕提哈·莫斯利莫夫原是尼勒克县土产公司办事处副主任，一直从事反盛世才的秘密活动，到国民党势力入疆后仍在继续。当时的尼勒克县长拉衣丁(蒙族)也参与了他们的活动。1943年9月被伊犁专员公署发觉，准备逮捕他们之时，拉衣丁服毒自杀，帕提哈·莫斯利莫夫闻讯逃到了苏联，后又潜回新疆与其小组成员在塔拉克一带活动。帕提哈·莫斯利莫夫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途经霍城一个叫艾因塔勒的地方与色依提和艾克拜尔相识。

色依提和艾克拜尔兄弟俩是哈萨克族人，原都是牧民，因抗捐被抓，1944年7月越狱逃出。二人无路可走无家可投，被逼无奈决心与国民党拼到底。后与帕提哈·莫斯利莫夫及其秘密小组成员哈密提、奴洛木、乌守尔、乌斯曼等取得联系，立誓共同反对国民党。这个秘密活动小组由于又有色依提和艾克拜尔加入，其活动更加活跃了。帕提哈·莫斯利莫夫等人决定开展武装斗争，用马匹换取武器弹药武装自己，这项工作指定色依提和艾克拜尔去完成。

1944年8月14日，在帕提哈·莫斯利莫夫、色依提、艾克拜尔、哈密提、乌斯曼和艾尼等人的领导下，正式组建了游击队。他们以乌拉斯台山区为根据地，在加仑库勒、伽尔图干、库克巴依等地抗击国民党军，同时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吸收当地知名人士、部族首领、被国民党抓过的人及一些猎人参加游击队，仅半个月队伍人数超过了六百人。同月底，尼勒克县警察局长带领五十余名警察到乌拉斯台催交军马，返回途中遭到游击队袭击。游击队打死十余名警察，缴获了数件武器。这是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游击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放出的第一枪。

国民党省政府得到乌拉斯台发生交火的消息，派省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伊犁回族)赴伊犁调查实情以便对付暴动者。而帕提哈·莫斯利莫夫领导下的游击队活动更为频繁，他们在尼勒克一带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公开宣传，同时不断突袭分散驻扎的国民党

军。9月2日，在霍城一个叫凯干萨衣的地方与国民党军交战数小时，给反动军队以应有的惩罚。艾克拜尔率领的另一支人马在巴斯力干达坂与国民党军交火，击毙敌军十余名，缴获了两挺机枪、七十余支步枪。

国民党对日益壮大的革命运动惶恐不安。9月中旬，在吴忠信到任前主持新疆政务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委派预七师副师长杜德孚到伊犁剿灭游击队。杜德孚抵伊宁后，玩弄欺骗与镇压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向尼勒克派出宣慰团；一方面由128师抽出一个排兵力，与几十名警察共乘三辆汽车前往镇压。这股军警半途中了游击队的埋伏，遭重创被迫撤回。杜德孚恼羞成怒，速命驻绥定保安骑四团副团长喜海山率一个连经巩留进剿游击队；委派伊犁警察局副局长张俊民带一部分警察去尼勒克设防；还命令当地军警从另一方向策应。张俊民到尼勒克凑集军警三百余人，分三路向游击队进攻，遭迎头痛击，十多人被打死，八个人作了俘虏，丧失了二十余支步枪，其余人拖上伤号溃逃。喜海山所率的一个连遭到狙击，原路逃回。杜德孚无可奈何向乌鲁木齐发出紧急求援电报。

1944年10月5日拂晓，游击队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尼勒克县城。艾克拜尔的一大队由西进攻；白求仁的二大队由北面进攻；艾尼的三大队由南面进攻。当时国民党的兵力集中部署在警察局、影院和县政府大院。游击队首先组成了十个人的敢死队，向固守在影院的敌人发起冲锋，然后从三个方面同时发起总攻。城内的群众听到枪响都自发地挥舞棍棒大声吼叫为游击队助威震慑敌人。敌军警见游击队来势凶猛，放弃了县政府大院这个主要支撑点，纷纷逃进了影院和警察局大院。警察局院墙有两人多高，墙上除了沙袋还有坚固的碉堡。而游击队的武器只有步枪、猎枪及棍棒等物，一时还拿不下警察局。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最后游击队放火烧了影院，用炸药炸开了警察局的围墙，这一来战斗进行得

较顺利了。10月7日，一百四十余名敌人手举白旗出来投降，尼勒克县城全部解放。游击队在占领尼勒克县城的战斗中，击毙国民党军警三十余名，缴获了六十六支步枪、九支驳壳枪、一百五十枚手榴弹及近一万发子弹。还释放了监狱里的一百余名各族群众。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指挥部任命乌斯满·乔潘尼为尼勒克县长，任命乌拉孜坎尼为副县长，加喀巴依尼为警察局长。国民党走狗原尼勒克县长齐鲁生（音译）、县警察局长冯维俊（音译）、一向与游击队为敌的伊犁保安团副团长喜海山、伊犁警察局副局长张俊民、大恶霸哈那特伯克等一批国民党官吏、反动乡绅全被处以死刑。

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哈密提在攻打尼勒克县城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不久牺牲。游击队指挥部为了保卫暴动胜利的果实，也考虑县城的安危，向精河西南的古力沙尔和尼勒克与伊犁之间的麻扎派出了侦察兵，又把原设在乌拉斯台的指挥部迁入尼勒克县城。尼勒克县和附近几个县的不少群众前来志愿参加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游击队指挥部在他们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人充实队伍，并将这支超过八百人的游击队划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近三百人，清一色的哈萨族，由艾克拜尔任大队长；第二大队约二百五十人，包括维吾尔族、蒙古族和一些锡伯族，由艾尼任大队长；第三大队大部分是俄罗斯族，由西托夫·伊万任大队长。游击队的声望威震四方，其影响已扩大到特克斯县和巩留县境、包括喀什河以南，喀拉苏北山、麻扎以北、伊犁以东的沙木玉孜及伊犁河以南的雅马渡等地。

10月19日，游击队向麻扎驻军发动猛烈进攻。10月21日，挺进北面的古尔沙衣，攻击精河县警察局派驻该地的派出所，一直打到距精河县三十公里的地方。杜德孚见情况紧急，就近抽调一部分喀拉苏驻军沿喀什河推进，企图攻击尼勒克县城。游击队及时掌握了敌情，当敌军到达距尼勒克县城四公里处将敌包围。游击队先向

敌军喊话劝其投降，遭敌军拒绝。游击队发起猛攻，给了敌军以致命打击。当场击毙击伤数人，仓皇逃命的十余名敌人过河时全被淹死，没跑掉的也做了俘虏。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游击队员又将靠近伊宁的吐尔克村和哈拉苏国民党驻军包围起来，敌军付出沉重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冲开包围逃了出去。

人民暴动的强大声势把国民党当局吓得手忙脚乱。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命驻扎在乌鲁木齐的预七师十九团团长彭俊业率全团人马开赴伊犁。紧接着又派预七师参谋长曹日灵去伊犁替换杜德孚指挥部队。

曹日灵以“靖绥伊犁司令”的头衔将伊犁地区所有的国民党军、保安团和一个补充后备团统归自己节制，但还是对付不了尼勒克的暴动者。于是他开始实施自己原来制定好的《伊区靖绥计划》和《巩哈附近土匪清剿计划》。他命令伊犁地区尚能参战的国民党军经麻扎、雅马渡向东推进；电令库车的骑四团由库车北上，翻越冰达坂进驻特克斯；又命乌鲁木齐预七师二十一团团团长张宣铨率团部和该团第一营由玛纳斯经精河转赴古尔沙衣以保全伊犁。尼勒克游击队10月19日包围了麻扎并发起进攻。对国民党来讲，如果丢掉麻扎，伊宁和精河便失去了屏障。且不说肃清尼勒克“土匪”，就连自身也难保了。曹日灵被迫给已由玛纳斯出发的二十一团团团长张宣铨发出急电，命该团三营进驻乌苏，另抽一个连开赴精河，命原驻沙湾的二十一团一营东去玛纳斯驻防。

国民党当局在调兵遣将的同时还在玩弄骗人的把戏。10月21日派省政府民政厅长邓翔海前往伊宁进行游说活动。邓翔海带着广禄、沙拉群等人抵达伊宁，于10月25日举行了一个有各界人士一百余人参加的恳谈会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他们说：“尼勒克事件是盛世才留下的伤痕”，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他们还许诺释放“政治犯”、双方交换死难者遗体、归还没收的财产等。但这些花言巧语都

平息不了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一向言行不一,就在他们进行欺骗宣传的同时即10月22日,两个连的国民党军越过塔什达坂进攻尼勒克。游击队指挥部及时采取对策,派艾克拜尔的第一大队前往狙击敌人,派西托夫·伊万的第三大队赶往喀拉土帕和土台一带设防。第一大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发,越过巴斯力干达坂,与敌军在山谷中遭遇。战斗异常激烈,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国民党军抵挡不住被迫逃回。敌人在山谷中丢下了八十余具尸体、七十余支枪。有些侥幸逃跑的敌军也被当地群众抓获交给了游击队。

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本不考虑其欺骗宣传在群众中出了大丑,仍不肯放弃他们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策略,四处大肆散布所谓“反对六贼”的滥调。他们把尼勒克人民武装革命诬蔑为“六贼造反”,妄图以此为借口镇压人民武装暴动。尽管他们搜肠刮肚耍尽花招,还是枉费心机,人民武装暴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尼勒克武装暴动的六位领导人帕提哈、莫斯利莫夫、艾克拜尔、艾尼、乌斯曼、奴洛木、乌守尔已成为各族人民敬佩的英雄,他们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严惩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创建和壮大尼勒克游击队的过程中和攻占尼勒克和其他地方的战事中,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章 攻占伊宁和临时政府的成立

伊犁国民党当局为了消除尼勒克人民武装起义的影响,竭力加强军事防范,惟恐革命暴动蔓延到其他地区。可是这样一来反动当局的注意力全被尼勒克人民武装起义吸引过去,眼睛只盯着伊犁东南方的山区,对伊宁城内不断壮大的革命活动就不能全力应付了。这点对伊宁的起义者十分有利,所以伊宁城内革命青年反对

国民党的活动愈加活跃起来。他们与尼勒克游击队的武装斗争相呼应,鼓动当地人民拿起武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

国民党反动派出于自己的本性,顽固推行武力镇压政策。1944年10月底,国民党军从苏里塘外衣斯麻扎、大喀拉苏、小喀拉苏几个方向猛攻乌拉斯台。游击队第三大队反击不利撤了下来。原奉命坚守巴斯力干达坂由艾克拜尔率领的第一大队主动支援第三大队,两个大队协力作战,击溃了国民党军,俘虏敌军十七名,缴获步枪十四支,胜利返回乌拉斯台。守卫阿库衣山谷的第二大队因部分队员随艾尼去城郊游玩,谷口阵地被国民党军夺去。但后来游击队指挥部的白求仁派队伍支援,又将谷口夺了回来。

1944年10月底,“解放组织”主要负责人阿巴索夫前往中苏边境,与苏方就购买武器事宜举行了紧急会谈。在伊宁城内,“解放组织”不再仅仅停留在宣传鼓动阶段,已经实地组织民众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国民党当局已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为了集中力量制止伊宁人民起事,想尽快解决尼勒克游击队,11月2日,预七师十九团二营在两架飞机的空中掩护下拼命向尼勒克县的阿库衣谷地冲击。敌人拥有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而游击队武器匮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决定撤退,放弃了阿库衣谷地。国民党军拿下阿库衣谷口后,沿着喀什河向尼勒克县城扑来。艾尼带领的第二大队陷入敌人的包围,他们主动放弃县城,撤到了乌拉斯台。傍晚,国民党军进占了尼勒克县城。同时还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连在两架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伊宁至尼勒克之间的驿站——喀拉苏。

国民党军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有些得意忘形,11月3日由喀拉苏出动,在两架飞机配合下进攻乌拉斯台。守卫在外围加棱库勒的游击队员边打边撤,把敌人引入了伏击圈。集中埋伏在乌拉斯台的游击队员一齐冲出,从三面包抄敌人,与敌展开激战。游击

队员手中的武器虽然量少质差,但顶住了强大敌人的疯狂进攻。没有枪的就抄起马刀、棍棒、利斧与敌搏斗,有的牧民还用套马杆整治敌人。白刃战持续了八个多小时,鲜血染红了皑皑雪原。这场战斗击毙敌军四十七名、抓获俘虏十二名、缴获机枪三挺、步枪三十二支、子弹十箱及其他数件军用物品。溃散的国民党军也被山里的群众三三两两地消灭了,只有极少敌兵漏网。国民党军遭到惨败。

在这场鏖战中,游击队的组织者第一大队长艾克拜尔身负重伤,(因治疗无效于11月10日牺牲)由其弟色依提接任第一大队长。

乌拉斯台战斗震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11月4日伊犁专区警察局长兼代理专员高炜和省警备处副处长刘秉德急电乌鲁木齐请求支援。电报中说:“巩哈事件发生后,暴民改变进攻策略,沿喀什河活动,包围了苏里塘外衣斯麻扎等地国军。11月3日交战中我方损失大量人员与武器,当地百姓多数加入暴乱……开赴尼勒克的汽车血迹斑斑驶返,车上装满伤号,此景令人惊恐不安……暴乱首魁为帕提哈、艾尼、艾克拜尔·库尔班、白求仁。他们现有三百余支枪、一千五百余人,全部骑兵。他们在伊犁的潘津、吉利圩孜、绥定芦草沟等地建立秘密组织,伺机叛乱。伊犁面临严重威胁,火速派部队增援。”^①

同一天,游击队正在乌拉斯台休整,指挥部新整顿了队伍,做好歼灭苏里塘外衣斯麻扎一带的国民党军的准备。

此时,伊宁的“解放组织”已迁回到伊犁敌军外线,在敌守备力量薄弱的地方鼓动、组织和武装各族群众,并且派出信使给尼勒克游击队送去了“解放组织”的重要决定,命令尼勒克游击队暂停执行进攻苏里塘外衣斯麻扎的计划,而命尼勒克游击队从三个方向

^① 此电文无法核对,系由维文译成汉文。

进攻伊宁，以便内外呼应一举解放伊宁城。

尼勒克游击队虽说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余人，可手中握有武器的队员还不足三百人，武器也很简陋，多是土造的。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又因缺乏子弹使用不上，但队员们的士气是高昂的，消灭国民党军的决心很大。游击队指挥部按照“解放组织”的决定积极投入解放伊宁的战斗准备，抽掉部分队员留在塔乌拉勒狙击由伊宁城开出去清剿游击队的敌军，将主力部队分作三路绕开国民党军营盘直扑伊宁。

11月5日，伊犁专区警察局给省城国民党要员发出急电称：“伊宁暴动即将爆发，为暴动而准备之枪械已运入市内。”可国民党已无力制止伊宁的起义了。11月初，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领导的阿勒泰游击队攻击了吉木乃县城之后，在乌鲁木齐以北及米泉一带也加强了游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想从东面和北面抽调兵力增援伊宁已经力不从心了。

尼勒克游击队遵照“解放组织”的命令于11月6日拂晓正式发动了对伊宁的进攻。一大队由城西北方向进攻；二大队由东南方向进攻；由帕提哈·莫斯利莫夫指挥三大队由城东北进攻并负责全盘指挥。另外还有千余名群众手持棍棒、木叉、梭标随队冲锋。

攻打伊犁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利。三大队行进到吐鲁番圩孜便停步不前了，而第一大队只好等他们到达指定位置才能动手。只有第二大队按原计划到达伊宁东南的库班，向伊犁专区警察局开了火，被关押的游击队员家属也前来助阵。当他们冲到古尔巴扎时，国民党的一二八师三营在三架飞机掩护下向游击队反扑。游击队损失了四名战士和三十四匹马。为避免付出更大牺牲，二大队撤至吐鲁番圩孜与一、三大队会合。

当天夜里，尼勒克游击队指挥部又与“解放组织军事指挥部”取得了联系。这个军事指挥部成员包括阿巴索夫、阿列克山迪尔、

赖希木江、马那甫·别克特米洛夫、卡斯木江·堪拜力、马扎洛夫（俄罗斯族）等人。“解放组织军事指挥部”原决定11月10日攻打伊宁，因事先走漏了消息又决定将进攻时间提前改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即11月7日。同时命驻扎在吐鲁春圩孜的尼勒克游击队第三大队在外围助攻。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分别布署在乌拉斯台、苏里塘外衣斯、麻扎等地。伊宁城内只有一二八师三八二团的两个营、航空教导队、保安四团等部，约一千五百人。但兵力不集中，分散部署在伊犁专区警察局、皮革厂、汽灯厂、艾林巴克、飞机场及梁乡庙一带，这也是国民党军最致命的弱点。

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在军事上屡遭失败，亮出了最狠毒的一招儿。他们四下散布谣言，撒播民族仇恨的种子，说什么“游击队见汉人就杀……”给伊宁城内的商人和一部分汉族发放武器，迫使汉族人反抗游击队。但是只有汉族少数上层把自己武装起来，绝大多数汉族人民拒绝领取武器。

11月7日凌晨三点，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迪尔二人率六十名游击队员由苏联潜回伊犁地区。这支游击队是由逃出伊宁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组建的，装备精良，全使用自动化武器。他们携带着两吨炸药、两挺机枪和一门迫击炮，从霍城县的艾因塔勒入境，经巴彦代迂回至伊宁城下。这批游击队员带领着伊宁的游击队员向敌警察局和发电厂展开攻击。他们很快控制了专员公署西面的女子中学大楼，用强大的火力封锁了专员公署、专区警察局和实业公司之间的通道。尼勒克游击队密切配合伊宁游击队的上述行动，由艾尼率领的第二大队攻占了伊宁市一区警察局，释放了关押在那里的八十余名群众。

国民党军拼命拦击向三座门集结的游击队，但伤亡惨重，只坚持了两小时就被迫撤走了。游击队指挥部命令一、二大队分头进攻

国民党军警盘据的据点，将敌军分割开，敌军相互不能通气，只好各自为战。在当天交战中，新疆省警备处副处长刘秉德被游击队击毙。

11月8日战斗仍在继续。尼勒克游击队第一大队六百余人（有武器的一百七十人，其余都是手持棍棒、梭标的群众）在色依提和库尔班的率领下进攻国民党驻伊宁的司令部；艾尼的第二大队进攻敌伊犁专区警察局。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游击队先后拿下了沙依博依、六大政策大街和通往敌司令部的桥头。

国民党军号称“靖绥伊犁司令”的曹日灵吓破了胆，给伊宁的反动军警下达了紧急命令，要他们必须死守警察局、专员公署和实业公司，同时命尼勒克的敌连长秦荣谦（音译）率部连夜开赴伊宁。还给古尔沙衣和精河的驻军二十一团发出急电，要他们火速救援伊宁，另命姜宣铨率该团直属人员由苏里塘外衣斯麻扎赶回伊宁。

伊宁游击队的列斯肯带领队伍控制了乌鲁木齐至霍城公路上的险要关隘果子沟，在公路上挖掘工事切断交通，拦击外部增援伊犁之敌。在霍城一带活动的游击队与此相配合，攻占了老二台和清水河子等地。

11月9日，由预七师二十一团团团长姜宣铨率领的一个营与冲入城内的游击队遭遇，经半日激战，该营连长王金鹏（音译）、排长孙士高（音译）、王树斌（音译）、王增祥（音译）在混乱中被击毙，另一连长严堂兴（音译）及排长伍德平（音译）负伤。还有几名士兵也被击毙。下午两点，游击队控制了一些路口，切断了敌人的供给线。敌团长姜宣铨命该团麻扎驻军火速增援伊宁，同时将该团战况恶化的消息电告曹日灵。

11月10日天还没亮，游击队指挥部下达了向整个伊宁国民党军警发动总攻的命令。游击队员和各族群众高呼“乌拉”朝国民党军警冲去。枪声不断，喊杀声响彻了全城。城内的国民党军警陷

于层层包围之中。战斗刚一打响，守卫第三仓库的四百余名国民党军反正，他们绝大多数是被抓来当兵的当地人，有的反正后马上加入游击队一边参加了战斗。由色依提和库尔班指挥的第一大队勇猛地向日宁总司令部发起进攻。国民党军根本抵挡不住四下逃窜。当时曹日灵就在敌司令部内，他见势不妙急忙收拾残部带领着军官家属和汉族上层人物逃到了艾林巴克。与此同时，由尼勒克回援日宁的国民党也遭到游击队的阻截没能进城，被堵在艾林巴克一带，他们正好与亡命的曹日灵一伙会合。

游击队在攻占敌司令部（即专员公署）的战斗中，击毙国民党军官兵三十二人，缴获二十二支步枪，将伊犁起义指挥部迁入敌司令部原址。

游击队第一大队长色依提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当天夜里与他哥哥——在乌拉斯台战斗中负伤的艾克拜尔同时牺牲。色依提的职务由副大队长库尔班接替。库尔班率领队员们继续投入战斗，向盘据在气象台里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击毙敌军十一名，缴获步枪二十七支。游击队员们获此胜利士气大振，又奋不顾身地去进攻县政府大院和县警察局，并全部消灭了这两处的敌军。

游击队的胜利震撼了敌人，国民党当局慌作一团。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下令自11月10日起在伊犁地区实行戒严。11月11日吴忠信电告蒋介石：“现军用电台虽仍畅通，惟伊市通绥定间之果子沟被匪切断，伊北之二台亦被归化匪袭占，绥定危急，温泉被围，博乐、霍城有失陷之讯。我伊犁驻军日夜与匪巷战，死伤颇重，一时无法增援，弹药接济，因机场受匪炮击，大飞机不便降落。”

吴一方面向蒋求援，另一方面调兵遣将力求自保。他由吐鲁番和焉耆两地各抽调一个营加强乌鲁木齐的防卫；又由乌鲁木齐驻军抽调一个营去精河，以保障伊犁地区的公路畅通。

11月12日艾尼的第二大队攻占了伊犁专区警察局。局长高炜自知杀人太多，经察布查尔逃往惠远。游击队在攻打伊犁专区警

察布查尔县警察局。经察布查尔逃往惠远。游击队在攻打伊犁专区警

六、各级官员由人民选举。

七、实行靠拢苏联的政策。

八、发展教育事业。

九、规定维吾尔文为官方通用文字。

临时政府遵照纲领的精神提出了当时的主要任务：统一指挥在各地作战的武装力量，统一解决游击队的给养和马匹；没收国民党所有财产归新政府所有，建立新政府的财经基础；恢复城镇街市的正常秩序；将伊犁游击队地下指挥部公开化，定名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军事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考虑到国民党军还盘据在艾林巴克、梁乡庙和飞机场等据点，期待乌鲁木齐方面增援，另外，绥定、惠远等地仍驻有国民党军警，于是向各游击队提出以下五项任务：

一、分化瓦解国民党军，在年底（1944）前全部消灭伊犁地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

二、在阿恰勒、果子沟和其他国民党军可能得到补给的地区加强防御工作。

三、集中各处分散的游击队加以整顿。

四、将各游击队缴获的武器和其他军用品重新进行分配以补充武器缺乏的游击队。

五、向敌占区派出侦察部队，组织小规模游击活动。动员当地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不让国民党当局派兵增援伊犁，同时就地消灭伊犁一带的国民党军。

第三章 伊犁解放

伊犁地区游击队创建的人民政权，在统一的指挥下日臻成熟，

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坐卧不宁。1944年11月14日，即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两天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扩大的军事会议，并将自己在兰州的司令长官公署迁到了乌鲁木齐。朱绍良为了对付伊犁革命、加强乌鲁木齐的防御，决定调驻哈密的二九军军长李铁军来乌鲁木齐，主持对伊犁方面的军事镇压事宜。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朱绍良提出了进攻伊犁的军事计划。按照他的计划，国民党军采取五路并进的策略。即：第一路，派五个加强连沿乌鲁木齐至霍城公路前进，越过坦尔克达坂与驻二台的两个营会合，然后再和驻绥定的国民党军联合进攻伊宁。第二路，派一个骑兵加强营同精河、乌苏以南阿恰勒达坂驻军一起进犯伊宁。第三路，以一支骑兵加强中队经由焉耆的达尔达坂转向西北，再经巩留进攻伊宁。第四路，派一个骑兵加强营由阿克苏出发，越过冰达坂经昭苏由南面进攻伊宁。第五路，派一个加强营走温泉、赛里木湖一线，会同大西沟及霍城驻军一道从西北方向攻击伊宁。

朱绍良觉得五路进兵计划还欠十足把握，11月15日又命预七师师长李禹祥统一指挥由预七师和四十五师抽出的三个团，前去伊犁为国民党军残部解围。李禹祥的司令部设在精河。他为了给被围困的国民党军运送给养，抓了两千余名壮丁修筑飞机场。此外，他还打算两路进兵袭击伊宁。根据他上报给总指挥李铁军的计划，一路沿乌鲁木齐至伊犁的公路推进，经三台、斯木甫统扎、新二台、果子沟、芦苇沟直扑伊宁。另一路由大河沿向南行，翻过阿恰勒达坂沿科古琴山麓由东向西行，然后转向南由地势高处经下冲，进攻潘津等地。

无论是朱绍良的五路进兵计划，还是李禹祥的两路进兵计划，都被革命游击队彻底粉碎了。朱绍良的所谓五路进兵的第一和第二路，虽说抵达了目的地，但没能实现军事目的。其余三路人马由

于山路雪厚没能越过天堑，被迫原路撤回。李禹祥的两路进兵计划也泡了汤，最后只得将指挥一职让与45师师长谢义峰。

这段时期，伊犁地区的游击队作战更加英勇顽强。1944年11月16日，伊斯哈克拜克率领一个属于塔什库尔干—乌恰游击队的骑兵连假道苏联境内运动到伊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围困艾林巴克的战斗。11月17日，一支游击支队在巩留、特克斯和巩乃斯一带打了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国民党驻军。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军警和一些富商都向焉耆溃逃。游击队追击到尤勒杜斯将他们全部解决，只有一两名县长和警察局长逃到了焉耆。游击队释放了他们的家属，任其自由离去。

11月18日，另一支游击队将驻昭苏的国民党军打得七零八落，少数国民党军政人员冲破包围圈经冰达坂向阿克苏逃窜。在游击队的追击下，活着到达温宿县的还不足十人。

11月20日，莫古托洛夫、伊斯哈阔夫、赛义德·艾合买提等人领导的游击队员在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经过四小时激战占领了霍城县，全部消灭了当地的国民党军。

临时政府军事指挥部为了进一步推动军事上顺利发展的大好形势，11月23日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一、伊宁成立两个大队，任务是继续监视盘踞在伊宁西北的国民党军，提防国民党空投部队，防止被围困的敌军突围。

二、成立一个大队，支援绥定一带的游击队攻占绥定和惠远；配合二台的游击队作战。

三、成立一个大队，支援被国民党军视为眼中钉的坦尔克达坂游击队，死守达坂，作好进攻博尔塔拉和温泉县的准备。

四、组建一个骑兵大队，支援阿恰勒达坂的游击队，封锁科古琴、考西安切克、考克巧卡达坂，并在精河和大河沿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五、动员巩乃斯、特克斯、昭苏等地各族群众守住冰达坂，防备南疆的国民党军北上。

六、在乌鲁木齐、玛纳斯、乌苏以及南疆各地开展游击活动，与塔城、阿勒泰、塔什库尔干的游击队取得联系，相互支援，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争取在全新疆获得胜利。

11月29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派预七师的一个连和四十五师的一个团分乘二十余辆汽车杀奔伊宁。他们刚接近果子沟就遭到游击队的猛烈狙击，慌忙丢下汽车逃散。一部分人当场被击毙，一部分人逃至三台也被解决，只有极少数敌人逃往精河。朱绍良进攻伊宁的计划又一次破产。

伊宁革命起义者占领了伊宁机场发报台，动用迫击炮轰击机场，不让国民党飞机起降。乌鲁木齐国民党当局为使被围困部队摆脱困境，企图采取空投的办法予以支援。12月13日，派飞机空投各种物资十二次，由于在游击队的炮火下，低空飞行的飞机投不准，空投物资大都落在游击队的阵地上。

12月18日，霍城游击队开始围攻绥定县城，在伊宁游击队的支援下，12月25日将城墙炸开，占领了绥定县城，活捉了县长周肇祥。12月18日，成立了游击队绥定一团，委任莫古托洛夫、伊斯哈阔夫、赛义德·艾合买提为该团负责人。

12月23日，艾尼率领一百余名老练的游击队员在二台达坂狙击国民党军获胜，又与绥定游击队的一百余人会合，经大西沟、麻扎翻越阿克苏达坂，朝阿衣巴克塔勒、锡音塔拉运动，占领了温泉。博尔塔拉的国民党军担心陷入游击队的包围连忙逃走。

12月29日，伊斯哈克拜克指挥的游击队包围了惠远，敦促当地守军投降，提出下列五项条款：

一、为避免武装冲突，惠远国民党守军必须投降。

二、投降后不准藏匿、破坏、丢失武器。

三、保证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四、惠远保安团长陈志亮为首的军事人员将受到保护，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加以逮捕、审判。

五、凡违反上列各项的顽固敌对分子将受到严惩。

惠远国民党方面由逃至惠远的伊犁专区警察局长高炜、军人疗养院长郭英(音译)、惠远商会会长高兴武等人出面，接受了上述条件。但保安团团长陈伯良和一连士兵拒绝投降，故没能在伊斯哈克伯克限定的时间打开城门。12月31日，游击队发动猛攻，冲入城内，一举歼灭了敌保安团的直属队、两个骑兵排、一个炮连及县警等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千余件。高炜、陈伯良自杀身亡。朱绍良乘飞机从空中视察伊宁局势也恰好在12月31日这一天。他的座机飞临伊宁上空被游击队击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飞回乌鲁木齐。

1944年底，伊犁游击队又获一项战果，占领了巴音布鲁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先临时政府选派锡伯族的广禄、回族的刘秉义、(刘秉德之兄，经名伊利亚斯)维吾尔族的塔力艾特·木沙尤夫三人赴巴音布鲁克进行宣传，争取当地蒙古族群众的支持。没想到这三名代表背叛了临时政府，反与国民党的巩乃斯县长罗继辉、特克斯县长锡钧、巩留县长曹相森一同逃往和硕县，投靠了国民党。国民党军驻焉耆团长蔡琦原想杀掉这三个人，后经焉耆专员纪凤楼的劝阻，才决定将他们押送乌鲁木齐处理。巴音布鲁克设有一个国民党正规警察派出所。伊犁游击队经特克斯、尤勒杜斯进攻巴音布鲁克。在当地蒙古族牧民的协助下消灭了派出所的警察，攻下了巴音布鲁克。临时政府在该地设置了尤勒杜斯县，委任藏族人唐各特齐央为县长，蒙古族人察汗为副县长。

跨入1945年，游击队为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活动更加频繁。而国民党反动派急于扼杀伊犁的革命力量，则继续玩弄

政治欺骗和军事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1944年12月底,国民党省政府拼凑了一个所谓的“疏导委员会”,分东、西两路进行“疏导”。此外,他们还委任高伯玉为阿勒泰专员、艾兰王为副专员、李梦白为专区警察局长,还委任穆华西为承化县长、巴第为哈巴河县长、库科乃台吉为吉木乃县长、哈德轩为青河县长。反动当局企图利用上述傀儡人物分化革命力量,招抚阿勒泰游击队,进而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在高伯玉的诱劝下,乌斯满手下的苏来曼、努尔霍加等人投靠了国民党省政府。

国民党政府面临军事上的惨败,但仍要作最后的挣扎。1945年1月8日,蒋介石亲自电示伊宁被围的国民党军残部,命他们要“以超越斯大林格勒之精神坚持到底”,为之鼓气,同时催促新疆军政当局攻占伊宁,为残存部队解围。1月10日,国民党军四十五师师长谢义峰率精河驻军一个步兵团,沿科古琴山口向南运动开赴伊宁;谢命该师驻老二台的步兵团抽调两个连翻越托克逊达坂进袭伊宁;还调动预七师的第一营走喀尔达坂一线,与其他两路人马合攻伊宁。他自信这三路国民党军一定能拿下伊宁,把被围困的残兵败将解救出来。他们经七天行军集结在伊宁东北吉力圩孜和潘津一带。

伊犁游击队总指挥部在伊宁进行总动员,增建新的游击队。游击队在阿恰勒与潘津之间与敌接火,采取了诱敌深入分割敌人各个击破的战术,全歼敌军。1月18日,由老二台开来的两连敌军刚到潘津还未站稳脚根就被游击队包围全歼。1月21日,谢义峰亲自率领的部队也遭惨败,只剩很少一部分人朝科古琴山口方向逃回。战斗中,游击队击毙敌军一千三百人,俘虏一百六十人,缴获三门迫击炮、二十挺轻重机枪、二百余支步枪。国民党军进攻伊宁为被围部队解围的梦想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们从此再不敢染指伊宁了。

游击队决定趁这个有利的形势彻底解决国民党军残部。1月28日清晨战斗打响,游击队用迫击炮猛烈轰击国民党军残部盘踞着的艾林巴克,子弹如雨点般向艾林巴克倾泻,燃烧着的炮弹摧毁了敌军要塞的防御碉堡。游击队员们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下午一点攻占了梁乡庙,击毙敌团长姜宣铨,晚十点控制了空教队,开始攻击飞机场。当天夜里,朱绍良电示困在艾林巴克的杜德孚,叫他设法突围。1月30日,杜德孚丢开所有部队,只带领近千名警卫及贴身军官突围逃跑。当他们逃至伊宁以北一处叫“皮利青”的河滩时,与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游击队遭遇,战斗进行了一天多。杜德孚的突围人马未能前进一步,最后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夹击下全军覆没。杜德孚身负重伤,敌司令部头子曹日灵、团长彭俊业、军务处副处长曹天爵均被击毙。国民党伊犁党部书记长张羽也做了俘虏。

至此,伊宁完全获得解放。

在这次总决战中,游击队取得巨大胜利,共俘获敌人八千七百七十六名(其中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反动官员的眷属、上层地主、商人及当铺老板等),缴获二千余支步枪、九十八挺轻重机枪、五门迫击炮、两挺高射机枪、五十四架飞机(因在攻占飞机场战斗中被击伤了部件,几乎都不能飞)、十六辆小轿车、八台无线通讯设备及大批军用物资。

伊犁专区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广大人民都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城镇街市日夜都洋溢欢歌笑语,人民庆贺自己的胜利。

第四章 组建民族军和改组政府

1945年1月,在临时政府第六次委员会议上,委员们认为要

想巩固和扩大人民革命事业已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必要将分散状态的武装力量合并,建立一支统一的正规军,而且当时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于是会上决定组建正规军,并且制定了部队编制、指挥制度、颁发军衔、勋章、奖章以及各种奖惩制度。

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临时政府已经统一了处于分散状态的五十余支游击队,组建了伊犁团、绥定团、二台骑兵团、特克斯骑兵团和几个独立旅、营、连、中队等作战单位,正式任命了各级指挥员(上述部队中有些名称和指挥员在会议前就有了,但他们当时的体制和活动仍处于游击阶段)。

1945年2月3日,临时政府第十九次委员会议通过决定,将上列各团及团以下单位全部统编为正规军队。根据临时政府的决定,4月8日在伊宁城内举行了阅兵盛典,宣布正式建立正规武装部队——民族军,并确定该日为民族军节。民族军的建立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民族军建立伊始,便对下属部队的划分进行了调整。组建了绥定骑兵团、伊宁第一步兵团、伊宁第二步兵团、特克斯骑兵团,还成立了三个独立营、两个独立旅及其他直属部队,全军共有官兵一万二千人。临时政府授予民族军最高统帅伊力汉吐拉元帅衔,授予民族军司令帕里诺夫中将衔,授予副司令祖农·太衣甫夫和阿不都热合木江少将衔。

过不多久,民族军又划为一、二、三三个旅,战场上又分别称作中、北、南三条战线。中线指乌鲁木齐方面;北线指阿勒泰、塔城方面;南线指的是南疆。

1945年1月,由各县选派的代表在伊宁城开会,同意重新组建临时政府,选举出十七名政府委员,还选举了政府的正副主席、各厅厅长及其他各部门负责人。

新的一届政府成立后,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作为自己的工作

指南。新的政治纲领与上届政府颁布的九项政治纲领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基本上纠正了某些错误观点。革命政府一丝不苟地按照新政治纲领开展各项工作。首先整顿了社会秩序,曾多次作出决定,严厉打击破坏治安的强盗、小偷、流氓,使社会秩序大为改观。政府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将银行、地下资源、森林收归国有;印发新货币;发行“胜利公债”以解决一部分财政困难;贷款给贫困农民购买种子、农具以发展农业生产。政府还把发展文教事业当作大事来抓,大力开办中小学、中等专科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为各族适龄青少年入校学习及广大群众的扫盲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还新建或扩建了一批俱乐部,出版发行了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活跃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以上作法无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都给予了有效的扶持。

在军事方面,革命政府制定了主动灵活的作战计划,其内容包括:切断乌鲁木齐和精河通往塔城、阿勒泰的公路,解放塔城和阿勒泰;控制伊犁和由伊犁通往南疆的天山山麓的各条道路,解放焉耆、阿克苏等地;继续壮大塔什库尔干一带游击队,切断喀什通往和田的道路,威胁喀什、莎车等地;加强乌苏、玛纳斯、精河和吐鲁番等地武装游击队的活动,威胁国民党军进出乌鲁木齐的交通线;将作为前沿阵地的玛纳斯河沿河一带建成坚不可摧的防线,以便必要时进军乌鲁木齐。1945年5月,民族军司令部按此计划命令下属部队分头实施。

新组成的革命政府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异常繁忙,上至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厅厅长,下至科长全都日以继夜地忙碌着。阿巴索夫起初任民政厅长,负责公安警察及安全的工作,不久调到军政部工作,由赖希木江接替其原来的职务。当时阿合买提江刚从报社调到秘书处,在秘书长阿不都罗夫·买合苏木手下工作。他实际上干的是秘书长的那份工作。他一到秘书处就把政府事务管理得井井有

条。

阿合买提江是在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开始发行报纸时进入报社工作的,后才调到秘书处办公室。按理说政府机关在工作任务和办事程序方面应该有个原则性规定,但秘书长阿不都罗夫·买合苏木根本写不出来。可没过一个星期,一份非常像样的规定草案出现了。过后我们打听出这份规定草案是阿合买提江起草的。这时大家才发现他是个天才,连政府主席伊力汉吐来及其顾问,也对阿合买提江另眼看待。阿合买提江成了实际上的秘书长,安排政府工作、撰写政府委员会议的决议、起草军政命令等事项,他都亲自动手去干。在政府委员会议上发生争执坚持不下时,他的意见能起决定性作用。

阿合买提江逐渐成为被人们所崇敬的人物。1945年下半年他被选为政府委员兼政府军事科中校(后晋升上校)科长。在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期间,以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谈判,不久升任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三区革命政府在十一项协议条款上签了字。他在新疆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运动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阿巴索夫是三区革命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从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刻苦读书,事业心强,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他在新疆学院学习期间,受到校内共产党员的影响,具有进步思想,尤其得到当时任学院教务长的林基路同志的直接教诲,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他非常崇拜林基路同志,1945年5月,当他得到共产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被盛世才杀害的消息,万分悲痛抱头大哭,并写了下面一首挽歌:

惊闻噩耗起乌垣,
不禁泪洒涌如泉。

导师思想明千古，
革命英风遗万年。
桃李满园遍开花，
伊犁河谷义旗掀。
万马奔腾下三区，
千山烽火势燎原。
匪逆残喘风中烛，
工农壮志磐石坚。
义愤填膺挥兵马，
血染红旗分外鲜。

阿巴索夫 1938 年在新疆学院高中部读书，因其父遭盛世才逮捕受到牵连，被校方以“叛逆分子”罪名赶出学校。1940 年 5 月又被流放到沙湾。1942 年流放期满后他转居伊犁，通过各种途径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宣传革命。在成立和领导“解放组织”的工作中和三区革命的思想、组织准备阶段，充分显示出他的作用。伊宁起义前夕，他为避开国民党抓捕逃到苏联境内，不久又率一批人秘密潜回伊宁，打响了伊犁革命第一枪。三区革命政府成立后，他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以顽强的毅力和苦干的精神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操劳着。阿巴索夫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敢于坚持真理，无论是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还是其他政府成员，只要有谁提出了错误观点或作了错事，他都会挺身而出毫不含糊地作坚决的斗争，阿合买提江对他也十分佩服。我和其他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有幸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一起共过事，我们从他们两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当时在政府里，具有进步思想的只有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卡斯木江·堪拜力等几个人。这少数几位知识分子在政府会议上，经常与其他代表上层人士及宗教界的政府成员发生激烈争论。但

具体事情还要靠这批知识分子去干。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队伍成长得很快，在各项工作中都担负着重要工作。

革命政府初成立时，我被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我首先把教育厅的架子搭起来，物色调进了干部，然后再去抓学校工作。我把原有的学校及校内的教职工分门别类造册，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使学校教育恢复正常。1945年1月教育厅长艾比甫·尤尼奇逝世，我于当年3月13日的第三十三次政府会议上被任命为教育厅厅长。这时赛甫拉也夫由苏联回到新疆在教育厅工作。教育界的事务相当繁忙，由我和赛甫拉也夫、安尼瓦尔·汗巴巴及其他教育界同仁共同应付。

一天早上，我到机关上班，一进门看到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写给我的一张条子，叫我去政府一趟。我急忙赶去见他。艾力汗吐烈交给我一份政府命令，指派我组建一个“喀什团”。我带着命令返回教育厅，着手准备建团。因是白手起家首先张罗招兵买马，一周之内征集了二百多人，他们大都是喀什人，当然也有不少同乡阿图什人。我们选定地处水门的汉族中学作为团部，拿出原先储备的一批武器，将这二百号人武装起来，还作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攻打艾林巴克和飞机场那天，我接到命令，让我率团赶赴新生村，协助兄弟部队攻打梁乡庙。当晚，我率领着这批尚未怎么训练过的新兵赶到了新生村。我们摸黑占据了有利地形，一切准备就绪。天快亮时总攻开始，我们和另一支部队的战士一起发起了攻击。那年冬天雪特别厚，天气酷寒。我们冲到了梁乡庙近前，可敌人的机枪打得很猛，我们难以靠近。天已大亮，我们只好挖雪刨坑修工事藏身，一步也前进不了。直到下午三点，都不能抬一下头，只得在雪地趴着。最后另一支兄弟部队从新生村上方压下来，我们才和他们一道攻占了梁乡庙。

这次战斗中,除了手持武器的战士之外,还有不少群众助阵,他们有什么就操起什么随同参战。士气格外旺盛。战场上响彻“乌拉!”“阿门!”的呐喊声,场面非常壮观。就这样,在三区革命初期,我在抓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还当了几天的军事指挥员。

战士们由于长时间趴冰卧雪,许多人受了寒,我也患感冒发烧躺了好几天。

有一天,政府机关打来电话,还叫我回教育厅工作。我回到教育厅见到艾力汗吐烈给我写好的命令,上面说:“决定你仍回原单位负责教育工作。”事后我一打听,原来文教方面已运转不灵了。我回教育厅后,与大家一起重新振兴文教事业,在1944年至1945年度下半学期针对实际的教育状况作了一些实事。新开办了一些学校,规定各校按新制定的教学大纲开课,并使教员们加强了授课责任心,各校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夏季考试结束后,我们还利用假期开办了教师训练班,这样做会使下个学期教学工作更为顺利地展开下去。

第三部

三区解放和逼近乌鲁木齐

第一章 解放三区

1945年6月，民族军进攻塔城，切断了额敏至乌苏，额敏至布尔津的公路，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援兵，占据了额敏县。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政府委员会进行了紧急准备，决定在部队进军塔城、阿勒泰的同时也一同前往。任命穆罕买提江·买合苏木为主席，我为秘书长。

我们随部队步行至博尔塔拉，休整一周。我们的任务为部队攻占城市后，立即接收，宣传革命政府政策，成立临时政权机构，整顿社会秩序，对收缴的武器弹药及其他战利品进行登记、处理。

为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在博尔塔拉作了认真的准备，制订了具体措施。我们拟定宣传提纲，完成组建专区市县政权机构的规划，而后向塔城专区进发。我们跟在部队后面行进一、两日，到达隶属柯来依一个名为“萨孜”的牧场。以前我们曾派托乎提·艾力莫夫率一支游击队到过此地。他们从塔城到乌苏，途中轻取亚马渡，杀死数名敌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切断了塔城至乌苏之间的公路，战绩辉煌。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整，数日后向塔城进发，艾尔莫夫

则率领游击队穿越山区进军额敏。行至额敏县附近的克尔提，来到一处我军宿营地。苏联顾问帕力诺夫将军在一间房子里正同几名部下一起用餐。见我们到来，他显得非常兴奋。一张不大的桌子四周放有四只箱子，桌子上摆满饭菜酒瓶。他手指箱子神秘地说道：“请坐吧，这可不是一般的箱子，是无价之宝啊！”我们不解，打开一看，里面原来都是黄灿灿的金子。帕力诺夫告诉我们，阿勒泰国民党军政要员携带家眷与重要文件仓促逃命的同时，从金库掠夺了大量黄金随车运走，装了十几卡车之多，由军队护送逃往乌鲁木齐，不想在额敏附近被截获，这些装满黄金的箱子自然价值连城了。我们坐在这几只箱子上吃了饭，喝了酒，美美地歇息了一大阵。

次日清晨向额敏县进发，经过萨尔也木勒河时，恰遇我方一支部队正与敌军酣战。我方在一座桥两侧向对岸敌军猛烈扫射，敌军以同样密集的火力顽抗。战斗从清晨打响持续到下午三点难分胜负。后来我军兵分两路迂回到上下游，涉水过河，乘敌不备进行两面夹击。敌军毫无准备，顿时大乱，反应快的仓皇向塔城方向逃窜，来不及逃的被迫缴械投降。

拿下额敏，我们连夜进军塔城。走前我们平定了县城，组建了新的县政府，并命令原汉族县长和一名回族，一名哈萨克老人在我们到达之前赶至塔城劝降。第二天下午听说我方攻占了县城，我们立即向县城进发。1945年7月31日塔城县完全解放，当地守军及其他国民党官员两千余人仓皇逃往苏联。我军没放一枪，与敌军没发生武装冲突而轻取该县。以后迅速平定了县城，组建了政权机构，同时准备挺进阿勒泰。

部队比我们先行一步。

我们到达塔城刚两天，曼素尔先生便与阿吉尤夫一道从苏联赶来。我们边恢复社会秩序，边着手组建专员公署及其他行政机构，恢复报社的正常工作，以通过报社开展宣传。我们任命塔城地

区颇富声望的大牧主巴希瓦依为专员，曼素尔先生为副专员，阿吉尤夫担任秘书长。政权机构刚刚诞生，日常工作异常繁忙琐碎。工作稍步入正轨，我们立即召开了大会，向群众宣讲三区革命的主要目的与今后的任务，明确指出各部门的当务之急，塔城地区与县城群众面临的形势与当前的任务等等。会上，我们中央政府代表团的团长穆罕买提江·买合苏木讲了话，曼素尔先生和我也先后讲了话。会后，一些妇女知识分子倡议开展为民族军募捐的活动，妇女们积极响应，有些妇女当场献出自己佩戴的戒指、耳环、手镯、项链等贵重首饰，不少姑娘、小伙子则当场报名参加民族军。财主，牧主等有钱人也捐献出不少财物。我们看到群众踊跃捐献，自觉地，秩序井然地登记、整理，深受感动。这次大会开得相当成功，募捐得来的财物数目可观，可以看出人们都在期待着尽快开始美好而富有活力的新生活。

在那些日子里，除协助代表团和专署工作，我主要抓了办报与宣传鼓动。塔城市基础不错，原来群众的文化素质比较高，知识分子比较多。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曾有过从事革命宣传的地下组织，该组织做过大量工作，干部群众有一定的觉悟，容易组织，容易发动，他们的行动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还要好一些。

塔城工作步入正轨之后（大约塔城解放一两周后），艾力汗吐烈来到塔城。与他一起来的有阿合买提江，苏联顾问穆合森等几人。我们组织干部、学生以及一些乡绅前往欢迎。

艾力汗吐烈几天后奉命返回伊犁，我们与阿合买提江、穆合森、曼素尔先生等就进军阿勒泰、解放阿勒泰的有关具体问题进行商讨。塔城一切步入正轨，我们的准备也同时完成，开始正式进军阿勒泰。

部队行进神速，他们欲先取和布克赛尔，然后攻占布尔津。为追赶他们，我们乘汽车日夜兼程。沿途都是干燥无水的戈壁荒滩，

汽车在戈壁荒滩上前进非常不易。行至距和布克赛尔约一百公里处，我们的司机突患重病。车上二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会开汽车，只好在车上等待。我们带的干粮快吃光了，水也喝光了，周围找不到一滴水，二十多个人饥渴难耐，简直是在坐以待毙。当时我曾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学会汽车驾驶技术（后来我真的学会了开汽车）。

我们在车上整整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好不容易等到一辆从我们后方开来的汽车。司机痛快地用他的车把我们的车拖到和布克赛尔，我们的部队已在和布克赛尔旁边一座山谷里与国民党军队接上了火，双方已交战一天。我们到达以后，上午刚刚有所缓和的战斗下午又激烈起来。

和布克赛尔驻有国民党一个团，这个团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为保障塔（塔城）阿（阿勒泰）公路畅通无阻，国民党反动派特地在这个要害地区部署了这支精锐部队。

我方抓获了一名来自乌鲁木齐的敌军报务员，从该报务员嘴里得知，敌人视阿勒泰、和布克赛尔和塔城为鼎立三足，认为损坏其中任何一足，整只鼎都必倒无疑。如今塔城这只“足”已被折断，只剩和布克赛尔和阿勒泰两只足，鼎已然倾斜。和布克赛尔的驻军深知守住此地责任重大，利害攸关，因此他们不惜代价，拼死顽抗。

我军攻取这座城池很不容易。四围城墙直上直下，破城相当困难。我们组织先锋敢死队发动强攻，结果伤亡惨重，只好停止进攻，准备夜间乘敌不备发动夜战。

夜幕笼罩大地之后，我们突如其来地发起了攻城战斗。我军准备充足，敌军则缺乏思想准备，加之月黑星稀，士气不振，虽抵挡一阵，终被我军打败。我军攻破城池，国民党军仓皇逃窜，一部分在逃跑的路上被俘，一部分没来得及逃出城门，只好缴械投降。和布克赛尔之战激战数日，至此以我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战场上人、畜尸体很快腐烂，臭气冲

天，整座城市又臭又脏，部队无法停留。我们留下少数几人清理战俘，把大部队拉到城外和布克赛尔山谷休整，同时筹备成立县政府，处理有关事宜。我们在此地虽仅停留两三天，可敌军也使我们不得安宁。国民党从乌鲁木齐派来的飞机不断轰炸，山谷是一片长满芨芨草的开阔地，我们隐蔽在草丛中向敌军飞机射击，敌军在飞机上对我们机枪扫，炸弹轰，盘旋良久，给部队造成一定的伤亡。终因我们在暗处，敌机奈何不得，快快而归。

我们离开和布克赛尔，转移至吉木乃。吉木乃早已解放。原来早在三区革命前，阿勒泰革命解放组织就曾在吉木乃一带活动，领导者为毛拉斯拉木相总。该组织有时以组织的名义，有时以毛拉斯拉木相总个人的名义散发传单，进行宣传。我军进军阿勒泰，该组织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吉木乃。我们一进城便着手成立县政府，进行诸如安定社会秩序等一系列工作，非常顺利。

吉木乃与布尔津之间有个名叫哈得万草场的地方，在萨吾勒山边，那是一个绝好的草原。我们在此地小住数日，向牧主为民族军募捐。我们下榻在拉木赞扎令家，群众对我们亲切热情，为我们演节目，捐赠了大批财物支援我们。

离开哈得万草场，我们进军布尔津，在额尔齐斯河南面一座山下落脚。我军司令部设在此地一山谷内。我们打算在此等待阿勒泰游击队，而后一同攻克布尔津。先我们而到的部队发起了数次进攻，均未能横渡额尔齐斯河。我们到达此地的当天晚上，敌军竟渡河向我方发动进攻，被我们击退。第二天我们采取主动，向敌军发动攻击。我们的部队分两路，分别从额尔齐斯河上下游涉水过河，前面布雷，两面夹击，迫使敌军从河对岸登上抢来的木筏从河里仓皇逃命。我们的战士顺利渡河，激战半天之久拿下布尔津。布尔津被攻克之前，敌军见大势已去，大队人马便已仓皇逃窜，剩下少数人被我们全部俘获。

攻克布尔津，部队向萨尔苏穆拜进发，我们留在布尔津整顿社会秩序，筹建县政府，处理日常公务。两天后我们离开布尔津赶赴萨尔苏穆拜。

行至半路，传来阿勒泰守军弃城向外蒙方向逃窜的消息。我们加速赶路，行至靠近萨尔苏穆拜的齐木尔切克，汽车汽油用尽，不能行驶，我们只好找到马的骑马，找不到马的步行，赶往阿勒泰。大约有三十多公里的路很不好走，行进艰难。我们连夜跋涉，次日拂晓赶到县城，萨尔苏穆拜已全部解放。队伍追歼敌军，我们接收县城，开展工作。敌军逃至临近外蒙边界，被阿勒泰游击队的部分队员阻截，未能越境。这支游击队有一位名叫阿不都洛苏勒的英雄，是位头目（我以后与他见过面。他须发皆白，却魁梧健壮，面带英武豪气），在阻截敌军的战斗中立了大功。

这支部队只有二百人左右，而敌军有两千余人之多。游击队机智灵活，占据山顶有利地形，虚张声势，使敌人摸不清虚实，遂乘势把惊惶失措的敌军封锁在山谷中，迫使敌人缴械。我军从萨尔苏穆拜赶到，敌军只好束手就擒。敌专员兼阿勒泰驻军司令及其他军政要员全部被俘，与敌军士兵一起被押至萨尔苏穆拜，后被押送伊犁。

攻占阿勒泰县城，我们着手筹建政权机构，任命乌斯满为阿勒泰专区专员，达列里汗为副专员，对其他部门的负责干部也同时进行了任命。攻克阿勒泰县数日后，艾力汗吐烈返回阿勒泰，同行者仍是阿合买提江、穆合森等人。他们在此小住几日后去了伊犁。我因塔城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加之艾力汗吐烈等人来时把阿依木带来，派她去了塔城，所以我没同艾力汗吐烈等人同去伊犁而去了塔城，一方面检查工作，处理积压问题，一方面接阿依木，几日后离开塔城返回伊犁。

就这样，截至1945年8月，三区全部解放。我们从各方面做好

成立三区革命政府的筹备工作,集中军事力量,向乌鲁木齐进军。攻占塔城之后,紧接着轻取乌苏。在乌苏完成准备工作,抓获了颜思海、阿拉维索等人后,部队开至玛纳斯河畔。正当我们以玛纳斯河为前沿,为大举进攻乌鲁木齐进行紧急准备之时,有关方面提出了关于举行会谈,签订停战协定的建议。

第二章 青年组织和人民革命党

1945年中期,三区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一支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深感自己肩负责任之重大,深刻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要有先进组织的领导,因此他们提出了成立先进组织的倡议,并为成立先进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活动。

然而他们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三区革命领导阶层是上层封建势力、地主巴依和宗教人士的代言人,他们对革命知识分子的倡议与活动颇不以为然,从开始持冷漠态度到以后进行冷战,最后竟演变为激烈而公开的对抗。

那些宗教上层人士和宗教事务厅几乎对政府的所有事务都要介入。艾力汗吐烈本人就是宗教人士,对一切问题都用宗教观点去衡量,去对待,对所有工作都以宗教观点为指导,对一切先进的事物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抵制,阻挠其发展。

我曾担任三区革命政府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但身为教育厅厅长,我却不能放手干我想干的工作。因为我身边有两个顾问,一个是苏联顾问,一个是宗教顾问。无论我做什么,都必须先去征求这两位顾问的意见。宗教事物厅对各行各业,特别是对文教业要求颇严,限制颇多。他们不仅不听取我的意见,而且擅自专横地规定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教学大纲、演出内容横加干涉。对他们

的规定与干涉我当然不满,因此我和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分歧,各种分歧越来越大,矛盾后来激化到互不相让、以至一触即发的地步。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先进的革命青年首先行动起来。他们敏锐地感到,必须成立一个组织,一方面进行自我教育,提高革命觉悟,一方面寻求恰当的斗争方式,开创不断前进的局面。

1945年下半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革命青年组织”终于诞生了。“革命青年组织”一诞生便产生了中央委员会,选举阿巴索夫为主席,确定了组织纲领和斗争原则,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青年组织先在伊犁,紧接着在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很快建立,扩大了基层组织,大力培养各族进步青年,积极指导青年开展各种斗争。

青年组织的诞生、发展及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反响。有积极支持、热情喝彩的,也有坚决反对、大力诋毁的,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斗争越发激烈。社会上各种保守势力,特别是宗教势力依靠上层代表及三区政府内部的支持者对青年组织的活动横加干涉、指责,一心想搞垮该组织,而青年组织坚持斗争,不屈不挠。为开展民族解放民主运动,他们试图在思想上对青年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进而对青年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施落实。

尽管阻力重重,进步青年组织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仍不断发展壮大。青年组织的各项活动上至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下至各县基层组织均积极响应,通力支持。不断发展壮大的青年组织使上层人士不得不改变态度,予以承认。然而承认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对青年组织这股政治势力的政治主张及行动,他们绝不支持。他们的阶级本性及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不能容忍青年组织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进行的努力。为了有效地抵制青年组织的活动产生影响,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裸裸地以激烈的言辞公开对青年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表示反对，而改变为有计划、有组织地干扰青年组织在各族青年与群众中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为青年组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设置障碍和阻力。这样做的结果使得青年组织虽然在前一阶段的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员，但在进行进一步革命教育，组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方面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种情况迫使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的部分先进青年开始重新思考整顿、健全组织，以更好地领导广大革命青年开展与上层反动人士及一切反动派的斗争。

1945年底，以阿巴索夫为首，我们秘密成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苏联顾问得知该小组成立的消息，不由分说，提出了所谓“坚决解散小组”的意见，这实际上是硬性命令，不执行不行。遵照苏联顾问的“意见”，“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被迫解散。我们实在不甘心，又秘密成立了“哲学学习小组”，不料他们得知成立这个消息后，仍然进行反对。我们与他们多次交换意见，强调成立这样的组织非常必要，革命已经开始，但目前仅仅是拉开了序幕，真正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就要到来，为了迎接这个伟大的革命潮流，我们必须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以革命思想武装先进青年，对广大青年进行关于明天，关于未来，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意见苏联顾问一点也听不进，他们强调时机尚未成熟，形势不允许我们成立什么组织。他们要求我们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说。我们向他们反复强调革命高潮到来前夕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有关阶级斗争的革命教育，以避免行动上产生盲目性的必要性，可苏联顾问无论如何就是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与意见，坚持不让我们成立组织。

与苏联顾问协商无效，我们决定不管他们同意与否，先秘密建

党再说。1945年12月底我们七位同志经过充分的准备成立了“人民革命党”(维吾尔语缩写为HEP),接着产生了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进行组织方面的准备,起草党的纲领、章程,制定斗争方针,开展壮大党的组织等工作。

由几位同志起草的党纲、党章交付中央委员会讨论。中央委员会经过一周的认真讨论,批准其作为“人民革命党党纲、党章草案”,宣称今后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均以此纲领及章程为依据。

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由以下七位同志组成:阿巴索夫(主席)、赛福鼎·艾则孜、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赛依都拉·赛甫拉也夫、麦木提明·伊敏诺夫、安尼瓦尔·汗巴巴、阿不都拉·扎克洛夫。

我们内部称“人民革命党”为“Leninqi”,这个词的译音为“列宁奇”,维语意为“列宁式的”。我们每人取一化名,化名第一个字母连写起来便是“Leninqi”。阿巴索夫化名“Letip”(列提甫),赛依都拉·赛甫拉也夫化名“Ilgar”(伊力尕尔),赛福鼎·艾则孜化名“Nur”(努尔),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化名“ILDan”(艾力旦),阿不都拉·扎克洛夫化名“Nijat”(尼加提),安尼瓦尔·汗巴巴化名“Qolpan”(乔力潘),麦木提明·伊敏诺夫化名“依加特”。这些化名我们只是彼此之间和在党的文件中秘密使用。

依据党的章程,中央委员会七位成员进行了分工:阿巴索夫为主席,负责全面工作;赛福鼎·艾则孜负责宣传;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负责组织;军事工作由麦木提明·伊敏诺夫负责;赛依杜拉·赛甫拉也夫管农业;安尼瓦尔·汗巴巴主管文教;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负责秘书工作。

对外,我们严守党的机密,个别接收党员,平日以三人小组形式进行活动。我们经常对党员强调,保守党的机密是我党的铁的纪律。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中这样做非常必要。我们这个组织既

不能被三区政府内部的上层人士及宗教上层人士知道,以防备他们破坏捣乱,也不能泄露给苏联顾问。他们一旦得知我们背着他们秘密建党,不仅会强令我们解散,而且会对我们怀恨在心,给我们扣上一顶“反苏”的大帽子。

由于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实践经验都很缺乏,因此我们的斗争若没有一个成熟的、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政党支持很难取得胜利,而当时就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所进行的斗争来看,这样的政党只能是苏联共产党。既不让苏联顾问知道我们建党,又要争取苏联共产党的支持显然是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寻求一名不反对我们建党的苏共人士。伊犁除了苏联顾问就是苏联领事,苏联顾问反对我们自不必说,驻伊犁的苏联领事也不会越过自己的权限与苏联顾问唱反调来支持我们,因此我们只能直接同苏联共产党取得联系,讲明我们的观点才有可能取得理解与支持。当时有一位苏方人士为解决三区革命的有关问题经常来往于莫斯科与伊犁之间,我们认为通过该人与苏联共产党联系最为恰当,便在一次他来伊犁时,以我和阿巴索夫二人为代表与他进行了秘密会谈。我们向他详细阐明我们建党的目的、经过与我党的纲领,他对我们深表同情与理解。他说:“你们可以继续战斗,只是要更加注意保守党的机密,绝不能在社会上公开你们的组织。环境相当复杂,你们应当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防止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离开你们。我了解你们,了解你们的活动,就等于莫斯科方面已经了解了你们,我们会支持你们的。”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传达了这些意见,决定参照这些意见行事,开展斗争。

人民革命党的纲领是依据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章程,结合新疆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党的目的,奋斗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依靠三区人民和全疆人民,为夺取新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而斗争。条件一旦成熟,在全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把党的任务明确写进了总纲部分,指出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党员必读手册,强调指出要在深入研究新疆现状,研究新疆阶级情况及其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采用适合于当时环境的恰当方式开展斗争。

根据这个纲领的精神,我们以察布查尔和伊宁县做为试点,对封建剥削制度与农民的现实情况分头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我们的调查研究不能公开进行,因此在深度、广度方面不甚理想。但我们尽力而为,仍然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即党对上层人士,对上层人士在政府内的代表,对宗教界上层人士,只能持既团结、利用,又进行原则斗争的态度。

该党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在民族军内部开展工作。我们在民族军内部建立了党的组织,通过青年组织,进行比地方各单位更加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党的主席阿巴索夫担任民族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在民族军内部按党的原则开展思想工作非常顺利。

至1946年上半年,除伊宁市之外,伊犁专区各县均建起了党的基层组织。塔城、阿勒泰专区也相继成立了支部。到1946年6月省联合政府成立,人民革命党党员已超过四千人。人民革命党通过广泛发展吸收党员,利用公开的青年组织,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做了大量工作。青年组织从上级领导(主席是赛依都拉·赛甫拉也夫)到各专区、市县基层组织的负责人都是人民革命党党员。利用这种便利条件,人民革命党为完成自己的使命,通过青年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大部分委员在省联合政府成立后都被调往乌鲁木齐任职。这对在乌鲁木齐和其它国民党统治区壮大人

民革命武装力量十分有利。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后来与由乌鲁木齐回、汉族革命青年组成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该组织主要负责人李泰玉、罗志、陈锡华、何瑞、禹占林等同志被增选为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此后，人民革命党开始在乌鲁木齐及全疆其他地区扩建基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教育活动。

人民革命党的最大功绩，是依据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派遣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主席利用1946年11月赴南京参加伪“民族代表大会”之机，在南京会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董必武同志，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关系。

人民革命党的建立当属三区革命的一个胜利成果，也是新疆各族革命知识分子长期艰苦斗争的产物。人民革命党建党后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秘密开展工作，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斗争。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自由解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应当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人民革命党是新疆首次建立的共产主义政党。虽然建党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能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其一切行动却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其行动纳入了更为正确的轨道。

当然，人民革命党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条件下，要求它尽善尽美似乎不大可能。人民革命党的主要缺点与不足在于，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新疆要依靠贫民和雇农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革命党之所以提出“依靠贫民和雇农”，是依据当时新疆的无产阶级尚未以一个独立的阶级面目出现于新疆社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然而即便如此，人民革命党在纲领中也应指出，争取新疆解放应当依靠无产阶级和贫民、雇农，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革命党多少表现出了一些农民党的观点及片面

性。

人民革命党的另一个缺点是对民族问题自始至终没有公开表态,只是在纲领中笼统、含糊地提出“新疆的民族问题应按照新疆各族人民的要求解决”这样一个原则。1947年后,人民革命党提出“新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一部分,新疆的民族问题应作为整个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解决”,足以证明为纠正自己对待民族问题的错误态度,人民革命党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第三章 进军南疆

阿巴索夫在关于进军南疆的《行军日记》中写道:

……(1945年)7月的一天,上级正式向我下达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军南疆的命令。从接到命令之日起,我们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让我们在主麻日^①出发。星期四下达的“主麻日必须出发”的命令我们虽没想到,却没有一个人为此惊惶失措,因为我们早已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完成了一切准备,个人私事均处理完毕,随时都在准备出发。

我是瞒着家人,特别是瞒着母亲进行准备工作的。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我自认为隐瞒得很好,星期四那天母亲不知从何处仍然知道了我们次日出发的消息……

^① 主麻日——即星期五,该天午后伊斯兰教徒要聚集在清真寺内举行集体礼拜仪式,故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

母亲已经六十多岁，对我异常疼爱，以往对我看得极紧。为了不让我离开她，经常不吃不睡地守在我身边，这种守卫不奏效时便是连哭带骗，常常把我搞得手足无措。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知道我即将出发的母亲，这次异常平静，除了从她那难以掩饰的眼睛中流露出的对我难舍难离的感伤外，丝毫没有阻拦我离她而去的任何言谈举止。母亲的表现令我感动，我想，母亲肯定同一切深明大义的老妈妈一样，深知我们此行的重大意义，也深切地盼望着早日得到自由解放。从母亲身上我更加体会到争取自由解放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这些日子，中央政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工作非常繁忙、紧张。他们积极印发各种文字拟就的传单，在手绢、背心、枕套上绣制“献给前线将士”、“献给消灭十名敌军的勇士”、“一个倒下去，十个跟上来”等鼓舞士气的口号。我经常出入于宣传部，看到那些绣有极富激情口号的手绢、背心和枕套，竟油然而产生一种争取立功，争取得到一块绣有“献给消灭十名敌军的勇士”的手帕的冲动……

朋友们知我主麻日出发，星期四纷纷来到我的住处给我送行。朋友们语重心长，深情鼓励我：“保重身体！多杀敌人，祝胜利凯旋。”有些朋友赠送手绢作为送行礼物，手绢上绣满“珍重自己，消灭敌人，争取胜利”之类充满深情的祝福。这些祝福赠言都是当今最时髦的解放口号。

星期四下午五点半钟我与一位朋友话别时，朋友嘱咐我说：“坚决消灭一切反对革命的敌对分子，绝不可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句貌似平常的嘱咐实际上蕴含着我们是为正义、真理而战的纲领，体现着我们的斗争原则。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朋友这个嘱咐的分量。

母亲陪了我一夜，她不放心中自己准备的行装，一件件重新检查、打点。母亲时不时地看我一眼，却始终没说一句话。我多想好好陪陪风烛残年的慈母，却由于忙东忙西竟没能在母亲身边踏踏实实坐上一分钟。天亮了；我与母亲同饮一碗茶，洒泪告别。我迈步向中央政府所在地走去时，母亲再也忍耐不住了，她高呼了一声“回来！”我转过身，看到母亲泪如泉涌。我知道母亲舍不得我，但我更知道，此刻母亲眼中的泪不单纯是难过的泪，更主要的是盼望我们早日凯旋，祝福我们早日胜利的泪，是为即将出征的儿子感到骄傲与自豪的泪！

早晨八点钟，又一个朋友前来与我话别。他没多说话，只说了一句：“早日凯旋！”我理解他的深情祝愿，用力地点了点头。

离开中央政府，我们登上汽车启程。同志们、朋友们一直把我们送到吉尔格朗沟。我在革命者当中年龄最小，大家都非常爱护我。我称人们“叔叔”或“哥哥”，他们则称我为“兄弟”。一路上大家抢着拉我坐在他们身边，千叮咛，万嘱咐，亲切友爱，关怀备至。到了吉尔格朗沟，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依依惜别，互道珍重，人们又一次祝愿我们：“健康而去，健康而归，祝胜利凯旋！”

我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健康而去，健康而归，胜利属于我们！我们必定会彻底消灭敌人，早日凯旋！”

很遗憾，这个征途日记的以后部分我未能找到。但阿布杜克力木这次征战回来之后那种满怀激情的讲述，那种自信与自豪的表情至今令我难忘。

1945年夏，天山山麓牧场出现了一队排成四列纵队的骑兵队伍。这是翻越冰大坂挺进阿克苏的三区民族军。由十人组成的侦察小分队走在大部队前约一公里处，担负侦察任务。骑兵队伍前面

是一支高举战旗的步兵队伍，团指挥官苏帕洪走在步兵队伍的后面。队伍后面约一百米处，是雄赳赳的部队指挥官卡斯木江·堪拜力、政委阿巴索夫率领的一队士兵……

1945年上半年，按原定计划，三区革命民族军东面要到达玛纳斯河畔，北面要解放塔城专区，向阿勒泰发动进攻。当前的行动计划是：待三区全部解放后，配合进军乌鲁木齐，在南疆开展武装斗争。阿巴索夫为首的部队直取阿克苏，切断国民党军队乌鲁木齐至喀什的联系，进军喀什；塔什库尔干游击队攻占叶城、莎车、乌恰，从南部、西部配合民族军进攻喀什。和田专区、吐鲁番准备组织群众暴动。哈密有吾南巴依、色依提巴图尔、道列提汗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积极活动。这样看来，在民族军进攻乌鲁木齐的同时，其余七个专区均要同时开展武装斗争，对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这边半年，那边一年，新疆全部解放应当是不成问题的。虽然马步芳欲率兵进军新疆的消息传来令我们稍有担心，但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与胡宗南交战，节节胜利，牵制住了马步芳，使马步芳无法进军新疆的消息也很快地传来，使我们踏实下来。新疆八万左右国民党军面临我们的全面进攻显得惊慌失措，无力抗衡，狼狈不堪。

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堪拜力率苏帕洪的部队按照上述周密的战略计划，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南部进发。

部队翻越冰大坂，消灭了当地二百余名敌兵，在山坡上休整两三天，等待前方侦察小分队的侦察战报。很快，侦察小分队派侦察员向部队指挥官报告了敌情：公路上向喀什行进的国民党军不多，运送武器弹药、军需给养的车辆源源不断、络绎不绝。拜城驻军二百名左右，警察四五十名，他们听到民族军从伊犁开来的消息大为恐慌，现勉强留守以作暂时应付。阿克苏方面加紧抓夫，加固增高新旧城池城墙，国民党搜捕杀戮行动益发频繁，老百姓苦不堪言，

日夜盼望民族军早日解放他们。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等指挥官商定,先取拜城,而后挺进阿克苏。他们从硝尔塔木出山左转弯,向拜城进军。

民族军行动神速、秘密,拜城国民党驻军及老百姓对这支部队进军拜城的举动竟丝毫没有察觉。

队伍急行军一两天,到达拜城县郊。为封锁消息,扣留了进出县城的一切行人,切断了城内外的联系,为突袭县城做好了准备。农民群众兴高采烈地欢迎民族军,踊跃报名入伍。我们对农民群众进行了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教育,不让他们随意进出县城,严守有关部队行动的一切秘密。

部队在距县城十几公里开外一个村庄前面的树林中休整了一天一夜。据乔装进城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国民党官员对我方行动毫无察觉,但他们知道民族军正在向南部进发,一直惴惴不安,在县衙与部队驻地修筑工事,加高围墙,增建碉堡,还向百姓增派赋税徭役,强行征收囤积了军粮、肉类及各种食品等。侦察员将自制的县城地图交给指挥官。指挥官依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行动计划:部队半夜行动,兵分三路,从北、西、东三面同时于黎明前发动进攻。部分兵力在南面执行堵截任务,争取不放过一个敌军。正面发动进攻的部队由苏帕洪率领,进攻目标为国民党军驻地。

1945年8月8日拂晓前,整座县城还在沉睡之中,伴着国民党巡逻兵单调的脚步声,民族军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到达了指定地点待命。部队隐蔽地周围悄无声息,似乎一个人也没有,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东方破晓,清脆的号角声蓦然响起,划破黎明前死一般的静寂。三路大军似从天而降,从北、西、东三面同时发起攻击,没放一枪一炮便迅速潜入了县城街道。临到县政府的哨兵哨位,敌人才发现我方军队。他们猝不及防,仓皇射击,我方边还击,边在“乌拉”声

中前进,很快便包围了县政府、警察局和敌军驻地。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我军终于拿下了县政府及警察局。敌军集中全部兵力负隅顽抗。8月20日,一个名叫马德宏的敌军团长率三百人马从库车赶来增援,民族军被迫进行暂时性撤退。休整数日,9月2日集中力量再次发动进攻,终于一举攻占县城。

战斗宣告结束,群众纷纷涌上街头,庆祝胜利,欢迎民族军进城。民族军宣传队不失时机地分头开展宣传教育,迅速整顿了社会秩序,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全城群众云集在街头巷尾,自发地举行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地方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和各族群众成群结队来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堪拜力的住处,以各种名义向民族军致意,表示要从各方面给民族军以支持和帮助。

民族军当天把俘虏集中一处,清查缴获的武器弹药,清理政府部门的各类公文。群众载歌载舞,与部队宣传员一道走街串巷,宣传庆祝胜利解放。

次日,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与县城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座谈,听取意见,任命吾斯曼大毛拉为县长、亚森阿洪为警察局局长。群众表示拥护,新的政权机构由此诞生。

部队休整数天后,继续挺进阿克苏。

部队急行军到达阿克苏温宿县的扎木台与国民党百余名卫兵相遇。民族军士气正旺,不费多大劲,很快将敌军消灭。接近阿克苏县城时,国民党军仍采取不抵抗政策,躲在新旧城池内消极自卫。民族军首先包围并于9月6日攻占旧城温宿。国民党官兵伤亡惨重,部分幸存者仓皇逃往新城阿克苏。9月14日国民党部队集结重兵向旧城温宿发起猛烈反攻,民族军寡不敌众(当时阿克苏有一师兵力,远比民族军人数多),暂时弃城撤退,而后集中兵力,积极准备,于9月22日再次夺回了旧城温宿,追击国民党逃兵直

至阿克苏县城。9月23日民族军包围了新城阿克苏，伊犁派来部分援兵，除去民族军外，志愿参军的群众逾数千人。国民党近一万兵力在县城内殊死顽抗，攻破城池实非易事，战斗直持续到10月6日，双方仍难分胜负。

很久以来，新疆独裁政府就效仿关内，在不少县市修筑起高大坚固的城墙，作为自卫的“乌龟壳”。满清政府执政期间，在增建城墙的同时，对重点县市的城墙又进行了加固、增高。像乌鲁木齐、阿克苏、巴楚、喀什新城（疏勒）、莎车等县市的城墙均成了一种特殊的堡垒。包括阿克苏县城在内的上述县、市城墙坚固严实，故民族军的攻城战打得非常艰苦。

攻城期间，一些进步青年秘密逃出阿克苏县城，给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送来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9月18日，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以黎·穆塔里甫为首的部分进步知识青年。阿巴索夫听到噩耗悲痛欲绝，紧握双拳，失声痛哭，泣不成声，仰天长叹：“可惜呀！我们来晚了，我们没能挽救这样杰出的英雄，对不起他们啊！”卡斯木江与军官们肃然起立，对烈士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黎·穆塔里甫是维吾尔族天才的青年诗人和爱国战士，也是阿巴索夫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在乌鲁木齐同过学，在新疆学院同时接受过林基路等优秀中共干部的培养教育。黎·穆塔里甫在乌鲁木齐学习期间以善写言辞激烈、内容进步的诗歌而负盛名，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与尊重。穆塔里甫那些颇具新意的进步诗歌，对阿巴索夫产生过强烈影响，阿巴索夫对这位年轻的天才诗人由衷的敬佩。对穆塔里甫的诗，阿巴索夫不是用眼睛看，用嘴巴读，而是用心去体会，用脑去思考。共同的追求与理想使他俩成为亲密无间的知心好友。阿巴索夫1940年被盛世才流放沙湾，离开亲密的战友穆塔里甫，穆塔里甫也被盛世才列入进步知识分子行列，被驱逐至阿

克苏。到阿克苏以后的穆塔里甫毫不消极颓唐，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向反动势力宣战，用“卡依纳木乌尔克西”（意为“汹涌澎湃的波涛”——译者）为笔名，写了大量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与反动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他团结阿克苏进步青年，成立了革命组织“星火同盟”，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极大地壮大了反对反动势力的进步力量。

1944年三区革命开始后，穆塔里甫以实际行动积极配合，在阿克苏加紧进行革命活动。阿克苏国民党反动派对三区革命怕得要死，对配合三区革命积极行动的革命知识分子恨得要命。他们设圈套诱骗革命知识分子上当，并以此威胁革命知识分子。然而穆塔里甫及其伙伴丝毫不为其所动，他们不仅没有停止革命斗争，反而进一步坚定了斗争意志，与敌人进行了更加坚决的斗争。敌人恼羞成怒，在三区民族军进攻阿克苏的日子里，竟凶相毕露，灭绝人性地砍杀了以穆塔里甫为首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与穆塔里甫同时遇难的有穆尼尔丁霍加、比拉力·艾则孜、阿不都拉·达吾提、斯依提·阿巴斯（阿巴索夫之弟）、麦吾尔江·吐尔地和阿不都拉·肉孜等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为人民奋勇斗争的诗人、教师和知识青年。

阿巴索夫自沙湾到伊犁后，1943年同穆塔里甫秘密联系过两次。两位战友在两个战场上为了同一个目标并肩战斗，相约胜利后相见。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为革命、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盼望革命早日成功，他们早日相见。然而穆塔里甫没能看到革命胜利就被残酷杀害，穆塔里甫的壮烈牺牲对阿巴索夫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实在比痛失同胞兄弟还要悲痛十分。

民族军包围阿克苏县城，双方交战数日，难分胜负。就在这时，库车的国民党援兵即将抵达阿克苏。敌军援兵一到，无疑对民族军更加不利。为对付敌军援兵，争取主动，阿巴索夫、卡斯木江等人一

面向伊犁方面求援，一面在当地征兵，壮大队伍，为攻城做准备。民族军刚得到伊犁即派援兵至阿克苏的消息，突然又接到民族军总指挥部的命令，要他们“速归”。身为军人，阿巴索夫等人深知“军令”必须服从，必须执行，然而接受这个命令对他们来说真比要他们的命还难。何以下达此令，阿巴索夫心中明白。离开伊犁时，一些朋友曾与他谈到，二次大战一旦结束，新疆的武装斗争问题会立即提上议事日程。9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他们收到的命令无疑与二次大战停火，苏联采取和平政策有关。事实确实如此，二次大战一经宣告结束，不仅阿克苏，就是三区民族军进攻乌鲁木齐的计划和上述有关解放全疆的军事战略计划也同时停止实施。面对这种形势，阿巴索夫、卡斯木江、苏帕洪等只好放弃阿克苏，遵照总指挥部的命令于1945年10月6日返回伊犁。

第四章 塔什库尔干革命

三区革命取得胜利，三区各族人民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派惨遭失败，把满腔怨愤一股脑儿发泄到了七个专区，使七个专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及至濒临崩溃。在财政方面，盛世才几乎把国库折腾一空，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为缓解经济危机，国民党军政机构大量发行纸币，人为地制造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劳动群众陷于无法生存的悲惨境地。国民党军政、警署长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军官们甚至贪污士兵的津贴与饭费。士兵、警察从上面拿不到津贴，便加紧对百姓进行搜刮抢掠，使得本来就生活无着的劳苦百姓更加穷困潦倒，怨声载道。

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七个专区的残酷压榨剥削，使各族群众忍无可忍。为了生存，各族爱国民众及宗教人士纷纷加入到人民群众

的斗争行列中。三区革命领导者大力支持七个专区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并承担领导责任。在三区民族革命军总指挥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的亲自指挥下,塔什库尔干各族群众于1945年8月15日发起了武装暴动。

黎明时分,百余名暴动者分赴塔什库尔干县城、塔合尔玛、苏巴什、布伦口等地,同时发起进攻,给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以致命打击,将上述地区全部解放。起义者在塔什库尔干建起了各级政权机构,抓紧整顿队伍,成立指挥部,把从塔什库尔干开始的武装暴动迅速扩大到乌帕勒和塔西米勒克,前方侦察员则已先行到达喀什新旧城疏勒、疏附。

暴动者的另一条战线是阿克陶、英吉莎、叶城、泽普和莎车县。叶城、泽普被攻占后立即建起了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给了国民党驻南疆部队以沉重打击,使国民党军受到人民武装力量的牵制。从帕米尔高原到喀喇昆仑山的边境地区很快被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全部占领。

1946年,按照国民党政府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签订的十一项和约的有关条款,遵照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的命令,除塔什库尔干保留一支人民武装力量外,其余人员全部解散,武器由三区政府收回。下面,将这次革命的有关情况向读者做一简单介绍。

1. 准备阶段

塔什库尔干响起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之前,具体地说,1945年2月14日,南疆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暴动核心领导小组举行了一次会议,各地主管组织工作的干部和三区革命联络员、帕米尔高原武装游击队负责人等有关人士应邀到会。他们是: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的随身警卫员马尤尔·艾合买提和特工柯其卡尔,武装游击队负责人努尔阿吉、哈德尔阿洪、艾山先生,被盛世才逮捕后获

释的原莎车县县长卡斯木·塔西,乌恰县县长萨依提拜克,原塔什库尔干县县长卡尔万夏拜克,英吉莎的阿布都吾甫尔拜克,莎车县的阿布拉江,阿克陶的乌米拉库勒,叶城县的阿布都黑里力和库德斯汗霍加,泽普县的米尔·阿合买提喀孜、乌守尔拜克,库西拉甫的斯德克汗霍加,麦盖提县的阿布都卡德尔·哈力法、阿布都卡德尔·拉衣丁,巴楚县警察局局长阿布都热衣木·萨比尔,阿图什的阿布拉·玛合木提,喀什的艾买提汗·麦合苏木和另一位名字被我忘记的人。叶城其皮勒克乡的艾山拜克、穆罕默德·艾沙、塔依尔拜克、英吉莎克孜勒乡的萨吾提卡力、穆罕默德伊善,国民党驻喀什第35团的和加艾合买提(即和连长)等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向与会者通报国际形势,介绍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关情况;宣读三区革命政府关于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号召书;介绍1943年开始的喀什山区及其他各地的武装斗争,组织情况及其他有关事宜等。

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保证暴动成功方面,统一了意见。

这是塔什库尔干暴动前夕所进行的最初的和全面的组织准备。

自会议结束至8月15日,其间半年,各地均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扎实的组织准备和宣传鼓动。以萨特巴依为首的一百八十多人聚集在克孜勒伯依;以萨依提拜克为首的四百来人聚集伯尔托卡依;卡斯木塔西为首的近一千二百人聚集在乌帕勒、塔西米力克、伯力格塔依和乌依塔格等地周围。这些地区的群众进行了相当全面扎实的准备。

至1945年6月底,七十余人在卡尔万夏拜克、塔西特木尔拜克、吾布勒·卡斯木拜克、塔依尔拜克、艾买提柯尔克孜等人的领

导下,集结塔什库尔干。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塔什库尔干山区努尔阿吉、艾山先生领导下的游击队的大力支持。

参加“2·14”会议的各地负责组织工作的代表在本地区各自组织了四五十人,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部署情报组搜集敌方政治、军事情报。情报组成绩显著,很快搜集到了有关敌军部署、敌军司令部和警察局的实力等重要情报。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上级领导机关把刚从乌鲁木齐监狱获释的阿布拉孜·穆罕买提同志派来全面负责喀什地区的组织工作,标志着举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已最后完成。

2. 暴动开始

1945年8月15日清晨六点,全副武装的暴动军开始行动。暴动军士气高昂,勇敢顽强,主攻方向为苏巴什、塔合尔玛、布伦口、塔什库尔干县城街道。上述地区各派出数十名暴动者发动进攻。

为切断敌军逃路,二十余名游击队员奉命开赴其其克力克大坂,担负堵截逃跑的敌军与阻击敌军援兵的任务。

暴动前夕塔什库尔干计有国民党军四百名左右。

在预定时间发起的攻击取得了预期的胜利。苏巴什、塔合尔玛、布伦口等地开火仅半个多小时便被攻占,只有塔什库尔干县城街道之战打得艰苦一些,经过六小时激战暴动军才最终击败国民党军。国民党军仓皇逃窜,经白勒迪尔、克吾西鲁克直下托衣拉布隆。暴动军缴获敌步枪二百二十七支,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弹药一百二十箱,还有大批战利品。

3. 胜利之后

上述地区一经解放,暴动军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鼓动工

作,以唤起民众,壮大队伍。他们废除了国民党遗留下的一切组织机构,组建了新的政权机构——政府机关、暴动军革命指挥部和解放组织。

政府机关是革命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全面工作。最高首领为卡尔万夏拜克,副首领是吾拉木汗,阿布都克力木汗·买合苏木为名誉主席。其他各部门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被任命为革命指挥部名誉指挥,吾拉木汗任指挥。艾拜都拉·麦合苏木、艾则孜拜克、托乎迪巴尤夫等人为政治军事顾问。

解放组织的名誉主席是阿布都克力木汗·买合苏木,主席是吾拉木汗,副主席是卡尔万夏拜克,指定了其他几人为常委。

8月27日前上述工作全部完成。新政府随之宣布废除原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一切制度,公布了一系列新政策,在各部门及各级行政机构建立民主制度,调整了赋税及宗教税款。

经过整编,指挥部重新确立了两条战线。其中一条是以喀什为基地的乌依塔格战线,另一条是以莎车为中心的克孜勒塔格战线。此外还组建了一个以乌斯曼巴图尔为领导的中队,留在英吉莎附近活动。另建一警备区,在以西林拜克为指挥的27人组成的司令部的指导下,担负保卫边防的职责。各地国民党军内部的进步人士纷纷投靠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和进步势力。

这里插上一句,1940年开始的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进步组织的革命活动,曾波及到阿克苏、和田等地,1943年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在乌恰县周围开展积极的革命活动,6至10月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打算在乌恰县率先发动武装暴动,而后向喀什以至全疆发展,成绩相当显著。颇富军事指挥才能的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当时之所以能开展如此卓有成效的、扎扎实实的武装暴动准备工作,不能不承认当时“解放组织”给予了他以巨大的支持与具体的帮

助。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该组织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胡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员。

胡鉴同志当时是塔什库尔干边防部队的一名连长。他曾进行过废除英帝国主义在塔什库尔干的商务与邮政代办处的斗争。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这个斗争取得了胜利。胡鉴同志在扎米尔的支持下，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宣传倡导新思想，扎米尔则在胡鉴同志的帮助下，提高了革命觉悟。他领导“解放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使为争取自由、民主、解放而斗争的进步思想在群众中深深扎了根。为此，南疆人民，特别是塔什库尔干和乌恰县周围的群众觉悟比之其他一些地区的群众觉悟确实高一些。

盛世才在全疆范围内大肆进行反革命屠杀时，南疆各地大批进步人士被逮捕残害，这些被残酷杀害的进步人士之中就有上面提到的扎米尔。盛世才先提拔他当副团长，将其调至 35 团之后逮捕并随即押至乌鲁木齐杀害。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手下的大批骨干被拘捕，使得他无法实现在乌恰举行暴动的计划而离开南疆去了北疆。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留下的一部分人马在帕米尔高原和喀什周围山区坚持武装斗争，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塔什库尔干发生武装暴动。

综上所述，塔什库尔干暴动之所以迅速取得全面胜利，除有组织领导方面准备充分的因素外，当地群众觉悟较高，配合默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4. 革命的继续

整顿后的塔西米勒克的人民武装力量，由拥有四百余名装备齐全的战士所组成。他们担负为进攻喀什而紧急准备的任务。前方侦察人员到达托库扎克甚至台力维奇克边缘。喀什的国民党驻军在县城周围砍伐树木，构筑工事，关闭了所有城门。他们派遣大

批特务、警察加紧活动，白天对进出城门的人员严格搜身，傍晚时分紧闭城门，严禁任何人出入。与此同时，国民党的警察和行政人员也全部搬迁新城以进行防御。

暴动军向塔西米勒克发起攻击后，驻守只有一条街道的塔西米勒克的千余名国民党军遭到惨败，丢下三百余具尸首落荒而逃至喀什。他们把愤恨发泄到县城百姓身上，手无寸铁的百姓惨遭血腥屠杀。

1945年8月24日，国民党军欲执行杀害喀什监狱在押犯的计划。在押犯中有一般犯人三百八十名，政治犯三百九十六名，枪杀名单中还有狱外的三十名进步人士。当天夜间，关押在喀什克孜勒堆维的囚犯们，被赶到盛世才修筑的六角形院落。国民党军令囚犯为自己挖坑，三百余名犯人棍棒、铁头大头棒打死或铡刀铡死后推入坑内掩埋。这场野蛮的杀戮直持续到天亮。这些犯人们挖的坑数目之多，足够掩埋第二天夜里的第二批受难者。

除了这样的集体屠杀，被国民党分子用各种手段残害、活埋的受害者也很多，他们的详细受害经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国民党军在塔西米勒克吃尽苦头，转向乌衣塔格，试图进攻此地，以求报复。然而在这里他们同样没能如愿，同样大败而归。

暴动军并未消极防御，而是主动出击。他们对六百余名对抗塔西米勒克和切其塔格山区游击队的国民党军进行阻击，经过六小时激战，大获全胜，歼敌百余名，缴获步枪二百余支，机枪一挺，冲锋枪二十二支及其他战利品若干，截断敌军与斯木哈那、乌恰、穆九的通路。

1945年10月20日，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再次向乌衣塔格发起攻击，次日发动了第二次进攻，10月27日发动第三次进攻。然而三次进攻均遭惨败，国民党军此后再没敢发动进攻。

革命武装部队乌衣塔格战线取得胜利，武装部队组织群众，壮

大队伍，很快由原来的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他们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酝酿成立南疆民族军。

武装暴动队伍在克孜勒塔格战线也取得了胜利。如果说乌衣塔格战线的胜利在于解放了自塔什库尔干到乌帕勒、塔西米勒克之间的大片地区，克孜勒塔格战线则接连取得了一直到克孜勒塔格、阿克塔拉、叶城县棋盘的胜利。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未能挽救败局。英吉莎县镇全部解放，组建起新的政权机构，队伍也由原来的两个骑兵连增加到两个团。

5. 和谈开始

1945年10月底，国民党与三区革命代表之间的谈判开始了。南疆人民的武装斗争对国民党方面说来，犹如一颗重磅炮弹，迫使它无条件地签订了协议。大势所趋，加之三区方面的一片诚意，安排南疆革命武装队伍司令部部分成员返回原单位已成必然。司令部内部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1945年11月3日，各部队接到总指挥部关于各条战线指挥员、司令部成员到设在齐力拱拜子总指挥部所在地集结的命令。这一道命令使各占领区一下陷于空虚的境地。乌衣塔格战线的队伍到布伦口，克孜勒塔格战线的队伍到库什拉甫集结，休整待命。

各团、连指挥部军官集中在司令部，得悉胡拉木汗吐拉和伊犁来的军事人员基本上都要返回伊犁，同时要带走部分重型武器，只留下部分负责政治、组织、宣传工作的人员。

南疆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吾拉木汗向众军官阐述了自己回伊犁的原因，介绍了接替总司令职务的人选，向留守人员交待了任务。

国民党方面得知南疆革命武装部队总指挥部的人事变动，大喜过望，认为一个个夺回被暴动军占据的地区指日可待，因为这些

地区目前无人防留，内部空虚。对革命武装部队来说，不使国民党方面的企图得逞，保住胜利果实的唯一办法是重新武装自己，以武力保护胜利成果。为此，留守南疆的革命武装部队重新组建指挥部，对部队进行了如下整编：

乌衣塔格战线的队伍整编为一个旅，旅长塔依尔拜克，副旅长萨依提拜克。该旅下设两个团，团长、副团长由旅长、副旅长兼任。

克孜勒塔格战线的队伍整编为一个旅。旅长马大耀（原名穆罕默德·阿尤甫拜克），下设两个团，一个团为塔吉克团，团长莱西开尔，副团长阿克尤力拜克，另一个团是维一柯（柯尔克孜）团，团长卡德尔库勒，副团长纳斯拉洪。

原马大耀所指挥的塔什库尔干部队与嘎尔尼尊部队合编为另一个团，团长为西林伯克。

6. 三次战斗

改组司令部，整编部队之后打了不少仗，其中比较重要一些的如下所述：

攻占叶城。攻占叶城前，革命武装部队采用了分散使用兵力、四面出击的战术。敌人无法行动，占不到便宜，便把主力部队集结在叶城、泽普。针对敌人的部署，武装部队指挥部改变了战术与计划，决定攻占叶城。1945年12月26日指挥部下达了进攻叶城的命令。

在此之前，具体地说是12月20日，革命武装部队攻占了叶城县一个名叫棋盘的地方。取得这个战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摸清叶城敌情提供了方便，大长了我军官兵志气，大灭了敌军威风。这次战斗相当于攻占叶城之前的一次实战演习，对进攻叶城的部署及全歼敌军的计划在实战中进行了详细、严格的检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时叶城驻扎着国民党装备齐全的正规军两个团。这两个团的联合指挥部设在艾孜莱提巴格，在县警察局和县政府大院中还驻有警察部队。

1945年12月31日午夜，革命武装部队按预定计划行动，黎明前发起正式进攻。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战，于1946年1月1日正午，全歼敌军，大获全胜，解放了叶城。

解放叶城后，革命武装部队抓紧清查处理国民党残兵败将，惩治间谍特务，打击恶霸地主及贪官污吏，废除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一切反动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秩序，实行民主选举。塔什库尔干武装起义的参与者、主张爱护百姓的萨比特卡力当选为县长。其他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均由群众选举诞生。此外还成立了南疆人民的“解放组织”，县长萨比特卡力兼任该组织负责人。该组织的任务是唤醒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政策，为争取民众的彻底解放及民主权利而斗争。“解放组织”在当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叶城县新诞生的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生活，为帮助饥寒交迫的叶城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向穷苦百姓发放了大批物资，包括三千余块且克曼布（一种土布），一千余块大布及细白土布，八百多块毡子以及大量瓜果蔬菜、粮食油料等（这些物资均系革命武装部队缴获的战利品，是国民党军搜刮百姓，抢掠得来尚未及销毁的东西）。

叶城人民拥护新政权，视革命武装部队为子弟兵。解放仅三天，就组成一个新兵团，加入到了武装部队中来，壮大了革命武装部队的力量。该团由阿希木阿洪会长任团长，图尔迪·卡力拜克任副团长，卡斯木拜克任政委，纳斯拉洪任顾问。各乡村、牧场自愿参军者逾三四千。由于革命武装部队无力解决武器装备，故未能进一步满足群众踊跃从军的要求。

攻占泽普。叶城解放的第四天，即1946年1月4日，革命武装部队浩浩荡荡进军泽普。

进军泽普时，由塔吉克团和阿西木阿洪会长团（该团在战争期间由纳斯拉洪指挥，也称纳斯拉洪团）各抽一部分人组成“胜利团”充当主力部队。塔吉克团和维族团原在卡群、阿依力塔什、库什拉甫、柯西拉甫和莎车河周围的集镇一带活动，还担负守卫塔什库尔干到和田的喀拉库鲁姆山、柯克亚、苏盖提、谢依杜拉等边防站的任务。这次向泽普进军，这两个团成为先遣部队，其他队伍都奉命支援他们。泽普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听到动静，仓皇逃往莎车，留下的守军抵挡不住革命武装部队的强大攻势，逃的逃，死的死，被俘的被俘，革命武装部队没费大劲便轻取泽普。

同叶城解放后的情况一样，泽普县一解放，革命武装部队立即着手对国民党军政部门进行清查，废除腐败的国民党机构及其独裁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建立新秩序，革新机构，成立“解放组织”，组织群众进行民主选举，选出库尔班·穆夫提阿洪任县长，吐尔逊任副县长。

人民政府诞生后，开展工作颇为顺利。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唤起了民众。群众自发地支援革命武装部队，“解放组织”迅速壮大，群众踊跃参军入伍，革命武装部队人数剧增，力量迅速壮大。

进攻莎车。连失叶城、泽普，使国民党驻疆军事首领惊慌失措。他们深知革命武装部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南疆的战略要地莎车，便从各地抽调精锐部队集结莎车，要在此地与革命武装部队决一死战。

国民党驻疆部队首领将阿克苏赵汉奇团长的第五团调至莎车县城内守城（该团与三区革命民族军阿巴索夫、卡斯木江、苏帕洪等人率领的部队交过战，在国民党军心目中，是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精锐部队）。为加强该团的战斗力，特从喀什调来另一支精锐部队进行补充。巴楚县与麦盖提县的国民党驻军被部署在距泽普县颇近的杭堤，而皮山、扎瓦等地的国民党驻军则奉命驻守在泽普

和叶城周围。

显而易见，国民党军的周密部署对革命武装部队的行动极为不利。已获解放的叶城、泽普处于国民党军剪刀形的包围之中。然而，被轻取叶城、泽普冲昏头脑的革命武装部队指挥部，没有审慎地对待国民党军的周密部署，依靠百余名手无寸铁的志愿兵的一腔热情贸然行动，结果无法对抗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加之国民党军接连有援兵相助，革命武装部队终未能攻取莎车城池而被迫撤退。

7. 整顿部队

从莎车撤退的部队集结库什拉甫休整训练。1946年3月1日（也许是2日），艾则孜拜克·托乎提巴克尤夫、艾拜都拉·麦合苏木、卡斯木先生等高级军政首领和军事工程师，被派往南疆革命武装部队指挥部驻地塔合尔玛。这批人到塔合尔玛后，对前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找出胜利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制订了新的战斗计划，加强了部队建设，整顿了革命武装部队的思想与组织。他们带来了一批现代化武器（如打飞机的高射炮、各种机枪、能穿越城墙的大型武器以及地雷等等），就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艾则孜拜克·托乎提巴克尤夫亲赴阿依力塔什，整编该地区的革命武装部队（主要系克孜勒塔格战线的队伍）为三个旅，任命了旅长及其他军官。

完成对革命武装部队进行整顿的任务，派往总指挥部的艾则孜拜克·托乎提巴尤夫等人便奉命离开了阿依力塔什。

8.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的到来

1946年3月20日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率领一个由三十名重要

的军事顾问及助手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南疆革命武装部队总指挥部所在地塔合尔玛，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他首先将塔合尔玛的总指挥部迁至齐力拱拜子，然后改组总指挥部并制定了新的战斗计划。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提议设立“南疆解放组织”总部，自己兼任总负责人，斯德克汗·吐列、阿西木阿洪会长、萨依提拜克、卡斯木塔西、卡尔万夏拜克、夏米西丁、萨吾提卡力、穆罕默德依善、古勒江、斯拉木·帕夏甫、艾山·阿提拉等人为总部成员，库特鲁克夫·马合木提和斯德克·谢力甫为秘书长。

他们还成立了前线侦察科，尧力瓦斯卡力任科长，塔西阿洪·萨力霍夫和卡力汗为助手，负责具体工作。

他们整顿指挥部内部的人事部门，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兼任负责人，穆合塔洪·吐尔干诺夫为执行负责人。

除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原有“将军”的军衔，没必要授衔外，给其他所有军官分别授予了少尉、中尉、大尉、少校、中校、大校等军衔。少将以上由司令部授衔，大尉以下由旅授衔。

1946年5月26日，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和军事参谋马合木提拜克、阿布都热合曼拜克，总司令卡斯木塔西、阿西木阿洪会长，萨依提拜克、阿洪加诺夫、萨比尔江等人一起制订了解放莎车的作战计划，确定由维族第一旅（两个团），柯尔克孜第二旅（两个团），塔吉克第三旅（两个团），工兵第四旅（一个团）参战。

解放莎车以后的计划为：克孜勒塔格战线以英吉莎、叶城，泽普为基地，莎车一旦解放立即进军喀什。乌依塔格战线以乌恰、阿图什、阿合奇、巴楚、麦盖提为基地进军喀什。两条战线的革命武装部队联合在一起，共同解放喀什。

9. 执行和约

1946年6月13日，南疆革命武装部队的旅长、团长及指挥部

全体成员集结塔合尔玛，听取伊斯哈克拜克将军传达重要决定。沉默片刻，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终于打破沉寂，向与会者传达了关于三区革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和约的情况。他说：

“国民党政府同三区革命代表签订了十一条和平协议。我们的革命是三区革命的组成部分，在和约上签字的代表自然也代表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执行和约。我们革命的目的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手段，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在和平条约上签字，消除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沉重剥削压迫，争取自由、平等，建立民主制度。如今我们已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今后要做的是执行十一条和平条约，在新疆执行民主政策，实现真正的和平、自由与平等。

根据十一条和约的有关精神，我们南疆革命武装部队除塔什库尔干保留一个团外，其他人员全部解散回家。这些人员的登记册留在我们手里，必要时我们将随时召唤他们归队。各团队军政干部留在战备班接受培训，这些人是我们建立民族军的骨干。现在我们需要把武器集中交到军械库。由卡斯木塔西大校负责总军械库的工作和筹建民族军的准备。兰西卡尔旅长从自己部队中挑选一个团留在塔什库尔干，其他部队立即解散……”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接着宣读了留队军官的名单。与会人员有的对停战决定公开表示不满，有的虽不开口，却喘着粗气忿忿不平。看得出来，他们内心极不平静。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做工作说：

“这是军令，必须服从。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这个十一条和平协议。大家不必担心，因为外国代表作为执行协议的保证人参加了谈判，在协议上签了字，国民党政府在关于执行协议方面也做了保证。如果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撕毁或违反协议，我们三区方面还有部队，我们的人民绝不会答应。”

会后，克孜勒战线的队伍全部集中到库什拉甫，集中收缴武

器；乌依塔格战线的队伍也全部集中在布伦口和乌依塔格，集中收缴了武器。

武器集中起来之后，向全体官兵传达了有关签订和约，部队遵照命令解散回家的决定。人们高呼口号：“不回老家，战斗到底！”无奈军令如山，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

去叶城棋盘执行任务的十一名侦察员没有赶回来。他们听到签订和约、上缴武器、解散回家的消息想不通，没有回部队，直接到被革命武装部队解放了的山区隐蔽起来。

去指挥部开会的军官尚未回到各自部队，武器便早已上缴。萨依提拜克旅长接受不了这种变故，气急败坏，第二天便一命呜呼。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回伊犁前交待说：“南疆革命就此结束。塔依尔拜克负责指挥部的善后工作，卡斯木塔西以参谋长的身份需最终完成遣返所有人员，收缴全部武器入库的任务……。”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与同来南疆的参谋、助手以及其他官员一道返回伊犁。收缴的武器在由三百人组成的运输队的护送下运往塔什库尔干那个名叫苏巴什的地方。

10. 疯狂报复

手无寸铁的游击队战士刚刚踏上归家的征途，国民党军队便毫不客气地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动。

他们袭击运送武器的队伍，妄图抢劫游击队上缴的武器为己有，遭到运送武器的警卫部队的沉重打击，未能如愿。武器平安转运，国民党军却厚颜无耻地诬蔑塔什库尔干游击队“拒不缴械”。

接着，他们又惨无人道地射杀归途中手无寸铁的游击战士。从柯西拉甫成群结队奔赴家乡的游击战士竟遭敌机轰炸。戈壁荒野、山岭河滩上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游击战士的尸首。对这些尸首国民党反动派都不放过，他们乱砍乱扎，肢解尸体，野蛮残忍，令人目不

忍睹。

国民党军血洗革命武装部队占据的十座县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枪杀、刀劈无辜百姓，甚至将人吊在树上致死，实在灭绝人性，天理难容！

他们杀人诛连九族，亲属中有人参加革命部队或祖辈有人当过兵的家庭，基本上都被斩尽杀绝。

司令部与留队的官兵约三百余人集结在塔什库尔干的苏巴什。

奉伊斯哈克拜克将军之命在兰西卡尔率领下留下的一团人马驻守塔什库尔干。

司令部及其领导人塔依尔拜克有名无实，有些惊慌失措。指挥官及参谋卡斯木塔西忙于处理武器入库，安排来往部队及经济方面的一应事务。

国民党军队疯狂报复，洗劫游击队占领区，屠杀解散回家的游击战士和百姓的消息不断传到司令部，令指挥官塔依尔拜克、旅长哈克木·谢力甫、政府官员斯德克汗·吐列等人心绪不宁，为免遭不测，终率部分下属与眷眷经苏联返回伊犁。

南疆民族革命指挥部主要领导人返回伊犁，留下的部队与有名无实的指挥部置于参谋长卡斯木塔西的领导之下。卡斯木塔西对留队的三百名官兵的生活、学习等一切负起责任，坚持进行成立民族军的准备工作。

国民党方面派来一个由柯尔克孜人阿木提阿吉（现居国外），柯尔克孜人托乎塔洛夫·阿布都卡德尔（现居国外），塔吉克人阿力甫夏（现居国外）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革命指挥部，要求归还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这个要求符合协议之精神，司令员卡斯木塔西于是命部下退还了国民党军部分武器。

1946年9月，喀什市“解放组织”及专员公署通知司令部军官

及其他人员回去参加民主选举,动员驻守塔什库尔干的战士解散回家。

老资格的革命者卡斯木塔西终于宣布了解散南疆革命武装部队指挥部的决定。

游击队员回到故乡参加民主选举,当选者在当地行政机构继续为人民作出了贡献。1947年7月国民党当局厚颜无耻地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和平条款》,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当局制造白色恐怖,逐村逐户搜捕参加过起义的游击队员,使参加过起义的一万二千余名各族革命群众几乎全部被害,财产被抢,房屋被烧,家破人亡。

11. 总结与思考

南疆其他地区与塔什库尔干起义同时开展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给十几个县市的国民党驻军以沉重打击,解放了这些县市与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有效地保卫了帕米尔山、喀喇昆仑山脉与三国接壤的漫长边防线,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南疆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是在各族农牧民的参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教育的各族先进分子的带领、三区革命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和发展的。这个革命自始至终是三区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领导者始终不渝地听命于三区革命政府,与三区革命政府步调一致,承认参加和谈的三区人民代表为自己的代表,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遵守了和谈协议。

事实不可辩驳地说明,南疆革命是三区革命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为南疆革命献身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后人传颂,他们将永远活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第四部

联合政府和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章 和平条款的签订与 联合政府的成立

1945年9月三区武装力量占领了玛纳斯和沙湾,给乌鲁木齐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国民党反动集团深知自己必将遭到可耻失败,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必然命运,他们被迫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建议。

当时正值二次大战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刚刚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又面临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在抗战胜利基础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加速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总动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所做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革命的纲领、战略和战术,武装了军民的思想。大会制定了我党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这个路线一经提出,与全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新疆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

蒋介石卖国集团秉承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意旨，疯狂进行内战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共代表却不顾个人安危飞抵重庆与蒋介石集团举行和平谈判。

在这种形势下，新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接受了蒋介石关于“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提议，使国民党卖国集团“和平”幌子下藏着的见不得人的货色又一次赤裸裸暴露在新疆人民面前。

1945年10月中旬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该团开始由赖希木江率领，以后改由阿合买提江负责）与伪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先生在乌鲁木齐正式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历时三个月，双方围绕“自由”、“民主”、“和平”、“团结”这个中心议题各抒己见。国民党代表坚持先“和平、团结”，后“自由、民主”，实质是先停战，先解除革命起义军武装、解散革命政权，再谈“自由、民主”。显而易见，这个主张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和谈”的幌子，不费吹灰之力窃取新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果实的痴心妄想。三区革命代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阴谋，为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进行了多方努力。

1946年1月2日双方代表签订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以下简称《和平条款》）。其正文、附文全文如下：

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
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

一、政府给予新疆人民选举彼等相信之当地人士为行政
官吏之选举权。

为实行此种权利，其程序规定如左^①：

事件解决后三个月内，由各县人民选举县参议员，成立县参议会；由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及县政府科长以上人员，则由县长委用。

尚未实施上项选举以前，事变区域内，区及县之现有行政官吏予以保留。

区行政督察专员及副专员，由当地人民保荐，呈请省政府核定。

专员公署职员由专员任用。

各县参议会成立以后，依法选举省参议员，成立省参议会，代表人民之公意，监督并协助省政府。

在宪法未颁布、普选未确定以前，省政府之改组办法，如第九条所定。

二、政府取缔对于宗教之歧视，并予人民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

三、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文书，国文与维文并用。人民上呈政府机关之文书，准予单独使用其本族文字。

四、在小学与中学，用其本族文字施教，但中学应以国文为必修科；大学则依照教学需要，并用国文与维文施教。

五、政府确定民族文化与艺术之自由发展。

六、政府确定出版、集会、言论之自由。

七、政府按照人民实际之生产力，并视其力量，规定税率。人民经明了对于政府经济上所负之义务，自当负担，但此项负担之数额，应以不妨碍人民之生活与经济发展为标准。

八、政府给予商民以国内外贸易之自由，但对外贸易商

^① 原文为竖排本。

民，应遵照中央政府与外国商订商约之规定。

九、新疆省政府之组织，应由中央予以扩充，委员名额为二十五人。

二十五名省政府委员中，十名由中央直接派定，其余十五名，由各区人民代表保荐中央任命之。

中央直接派定之十名委员中，包括主席、秘书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社会处长、教育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卫生处副处长及专任委员二人。

由各区人民代表保荐中央任命之十五名委员中，包括副主席二人，副秘书长二人，教育厅长、建设厅长、卫生处长、民政厅副厅长、财政厅副厅长、社会处副处长各一人及专任委员五人。

余见附文(一)

十、准予组织民族军队，此项人员之补充，应以回教徒人民为原则。

此项军队由参加此次事变之军队，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

此项军队之数额及驻地，另行讨论，作成附文(二)俟签订后，始发生效力。

此项军队之教练及命令，以用维、哈语文为原则。

此项军队之各级军官，以保留原级职之方式，分期调送军官学校，补习其应受之军官教育。

此项部队应由政府派遣教练人员协助训练。

驻新中央部队，不与此项军队同驻一处，并应相互间保持友好关系，不得有互相仇视情事。

余见附文(二)

十一、事变迄至现在，双方拘捕之人士，于事件解决十天

之内，相互开释；并保证今后不以任何借口，加以歧视。

中央政府代表 张治中

人民代表 赖希木江·沙比里

阿木都哈依尔·吐烈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日 于迪化

附文(一)

关于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所签订“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第九条规定新疆省政府组织办法一节，经双方同意，补充规定如左^①：

一、在各区人民代表保荐中央任命之省府委员十五人中，事变区内之三区，可保荐委员六人。

二、上项之委员六人中，包括副主席一人，副秘书长一人，教育厅长或建设厅长一人，民政厅副厅长或财政厅副厅长一人，卫生处长或社会处副处长一人及专任委员一人。

三、其它七区共保荐委员九人，包括副主席一人，及除中央直接派定与上述三区所保荐以外之其余厅长、处长，或副处长、副秘书长、副厅长各一人及专任委员四人。

中央政府代表 张治中

人民代表 赖希木江·沙比里

阿木都哈依尔·吐烈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日于迪化

^① 原文为竖排本。

和约的内容主要是改组省政府,允许少数民族代表参与省政,在全省范围内,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文书,国文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字共用;保证各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及宗教信仰自由,保证各族商人国内外贸易自由,可以保留部分民族军队等等。双方代表就正文与附文(一)签字之后,国民党政府又采取拖延手段,至使附文(二)直至6月6日才得以正式签字。

全文如下:

附文(二)

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局部事变人民代表依据本年一月二日所签订之“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第十条关于事变区域内之参加部队重新改编问题,双方商得同意,补充规定如左^①:

(一)参加事变之各民族部队,参照国军编制,编成骑兵三个团,步兵三个团,总人数以一万一千名至一万二千名为限。此六个团中,两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为国军,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为本省保安部队。

(二)政府准伊宁方面就当地回教徒中保荐一人派为伊宁、塔城、阿山(即今阿勒泰——译者)三区部队指挥官,指挥节制以上六个团。该指挥官应遵照西北行辕核定之编制,组织指挥部。该指挥官应服从新疆警备总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之命令,并由政府派该指挥官兼任全省保安副司令。

(三)以上六个团之驻扎地点,以伊宁、塔城、阿山三区为限。该三区之治安,由政府责成只准由该指挥官所受辖之六个团负责维持。国境之守备,由中央担任边防之军队负责,其办

^① 原文为竖排本。

法参照事变以前之办法办理。

(四)自该指挥官派定之后,政府准其协商会同迅将阿克苏、喀什两区之保安部队改编,其补充办法,均由当地回教徒人民补充之。

(五)该六团之待遇、供应及其将来之武器装备,其三个国军团,准按照驻新国军之规章及标准办理,由中央补给之;其三个保安团,按照本省保安部队之规章及标准办理,由省政府拨交保安司令部补给之。

(六)参加事变之各民族部队之改编事宜,由该指挥官对政府负责办理,此项部队编成六个团以后之驻扎地点,应分别呈请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核定之。该六个团之人马武器实数分别呈报警备总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备查。

中央政府代表 张治中

人民代表 赖希木江·沙比里

阿木都哈依尔·吐烈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六日于迪化

根据《和平条款》的有关规定,1946年6月18日省政府进行了改组,并定于7月1日正式成立新的新疆省政府。新的联合政府组成如下:

兼主席:张治中

委员兼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维吾尔族)

委员兼副主席:包尔汉(维吾尔族)

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

副秘书长: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

萨力士(哈萨克族)

委员兼财政厅长：卢郁文

副厅长：马廷骧（回族）

委员兼民政厅长：王曾善（回族）

副厅长：赖希木江·沙比里（维吾尔族）

委员兼建设厅长：穆罕默德·伊敏（维吾尔族）

副厅长：顾谦吉

委员兼教育厅长：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

副厅长：蔡宗贤

委员兼社会处长：赵剑锋

副处长：尔德尼（蒙古族）

委员兼卫生处长：达列里汗（哈萨克族）

委员兼乌鲁木齐市市长：屈武

委员兼伊犁专区专员：艾力汗·吐烈（维吾尔族）

委员兼阿勒泰专区专员：乌斯满（哈萨克族）

委员兼喀什专区专员：阿不都克日木汗·买合苏木（维吾尔族）

委员兼省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伊斯哈克拜克（柯尔克孜族）

委员：艾沙（维吾尔族），钟隶华（锡伯族），管泽良（未到任）

上述二十五名省府委员中，三区革命方面有八人，其余均为各专区推荐人选与国民党人士。

新组阁的联合政府于7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就职当天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施政纲领。

新的施政纲领计有九章八十六条，其基本点如下：

一、为贯彻执行民主主义政策，要保证人民获得充分参与

政务之权利；保证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

二、切实增进中苏亲善，发展中苏文化与学术关系，促进中苏经济合作。

三、扶植自耕农，保护佃农，防止土地集中，限制少数人吞并土地。

四、严禁重利盘剥及一切不合理之重租，促进劳资协调。

五、大量增垦农田，有计划地开发整理水利资源。

六、分期计划创办水泥、电气、钢铁、机器等基本工业。

七、保证贸易自由，统一币制。

八、发展省内外交通，促进本省经济文化的发达，发展文教卫生保健事业等等。

和平条款的签订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是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平等、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新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充分利用在联合政府任职的合法地位，为争取全省人民的民主自由、改善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与生活做了大量工作。新疆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政治空气，进步知识分子很快组织发动起来，各地群众相继集会庆祝和平条款的签订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依据和平条款与联合政府施政纲领的有关规定，各地群众积极准备民主选举县参议员，成立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充分体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对民族平等与民主自由之要求是何等之强烈！

第二章 针锋相对的斗争

联合政府的成立,使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斗争取得了新的进展。各族人民兴高采烈,积极准备选举产生新的政权机构,以争取得到更广泛的民主权利。群众对民主自由的强烈渴望与随之俱来的积极行动令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

1945年10月刚开始会谈时,国民党反动派本无诚意,他们提议举行和平谈判不过是个骗局。秉承南京伪中央政府旨意行事的新疆国民党当局,利用和谈期间停战之机,一方面积极补充军备力量,一方面加紧勾结泛土耳其主义分子,大肆进行反对三区革命的勾当。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伺机扼杀新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重新建立和强化反动的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和谈双方签字的《和平条款》和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对国民党反动派说来,是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阻力,因此,他们不仅不执行《和平条款》,而且竭尽全力破坏《和平条款》的实施,因为这个条款与施政纲领对他们推行反动统治有极大的震慑力。在新疆各族人民准备认真贯彻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开始了有计划、有蓄谋的破坏。在地方上进行民主选举时,国民党反动派以极为恶劣的恐怖手段对百姓进行威胁。如阿克苏一位农民因告一个村长的状被打得半死;一次会议上一位小伙子只因提出“要执行和约”便落得同那位农民相同的下场。莎车旧城九位县政府成员因怕遭迫害被迫逃至城外,另两人只说了一句“候选人应当由人民推举产生”,就被打断四肢致残。库车县清真寺前参加选举大会的群众遭机枪扫射不久,各地纷纷效仿,相继发生类似事件。

“废除秘密警察”的决定对秘密警察毫无作用。秘密警察的特

务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比过去更加猖獗。旧官吏仍然高踞官位耀武扬威;国民党军方向新疆大量增兵;各地先进分子与青年学生大批被捕;《和平条款》的基本精神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殆尽。

到1946年底,双方对立益发尖锐,开始公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联合政府事实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委员们开会时常常争论不休,甚至因冲突激烈而被迫休会。国民党方面出面调停,要求我们以团结为重,我们反驳说,人民要自由。他们诬蔑我们反对国家,我们回敬说,我们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独裁统治集团和民族压迫。他们要求我们按他们说的办,我们坚持身为人民的代表,必须照人民说的办。明明是他們破坏和约,却硬把破坏《和平条款》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双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导致民族问题越来越多,武装冲突、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联合政府中明显地分为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一方,三区人民代表为另一方的两派力量。大多数一般职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旗帜鲜明地站在三区代表一方,只有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为其摇旗呐喊,拍马助威。

个别信奉所谓“中庸之道”,自诩“主持公道”之人,颇能迷惑一部分群众。麦斯武德,伊敏,艾沙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贾尼木汗、哈得万、萨力士等也属此列。他们有时高喊什么“民族平等、自由”之类令人激动得头脑发昏的口号,但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套。这些人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蒋介石卑躬屈膝,顶礼膜拜,企图以此获取国民党反动派的关怀与同情,建立一个以加强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统治的“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麦斯武德和贾尼木汗之流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反苏反共。他们对苏联、对共产主义极端仇视,经常穷凶极恶、咬牙切齿地诅咒苏联和共产主义,这种仇恨与诅咒自始至终没有停止和削弱。在反苏反共方面,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之流

在国际上也是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

他们说我们是“苏联的追随者”，我们并不否认。

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民党反动派、泛土耳其主义分子、美帝国主义及其它侵略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一方，而以三区为中心的新疆各族人民、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及其政府则结成了统一战线。双方界限清楚，旗帜鲜明。我们姑且把前者算做第一方面，后者算做第二方面，用下面这个公式表示出来，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一方面——压迫者+奴才=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反对派

第二方面——被压迫者+争取自由解放者=人民利益的代表

麦斯武德、贾尼木汗之流追随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一心乞求得到金钱、官衔，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愿望。我们对待他们是既团结、教育，又坚持斗争，而与国民党反动派则不存在任何团结的基础，我们和他们对待形势的看法截然不同，矛盾越来越大。

在如何对待三区革命代表，如何对待新疆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分看法不一致，存在着很大分歧。联合政府主席张治中、乌鲁木齐市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人力主谨慎稳妥地对待三区方面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比上述几人稍晚些时候来疆的陶峙岳也同意上述观点。而国民党驻疆部队头目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联合政府秘书长刘孟纯、民政厅长王曾善，乌鲁木齐市警备司令党必刚等人却不自量力，主张对我们所代表的人民革命势力动用武力。张治中等人在极为审慎地召开的内部会议上提出“应当运用英国在印度使用过的战术解决新疆问题”，宋希濂说：“让步会受欺负，必须进行武装镇压。要像伊

朗解决阿塞拜江问题那样解决新疆问题。”(伊朗阿塞拜江当时举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起义,后来通过谈判向伊朗政府索取到一定权力,不料很快被英国支持下的伊朗政府残酷镇压。)

虽然在对待新疆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内部两派意见不一致,但其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想方设法扼杀革命力量,在我们的脖子上套上绳索,让我们听凭摆布。要说有什么不同,说到底不过是扼杀我们,为我们套绳索的方式不同而已。前者连哄带骗地来软的,后者则连抽带打地硬来。他们的区别不在于套不套绳索,而是如何去套。二者同样以其老祖宗乾隆皇帝“以夷制夷、羁縻与牵制”的方法令我们互相制约。基于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代价地起用了贾尼木汗、乌斯满等民族败类。

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法西斯政策,疯狂践踏《和平条款》,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恐怖的斗争浪潮在乌鲁木齐以至全疆各地风起云涌,各种进步组织,特别是青年组织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展了广泛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活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

第三章 乌鲁木齐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

三区革命爆发后,为配合三区革命,乌鲁木齐进步青年的各种组织应运而生。进步青年通过各自的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张旗鼓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类组织主要有以下一些:迪化民主青年联合会、民主革命青年解放组织、新疆民主青年组织、民主联合会等等。

到了1949年,上述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青年组织”。该组织的负责人为努斯热提、谢合地、托乎提·库尔班等。该组织制

定了十章、49 条的章程，出版名为《正确之路》的报纸、杂志，章程里写入了“被压迫者联合起来”，“谁不为祖国、民族服务，谁就是罪人”等口号。1949 年 10 月出版的第三期杂志曾刊登毛泽东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光辉著作，同年出版的第四期报纸发表过有关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的社论。由于历史的原因，该组织 1950 年自行解散。

上述组织，特别是后来的联合组织，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青年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当时可算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

乌鲁木齐当时还有一个先进青年的秘密组织即“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该组织成立于 1945 年，成立后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斗争。值得指出的是，国民党军校中的十八名青年与地方上七十余名青年一起加入该组织，做了不少积极工作。该组织 1945 年 5 月初被国民党警察机关破获，主要成员大部分被捕，一些人惨遭折磨致死。

该组织是这样暴露的：

一个名叫阿布杜拉的人叛变了，该组织决定将其除掉，派积极分子坎吉、卡斯木·祖力亚洛夫和斯马义等人执行处决任务。坎吉等人将阿布杜拉押至城外用手枪击毙。正在此时，他们发现一名不相干的人出现在现场，斯马义害怕被该人告发，便到警察局自首，主动交待了有关组织的一切情况，使坎吉、卡斯木·祖力亚洛夫为首的部分成员惨遭逮捕。

1946 年三区代表在乌鲁木齐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会谈期间，追查坎吉等人的下落，国民党警察机关的刽子手们在矢口否认监狱中有这些人的同时，将坎吉、卡斯木·祖力亚洛夫二人用铡刀秘密杀害，对其余人尚未来得及处理，便由于抗拒不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三区代表的强烈抗议而被迫释放。三区代表将获释的该组

织成员艾则孜、卡斯木、祖拉力、马木托夫·库尔班、哈密提·伊敏诺夫、伊明江、阿不都热依木·吾买尔等十八人送到乌苏县参加了民族军。这些人参加民族军之后，不管在部队中还是以后复员到地方，不管在解放前的对敌斗争还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觉悟，发挥了重大作用，战功显赫，贡献卓著。坎吉和卡斯木·祖力亚洛夫虽然不幸牺牲，但他们精神永存，他们将永远活在后人的心目中，革命烈士的光荣榜上理所当然应当铭刻上他们的芳名！

乌鲁木齐的另一个革命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汉回进步青年于1944年成立的。成立不久曾一度陷于瘫痪，后来李泰玉、罗志、陈锡华、于昌志、禹占林等同志参与，重新使这个陷于瘫痪状态的组织恢复了生机。李泰玉、罗志二同志被选任正副书记，陈锡华、禹占林被选为组织委员，于昌志、罗志（兼）被选为宣传委员。他们秘密出版发行定名“战斗”的杂志，以后公开发行过，该组织为此亦被称为“战斗社”。

1946年6月三区代表到乌鲁木齐参加和谈期间，阿巴索夫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负责人来往密切、志同道合。对新疆形势及其它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样仇恨。共同的思想基础促进了双方的联合要求，经我们提议，他们同意加入“人民革命党”，完成了联合和统一的思想准备。

对《战斗》杂志的出版发行，我们表示祝贺，并给予了实际的支持。《战斗》杂志的执行编辑罗志同志受到国民党特务盯梢跟踪，处境危险。为了罗志同志的安全，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同志与我商议，安排罗志同志住在我们家中。因为虽然国民党安排特务在三区代表家附近昼夜二十四小时执行监视任务，但毕竟不敢擅自闯入我们三区代表的家中。因此安排罗志同志在我们不论哪家办公都行，不仅安全能得到保证，而且利于《战斗》杂志的顺利出版发

行。

罗志同志在我家从事秘密工作时，我有幸目睹了他是如何亲自刻蜡纸，亲自油印，亲自装订，亲自发行的。看到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真是又佩服，又心疼。为了减轻他的劳累，我决定让我们的养女古丽尼莎帮他工作。

古丽尼莎原是东北军一个老战士的女儿，其父“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战争，一次败仗后跑到苏联，后经霍城到伊犁务农。古丽尼莎的生母是一位名叫福洛赛的波兰妇女，古丽尼莎在苏联出生刚满一岁，生母便不幸过世，父亲后续娶一位名叫马鲁莎的俄罗斯女人为妻。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前夕，古丽尼莎的父亲在三区革命前夕的兵慌马乱中下落不明，马鲁莎为了生存，带古丽尼莎和她的妹妹以及与两姐妹同父异母的弟弟投奔伊宁市一个名叫萨代提汗的维族朋友。革命政府成立后，马鲁莎被教育厅录用为清洁工。打扫办公室、走廊和院子时，我常看到她身后跟着一个十一二岁的黄头发小姑娘和略小一些的一个小男孩。两个孩子帮马鲁莎扫地，给各办公室送茶水，看样子他们的生活很清苦。不用说，革命政府刚刚成立，经济情况不甚理想，工资普遍比较低，靠一个人的微薄收入养活几个孩子，其窘迫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非常同情她们母女，考虑再三，决定帮助那个母亲，收养小女孩为养女。当我把自己的打算告之马鲁莎后，她既有些舍不得，又很难拒绝我的好意，因为她的生活确实太困难了。她沉思片刻，叹息着对小姑娘说道：“孩子，你看行吗？我看你还是同意好了。我们连住的房子都不是自己的，要煤没煤，要柴没柴，没吃没喝，可怎么活啊……”小姑娘没有多考虑，立即表示同意，做了我的女儿。领回家中，我们给她取名叫“古丽尼莎”，这个小姑娘非常能干，很快便成了我们的好管家、好帮手。我们都很喜欢她。1948年12月由我们操办，古丽尼莎出嫁了，女婿是阿合买提江叔叔的儿子、他的警卫员穆罕买提江。

此后她便作为阿合买提江和玛依努尔的儿媳与他们生活在一起。1960年古丽尼莎与丈夫一起迁居苏联，在吉尔吉斯斯坦一所医院里工作。她生育了十一个子女，其中有九个被抚养成人。现在她已退休，1989年5月她曾在儿子地力木拉提陪同下来北京看望我们。

古丽尼莎当时随我们到达乌鲁木齐。我让她帮助罗志同志工作，她聪明，勤奋，很快便成为罗志同志的得力助手。罗志刻好钢版，古丽尼莎印刷；罗志整理，古丽尼莎装订；二人一起搞发行。他们机智勇敢，配合默契。《战斗》杂志除了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内部发行外，还对外发行一部分。他们通过穷苦百姓，乞丐儿童帮助散发了不少。罗志有很多汉、回、维等民族的小朋友，这些孩子经常以“乞讨”为名闯入我们的院子。每当这种时刻，古丽尼莎便站在远处放哨，罗志则把杂志塞进孩子们的要饭口袋。孩子们收好杂志后故意做出被追赶的样子钻窗户，挤门洞，翻墙头，四散奔跑。敌人特务毫不怀疑这些破衣烂衫的乞儿身上会有什么秘密，大量杂志就通过这些孩子散发到社会上，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积极作用。

在与一些重要部门难于联络的时候，古丽尼莎自然而然便成了不被敌人怀疑的最佳“联络员”。

天有不测风云。不知哪一点疏忽引起了敌人的怀疑，特务们窥探到罗志同志住在我家并在我家印刷《战斗》杂志的秘密，于是我家开始“宾客”盈门，门庭若市。为安全起见，我们决定将罗志同志及其印制《战斗》杂志的全套设备转移到阿巴索夫家中。

阿巴索夫以联合政府副秘书长的身份安排陈锡华、罗志、于昌志、范英中等“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的成员，到新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这些同志进入协会后，以合法身份向各族人民热情介绍苏联的情况，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1946年11月阿巴索夫利用与阿合买提江一起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伪代表大会的机会,与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董必武同志取得了联系。回疆后,他立即向“人民革命党”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两个组织的领导者汇报了与董必武同志会面的经过,传达了董必武同志的重要指示和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加入“人民革命党”的意见。

遵照董必武同志的指示,我们讨论了两党实现统一的问题,作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加入新疆人民革命党,重建新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随后,选举阿巴索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赛福鼎、艾则孜、李泰玉、阿斯海提·伊斯哈科夫、赛甫拉也夫、安尼瓦尔·汗巴巴、伊敏诺夫·穆罕默德伊明、阿不都拉·扎克洛夫、陈锡华、罗志、禹占林、于昌志等人为中央委员。(会上曾有人建议合并后将组织名称改为“民主革命党”,并增选阿斯海提、李泰玉二人为副主席,与会同志对此未提出异议,但未参加会议的其他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不同意此建议,故这个问题未形成最后决议。因为有这样一段插曲,所以后来有些同志称合并后的组织为“民主革命党”。)

新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确定了加强组织建设的有关问题,会后,按照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派人分赴各地筹建人民革命党的基层支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和平条款》终未能坚持执行,而被撕毁践踏,联合政府亦被迫解散。三区代表返回伊犁,新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随之迁往伊犁。战斗出版社的李泰玉、陈锡华、何瑞、范英中(音译)等同志随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来伊犁,罗志、禹占林、李伟新、于昌志等同志则留在乌鲁木齐以“新疆人民革命党乌鲁木齐地区委员会”之名坚持斗争,直至新疆和平解放。

第四章 南京之行^①

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众的意愿,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下简称“国大”)。新疆代表团由十八人组成,其中包括省联合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七名三区代表。当时我们对“国大”的召开也持反对态度,但使我们高兴的是,南京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驻南京代表团,这令我们为之振奋。几年来,我们虽然处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行事,但因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指导,仍走了不少弯路。我们梦寐以求地盼望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希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曾打算派人去延安,由于遭到反动派的百般阻挠,一直未能如愿。如今赴南京参加伪“国大”的三区代表终于有机会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实在令人无比兴奋。1946年10月底,阿巴索夫在乌鲁木齐安尼瓦尔·汗巴巴家中召开了人民革命党在乌鲁木齐的中央委员会议,做出由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去南京同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进行接触,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决定。

在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对三区代表与中共办事处严密监视的南京,如何避开国民党的耳目与中共代表进行接触是个颇费脑筋的难题。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可以利用李泰玉同志认识的南京几名地下工作者的关系。李泰玉同志给其中一名最为可靠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阿巴索夫南京之行的使命,恳请那位同志予以大力帮助。阿巴索夫同时还带去一封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

^① 本章节选自作者《天山雄鹰》一书第九章。——译者

的信。

1946年11月初,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从乌鲁木齐乘飞机经上海抵南京。

在南京出席会议期间,阿巴索夫时刻不忘自己的神圣使命,积极设法与南京中共办事处联系,并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童小鹏、张师傅、段廷英(司机)等人的周密安排下,于12月5日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所在地梅园与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直接会了面。董老对阿巴索夫表示热烈欢迎,并提出不少有关新疆的问题,阿巴索夫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与介绍,向董老转达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问候,转达了全体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崇高敬意,转达了新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良好祝愿。阿巴索夫代表人民革命党表示一定按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办事,最后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

阿巴索夫向董老介绍了新疆概况,汇报了几年来经过的曲折、坎坷,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疆的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最后,向董老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

第一,请求中共中央接受人民革命党为自己的下属组织。

第二,请求党中央派几名领导干部指导人民革命党的工作。

第三,为与党中央保持经常性联系,请求派一名技术干部携电台去新疆工作。

董老听完阿巴索夫的介绍和要求,沉思片刻回答说:“你谈的情况很重要,对我们了解新疆现状很有帮助。你提的三点要求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无权答复,需报告中央。等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我将正式答复于你。”

董必武同志非常重视阿巴索夫的这次拜访,立即致电延安向党中央报告。电文为:

国大新疆代表阿布杜克力木，姓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员，兼副秘书长，系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去年成立人民革命党组织，在新疆解放区内公开，在迪化及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把青年组织成员作为其间接成员算，该组织计有一万五千人……

接着列述了阿巴索夫的要求：

- 要求我党承认和领导他们的组织；
- 要求接纳该组织中央委员会十一位领导人入党；
- 要求派工作人员到新疆工作；
- 要求联络；
- 要求我党对新疆问题有明确指示。

电文中还写道，我答复三项：

- (一)要求中央指示；
- (二)我派不出人来；
- (三)可约定与延安联络的办法。

电报最后写道：是否有当，请中央核示。并解释说：“阿是由新返延林启乐（即林基路）同志的学生，由新返延同志中有人知道他。”

发电日期：12月6日。

延安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份电报。收到电报的当日便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复电，刘少奇同志签发。复电开头称：

电悉。望向阿（指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同志询明：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他们组织之具体主张；阿同志能（否）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如可以，可派一同志去。

电报要董必武同志向阿巴索夫申明下列几点(大意):

- 中共愿与该组织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
- 派去之代表,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
- 该组织十一位领导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
- 派工作人员须视今后新疆政治形势及交通条件而定。

电报最后要求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刘少奇报告及其他有关印发文件交与阿巴索夫,希望带回新疆后译成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出版。

1946年12月11日晚十时左右,董老派人将阿巴索夫秘密接到梅园,向他传达中央指示。董老说:“你介绍的新疆情况和提出的要求,我已向中央报告。中央很重视你的到来,对你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要我将研究结果转告你,这也是中央对你的答复。”

董老说:“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你们的人民革命党第一步先建立友谊关系,以后怎么办视情况再说。你们的党应当成为(新疆人民的)领导核心,要团结一切进步组织和人民群众,继续斗争。能够合并的组织,可以通过协商合并,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更好地开展斗争。至于组织的名称,基于新疆情况复杂,群众觉悟及接受能力有限,不宜过早打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这点请你们考虑。要求中央派代表去新疆的问题,可以考虑,但所派代表的任务只是联络和观察,具体派法以后再定。派工作人员去新疆帮助你们工作目前尚有困难,因为我党干部比较缺,领导干部更少,一时难以派出恰当人选,以后视新疆的政治形势及交通情况再说。关于你们党十一名领导干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我们表示欢迎,具体手续待我们的联络代表到疆后再请示中央决定。”

董老接着说:“新疆是个很复杂的地区,那里有国民党的反动

政权，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宗教影响深，帝国主义无时不在窥伺这个地方。你们在伊、塔、阿三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牵制了驻守新疆的大量国民党军队，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希望你们坚持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新疆地处祖国边疆，交通不便，加之目前我们党正处于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关键时刻，一时实在难以抽调干部赴疆工作，因此新疆的斗争当前主要靠你们自己。希望今后能常联系，有何困难与问题你们尽可提出，我们一定尽力帮助。希望你们注意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死心踏地效忠帝国主义的人都要团结。考虑到新疆人民的接受能力和宗教影响，我们认为暂时不要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口号为好，可多开展正面宣传，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这也是策略问题。我衷心祝愿你们斗争成功。”

董必武同志的一席话使阿巴索夫顿觉心明眼亮，信心倍增，思想豁然开朗，更加明确了斗争方向，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他激动万分地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关怀，我已圆满完成了党交付的重要使命，明确了今后的奋斗目标。您的答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革命事业与新疆人民的重视与关怀。回疆后，我将如实传达您的指示，照您的指示去做。”

董必武同志又向阿巴索夫转达了中央完全同意关于他要一位报务员和一部电台的要求，决定派彭国安（后改名为王安迪）同志带一部电台随阿巴索夫同志赴疆。阿巴索夫同志对此深为感谢，十分激动。

1947年1月14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一行返回乌鲁木齐。此后，他们开始通过电波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联系。1947年8月，国民党撕毁和平条款，王安迪携电台随阿巴索夫等人来到伊

宁。当时党中央也已撤离延安，由于相距遥远，功率不够的电台无法与党中央继续保持联系，只好将电台改装为收音机，收录每日的新华社通讯，然后转载于报纸发布。

第五章 与泛土耳其主义者的斗争

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列强争夺的目标。俄、美、英、德、日等帝国主义先后不遗余力地对新疆进行过侵略。他们的共同目的无非是分裂我国，把新疆变成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军事基地。帝国主义者费尽心机要在新疆建立什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伊斯兰国”之类的伪政权。为达目的，他们不惜向新疆派遣形形色色的间谍、特务，收买地方民族败类及泛伊斯兰分子、泛土耳其主义分子，并将他们培植为忠实奴仆为其效劳。二十世纪初，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新疆的侵略。1944年新疆各族人民掀起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风暴，美帝国主义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对这场革命风暴的疯狂镇压。时隔不久，与国民党反动集团一起收买了新疆的土匪头子乌斯满，利用他策划对三区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这个阴谋被粉碎之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又策划了一个新的阴谋，将叛国潜逃国外的忠实奴仆、泛土耳其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麦斯武德、穆·布格拉、艾沙等人于1946年送回新疆。

麦斯武德原籍伊犁，二十世纪初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当时可算个知识分子，曾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1939年自南疆逃往印度，解放后死于乌鲁木齐。

关于穆·布格拉前面我们曾作过介绍。该人与其兄依米尔·艾孜莱提，其弟夏合曼苏尔共同领导过和田暴动，以后到过英国。

该人办事不是为劳苦大众,而是为剥削阶级、宗教上层人士谋利益,是一个与人民大众相对立,“为伊斯兰而战”的阿孜。该人于1934、1949年先后两次逃往印度。1972年死于土耳其。

艾沙精通汉语(在乌鲁木齐学堂专门学过汉语),在安集延的中国领事馆任过职,是一个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长期高喊“民族至上”者之一,以出版为业进行活动(多在南京)。现在土耳其。

这三人都都是民族主义者,基本思想都是坚持反苏反共。在反苏反共方面三人甚至在国际社会(起码在近东)都大名鼎鼎。为鼓吹和实现自己的主张,三人不遗余力采取种种方法,进行了大量活动。他们狂热鼓吹泛土耳其主义,一心想建立一个“土耳其国家”,推行泛土耳其主义纲领。主张东西方一切操突厥语的人们(土耳其人自然包括在内)团结在一面大旗之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土耳其大帝国。

这个主张原是英帝国主义为欺骗拉拢操突厥语的人民反对共产主义而打出的旗号。麦斯武德等三人虽深知这个主张不过是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的幌子,仍助纣为虐。反苏反共的共同思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帝国主义的怀抱,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本民族人民。三人沦为蒋介石的忠实奴仆之后,对蒋介石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狂妄宣称要在新疆建立什么“真正的土耳其斯坦”。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这块空招牌颇感兴趣,如获至宝。他们把这张“王牌”抛向乌鲁木齐,妄图以此对抗三区革命,对抗新疆各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达到他们把新疆变为反苏基地的罪恶目的。

麦斯武德等三人一到新疆,便听命于美国领事馆与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进行了一系列反苏反共、反对三区革命、反对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罪恶活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得尔涅克”(同盟会)的

组织,出版报刊杂志,纠集一批臭味相投的人,疯狂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

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监察使,穆·布格拉为建设厅长(后任副主席),艾沙为政府副秘书长(后任三青团书记)。很明显,国民党政府给他们委以高官厚禄的目的自然是要他们监视我们,对付我们。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美国主子操纵下进行的拙劣表演,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

麦斯武德之流在新疆物色了青格孜汗、甫拉提·卡德尔、萨力主克、艾尔托乎如力、萨力士等一批徒子徒孙。这伙人在麦斯武德之流的指使下,在乌鲁木齐和南疆各专区县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蒙蔽了一批忧国忧民、追求自由解放、却苦于找不到正确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使这些青年上当受骗而追随他们。三区代表到乌鲁木齐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和阿合买提江先后去过两次南疆,帮助那些受蒙蔽的青年知识分子澄清认识,使他们找到了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正确道路,看清了口头上宣扬“民族自由解放”,实质上却是反对“民族解放”的麦斯武德之流的本来面目。

当时在新疆,特别是在七个专区内,对待民族解放问题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主张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争取自由解放,这种思想潮流以三区代表为代表;另一种倾向则主张向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顶礼膜拜,卑躬祈求自由解放,这种思想潮流以麦斯武德等三人为代表。从联合政府成立到我们来乌鲁木齐,麦斯武德之流的主张一度颇有市场,在社会上广为宣传。联合政府成立之后,经过对比,不少人的认识有了转变。通过自由辩论,很多人明辨了是非,辨明了曲直。

麦斯武德之流视我们为亲苏派。他们认为依靠苏联政府的援助争取民族解放远不如栖身于蒋介石独裁集团的怀抱中安逸舒

适。三区革命党反对的不是国家的统一，而是那些窃取国家政权、出卖祖国、欺压人民、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独裁统治者和反动派。我们认为新疆的根本问题是争取民族自由解放。那些扼杀自由、民主，实施民族压迫的独裁者的本性是十分反动的，他们妄图扼杀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运动纯粹是痴心妄想。我们主张通过斗争，获得民族的自由、民主与解放，是由于无数历史事实教育了我们，在反动统治集团掌权的情况下，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谈到“亲苏”，我们承认，我们的确是亲苏派。我们亲苏的原因，一是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不仅是为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为世界各国人民指出如何真正争取自由解放的唯一的国家和政党；二是我们觉得只有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才真正关心并支援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大力支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苏联政府同样支持、援助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我们认为苏联政府的有力支持，是三区革命从爆发到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只能亲苏，而绝不能亲美、亲英或亲别的什么。他们说我们亲苏，并为此而百般敌视我们，这恰恰是他们反苏反共思想本质的真实反映。

麦斯武德之流及其少数追随者对中国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他们害怕中国共产党，尤其害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他们拥护与中国共产党作对的国民党反动派，支持新疆的国民党独裁统治，为巩固国民党反动政权不遗余力。

我们与麦斯武德之流的想法针锋相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新疆的民族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麦斯武德之流蛮横地要求我们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听命于蒋介石政府，我们坚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坚持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的政治立场。

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召开伪“国大”，新疆十八名代表应邀赴会。代表中有新疆联合政府中的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二人。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不参加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后，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立即响应，对“大会”持消极态度，对“大会”的安排不予理会，以后干脆回避，不参加会议。蒋介石又是邀请，又是威胁，软硬兼施，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然而两位代表丝毫不为其所动，不仅拒不到会，而且后期干脆到北京、天津等地观光旅游，使得蒋介石及一帮亲蒋分子大为恼火。麦斯武德之流对此举也颇为不满，一会儿说我们不尊重蒋介石，一会儿说我们追随共产党如何如何。我们的代表回敬说：“我们不会追随与人民为敌的人。而对于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战的人们，我们不仅支持，而且要和他们并肩战斗。”阿合买提江对蒋介石及麦斯武德之流的攻击毫不妥协，在当时的公开讲话与撰写的文章中，列举了大量事实予以反击，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义斗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在痛斥蒋介石、麦斯武德之流的同时，也教育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

麦斯武德之流对我们大谈其“要安定、要团结”，与国民党高喊的“你们必须服从于我”毫无二致。我们认为，没有自由谈不上团结，绝不能以镇压人民的代价换取安定。他们攻击我们“玩火”，说我们“玩火者必自焚”，我们回敬道：“这种火不烧手，即使烧手我们也在所不惜。”

大约在1947年初，国民党方面邀请我们参加三青团的一个什么纪念会。我们考虑良久，最后决定赴会。我以三区代表身份参加

大会时，国民党军政要员均在场。三青团书记艾沙请我讲话，由于我们事先决定不对任何问题表态，便借故推辞。谁料麦斯武德的一番胡言乱语使我改变了初衷。麦斯武德讲话大谈新疆的政治形势，说什么新疆人民在受苦，在流血牺牲，这是有些人玩火造成的，胡说什么，玩火是不行的，玩火者必自焚。针对他的一派胡言，我拍案而起，义正词严地进行了反驳。我以铁的事实说明，对于新疆人民正在流血这个事实，军阀应负直接责任。我说：“怕狗要不成饭，怕火革不了命，怕烧手的人绝不会走近火堆。你们说我们玩火，我们就算是玩火，这样的火我们还要继续玩下去。我们绝不向你们的主子祈求怜悯，祈求恩赐。”当时因我没准备发言，故未带翻译。我请艾沙帮助翻译，他不肯，我便开着玩笑激他道：“你们是东道主，我是你们的客人，东道主总得给客人点儿面子吧！”（艾沙是个风趣幽默的人，在进行政见不同的辩论时，我们时常开些玩笑。）他无可奈何，只好苦笑着应承道：“没办法，看来我只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了！”我理解翻译我的讲话，对他来说有多么不容易，正如翻译完了他擦着满头汗水所说的“这不是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我的发言使麦斯武德之流及其主子坐卧不宁。没等会议结束，我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麦斯武德之流鼓吹通过文化启蒙争取自由解放纯粹是一派胡言，他们打着“民族”旗号粉墨登场干的就是如此勾当。在南京出版维文杂志，目的也不外乎宣扬他们自己的这个主张。他们号召压迫者“公允”一些，要求人民群众本本分分地学习文化，获取知识。可他们不明白，没有自由解放，哪里谈得上学习文化，获取知识！实际上他们是在装糊涂，他们实在是别有用心。当时我任教育厅厅长，经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他们要我在促进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多出些力，不要干预政治，我当然要反驳他们，因此我们经常发生争执自然就难免了。

第五部

新的斗争浪潮

第一章 喀什的民主选举与革命高潮

随着乌鲁木齐斗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尚未解放的新疆七个专区县掀起了新的斗争浪潮。有些地方发动了武装起义,我们劝告他们要遵照《和平条款》进行合法斗争。哈密의吾南巴依和道列提汗等人发动的武装游击活动,就是这样经阿巴索夫亲自劝止并组织他们进行和平斗争的。酝酿中的吐鲁番武装行动也经我们的劝解而平息。我们根据形势的需要向各地派人以三区代表的身份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合法斗争,我们所派出的代表中,有一部分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了,安尼瓦尔·玉素甫就是其中之一。安尼瓦尔·玉素甫到达莎车,被莎车专员周芳刚逮捕施以酷刑,横遭折磨。周芳刚企图逼他供认自己是奉三区之命前来建立革命组织的,然而安尼瓦尔·玉素甫置严刑拷打于不顾,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最后慷慨就义。

在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加紧镇压新疆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反对压迫的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全疆各县的民主选举开始了。按照条款的有关规定,各县首先召开县参议会,选出县长,而后召开

省参议会。当时专员的任命有所变动：阿布列孜·买合苏木被任命为阿克苏专员，阿布杜克日木汗·买合苏木被任命为喀什专员，卡斯木江·堪拜力被任命为喀什副专员。被任命的上述几人就职后终日生活在高压与危险之中，因为各县选举前的县长都是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官吏，个别县的维族县长不过是有职无权的傀儡。为保证选举顺利进行，我们成立了监督小组。小组成员包尔汗赴莎车专区，穆·布格拉赴和田专区，我则赴喀什专区，我们分别担任各专区选举监督组长。

我们到达喀什后，国民党军政人员对我们态度冷漠，人民群众则欣喜若狂。群众自发地跑来迎接我们。从机场到市区，路边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热情欢呼，热泪盈眶。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激动万分，喜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难以形容。当时喀什有一个名叫杨德良的军长，是个凶神恶煞般的回族军阀。此人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一面残酷压榨百姓，大肆逮捕进步人士，一面又装出一副虔诚的模样去清真寺做礼拜，用以欺骗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颇能迷惑人。我离开乌鲁木齐之前曾向张治中提出：“杨德良不调离喀什我不去。若一定要我去，去后发生任何问题我概不负责。”张治中保证一定将此人调走，我方成行。我到喀什之后，该人尚未接到调离命令，我按兵不动，未开展任何活动。三四天之后，他接到了张治中令他速到乌鲁木齐的电报后离开，我们才投入工作。

阿布杜克日木汗·买合苏木对该人十分不满。记得有一天，专员公署招待所我们居住的客房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传出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我们闻声赶去一看，原来阿布杜克日木汗·买合苏木正在和杨德良吵架。他气得白胡子不停地抖动，杨德良却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边。阿布杜克日木汗·买合苏木挥舞着拐杖激动地喊道：“老牛不怕屠刀，你有本事尽管使来！要抓就抓，要杀请便，无论如何要我离开群众办不到！”我劝他坐下来，有话好好说，他怒不可遏

地告诉我，杨德良恐吓他说：“我去乌鲁木齐开会，一个星期左右返回。你办事须三思而后行，你若跟在伊犁人后边跑，出了麻烦，我回来后饶不了你！”杨德良见到我很不自然，告诉我张治中来电报要他去乌鲁木齐，一个星期以后回来，他不在的这段日子，军事方面由喀什警备司令张凤仪、赵锡光二位将军负责。我不屑与他交谈，应付一下就出去了。第二天我把张凤仪、赵锡光找来，和他们交换有关在喀什专区开展选举工作的意见，提出部队和警察机关不能对群众施加压力，军方不能违背《和平条款》，应当大力支持民主选举等问题。张、赵二位态度比较和缓，不那么强硬。这是因为我来前我们曾派人来喀什做过他们的工作。（来人系何瑞同志的夫人姚子建（音译）同志。姚与张凤仪的夫人相识，通过张夫人做了不少工作。）

在那段日子里，喀什形势异常紧张。军队全副武装，充满了白色恐怖气氛；警察虽尚不敢公开捕人，特务活动却加紧了；群众中出现了骚动，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情绪激昂，却不知如何行动。经常有人来往于我们的住地，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紧张的问题和要求。我们来之前处于国民党反动军警重压之下的青年们，如今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精神面貌为之振奋，为国民党效劳的人则似乎开始威风扫地了。

过去一些站在麦斯武德一方的维族知识分子终日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如今垂头丧气，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三区一方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令人欢欣鼓舞。麦斯武德方面沉不住气，派来三名代表与我进行会谈。我正告我方的动机，告诫他们不站在人民一边绝无好下场。他们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一一作答，当他们提出“三区代表与麦斯武德、伊敏、艾沙先生究竟有何区别”时，我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他们高谈‘民族’，我们也谈民族，然而二者所谈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谈的是形式上的民族解放，我们注重的是真正的民

族解放。他们妄图利用报刊杂志向统治者摇尾乞怜，乞求民主自由解放，而我们主张以武力对抗，消灭剥削者，争取真正的民主自由解放。我们的区别就在于此。”他们似乎理解了我们的回答表示满意。以后这三个人又分别与我交谈，态度越来越好。看到他们的变化，我很高兴。为了进一步团结他们，我要求进步青年和他们搞好团结，争取他们，壮大我们的力量。

包尔汗去莎车，穆·布格拉去和田之后，我们在喀什开始了工作。我和卡斯木江·堪拜力、阿不列孜·穆罕默德、阿布都热衣木·伊明等同志确定了喀什工作的原则、计划和政策。我们的工作原则为：坚决执行《和平条款》，支持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要求，不允许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和平条款》不得开展武装斗争），坚决搞好选举，撤换反动官吏，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镇压进行坚决斗争。

工作原则确立之后，我们立即在喀什市努尔比西中学礼堂召集了一次进步知识青年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使这次大会成为既是动员，又是强调政策和策略的大会。大会结束，斗争浪潮益发汹涌澎湃，特务们惊恐不安，忙于四处逃窜，因为他们一旦被青年们发现，便逃不掉一顿痛打，军队慑于群众的激愤，对此望而却步。喀什出现了为自由解放奋勇抗争的新气象。《喀什日报》的内容随之焕然一新，令人振奋。

选举工作开始了，我们首先成立了筹备小组，派人分赴各县，指定县长候选人。而后我和卡斯木江·堪拜力、阿布列孜·穆罕默德等人轮流到各县主持选举工作。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国民党分子对此同样重视，他们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我们抗衡。国民党分子手中有武器，看起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实际上非常心虚，因为广大群众明显地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到各县检查，发现时机成熟后立即布置选举。有些地区的国民党人士派兵包围选举会场，问他

们何以如此，他们美其名曰：为保证选举顺利，保卫赛厅长（指我）安全。实际上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向选民实行军事威胁。尽管如此，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仍然取得了喀什专区十二个县中十一个县选举顺利完成的重大胜利。十二个县中只有乌恰一个县的选举工作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情是这样的：选举时提出的两名候选人中，一名是国民党方面推选的原县长，是个贪污腐化成性的大烟鬼；另一名是我方推选的柯尔克孜族人民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选举刚刚开始，作为选举会场的县政府大院就被预先布置好的一百多名武装军人所包围，选民处于武装威胁之中。我们担心发生不测，要求部队离开，可国民党方面却以保卫选举为由拒不让部队撤离。我们分析了形势，认为选举会场没有交战场地，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便主持选举按时进行。选民们交来无记名选票，监票人在黑板上做统计，只见两名候选人票数交错上升，最后那个原县长竟以两票之差占了上风，这个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根据选举规则理应承认这个选举结果有效，然而我们不甘心。经过充分酝酿进行的民主选举竟选出这么一个大烟鬼、吸血鬼，这个民愤极大的贪官重新登上县长宝座对百姓的盘剥压榨岂不更会变本加厉？我看到会场中的人民代表有些垂头丧气，国民党分子趾高气扬，以胜利者自居，心中十分不平，毅然宣布：“武装部队威胁选民，这种情况下的选举不能算数！我以省选举监督组长的身份宣布本次选举无效，待适当时机另行选举。现在散会！”听完我的决定，大多数选民鼓掌欢呼，表示拥护，只有个别人叫喊：“这样做不公平，不能这样做！”我没理会个别人的狂喊乱叫。会后，先我们而到的工作组向我们做了检讨，然而我们知道，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选民受到全副武装的部队突如其来的威胁造成的。选举前，一些代表曾被叫出会场，受过恐吓。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造成的失败不足为奇，十二个县中一个县遇到些挫折也不能说明我们的失败。我否定了这个失败的选举

结果,又进行了一个月充分的准备,待时机基本成熟,决定进行第二次选举。选举前,我正言厉色警告国民党军事头目说:“如果你们重蹈上次选举的覆辙,再派部队对选民进行武装威胁,我们就不再
进行选举了,一切后果你们自负!”国民党方面心虚,这次没敢轻举
妄动。选举开始后,阿左列改,穆罕默德伊夫里士塔士,往田我

期间,了解到喀什地区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不仅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量公开的政治斗争,而且开展了大量地下革命活动。喀什、伽师、阿图什等地的进步青年先后成立了青年组织,有些为武装暴动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我们曾劝阻他们不要成立什么组织,更不能举行武装暴动,可是“按倒葫芦又起瓢”,今天劝止一个,明天又出现另一个。喀什的“飞燕组织”,阿图什的“解放组织”,伽师的“自由组织”以及其他种种均是当时形势下的产物。说句心里话,制止青年们进行革命活动对我来说实在是违心的,这些组织是难能可贵的进步力量,身为革命者的我,违心地阻挡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压制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真比用刀割肉还要难受。现在看来,这种作法从本质上说是大错特错的。和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座谈,他们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令我由衷地钦佩,对他们的提问我无言以对,阻止人们革命的作法使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只能反复用一句话说服他们:“我们不能违背《和平条款》。千万不能松劲,也不能急于求成。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们该如何做。”他们想不通,却还是听从了我们的劝告。若当时听其自然,加上我们的支持,我想塔什库尔干游击队肯定会迅速把莎车、和田、阿克苏等地的人民发动起来,用不了多久,一场震撼整个新疆的革命风暴就会席卷整个南疆,那将会出现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高潮啊!然而客观形势不允许我们支持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当时我特为此事给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打电话,建议保留喀什地区的几个革命根据地,结果遭到拒绝,我只能照办。

当时喀什地区的教师在知识青年的进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年教师占进步知识青年的大部分,教师们自觉地修改教学大纲,对学生加强民族解放和革命思想的教育,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站在最前列,使整个喀什地区民族教育战线很快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新局

面。我每到一处都一定要走进学校与教师们举行座谈，这成了我执行主要任务以外，以教育厅长身份执行的一项个别任务。我目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的革命热情和旺盛的斗志，深受鼓舞，非常感动。

在教育界人士和广大教师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在喀什召开了一次教育人员大会。这次会议在讨论教育战线任务的同时，还号召教育界人士要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最后喀什教育工作者授予了我一枚刻有“教育先锋”字样的金质奖章。

大会开得非常成功。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热情与旺盛的革命斗志，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我觉得，为我颁发奖章不是对我个人的尊崇，而是喀什教育工作者乃至全喀什革命知识分子给予三区革命、三区革命者的崇高敬意与珍贵礼物。称我“教育先锋”，我当之无愧。我虽然在教育战线多少做了一点工作，但实在微不足道。这个光荣称号理应属于全体三区革命干部。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这枚奖章做为喀什教育工作者和其他革命群众给予三区革命的崇敬与珍贵礼品接受下来（在此我想说明一点，除了三区政府授予的奖章，勋章，我还得到过以阿勒泰人民、塔城人民的名义赠送的奖章，我认为这些奖章与喀什教育工作者赠予我的奖章性质都是一样的）。遗憾的是喀什专区教育战线的革命烈焰，由于《和平条款》被撕毁，我们被迫返回伊犁而被国民党刽子手无情地扑灭，大批为人民自由解放而战的革命知识分子被凶恶的敌人无情地投入了监狱。

第二章 和田、莎车之行

在喀什期间，我收到过不少莎车、和田革命青年写给我的信

件,内容都是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我在喀什专区的任务完成后,原打算即刻返回乌鲁木齐。以后听说莎车、和田等地的选举工作遇到麻烦,包尔汗和穆·布格拉中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计,包尔汗写信邀我去莎车,和田青年也特派三名代表请我前去,于是我不得不改变原计划,决定到和田、莎车走上一遭。国民党军方对我的行动百般阻挠,阻挠不成竟以不供汽油的卑劣手段(当时汽油掌握在部队手中)使我难以成行。我拒不屈服,向苏联驻喀什领事馆要来一辆汽车,不顾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强烈反对,毅然踏上去和田、莎车的旅途。国民党当局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硬要给我增派卫兵。我不要,他们说:“这是张治中的命令,张治中要我们务必保证赛厅长的安全。”我斥责他们:“别提什么保证安全了,只要不给我添乱就谢天谢地了。”不言而喻,他们的所谓“保证安全”,主要不是保卫我,而是把我和群众隔离开。他们派“卫兵”在途中“保卫”我,令我们苦不堪言。去喀什县城,他们派十至十五名卫士,去稍远一些的县,增至二三十人。这些卫士的任务是以“保卫”为由,不许群众进入我们住所的大门(我们也不允许卫兵进门)。这些卫兵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会儿少个人,一会儿丢支枪,都要我们帮助寻找。我们还得管他们饭,说是保卫我们,实际上却是我们养活他们,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

去莎车时,我拒不让他们再派卫兵,只带了自己的两名护兵、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同往。我相信群众的觉悟,无论走到哪里,群众都会自发地保护我们。从喀什出发,当晚到达英吉莎。在县城内行进时随着一声“站住”的喊声,我们乘坐的吉普车玻璃窗前一发子弹呼啸而过。仔细察看,子弹从路边一间店铺的板墙中射出,穿入路对面一间房子的墙壁。这间房子的主人是一对夫妻带着五六个孩子,全家正在酣睡。若这户人不是正在睡觉,说不定有人会被打死。我们非常气愤,抓住打枪的士兵,缴了枪,令他带我们去团部

(当时英吉莎有国民党一个团的驻军)。我们令这个士兵立正站在吉普车车门旁,见到他们的人回答口令。行进途中,我们发现街道两旁四、五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弓身向我们缓缓靠近,神色紧张,似乎十分心虚。站在车门旁的士兵回答了口令,用汉语解释了几句什么,仿佛解除了那些人的疑虑与紧张,于是为我们一路放行,直至汽车开进团部大院。团长在院子里正在心神不定地踱步,见我下车忙深鞠一躬,以示欢迎。他对他的士兵向我们开枪一事表示不满,他大骂那个士兵:“他妈的!你算什么玩意儿!”命令关那个士兵的禁闭,同时连连向我道歉。显然,这个团长是在耍滑头,堵我们的嘴。然而我们虽然很不满意,也不可能向他再提什么要求了。

离开团部上了大路,发现路上有近百名群众正在恭候我们。原来这些人本来准备在我们下榻处欢迎我们,听到枪响不知何事,放心不下才来到大路边等候。我们告诉他们准备住在县政府,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小伙子忙告诫我们千万不可住在那里,他们已在另外的地方为我们安顿好住处,要求我们务必随他们前往。盛情难却,我们只好随他们来到住地。那是一所非常整洁漂亮、房间都镶有玻璃窗的崭新院落,一问,原来这是艾沙伯克的家。我们去时,恰好艾沙伯克的弟弟阿不都克力木伯克在家。院子里挤满了人,大门两旁和房顶上站着不少人,均手持棍棒,威风凛凛。我们洗完脸刚在桌边落座,一桌丰盛的饭菜便出现在眼前。我又惊奇又感动,惊奇的是我们动身来英吉莎之事并未张扬,这里的人们如何得知?感动的是群众对我们的一片盛情充分说明他们盼我们来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由解放心情之迫切。经了解得知,原来我们来英吉莎一事是卡斯木江·堪拜力和阿布列孜·买合苏提事先派人骑马前来报的信。

饭后我们被安排在一间较大的房间内歇息,我们睡在中间,很多手持刀、棒的人们坐在我们周围守卫。房前走廊上也站着一排手

持棍棒的“卫兵”，真是戒备森严！我招呼众人躺下休息，可能是旅途劳顿之故，我一躺下很快入睡，其余人睡下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半夜时分我被一阵骚动惊醒，只听屋子里的墙皮“喀嚓喀嚓”，大门“哐啷哐啷”乱响，院子里和屋顶上的人们都在高声喊叫，气氛非常紧张，好像是大敌当前的样子。谁知众人是虚惊一场，原来这是一次大地震。当人们反应过来后，忙往院外跑。地震很快便停止了，只见院子里的人们手持大刀、棍棒都在严阵以待，准备战斗。两名身材魁梧、满脸黑胡须的人各握一把明晃晃的大刀，高挽衣袖，英姿勃勃地站在院子正中。我对这两个人一见便心生好感，连连称赞二人“够威风”。阿不都克力木伯克向我介绍：“这二人是英吉莎有名的好汉，在敌人面前从不甘示弱。”众人听到我们的对话都笑了起来。群众自发地奋不顾身地保卫我们，令我深为感动。这充分体现了英吉莎人民对三区革命和三区革命者的崇高敬意与诚挚关怀。

到达莎车，守卫城门的几名士兵妄图挡住我们的汽车。我们不理睬，鸣笛直冲过去，气得他们在汽车后面“哇哇”乱叫。一个名叫司马义阿洪的人（包尔汉住在该人家中）听见喊声，和其他几人一起走出院门把我们接至院内。我们在莎车没停留多久，因为包尔汗已经结束了这里的工作。

这里有些县的选举工作进行顺利，有些县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威胁，结果不甚理想。以“吸血鬼”的绰号闻名莎车以至整个南疆的莎车专员朱芳刚在包尔汉去莎车前便做好全面对抗的准备。包尔汉来后，形势一度对民主选举很不利，包尔汉一方面依靠进步知识分子，一方面争取张治中的支持，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扭转了被动的局面。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威胁和警察机关经常性的拘捕恐吓，形势没能有特别的起色。为改变这里的局面，我想停留一段时间，协助包尔汉多做些工作，可和田还需要我去，所以

在莎车只停留几天我便离开了。

离开莎车上路，到达叶城时，守卫在城门口的两名国民党兵士在城边桥头上将我们拦住。我的随身警卫穆罕默德和他们争辩，要求他们让路放行，却遭他们辱骂。一气之下穆罕默德打了一个士兵一记耳光，把那个士兵打落水渠。穆罕默德一不作二不休，索性缴了另一个士兵的枪支，把那个士兵塞到我们的汽车中，带到师部。一个被称做尚师长的军人见状忙向我们道歉，命令关两个拦车士兵的禁闭。我对他说：“你不必关他们禁闭，他们并没有什么过错。”这位尚师长就坡下驴，不再提关士兵禁闭的事情。对于这件事我们双方其实心照不宣，都明白是怎么一档子事。

当晚尚师长设宴招待我们。宴会很是隆重，尚师长在宴会上致欢迎词时，大夸特夸自己及部下如何如何好，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次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国民党人把“西安事变”视为蒋介石表现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事件，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在欢迎宴会上，尚师长邀请我参加次日的纪念会，请我帮他点忙，保证大会顺利进行。我估计他是害怕群众冲击大会，想借我的威望阻止群众采取行动。尚师长虽自命不凡，做起事来却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以前塔什库尔干游击队多次到过此地，叶城人民，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接受过不少革命影响。我到叶城时，不少群众自发上街表示欢迎，我们下榻的县政府门前院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一切似乎都令尚师长不安，于是再三请我一定参加大会。我对他说：“你不必害怕群众。其实群众通情达理，没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与人民作对。”

第二天在县城旧俱乐部召开大会。会场里坐满了人，尚师长亲自在俱乐部门前迎候我。我随尚师长走进会场，受到大部分与会少数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会场前排是士兵的座位，我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座。尚师长亲自主持大会，首先请全场起立齐唱“三民主义国

歌”，这是当时开会的例行仪式。尚师长用力地挥动双手打着拍子指挥全场唱歌。前排的人们随着尚师长的命令起立，放声高歌。唱了两句，这些人似乎感到些什么，向后一看，歌声戛然停止。原来大部分与会的民族群众不仅没唱歌，甚至没有起立，我在台上也是稳坐没动。尚师长见会场出现这种情况感到很尴尬，但他不能停止。只见他越发用力地挥动手臂，越发扯着嗓子嚎叫，可惜唱了一半，嗓子就发紧，声音变得十分难听。他毫不理会，仍然扯着嗓子叫唤，以至唱得嗓音嘶哑，满头大汗。礼堂里不时传出人们“嘿嘿”的窃笑声，像是观看一幕绝妙的讽刺喜剧。歌唱完了，此时的尚师长俨然一副对“三民主义”，对蒋介石无比忠诚的神情，眉头紧锁，胸膛高挺，目光痴迷，似乎在向全场显示自己的一片赤诚，可在我眼里，他分明是在示意这幕讽刺喜剧的结束。片刻，他开始讲话，说什么：“西安事变是叛徒对国父的阴谋迫害，伟大的国父蒋介石与叛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叛徒来抓蒋委员长，蒋委员长高喊：‘我是中华民族之父，我命令你们立即滚出去！’叛徒们吓得浑身发抖，边不停地鞠躬行礼边退出委员长的房间。”

尚师长唾沫星子四溅地吹嘘所谓蒋委员长的“英雄气概”，其表情与语言不啻又续演了一场喜剧。会后我召集进步青年和乡里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举行座谈，解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给他们讲了讲形势。在叶城停留两天后我们直赴和田。

在快到和田县城的路上，遇见了不少或骑马、或骑驴、或步行前来欢迎我们的群众。人们见到我们欣喜若狂，自发地围在汽车周围，簇拥着我们前进。我们的车开得很慢，越接近县城人越多。欢迎人群绵延四五公里之远，人们情绪激昂，热情奔放，不少人淌着兴奋的热泪。头缠色兰的人们虔诚地为我们祈祷平安，人群中传来阵阵“欢迎三区代表”，“坚决执行十一条和平条款”的口号声。

进城后，我们看到专员哈东邦（维族名字为努日伯克）、部队首

领刘指挥率一些官员前来欢迎，我们穿过国民党军的队伍前行。我们觉得，与其说他们出动军队向我们表示欢迎，不如说是在向我们示威。进入专署大院，只见从门口到院内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穆·布格拉在大门里面迎候我们。我们互致问候之后，我指着那些全副武装的兵士笑着对刘指挥说：“看样子你们把穆·布格拉厅长保护得蛮不错嘛！”这位旅长不知趣地说：“这是我们的任务。”穆·布格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气愤直言：“你们的任务不是保护我，而是监禁我，你何必不直说呢？”旅长说：“我要是打算监禁你，早就把你抓起来了，何必等到现在？”穆·布格拉更加气愤地说：“你有本事尽管关押好了，我倒正想领教领教你的能耐。”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尖锐到如此地步，我实在没想到，也实在感到愤懑不平。我忍不住说道：“你可以关押一个穆·布格拉厅长，可以关押一个赛福鼎厅长，可你总不能把全和田的人民、全新疆的人民都关押起来吧？”那位旅长脸红了，十分窘迫，连声说道：“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哈东邦见状怕再说下去无法收拾，忙息事宁人地劝道：“请进屋休息吧，你们一路辛苦了。”刚到和田，我们与当地的军政要员便进行了这番接触。

我们的到来使和田呈现出了一派崭新的精神风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到愉悦振奋的气氛。在白色恐怖下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农民们大批进城寻求争取自由解放的真理，青年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广大群众表现出不怕威胁，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此时的和田大有一触即发，点火就着之势。

我们在和田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因为我们感觉到和田形势异常紧张。听说穆·布格拉来和田后，国民党军事当局给他施加压力，他经历了严酷的斗争考验，依靠人民群众，依靠青年知识分子，在一些县主持开展了选举工作。虽然有些县选举结果不理想，但不

能归罪于他。因为他来后坚决执行和平条款，在发动群众进行反独裁、反压迫、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对穆·布格拉恨之入骨，派军队出面限制他的行动，最后竟至不许他自由活动，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我们到和田后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集中在确立和田县县长人选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力荐原汉族县长继续出任，群众拒不接受，定要选举阿布杜卡德尔·艾山。穆·布格拉支持群众的意见，双方矛盾更趋尖锐。我发现穆·布格拉的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比之过去有不小变化。他强烈地表现出对刘指挥的不满，激烈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由于签订和平条款，需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违心地讲些要求自由解放的话，他认为这是卑躬屈膝，难以忍受，于是给张治中打电报，发泄不满。张治中复电要求他“为避免与军方发生冲突，见电请速回。”他回答：“不完成任务绝不离开和田。”双方矛盾尖锐，几近僵局。我们召集刘指挥、哈东邦等举行座谈，穆·布格拉心怀强烈不满，异常气愤地发言。他对刘指挥高声怒喝：“要杀要砍请便，不达目的我决不离开。有本事你枪毙我！”刘指挥也毫不示弱，暴跳如雷。我严肃指出刘指挥与哈东邦的做法是错误的，应当执行和平条款，按和平条款的精神进行民主选举，按照人民的意愿解决问题。我指责他们对穆·布格拉施加军事压力的错误，他们自知无理，东拉西扯，为自己辩解。我义正词严地表示：“绝不允许违背群众的正当要求，不允许愚弄群众，否则只会自食其果，自讨苦吃。”他们无理以对，态度开始缓和，最后就举行民主选举一事达成协议。协议原则是充分保证与会代表的自由，进行民主自由的不记名投票。

做了数日准备，正式进行了民主选举。那天我因故未到会，但从穆·布格拉回来后的表情中一眼看出：选举成功了！听穆·布格拉介绍，当宣布阿不都卡德尔·艾山当选为县长时，选民们高兴得

欢呼雀跃，全场一派欢腾，国民党人垂头丧气，与群众的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县的选举工作是整个和田专区开展选举工作的一次斗争实践。选举获得成功令群众精神振奋；我们则更加忙碌，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又要开展和平斗争。青年们的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以墨玉县青年为主的数百名进步青年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态度坚决，信心十足。若不加制止，听之任之，他们很快就会揭竿而起，举行武装暴动，可我们不能眼看他们做违反和平条款的事，于是说服他们按和平条款办事，他们非常通情达理，工作一做就通。这支青年队伍由阿布都卡德尔·艾山、阿不利孜卡力和一些进步青年领导。（条约被撕毁之后，不少进步青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些人被残酷杀害，幸存者于解放后获释。1950年我去和田时，这些获释的青年人竟以“穆·布格拉”的人为由再次被捕。我向和田地区党委介绍，这些人当年都是与国民党反动派做过坚决斗争的进步青年，穆·布格拉在和田期间的所做所为并没有错，因而当时他们听穆·布格拉的话是正确的。听了我的介绍，和田地区党委才将这批人释放。）

在和田期间，我们与进步知识分子、群众代表及开明士绅分别举行座谈，还在和田俱乐部礼堂召开了一次大会。我们赶到会场时发现俱乐部周围被部队包围着，一些士兵对着礼堂架着机枪，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与会者表示在这种威胁之下不能开会，我们做工作：“他们是在保卫我们，以使大会能顺利进行。这不是很好吗？我们照常开会就是了。”

大会按时召开。发言的代表个个义愤填膺，穆·布格拉和我在会上相继讲话。大会开得生气勃勃，进步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意志高昂，难能可贵，他们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大会结束步出会场，只见俱乐部前面和院子里都是被国民党兵士包围着的群众，形势似很危急。我们与群众亲切地

打着招呼,对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屑一顾;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平安无事地返回了住地。原来国民党当局怕群众闹事,准备一旦情况有变就采取军事行动。当晚刘指挥来到我们房间,我不无调侃地对他说:“谢谢你了,大会开得很好,你派人保卫得不错。”他有些慌乱地回答:“是的,张治中先生来电,吩咐我们务必保护好您。”我说:“保护本是好事,但借保护之名行恐吓群众之实可就不好了。如果限制人民和为人民办事的人的行动,那么可是要吃亏喽!”

和田的事情办完了,环境不允许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准备返回喀什。我想单独上路。在决定次日启程的当天,墨玉一些年轻人给我送来一个可靠情报:国民党当局派人在城外一座我们必经之路的桥下埋了地雷,打算炸死我们。我不动声色地宣布改变行期,可在当天半夜时分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我们既没与打算为我们送行的刘指挥、和田专员和群众辞行,也没走原定路线,而是绕道墨玉踏上去喀什的行程。走前我们请阿不都卡德尔·艾山在我们走后与阿布利孜卡力等向群众解释一下,由于我们身负紧急使命,不得不匆匆离去,来不及告辞,请大家谅解。就这样,我们结束了莎车与和田的工作,于1947年1月中旬平安返回喀什。

喀什已经没什么事情了,我们准备返回乌鲁木齐。不料回去却不那么容易了:原来我们想乘汽车走,行前突然收到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和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的电报,电文为:“万勿乘汽车上路,请在喀稍候。”我们知道肯定有问题,便未急于启程。经了解方知哈德万(哈萨克族,乌鲁木齐专员,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追随者)派两名特务埋伏在喀什至乌鲁木齐的路途之上,准备伺机暗杀我。为对付这两个特务,我们安排阿不都热依木·伊明跟踪他们。阿不都热依木·伊明手下有一批精明老练的侦探,这批侦探对从乌鲁木齐出来的人逐一进行了解。他们把两名特务在阿克苏潜伏

的情报向乌鲁木齐方面汇报之后，我们立即收到乌鲁木齐方面一封“阿克苏有情况，万勿上路”内容的电报。不久，我又收到一封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拍给我的电报，电报称“阿依木病重，拟手术治疗。你不在手术不能进行，望速归。没有飞机不可上路，切记。”收到电报我大为震惊，我想阿依木的病一定不轻，否则不会告诉我，更不会说什么“你不在手术不能进行”之类的话。我心焦如焚，彻夜不眠，然而飞机从何而来？我实在不得而知，急得六神无主。正在我急得不知所措之际，收到张治中一封内容为“有飞机去接你和买买提明”的电报。飞机很快来了，是两架小型飞机。来是来了，却丝毫没有即刻起飞的意思。我催问何故不飞，答曰正在维修，维修后试飞，试飞合格方可飞返乌鲁木齐，不合格需继续检修。我五内如焚，却毫无办法，直等了一个星期飞机才有了能飞的意思。在去机场（当时机场在英吉莎县城外）的路上，我看到路边有很多自发欢送我们的群众。到机场一看，欢送的群众更多。机场上停着两架小飞机，其中一架看上去好一些，另一架显得很破旧。飞行员嘱我们系好降落伞，教我们必要时如何将降落伞打开，除食品外不许携带任何东西登机。他们请穆·布格拉上了那架好一些的飞机，让我上那架破旧的。我快步走向那架破飞机，以阿布都克日木汗·买合苏木、卡斯木江·堪拜力、阿布列孜·穆罕默德、阿布都热衣木·伊明和阿布来克大哥为首的一批人却挡住我，不让我登机。他们不放心这架破旧的飞机会平安把我送回乌鲁木齐，他们顾虑重重地阻止我说：“你不能乘这样破旧的飞机。如果他们不派好飞机来接你，你就留在喀什不走好了。”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怀，然而阿依木生命垂危，加上乌鲁木齐形势严峻，不管是斗争形势还是我的妻子阿依木的病势都令我牵肠挂肚，我怎能继续留在这里呢？我安慰众人说：“不要为我担心，飞行员也要活命啊，请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不顾众人的反对登上了飞机。这架飞机小得只能容

纳两个人。飞行员坐在前面驾驶台上，我坐在只能勉强容纳我和降落伞的后面座位上。飞机起飞了，飞得很好。飞行员告诉我，“若发生情况，需要跳伞，我回头向你示意，你就打开玻璃窗做好跳伞准备。我一抬右手你就跳。”听了飞行员的话，我原本踏实一些的心又提了起来。一路上提心吊胆，好不容易飞抵巴楚。开始降落了，飞行员既未回头示意，也未抬过右手，就安全降落在机场上了。飞行员对我说：“飞机有些小毛病，需要检修一下，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我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这个飞行员在盛世才时代就读于伊犁飞行员预备学校，接受过苏联的影响，思想相当进步，路上，他一直咒骂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他告诉我，这架飞机是美国飞机，十二年来未经检修，因此总出毛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巴楚住下。

巴楚机场上到处是国民党兵士，这些国民党兵不许群众接近我。我想方设法离开机场，同进入县府大院的人们谈了谈，还到街道上转了转。

第二天飞机按时起飞，我暗暗担心飞机在阿克苏降落。真是谢天谢地，飞机从阿克苏一直飞过轮台还没有降落的意思。当飞到距库尔勒一两公里远的地方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飞机的轰鸣声也骤然消失。我一下紧张起来，只见飞行员向后看了我一眼，我想大约要出事，便紧急做好跳伞准备，只等飞行员右手一抬便立即跳伞。我打开玻璃窗，握紧降落伞的环形柄。向下望去，只见飞机已经下降到距地面仅有五百米的低空，下面的公路与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清晰可见，看不见一个村庄，我一心只想跳伞活命。估计身边挂着的食品袋里的食物够吃两三天，只要在两三天之内走出戈壁滩，找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就行。我不断给自己鼓劲，命令自己镇静，应当临危不惧。飞行员很沉着，一手紧握方向盘，一手鼓捣着什么。我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他那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举起的右手，一会儿担心得要命，一会儿又强令自己镇静。突然，飞机开始缓

缓上升，飞行员回头望着我笑了！啊，我悬在嗓子眼儿的心放了下来：我们脱险了！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我不由长长出了一口气。飞过库尔勒，飞机抵达焉耆机场降落。一下飞机，飞行员一下子向右摔倒在地，脸色蜡黄，满手鲜血，现出非常痛苦的神情。我劝他去县城内休息休息，他执意不肯。他说：“我还要修修飞机，明天能否继续飞看情况再说。”我到县城歇息等候，第二天飞行员打电话通知我可以起飞，我赶到机场，于九点钟左右，飞机起飞了。穆·布格拉乘坐的飞机从喀什起飞后一路没停，一直飞抵焉耆等候我们。从焉耆起飞，我们的飞机先走一步。行至托克逊、吐鲁番时，因汽油不足飞得很低。飞到博斯腾湖上方时，飞机转向正北方向上升，直升至距地面五千三百米的高空，原来下面是高山必须高飞才行。在高空飞行我感到心慌气促，氧气不足，但尚能坚持。这次飞行顺利，我身体未感太大的不适，完全得益于我的身体素质良好。飞越高山之后飞机开始下降，飞得很稳，但当降到距地面三千米左右的空中时，机翼突然上下颠簸起来。飞行员沉着镇静，似乎没发生什么事，我听声音正常，不知机翼何故如此颠簸，问飞行员，飞行员告诉我，这是由于另一架飞机在我们右下方山腰里飞行。我们的飞行员给那架飞机的飞行员发出信号，请他向左转，由于信号尚未结束，故飞机受到影响，造成机翼上下摆动。信号结束后飞机正常了，终于平安抵达乌鲁木齐。

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同志到机场接我。当时的机场在现人民广场东面，是个很小的机场。飞机降落，没等我下来，阿巴索夫便登上飞机紧紧拥抱我。他热泪盈眶，连声说道：“回来了！回来了！总算平安回来了，这简直太好了！太好了！”阿合买提江也与我热烈拥抱。与同志们一一打过招呼之后，我随阿巴索夫等同志一起回家。我与阿巴索夫同乘一车，我在车上急不可待地向他询问阿依木的情况，他笑着说：“放心，什么事也没有。”他的神情与答话令我疑

惑不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巴索夫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没待我发问便告诉我：“你回家一看就明白了，阿依木正在家中等着欢迎你呢！”我们急匆匆赶到家中，一进家门，一眼看见阿依木躺在床上。见我进门，她激动万分，掀开被子打算下床迎接。阿巴索夫见状，望着窗外轻声阻止阿依木说：“别动。”不让她下床。他们二人看着我迷惑不解的神情，相视而笑。我虽然不知他们演了一出什么戏，却看到阿依木平安无事，也总算放下了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是他们为使我尽快从喀什平安返回，要国民党方面派飞机接我而演给国民党看的一场戏。国民党方面原不同意派飞机，我们的人没办法，就耍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把戏，宣称阿依木生了重病，请来苏联医院一位名叫甫拉洛夫的主治医生配合，佯称：“病势严重，需尽快手术。无丈夫签字手术不能进行。”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携诊断书向刘孟纯秘书长讲明“病情”，请他转告张治中。张治中特为此事给阿合买提江先生打电话以辨明真伪，阿合买提江先生告之：“情况确实严重，赛福鼎必须立即赶回。”张治中确信情况属实，才派飞机去喀什接我。在派飞机接我的同时，张治中派刘孟纯来我家探视，刘孟纯探视完阿依木向张治中汇报时，再一次证实了阿依木“病情确实严重”。我能想象得出，阿依木肯定装得特别逼真。总之，他们最终不得不派飞机接我，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没乘汽车脱了险，却险些在飞机上遇难。我们的同志在飞机从喀什起飞的第三天还没飞抵乌鲁木齐时，一度很担心，直至见到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阿巴索夫不待我走出飞机便抢先登上飞机与我紧紧拥抱并流下热泪正是同志们由担心到放心，激动万分，不能自己的真实表现。

我平安返乌，该让阿依木从床上站起来了。那位甫拉洛夫医生比以前来得更勤，看上去他好像在努力为阿依木“治疗”。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医生对外声称所谓阿依木的病“不进行手术，保守治疗

亦可，”又过了几天，他又到处放风说“治疗效果非常之好，”于是阿依木又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便“痊愈”了。

以上所谈便是我南疆之行的整个经过。

两个来月的南疆之行，使我深切感受到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广大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高潮已经到来。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席卷新疆大地，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地人民群众的斗争怒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势不可阻挡，整个新疆如同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面对如此激动人心的革命形势，我们不仅不能推波助澜，反而要充当阻止革命潮流滚滚向前的拦路虎的可悲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国民党不讲信义，有可能撕毁和平条款，可我们却不能，我们绝不能背信弃义，陷于被动地位。我们做了多方努力，终未能保证和平条款的继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还是撕毁了和平条款，再一次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然而，他们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得不承担一切后果，实在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第六部

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行为 与和平条款的撕毁

第一章 各种挑衅与“2·25”流血事件

全疆范围内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去南疆巡视时群众提出的一系列强烈要求令张治中更为胆战心惊。喀什专区、喀什县城革命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要求令张治中尤感难以应付。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一行刚到喀什，群众立即在广场上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群众代表发言，谴责国民党破坏和平条款，强烈要求执行和平条款。他们向张治中提出不少问题，要求答复。张治中对群众的问题做了答复，群众不满意。张治中最后累得声音嘶哑，说不出话，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和田他们也亲眼目睹了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从和田回到喀什后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喀什革命青年冲入张治中下榻的专员公署，强烈要求对群众的要求给以答复。张治中的回答仍未能使群众满意。他讲了很长时间，以至最后声嘶力竭，群众仍不放过。双方僵持到快天亮的时候，疏勒县驻军指挥官赵希光师长赶到，才给张治中解了围，把他从后门接出，送到疏勒。次日张治中通知阿合买提江一行一早便启程赶赴乌鲁木齐。这是1947年5月的事。

在此之前，即同年年初，以宋希濂为首的一批军事头目蠢蠢欲动，妄图发动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被张治中制止。从喀什回来后，张治中一改过去的态度，同意了宋希濂的镇压计划。这样，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就得到了统一。在统一的指挥下，国民党反动派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散布谣言、疯狂镇压群众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自 1947 年年初起，为破坏和平条款，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与大屠杀。在此特拣几件主要的向读者介绍如下：

一、争取乌斯满匪帮，支持其破坏三区革命；威胁、压制乌鲁木齐地区的三区代表和进步力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逮捕；让麦斯武德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吐鲁番进行残无人道的大屠杀。

二、乌斯满匪帮对三区革命在阿勒泰的胜利拒不支持，上山建立了独立武装。新疆国民党当局想方设法拉拢他，于 1946 年下半年至 1947 年终于把他完全拉向自己一边。

乌斯满何许人也？且让我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来历：四十年代初阿勒泰发生了反对盛世才的武装起义，其领导者名叫吾斯玛坎。为反对盛世才收缴群众武器，拘捕屠杀群众，吾斯玛坎于 1940 年在青河县聚众起义。起义深得民心，队伍不断壮大，当时还是小商人的乌斯满见暴动队伍日益壮大，便弃商从军，参加暴动，不久便成了一个小头目。1945 年至 1946 年间，他进而窃取了暴动头目的头衔。该人反对盛世才态度坚决，却同时又坚持反苏反共，因而拒不参加苏联支持的三区革命。革命胜利后，他仍坚决反对。阿勒泰解放后，三区政府任命他为专员，他拒不赴任，由副专员达列力汗代为履行专员职权。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他进行反对三区革命的武装活动，遭到以达列力汗为首的革命力量的沉重打击，被迫逃往边远山区。1946 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认为时机成熟了，于是与乌

斯满频频接触，终于把他彻底拉向自己一边。乌斯满投靠国民党之后成了反对三区革命的马前卒。国民党当局首先派人去乌斯满驻地，把乌斯满的代表接到乌鲁木齐，举行会谈。乌斯满本人出山后被请到乌鲁木齐，奉为上宾。国民党当局资助了他大批武器弹药，无线电通讯器材，收发报机以及其他军用物资。1947年上半年又正式给了他以军事援助，为他派去了军事顾问。

对于乌斯满与国民党当局的互相联系，驻乌鲁木齐的国民党爪牙贾尼木汗与其子达列力汗以及扎克沁、萨力士等人都帮了大忙，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2月贾尼木汗曾派代表送信给乌斯满，信中称：“如你们与三区决裂的决心已下，请即派代表前来商谈有关问题。”乌斯满同年8月派代表到乌鲁木齐，由贾尼木汗引见同宋希濂会晤。国民党方面馈赠乌斯满部大批礼物，包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及两名话务员。为进一步控制乌斯满，国民党又以“帮助”为名派去三名汉族官员，贾尼木汗则从此成为乌斯满的驻乌代表。不久贾尼木汗被任命为省财政厅厅长，掌管了省财政大权。

1946年12月28日，乌斯满再次派往乌鲁木齐一个八人代表团。据乌斯满的参谋长力提甫介绍，该代表团中有乌斯满本人。1947年1月17日，张治中秘密接见代表团，慷慨大方地满足了乌斯满索要枪枝弹药的要求。宋希濂、刘孟纯（省政府秘书长）、贾尼木汗等与代表团也频频接触。1948年7月10日，遵照国民党方面的旨意，乌斯满率部下部分头目喽罗再次来到乌鲁木齐。此行国民党当局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贾尼木汗之长子达列力汗及扎克沁，当时的省政府秘书长艾沙等百余人亲往乌斯满驻地迎接，接至乌鲁木齐后，先后举行了多次盛大的宴会，以示重视。第一次是宋希濂设宴，康巴尔汗（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应邀赴宴，为宾客献舞助兴；第二次宴会为维族社团所举行；第三次是贾尼木汗和扎克沁等

人士作东。国民党当局不仅满足乌斯满索取武器弹药的要求，还依照其意愿，给他派去了军事人员若干。宋希濂另以个人名义赠送乌斯满手枪、望远镜、马刀、砖茶(六十块之多)、布匹等大批礼品，以示友好，使乌斯满感激涕零，彻底投靠了国民党。为对主子表示忠诚，他进一步加紧进行反对三区革命及反共反苏的土匪活动。当时乌斯满还接受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马克南的领导。马克南示意乌斯满：“你来到乌鲁木齐非常好。美国和中国是好朋友，你是一个有骨气的英雄好汉，我们坚决支持你。”“美国科学技术最先进，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如有朝一日你遇到不测，美国派出飞机，一个月内便可解决问题。你要派人去美国学习使用新式武器，今后我们双方可通过总司令(指宋希濂)联系。”他要求乌斯满在乌鲁木齐留一个联络员，乌斯满欣然从命，把一名叫卡力木喀孜的人留下担任了联络员。

新疆解放前夕，贾尼木汗将马克南送巴里坤暂避，不久把他与另外四人一道经青海送回国。临行前马克南嘱咐乌斯满：“如今你可率兵去巴基斯坦的台吉努尔，在那里你会得到美国的大力帮助。”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乌斯满匪徒是如何死心塌地地效力于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又是如何全力扶植乌斯满匪帮对抗三区革命，反对广大群众的。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的手法。乌斯满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反共反苏，反人民，反革命，罪行昭著，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解放后在青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1950年在乌鲁木齐群众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三、1947年初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乌鲁木齐大肆进行散布流言蜚语、压制群众，威胁三区代表的军国主义反革命活动。他们

任意编织罪名,逮捕枪杀进步人士,以暗杀的卑劣手段恐吓威胁三区代表。1947年第一季度,新疆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同国民党方面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在省政府会议上,在与张治中会谈时,甚至在某些正式会议或宴会上,争执与冲突都时有发生。国民党妄图以逮捕、枪杀进步人士的手段向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我们屈服于他们的淫威。他们阴险地组织所谓的“游行示威”,对我们实施包围;还利用三区革命中外逃或有亲属死于三区革命的人们反对我们。他们精心策划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行”,由于群众不参加,便让国民党兵士换上便衣,乔装打扮,滥竽充数,混淆视听。这些奉命参加游行的军人在游行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策划的一次“汉族游行”导致了“2.25”流血惨案。为说明事实真相,我在此特抄录当时的日记如下:

紧张的日子:

1947年1月20日我们自喀什返乌。乌鲁木齐形势比我们走前益加复杂。为扭转形势我们做了不少努力,阿合买提江先生做了题为《为中央代表大会所认可的法律及我省今后的情况分析》的重要讲话。

刘孟纯秘书长设宴招待,要求我们就南疆形势发表声明。我们发表了声明,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两天会谈,但未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声称待张部长回来再说(当时张治中先生去南京不在)。

从不断传来的消息看,吐鲁番形势危急。通过书信指示似无法扭转形势,阿合买提江先生于2月29日亲赴吐鲁番,召集各界群众开会,与各界人士分别举行会谈,回答人们的提问,同时对群众进行教育。

1947年2月21日在阿不来提·买合苏木率领下,维吾

尔族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提出了三十二条要求，并请在一二十四小时之内给以答复。后来延长答复时间至七十二小时。次日又补充提出二十三条。“要求”总的看来不无道理，但提的方式欠妥，尤其是限定时间答复就似乎不是“要求”而是“勒令”了。

2月24日就吐鲁番游行群众所提要求举行省临时政府会议。今日回族群众游行闯入政府机关，提出十二条要求。在条款许可范围内我们给了他们以满意答复后继续开会。以后又有少数人以哈萨克群众的名义游行，所提六条建议十分蛮横，纯粹是与我们作对，将我们的军。我们亦给他们以答复，将他们打发走。

继续开会。针对就群众要求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总体原则做出了具体规定。会后召集等候在会场外的很多维族群众进入会场，对他们的要求给予答复。群众对我们的答复不满意，争议颇多，最后阿合买提江先生表示：“实在不行，我们亲自向广大人民群众作答。”才使那些人退去，我们随之离开会场。

2月25日原计划继续开会。九点钟我和阿巴索夫二人到达政府机关，在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办公室内等候开会。一位汉族人（我们认识）走进来告诉我们，汉族群众做好准备，打算今日游行。我们请他代为了解游行的目的。五分钟后他回来告之，游行内容与口号不出《和平条款》范围。此时游行已开始进入机关大门。我们见他们手持标语牌上的标语口号无大错误。我们出去观看，见游行不少，有两三千人。游行队伍中有部分青年学生和转变了立场的士兵。我们穿过游行队伍回到机关，对游行者的成份有些担心。一位汉族官员请包尔汉先生和阿巴索夫到包尔汉先生办公室与游行代表谈判，

答复他们的要求,我留在会议室内。包尔汉先生和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一走进谈判办公室,游行队伍中立即爆发出一片“打!”“打死他们!”的喊声,队伍同时向前涌动。代表们要求见阿合买提江先生,我们表示阿合买提江先生来不了。代表们不干,强烈要求,一定要见阿合买提江。听声音游行开始砸门窗往里闯了。阿巴索夫给阿合买提江先生打电话,嘱咐他无论如何不能来。游行开始冲击会议室了,屈师长(屈武)阻挡不住,游行破门而入。我从另一个门离开会议室,穆·布希格拉先生也随我出来。我想去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等人的房间,但游行不让路,走不成。我们被围团在人群当中。我索性向后转,进入外院第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是伊斯兰教工作人员(大多是妇女)。他们放我们进去,我们打算从旁门出去,带阿巴索夫等人一起离开。但从这边仍进不了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因为游行发现了我们,四五十人从背后包抄过来。我退回刚才的房间,再次给阿合买提江先生打电话,通知他不要来。就在打电话时,我所在的办公室被十多人包围住,并已经开始往房间里闯。情况危急,我们再次从旁门出去走向阿巴索夫所在的房间。包围我们的汉族人和路上的一些汉族人边用胸脯撞击穆罕默德(我的秘书),边用不干不净的话辱骂他。穆罕默德血气方刚,不能忍受,进行反击,我怕事态扩大,忙将他拉走。百余名示威者簇拥着我们,但没阻拦我们前进。我们快步向会议室走去。

11 时许阿合买提江先生来到政府大院。为保证他的安全,我们不打算让他出面。以后因游行要求见他态度坚决,大有不见到他誓不罢休之势,因此乌鲁木齐警备司令党必刚带领一名游行代表中的老者,面见阿合买提江先生,阐明了详细经过。阿合买提江先生认为,自己不出面,游行对别的三

区代表(指阿巴索夫和我等人)开火,自己在旁观望不妥,毅然带领赖希木江大哥一同出去。游行者为他们让开一条路,并鼓掌表示“欢迎”。然而阿合买提江先生刚走到办公室门前,游行者立即改变态度,高喊“打!”“打死他!”阿合买提江先生进入办公室,游行者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流向前奔涌,并砸毁门窗,闯进房间。与我们同在会议室的汉族官员对此持不介入态度。忽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响,随之一个被打伤者由几人抬进阿合买提江先生房间。此时,他们的行动更升级了,一些身穿军大衣的国民党军人与其他示威群众一起站在雪地上狂呼乱喊,进行反动宣传。枪声又响起来,萨力士(哈族,副秘书长)命令身边四五个哈族小伙子做好准备,几个小伙子立即掏出驳壳枪,把子弹推上膛。我置身于汉族之中,离极端敌视我的萨力士及其全副武装的部下距离极近,因此十分担心他们会对我采取行动。与我在一起的有穆罕默德和阿合买提江先生的司机阿不拉海提(他是从后面逃到我身边来的)。为了自卫,我命令他们备好武器。萨力士让一个小孩子找来五六顶哈萨克狐皮帽,每人头戴一顶,然后放心大胆,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阴谋制造“维族人杀汉族人,大事不妙”的假象。游行者冲向阿合买提江先生房间,我担心发生不测,两次派人进屋查看。查看的人出来告诉我,游行者搜遍所有房间,也未找到阿合买提江先生。我非常奇怪:阿合买提江先生会去哪里呢?前门后门都有示威者,他们是不可能从后门出去的。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阿合买提江先生。按我的吩咐,穆罕默德、阿不拉海提二人在前面奋力冲开人群开路,我紧随其后,拼命挤入阿合买提江先生的办公室,确实不见阿合买提江先生等人的影子。这间屋子里挤满了我们的人,这些人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堵在阿合买提江先生办公室旁边通向卫生间的门前。我心里一下明白

了,阿合买提江先生等肯定躲在那里边。小伙子敲门,门没有开。我走过去轻声喊道:“阿巴索夫!”听到我的声音,门轻轻开了,阿合买提江先生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拉了进去。这是卫生间的小外间,我们放心不下的那些人都在这里。卫生间的另一个门通向院子,距这扇门三四米远处有一架梯子靠后墙放着,这是为阿合买提江先生逃离这里准备的。阿合买提江先生不愿意逃走,便一直躲在卫生间里。我找到他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阿扎提(赖希木江的卫兵)等四五个小伙子不知从何处也找到这里。我们一起分析,认为游行居心不良,若他们强行闯入,胆敢动阿合买提江先生一根汗毛,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把为首者干掉。一会儿,传来消息说游行解散了,我们一行离开小卫生间赶到包尔汉先生办公室,叫游行代表前来谈判。游行代表提出的强硬要求,不是针对政府,而是指向三区方面。阿合买提江先生不卑不亢,对其要求,合理的予以肯定,无理要求则严正指出错误。答复全面严谨,游行代表却仍不满意。

此时,上万名穆斯林教民聚集在早已关闭的城门前与南关门,强烈要求“把我们的代表放出来!”汉族游行代表闻讯知道情况不妙,向我们提出“维族人聚集南关,似要闹事,请设法平息”的要求。我们以阿合买提江先生的名义给穆斯林教民写了一个内容为“我们平安无事,请勿担心,望立即解散”的便条。接到便条,穆斯林教民仍不愿散去,我认为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阿巴索夫对汉族代表示意:“你们若希望安定,便立即解散游行队伍。否则的话,天黑之前我们出不去,南关今天肯定会有不计其数的人流血。”汉族代表闻听态度有所和缓。他们告之已给我们备好饭菜,请我们用饭,我们随他们去吃饭。大

约过了半小时，我们饭尚未吃完，又有一些人吵吵嚷嚷闯将进来。我们告诉他们，游行群众已经散去。看样子，这些人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专门搞阴谋诡计的乔装打扮、改头换面的军人。一进门他们就吵吵闹闹要求阿合买提江先生出去，我们说可以召见他们的代表，他们不肯，坚持要阿合买提江先生出去交涉。对这个问题省政府汉族官员也有不同看法。党必刚为首的一派支持阿合买提江先生出去，刘孟纯秘书长为首的一派则不同意阿合买提江先生出去。阿合买提江先生本人决定出去谈，遭到我们的坚决反对。我们力主叫他们的代表进来谈判。说话间，一位汉族老人走进屋内，老人老泪纵横，抽抽搭搭地诉说：“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游行，只知道维族人现在聚集在南关，若你们不出面让他们解散，他们今天将把汉族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斩尽杀绝。我家住南关，有妻子儿女，他们也会被杀死的。请您（指阿合买提江先生）开恩去一趟吧，无论如何希望您能制止今天南关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面对老人的哀求，我们怎能不动心呢？我们答应老人将竭力制止惨案的发生，老人才离去。其他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并恳请阿合买提江先生“请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阿合买提江先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即写了一张内容为：“我们以穆斯林代表的身份保证”的便条交给他们。那些人对便条似乎不放心，坚持要阿合买提江先生亲自走一趟。阿合买提江先生生气了，把纸条撕得粉碎，随手扔掉，不再理会他们，只说了一句：“好吧，你们有本事尽管施展好了！”

今天这件事的起因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正是这些人以诱人的口号哄骗了一些群众聚众游行，当群众被我们劝回去之后，这些人见没达到目的，很不甘心，便居心叵测地再次回来找麻烦。

为了揭穿这些人不可告人的阴谋,避免发生意外,我们经过周密的考虑,确定了对策,心里坦然踏实了。此刻,我们不是以小时,而是以分秒为单位静候死神的来临。我们并不畏惧,相反,我们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代表群众的,坚信事实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那些人的阴谋诡计注定会破产。我们说话铿锵,掷地有声,充满自信。阿合买提江先生以其坚定不屈,镇定自若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就在这时,党必刚将军来了,他对阿合买提江先生说:“他们不放心一张便条会解决问题,看来你不亲自走一趟似乎解决不了问题。”阿合买提江先生毫不妥协,坚定地说:“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条是立即命令部下向后转,齐步走,我们做工作令南关群众解散,以求平安无事;另一条是你打开大门,放你的兵士们进来把我们杀掉,那么今天的乌鲁木齐,明天的全疆就将血流成河。两条路,何去何从,任你选择!”说完又补充道:“我们不怕死。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益于人民群众,我们活着遵守《和平条款》,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死了意义更大,会唤醒人民,教育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民主、自由、解放而奋起斗争。我们的鲜血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流淌是值得的。”阿合买提江先生的一席话令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他们的恐吓会把我们吓倒,会使我们听任摆布,没想到我们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与此相反,他们从闹剧一开始便心虚胆怯,一些被蒙蔽的群众本来就懵懵懂懂;晕头转向,见我们大义凛然,一身正气更是又惊又怕,呆若木鸡。我们谈笑自若,嘲笑他们的好戏难以收场。

阿合买提江先生和我们稍微交换一下意见后对那些汉族人开口说:今天这出戏的导演恐怕没想出戏该如何收场。我倒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给你们听听吧:过去,俄国有那么

一位将军。一天，这位将军心血来潮，想考验考验自己的士兵，于是邀请士兵们到自己家中喝茶。他在餐桌上摆了一盆冷饭，冷饭中间藏着一枚手榴弹（用棉花包裹）。兵士们在桌旁落座后，他请兵士们用饭。当刀叉刺进冷饭后，手榴弹一下子爆炸了。此时只见一个战士慌忙钻到桌子下面，一个战士一个箭步冲到屋外，一个战士躲进床底下，几个战士四散逃窜，只有一个犹太籍士兵稳坐桌边，一动未动。将军把众人召集在一起对大家说：今天我是特地来考验你们的。你（指犹太籍士兵）最勇敢，应当重赏。你需要什么，请告诉我，要什么我都满足你。犹太籍士兵听完将军的话仍一动不动地坐在桌边，只给将军行个军礼道：尊贵的将军，对我来说，什么奖赏我都不需要，我只想要一条裤子和一块肥皂。如您给我一条裤子、一块肥皂，对我来说就算是最高的奖赏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那些汉族人深感不解，他们不明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为何还会如此开怀大笑。阿巴索夫把这个故事翻译成汉语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不禁大笑起来，笑完却颇为难堪，只是面面相觑。

五点多钟，传来南关维族群众更为激愤的消息。很明显，若天黑之前我们仍不得出去，南关必定会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流血惨案。听说我们驻玛纳斯的部队已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担心事态恶化，汉族官员也陷于深深的忧虑之中。汉族官员想以武力驱散示威群众，但打了几次电话却调不来兵。刘秘书长焦虑不安，亲自派人去调兵，结果只来了几个战士，这几个战士见状一个劲地推诿，并无行动。我们对他们表示：“你们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好了。”可他们对我们毫无办法。最后市警察局刘局长采取了一些措施，才把示威群众驱散。他们请我们带他们出去。五点半钟，我们离开了省政府机

关。政府机关到南关，路边有两列士兵肃立护送，我们威严地踏出了省政府的大门。

街上路边到处是维族群众。这些群众以热烈的掌声和狂热的“乌拉”声欢迎我们。有些人脸上流露出深切的忧虑，有些人脸上挂着晶莹的泪花，有些人见到我们脸上绽出了笑容。人们一下将我们围住，我们被群众的一片深情深深地感动了！阿合买提江先生登上汽车高声喊道：“大家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伸张正义！”我们被簇拥着进入俱乐部，俱乐部里也聚集着不少人，阿合买提江先生向他们讲了上述内容的话，用以安抚大家。六点半钟，我们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各自家中。

次日清晨，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前来向我们表示慰问，我们义正词严地申明我们的意见。双方协商，为避免骚动，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双方遇难者（三名汉族，四名维族）由双方自己负责掩埋，料理后事。我们提出的其他要求，他们建议待张治中回来再解决。

2月26日。

乌鲁木齐的气氛令人感到压抑。人们显得焦躁不安，情绪激动。三五成群的人们谈论着什么，似乎在竭力压制一触即发的狂怒情绪的爆发。我们命令将四名维族受难者的尸体秘密送往洋行清真寺停放。不料尸体一起运便被发现，人们很快聚集在清真寺门前。我们赶到清真寺时，看到清真寺前面和寺内挤满了愤怒的人群，有人挥动手臂厉声地说着什么。群众见到我们，一窝蜂似地涌上前来。阿合买提江先生登上汽车，群众脸上流露出对阿合买提江先生深切的尊重、爱戴与对凶手的强烈愤慨与仇恨。人们悲切地哭泣，满怀期待地注视着阿合买提江先生。此情此景令我们深为感动，我们淌着热泪，心都碎

了！

“请不要哭泣，我亲爱的弟兄们！”阿合买提江先生挥动双臂，声音颤抖地说道：“我们不要哭了，应当化悲痛为力量。朋友们的血绝不会白流！我们要让理智战胜感情，组织起来行动。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妥善地解决问题。请大家务必节哀保重，如果大家承认我们是群众的代表，就听从我们的劝告，理智一些，解散吧！……”

“我们听从代表的劝告！”“我们执行您的指示！”人群中响起一片喊声。

人群开始移动，然而人们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着，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子。人们一只眼睛盯着死者，一只眼睛注视着我们。我们离开后，群众才难过地垂着头缓缓离去。

这一天在危急的形势与不宁的心绪中度过。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终于停止了在市内的工作。”

以上日记以铁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是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家，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以及与人民为敌的顽固立场，充分暴露了他们假和平真镇压的反动嘴脸。在这次事件之前和以后，他们一直想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各种反动要求，甚至不惜以杀人放火相要挟。结果适得其反，我们不仅没屈服，而且与他们进行了一场更加坚决，更加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导演的闹剧难以收场，下不了台，正如阿合买提江先生所预料的，问题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或者开门让人把我们杀掉……”这只能进一步让群众看到他们凶恶残忍的嘴脸，“或者自己平息他们组织的所谓示威。”当然，他们最终只能选择后者。

流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到南花园（阿合买提江先生住所）见我们，据他们自己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向我们表示慰问。我们对前一天的“事件”表示强烈抗议时，刘泽荣特派员不得不讲了真话：“昨天我们从严酷的危险事件中被解放出来，凭良心说，应归功于你们的坚贞不屈，善于斗争。你们的英雄气概及大无畏的精神令我们敬佩。”屈武也向我们表示了个人的敬意。我们认为这二人及陶峙岳（当时陶峙岳不在新疆，军权掌握在宋希濂手中）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军国主义分子，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同情我们，比较尊重事实，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对我们表示折服。

国民党当局在乌鲁木齐时常实行军事戒严，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军事戒严经常在南梁一带进行，其目的不外乎搜寻武器，捕获所谓的进步“组织”，以此为由对进步人士实施搜捕与镇压。每次戒严都要逮捕一批他们早已盯上的进步人士。一些被捕者不待搞清被捕原因便惨遭杀害。1947年3月初就进行过这样一次军事戒严，仍节录一段我当时的日记为证：

公开的恐怖

3月4日到5日。夜里两点左右，电话铃骤然响起。拿起耳机，我听到听筒中阿巴索夫同市警察局长刘亚哲的对话（我和阿巴索夫二人的电话分机用同一条电话线，外面来电话，我们二人的电话铃同时响，拿起耳机就能听见对方与他人的通话），刘电话通知阿巴索夫：“四点钟实行军事戒严，检查良民证。”阿巴索夫表示反对，刘亚哲拒不接受阿的反对意见。

阿巴索夫给阿合买提江先生打完电话，到我处找我，我们三人同时给警察局打电话反对戒严。刘亚哲在电话中回答：这是军事指挥部的命令，我无权违抗。随后不由分说，将电话挂断。

拂晓四时许，全市开始大搜查。搜查自南关始，街上满是全副武装的宪兵。搜查一步步逼向我们的住地，我和阿巴索夫

命令小伙子们全副武装做好战斗准备，并吩咐：我们住处不得放进一个人，若有人硬闯格杀勿论。

搜查持续到天亮，我们周围的院落均遭到搜查，只有我们的院子，他们最终出也没敢贸然闯入。我们夜间未同阿合买提江先生取得联系，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我们深知，国民党当局检查良民证是假，按照黑名单，有目的地搜寻武器、抓人才是真实目的。至两三点钟，我们得到了一些人被捕的消息。

天亮后，我和阿巴索夫同乘一辆汽车，令两名佩带驳壳枪的随从站立于汽车两旁踏板之上，前往阿合买提江先生家探望。街道两旁密密麻麻站满了士兵，隔二三十米便有荷枪实弹的兵士横在路中间，街上鸦雀无声。我们驱车从兵士中间穿过，遇上横在路中的兵士便狠按喇叭令其让路。国民党士兵认识我们的车，没人敢挡。我们很快到达阿合买提江先生家，见阿合买提江先生平安无事才放下心，他见到我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原来阿合买提江先生也正在为我们的安危担心。

我们把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请来，要求他们解除戒严，他们说这是军事部门所为，他们无权干涉，但一定想办法与军方协商，请军方尽快解除戒严行动。他们走了，戒严仍在继续，直至下午两时许戒严才被宣告解除。

事后我们得知，戒严那天城内外有十余人以“违反戒严令”为由被击毙，近六十人以“私藏武器”的罪名在搜查时被捕。

我们强烈要求释放被捕人士，追查枪杀无辜的罪责，对伤害无辜的罪犯予以严惩。然而在我们的坚持下，他们最终也只释放了近二十人，其余人仍被关押，不予释放。

这次军事戒严是以搜查为由蓄意制造的一个赤裸裸的恐怖行动，其结果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国民党反动当局就是这样想方设法施展阴谋诡计无中生有地找碴。为了清除我们的势力与影响,甚至不惜公然采取军事行动。

有一天,国民党方面全副武装的一连士兵突然包围了南花园阿合买提江先生的住所。我们闻讯当即赶赴南花园,随身带领四五十名从三区带来的卫士,做好武装守卫南花园的准备,同时对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国民党反动当局包围南花园的目的,不外乎是向我们进行威胁,给我们施加压力,妄图通过恐怖、恫吓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主张,乖乖地听任他们摆布。我们识破他们的阴谋伎俩,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合买提江先生多次打电话表示抗议,最后迫使他们第二天撤回部队,解除了包围。为了解释他们的无理举动,他们谎称因三区代表处境险恶,他们派兵保卫,真是无稽之谈。类似这样的荒唐举动多得举不胜举,如他们派遣各种各样的特务,乔装打扮成“革命者”的模样潜入阿合买提江先生、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和我家中,刺探情报,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被我们识破后,又对我们进行跟踪盯梢,策划暗杀、行凶,其手法卑鄙无耻,无所不用其极。一个特务潜入我家被我抓住,供认来此的目的是盗窃文件,伺机行刺。我将此人交付国民党当局处理,他们先对此人进行“关押”,不久即放风称该人“逃跑”了。到底是“逃跑”还是“放跑”? 该人究竟为何许人? 明眼人不是一眼即可看清楚吗?

第二章 反对国民党阴谋诡计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大肆拘捕、杀害进步人士,扶植与人民为敌的麦斯武德出任省府主席,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

的强烈愤慨。

1947年5月张治中与阿合买提江先生赴南疆视察，遭到群众围攻。回到乌鲁木齐后，他余怒未消，决定改变政策，变以往的“温和”为“强硬”。他召集我们进行了三天会谈，名为“会谈”，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辩论与严肃的斗争。张治中谈道：“你们应当保证实现和平。以革命为名，鼓动群众围攻我们是不合适的。”我们回击：“没有自由谈何和平！人们的抗议与要求完全是正当的。必须全面执行《和平条款》，制止军事干涉，制止挑起战争，制止拘捕与凶杀行动。”张治中时而对我们威胁，恫吓，时而以花言巧语行骗，我们丝毫不为之所动。阿合买提江先生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以大量事实对他的谬论进行驳斥。谈判不仅没取得满意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双方的斗争从此更加针锋相对。张治中采取强化政策，有事不与我们商议，不举行联合政府会议。经蒋介石批准，张治中于1947年5月自行辞去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麦斯武德继任。国民党反动派把麦斯武德推上省府主席宝座之后，大肆宣扬“民族政府诞生了。主席为少数民族人士，这是采纳新疆各族人民意愿的结果。”

对于麦斯武德继任主席职务，以阿合买提江先生为首的三区代表致函张治中，表示强烈反对。乌鲁木齐进步人士代表站出来提出抗议，正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省参议会与会代表也特意给张治中写信，提出麦斯武德继任主席不妥。然而国民党方面固执己见，拒不听从各方反对意见，执意坚持麦斯武德就任主席。麦斯武德是他们最为信赖，对他们最忠心耿耿，惟命是从的奴才。他曾在内地效忠国民党政府十余年，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后被南京政府派回新疆充任新疆监察使。

麦斯武德对国民党当局的栽培提携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为分化瓦解新疆人民，反对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民主、自由、解放的

正义斗争，他依仗国民党军事力量干了大量反动勾当。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政府的命令，疯狂打击民主力量，迫害进步人士，勾结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卡力伯克等匪帮，妄图一举全歼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极力鼓吹反动思想，操纵出版了《自由》、《火焰》、《故乡》等报纸和《阿勒泰》杂志。利用这些宣传工具，他们大肆宣传反动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思想。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正如阿合买提江先生在《再论东土耳其斯坦》一文中指出的：“两个月前他们一伙急匆匆地向民众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充斥着‘真土耳其斯坦’，‘我省已成为真正的土耳其斯坦’，‘欢呼真正的土耳其斯坦成立’之类动听口号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出现。身居外省，对我省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读了这样的文章定会认为中央政府对新疆很大方，很慷慨，定会感觉新疆人民已从奴役中被解救出来。然而他们怎能知道，‘真土耳其斯坦’带给我省人民的是更多的苦难与忧患。所谓我省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新疆有了‘民族主席’之类的吹嘘，仅从1948年6月17日开始实施的‘不吃肉规定’中便足以看出是些什么货色。我省活畜大量减少，人民没有肉吃，瘦得皮包骨头。麦斯武德之流不仅不限制，不指责两条腿‘吸血鬼’的穷奢极欲，反而诬蔑活畜减少的原因是由于饥寒交迫的百姓‘吃’得太多。法西斯警察火上浇油，以种种借口对人民群众进行盘剥压榨，百姓难以生存，我们实难忍受……，为人民争自由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奋斗目的。”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疯狂镇压新疆各族人民反对麦斯武德出任主席的正义斗争。谁提出让麦斯武德下台谁就倒霉，就会遭到非捕即杀的下场。然而不管他们推行何等强硬的军事干预也未能达到目的。新疆人民反对麦斯武德统治的斗争浪潮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吐鲁番人民率先发起暴动，其他地区积极

响应,纷纷揭竿而起。面对群众斗争的滚滚怒潮,蒋介石反动集团再也无法维持麦斯武德在新疆的统治,终于在1949年1月把麦斯武德赶下了台。为继续欺骗新疆人民,缓和新疆形势,他们推出包尔汉担任新疆省府主席的职务。

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群众大搞欺骗活动的目的是镇压以三区为主的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持其在新疆的反动统治。时隔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公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重庆谈判条约》,在全国范围内挑起内战,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向全国革命人民发起了猖狂的反攻。张治中在新疆采取的“先温和,后强硬”的态度,同全国形势的变化紧密相关,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都不会不顾及全国形势而固定不变地推行或“温和”,或“强硬”的“新疆政策”。

谈到张治中先生本人,客观地说,他虽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但长期以来言行却比较偏“左”,同国民党右派有明显的区别。正因如此,蒋介石才把他派到新疆,认为唯有他能争取民心,能较好地解决新疆问题,维持和加强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当然,张治中在新疆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维持和加强这个政权。

张治中在新疆兼任省主席期间,把全部精力用于扼杀以三区革命为中心的新疆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然而其具体作法却明显地不同于以前的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吴忠信。为了迎合各族群众要求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愿望,他不遗余力地大力气进行宣传,对内坚持“安定”(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安定”旨在创造一个不动用武力而使人民群众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环境),对外宣扬亲苏。

他刚到新疆时,曾对内宣称,自己是为纠正历史上新疆大汉族主义统治的错误,洗刷历史罪恶而来。他认为:“新疆建省是在清朝光绪十年,就是左宗棠入新之后奏请清廷设置的。自清朝至民国年

间盛世才黑暗统治结束为止,无不以殖民政策统治这块地方。每当新省人民因不堪压迫剥削起来反抗时,统治者总是以武力戡平,戡平之后,又继之以高压剥削。高压剥削过度了,人民又起来反抗。如此循环不已,便构成了新疆的历史——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各民族一向在政治上、经济上毫无地位,也谈不到什么民主自由。”^①

1945年10月17日张治中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会谈时,对以往新疆省政府执行的大汉族主义反动政策进行了抨击,承认“在过去省府当局有些措施,颇有对不起全省同胞的地方”。^②关于张治中解决新疆问题的诚意,在1946年1月6日他呈送蒋介石的报告和他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中也有所反映。他认为:“在汉武帝时候,张骞奉命通西域,以至清朝末年左宗棠进兵新疆,这一部历史实在是一部惨痛的黑暗历史,对新疆同胞所受的压迫,我们应该给他们以莫大的同情,伸出亲爱的手来援助他们。”^③对于新疆各少数民族,他这样陈述他的看法:“就民族方面看,有人说新疆民族是落后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所看到的新疆各族人民,绝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落后。新疆的人民实在太可爱了,我们在迪化街上看到的男女同胞,他们是多么漂亮俊秀,他们伊斯兰教的精神,他们那种吃苦耐劳、健康活泼的民族特点是多么吸引人呀!老实说,我们在新疆的汉人和他们比起来是惭愧的。他们各族人民不打牌,不抽大烟,天天洗澡,清洁卫生,这些好习惯都是汉人所不及的。我们今天要各民族团结,就应该把新疆各族人民看成是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

① 引自《张治中回忆录》下册 41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年2月第一版。

② 同上书,424页。

③ 同上书 442页。

是构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但是就人口占多数的维吾尔族来说，在古代历史中，它的文化不但不落后，而且有极其光辉的表现，不过因为千百年来受了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其它条件的限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应该负责的。”^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处理新疆问题时张治中始终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

“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新疆人民在历史上是备受反动统治的高压和剥削。这种高压和剥削的结果，就是人民奋起反抗。因此要想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改变过去的态度和做法，并且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给他们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首先是政治上的平等权利。”^②

谈到对外问题，他认为“新疆问题又是外交问题”。“新疆和苏联向来就有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经济的种种密切的关系，可以肯定，苏联对新疆绝无领土企图，但它也不能容忍在新疆出现反苏局面，所以新疆绝不能反苏，一定要和苏联保持亲善的关系。”^③

依据如上原则，长期以来，张治中先生对内坚持和平政策，由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的诚意协作，双方终于签订《和平条款》，成立了联合政府。在对外方面，由单纯的表示到付诸实践，如协助苏联运回存放猩猩峡和哈密的物资，为签订中苏航空协定不遗余力，恢复迪化中苏文化协会及其经常性的活动，撤销“旧文会”，组织苏侨

① 引自《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443、44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

② 引自《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421、42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

③ 引自《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421、42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

会,促进中苏在新疆的贸易往来及经济合作方面的谈判等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然而,不能否认,他做的所有这一切实质上无不以维持与加强国民党反动统治为前提。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提案,所谓“给人民以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口号不过是一纸空文。也就是说,口头上他宣称“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在实际处理新疆问题时,他却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切指令,这正是他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的一种预示。

张治中疏远三区代表,袒护麦斯武德,穆·布格拉,艾沙之流,把麦斯武德推上省府主席宝座,令其骑在新疆各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反对苏联,反对三区革命,秘密接见乌斯满匪徒,为其提供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军事顾问,无线电通讯器材(虽然他将这一切责任都推到宋希濂头上,但身为省府主席的张治中是绝对不能推脱干系的);他对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人民的武装斗争以“破坏《和平条款》”的罪名进行血腥镇压;撕毁和平条款之后对南疆塔什库尔干革命的参与者无情屠杀等等一系列铁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我上述观点之成立。

客观地说,张治中进疆时,新疆形势极为复杂,社会矛盾相当尖锐,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他认为“以三民主义的力量来领导新疆,新疆一定接受我们的领导;以开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新疆一定得到安定;……”,对新疆的一切矛盾他都是这样加以淡化,掩饰,大搞折衷主义,致使矛盾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他在某一时期,出于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需要,对内推行“和平”,对外推行“亲苏”的临时政策,却丝毫得不到上司、同仁的理解。他的临时政策遭到上至国民党中央政府,下到他部下那些顽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右派的强烈反对,他无法实现关于给予新

疆人民以“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承诺。当然，蒋介石反动集团也绝不会允许他实现这种承诺。结果，他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和平条款》被撕毁，联合政府解体，他本人万般无奈，只得于1947年5月将新疆问题不得解决的责任多半推给三区政府，少半推给宋希濂等人之后，辞职赴兰州就任西北行辕主任之职。

张治中认识到举荐麦斯武德继任省主席系不明智之举后，即令其下了台，而他意识到宋希濂调离新疆之必要性时，已到了

民更加不利。为此，我们毅然决定尽快返回伊犁。

我们首先把驻乌鲁木齐及七个专区内处境危险的进步人士和参加省议会的一部分代表以及部分汉族革命青年送走，几箱汉文铅字同时运往伊犁（当时伊犁需要汉文铅字）。我们要离开乌鲁木齐的消息虽然没透露，国民党当局却也知道了，可他们没有阻拦我们，因为他们清楚，他们即使阻拦也无济于事。相反，我们把进步人士一同带走，对他们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此，我们这次很顺利地离开了乌鲁木齐，也不能不算是减少了不少麻烦吧！

第七部

解放前夕的斗争

第一章 总的形势

我们返回三区已是 1947 年下半年。全国战局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指挥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集团日趋衰败。地处祖国西北边远地区的新疆出现了三区人民与七区（当时新疆共有十个专区，除三区外，其余是由国民党控制的七个专区，简称七区）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局面。

1. 全国的形势

1947 年初，全国已呈现出喜人的大好形势。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制定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为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的方针。从 1946 年 7 月到 1947 年 6 月，即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内，人民解放军同时在几个战场打击蒋军，迫使其由进攻转为防御。解放战争的第二年第一季度，即 1947 年的 7 月至 9 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

转入进攻阶段,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战争扩大到解放区,进而完全吃掉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党发动与组织敌占区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众多的根据地。同时,蒋管区的工人、学生在党的关于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战场指示的鼓舞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从1946年爆发的民主爱国运动以及稍后爆发的反美反蒋斗争,到1947年五六月份达到高潮,扩大到蒋管区六十多个大中城市。人民解放军抗击国民党军的正面战争和蒋管区各界人民的民主爱国运动,这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使蒋介石政权陷于全民的包围之中。这一大好形势,也是对我们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支持。

2. 全疆的形势

当时,新疆的局势一直是异常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强化法西斯统治,大肆抓捕、屠杀革命群众。在喀什,卡斯木江·堪拜力、阿布利孜·穆罕默德、阿不都热衣木·伊明、阿布莱克·艾则孜等一批革命青年被捕;塔什库尔干游击队上至领导下至一般队员,几乎全部被捕杀;在和田,阿不都卡德尔·艾山、阿布利孜·哈力等人被打伤,还有一大批革命青年遭到关押。喀什专员阿不杜克日木汗·买合苏木被免职,由乌买尔大毛拉接任。阿克苏专员阿布利孜·买合苏木也被撤职,由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赛衣提·艾合买提霍加接替。这一连串的大逮捕、大屠杀,无疑更加激起新疆人民的愤怒。

3. 吐鲁番暴动

我们返回伊犁没过一两周,吐鲁番的民众起事了。这次吐鲁番暴动完全是由国民党的高压、威吓和欺骗政策所导致的。

宋希濂在《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三册中称:“张治中南疆之行

在喀什受挫，返回后他的态度由宽容转为强硬，这是加速促成吐鲁番暴动以及与伊犁方面最后破裂的主要原因。”他一方面承认以上事实，而另一方面却又打自己耳光，自相矛盾地诡称这次暴动是吐鲁番、托克逊、鄯善三县的当地人闹起来的。为证明这一点，他还拼凑了几条理由。他说吐鲁番有人抢蒋军士兵的枪，中断交通还抢了粮食。还说以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为首的一伙人开会秘密串连。又称阿合买提江等人秘密纠集四百至五百人并有四十至五十条枪在托克逊的阿拉沟一带活动，进攻连木沁和洋河两处的警察局等等。这几条所谓的根据纯属诬蔑。“阿合买提江派人在阿拉沟进行武装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当时，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警察逞凶时夺枪，反对警察胡乱打人、抓人一类的事件确实发生过，酿成这类事件的原因是国民党军警残害无辜群众。而国民党却以此人为地制造武力冲突，寻找武装镇压的借口。所谓“阿布都热合曼开会秘密串连”的问题，其真相是这样的，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和吐鲁番其他负责官员，耳闻目睹国民党军的暴行不可能无动于衷，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担任县长后，的确曾召集吐鲁番的进步青年和一部分群众进行过宣传教育。我们三区革命领导同志曾多次对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及广大群众做说服工作，常嘱咐他们，不要急于搞武装暴动。阿合买提江先生还特意把纳曼江叫去苦心劝导。我和阿巴索夫还派专人去吐鲁番做工作。后来吐鲁番的乌守尔几个人（名字记不清了）到乌鲁木齐来找我，他们说吐鲁番情况紧急，如再不暴动就不可收拾了，并向我转达了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举行暴动的请求。我对他们讲，可先集中武器，但眼下不可闹暴动，什么时候需要暴动会通知他们。这几个人虽一时接受不了我的意见，但行动上还是服从了，没有马上动手。

1947年7月初，吐鲁番发生的暴动，完全是当地民众自发的行动。国民党当局以他们散布的谣言为依据，宣布在吐鲁番实行戒

严,将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巴吾东·玉素甫等人围困在县政府大院里。这时以阿布都热合曼为首的吐鲁番民众忍无可忍,实不得已才掀起暴动。

在吐鲁番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和盘剥准备奋起反抗的形势下,国民党又翻出以前的旧帐制造混乱,寻找武力镇压的借口。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政府没收了一些人的土地和财产(包括遗产),并转卖给其他人,后来这些土地和财产早已退还给原主。而此时国民党却煽动那些曾由政府手中购买这部分土地、财产的人去找原主纠缠。结果,土地、坎儿井、财产所有权的纠纷接连发生,引起社会动乱。这样一乱,正中国国民党的下怀,当局立即派出四百余名士兵上街,宣布吐鲁番街市实行戒严。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等几个负责人已得到了消息,在大家的帮助下,用绳子坠下吐鲁番城墙,跑到一个叫青蛙泉坎儿井的地方躲藏起来,并与阿斯塔那派出所所长热介甫·托合提取得了联系。

吐鲁番人民听到县城戒严和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出逃的消息后,于7月2日纷纷赶到一个叫“和加尼牙孜工厂”的地方集中待命。热介甫·托合提带来了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关于决定举行暴动的信件。众人当下商定以热介甫·托合提的名义写信,派人携带信件赴胜金口和洋河等地联络当地人民举行暴动。

转天,7月3日清晨,暴动者由胜金口开始朝山上进攻。此时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和伊明两位县长赶来指挥战斗。交火两天后,由吐鲁番县城方向远远走来几个人,他们手举写着维吾尔文和阿拉伯文的旗子,越走越近,来到近前,突然朝暴动队伍开枪射击。原来他们是伪装穆斯林的国民党兵。战斗持续了几天,国民党军纷纷赶来增援,疯狂地向暴动者反扑。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率众撤至约唐口,整顿队伍并成立了指挥部。当时的暴动民众约有三千人左右。

大家一致推举阿布都热合曼·穆衣提为游击队队长，希尔拜克、巴吾东·玉素甫、依明、纳曼江为副队长。另外还选举了由阿不都卡德尔·艾山、吾守尔·克里木、热介甫·托合提、阿吾提、阿不都吉力力、艾则孜·库尔班、伊斯坎德尔·阿不都组成的指挥委员会。当时队员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各有各的想法，不能抱团。从托克逊来的队员们提议将队伍拉到托克逊，能够补充更多人。游击队领导听从了这一建议，将队伍拉到了托克逊，但并没有多少人来参加游击队。国民党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在紧要关头，队员们心不太齐，领导人员也没能到位，游击队竟抵抗不住四百名国民党军的进攻而遭到重创。阿布都热合曼等领导人决定转移到伊宁去，他们宣布愿留的留，愿走的一起走，随后就率队出发了。这支队伍忍饥挨饿长途行军，中途在阿拉勒托甫暂作休息，于当年11月12日动身继续西行，在民族军派出的向导带领下终于到达了伊宁。

国民党调集了大批军队镇压吐鲁番暴动，除胜金口驻军外，还调来了吐鲁番、鄯善两地的两营驻军，动用了七十八军的一七六师，还命令七十八师待命增援。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损失惨重。接着国民党当局还命四十六师前往吐鲁番镇压暴动，防止暴动范围扩大。国民党军以铲除暴民为借口，在吐鲁番随意抓捕大肆屠杀参加暴动的民众，甚至还杀了不少没有参与暴动的无辜百姓。

新疆的局势虽说非常严峻，但总的形势仍对人民有利。日甚一日的迫害和屠杀使人民更加清醒，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革命士气更加高涨。

4. 三区的形势

转过头再谈谈三区的情况。三区的局势总的来讲是好的，和平条款已经签定，三区政府有了很大变动。在我们将赴乌鲁木齐之

时,按照协议条款撤消了三区临时革命政府。为了便于直接受省政府领导,将原所辖地区仍划作三个专区,每个专区设专员公署。这样一来,临时革命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元帅就靠边站了。另任哈克木别克·霍加为伊犁专员;任巴西瓦衣为塔城专员;任达列力汗为阿勒泰专员。等我们由乌鲁木齐返回时,三区在形式上还是三个专区,但实际上由原临时革命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先生协同三区选出的其他原政府委员一起主管三个专区。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全面负责行政工作。大多数进步青年和广大群众都尊敬他拥护他,都肯协助他履行三区代表的职责,从未发生过不服从他指挥的现象。三区的军队都严守纪律,原地待命。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也都正常开展,这是三区形势好的一面。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三区形势还存在着不利于整个斗争的一面,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不少困难。三区革命的领导层中包括两种势力,一方是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代表及拥护他们的绝大多数进步青年、人民群众,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民族军在伊斯哈克拜克的统帅下站在这一边。另一方则是巨贾富商、宗教上层人士、地主老财,还有顺从他们,为他们效劳而又不受约束的“革命英雄”,还包括没能捞到官位还在苦心钻营的投机分子。这部分人为数不多,也不掌握军队,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在社会、宗教、经济等方面还是颇具影响的。其中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宗教势力。他们专为富人撑腰,这部分人当中坚持反苏反共思想的人不少,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的人也不是没有的。这些人千方百计为自身的利益为维持封建统治苦苦地挣扎。

双方之间的矛盾就是权力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是隐蔽着的阶级斗争。但与上层人士公开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尚未成熟,当时我们掌握的原则是执行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为目标的统一战线

政策，即又斗争又团结的政策。当时我们就是在这种复杂斗争形势下，一方面正确指导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执行减轻人民生活负担的政策。阿合买提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坚持了这些政策。

这一时期三区的困难较多，麻烦主要出在伊犁，塔城方面领导人内部也存在着某些矛盾。阿勒泰地区的领导层中没什么问题，专员达列力汗一直与进步力量团结一致，依靠群众办事。他那里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乌斯满匪帮，通过打击乌斯满匪帮达到武装抗击国民党的目的。有段时间，乌斯满在国民党扶植下加强了军事力量，曾一度占领了沙尔松拜。很快被达列力汗驱逐出去了。

第二章 新的任务

三区面临的任务繁多，根据当时形势需要，我们将军事工作、思想和组织工作、民族工作列为三区的重要任务。此外还有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妇女工作等，我们的精力大多集中在以下主要任务上。

1. 军事工作

当时，蒋介石欲将马步芳的部分军队调入新疆，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派有进攻三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对付敌人的进攻，就必须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卫三区，更是为了帮助七区人民投入解放整个新疆的战斗。

1945年4月，三区革命的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已由原来游击式的分散武装，成长为一支正规的民族军。民族军现役人员加上后备人员约三万人。联合政府成立时，根据和平条款民族军应裁

减到一万二千人,但鉴于国民党军不仅没有对应裁减,反而不断扩充兵力,所以民族军也只裁减了一定数量,没能按条款裁减到一万二千人。在联合政府时期,裁减兵员的事,便这样搁置下来,不了了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壮大和整训民族军,在部队训练和思想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还为部队补充了武器装备,部队的士气非常旺盛。

订立和平条款时,民族军的指挥机关和所辖部队情况如下:

总指挥机关有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侦察科、营建科、作战科、通讯中队、执法连、机械化连、卫戍部队、炮营、警卫骑兵团、直属连、北路指挥部、中心医院、乌苏医院、军校等单位,在司令部内部还有个叫“革命青年社”的军人委员会。

民族军的作战部队共有 11 个团,6 个骑兵团,5 个步兵团。它们是:北路挺进团、乌苏团、后备团、特克斯骑兵团、塔城骑兵团、沙尔松拜骑兵团、和布克赛尔骑兵团、沙湾骑兵团、蒙古骑兵团、果子沟独立骑兵团等。此外还有些直属营、连或中队,如直属战斗营、炮兵营、直属骑兵团、东干(回族)骑兵团、云梯中队、锡伯中队等。每个步兵团有一千五百至一千九百人,每个骑兵团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每个骑兵团约四百至五百人,卫戍中队有三百余人。民族军中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及锡伯族等。和平谈判破裂后,民族军从原来的十一个团扩充到十三个团,原从战场返乡的官兵重新回到了部队。

民族军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工作,为了培养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开办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宣传员训练班、为期两个月的营连正副指导员训练班和团级军官训练班及短期培训班。军中出版了十多种报纸,还给部队下发了军内外出版的各种杂志和理论书籍,如《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组织各级军官进行学习和讨论。各部队还成立了剧团、乐队,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全

军开设了一百零九个图书阅览室,藏有各类书刊三万余册。另外,我们在全军开展了扫盲运动,到1949年,识字的人已达百分之七十五。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措施,大大增强了民族军的战斗力,使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理论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民族团结进一步巩固,军纪更加严明。民族军全体官兵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争取人民解放的战士士气空前高涨,全军上下拧成一股绳,共同对敌。三区的民族军已成为一支既有纪律又有战斗力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此应该提到一点,民族军成立时,苏联政府派遣了各级顾问,给三区以很大支持。民族军的武器主要是从国民党军手中夺来的,苏联政府也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这种援助在民族军成立伊始起了很大作用。

回忆三区革命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不缅怀那些在争取解放斗争中舍生忘死在战场上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同时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幸存下来的民族军官兵所创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在部队建设和军事指挥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拜克将军、副司令达列力汗将军、祖农·铁衣波夫、阿不都热衣木江·艾山诺夫和其他负责干部,还有团级指挥员马加洛夫、伊敏诺夫、列斯肯、买尔乌甫、艾斯艾特、玉素甫江、乌拉衣木巴依、莫古特洛夫、艾尼、玉素波夫、音阿木加诺夫、热苏洛夫、白求仁、薛慕通、尤努乔夫、阿力尤夫、拜代勒汗等同志。我们应该记住他们,他们为了新疆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虽然有个别干部由于各种原因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忘记他们当时的业绩。

这里要特别指出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和他的战友阿巴索夫,他们非常重视民族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常在百忙中抽时间深入部队,了解官兵的思想状况,视察部队的的生活供应情况,力求直接掌握下情,解决具体问题。阿合买提江到基层去视察的路途中,只要听说附近驻有部队,肯定前去看望。他给官兵们讲演,鼓舞部

队的士气；还与官兵们亲切交谈，征求意见，解答问题。他与一般战士交谈得更多一些。阿合买提江很关心部队的后勤供应，他调查得很仔细，如服装靴帽是否耐穿，运输方面是否满意，粮食定量是否够吃，饭菜是否可口，他都一一问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再说说阿巴索夫，他非常重视官兵们的理论学习及思想动态，在各级干部训练班中作过各种政治内容的讲座。他以前在民族军司令部政治处工作时也是如此，后来改做行政工作，还是把部队的思想工作挂在心上。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到乌苏给军官训练班讲课，原定只去一周，当他调查了军官们的思想状况后觉得一周时间不够，于是他不顾伊犁方面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提出延长讲课时间。我们两个人又是讲课又是开讨论会，整整折腾了将近一个月。

2. 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

我们当时需要落实的第二项主要任务就是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思想工作首先是要教育群众，尤其要教育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进步青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青年队伍中，思想状况基本是健康的，但也有其复杂的一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革命目标问题、革命基本力量的培养和组织问题，还有如何保证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势力手中等问题。由于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认识不一，就很有必要端正思想，划清立场，弄懂路线，引导群众统一认识，齐心协力去争取胜利。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代表们刚一返回伊宁，便立即狠抓这项任务，一面调查研究思想状况，一面指导具体工作。

在权力问题上，广大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反应强烈，要求收回达官显贵和宗教上层手中的权力。当时阿合买提江和他的战友们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代表，总握大权。但在行政系统中，有许多实权仍操在上层人士代表手里，好多事就是行不通，这些上层人士便成了革命工作顺利进行的绊脚石。怎样做才能掌权呢？这

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尽管阿合买提江和其他三区代表依靠军事部门、军队干部和较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思想工作，仍没有什么效果。我们认为要想有效地作好思想工作，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来领导三区。经过多次认真而慎重的讨论，为了有组织地进行思想工作，统一指导三区的政治、军事、行政、经济、文教等各项工作，决定成立一个有权威的群众性组织。根据此项决定，在三区和七区人民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社团、人民革命党、革命青年社和其他人民团体的领导及积极分子的倡议下，1948年8月1日在伊宁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

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前面提到的“人民革命党”，在“新盟”成立的同时便停止了自己的一切活动。我们为此事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人民革命党”如公开亮相，能否获得社会承认。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带有共产党性质的“人民革命党”是不可能产生的，要是让它修改自己的纲领以民间社团的名义活动更是不可能，所以我们才决定另成立一个新的群众组织，把“人民革命党”纳入新的群众组织之中，并停止其原来的一切活动。继之散发了一份《“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的呼吁书》，呼吁书中列举了“人民革命党”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论述了该党原先成立的正确性，同时也讲明了宣布该党自行取消的理由，号召该党原负责人及全体成员加入“新盟”，在“新盟”组织中继续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至此，“人民革命党”宣布解散。“新盟”成立后，原“人民革命党”的主要负责干部都加入到“新盟”中央级和各专区级组织中去了。实际上“人民革命党”的基本力量也就是“新盟”的基本力量。

“新盟”成立不久，各个专区、县都出现了该组织的盟员，建成了组织，后来，在其下属地方也建立了基层组织。该组织虽然是以“新盟”命名的群众性团体，但实际上它已成为领导全三区军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条战线具有权威性的政治组织。“新盟”成员

在1948年内已超过六万人。解放后，七区扩大“新盟”时，盟员人数突破了八万人。“新盟”的成员是由各民族阶层人员组成的，其中农民有二万余人，工人有一万余人，其他还有牧民、职员、手艺人、教师等，其骨干是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

“新盟”刚成立不久，便成了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领导力量。它教育人民群众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它把实现人民民主平等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

“新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新盟代表大会”，由它来选举产生“新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研究全国、全省、三区的政治形势，确定下一步新的任务；规定和执行必要的政治措施以及行政、经济、文教诸方面应该相应采取的措施。在此期间，“新盟”的基本路线是大力扭转三区革命的工作重点，制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原则，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巩固三区革命取得的成果，纠正错误和缺点。“新盟”还通过自己办的《前进报》、《团结》杂志等刊物和召开会议，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报道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使新疆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鼓舞。总的来讲，“新盟”在三区革命中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开创了一个新阶段。它在这一新阶段中，通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在促进三区革命、推动全新疆人民民族民主革命、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胜利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和平解放新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盟”在解放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1950年该组织进行了改组，修改了组织章程，转变为在党领导下起统一战线作用的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新疆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实现党对各个领域的全面领导，那么“新盟”就再也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随即撤消。

“新盟”虽然不复存在，但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推动了新疆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对新疆人民的彻底解放起了重要作用。“新盟”这个组织和它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疆革命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章。现在乌鲁木齐市的人民剧场，就是使用“新盟”剩余款项修建的，这座剧场可算是我们怀念“新盟”的一个纪念物。

第三章 民族工作

三区革命的力量在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其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很激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三区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正义斗争的角度来观察，可以看出，当时民族问题在意识形态上所存在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实质上就是维护祖国统一与分裂祖国这两者之间的斗争。

这场斗争，一方是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首的进步势力；另一方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保守势力。进步势力始终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与顽固坚持泛土耳其主义和泛穆斯林主义的保守势力进行斗争，这场斗争的成果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1946年6月，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上层人士丧失了在三区革命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阿合买提江在三区革命中的领导权威，从而使三区革命政府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加速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政治民主和民族平等的目标。三区革命是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它的目的并非是分裂祖国，而恰恰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

三区革命初期，革命队伍中在民族问题上曾出现过某些错误和缺点。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革命负责干部，及时觉察并与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多次斗争。为了避免以后再犯

同样的错误，他们除了向群众进行反对民族仇杀的宣传教育外，还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防止再发生由极少数投机者、流氓、危害社会的坏分子搞的杀人、枪劫事件。他们向各族群众说明，汉族统治者和汉族劳动人民截然不同，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仇杀的罪魁祸首是反动统治者，汉族劳动人民和其他各族劳动人民同样都是被压迫者。在具体行动上，他们制定并实施了保护三区尤其是伊犁地区的汉族人民的法规，以消除汉族人民的顾虑；出版发行了汉文报纸，对汉族中别有用心的民族分裂分子制造恐怖气氛的反宣传予以回击，说明这种作法的危害，反复宣传三区革命的真正目的；协助汉族人成立了社团，还为汉族人子弟开办了汉族学校。

1945年2月2日，在有十七位政府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研究了一个特殊议案。在攻占巴衣库勒、艾林巴格和飞机场的战斗中，部分被围困的国民党军见逃跑无望，便残忍地枪杀了他们的几个亲生孩子；另外丢弃了几名尚活着的孩子。召开此次会议，就是要研究如何安置这几名被遗弃的汉族孤儿的问题。会议听取了有关此事的报告后，作出了成立孤儿院的决定。内容如下：

1. 成立孤儿院，交教育厅负责管理。
2. 孤儿院用房，由财政厅提供。
3. 孤儿们的生活费用由教育厅作出开支预算，由财政厅拨款。
4. 在伊宁附近拨出地皮建院。

临时政府为了便于更好地爱护和管理汉族干部，曾下达通知，规定原由政府各厅及其他机构管理的汉族干部或教师，统交教育厅集中管理。临时政府对汉族人在战争中的财产损失也有明文规定，汉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拥有的财产在革命战争中遭受损失的案件，政府部门应予受理，对以此由提出申诉的人员应及时接待，政府还要听取或审阅有关案件的处理报告。

在战时和战后，某些居心不良分子故意制造矛盾，挑起事端。

但三区革命政府并没有单纯地把这些看作民族同民族之间的问题,而是公正地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例如:1945年2月24日第24次政府委员会议上,就某些坏人闯入汉民家中抢劫、强奸一案进行了专门研究,作出了如下决定:

1. 对抢劫犯、强奸犯须作非常处置。
2. 凡犯抢劫罪、强奸罪一律处以极刑。
3. 判处此次持械强奸的乌斯曼回回、库特鲁克二犯死刑。

三区革命者对被俘的国民党汉族官兵没有持民族偏见,而是以人道主义精神和善对待他们,没有乱杀乱抢。1946年6月,三区革命代表与国民党方面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条款后,我们将俘虏的五千余名国民党官兵全部放回,其中有两三名将官和多名各级军官。负责此项工作的“交还战俘委员会”主任热西提巴巴、副主任司迪克·玉素波夫、委员阿洪巴衣、艾牙斯丁、卡玛勒丁·塔里甫、艾米尔丁等人,曾向政府提交了有关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报告。

我们三区内部有少数上层人士代表却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情绪,抓住国民党刽子手是汉族人这一点,大肆散布民族主义的言论,蛊惑群众。他们说国民党既是杀人魔王,汉族就是国民党,都是一路货。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进步领导人,对上述论调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一再向群众宣传每个民族同样都有反动派,只占少数;每个民族也同样都有劳动者,占大多数,民族反动派首先是本民族的敌人。这样使三区革命某些领导人纠正了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尽管如此,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人们中间存在的思想问题。阿合买提江等领导人,为了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1948年8月5日举办了一次报告会,报告会由阿合买提江亲自主持,由阿巴索夫作题为《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报告后阿合买提江也作了重要讲话。

阿巴索夫在报告中讲了三区革命的性质、目标，革命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还着重讲了我们的民族政策。他首先指出：“我们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运动。所以，全省各族人民都纷纷响应，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民主运动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把政治腐败、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旧新疆建成政治平等、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新疆。”

阿巴索夫接着重点地讲了执行民族政策的问题，他说：

“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实现以上目标，正确地处理了各种问题，同时对民族问题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战争初期发表的宣言中，我们曾指出新疆是多民族的省份，我们承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1947年在阿合买提江于乌鲁木齐主持的一次会议上，阿巴索夫曾作过关于如何对待每个民族的报告，其中也有类似的观点，现引用一段话来证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他说：“我省民族众多，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反对汉族，我们只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它的统治。”）

阿巴索夫在报告中谈到了三区革命开始后，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如各民族都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教育，用自己的文字印制教科书；三区发行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汉文、俄文、锡伯文、蒙古文的报纸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的月刊杂志。此外，有的民族还召开了本民族的代表大会，各民族共同成立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启蒙协会等。

他谈了执行民族政策正确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了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错误。他说：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没犯一点错误。我们不应掩盖所犯的错误而要揭露错误，要找到产生错误的原因以便纠正它。我们犯过不少错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没有很

好地考虑‘压迫民族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这一道理。有时不能区分压迫民族内部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所以很容易把国民党反动派和同样受国民党统治的被压迫的汉族人民混淆起来。例如，我们队伍当中极少数坏分子把汉族视为敌人，不能平等对待他们，甚至恐吓他们，抢劫汉族人的财产，借汉族人的债不还。有些流氓不仅抢劫他们的财物，还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

阿巴索夫在报告的最后，分析了这些错误给我们民族解放运动所带来的危害。强调今后应该坚决纠正这些偏向，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广泛宣传各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要与汉族人民搞好团结，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后台帝国主义作斗争。他最后号召大家要坚决同一切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进行斗争。

这次报告会，是三区革命纠正在民族问题上所犯错误的一个重大转折。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领导人，为增强民族团结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如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想尽各种办法教育“新盟”盟员。关心汉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办汉族学校，出版汉文报纸。三区革命领导人就是运用以上手段来教育干部、群众，号召大家坚决执行新制定的民族政策。阿合买提江本人也直接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多次报告会的讲演中和撰写的文章中，都着重就民族方面的问题对大家进行宣传教育。他曾这样讲过：

“民族主义不可能使各个民族形成整体力量，它只能在民族之间点燃对立之火，而其他民族视该民族（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为仇敌。按民族主义者的逻辑，他们要庇护本民族的败类和民族的叛徒。要知道谁要想解放本民族，谁就要为其他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因此，我们必须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一民族中的民族败类决不会放弃他自己的利益而去为民族利益工作的。”

阿合买提江在他的《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某些错误》一文中这样说：

“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矛头应对准人民的敌人，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及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和民主阶层正在与中国的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军事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盟友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着的人民和民主阶层是我们的同盟军；中国的军阀、反动的国民党及世界上的帝国主义才是我们解放事业的凶恶敌人。今天，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目前大众的真正任务，是尽快纠正民族解放运动第一阶段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建设一个不分民族的、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统治的、建立在民族真正平等基础上有真正自由的崭新省份。”

从1948年上半年起，纠正民族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工作逐步获得进展，到1949年成果更加显著，民族团结得到加强。当然，当时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圆满地解决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但最重要的成绩是纠正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如坏分子破坏民族团结、敌视汉人、抢劫汉人等严重错误及恐怖行动被制止住了，少数坏分子受到严厉的打击。这场斗争也不是那么顺利的，有些反动分子、地主富商、宗教上层仍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试图顽抗，他们煽动一些当权者和坏人给此项工作制造障碍。但是三区革命领导人依靠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清除了障碍，不让坏人得逞，终于使这项工作得以胜利进行。这一成果，在使三区革命与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八部

三区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一章 三区革命的爆发与胜利的主要因素

三区革命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三区革命的爆发并能获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 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势如燎原。

这一点是三区革命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全省各族人民如果不是那么渴望着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如果还没有拼死反抗压迫的决心，三区革命也不可能那么快地一触即发。

1944年出现的三区革命是在此以前各族人民在新疆各地进行的各种形式斗争的集中体现。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及塔什库尔干一带，早就发生过反抗盛世才和后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

1940年盛世才害怕山区人民造反，下令收缴枪支。山里人持有的枪支都是用以打猎的粗糙破旧的土造枪，而且数量有限，他们离开枪就无法生活。他们多次拒绝交出这些打猎用的武器。盛世才于该年2月2日成立了一个“阿山清枪委员会”，并委派该委员

会的人去强行收缴山中牧区人民的枪支，激起山区牧民的强烈反抗。富蕴县的牧民杀掉了在富蕴县长和警察局长带领下的东路清枪委员会的全部人员，聚集了三四百人攻打富蕴县街市。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阿勒泰地区。

转年，青河县牧民在阿合特阿吉及其子拉哈特等人率领下，掀起了范围更为广泛的武装暴动。盛世才成立了“巴里坤和阿勒泰战区指挥部”，派大批军队进剿，但因暴动者及时转移，盛世才这次的进剿计划没能达到目的。

1943年夏，盛世才又下令征集一万匹军马，引起愤怒已极的牧民们更强烈的反抗。阿勒泰的牧民举行了暴动，攻占了青河县。阜康和巴里坤的哈萨克人民齐声响应，他们团结在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周围，成立了由达列力汗等二十五人为核心的“阿勒泰哈萨克人民复兴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领导下组建了游击队。

正值此时，塔什库尔干山区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人民在伊斯哈克拜克领导下开始了武装反抗，在乌恰和塔什库尔干之间展开了游击活动。

南北疆各族人民同时起事并非偶然，这是新疆各族人民不堪忍受盛世才的血腥统治，忍无可忍进一步掀起全面反抗浪潮的先兆。

后来盛世才走了，又来了吴忠信，国民党开始直接统治新疆。国民党给新疆人民带来的是更加残酷的压迫、更加锋利的屠刀、更加赤裸裸的民族歧视。一言以蔽之：走了狼，来了豺；走了屠夫，来了刽子手。他们同出一辙，他们都把大汉族主义的桎梏戴在各族人民身上。这种极端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及伴随而来的军事独裁、白色恐怖、经济崩溃、文化落后，在政治上使新疆各族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将新疆各族人民推入被奴役的深渊。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三区人民在上述层层重压下，反抗国民党统治，推翻新疆反动

政权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2. 全国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强大。

这是三区革命爆发的又一重要因素。1943年和1944年,蒋介石卖国集团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却实行对外投降对内反共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当局采取不对日作战的方针,保存实力妄图消灭在抗日前线英勇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没被消灭反而越来越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实力。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人民力量方面发展,苏联在对德国希特勒的作战中接连取得胜利。作为法西斯阵营一员的日本帝国主义,注定要垮台。在这种国际条件下,无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是反动派把持的国统区,业已展开的人民武装活动已成燎原之势,逐步壮大连成一片。

正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投入从日寇手中拯救国土的战斗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行将灭亡、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遭到人民严厉谴责的形势下,三区革命爆发了。如果没有当时全国的大好形势,三区革命的爆发并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3. 强大的苏联给予三区革命的支持和援助。

这是三区革命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与苏联及蒙古的边界线长达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千五百公里长的边界与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接壤。从历史上讲,三区不论是同沙皇时代的俄国还是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地理、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三区各族人民与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之间的关系紧密,甚至亲密得如亲朋好友。那边的进步思想会很快传到这边来,为三区人民

群众的觉醒,组织起来反抗国民党等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区革命爆发前,这边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者、进步人士遭到国民党迫害遇到危险时,就逃入苏联境内避难,待风头过后再返回来。有些三区革命的领导和骨干分子,就是在苏联受的教育。如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就曾在苏联受过教育;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进步人物代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拜克、赛甫拉也夫等同志,革命前夕都曾在苏联短期避难。

另一方面,苏联政府支援三区革命,也有一定的国际政治背景。那时盛世才已暴露了其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真面目,背叛了苏联。其次随着国民党势力伸入新疆,英、美势力也渗入了新疆。1943年在乌鲁木齐开设了英国和美国的领事馆,不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新疆“视察”,由美国垄断资本家组建的属于石油托拉斯集团的“中国石油公司”也跑到新疆开办公司。随后大批美国情报人员纷纷窜入新疆活动。苏联当然不甘心充当这场国际“游戏”的旁观者。

以上事实,对统一形成的共产主义阵营,对共产党,对苏联本身都是不利的。在此情况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对三区革命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了三区革命。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三区革命如此顺利地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始终 关怀着三区革命

新疆各族人民以三区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支强大力量,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革命力量,后来又作为解放战争的一部分,起到了

自己应有的作用。三区革命由于在当时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所以不仅从外部获得了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在国内同样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关注。

三区革命发生在中国最遥远的西部边陲，远离中共中央，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领导全国范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上。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三区革命的准备到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未能派人直接指导。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对这次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尽可能地予以声援，间接地产生了影响。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这篇著名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少数民族问题时指出：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人民的屠杀事件，1944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①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讲话中，指出了新疆以三区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斗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实行的以大汉族主义为基础的错误的民族政策；肯定了新疆各族人民这次斗争是正义的。

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行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和重庆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载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新疆各族人民的罪行，还发表社论向全国人民澄清新疆以三区革命为中心的人民革命斗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发动全国人民同情、支持新疆人民的革命斗争。

^①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

1945年6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以《新疆动乱、物价高涨，一个鸡蛋达二百元》为题登载一条消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掠夺新疆各族人民的罪行。文中报道新疆自1944年起物价飞涨，成为全国物价最高的省份。一个鸡蛋官价二百元，一袋面粉官价三万元。常人月生活支出达三万至四万元。此外，糖、茶、布的价格已涨到惊人的程度。

1945年12月3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从新疆返回重庆的一位教授的谈话，题为《国民党腐败政策一观》，副标题为《新疆人民处于水火之中》。他说：新疆的问题主要是腐败。以前新疆有个盛世才是贪官，造成了一些官员的贪污行为。而现在从上至下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人民无法生活。例如平头百姓去内地，一张通行证须交二十万元。新疆明明有众多民族，但有些人不承认他们的民族，只称宗族。近来，不知何故派去了慰问官员，可他们对少数民族一点也不尊重。情况就是如此，出现问题也就不为怪了。

1946年3月28日，《解放日报》刊载了署名“沙龙”的评论文章，题目为《新疆民族运动的真实状况》。评论开头指出，以前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进行歪曲的宣传（例如把新疆的民族运动诬蔑为“暴乱”等），新疆民族运动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只有少数人知道。文章通过对民主革命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研究，全面而具体地分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革命性质，介绍了这次革命的成果，预断了斗争的前途。文章指出，从历史上看，新疆各族人民在清朝统治时期，长期生活在清政府和大汉族主义的暴政之下，他们也曾不断掀起民族运动，这种斗争此起彼伏、时高时低，一直延续着。辛亥革命时期，号召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由于共和国的权力被军阀们窃取，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又被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政策所取代，各族人民仍得不到平等的权利。新疆汉族大地主的代表杨增新、金树仁等军阀先后把持新疆，他们强占

土地，征收苛捐杂税，对少数民族实行恐怖统治。在这种暴政下，新疆各族人民才不断奋起反抗。评论文章还特别分析了三区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盛世才在其统治后期，背叛了由他自己公布的进步纲领，推行屠杀少数民族的政策，先后屠杀了十余万人。从1941年起，国民党的直属部队大批开入新疆，肆无忌惮地压迫和掠夺少数民族人民。他们霸占新疆的财富，抢夺各族人民的房屋、财产，贬低币值，高抬物价，把各族人民逼到了绝境。俗话说“官逼民反”，于是新疆的民族运动猛烈地爆发了。可见新疆问题是民族压迫所导致的，这正好证明了三区革命斗争的正义性。这篇评论还无情地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反动本性。

1946年7月2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新疆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文章。文中报道了三区革命的胜利消息。文章说，自三区革命爆发以来，国民党当局调动了三万大军入疆镇压。但起义部队越战越强，日益壮大。去年11月穆斯林人民抵抗武装已推进到离乌鲁木齐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在同一月内，抵抗部队占领了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县城……反抗者们还控制了塔城和伊犁地区。

三区革命代表与张治中经过多次谈判，于1946年1月2日就和平解决“武装冲突”正式签定了“十一项条款”和“附件(1)”。中国共产党对双方经过努力达成的条款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月6日，张治中返回重庆，重庆的《新华日报》3月8日起连载了题为《张治中谈解决伊犁事件的经过》的消息，着重报道了张治中讲的双方能达成协议的原因，并引了张的原话：“我们坚持了民族平等精神和政治民主方针，采取坦率、亲切、心平气和的态度，尽可能给予人民所需要的民主权利和各种自由，这样便达成了协议。”

1946年7月，新疆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新疆各族人民以三区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斗争的一大胜利。为此延安的《解

放日报》很快于7月5日在该报头版以《新疆少数民族自治运动的胜利》醒目标题发表了这一消息。

1946年底,阿巴索夫同志抵南京与董必武同志多次会晤,详细地汇报了三区革命的全面情况。董必武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阿巴索夫同志亲切会面,他充分肯定了三区革命,特别强调了中共中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所表示的关怀,基本上接受了阿巴索夫提出的要求。阿巴索夫与董必武同志的会见表明,中国共产党与三区革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新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反动势力不遵守和平条款,极力进行破坏活动。中共晋察冀边区的《人民日报》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行径,给三区的革命斗争以热情的支持。194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破坏新疆谈判,蒋介石拒绝民族自治要求,人民不承认麦斯武德为主席》的文章。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协议条款,在南疆和北疆驻扎大批军队,恐吓、压迫、掠夺新疆人民,耍弄阴谋,妄图进攻起义人民武装的罪恶;支持三区人民反对反动分子麦斯武德。同年11月25日,该报又刊登了题为《新疆冲突仍在继续,人民军队收复承化》的消息,揭露国民党当局在南疆和乌鲁木齐一带集结五六万军队,企图进攻人民特区,蒋军和敌特捕杀一批穆斯林教徒。揭露蒋介石一伙儿表面上允许人民进行选举,实际上又抓捕关押人民提出的候选人,强迫人民投票选举他们的傀儡,捏造罪名逮捕已当选人民代表的人。文章说人民忍无可忍,会继续投入争取新疆民主与和平的斗争,强调了三区人民坚持武装斗争的正义性。此外,文章还报道了三区民族军的战绩,10月18日收复了由国民党军扶植的乌斯满匪帮占据的阿勒泰专区首府沙尔松拜,三区人口超过七百万,占全新疆人口的三分之一强,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到四五万人。

7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条消息,题目为《新疆人民自治运动扩大到天山以南,数千名徒步、骑马的群众统一组织,活跃在吐鲁番盆地,打击蒋匪军》,文中报道了吐鲁番、托克逊、鄯善三县人民起义的情况,告知全国人民,以三区为中心的人民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开展,这一革命斗争是全国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大大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斗志。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一野”开赴大西北战场,新疆面临解放。在此形势下,1949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派遣邓力群同志作为联络员来到三区,向我们转达了毛主席对三区革命的高度评价,带来了毛主席写给阿合买提江的信件。从这时起,三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便与全国的解放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毛主席亲自邀请三区代表参加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新政协会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区革命备加关怀、把三区革命看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明确体现。

第三章 三区革命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虽说三区革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爆发并获得胜利,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贡献要比预料大得多。这些成就和贡献可分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方面,三区革命力量实际上是国际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外来讲,三区革命无论在道义上还是物质上,对苏联埋葬德国法西斯的伟大斗争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对内来讲,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出了一份力量。三区革命当局不准许德国、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在三区管辖地带进行渗透活动,也不准

许他们威胁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仅从这一点来看,以三区革命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的新疆各族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各民族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方面,三区革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是解放军的强大友军。在1944年至1949年的革命斗争时期,三区革命牵制住国民党反动派十万正规军,在新疆又开辟了一个解放战争的新战场。假如没有三区革命,假如三区革命未能成功或者即使成功又被国民党的阴谋所蒙骗而丧失了革命成果,那么国民党可以从这十万正规军中抽出80%,起码可抽出50%调往内地去对付人民解放军,那势必会阻碍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就会推迟西北和全国获得解放的时间,新疆的和平解放也同样会受到影响。

三区革命的成就和贡献,就新疆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1. 彻底解放了三区

三区革命武装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将近一年时间,把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从此使三区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大大鼓舞了新疆人民,为新疆的解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从尼勒克发动人民武装暴动算起,在不到一年时间内,革命武装斗争迅速扩大,解放了整个三区,这是一项比较大的成就。取得这一成就并非容易,主要应归功于三区人民对革命的全力支持。枪声打响后,三区人民一呼百应,迅速投入战斗,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援革命。无数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人民、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浴血奋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三区武装力量拿下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进而严重威胁着乌鲁木齐和七区的国民党统治,这一胜

利震撼了整个新疆。

2. 推动了全省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浪潮

三区革命爆发促使新疆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出现了一个同情和支持三区革命、盼望三区革命早日成功的群情振奋的大好局面。此外,塔什库尔干的游击斗争作为三区革命的一部分,已形成正规的武装力量,对喀什的国民党驻军起着威慑作用;哈密地区出现了游击活动,吐鲁番及其他地区也在酝酿着武装斗争。

三区解放后,三区的武装力量抵达玛纳斯河,矛头直指乌鲁木齐。在此形势下,国民党被迫停止了武力镇压,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签订和平条款。和平条款达成后,双方按照条款成立了联合政府。尽管国民党设置种种障碍反对和破坏和平条款,尽管联合政府还是个松散的班子,但在联合政府延续的一年当中,在全省尤其在尚未解放的七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提高到了更高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一再违反协议条款,特别是1947年初,他们加紧了恐怖活动,镇压屠杀革命知识分子和反对他们的群众;制造“4·25”事件,严重威胁三区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破坏按照人民意愿举行的协商会议和县长选举工作。广大人民怒不可遏,认清了国民党签订和平条款的骗人把戏,更加懂得了对国民党抱任何幻想都是错误的,如果不依靠人民的武装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不可能获得民族平等、自由和解放。

3. 军事工作方面的重大成就

三区革命武装力量从暴动开始时的游击队到民族军成立前这一时期,其武装活动虽然还处于游击阶段,但各支队伍都服从统一

号令，有纪律地按照军事计划作战。

1945年3月，三区革命武装力量在原来的基础上组建了三区革命民族军。这支军队上从司令部下至广大战士都有统一完善的组织。民族军官兵当时身穿民族军军服，佩带漂亮的肩章，是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军容整齐的部队。民族军的成立不仅巩固了伊犁地区的战果，而且将攻击目标转向了塔城、阿勒泰两专区。他们大胆穿插，机警作战，只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就解放了这两个专区。在三区方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达成和平条款并组织联合政府期间，民族军按照条款暂时减少了官兵数字，可丝毫没有减弱自己的警惕性和战斗力。后来和平条款被破坏，三区代表由乌鲁木齐返回伊宁时，民族军又进行了扩编，准备迎击可能出现的来犯之敌。到1949年底全省和平解放前夕，民族军官兵在思想上树立了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信念，他们纪律严明，为群众办事，有一定文化素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迎击敌人。所以说民族军已成长为一支名符其实的人民军队。民族军在那四五年中，通过军事训练、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学习及实战锻炼，培养出不少干部，这些干部当时在民族军的指挥和管理方面，都很好地发挥了作用。

全省和平解放以后，民族军开赴乌鲁木齐和南疆地区，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社会治安，建立人民政权；有的部队在阿勒泰和巴里坤一带剿匪。我们从伊敏诺夫所率开赴喀什的团里抽出一部分干部，参加整个南疆政权建设的领导工作，后又从伊犁抽调部分干部也派往了南疆。当时在三区或七区入党的干部，现大多在作党的领导工作或行政领导工作，在解放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原民族军干部也不少。这些干部在民族军内得到培养教育的基础上，后又在领导岗位上成长起来，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在我们回忆民族军的历程时，不能忘记那些游击时期和民族军时期及整个三区革命过程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的烈士们；不能忘记民族军官兵当时的光辉业绩；同时也不能忘记至今仍辛勤工作在党政领导岗位上的原民族军官兵。三区革命中，民族军以其自身的战斗性、机动性、纪律性及文化素质，揭开了新疆历史和人民武装史新的光辉篇章。

4. 脚踏实地地抓经济工作

三区革命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前，经济状况和其他专区一样处于非常困难的阶段。当时三区可以说没有地方工业，仅有一家皮革厂和一座小水电站。日常生活必需品全要依靠手工业提供。农业生产落后，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加上国民党摊派的沉重的苛捐杂税及其他方式的掠夺，农民与手工业者的生活极端贫困。市场状况不景气。自从盛世才与苏联交恶，中断双方关系后，全疆的贸易陷入窘境。苏联停止向新疆出口工业品，由内地购运货物也很困难。日用品全要靠当地的手工业生产，但三区没有生产土布、且克曼布或丝绸的纺织手工业，这些物品都要从其他地区购买，然后长途运输到三区。总之三区当时经济上是很困难的。

三区政府针对经济上的困难，采取了若干措施。首先实行了减租减税的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三区政府1948年的税收比1944年国民党统治时减少了50%；给农民贷款购买种粮和农具等；鼓励扩大耕地面积，三区的耕地面积比1944年增加了50%。1948年，伊犁的粮食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只相当于乌鲁木齐价格的五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

经过一阶段努力，三区政府拥有了较雄厚的财力。1948年至1949年，三区政府下拨的发展文教事业的经费就占总支出的33%。此外还设立了县级银行，每年都向农民发放生活贷款和种粮贷款，有时还视农民本人的困难程度放宽还款期限；对确有实际困

难的农民免除其债务。这里附带说明一个情况，最初发放的贷款，有相当数量没真正发到贫困农民手里，却在中途流入了地主、富农的腰包。在领导干部中尤其在财政部门的干部中提出了“只贷款给有偿还能力的人”的主张，出现了胳膊肘朝里拐的倾向。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领导人察觉到这一倾向后，表示坚决反对。领导干部们不再满足于在会上讲话、作决定、定任务，还组成有领导干部参加的检查组，下到三区各县进行检查，解决具体问题。调查小组的主要任务（该检查小组下乡正值春耕时节）一是检查春耕情况，二是检查下拨的贷款是否满足了农民的要求。记得1948年春，我们三区领导干部下农村检查工作，阿合买提江去伊犁县，阿巴索夫去精河县，我到了绥定县。我见到农民们紧张地准备春耕，但农具不足，种子也没有，由上面赊购的种粮还没到农民手里。我断然决定按原则办事，不给地主、富农一文钱，把款子分到贫困农户手中。检查组回来后，阿合买提江立即召开会议，作出新的决定。特委托农业银行办理贷款事宜。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农业银行领导干部和其他财政方面的领导人。反复强调应该把钱款贷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因为他们在政府的扶持下发展生产是能够偿还贷款的，少数不能还的就算了。能够偿还的人是不需要贷款的。

三区政府还抓了商品贸易工作，在三区内部扩大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繁荣市场，保障人民生活用品的供应。对外与苏联政府建立贸易关系。我们主要向苏联出口活牲畜、畜产品、皮张、肠衣等。苏联供给我们纺织品及其它生活必需品。贸易进行得很顺利，市场繁荣了，人民生活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我们还狠抓了乱涨价的现象，使市场物价稳中有降。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单独印发了自己的货币，货币价值稳定，没出现过货币贬值现象。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使三区的经济状况得到全面改善，出现了粮食、日用品、衣帽鞋袜都能定量自给自足的大好经济形势。如果三区政府在经济

方面没有取得上述成就,那就难以保证三区革命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斗争的胜利。

5. 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三区革命时期,文教事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三区解放前夕,这三个专区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不用说学校和教员数量少得可怜,质量也很差。学校里缺乏教科书,尤其没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教科书。教员不但数量不足,而且原有的教员由于处在政治恐吓之下,人心惶惶,或由于其他方面的困难都不能专心执教。

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厅开办了不少学校并不断加以充实,学校教育发展很快,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提高。1948年至1949年学期,伊犁地区已有中小学二百七十所、一千一百多个班,学生人数达三万四千七百人;塔城地区有小学二百一十所、四百九十多个班,学生人数达四千五百一十一人;阿勒泰地区有小学六十五所、二百三十四班,学生人数达七千五百九十人(塔城和阿勒泰有些小学附设中学班)。这样算来,整个三区该学期共有五百四十五所中小学、一千八百三十个班、五万六千九百名学生、二千余名各族教职员。此外,为了培养干部,在伊犁建了一所中等专科学校,该校设有十八个班共五百多名学生,还开办了几个急需的专业班。该校号称“知识之乡”,是全三区培养干部的重点学校。校内各族学生都使用本族语言学习,学校备有用各族文字印刷的教科书,基本上满足了教学需要。仅拿伊犁来讲,就为各校印发了三万七千九百套各类教科书。

三区政府对医疗保健事业也很重视,除了继续留用原有的医生外,还在伊宁开办了一所卫生学校,培养出几百名学生。整顿扩建了各专区医院,各县建有足够的医院,各区也设有医疗站,并为各医疗保健单位补充了药品及其他物资设备。当时苏联对促进三

区的医疗保健工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文化方面,三区建立了专区级的文工团,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艺术水平和时代内容的歌舞节目,音乐也发展到一定水平,弘扬了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另外在专区、市镇、县建立了各级图书阅览室,为人民提供阅读资料,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三区政府还狠抓了扫盲工作,在城乡各处开办扫盲班,每年都有很多人脱盲,到1949年,三区识字人数越过了70%。同时民族军内的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及卫生保健等各方面工作以更高的速度得到发展。在大力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也培养出一批文化战线上的优秀人才。

总括来讲,三区的文化、教育、卫生、艺术、扫盲等各项事业,在短短的四五年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将这些成就与当时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七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6. 政治思想工作有了非常显著的进展

从三区革命政府成立起,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特别重视教育干部和群众的问题,不断纠正在革命工作中产生的错误和缺点。那时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各族群众,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必须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教育各族群众为了人民利益必须要站在苏联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从1948年起,宣传教育的侧重点有些变化,重点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不断取得的辉煌战果,使干部和群众及时了解解放战争的消息,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三区政府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知识渊博、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知识分子,依靠这支知识分子队伍带领人民反对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在政治上的破坏活动,正确地引导三区军民,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作为自己的目标 and 动力,奋勇战斗,使新疆随

着全国一起获得解放。

诚然，三区革命所取得的各项成果距离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要求还差得相当远，但考虑到当时的条件和实际情况，决不可低估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它们是三区革命领导人带领各族人民一面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反对内部的反动保守势力，以坚强的毅力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来的。所以三区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和自由所创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第四章 三区革命的性质

新疆各族人民从1944年至1949年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武装斗争，其性质说到底是一场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1949年8月18日在写给阿合买提江的信中（这封信是邀请三区革命者派代表团参加1949年9月中旬将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电函）指出：“你们多年来坚持的斗争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以推翻国民党独裁法西斯统治，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新疆为目的的三区革命，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自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这一科学评价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三区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

三区革命的性质是由当时新疆的社会性质和这次革命的对象所决定的。新疆当时的社会性质为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环境下爆发的革命，其对象自然是军阀盛世才和后来的外靠帝国主义势力内靠封建主义势力并充当这些势力代理人的国民党反动派。三区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坚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目标，并始终准

确无误地朝着这个目标顽强奋斗，无时无刻地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后台帝国主义，同与国民党相勾结，投靠帝国主义的民族败类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表明三区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那就是三区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国民党政权、同情革命、赞成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拥护民主的一切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及各民族成员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和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投身这场革命的人们包括众多成分，他们当中有应运而生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有农民、牧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立场上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凡站在民族民主革命一边的，不管是什么阶级，三区革命当局都不加以排斥，也不把他们列为打击对象；同时也不管是哪个民族，信仰哪个宗教，都把他們看作自己队伍中的一员。当时新疆所有的民族都参加了这场革命，在三区完全解放后成立的革命政府中，各民族代表都享有充分的权利，担任了政府高级职务。反之，谁要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相勾结出卖革命，不管是哪个民族都是我们打击的对象。其中就有维吾尔族的败类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哈萨克族的败类乌斯满、贾尼木汗、萨力士，回族的败类刘秉德等人。

三区革命领导成员中的成分也较复杂，有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罗志、李泰玉等；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吉、艾尼瓦尔·木沙巴也夫等；还有宗教上层人士艾力汗吐烈、阿克木伯克霍加等，他们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尽管领导层中成分复杂，甚至思想、信仰各异，但革命本身还是朝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这个主要方向前进的，自始至终没偏离这一方向。

革命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阿合买提江、

阿巴索夫等人，在革命初期就坚决反对某些人提出的把新疆变成泛穆斯林专政或泛土耳其专政社会的主张，而且超越革命在当时的要求，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倡议。主张这个革命在政治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民族败类们的独裁政府，建立若干革命阶级联盟的革命民主专政；在经济上要将国民党反动派和民族败类们的大量资本、土地、山川、森林、矿藏收归国有，把土地分给广大农民耕种，同时保护私人合法拥有土地，保护富农经济，保留私人的企业和商店。

简而言之，三区革命不论在武装斗争方面还是胜利后的各级政权结构方面，都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平等、民主、自由的愿望。从三区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来看，也恰好符合了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性质。因为三区革命所规定的革命对象和任务，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是基本一致的。这样，三区革命的成功，就为三区及受革命影响的新疆其他地区同全国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若干必备的条件；也为新疆与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合拍创造了可能性。此外，三区革命本身还培养储备了相当数量的有觉悟的优秀分子，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很快地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就像三区革命时代一样并且比当时更加努力自觉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新疆各族人民在三区革命初期，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及民族败类的主张，为了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使革命顺利进行，曾多次主动去寻找中国共产党，坚持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他们还拥护反法西斯阵营的领导者苏联，始终站在苏联一边，站在各民族无产阶级一边，站在民族解放运动一边，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在斗争中得到了苏联的

直接支持和援助。如果说三区的革命斗争一开始就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全国人民同属一个阵营，那么三区革命的胜利也就和世界无产阶级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后来三区革命所坚持的斗争基本也是沿着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方向发展的。

上述一系列事实，从几个方面恰如其分地表明了，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区革命以上述性质和特点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增添了新的一章，它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在新疆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永存。

第九部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第一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的号召。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族民众的热烈响应,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紧张地进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进入1949年,全国革命形势大为改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蒋家王朝的末日来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同年1月1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计划。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时局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职务。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会作重要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

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京。

4月21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先生：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将制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斗争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1949年8月18日 北平

阿合买提江收到此电函时，我们一家正在空气新鲜、景色迷人的果子沟的库克沙拉休养。一天，赛甫拉也夫带着阿合买提江的亲笔信来到我的住处，信中叫我火速回伊宁有要事商量。我当天就急忙与赛甫拉也夫一道返回伊宁。回到伊宁已是夜晚。我们直奔阿合买提江家，进门一看，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拜克、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吉都在这里聚会。一阵寒暄过后，阿合买提江兴奋地对我说：“你来得正好，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同志给我们带来了毛主席的信件，在这儿，你看看！”说着把一封信递到

我面前，接着又说：“看！毛泽东同志给了我们多么高的评价呀！”阿巴索夫插了一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了，那么我们在斗争中所追求的解放、繁荣、强盛新疆的目的就要实现了。”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接过那封信，信是两页纸，上面写的维文，细一看便知道是阿巴索夫由汉文翻译过来的。我先是快速读了一遍，而后又从容地复读了一遍，在座的同志都用喜悦的目光望着我，像是等待我说点什么。我只说了一句话：“实现中国人民、新疆人民伟大理想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同志写的这封信确实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重要文献。先是党中央派邓力群同志来三区与我们联系，而后毛泽东同志又给我们发出邀请信，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正式承认了新疆的三区革命，并且还将我们视为有资格的地方代表，邀请三区政府派代表参加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封信还具有一种特别意义，信上写了“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先生”，“特别区”就是指解放区，这样写是为了清楚地表明承认和尊重特别区政府以及政府领导人。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同志对三区革命给予了最恰当的评价，他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还说：“你们的斗争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按当时的习惯将“特别区”称作“三区”，毛主席所说的“你们多年来的奋斗”的含义主要指的是三区革命，就是说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只是字面上有点不同，意思是一个，只不过我们采用了当时易懂的惯称。）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间接地承认过三区革命，他在谈到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时，曾提及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他们民族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独裁统治的斗争，还提到伊犁地区武装力量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并表示支持这一斗争（即三

区革命)。这次,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又郑重地把三区称作“特别区”,肯定了三区革命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取得成功的意义,同时明确地指出了三区革命的性质。我们读过这封信都异常高兴,立即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的名义拟了复电: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您的来信收到了,信中所提的问题是我省全体人民长期以来所盼望的。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也是我省和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

顺致

敬礼

特别区人民的代表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1949年8月20日

我们拟好给毛主席的复电后,研究确定了去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由阿合买提江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有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拜克、省政府(联合政府)副秘书长阿巴索夫、民族军副总司令达列力汉、汉族知识分子罗志。另委派克里莫夫和阿不都热西提二人为工作人员。大事商定后我们着实大忙了一阵,一方面要准备带往北京的报告文稿和其他资料;另一方面要安排交待三区的事务。邓力群同志向中央汇报了代表团组成人员,中央复电表示同意。这样经过两天的周密准备,代表团定于8月23日启程。

在代表团出发前的那个夜晚,我们都没心思睡觉,大家聚集在

阿合买提江家里又研究了一系列事项。考虑最多的还是新疆这边的
问题，国民党面临垮台会有何打算？会不会进扰三区？会不会投
降？国民党头脑人物会不会逃跑？逃跑前会不会杀人放火？凡可
能发生的事变全考虑到了。大家认为敌人进攻三区的可能性不大，
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国民党的头脑人物一部分可能
投降，一部分极有可能向印度方向逃窜，逃跑前很可能干些杀人放
火的勾当。如果形势发展果真如此又该怎么办，我们在研究这类问
题时颇费了些脑筋。同时我们对三区的工作也作了部署，近两年来
三区的局势相当好，但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各项工作必须有专
人负责，商定在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去北平开会期间，由我负责全
面工作，列斯肯负责军事工作（他也是民族军司令部负责人），艾斯
海提主管行政事务，乃比江主管社会治安，赛甫拉也夫主管宣传工
作。为了避免三区发生混乱，阿合买提江一行准备秘密启程赴北
平，等他们开会回来再向社会公开。我们在三区会不会出事这一
问题上讨论了很久，最后大家都赞成“既保持警惕又注意团结，军
事上要有所戒备，加强治安和宣传工作”的决定。晚上十一点我
们才散去。

我邀阿巴索夫到我家，两人议论了目前的局势，总有些担心，
经多方考虑，还是觉得阿合买提江不要离开伊宁为好。我们两人立
即返回阿合买提江家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后又去找伊斯哈克拜克
商量，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让阿合买提江留下，由我补他的空
缺。我们打算将这一决定告诉邓力群同志，请他请示中央。但这时
阿合买提江经过慎重考虑仍坚持由他去北平的意见，他说：“我就
是想去参加那个会，亲眼看看毛泽东同志。”我和阿巴索夫遵从了
他的意见，我俩再次一道返回我的家。他特别兴奋，嘴里念叨着：
“我要见到毛主席了！你知道吗？这有多么荣幸啊！睡吧……”但
他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

阿合买提江一行转天夜里启程去了北平，所有的重担压在了我的肩上。

两三天以来，由于全力忙于代表团去北平的事，积压下来的公事很多，还有些新的事务等待着处理。这些事务全由我和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列斯肯、乃比江在碰头会上加以处理。我们在商讨过程中，觉得应该进一步发挥“新盟”的作用。办理完手头上的事务后，社会治安方面出现了一些麻烦，电话铃彻夜不断，一会儿是列斯肯，一会又是乃比江，他们带回了最新的情报。都需要我们一一处理。

有关三区的事，我们仍找邓力群同志商量，我主要向他介绍了三区的情况、三区革命爆发的经过、目前的政治局势及其他情况。

第二章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949年9月3日中午，我为了审查《前进》杂志的一篇社论，比平时提前来到办公室。下午两点，办公桌上的军事专线电话猛地响起来。这部电话是发生紧急情况才能使用的。我一拿起听筒，传来了值日军官的声音：

“报告！苏联领事馆要通知您一件重要事情。”

我急忙放下电话，把审完的稿件交给等在一旁的编辑，立刻驱车前去苏联领事馆。汽车穿过阿瓦提大街驶入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在大门内的草坪上迎候我，他文质彬彬地把我领到会客厅。会客厅内的场面令我惊讶，苏联的领事、副领事及另一位高级工作人员都严肃地站在大厅中央，见到我很快迎了上来，但却不像往常那样热情。领事与我握手致意后，请我坐下，还没等我开口，他就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份电报，用悲痛的语调对我讲：“我们收到了莫斯

科的加急电报。”接着，他用俄语向我宣读：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所率领的代表团座机，在途经伊尔库茨克飞至扎巴依喀勒山附近，因气候恶劣不幸撞山坠毁，机上十七人全部罹难。”

我听到这一噩耗如雷轰顶，几乎失去了知觉，当时只能勉强听到他们在说什么，隐隐约约分辨出他们脸上悲哀的表情。我失去了自制力，忽地站了起来，大声叫喊：“这不可能！”我从领事手中拿过那份电报，快速地在心里默读着。这架飞机上，除了代表团五名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外，还有莫斯科方面派来的三位护送官员，加上六位机组人员共十七人。

我立即离开苏联领事馆，乘车去找邓力群同志，很难过地向他传达了这一噩耗。邓力群同志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大吃一惊，面无表情，像木头一样僵住了。过了好一阵儿，眼里才滚出了泪水：“噩耗，太悲惨了！”

理智终于战胜了悲痛，我和邓力群同志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邓力群同志准备将这一消息立即电告党中央，我们等待中央的指示。还商定关于阿合买提江等同志遇难的消息对外暂时要绝对保密，除了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列斯肯、乃比江等人外，一律不得外传。根据伊犁当时的局势需要我们这样做。那时人们还都以为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到阿勒泰地区视察工作去了。

我与代表团的五位同志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下相识的，但我们都是为了反对反动势力在革命队伍中共同战斗过，所以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四十年来一直浮现在我眼前，久久不能忘怀。下面就我所知道的有关他们的生平事迹，分别作个简要的介绍。

(1)阿合买提江同志，1914年4月出生在伊宁市墩库吾律克买里一个贫民家里，父亲纳迪尔过早在贫困中去世。家庭失去了支

柱,母亲夏瓦汗带着七岁的阿合买提江给地主老财干些杂活讨口饭吃,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乞讨为生。阿合买提江八岁时便帮助母亲挑起生活重担,每天天一亮就去砍柴。一次,在劈木柴时,飞起的碎木屑打中了他右眼的瞳孔,他赶忙掏出衾里的破棉花烧成灰,用来堵住不断滴出的鲜血。从此,他的右眼视力低下,留下了苦难生活的纪念,也成了他坚毅性格的标志。

1924年他叔叔吾买尔·卡斯米见他母子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把阿合买提江带到了苏联的叶尔开提市。阿合买提江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新社会,少年的心灵被这样一个社会吸引住了,头脑中便产生了在自己家乡也努力创造这样一个新社会的想法。经叔叔介绍,他进入苏联政府为孤儿们开办的福利院上学。小学毕业后,他一边上中学一边在电影院干些打扫卫生或收票等杂活儿,解决了生活和学习上的费用。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高中的学习,1937年考入了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在大学里,他除了刻苦攻读科学知识外,还努力学习政治理论;阅读过《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和列宁的著作;并联系当时(盛世才时期)新疆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苏联政府支持的盛世才在进步的幌子下所干的事情。不久由于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牵连他被捕入狱。后来,苏联政府对盛世才狡猾的欺骗手法有所察觉;同时考虑到阿合买提江的学术观点和认识与苏联国内的政策并没有矛盾,于是把他释放了。阿合买提江出狱后又继续求学。他1942年大学毕业后在苏联教育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和十二名与他有同样遭遇的“嫌疑分子”为洗刷自己的“罪名”一起回到新疆。

这十二名学生中的十一个人,在阿勒玛斯带领下去了南疆。阿合买提江一人来到了塔城。盛世才如何来对待这个在莫斯科呆过的嫌疑分子是可想而知的。阿合买提江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特务们

的严密监视之下。

我最初见到阿合买提江正是他住在塔城的时候。那时我在报社当编辑。我发现他每天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前来报社买当天的报纸，然后坐在报社对面的长凳上仔细地看报。此外我见他有时干打土坯的活儿，有时给人粉刷墙壁。当时一个从事这种职业的青年竟对国内外形势这么感兴趣，热中于读报，不单是我，连周围的人无不感到稀奇。我虽想结识他，想知道他是谁，想了解他有什么想法，但我自己是盛世才的“流放犯”，一举一动都在官方的视线内。同样阿合买提江当时也是特务们监视下的人物。由于各自处境的限制，我们没有相互接近相互认识的可能，没过多久，我听说他被抓起来了。

阿合买提江开始被关在伊犁监狱，三个月后又被解往乌鲁木齐第二监狱。盛世才的打手们想刁难他可又没什么油水，放了他又不甘心，索性把他送到肥皂厂强制劳动。被放在这个肥皂厂强制劳动的“囚徒”中，也有我的哥哥伊拉里丁，他常常通过可靠途径（当时对犯人的管制有些松）给我们外面的人写信或传话。他在信中说“很适应囚徒式的生活”，“很愉快”，日子过得“有意思”，这些全靠一位叫阿合买提江的大哥起的作用。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阿合买提江竟是后来我在三区革命中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当然“囚徒”们所说的生活“很愉快”、日子过得“有意思”，可以理解为这些人渴望解放，为了继续进行斗争而焕发出惊人的勇气，即使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革命宣传活动，不由使我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敬意。后来哥哥又托人带口信给我，说那位阿合买提江大哥已被释放，去了伊犁，还把他的下落告诉了我。我按照哥哥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阿合买提江，我们一见面就像知心朋友那样推心置腹，促膝长谈。临别时，他表示了要经常见面交流意见的愿望。我也为着与这么一位开朗、活泼、谈吐逻辑性强的小伙子作朋友而感到高兴。

此后，我们经常见面。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时，阿合买提江在报社工作，我在教育厅工作，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阿合买提江在工作中很快就显露出他是个知识渊博、具有工作能力和组织才能的青年。他的办报宗旨明确，宣传得力，成为报社编辑、记者们凝聚的中心。在三区坚持武装斗争期间，他在宣传阵地上起到了独挡一面的重要作用。

阿合买提江的天才和能力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于是被调到政府办公室任副秘书长。当时的政府秘书长阿不都洛夫·买合苏木把所有的事务基本上都推给阿合买提江去做。阿合买提江在安排政府工作、分析形势作出决策、出谋划策处理疑难问题等方面，越来越显示出他的作用。他的革命热情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理解和拥护。在三区政府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他被推选为代表（此时他担任政府成员兼政府军事部长）。

阿合买提江在和平谈判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他是个精明强干的政治领导人，是个具有远见卓识、深谋大略并具有敏锐分析能力的天才人物。他总是无情地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企图消灭人民革命势力，解除人民武装，维护其黑暗统治的阴谋，一再敦促国民党拿出和谈的诚意来。临时革命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吉见到阿合买提江在谈判中的出色表现自愧不如，说：“这个差事我干不来，最好还是让阿合买提江当我们的头儿吧！”不言而喻，阿合买提江在谈判中，早就成了国民党难以对付的主要对手。

和平条款签订前后，在三区各族人民当中，阿合买提江的威望最高。广大人民通过对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进步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实践的观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前进的方向。所以理所当然地挑选阿合买提江作为自己的领导。阿合买提江成了三区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也是代表三区方面的省联合政府副主席。

省联合政府在决策上仍跳不出国民党方面画的圈套，没能给人民群众以根本利益。联合政府实际上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掠夺人民、欺骗人民的工具。对于此种状况，阿合买提江摆出有力的事实，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国民党在内地撕毁了和平协议，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新疆的和平条款也被国民党撕毁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阿合买提江率领的三区代表进行诬蔑，威胁三区代表团。在这种恶化的局势下，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破坏民主的无耻行径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三区代表团为将民主革命坚持到底，表现出不向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屈服的坚强意志，最后决定返回三区。

阿合买提江回到伊宁后，继续领导三区人民保卫和巩固胜利成果，以使三区民族民主革命更好地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主持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并担任该组织的主席。他紧密配合全国解放事业的需要解决新疆问题，动员各族人民迎接新疆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最后为了这一目的去参加在北平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途中罹难光荣殉职。

(2)阿巴索夫是三区革命最年轻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之一。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读过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严格按照共产主义者的标准要求自已，在领导层和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阿巴索夫原籍阿图什，祖父为生活所迫，带领全家去苏联谋生。阿巴索夫1921年9月生于苏联哈萨克斯坦皮利瓦尔斯克城，其父哈西木在当地负责中国侨民事务，经常来往于新疆和苏联中亚之间(按当时习惯，把管理侨民事务的人称作“阿克萨卡勒”，意为“中国公民的头头”，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哈西木阿克萨卡勒”)，

另外还利用这个方便条件,多多少少做点生意。1927年,阿巴索夫与弟弟阿不杜哈米提二人随母亲回国,住在霍城其伯父家。1928年,父亲和叔叔阿布利孜回国后,他随父亲到乌什县定居。阿巴索夫在乌什度过了童年时代,他聪明、活泼,喜欢提问题,所以得到了老师、朋友和左邻右舍的喜爱。他对知识有浓厚的兴趣,感到在乌什这个教育落后的地方无法实现求知的愿望。他父亲在苏联接受过进步教育,受到苏联的革命思想影响,支持儿子的求知欲望,盼望儿子将来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于是同意阿巴索夫去乌鲁木齐深造。

1936年夏,阿巴索夫告别了父母和亲朋好友来到了乌鲁木齐。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人的命运要靠自己去掌握”。起初,他打算听从父亲的嘱咐,走当时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阿吉的路子,去苏联学习,入乌鲁木齐俄罗斯中学读书。但后来无法去苏联才转入省一中民族二班学习。1938年毕业后,又进入新疆学院附设高中班学习。这段时间是阿巴索夫生活中真正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当时,共产党员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巴索夫听过林基路、祁天民、杨梅生等共产党员的报告和讲课,从他们关于抗日救国内容的讲座中得到了启发和教育。他认真领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课余时间按照老师的指导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列宁的童年时代》、《新哲学世界观》等社会读物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焕发着青春活力的阿巴索夫在共产党人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开阔了眼界;健康地成长起来。

1938年冬,盛世才制造了“阴谋暴动案”,抓捕了两千余名无辜群众,被抓的人当中就有阿巴索夫的父亲哈西木,哈西木老人不久便在狱中去世。这对阿巴索夫精神上是何等重大打击呀。他深深领教了盛世才说一套做一套的卑劣伎俩,但还解不开其中的

奥妙，于是就去问林基路同志：“林老师，六大政策的最终目的不是共产主义吗？不是要消灭阶级吗？”而林基路同志的回答并没有限于阿巴索夫所问的范围，向他详细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民族、国家学说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并给了他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让他读。从这以后，阿巴索夫把林基路同志当成自己的特殊导师，凡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问。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形成了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新的世界观。1939年他加入了由共产党员指导的反帝爱国群众性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为一名反帝爱国战士。阿巴索夫在新疆学院所接受的教育，给他以后坚持走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0年5月，阿巴索夫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被加上“叛逆子弟”的罪名，流放到沙湾县。他在当地的维哈小学任教，度过了两年艰辛的生活。两年间他为当地各族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同时不断地坚持自学。他刻苦攻读了自己偷偷带来的或托同学捎来的各种书籍，如《联共（布）党史》、《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著作，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萌发了革命思想，成长为一名具有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战士。

1942年夏，他结束了两年的流放生活，来到伊宁，先后担任伊犁专署教育局视察员、翻译，伊宁女子中学教员。在此期间他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几次卓有成效的调查，继而在1943年春成立了新疆第一个进步革命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组织规模不断壮大。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研究如何将革命理论与新疆的实际相结合，丰富、深化自己的革命理论知识。他们研讨的重点是中国革命的现状、在新疆进行革命的途径以及对革命

未来的一些看法。阿巴索夫还利用教育局派他出差的机会，到新疆各地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

阿巴索夫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他懂得要想在新疆首先在伊犁地区掀起革命斗争，必须有各界广大民众的支持才行。他通过不懈的努力，把各阶层民众争取到革命一边，积极参加组建“解放组织”的活动。后来就像他预期的那样，“解放组织”在宗教界、商界、知识分子、工人、手工业者、农牧民当中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在三区革命爆发前夕，为革命作好了强有力的舆论准备。

阿巴索夫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1年初他为了躲避国民党警察的追捕暂时去了苏联。1944年10月底，他率领近60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原从这边过去的人员）携带20驮武器装备、两吨炸药、一挺轻机枪和一门迫击炮返回伊宁参加了武装起义，在解放伊宁、成立伊宁第一个人民政权临时革命政府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后，他曾担任临时政府成员兼内政厅长、宣传局长，担子很重，经常出现在艰苦的第一线，越来越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1945年4月，民族军建立时，他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阿巴索夫的另一功绩是进军南疆，一直胜利地打到阿克苏（这一点前文已有专门叙述）。

阿巴索夫在和谈后担任新成立的省联合政府的副秘书长，及时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协议的行径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另外，经他多方努力，使“人民革命党”这个以谋求新疆各族人民真正获得解放为目的的组织，与乌鲁木齐的“新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日渐密切，他直接参与了这两个组织的合并工作，还通过董必武同志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怀。

和谈破裂后，阿巴索夫返回伊宁，以一名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了使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尽快成功，使三区革命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发展而忘我地工作。1948年3月，“新疆保卫和平

民主同盟”成立,他被选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兼情报处处长。此后,在他遇难前的一年中,更是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迎接全国和新疆的解放费尽了心血。

(3)伊斯哈克拜克,三区革命著名的军事指挥员,柯尔克孜族,1902年生于乌恰县衣肯乡斯木哈那地方的一个牧民家庭。其父木嫩阿洪从事牧业兼作点生意,到过俄国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曾到过麦加朝觐,听得多见得广,思想比较开明。这位老人看到自己的家乡贫穷,文化也落后,就在自己的阿吾勒^①开办了一所宗教学校,从喀什聘请毛拉担任教师。伊斯哈克拜克在童年时代就在该校就读,接受启蒙教育。后来又随父亲到过安集延、纳曼干等地,看到学到不少东西。1918年,被本地人一致推选为最年轻的伯克。他当时能自如地使用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讲话或阅读书报,此外还会俄语。

苏联十月革命后,大批被苏联红军追击的白匪和逃避革命的流亡者涌入新疆,危害了喀什地区的治安,当时的杨增新政府与苏联政府达成了协议,阻止白匪和流亡者入境。省政府在中国一侧的乌恰县境内的斯木哈那、托云等地设立边防哨卡驻兵把守。边防哨卡的士兵大部分是从柯尔克孜族人当中招募的,伊斯哈克拜克便是其中一员。后来,伊斯哈克拜克去了苏联,三十年代初又返回故乡。他回国后率领一部分柯尔克孜族士兵参加了推翻金树仁反动政府的起义,后又参加了镇压贾那伯克·哈孜等流窜匪帮的叛乱以及消灭马仲英匪帮的战斗,从一名士兵逐渐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员。

新疆的局势在消灭了马仲英部以后趋于平静。盛世才政权稳定了,提出“与苏联合作”、“拥护共产主义”等口号,这使伊斯哈克

^① 牧区人民居住的村落。

拜克倾向于盛政府。1935年春,伊斯哈克拜克手下的部队被盛世才政府编为正规军第一团,任命伊斯哈克拜克为团长。该团驻军喀什,负责阿克苏至塔什库尔干一带的边境防务和社会治安。后来根据省政府的提议,命伊斯哈克拜克再招募两千多人组建第二团并将两个团合编成一个旅,任命伊斯哈克拜克为旅长。伊斯哈克拜克打算将该旅建设成一支人民的军队,既不能像土匪一样的乌合之众,也不能像政府军一样的贪婪、腐败,于是从苏联聘请了迈乌拉诺夫、彼德罗夫等十几名顾问,负责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个旅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伊斯哈克拜克本人在群众中的威望也高起来。

伊斯哈克拜克的崇高威望,使盛世才惶惶不安。最初,盛世才以军事调动为由分化该旅,将伊斯哈克拜克调到乌恰县当一个局长,后又想除掉他,在培养使用的幌子下调他去乌鲁木齐说另有委派。伊斯哈克拜克识破了盛世才多次耍弄的诡计,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就是不去乌鲁木齐。盛世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命他去伊宁担任“伊犁哈、柯文化促进会”主席,催他立即赴任。这次伊斯哈克拜克再找不到抗命的借口,于1940年春去伊赴任。他在伊宁每时每刻都受到当局耳目及特务们的监视。

1942年春,盛世才按照既定计划向伊斯哈克拜克下手了。免去了他“伊犁哈、柯文化促进会”主席的职务,命令特务机关逮捕他。伊斯哈克拜克事先得到消息,带上警卫员艾买提和自己4岁的儿子好不容易才逃到了苏联。盛世才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逮捕他全家所有的人。他7岁的儿子死在乌鲁木齐狱中,他弟弟俄雅斯长期坐牢,他妻子古丽乃再尔被抓住送给盛世才在阿克苏的走狗托合塔朱西做了老婆。亲戚朋友也被流放到喀什、伽师等地。他和亲友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

伊斯哈克拜克逃到苏联后并没有虚度时光,他从不堪忍受盛

世才压迫逃到苏联去的新疆各族革命者中挑选出二百人,组成两个大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1943年夏,他率领一部分武装人员从阿克奇一带入境,鼓动当地人民在阿克奇和乌恰一带酝酿武装暴动,但由于他的一名警卫员向敌人透了风,他放弃了原订的计划。伊斯哈克拜克于当年9月率队途经苏联境内南下塔什库尔干和当地游击队汇合,与赞成革命起义的乌布利·卡斯木、马达尤夫、买买提·艾沙、西林拜克等人成立了“解放组织”。他们一面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一面组织游击队展开游击战,点燃了塔什库尔干人民武装革命的第一支火炬。临时革命政府初建之际,伊斯哈克拜克率领二百人的大队赶来参加了解放整个伊宁的战斗。因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又具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被推选为政府成员。

1945年4月8日民族军正式成立,伊斯哈克拜克被任命为第一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不久他率领一部分部队通过苏联境内赴塔什库尔干开展游击活动并对当地游击队进行整编,为统一塔什库尔干和三区革命部队的编制作出了卓越成绩。他后来返回伊宁指挥解放全部三区的战斗。三区政府高度评价了伊斯哈克拜克在三区革命中尤其是在乌苏战役和精河战役中所作出的贡献,于1945年10月14日政府第107次会议上,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后很快接替了帕里诺夫,被任命为民族军总司令。

在三区方面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期间,为了迫使国民党按照三区革命政府的要求条件签订和平条款,伊斯哈克拜克于1946年4月去南疆直接指挥暂时受挫的塔什库尔干武装斗争,还将当地游击队按正规军的标准重新改编,为使三区革命政府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增添了一份力量。

1947年7月1日,伊斯哈克拜克任省联合政府委员兼省保安部队副司令。1947年2月,他指挥下属三个骑兵团在达列力汗配

合下,把坚持反对苏联反对三区革命并同国民党串通的乌斯满匪帮赶出了阿勒泰。接着又指挥部队镇压了哈力伯克匪徒的叛乱,迫使其逃往巴里坤,使得三区革命政府很快控制了这两个专区的局势,保住了革命成果。当国民党全面撕毁了和平协议,暴露出其本来面目后,伊斯哈克拜克退出联合政府,继续为民族军的革命化而奋斗,为纠正民族军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倾向而不倦地工作。此外他还为阿巴索夫在民族军中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办法的计划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1948年8月1日,在“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上,伊斯哈克拜克被选为该组织中央委员。

(4)达列力汗,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光荣战士,哈萨克族,1906年生于阿勒泰专区的约勒盖衣区(现属蒙古共和国)克烈部克洛奇这个名门望族。达列力汗小时候求知欲望强烈,他在本地的宗教学校和普通学校都念过书,还学过蒙语和俄语。

1921年5月,敌视十月革命挑起叛乱的苏联白匪杜托夫部被苏联红军击溃,窜入塔城和阿勒泰地区。这帮匪徒妄图以阿勒泰作为基地顽固与苏联红军为敌。他们向当时的阿山道尹周务学索要一万只羊、三百头牛、五千匹马、一千头骆驼。这沉重的负担必然会摊派到牧民头上,在哈萨克牧民中掀起轩然大波。达列力汗受兄长之托准备越境去苏联,向红军报告白匪情况及他们所在的位置,决心消灭这群强盗。但此计划被人探知向白匪头目巴奇赤告了密。巴奇赤大为恼火,下令将达列力汗兄弟二人抓捕起来。一个月后,当巴奇赤要枪毙他们俩的关头,兄长对达列力汗说:“看来我们的命保不住了,等死还不如一拼,我朝前面逃,你朝后面跑!”说着朝前猛跑,负责押送的三名白匪忙着追赶其兄时,达列力汗忽向后面逃。其兄不幸被抓回枪杀了,达列力汗侥幸逃了出来。他一回到自己的阿吾勒,就立即派人去苏联红军边卡,通报了有关白匪的情

报。红军入境后由达列力汗带路围歼了一部分白匪，事后苏联红军指挥员向达列力汗表达了万分感谢之情。

1924年，达列力汗十八岁那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达列力汗一边受苏联的影响，一边又受刚刚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影响，萌发了在自己家乡建立革命政权的愿望并决心为此目的而奋斗。1932年，进步民主人士沙里福汗在吉木乃县组织民众反抗金树仁的独裁统治，达列力汗带领本阿吾勒群众响应，全力协助、积极参加沙里福汗的民主进步事业，成了沙里福汗的有力助手。

盛世才上台后伪装进步，多少有点民主的气氛。乌鲁木齐各族民众成立了“文化促进会”和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反帝会”，达列力汗是“阿勒泰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反帝会”的骨干。他和他所领导的组织使阿勒泰的局势大为改观，到处都澎湃着民主的浪潮。这些组织散发了大量的革命书刊，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就是那时译成哈萨克文广为传播的。达列力汗利用了这一较好的形势，走东家、串西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的宣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阿勒泰人民都自愿捐献钱物支援前线，仅短短几年时间就给延安送去了五架飞机、一百匹军马、二十余万元现款和许多优质皮大衣、高筒皮靴等物品。鉴于达列力汗的贡献，他参加了1939年3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省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刚刚结束，生性多疑的盛世才突然下令收缴牧民手中的武器，委任沙里福汗为“清枪委员会”主任，还不准大会代表离开乌鲁木齐。规定上交的武器中包括猎枪、土枪等一般的而又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枪支，这一命令引起了大会代表的强烈反对。

1940年2月，富蕴县和沙尔松拜的广大牧民群情激愤，打死了盛世才“清枪委员会”的官员，缴了11条枪和一些弹药，在阿勒泰首次点燃起暴动的烈火。盛世才数次派兵镇压，可每次都遭惨败。盛世才无可奈何，就把这股怒气撒在参加代表大会的阿勒泰代

表身上。他软禁了沙里福汗等人，另派出自己的岳父去阿勒泰与暴动者举行谈判。暴动者强烈要求释放被扣在乌鲁木齐的阿勒泰代表，同时坚持让达列力汗参加谈判。这时盛世才的气焰被迫收敛了一些，答应只要暴动者交出武器，可以送回除沙里福汗以外的所有代表。他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安排个别代表担任省政府委员，还任命达列力汗为沙尔松拜县县长。此次暴动事件暂告解决。

1940年10月，盛世才把沙里福汗关进监狱，对其施加酷刑最后将其杀害。接着盛世才又像对待其他地区一样，在阿勒泰变本加厉地巧取豪夺，加捐加税，使广大牧民和金矿工人陷入再也活不下去的绝境。1941年4月阿勒泰的牧民们再次暴动。这次达列力汗完全站在了暴动者一边，他以政府谈判代表的身份接近暴动者，为他们提供重要消息。9月，盛世才向阿勒泰派出大批军队，让自己的岳父邱宗浚兼任阿勒泰警备司令，还派心腹走狗贾尼木汗前往游说劝降。暴动者对抗不了强大的敌人，同意举行谈判，但是达列力汗同情暴动者的作法被发现，盛世才邀请达列力汗和阿勒泰专员布哈特等十余人赴乌鲁木齐开会。达列力汗立即猜透了这次“邀请”的意思，于是达列力汗就此“失踪”了，实际上他委托一个塔塔尔族朋友与苏联驻阿勒泰领事馆联系好了，到苏联暂避一段时间。他到苏联后进入阿拉木图东方大学就读，主要目的是掌握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他思想上又产生了一次飞跃，更倾向进步了。1943年9月，他向苏联当局提出返回阿勒泰搞民族解放运动的要求，请求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给予支持。苏联方面答应了他的请求，派出波波夫少将为首的十二人顾问团随达列力汗一道启程绕道外蒙进入阿勒泰地区。达列力汗在苏联顾问协助下，组成了纪律性强的二十五人领导骨干小组，准备组织群众举行武装起义。他鼓动广大群众只要坚持武装斗争就能摆脱盛世才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但是他并不急于同国民党交锋，也不急于攻占县城，而是深入到每个阿吾

勒启发牧民,争取他们同情革命或支持革命。

1944年4月,达列力汗为首的领导骨干小组的工作有了成效,阿勒泰专区有80%的牧民都撤离城镇迁到山上或平原地区去了,给国民党当局留下了座座空城。国民党政府发现自己管辖下的生灵几乎一个也不剩,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

从1945年1月至8月,达列力汗按计划与国民党军作战,打了多次成功的战役,他亲自指挥部队歼灭了大量敌军,解放了阿勒泰所属的部分县镇。该年8月26日,他率领的游击队与民族军列斯肯指挥的一个团相配合,发动了对布尔津的攻势。9月6日,他指挥的游击队和民族军一起攻打沙尔松拜,国民党守军支持不住往外蒙方向逃窜,达列力汗率骑兵追击,截断敌人的逃路,除极少数敌人逃生外,活捉了国民党阿勒泰专员高伯玉、警备司令宛凌云以下3000余人,完全解放了阿勒泰地区,宣布接受三区政府领导。

1945年10月,三区革命政府根据达列力汗在解放阿勒泰专区过程中的贡献,授予他勋章和中校军衔,委任他为阿勒泰专员。达列力汗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政务,他把阿勒泰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成立了民族军第三骑兵团,由他自己任团长。1946年4月,由于他在与乌斯满匪帮作战中多次获胜,为维抗革命功绩,和因

领导人。不论是在战争年月还是在战后恢复工作时，都表现出他这两方面的才能，此外他在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方面也有不少作为。达列力汗认为三区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一回事，他在纪念三区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致词时曾讲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为了自由和解放，以火山爆发般的大无畏的勇气，大踏步奔向解放之路。目前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日益强大，国民党的末日指日可数。”

(5)罗志，汉族，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完全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斗士。我是去乌鲁木齐在省联合政府任职时才与他认识的。当时他常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有一段时间，他常在我家印刷、散发《战斗》杂志，所以我们两人成了亲密战友。据罗志自己讲，他1915年出生在广东高明县，父亲有两个老婆，大老婆不能生育住在乡下，他是小老婆生的。他父亲与他生母住广州市内，开了一家玉石古玩店。罗志五岁那年，父亲生意破产，商店倒闭，回到乡下老家。不久罗志父母双亡，由父亲的大老婆抚养，罗志叫她为“大妈”。

罗志八岁上学，由于他生性顽皮，大妈也管教不了，于是把他送给了远在长春的没有子女的伯父罗信枝做儿子。1931年“9·18”事变时，伯父送他入校读书，但是十六岁的罗志却给伯父留了个“自寻职业，自力谋生”的字条出走了。他去吉林的抗日部队中当了兵，这支队伍人数不多，没有固定的供给和武器来源，只打了近一年的仗就撤入了苏联境内。1933年，罗志经苏联进入新疆，与同行的士兵们一起到了乌鲁木齐。

盛世才上台后，拉拢他的东北老乡，想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讲武堂招收学员时，罗志被挑中，为讲武堂第二期学员。罗志心里明白盛世才办讲武堂的目的是培养私人军队。他不想呆在讲武堂，转学到了新疆学院入法律系学习。这段时间他直接

受到林基路同志的教育,不仅听林基路的课,还按照林基路同志的指点阅读了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有关现代革命的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他除了进修理论知识外,还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

1938年学期结束,罗志留校任体育教员,参加了“反帝会”。半年后他担任蒙哈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学校“反帝会”干事。1940年任哈巴县教育局教育科长。1942年任沙尔松拜教育局教务主任。后遭人诽谤,涉嫌有政治问题,被关进阿勒泰监狱,后转乌鲁木齐第二监狱。后来问题得到澄清,确实有人诬陷,他被开释出狱,派到焉耆警察局做事。1944年5月,又被以“嫌疑犯”的罪名抓起来押回乌鲁木齐。1945年春,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清查犯人的委员会,通过审查,认为罗志是无辜的,又把他释放了。此后罗志再不去政府部门工作,他在南门摆了个小摊,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他是一名职业革命者,是1944年在乌鲁木齐成立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宣传鼓动工作。他负责主编、出版《战斗》杂志,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在组织和发动民众方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这点前文已有专门叙述)。

我们返回伊宁后,罗志负责“人民革命党”乌鲁木齐分部的工作,留驻乌鲁木齐单独活动。罗志同志继出版《战斗》杂志之后,又出版了《战斗报》,此外还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宣传工作,指导学生运动。他及时通过报纸和传单,报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捷报和解放区生产建设方面取得各项成就的消息,使当时的宣传工作更具战斗性,给封锁消息混淆视听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以迎头痛击。罗志主编的《战斗》杂志一直办到1949年9月。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乌鲁木齐人民大都是通过阅读《战斗》杂志才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和党中央领导的各项指示的。

同机遇难的除了上述五位革命领导人之外,还有艾尼·克里

莫夫、阿不都热西提、乌斯曼江等人，我们同样地怀念他们。以上同志的逝世正如毛泽东同志 1949 年 10 月 22 日发给“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唁电中所指出的“对新疆人民和中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但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热爱共产主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热爱人民子弟兵的高贵品德。四十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取得了烈士们所向往的胜利。今后，新疆各族人民会继续发扬革命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章 北京之行

邓力群同志将有关阿合买提江一行座机失事的消息电告中央，后收到中央复电，电文中首先对阿合买提江一行的不幸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然后指示我们另派代表团赴北京，三个人也行，由赛福鼎率团火速启程。我们经过磋商决定除我以外再议定两位代表。我提出两名代表中一个哈萨克族，一个汉族为好。邓力群同志同意了。我们先选定涂治为汉族代表，决定马上把他从乌鲁木齐接来。在我们商议哈萨克族代表时，苏联朋友给我们推荐了塔城副专员阿力木江·衣克木巴耶夫，我没同意，理由是，第一他不是哈萨克族，第二他本人的条件也不合适。在哈萨克族人选上着实争论了一番。当时苏联朋友从各方面做工作，也来说服我。他们的意见没有人能够拒绝，其他人都表示同意，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我们紧张地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起草报告，准备材料，还要安排有关的其他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将代表团成员集中到伊宁，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先是阿力木江从塔城赶到了伊宁，可涂治

在乌鲁木齐，我们只好求助于苏联领事馆秘密地用飞机把他接来。涂治抵达伊宁的事，除了我任何人也不知道，是我亲自去飞机场用我的车把他接回来的。一见面我发现他神色不安，语无伦次，但我没有多想，只是问他知不知道来伊宁干什么，他说不知道。我把他带到家里细一打听，才知道他来伊宁的经过，怪不得他那样担惊受怕。事情是这样的，在涂治来伊宁的前一天晚上，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的人把他找去，通知他第二天早上搭机去伊宁，至于干什么，赛福鼎会告诉他。因为涂治同志与我们的思想观点相近，况且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他也没问到底要去干什么，只要求回家准备一下转天再走。可苏联领事馆的人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让他回家。第二天早上用汽车把他拉到机场，送上飞机关上了舱门。飞行员登机后又把他锁进机上的厕所里，然后才允许其他乘客登机。直到飞机越过阿恰尔山朝着伊宁低空滑行的时候，才打开厕所门放他出来，还不让他接近其他人，安排他坐在飞行员身边，把涂治吓坏了。他下了飞机见到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他搭乘的是从哈密至阿拉木图航班的苏联飞机，属“哈密—阿塔”航空公司。飞机由苏方管理，中方不能干预公司内部事务）。听完他讲的情况，我向他交待了叫他来的原因，他才恢复常态，他听说要去北平异常地高兴。

我们就要启程了，三区的事务交由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列斯肯、乃必江等人集体负责处理。关于我们离开伊宁一事仍然严格保密，只有上述四人、邓力群同志及苏联领事们知晓。上次阿合买提江等人走的时候，我们对外说是到阿勒泰视察；而我们走的时候，对外又说“新盟”召开会议，因塔城方面出了点麻烦；要去那里处理。可有些人感到奇怪，问我阿合买提江去了阿勒泰，你们又要去塔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回答，他们也就不再追问了。前次阿合买提江一行是先乘汽车到阿拉木图然后登机出发的，这次我们

走时却从莫斯科调来一架专机，同时还派来一位陪同我们一起走的负责人叫洛索夫。

1949年9月8日，我们三名代表先到列斯肯家汇齐，再一起去飞机场。当我刚刚迈出他家屋门的时候，向列斯肯等问起我的秘书兼翻译德林和霍加合买提二人在哪儿，原定这两个人应由列斯肯和乃必江负责安置的。可万没想到这两个人的境遇比涂治来伊宁途中的经历更为狼狈。经我一问，列斯肯说他们就在这里，说着把两个人带了过来。不用问就能看出他们两个是多么害怕。原来头天晚上列斯肯就把他们叫了来，把他们锁进院内的一间库房内，给了点茶饭，告诉他们明天有任务别害怕，随即将房门上了锁。两人想，是什么任务要我们呆在库房里，还上了锁，到底怎么回事，谁能不害怕？我听了一边笑一边埋怨列斯肯，但列斯肯坚持己见说，要绝对保密。我对两个秘书说：“别怕！走！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全体人员坐上汽车直奔飞机场。在机场上，苏联领事向我们介绍了从莫斯科前来陪我们同行的洛索夫和机组人员。他们都是军人，机组组长叫玉素波夫，是名年轻的大尉，塔塔尔族。这架飞机是莫洛托夫的专机。听说斯大林同志得到阿合买提江一行遇空难逝世的消息，狠狠地训斥了有关负责人，嘱咐此次派出的飞机要绝对保险，所以把莫洛托夫在国际上使用的座机调了来（此情况是那个从莫斯科来的人讲的）。这架飞机的型号是伊尔12，外型很美，有卧室，有专用休息室，它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飞机了。

早上，飞机起飞了，朝着阿拉木图方向飞去。德林和霍加合买提透过舷窗向下张望，又抬起头惊愕地望着我，问我飞机往哪里飞，我反问：“你们说往哪里飞？”他们说：“往北飞呀！”看来他们原来可能以为要飞往乌鲁木齐，一看方向不对才感到惊讶。当我告诉他们要飞经苏联前往北平后，他们心里都踏实了，无忧无虑地闲聊起来。

那天,万里无云,旭日的光辉撒在伊犁大地上,察布查尔一带的群峰闪着银光,飞机的下面伊犁河蜿蜒流向远方,将河谷田野分割成一块块碧绿的地毯,飞机沿着伊犁河飞行,越过霍城进入苏联境内。这边的田野景色和我们那边不同,这边全是条田化的广阔的农田,树丛中点缀着白色的房屋,长长的道路伸向天边尽头。此时我的心中喜悦和悲伤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喜的是我们此次去北平参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事;悲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人遇难不幸逝世,一种悲痛的感觉总在缠绕着我。工作无论如何忙碌,思绪如何繁乱,也不能使我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另外,我还挂念着三区 and 新疆的局势,在解放前夕能不能坚持稳定的局面,会不会出乱子……自己想着想着连飞机已经抵达阿拉木图都没察觉到。阿拉木图有许多美丽多姿的建筑,全都藏在浓密的绿树丛中。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绕着市区上空盘旋两圈降落在机场上。我们一行人受到当地几位军政官员的欢迎,稍事休息后,重又登机继续飞行。下午降落在诺沃斯比利斯克的一个军用机场,几名军官前来迎接,把我们安排在机场旅馆下榻。第二天我们一行飞抵伊尔库茨克。傍晚,一名俄罗斯上校军官带来两个人,给我讲述了阿合买提江等人罹难的经过。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代表团于8月25日乘机飞抵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转天因气候恶劣飞机全部停飞,过了些时候还是因云雾太浓无法起飞。他们等了两天,到27日天气仍未转好。阿合买提江坚持己见,无论如何也一定要飞。原来北平方面有消息,要新疆代表早些抵北平,他们可能特别焦急。机场终于放飞,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飞越贝加尔湖时,忽然云雾遮天,刮起了大风。他们仍继续朝前飞。飞机上向机场报告说已飞临山顶,但飞机拉不上去直往下落。机场发出了返航命令,飞机上传来“返航”、“立即返航”、“转五十度”、“转九十度”、“转一百二十度”几句口令后,这架飞机便与机场失掉了联系。机场人员焦

虑地等待着飞机返航,但飞机没有飞回来。于是同前一站降落点赤塔市机场取得联系,得知飞机也没去赤塔,他们估计可能出事了。晚上,他们望见贝加尔湖那边的山里冒起一大股浓烟。第二天,又派出飞机侦察,观察到贝加尔湖那边一座叫作亚布诺勒别里瓦尔的山中(阿勒玛达坂)几处森林着了火,才断定飞机在此地坠毁。莫斯科方面下令派人进山调查,调查人员没能到达那个地方于前天返回。给我介绍情况的人说,莫斯科方面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派人弄清情况,交还遗体,叫我们放心(1950年,我随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时,苏方通知我,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遗体已经找到,如果我同意,这次可以带回去。我请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应该运回去,运回新疆后你们给建个陵墓,让大家记住为人民而牺牲的领导人。”归途中,我到了阿拉木图,一位俄罗斯族上校已将烈士们的遗体运到这里等我,我们进行了交接工作。遗体是由另一架飞机空运到伊宁的。遗体都装在水晶棺中,棺内放有防腐化学药品。我开棺看时,其他人的遗体是零碎的,不易辨认,只有阿巴索夫的遗体完整无缺,只是头部被刮破了。据介绍情况的那个人讲,发现阿巴索夫时,他的遗体躺在离坠机地点二十米开外的一块石头上。全伊宁市的群众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他们安葬。王震同志、包尔汉同志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专程从乌鲁木齐前往参加追悼会)。据说飞机、机上的衣物用品全部烧毁,还烧光了挺大一片森林,遗体是经过辨认拼凑起来的。阿巴索夫的遗体为什么抛得那么远,介绍情况的人也讲不出个所以然。依我看,可能是飞机撞山爆炸时将他远远抛出去落在那块石头上的。

第二天拂晓,我们飞离伊尔库茨克,不一会儿飞临贝加尔湖上空,看到太阳从东面山峰后冉冉升起,光芒照亮了飞机下面那长长的湖面。传说贝加尔湖中央有一个大漩涡,能搅动一两千米高空的空气打转并能将空气吸下去,如果飞机飞经大漩涡正上方也会掉

下去。我们在三千米的高空飞行，飞机正在拔高准备飞越前方的高峰。我透过机窗观望这座在阳光和碎云下耸立着的险恶山峰，阿合买提江等战友们就葬身在这座山上，我现在也同样沿着他们飞行的航线飞行。我这种难以言状的心情是同机的战友们所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阿合买提江一行已遇难身亡。飞机已上升到四千米以上，大尉飞行员玉素波夫手拿地图给我看，告诉我阿合买提江等人的座机的坠落地点亚布诺勒别力瓦尔就在下面，并把望远镜递过来。我隔窗向下望，看到一大片森林都烧焦了，还有散落在不同位置的一片片黑乎乎的东西，也许是他们的遗体吧，唉！真惨！他们是不是只受了伤仍活在人世？不可能，一切都烧尽了，他们怎么能还活着？我心中充满伤感，泪水不禁簌簌淌下来。眼前浮现出他们的身影，阿合买提江好像在对我说：“一路平安，去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任务吧！”又好像看到阿巴索夫手扶额头亲切地望着我，用悦耳的声音祝我一路顺风。接着我眼前又浮现出一连串情景，伊斯哈克拜克离开伊宁时，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希望你们再欢迎我们胜利归来。”在与达列力汗道别时，他高兴地对我说：“喂！老赛！我就要见到毛泽东同志啦！”我沉浸在哀痛之中，深情地怀念着他们，眼泪流个不停。不！你们没有死，你们的精神与我们的人民永存，你们的遗愿一定能实现。我以这样的信念来告慰英灵，同时也安慰自己。

洛索夫坐到我的床边，打断了我的沉思（我拉上床幔休息，尽量不影响其他同志）。他一开口就问我：“怎么了！哭了吗？”我说：“没有”，却又背过身去擦眼泪。他倒了一小杯葡萄酒让我喝，等我喝下这杯酒他才放心。他说阿合买提江他们就是在这座山上牺牲的，我们要继续完成他们的未尽事业。他再次重申：“斯大林同志对这次空难事件感到很难过，严厉地批评了航空部门的领导人。这对我们是个教训。斯大林同志考虑到这个教训，给我们下了命令一定

要保证这次旅途中的绝对安全。”这时，我感到心脏猛地抽紧了，正好玉素波夫走来报告，说飞机已升至近五千米，已越过山峰，就要降低高度。我从窗口向外看，飞机已越过高高挺立的山峰，开始降低飞行高度。过了一阵儿，大家都拥进休息室，洛索夫把阿力木江和涂治叫过来和他们坐在沙发上饮酒聊天。我发现阿力木江、涂治、德林、霍加合买提都在观察我的脸色，可能我的表情恢复了正常，他们什么也没看出来。

下午一点，我们降落在赤塔市，按计划再往前走就要换乘火车了。由于火车尚未备好，接待人员请我们停留一天转天再走，于是送我们前往旅馆休息。

晚饭后，我决定将阿合买提江等人空难牺牲的事告诉所有同行人员。在此以前不能透露，因为新疆还在保密，如在飞机上公开这一消息又怕大家过于紧张影响旅行。要知道即便在我乘飞机时没公开此事的情况下，阿力木江还是那样提心吊胆勉强跟着飞过来的，更不用说公开此事的后果了。我考虑下面的旅程是乘火车，再说离北平也不太远了，现在不讲不行了。他们听完空难的经过，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都很悲痛。当晚大家组织了一次悼念活动。过后我让他们回房睡觉，我自己仰面躺在床上心事重重。忽然德林同志哭着闯进来，一头扑在我怀里哭了很久，我也忍不住落了泪。我极力控制自己，劝住德林，两人谈了些有关阿合买提江等人的事，更多地谈了今后的打算和这次抵达北平以后的任务。

9月10日，我们乘专列驶离赤塔市，11日到达苏联边境城镇阿特布尔，专列越过边界停在我国满洲里车站。车站上还停有为我们准备的专列，专门从北平赶来的方星（音译）同志和马祥玉（音译）同志（该同志是一位解放军师长）在这里迎候我们。洛索夫把我们从小苏联专列转送到中国专列上交给北平来的同志。在中国专列的餐车上，我们设宴招待洛索夫，对他们表示感谢。我本人为了表

达对苏联政府和洛索夫本人的谢意,特意把一支“派克”金笔赠送给洛索夫留作纪念。我们送走了苏联客人,等待出发。

晚 10 点(按新疆时间,满洲里时间下午 6 点),列车启动向北平进发。这趟专列只有三节车厢,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车厢里很舒适,尤其是卧铺车很豪华。另一节车厢是餐车,还有一节车厢是供干部和警察休息用的。此外还从北平带来了回、汉厨师,汉族厨师会作欧式菜点,一切安排得很周到,我们的旅行就如同度假休息一样。近一个月来,我很疲倦,感到体力不支,这时顾不得许多,埋头大睡起来。没想到麻烦事又出来了,当时东北战争的创伤还没根治,战争中被毁的桥梁是暂时用木料搭建的,铁轨不很牢固,列车只好慢行,到哈尔滨干脆停下不走了。为等专列再次开动,我们乘车在市内转悠了个把小时,才又登车继续赶路。13 日下午 3 点,专列抵达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一位姓李的副主任和负责外事工作的伍修权同志带几个人在站台上欢迎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在沈阳休息一天,我们去旅馆稍事休息便去游览市容。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高岗接见我们并设宴接风,他待我们很热情,告诉我们北平正等待着新疆代表团,还向我们介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情况。14 日早 7 点再次上路,15 日晨路过天津朝北平进发。

1949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0 点,代表团结束了长途旅行抵达目的地北平。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兼河北省主席林伯渠同志登上专列欢迎我们,车下还有前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北平市党、政、军几位负责干部也来欢迎。我们驱车入城,下榻在特别为我们准备的住所(后来为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驻地)。刘格平同志也在这里,他负责接待少数民族代表,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

这次我们来参加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党中央的巨大关怀,对我们也是一次教育。我们作为

新疆代表参致，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心、重视和尊重。在北平的两个多月里，我与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国事、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对我来讲就像进了一所很好的政治学校，甚至可以说胜读十年书。这是我首次亲身接触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干部及解放军的将领们。以前我对他们的了解都是间接听到的，或从书本中读到的，这次却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在旅途中所见到的共产党负责干部都是与我以前见到的国民党官员截然不同，我的这种感受在见过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后更为强烈。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斯大林说的“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含义。

下边谈一谈我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后所得到的印象。

9月16日，齐燕铭同志（该同志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长等职）向我们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问候，他当时是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后来我才知道他负责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之间的联络工作。齐燕铭同志问我们生活起居和饮食方面有什么困难，他要我们不必客气，有事就提出来。他说不太知道我们的风俗习惯，但表示只要能办到的就一定尽力去办，做好接待工作。另外，他通知我们当晚5点周恩来同志接见新疆代表，6点请我们参加欢迎宴会。

5点整，汽车到了，送我们去周恩来同志那里。他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是昔日的日本大使馆，袁世凯与日本国就在这里签订过不平等的“二十一条”，解放初期是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毛主席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军委副主席）。齐燕铭同志已在大门口迎候，把我们领到一个房间坐下，说周副主席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请大家稍候。一个上穿平布蓝色上衣，下穿马裤的青年，给每个人倒了茶水，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等候。没多会儿，走进来一个人，衣着和那个倒茶的青年差不多，举止也很平常，他笑着朝我走来。我很纳闷，

心想莫非是服务员，可他手里又没有茶杯。他来到我面前说：“您就是赛福鼎同志吧。”我不在意地应了一声“是的”，仍坐着没动。他微笑着伸出手说：“你好！我是周恩来。”我惊慌地站起来赶忙伸出手。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路上辛苦了……”然后又和其他同志握手致以问候。等他落座后，我感到很难为情。他进来时，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周恩来。在新疆看过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照片，但没能记清谁是什么样。我想象中的周恩来一定是衣着讲究、颇有派头、外表威严的人，可眼前的周恩来，脚上还穿着旧布鞋，和一般招待员没什么区别，我哪能想到他就是周恩来呢？他亲切地同我们谈了起来，我仍很不好意思，不住地望着他。他穿的是一身旧蓝制服，而我们几个人都是欧式打扮，全套西装、裤线笔直，全身闪闪发光。相比之下，使我们更加惭愧。过后我想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平凡，也就在这一瞬间激起了我对周恩来同志无比尊敬和爱戴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开头先谈起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率领的代表团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事，并对此表示沉痛的哀悼。接着询问了我们一路上的情况，然后又问了新疆和三区的现状。我简要地一一作了汇报，对毛主席邀请我们参加政协会议表示感谢。随后周恩来同志又与我们三名代表和两名工作人员逐个交谈。他问我：“还有个哈萨克代表怎么没来？”我编了个假理由说：“因为太忙来不及赶到。”他又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政协的筹备情况，说筹备工作就绪，代表都已到齐，会议定于9月21日召开。

6点整，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到了，宴会开始。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介绍给大家，然后请大家入席。我与周恩来同志、乌兰夫同志分在同一桌，我们边吃边聊。周恩来同志一再提议为新疆代表的健康干杯（此前，可能已为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举行过宴会）。我对毛主席、党中央对新疆人民的关怀表示感谢，提议为全国人民包括少数

民族人民的解放胜利、为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健康干杯。宴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气氛非常热烈、欢快。在准备返回住所的时候，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后天毛主席要单独接见我们。

9月17日晚，我们去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戏曲节目，饶有兴趣地欣赏了京剧《野猪林》，我以前在新疆也曾看过一些旧戏，不过看得很少，戏演得也一般。今天看的戏，不论是戏的内容、服装、音乐、布景，还是演员的演技，水平都很高。德林在一旁给我解说戏的内容。接下去我们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一位姑娘飞快舞动双剑的节目（我们的座位是第一排）。这时有个人在我面前停住了脚步，当时场内光线半明半暗，什么也看不清，我一心惦着看节目，可奇怪的是这个人一动不动挡在我前面。正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由后边走来对我说：“毛主席来见见你们。”呀！我一看，真是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后面还有朱总司令，他们是由剧场通道走到我们跟前的。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们！”朱总司令也对我们表示欢迎。我连忙向领袖们道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异常激动。在暗淡的光线下模模糊糊地看到他那高大魁梧的体态和亲切的微笑。正在看戏的全场代表也认出了毛主席，全都起立热烈鼓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又回到后面座位上去了。这次会见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我想毛主席完全可以把我们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谈话，怎能让毛主席来看望我们呢！后来听周恩来同志讲，毛主席来时节目已经开演，毛主席为了不惊动场内看戏的代表们，就悄悄坐在后边看戏。原定毛主席第二天才接见我们，可当他知道新疆代表已经来了而且就在场内，于是赶紧走来看望我们。我听到这些情况心中更加感动。两三天来在北平的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周总理刚一得知我们抵达北平就立即接见并设宴招待；毛主席又很快要亲自接见，看戏时听说我们也在怀仁堂内，就赶忙来与我们见面。这是多么大的关怀

呀！同时也体现出领袖人物所特有的谦虚。看完了戏回到住处，按照自己的习惯睡觉前要写日记，这一天我的感受太多了，总不想睡，写了很长时间。

9月18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们。我们代表团一行来到中南海，进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入一间较大的会客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门口迎候，把我们让到室内。毛主席没有坐下，以示对上次罹难的代表团人员表示哀悼。毛主席沉痛地说：“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为首的新疆代表，为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在来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了。这是个惨痛的损失，不仅是新疆人民的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我们对他们表示沉痛的哀悼。”随后大家才落了座。毛主席与我们互致问候，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回答说，我们这次能作为新疆人民的代表，光荣地参加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感到十分高兴，对毛主席、党中央给予新疆人民的关怀表示谢意。毛主席逐个询问了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等人的生平，我详细地作了介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说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全是好人，是人民的革命领导人，太可惜了。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不太熟悉阿合买提江先生，在南京我们的一个记者提起过他，我们才有所闻。阿巴索夫我们比较了解，董老（指董必武同志）说在南京谈话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董老说，阿巴索夫是个天才的、聪慧的、有魄力的青年。可惜呀！太年轻了。”关于阿巴索夫的情况我作了补充介绍，说他是颇具天才的青年，才二十九岁，比我小五岁。在座的首长们都认为很可惜。这次交谈没有特定的话题，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对新疆的事情很感兴趣，我向他们介绍了新疆的整体情况，还简要介绍了三区革命的经过，革命初期所犯的错误及纠正的过程，“新盟”成立以来掌握主要领导权的革命知识分子如何端正了革命方向，一

两年来我们在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接着毛主席问我：“你们那个党怎么样了？”（指我们秘密成立的“人民革命党”，毛主席、党中央 1946 年通过董必武同志知道有这么一个党）我回答说 1948 年，在新疆当时的条件下，急需成立一个公开的组织，“人民革命党”就公开于众了。可这样一个群众组织很难担当重任，后来“人民革命党”停止了自己的活动，全部并入了另行成立的“新盟”。毛主席说：“在那种情况下你们停止了‘人民革命党’的活动是妥当的，不必难过，‘新盟’成立后取得的成绩同样是你们党的成绩。”当下委托周恩来同志处理此事，还说：“他们那个党的中央委员，可以不要候补期，直接接纳到中国共产党里来。”

我在当年 10 月 15 日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毛主席，毛主席于 10 月 23 日批准了我的申请，这是后来的事。现将我的申请书和毛主席的批示抄录如下：

申 请 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承认中国共产党党章与宗旨，志愿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并愿于今后的生活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教育下为人民服务。特此敬请接受入党。

赛福鼎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我入党申请书上的 批 示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三日

毛主席接见的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北平市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在北京饭店专为政协代表举行的宴会。董必武、聂荣臻、郭沫若等同志出席了宴会。董必武同志频频举杯对各界政协代表表示欢迎，随后聂荣臻同志和郭沫若同志讲了话。

9月19日，周恩来同志前来代表团驻地与我们长谈，他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新疆的新动态，新疆的包尔汉先生、陶峙岳先生、屈武先生、刘孟纯先生、刘泽荣先生（此人为当时的外交特派员）等准备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而马呈祥、叶成等人（他们分别属马步芳部和胡宗南部）准备逃往国外，穆·布格拉、艾沙为首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反动分子也要同他们一路外逃。周恩来同志说完，把三区拍来的电报交给了我。那份电报中，包括以三区临时政府名义向乌鲁木齐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要求。其内容如下：

1. 将马呈祥、叶成、麦斯乌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尧乐博斯、贾尼木汗、哈德万、乌斯满、哈力伯克、扎克钦、赛义德、艾合买霍加、苏皮伯克阿吉等人列为战犯，没收其财产。

2. 新疆省政府要脱离蒋介石集团，宣布起义。

3. 清除省政府中的穆·布格拉、贾尼木汗、王曾善等反动分子，在民主基础上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新政府，该政府要宣布实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4. 新政府要宣布立即实现民主，实现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性别诸方面的平等。

5. 关闭省反动军事机关和各地特务机关，立即停止发行反动报刊。

6. 全数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所谓政治犯。

7. 保证国民党起义或撤退地区人民的安全，保护档案资料。

我们研究了三区政府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些要求符合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所起草的纲领精神。我提出了需要修改之处并准备复电。后周恩来同志拿出伊宁再次拍来的电报同我商量，三区政府方面要求半路拦截逮捕向印度逃窜的叶成、马呈祥、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走就让他走，不必拦他。”（后来有一次我遇见毛主席，主席对我说：“想跑的就让他跑，以后你们的麻烦会少一点。国外骂我们的有几千人，再加上几百人也没什么。”）我们决定不拦击他们，于是我给伊宁发了回电。我们紧接着研究将要成立的新疆新政府的性质和成分，在这一问题上还需费些脑筋。最后周恩来同志提出了组织问题、干部问题、军事问题。在谈到三区民族军时，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民族军一定要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配合解放军进疆。从民族军中抽调一个团赴乌鲁木齐，再抽调一两个团赴喀什，再从三区（主要从军队中）抽调千名左右优秀干部，派他们赴乌鲁木齐和其他七区工作。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意。我准备就有关事项给伊宁发报。这一天我们谈得很投机，涉及面也广，

共谈了两个多小时。

第四章 盛大的庆典

1949年9月的最后十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隆重的大会。整个大会显示出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心愿,体现了各族人民代表的意志。会议以民主方式选举出临时代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责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人选;批准通过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实现了中国人民多少世纪以来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梦寐以求的最大宿愿。这不只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件盛事,同时也是自苏联十月革命后,国际上发生的又一重大事件。

会议在开幕之前,给代表们分发了各种文件。对组织原则和政协共同纲领草案,大家进行了广泛认真的讨论。此外还分别召开了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听取代表对各种草案的意见。9月21日上午又召开了一次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会上自始至终都在收集意见。这个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代表们都表示同意各个草案,个别意见已在上次座谈会上发表过了,再没有其他不同意见。

政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21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7点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全体代表起立长时间鼓掌,“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大厅,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政协筹备会副主任周恩来同志首先简要报告了有关会议筹备的情况,然后提出会议主席团名单,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主席团人员上台就座,会议主持人朱德同志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奏《义勇军进行曲》,场

外鸣礼炮四十响。接着由毛主席致开幕词，历时 15 分钟的讲话，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讲话结束时，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最后毛主席提议为革命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接下去是个人发言，上台发言的有共产党代表刘少奇，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民主建国会代表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和林伯渠，中国工人联合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人民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特邀代表张治中、程潜和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人也发了言。代表们代表各党派团体、少数民族、军队、工人、农民、侨胞热烈祝贺政协一次会议召开，表示坚决执行大会日程。他们的发言都得到了全场代表的热烈掌声。也许因为我们是来自尚未完全解放的新疆的解放区代表，代表们特别重视和尊敬我们，我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我首先祝贺政协一次会议的召开，然后讲了新疆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情，并代表新疆人民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烈欢迎解放大军进疆。接着我简要地讲述了新疆人民过去备受压迫和奋起反抗的历史，表示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新疆人民的革命愿望。

会议第二天，开会之前周恩来同志向我提出要公开阿合买提江一行遇难的消息，准备给新疆发一个唁电。我对周恩来同志说，他们遇难逝世的消息在我们离开之前要绝对保密，并说明了原因。他同意了，这份当时已拟好的电报一直到新疆为烈士们举行追悼会时，才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发出，电文如下：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新疆省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同志，新疆省伊犁、阿山、塔城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拜克同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杜克力木同志，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列力汗同志和新疆中苏文化

协会的罗志同志代表新疆人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幸竟于1949年9月因飞机失事，中途遇难牺牲。这对于新疆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实是一个重大损失。谨此电唁，表示深切的哀悼，尤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中，继续并发扬先烈的遗志。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49年11月28日

此电报与毛主席、中共中央的唁电同时发表。

在当天的大会上，我向毛主席献上了维吾尔族长袍和维吾尔族花帽，这种仪式在这次大会上还是首次。我先讲了几句话，说明维吾尔族人民有给尊贵的人披上长袍的习俗，请毛主席接受这一礼物并给毛主席披上长袍戴上民族帽。这时全场代表起立鼓掌，直到我走下主席台回原位坐下，掌声一直没断。

休息时间，代表们把我们围了起来，表达出他们每个人的喜悦心情，尤其是记者们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问披上民族袍的意义、袍子用的什么布料又如何缝制的、什么场合送给什么人等等。记者越聚越多，问题也就越提越多。记者们要求另找时间采访我们，了解新疆的全面情况。大会秘书处指定了二十名记者，定于9月25日采访我。我与记者们谈的内容相当广，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新疆人民听到政协一次会议开幕的消息无不欢呼雀跃，特别是三区人民和政府机关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新盟”中央和七区各县也发来了贺电。“新盟”中央来电内容如下：

致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盟员的名义祝贺中国人民革命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我们热烈地拥护和参加这次会议，并预祝它取得伟大的胜利。

疆驻军司令陶峙岳为首的军事将领及包尔汉主席为首的若干政府成员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向人民解放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消息，我们对在你们领导下、在解放大军指引下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使人民获得自由而感到无比高兴。谨对你们给予新疆人民的这一恩惠表示感谢。

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赛福鼎·艾则孜、阿力木江、涂治

1949年9月29日

此外，我们在征得周恩来同志同意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在1949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与彭德怀同志的贺电同版刊登。内容如下：

大标题 《政协新疆代表声明》

副标题 陶峙岳、包尔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残余政府，顺应新疆人民的要求，宣告与伊犁等三区人民及全新疆人民一起建设新新疆

〔新华社29日电〕对于新疆当局陶峙岳、包尔汉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三位新疆代表于今天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在北京正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听到了前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表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声明，我们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

多年以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新疆人民，包括已解

放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在内，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支援，和平地获得了解放，衷心表示感激。

新疆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行将改组的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保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几年来反对迪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新疆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三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代表

赛福鼎

阿里木江

涂治

1949年9月29日

远在新疆三区的“新盟”代理主席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为新疆和平解放一事也给毛主席发了贺电。电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尤其近来在西北取得胜利之际，我谨向阁下并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表示祝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中，奠定了自己的民主新生活的基础，但是仍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民族歧视和文化破坏。这次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省的国民党反动派被消灭了。全省人民在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集会，表示拥护和庆祝这一历史事件。三区人民向阁下表示衷心的感谢。全新

疆将在阁下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巩固经济,为建立幸福、进步、文明和各族一律平等的新生活而努力。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代理主席 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

1949年9月28日 于伊犁

毛主席在百忙当中以个人名义复电给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电文如下:

艾斯海特先生并“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胞:

感谢你们的祝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的斗争,是对解放新疆、解放全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愿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团结一致,为建成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

1949年10月21日

政协会议一天天深入,或大会发言,或小组讨论。代表们精神十足,都非常热烈地参加讨论。会议安排的讨论议程,首先是共同纲领,然后是各种机构组织法,最后还要讨论候选干部名单。此外还要讨论几个重要议题,那就是确定国徽、国旗、国歌和首都。讨论中代表们对各项议程没有多大意见,争议较大的是首都和国旗问题。有的人(例如其他党派个别负责人)主张并坚持定都南京、保留国民党时代的国旗。周恩来同志重申中央提出的方案,对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最终获得通过。

9月30日是政协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两点半大会开始,会上提出了候选人员名单,全体代表一致同意,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投票完毕,因计算选举结果需要一定时间,大会宣布休会,让代表们前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广场上聚

集了許多人，有代表，有軍人，還有群眾。周恩來同志宣布儀式開始，請毛主席講話。毛主席作了簡短而感人的講演，然後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各代表團團長按次序向基石上添一鎊土便結束了這一重要儀式。黨和政府在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期間，在舉國歡慶勝利的時候，並沒有忘記那些為了革命勝利而作出貢獻的烈士們，並以革命的敬意和深厚的階級感情來追念他們，這對每個代表確是一次受教育的大好機會。

代表們從天安門廣場返回懷仁堂後會議繼續進行。由大會主席劉少奇同志宣布選舉結果，他首先宣布毛澤東同志以全票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場響起長時間最熱烈的掌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震蕩着整個大廳。然後劉少奇同志宣布朱德、劉少奇、宋慶齡、張瀾、李濟深、高崗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代表們又報以長時間掌聲表示祝賀。大會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加上政府委員共六十三人（其中有我）。大會還一致選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主席、副主席、常務委員和秘書長。毛主席當選為政協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等為政協副主席。

10月1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舉行了第一次委員會會議，推舉林伯渠為政府秘書長，任命周恩來同志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沈鈞儒同志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同志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此外還任命了其他重要領導機關首長，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公告。至此，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光辉的一天，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展示出新的一章。这一天实现了亿万中国人民多少世纪以来所追求的愿望，这一天是以先烈们的鲜血为代价才换

来的。当天早晨，整个北京城沉侵在欢乐之中，男女老少都自动拥上街头庆祝这一盛大节日。太阳也仿佛在向北京人、中国人祝贺似的格外明亮。北京城各处锣鼓齐鸣、笑语欢歌。身穿节日盛装的男男女女纷纷向天安门聚集，这种欢悦的气氛加上明媚的阳光使每个人心潮难平。

下午两点半，我们登上天安门主席台参加开国典礼。从城楼上放眼望去，广场上人山人海，根本望不到边。长安街两侧及其他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市民们不顾大会规定的人数限制，凡能出来的全拥出家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群众手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画像，高举横幅标语和五颜六色的大幅彩旗，等候着庄严时刻的到来。人们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仰望着天安门，急切想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盼望大会早点开始。这不仅是北京人民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在这个大会上，将宣告千百年来革命先辈为之献身的伟大理想实现了；将宣告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已成为过去，将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将宣告国民党卖国政权专制制度已被彻底摧毁，将要实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奇迹的出现，不仅中国人民为之高兴，而且正盼望着人类解放的各国人民也会为之高兴。

广场上的人民从心底崇敬和热爱革命领袖毛主席及其战友们。正是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不倦地奋斗，领导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披荆斩棘才取得今天的辉煌胜利。人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军队所进行的长期武装斗争，是不可能打下江山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领袖就是在人民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如果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虚心向人民学习、从人民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确指导人民的领袖人物，那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革命也不可能达

到革命目的。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國革命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毛泽东同志时刻都在人民心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人民伟大领袖这一伟大、光荣的称号，受到世代人民的衷心爱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领袖而感到光荣和自豪，是理所当然的。

下午，近三点，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原本站在城楼检阅台的边侧，毛主席见到我就拉住我的手一同往城楼中间走，最后我站到主席台第二排董必武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之间。毛主席刚出现在天安门主席台上，整个广场顷刻间被欢呼声淹没了，“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在北京城上空回荡。天安门广场发出的声浪传向远方，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一齐向群众招手致意，口号声再次响起。广场上人海滚动，广大人民向敬爱的领袖喊出了发自肺腑的最强音，人人都情不自禁地淌下幸福的热泪。

三点整，林伯渠同志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开始，乐队奏起国歌，乐声响彻广场，响遍全城。毛主席用高亢的声调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广场上响起排山倒海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直冲云霄，庆典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亲自按下旗杆的电动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礼炮齐鸣。城楼上的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都举头瞻仰这第一面徐徐上升的国旗。此时究竟有多少人滚下激动的泪水！旗杆顶端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这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红旗。

这是胜利的旗帜！ 这是光荣的旗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赛福鼎回忆录

作者 =

页数 = 5 2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